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簡帛研究

二〇〇四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內容提要

20世紀是簡牘帛書大發現的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來的幾批重大發現，震驚了中外學術界。如今，簡帛研究已成為專門之學，與甲骨學和敦煌學一起被視為國際顯學。為推動簡帛研究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曾先後編輯出版了《簡帛研究》一至三輯、《簡帛研究二〇〇一》、《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及《簡帛研究譯叢》一至二輯，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這裏，奉獻給大家的《簡帛研究二〇〇四》集中收錄了近年來簡帛研究的前沿成果。本書所收論文，既有微觀的考證，也有宏觀的闡釋，對歷史學、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等學科的專家和廣大讀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簡帛研究

二〇〇四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室

卜憲群 楊振紅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2004/卜憲群, 楊振紅主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633-6274-6

I. 簡... II. ①卜...②楊... III. ①簡(考古)—研究—文集②帛書—中國—文集 IV. K877.0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19560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889 mm × 1 194 mm 1/16

印張: 30.5 字數: 40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 001~2 500 冊 定價: 98.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顧問

田余慶 [日]永田英正 何茲全 林甘泉 徐蘋芳
裘錫圭 [英]邁克爾·魯惟一 (Michael Loewe)
饒宗頤

編輯委員會主任

李學勤 謝桂華

主編

卜憲群* 楊振紅*

編輯委員

卜憲群* 邢文 李學勤 宋艷萍* 汪桂海
馬怡* [日]靱山明 侯旭東 孫曉 [日]富谷至
陳松長 梁滿倉 鄔文玲* 楊英 楊振紅* 蔡萬進
趙凱 劉馳 劉樂賢* 謝桂華

(顧問、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排列，加“*”者爲本輯執行編輯)

簡帛研究

選堂題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環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著名簡帛學家謝桂華先生逝世

著名簡帛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謝桂華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06年6月12日去世，享年68歲。

謝桂華，男，漢族，1938年10月生，湖南新化人。1963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同年到中國科學院（1977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歷任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戰國秦漢史研究室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理事、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等職。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謝桂華先生主要從事秦漢史和簡帛研究，重點研究秦漢行政文書簡，並做了大量簡牘整理工作，科研成果豐碩。他參與主持了《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的整理編纂工作。合校本充分吸收國內外有關釋文成果，在釋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978年至1994年參加居延新簡整理工作，合作出版《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中華書局，1994）。1995年至1997年主持尹灣漢墓簡牘整理工作，合作出版《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2002年至2003年參加額濟納漢簡整理工作，合作編纂《額濟納漢簡》（魏堅主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謝桂華先生先後發表《〈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補正舉隅》（合撰）、《〈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質疑》（合撰）、《〈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平議》（合撰）、《秦漢物價資料輯錄》（合撰）、《漢簡和漢代的取庸代戍制度》、《〈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考釋》、《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續）、《元康四年賜給民爵名籍殘冊再釋》、《漢簡與漢代西北屯戍鹽政考述》、《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尹灣漢墓簡牘初探》（合撰）、《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尹灣漢墓新出〈集簿〉考述》、《漢簡草書辨正舉隅》、《居延簡所見秋射及其相關文書考述》、《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百年簡帛》（上、下）、《秦漢簡帛與秦漢史研究》（合撰）、《漢簡所見律令拾遺》、《西北漢簡所見祠社稷考補》、《西北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韓國咸安城山山城木簡初探》、《〈二年律令〉所見漢初政治制度》、《張家山漢簡[247號墓]校讀舉例》、《初讀額濟納漢簡》、《額簡“芡錢”試解》等多篇學術論文，在國內外學界有較大反響。

謝桂華先生畢生致力於簡帛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參與了籌備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創辦《簡帛研究》和《簡帛研究譯叢》雜誌、籌辦1991年甘肅蘭州“中國簡牘學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和2001年湖南長沙“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策劃“簡帛研究叢書”出版等工作。

謝桂華先生注重培養簡帛整理與研究的後備力量，先後指導或共同指導過十多名學生，包括外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

謝桂華先生的去世是秦漢史學界和簡帛學界的重大損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徵稿簡約

- 一、本刊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的專業性學術刊物，歡迎與下述內容相關的論文投稿：
 1. 出土簡帛的辨識、考證；2. 根據出土簡帛考辨史實，研究中國古代的各種制度、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狀況；3. 有代表性的國外簡帛研究譯文；4. 簡帛研究綜述；5. 簡帛研究著作書評；6. 簡帛研究論著索引。
- 二、本刊提倡嚴謹的學風，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相互尊重的自由討論。本刊發表的文章均不代表本刊的意見，由作者文責自負。
- 三、來稿請提交一份文本稿，一份電子文稿（電子郵件或磁盤）。
- 四、本刊採用繁體橫排。
- 五、本刊實行頁下注。注釋中所引專著，務請注明著者、書名、卷數、出版社名稱、出版時間和頁碼；所引論文請注明篇名、刊物名稱和期數。如果引用書目為外文，請用原文，不必譯成中文。
- 六、投稿者（書評、索引、譯文除外）請附 300 字以內的中文提要 and 3—5 個關鍵詞。
- 七、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專家審稿制度。稿件中請勿出現作者個人信息，有關作者姓名、單位、聯系方式等，請另紙提供。
- 八、本刊對刊登的稿件擁有為期兩年的專有版權。作者如有異議和特殊要求，請於投稿時聲明。請勿一稿兩投。
- 九、本刊處理來稿期限為 60 個法定工作日。逾期未接到通知，作者有權對自己的稿件另行安排。因本刊經費緊張，來稿一律不退，請作者自留底稿。
- 十、來稿請寫明作者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工作單位、職稱或職務、通訊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以便聯系。

來函請寄：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五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

戴衛紅收 郵編：100732

電子郵件請寄：jbyj2005@yahoo.com.cn

目 錄

| | |
|--------------------------------|------------------------|
| 試說江陵天星觀、秦家嘴楚簡的紀年 | 李學勤/1 |
| 楚簡中的媼舍禮舍與空舍穴舍再議 | 黃錫全/7 |
| 包山楚簡及其傳遞的楚國信息 | |
| ——紀年與社會體系 | [日]藤田勝久 著 許道勝 譯/13 |
| 論郭店楚簡所見儒家音樂思想 | 彭 林/35 |
| 《太一生水》補疏 | 李 銳/49 |
| 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 | 姜廣輝/53 |
|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中的經典詮釋傳統 | |
| ——《關雎》的詮釋及有關方法論問題 | 邢 文/59 |
| 《上博竹書〈四〉》問詁 | 孟蓬生/68 |
| 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 | |
| ——結合張家山漢簡看名田宅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徵收 | 楊振紅/79 |
| 簡帛札記二則 | 劉樂賢/99 |
|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初步研究 | 陶 磊/104 |
| 簡帛筆記二則 | 王志平/112 |
| 里耶秦簡“陽陵卒”簡蠡測 | 宋艷萍 邢學敏/121 |
| 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 | 汪桂海/135 |
| 關於《二年律令》題名之再研究 | 李 力/144 |
|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 | 鄒文玲/158 |
| 《二年律令·賊律》整理芻議 | 初世賓/173 |
| 《二年律令》中的“守將” | 陳 偉/189 |
| 鳩杖與徭役制度 | [日]山田勝芳 著 莊小霞 譯/192 |

| | |
|-------------------------------------|-----------------------------|
| 漢律中有關行為能力及責任年齡用語考述····· | 徐世虹/210 |
| 漢代婚姻家庭另類形態的法律依據····· | 李解民/224 |
| 尹灣漢墓簡牘軍吏“以十歲補”補證····· | 卜憲群/234 |
| 尹灣十號木牘師君兄貸師子夏券文初探····· | 蔡萬進/242 |
| 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 | 馬 怡/248 |
| 西北漢簡所見祠社稷考補····· | 謝桂華/258 |
| “不和”與“不節”：漢簡所見西北邊地異常氣候記錄····· | 王子今/272 |
| 漢代邊境防禦制度初探 | |
| ——以出土漢簡日迹簡為中心的考察····· | 張俊民/279 |
| 說“有方”與“方” | |
| ——從《由漢簡“方”與“幡”看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一文談起····· | 張小鋒/295 |
| 漢代的家貲與貲家····· | 于振波/306 |
| 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看孫權時期的商品經濟狀況····· | 高 敏/317 |
|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地名、人名釋文校證····· | 胡平生/329 |
| 走馬樓吳簡“地獄錢”考····· | 李均明/347 |
| 簡帛書籍標題研究····· | 張顯成/354 |
| 楚簡“性自命出”篇考察····· | [日]金谷治 著 龔穎 譯/377 |
| 懸泉置及其周邊 | |
| ——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 | [日]宮宅潔 著 李力 譯/391 |
|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飲漆”解····· | [日]大川俊隆 田村誠 著 張愛萍 譯/430 |
| 關於漢代材官、騎士的身份····· | [日]高村武幸 著 楊振紅 譯/449 |
|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莧》釋文補正····· | [日]伊藤敏雄 阿部幸信 主編 蔡玫 譯/464 |

試說江陵天星觀、秦家嘴楚簡的紀年

◎ 清華大學
李學勤

內容提要 本文就江陵天星觀 1 號墓簡、秦家嘴 99 號墓簡和秦家嘴 1 號墓簡的紀年問題進行了探討。據曆日推知，江陵 1 號墓簡“秦客公孫鞅問王於菽郢之歲”合於公元前 340 年，“齊客申履問王於菽郢之歲”是公元前 339 年；秦家嘴 99 號墓簡與天星觀 1 號墓簡同時；秦家嘴 1 號墓簡“周客艱無王于宋東之歲”是楚頃襄王十六年，即公元前 283 年。

關鍵詞 江陵天星觀 1 號墓簡 秦家嘴 99 號墓簡 秦家嘴 1 號墓簡 曆日 紀年

一、天星觀 1 號墓簡

江陵天星觀 1 號墓，是荊州地區博物館在 1978 年發掘的。墓早期曾遭盜掘，但仍在墓的西室發現竹簡，“一部分夾在漆皮中，壓在兵器杆下，被盜墓者踩斷。一部分放在竹筩內，保存較好……經初步整理，簡文內容有‘卜筮記錄’和‘遺策’。整簡 70 余枚，其餘殘斷”。^①發掘報告已於 1982 年發表於《考古學報》，但簡迄未全部公布，只有報告和黃錫全先生《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滕壬生先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印出少數照片，滕書還摘摹了若干字形。^②王明欽先生撰有《湖北江陵天星觀楚簡的初步研究》論文^③。

①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

②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圖版 179。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③ 王明欽：《湖北江陵天星觀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1989。

報告說明墓主是鄧陽君番（潘）勅，係潘崇一族之後。關於墓的時代，報告舉出其青銅鼎足形似望山 1 號墓、藤店 1 號墓的鼎，而與擂鼓墩 1 號墓的相差較遠。小口鼎、盃尤與望山 1 號墓所出相近。陶甕，則類於信陽長台關 1 號墓。報告還特別指出，卜筮簡中有“貞人”軛腹志，其人也見於望山 1 號墓簡，“可知兩墓的年代應相差不遠，當均為戰國中期。”^①

天星觀 1 號墓簡有四條紀年，多見的兩條是“秦客公孫鞅問王於菽郢之歲”和“齊客申臆問王於菽郢之歲”^②。

發掘報告說：“在‘卜筮記錄’中，三條簡文記有‘秦客公孫鞅（鞅）聞（問）王於菽郢之歲’的年號……無疑，秦客公孫鞅使楚，是楚國這一年中外交活動方面的重大事件，可見，公孫鞅其人，在秦國是一位重要人物，在秦楚兩國關係中起過重要作用。戰國中期，秦國姓公孫氏名鞅的有名人物，據史書記載只有一個，即‘相秦十八年’的商鞅……公孫鞅在秦二十四年，後二年封於商，史稱商鞅，前二十二年，史稱公孫鞅或衛鞅。因此，推測簡文中‘秦客公孫鞅’的年代應是商鞅在秦受封的年代，即公元前 361-340 年……這樣，墓葬的下葬年代應晚於公元前 361 年，而在公元前 340 年前後，即楚宣王或威王時期。”^③這個分析顯然是正確的。

在已發表材料中，可以看到該年兩個曆日，即：

秦客公孫鞅（鞅）問王於菽郢之歲，冬祭之月，甲寅之日^④

秦客公孫鞅（鞅）問王於菽郢之歲，十月，丙戌之日^⑤

兩個都是“月貞”，這種貞卜行於月的朔日或稍後幾天。這樣的曆日，與“齊客申臆問王於菽郢之歲”的各個曆日，如《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所收一支簡的“臱（饗）月，己酉之日”，互相調和銜接，并能由後者推知“秦客公孫鞅問王於菽郢之歲”的冬祭（周正十二月，夏正十月，均在上年）甲寅應即朔日，正合於公元前 340 年（楚曆冬祭在其上年亥月）^⑥，而“齊客申臆問王於菽郢之歲”是公元前 339 年。

公元前 340 年，是秦孝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但此時秦用周正建子，所以宣王三十年的冬祭之月，是孝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月。公孫鞅受命聘問楚國，或即選取楚國的元旦之日，以致楚人以之紀年。查《史記·秦本紀》、《六國年表》及《商君列傳》，這時公孫

①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110 頁。

② 劉彬徽：《早期文明與楚文化研究》，岳麓書社，2001，190 頁。

③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110—111 頁。

④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圖版 179。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173—1174 頁。

⑤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 1 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108 頁，圖 32。

⑥ 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齊魯書社，1987，98 頁。

鞅變法已成。到孝公二十二年，他率兵擊魏，虜魏公子卬，受封為列侯，號商君。問楚的時候仍稱“公孫鞅”，是適合的。

公元前 339 年，是楚威王元年。簡文卜邱陽君潘勑（勝）的病情，直至年末，不再有下一年接續。看來墓主的死去，恐就在這一年結束的時光。至於下葬，或許已過了楚曆新年了。

“齊客申臚”屬於申氏，當與申縛為一家。公元前 333 年，即楚威王七年，楚攻齊的徐州，敗齊將申縛於泗水之上，事見《戰國策·秦策四》“或為六國說秦王”章、《齊策一》“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時間與簡文接近。“申縛”之名，或作“紼”，《史記》又作“紀”^①，有没有可能本來是個與“臚”通假的字，也是值得考慮的。

還要提到，上述簡文曆日，在公元前 340、339 年之後，再可相合的要到公元前 304、303 年，這個年代太晚，與考古分期顯示的相對年代不能對應。因此，即使擱置“公孫鞅”的證據，也很難作另一選擇。

天星觀 1 號墓簡其餘的紀年，一條見有照片的，是“左師庸聘於楚之歲”^②，左師疑為宋國使臣，事迹無考；另外一條也是這樣，兩者曆日太少，不能供推求之用。

二、秦家嘴 99 號墓簡

荆沙鐵路考古隊在江陵秦家嘴發掘楚墓，時間是在 1986 年 5 月到 1987 年 6 月。期中共發掘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墓 105 座，其中 1 號、13 號、99 號三座小墓出有竹簡^③，都是卜筮祭禱一類記錄。由於沒有詳細報告發表，這三座墓的分期還不清楚。

最近，武漢大學的晏昌貴先生根據 1995 年出版的滕壬生先生《楚系簡帛文字編》，輯錄出秦家嘴一部分簡的文字，做了聯綴復原^④。這為目前的討論，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這裏先談秦家嘴 99 號墓的簡。

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簡內有占卜者“軫臚”^⑤，應即天星觀 1 號墓簡的“軫臚志”。此人也見望山 1 號墓簡，下文還將講到。

秦家嘴 99 號墓簡與天星觀 1 號墓簡的同時，更可以兩者的紀年來證明。晏文復原的第 15 簡云（字的寫法依晏文）：

①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473 頁注 6。

②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圖版 179。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174 頁。

③ 荆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 年第 2 期。

④ 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 年第 1 期。

⑤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023 頁。

秦客公孫鞅聘於楚之歲，八月庚子之日，野以其有病之……

公孫鞅對楚的聘問，不可能有多次，所以“秦客公孫鞅聘於楚之歲”應該就是天星觀簡的“秦客公孫鞅問王於菽郢之歲”，也即秦孝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 340 年。這一年楚曆八月己卯朔，庚子是二十二日，正好符合。

同墓簡文，據晏文還有：

第 3 簡：“野以其有病之恙也，至秋三月，瘞，毋死，與妻子毋……白羽之戢。”

第 14 簡：“秋三月擇良月良日，與禱大地主一牀，與禱太，纓之吉王，疾速瘞，速賽之，占之吉。”

復原或許有一些問題，但占卜的時間一定在“秋三月”以前。按第 15 簡的楚八月是午月，時在仲夏，也便是“秋三月”的前兩月。由此看來，這些簡的時間相當集中。簡文已經說到墓主野至秋“毋死”，說明病體沈重，他的死亡應在當年，甚至就在占卜後不久。這比天星觀一號墓的潘勝要早一年。

三、秦家嘴 1 號墓簡

關於江陵秦家嘴楚墓的發掘經過，以及竹簡出土、發表的情況，在上節討論秦家嘴 99 號墓簡時，都已經敘述過了。以下試再就其 1 號墓簡做一試探，材料仍據晏昌貴先生的工作^①，不再詳注。

晏文復原的秦家嘴 1 號墓第 1 簡，其釋文是（字的寫法依晏文）

周客輓無王於宋東之歲，冬夕之月，辛未之日，紫以其又（有）疾之古（故），筮之於胡□曰：有敕（祟）。

“周客”，按楚簡慣例是指周王室派來的使臣。戰國文字“韓”常作“軼”，此處加從“邑”，仍應讀“韓”，“韓無”可能為使臣之名，而於“無”下脫一“問”或類似之字。不過滕壬生先生的《楚系簡帛文字編》“無”字下或加“？”號^②，也或徑缺該字不釋^③，說明該處文字尚有問題。無論怎樣，這一紀年講的是周朝使臣在宋東晉見楚王之事。

楚王何以在宋東接見周王來使？這一定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以下試作一推測。

《史記·宋世家》言宋王偃之末，“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

① 晏昌貴：《秦家嘴“卜筮祭禱”簡釋文輯校》，《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 年第 1 期。

②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023 頁。

③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559 頁。

地”，《漢書·地理志》也說宋“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

吳師道以來，不少學者懷疑《史》、《漢》上述記載，如梁玉繩《史記志疑》說：“潛王滅宋，未嘗與楚、魏共伐而三分其地，《六國表》及各世家皆不書……《國策》吳注曾論之，云：‘蘇代說燕曰：齊王南攻楚，西困秦，又以其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說秦曰：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使當時齊與楚、魏合，其言豈若是乎？史稱齊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是其乘滅宋之強，并奪楚、魏地，而謂與之分宋地，豈其實哉？樂毅勸燕昭王約趙、楚、魏伐齊，曰攻齊莫若結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年表書楚、趙取齊淮北，則楚、魏分地當是樂毅破齊後事。’此論甚確。”^①顧觀光《七國地理考》等，也有類似論述^②。

按齊潛王攻宋，實際不僅一次，這由近年發現的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策》可以證明。據繆文遠先生研究，齊第一次攻宋在公元前 288 年，取得宋淮北之地。這次進攻，燕王曾派張魁率軍參加，爲齊王所殺。第二次攻宋在公元前 287 年，楚、魏派兵與之爭地，魯國也乘機攻取徐州，結果齊、宋媾和。到公元前 286 年，齊第三次攻宋，當時宋太子出走，國內不寧，終將宋國吞滅，齊潛王因此自驕。公元前 284 年，燕、韓、趙、魏、秦五國伐齊。燕軍在樂毅指揮下進入齊都臨淄，並在五年間攻下齊國七十二城。^③

楚國在伐齊戰事中的地位是很微妙的。《史記·田齊世家》稱：“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楚世家》云：“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這樣，楚是站在五國一側的，然而《田齊世家》又說：“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與《戰國策·齊策六》所言“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對照，楚似又站在齊國一邊。看來，楚當時是前後不一，並且使用了兩面的手法，先與五國合謀，隨後又派淖齒助齊，而收取淮北則是其實際的目的。

淮北指今江蘇、山東之間的地帶，也即是原來宋國的東部，《漢志》說楚分宋得沛，也應即指同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楚世家》講“楚王”伐齊，取淮北，看來秦家嘴 1 號墓簡所記楚王在宋東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同時，魏也攻取原來宋國的一大部分，《漢志》所說於此亦有踪跡。^④

五國伐齊，燕軍入臨淄，在公元前 284 年，即楚頃襄王十五年。楚王攻取淮北，也在這一年中，或當在該年之末。簡文“周客輓無（？）王於宋東之歲，冬夕之月”，是楚曆第一月亥月，當爲楚頃襄王十六年。“率未之日”，因該月癸丑朔，是十九日。這時楚王在

① 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966 頁。

② 參看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345 頁注 2；又《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6 頁。

③ 繆文遠：《戰國史系年輯證》，巴蜀書社，1997，168—179 頁。

④ 楊寬：《戰國史》，349 頁。

新收得的淮北即宋東，因而周使到那裏去見他。

現在看到的秦家嘴 1 號墓簡只有這一條曆日，對墓主（名紫）的病情也不能多作討論，但從沒有其他紀年推想，其人應即卒於該年，就是楚頃襄王十六年，公元前 283 年。

目前還沒有秦家嘴 1 號墓的發掘報告發表，以上推論能否與墓的考古分期一致，有待將來判斷。

楚簡中的媼畬禮畬與空畬穴畬再議

◎ 中國錢幣博物館

黃錫全

內容提要 本文列出有關楚先祖名媼畬、禮畬與空畬、穴畬的材料，在羅列、比較諸家之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個人傾向性的意見。傾向媼畬、禮畬與空畬、穴畬應分別釋讀為鬻熊和穴熊，楚人祭祀祖先可能分為老童—祝融—穴熊（一組）和老童—祝融—鬻熊（一組）兩組。有關疑難問題的確定，還有待考古新發現。

關鍵詞 楚先 老童 祝融 穴熊 鬻熊

楚簡中陸續有楚先祖名媼畬、禮畬與空畬、穴畬的材料出現，這對於研究楚史十分珍貴。由於文字書寫有別，這些名稱究竟是一位先祖名還是兩位先祖名，學術界至今未能達成共識。本文擬就這一棘手的問題，簡要談一點傾向性的看法。^①

① 此文早已草就，準備發表時在簡帛研究網站上看到宋華強先生的論文《〈離騷〉“三後”即新蔡楚簡“三楚先”說——兼論穴熊不屬於“三楚先”》（2005年3月4日），他的某些看法與我相近。後來又讀到賈連敏《新蔡竹簡中的楚先祖名》（《華學》第七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賈先生又提出不同意見。原考慮不發此文，近來覺得這個問題還可以再議一議。不過，最後的確定，還有待於新材料的發現。

一、有關材料

楚簡中名“媿禽”者見於下列材料^①：

壻禱楚先老童、祝融、媿禽各一牂。

包山楚簡 217

壻禱楚先老童、祝融、媿禽各兩牂。

包山楚簡 237

□先老童、祝□、媿禽各一牂。

望山楚簡 M1, 120、121

楚簡中名“禮禽”者見於下列材料^②：

□以元(其)古(故)敗(說)之，壻禱楚先：老童、祝融(融)、禮禽，各兩牂(牂)。

新蔡簡甲三 188、197

楚簡中名“空禽”者見於下列材料：

又(有)敗(崇)見於司命、老童(童)、祝融(融)、空禽。 新蔡簡乙一 22

融(融)、空禽，各一牂(牂)。

新蔡簡乙一 24

□[祝]融(融)、空禽，各□。

新蔡簡零 288

楚簡中名“穴禽”者見於下列材料：

□[老]童、祝融(融)、穴禽，芳屯一□。

新蔡簡甲三 35

□[祝]融(融)、穴禽、邵(昭)王、獻[惠王]□。

新蔡簡甲三 83

□[祝]融(融)、穴禽、邵(昭)王□。

新蔡簡零 560、522、554

□[祝]融(融)、穴禽、敦(就)禱北□。

新蔡簡零 254、162

①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41頁，102頁注101。

② 下列所列新蔡簡材料均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

二、有關意見

李學勤先生認為，包山楚簡的“媼舍”即“鬻熊”。媼字從女，蟲省聲，古音在冬部，與覺部的鬻剛好入、陽對轉。“它與質部的‘穴’字不會有什麼關係，因而簡上這一楚先祖名是穴熊的可能性應該排除。”^①李零先生也同意這種看法^②。

李家浩先生認為，“媼”字從蟲、女聲，疑即“蛩”或“蛩”的異體。蛩與穴、鬻二字的讀音都相去甚遠，媼舍既不是穴熊，也不是鬻熊，而應該是另外一個人，即長琴。《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長琴”與“蛩舍”音近。後來他見到新蔡楚簡“蛩”字又作“空”，認為新蔡簡的這個字從穴，土聲，《史記·楚世家》的“穴熊”即其訛誤。土屬透母魚部，女屬泥母魚部，聲母都是舌音，韻部相同，故可通用。指出把長琴與穴熊作為二人有誤，應是一人。^③

曾憲通先生《再說“蟲”符》一文認為，土旁、女旁、示旁等“恐非聲符，因為形聲字的聲符一般是不能省略的”，“它們共有的‘蟲’符才是聲符。如此，則‘媼舍’、‘禮舍’均可讀為‘鬻熊’，正可與李學勤先生釋作‘鬻熊’互相印證”。^④

黃德寬先生認為禮舍和穴舍同為一人，禮有可能在簡文中讀為穴。他舉出從穴的狄、𡗗(you)古音在幽部，聲母與“𡗗”讀音相近，這就意味着禮有可能在簡文中讀作穴。認為《大戴禮記·帝系》篇中的“內熊”之內乃是穴的變體。^⑤

魏宜輝、周言先生同意黃德寬先生認為禮舍和穴舍同為一人，禮有可能在簡文中讀為穴的观点，但他“懷疑這個字很可能不是‘穴’（或空），而是‘六’（或壺）字”。因為六和穴是形體很近的兩個字，很容易相混。六與𡗗、鬻讀音相近，六熊即鬻熊。並認為黃德寬所舉的狄、𡗗二字可能也從六，而誤作穴，但其讀音仍保留了六的音。《大戴禮記》中的內熊之內，可能是六字的變體。^⑥

宋華強先生認為，《離騷》中的“三後”即新蔡楚簡“三楚先”，為老童、祝融、鬻熊，穴熊不屬於三楚先，穴熊與鬻熊是兩個不同的先祖，在楚簡中其組合不同。^⑦

賈連敏先生主張楚簡中的媼舍、穴舍為一人，就是穴熊。認為媼字從女，𧈧(昆)聲，與穴的聲母相近，可通。同時也認為，“從新蔡簡辭例看，將‘禮舍’、‘媼舍’讀為‘穴

① 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楚先祖名》，《文物》1988年第8期。

② 李零：《楚國族源、世襲的文字學證明》，《文物》1991年第2期。

③ 李家浩：《包山楚簡所記楚先祖名及其相關的問題》及“補記”，《文史》第42輯，中華書局，1997。

④ 曾憲通：《再說“蟲”符》，《古文字研究》第25輯，中華書局，2004。

⑤ 黃德寬：《新蔡楚簡“穴熊”及其相關問題》，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座，2004年10月29日。

⑥ 魏宜輝、周言：《再談新蔡楚簡中的“穴熊”》，簡帛研究網站，2004年11月8日。

⑦ 宋華強：《〈離騷〉“三後”即新蔡楚簡“三楚先”說——兼論穴熊不屬於“三楚先”》，簡帛研究網站，2005年3月4日。

熊’，要比讀爲‘鬻熊’適當。但有些問題仍難以斷定。……簡文中未見鬻熊，當有其因，這些問題有待新材料的出土和進一步的研究”^①。

三、傾向性看法

經過比較諸家的分析研究，我們初步傾向於下列看法：

1. 嫪、禮所從的女、示當爲形符，右旁爲聲符。正如李學勤先生分析的，嫪字從女，蟲省聲，古音在冬部，與覺部的鬻剛好入、陽對轉。禮字右旁中間多一“口”，左從示，可能如曾先生所云，爲嫪字的異構。嫪舍、禮舍即文獻所記鬻熊。如果認爲嫪是從女聲（泥母魚部），則禮當從示聲（船母脂部），不易解釋二者的關係。

2. 李家浩先生認爲《楚世家》的穴熊之穴即空之訛誤，有可能當時他未能見到全部新蔡楚簡材料，不知還有作“穴舍”者。穴并不從土。如視穴爲空省去土聲，說服力不强。從土從穴即坑，見於《集韻》，空深貌。《說文》：“穴，土室也。”穴、坑乃一字之分化。土不大可能是聲符。因此，曾憲通先生認爲土等不是聲符，而是形符。

3. 我們也曾懷疑楚簡穴熊的穴有可能是六。六，來母覺部。鬻，喻母覺部。蟲，定母冬部。流，來母幽部。幽、覺、冬通轉。其實，疑穴爲六的看法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翻檢新蔡楚簡，發現有下列三個六字，寫法與這批簡的穴及從穴的空字就有區別。（楚簡三字基本作如下形，𠂔乙一：22 𠂔甲三：83 𠂔甲三：294）

（1）新蔡楚簡甲三 294、零 334：攻婁連爲攻人受六𠂔（六與穴有別）

（2）新蔡楚簡乙四 58：犧六女（六與穴有別）

（3）新蔡楚簡零 375：六𠂔（六與穴有別）

同一批簡，兩字字形如此分明，可見穴不大可能是六，穴舍也就不可能是六舍了。

4. 狢、狢從穴是有問題的。《說文》：“狢，鼠屬，善旋。從豸，穴聲。”《唐韻》餘救切。段玉裁注：此從“穴散之穴，俗訛作穴聲，篆體亦誤。今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段氏訂此字從穴散之穴，謂與𠂔同字，則可。”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也主張此說。也就是說狢、狢二字可能從穴得聲，今從“穴”者是因穴、穴形近混同之故，與楚簡從穴聲不是同形字，所以不能作爲穴讀爲鬻的直接證據。穴，日母東部。狢、狢，喻母幽部。古韻東、冬或主張不分。而穴屬匣母質部。可見，狢、狢有“育”音實不從“穴”。

① 賈連敏：《新蔡竹簡中的楚先祖名》，《華學》第七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要么，楚簡的穴就是宀的寫誤或者當時的楚文字穴就是如此。如果這樣，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宀（日母東部）、狄、狄（喻母幽部）與媿（喻母覺部），古音相近可通。問題是^①與宀形近而字實別，目前還沒有證據說明二字形近混同。所以，也就難以說明二者為一人。如果穴熊真是媿熊，可能是因聲母“喻三歸匣”之故，與狄、狄之“育”音沒有關係。媿、穴（匣母質部）二者都是入聲字。喻三歸匣是曾運乾的卓見，為學術界所接受。如古讀營如環，讀援如換，讀羽如扈，讀圓如回，讀員如魂，等等。^②不過，這也祇是硬行之說。《史記·楚世家》明明記有穴熊，媿熊為穴熊後裔，不是一人，不必硬要將二人視為同一人。《大戴禮記》的內熊之內應是穴之形近誤記。

5. 認為媿字從女，𧈧（昆）聲，與穴相通，雖有一定道理，但總覺不妥。前舉包山楚簡祝融、媿畬連寫，均從二蟲，何以見得一是從蟲，一是從𧈧（昆）？而且昆（見母文部）與穴（匣母質部）讀音有間隔，也未見直接相通之例。

6. 據目前的材料，媿畬、禮畬之前明確記有楚先，而在穴畬、空畬前面，目前所見材料多殘缺或不清楚，就是連舉，也未見有楚先的字樣。說明二者很可能不是同一組，而有可能“楚先老童、祝融、媿畬”為一組，“老童（童）、祝融（融）、穴（空）畬”為另一組。因此，媿畬、禮畬為媿熊，而穴畬、空畬可能就是穴熊。長琴若為重黎之子，據《楚世家》，重黎以後的傳承已為重黎之弟吳回取代，楚實際是吳回之後，與長琴已分道揚鑣，楚人不大可能稱長琴為楚先，所以楚簡中的幾位楚先不大可能有長琴而稱“楚先老童、重黎（祝融）、長琴”。

從有關記載看，楚人始終沒有忘記的楚先祖除老童外，下面兩位是比較主要的人物：

（1）穴熊。因為自他以後，“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大戴禮記》及司馬遷能夠記下他的名字，說明他在歷史上有特別的影響，留下過足跡，楚人代代相傳，沒有忘記他。

（2）媿熊。因為他是季連之苗裔，活動在周文王之時，而且其子事文王，是楚國發展的開端，楚人特別尊崇，所以“夔子不祀祝融與媿熊。楚人讓（讓）之”。（《左傳·僖公25年》）

因此，楚人祭祀祖先分為下列兩組也就成為可能。

（1）老童—祝融—穴熊，這一組距穴熊較遠

（2）老童—祝融—媿熊，這一組距媿熊較近

7. 《大戴禮記·帝系63》：“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於渠，婁緜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

① 曾運乾：《喻母古讀考》，《東北大學季刊》第二期，1927。

爲威章王。”與《楚世家》比較，“什祖”即爲“附沮”、“內熊”當爲“穴熊”之筆誤。但此處有一個問題，就是從熊渠上推九代，正好是鬻熊而不是穴熊。見《楚世家》：

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黶，熊黶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郢。

这里，“九世”可能有問題，或者“九世”前有脫文。據《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陽。

穴熊爲季連之孫，鬻熊爲“季連之苗裔”，時代不合。季連爲吳回之孫陸終之六子，吳回爲老童之子，老童爲顓頊高陽之孫。帝顓頊高陽爲傳說中古時代部族的首領，大約在夏以前某個時代。穴熊有可能是夏或商時期的人物。“鬻熊子事文王”，則鬻熊爲商末周初人物。故穴熊、鬻熊不可能爲同一人。

8. 根據楚簡及相關記載，楚人對先祖、先公、先王的祭禱漸漸明確。

先祖：老童、祝融、鬻熊（一組）；老童、祝融、穴熊（一組）（新蔡簡等）

先公：爲荊王，自熊鹿（麗）以至武王^①（包山簡 246、新蔡簡等）

先王：自文王以至距時王最近之王^②（新蔡簡甲三 137 等）

① 熊麗考釋見李家浩《包山楚簡所記楚先祖名及其相關的問題》，《文史》第 42 輯，中華書局，1997。

② 賈連敏：《新蔡竹簡中的楚先祖名》，《華學》第七輯，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包山楚簡及其傳遞的楚國信息

——紀年與社會體系

◎ 愛媛大學法文學部

藤田 勝久 著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許道勝 譯

內容提要 戰國的墓葬資料，有的像包山楚簡那樣包含紀年、地名，可以知道墓主身份。不過更多情況下是像郭店簡那樣，沒有楚的紀年，不清楚隨葬的背景。本文以包山楚簡為例，討論紀南城周邊古墓資料所包含的信息。包山楚簡的卜筮祭禱簡與遺策用楚曆來紀時，並記有楚先祖的傳說，乃是基於楚國的系統。貞人的職掌與秦漢時代的太史、太祝、太卜相近。此外，文書簡保存有左尹官府收發文書的記錄，從中可以窺見都城一帶與地方的關係。包山簡傳遞了戰國中期楚國以都城為中心的信息，以及地方行政與審判的社會系統。

關鍵詞 戰國古墓 包山楚簡 楚曆 左尹

序 言

中國的戰國時代是秦漢統一國家形成的重要時期。但《史記》主要記錄戰國時秦統一六國的過程，除了與秦之間的戰爭、外交等重大事件外，對於其他各國鮮有關於社會結構的記載，所以利用《戰國策》、諸子等文獻時，必須注意編年與史實的復原。如此，欲依據文獻弄清各國作為領土國家的社會體系的形成過程，便受到制約。^①

① 拙著《〈史記〉戰國史料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又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91）、江村治樹《春秋戰國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之研究》（汲古書院，2000）收集整理了各國兵器及青銅器、陶器、貨幣等器物銘文，試圖探明戰國時期各國的君主權力與地方社會的特徵。

20 世纪 70 年代以降，戰國古墓中出土的資料日漸增多，尤其集中於戰國楚簡和秦簡。這些資料是補充《史記》、《戰國策》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包含遺策、卜筮祭禱簡、日書以及行政與法律文書、書籍等，促進了歷史學、思想史等領域的研究。^①但與甘肅省等邊境遺迹發現的漢簡、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湖南省水井中發現的秦、漢、三國時代的簡牘資料相比，這些古墓中保存的資料，因其出土狀況不同而出現問題。^②因而對戰國楚簡和秦簡，不僅應視為秦代以前的文字資料，還必須考慮其作為考古遺物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引起爭論的有如下兩點：

1. 古墓的資料如何被隨葬，其信息具有怎樣的性質？
2. 戰國楚簡是如何反映楚文化及其社會體系的？

在戰國楚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北省荊門市包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包山楚簡）。^③因為包山楚簡中載有懷王時期七年間的大事紀年（前 322—前 316），其年代可推定為戰國中期。另外，作為一個珍貴的實例，還可以看到屬於楚王族的墓主姓名、遺策、占卜墓主健康狀況的卜筮祭禱簡、左尹的職掌等。所以，包山楚簡當可作為認識戰國楚簡性質的基準。

迄今，包山楚簡除釋文和文字研究外，還有陳偉的《包山楚簡初探》（下稱《初探》）嘗試作了全面的考察。^④在日本，工藤元男氏、谷口滿氏及廣瀨薰雄氏等人對包山楚簡的卜筮祭禱簡、文書簡的構成、歷史地理與訴訟制度等作了分析，楚國的社會狀況和習俗隨之逐漸清晰。^⑤

本文擬以上述成果為基礎，通過對包山楚簡進行研讀，探討戰國時期楚國的社會體系及其信息傳遞的實際狀況。

① 出土資料的概況，參看永田英正《居延漢簡之研究》（同朋舍，1989）、駢宇騫、段書安編著《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關於思想史，參看《中國研究集刊》33 號《新出土資料與中國思想史》（大阪大學中國學會，2003）、淺野裕一、湯淺邦弘編《諸子百家“再發現”——被發掘的古代中國思想》（岩波書店，2004）。廣瀨薰雄的《荊州地區出土戰國楚簡》（本簡學會研討會報告，2004 年 12 月）主要對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等進行整理，指出楚墓的考古學年代與思想史上所討論的年代不同是焦點之一。

②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李均明《古代簡牘》（文物出版社，2003）主要對文書的分類作了探討。拙稿《中國出土資料與地域社會》（《資料學方法的考察（4）》，愛媛大學法文學部，2005）從出土資料的總體把握出發，構擬城郭都市及其周邊的基層社會（秦漢時代的縣級區域），將其作為生活在那裏的人們所傳遞的資料加以考察。

③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

④ 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拙稿《書評：包山楚簡研究的新階段》，《中國出土資料研究》2，1998。參看張光裕主編《包山楚簡文字編》，藝文印書館，1992；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張守中撰集《包山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6。

⑤ 池田雄一：《戰國楚的法制》，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150，1993；工藤元男《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結構與體系》，《東洋史研究》59—4，2001；谷口滿：《包山楚簡受期簡釋地》，《先秦楚國歷史地理研究》科學研究報告書，東北學院大學，2003；廣瀨薰雄：《包山楚簡〈所訟〉分析》，《郭店楚簡的思想史研究》5，東京大學，2001；廣瀨薰雄：《包山楚簡所見證據制度》，郭店楚簡研究會編：《楚地出土資料與中國古代文化》，汲古書院，2002；等。

一、楚曆與卜筮祭禱簡

包山二號楚墓位於紀南城以北約 16 公里，是有封土的大型墓。^①東側有墓道，長方形土坑東西長 34.4 米，南北寬 31.9 米，深 12.45 米，設有 14 級臺階。檸室長 6.32 米，寬 6.26 米，高 3.1 米，分為五室。中室放置三重木棺，周圍東、南、西、北四室放置隨葬品。包山楚墓的竹簡位置如下（見圖 1）：

東室：遺策 8 枚（包含“臥室”等字句）

南室：遺策 13 枚（無文字 4 枚）、竹牘 1 枚

西室：遺策 6 枚、文書簡 1 枚（無文字 128 枚）

北室：卜筮祭禱簡 54 枚（無文字 3 枚）、文書簡 196 枚（無文字 35 枚）

亦即，與葬儀有關的遺策等分散置於東室、南室和西室，北室隨葬卜筮祭禱簡和文書簡。不過，西室的一件銅盤上放置有 1 枚文書簡和無文字的竹簡 128 枚。有文字的簡共有 278 枚，《包山楚簡》分類如下：

文書類：集箸 13 枚、集箸言 5 枚、受期 61 枚、疋獄 23 枚、其他 94 枚

卜筮祭禱記錄：54 枚

遺策：27 枚

竹牘：1 枚

陳偉在《初探》中，對分類進行了改動，如將文書類的处理記錄稱作“所誼”，將遺策 1 枚和竹牘稱作“贈書”，排列上也有所不同。本文對包山簡的稱引，基本按照陳偉氏的分類與排列，但根據後來的研究成果，有些文字作了改動。^②

在認識包山楚簡的性質方面，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卜筮祭禱簡。它是對墓主生命的最後三年（前 318—前 316）為其職事、健康等進行占卜的資料，記錄著左尹昭佗的名字和顯示

① 前揭《包山楚墓》。其周邊的楚墓，參看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楚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及《楚都紀南城復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等。

② 釋文儘量採用通用字，但各說有差別。其後的釋文改訂，參看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藝文印書館，2003）、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至第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4）等。

墓主爲昭王一支的祭祀。工藤元男氏整合陳偉氏等人的說法如下^①：

第一次占卜

A 前辭：“以事紀年+楚月名+干支日”、貞人等的記述

B 命辭：貞問的事由〔陳偉氏分爲定型的“歲貞”和“疾病貞”兩類〕

C 占辭：基於卜筮結果作出的判斷之辭

第二次占卜

D 命辭：承第一次占辭，貞人提示解除災祟的方法

E 占辭：占斷命辭中所提出的祭禱方案等是否合適

在這裏，卜筮祭禱簡的貞人爲了給墓主個人占卜，用楚國的紀年和月名紀時。亦即在 A 前辭中構成“以事紀年+楚月名”的形式，這一般被視爲楚國特有的曆法（紀年和月名）^②。

迄今人們對楚國曆法有不同說法。其年代採取基於楚國事件的大事紀年（以事紀年）的形式。其月名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的記載相比，與秦曆相差三個月。^③因而，即使其曆法的計算方法與他國相同，由於其採用楚國的大事紀年和月名，楚曆遂構成楚文化的一個要素。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楚曆不是貞人們編定的。亦即爲墓主占卜的貞人，即便爲個人占卜，也是用楚國的曆法來記錄。

如果是私人性的卜筮，恐怕不一定非採用國家的曆法不可。包山簡在卜筮中採用楚曆，顯示貞人們處在楚王朝體系的影響之下。這是第一個特征。

其次是被劃分到“第二次占卜”中的 D 命辭問題。彭浩氏將這部分看作禱辭（爲解除近期內的憂患，向鬼神祈禱，請求保佑、賜福之辭），李零氏則視爲對禱辭的占問而放入“第二次占辭”之中。池澤優氏也將其當作“第二次占辭”，上揭工藤氏的說明即依據其說。^④其中一例採用了如下的形式：

A 東周之客許經歸胙於薳郢之歲。夏曆之月乙丑之日。苛嘉以長前爲左尹旻貞。B 出內侍王。自夏曆之月以就集歲之夏曆之月。盡集（216）歲。躬身尚毋有咎。C 占之。

① 彭浩：《包山二號楚墓卜筮和祭禱竹簡的初步研究》（前揭《包山楚墓》上冊）；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93）；陳偉前揭《包山楚簡初探》；池澤優：《祭祀的神與不祭的神——戰國時代楚國“卜筮祭禱記錄”簡所見的神靈結構》（《中國出土資料研究》創刊號，1997）；工藤前揭《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結構與體系》。

② 關於楚曆，有王紅星《包山簡牘所反映的楚國曆法問題》、劉彬徽《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均載前揭《包山楚墓》）、陳偉前揭《初探》第一章等諸多研究成果。

③ 劉彬徽前揭論文、工藤元男《從睡虎地秦簡看秦代國家與社會》（創文社，1998）等。

④ 池澤在前揭論文中指出，禱辭是貞人承第一次占辭而提出的解除“降祟災禍”的方案，判斷其合適與否的爲第二次占辭。同時，對“以其故效之”、“思攻解於……”的解釋，工藤元男氏整理諸說，可見其大概。

恒貞吉。少有憂於躬身。且外有不順。以其故致之。D舉禱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
 牂。思攻解於不□。E苛嘉占之曰。吉。(217) 卜筮祭禱簡，216、217 簡

在卜筮祭禱簡的禱辭中所見對鬼神、祖先的祭祀，是由什么人計劃或者實施的呢？如果這種禱辭是貞人爲了解除災禍而占問祭祀計劃的話，那麼祭祀就不當由貞人實施。如果另有實施祭祀的人，而由貞人占卜其是否合適的話，這種情形下實施祭祀的也不是貞人。因此，卜筮祭禱簡中的祭祀即使得以實施，它也可能不是由貞人去做的。

那麼，改善墓主卜筮的祭祀，由誰來實施呢？作爲墓主祖父的司馬子音，其祭祀由攻尹的執事人實施（224 簡）。至於楚遠祖的祭祀，也當是由受楚國體系影響的人來承擔。這是因爲在使用楚曆的同時，在卜筮祭禱簡的受祭對象中，與整個楚國有關的祖先和遠祖均見於記載。現將楚國的祭祀放在包山楚簡的紀年中試作考察（見表 1）。

表中可見與楚的祖先有關的人名，其中“熊繹”陳偉氏等人讀作“熊麗（麗）”。據《史記·楚世家》，鬻熊之孫爲熊麗，熊麗之孫爲熊繹。^①此外，卜筮祭禱簡中還可以看到作爲墓主的直系近祖、位列昭王之後的“文坪夜君、郢公子春、司馬子音、蔡公子家”（200、203、206、214、240 簡）等人。^②因此，作爲祭祀的對象，貞人列舉的墓主近祖可能屬個別祭祀。而祭祀“楚先老僮、祝融、鬻熊”，以及“荆王自熊麗（熊繹）以就武王”的祖先之事，大概就不僅是墓主一族所能做的事了。

在祭祀楚的祖先方面，如果墓主確係昭王同支的話，那麼或許存在將“老僮、祝融、鬻熊”等視爲共祖的觀念。但祭祀楚王，尤其將從熊麗或熊繹到始稱王號的武王一起祭祀，似乎超過了通常僅祭祀父母、近祖的範圍。^③因此我們推測，伴隨著楚曆的使用，卜筮祭禱簡中對祖先的祭祀也受到楚國體系的影響。這也和《史記·楚世家》所見楚系譜有關。

到目前爲止，卜筮祭禱簡中可看到與《史記·楚世家》相同的譜系，這顯示司馬遷所說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於所載是否即是真實的歷史人物姑且不論，那至少是戰國中期流傳於楚國的說法。不過，那些祖先作爲祭祀對象而出現，與文書簡所見的對真實的王的記載不同。因而有這種可能，即在戰國中期，作爲王，其活動被記錄下來；而此前的譜系則由司掌祭祀的人傳播下來。再從包山楚簡“自熊麗以就武王”的記錄來看，其間的譜系也流傳了下來。這大概與《史記·楚世家》等的譜系資料有關。

① 《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② 關於楚的祖先，除工藤前揭《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的結構與體系》外，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楚祖先名》（《文物》1988 年第 8 期）、李家浩《包山竹簡所記楚祖先名及其相關問題》（《文史》第 42 輯，1997）、陳偉前揭《初探》第六章等也作了考察。

③ 此外，年代不明的有“聖（聲王）夫人之人”（正獄 84 簡）、“肅王宅人”（所誼 174 簡）等。岡村秀典《中國古代王權與祭祀》第八章《先秦時期的身份制與祭祀儀禮》第五節《與祭禱相伴的供犧》（學生社，2005），也考察了楚卜筮祭禱簡中的祖先和動物犧牲。

若上述假設成立，則從楚國的卜筮祭禱簡可看到與記錄有關的三種人。即：一、擔任曆法工作的人，以楚的大事為基礎編制紀年和帶有楚月名的曆法。二、擔任楚國祖先祭祀的人，他們或許也傳播著譜系資料。三、在楚曆與楚國祭祀系統下，為王族等卜筮的貞人。即使占卜的原理和別國類似，仍然可以說它是楚國特有的卜筮。

在楚國體系下活動的這三種人，從後世看，與秦漢時代司掌禮儀祭祀的奉常（太常）所屬的太史、太祝、太卜之職非常相似。這些職務，除太史司掌天文、星曆外，在漢初被看作史官一系，這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史律》將太史、太祝、太卜視為“史”的事例也可以證明。^①

此外，包山楚簡中還有竹牘和遣策，也被稱作“贈書”的竹牘，記述公元前 316 年六月丙戌之日贈車馬等事，南室的遣策則記載六月丁亥之日（翌日）埋葬墓主之事。由此一看即知，它雖是個人隨葬品的清單，但使用了楚國的大事紀年，是依據楚國的系統。因而從卜筮祭禱簡和遣策可以看出，至少戰國中期以前，在楚國已經編定了楚曆并對楚的祖先進行祭祀，在此基礎上貞人進行卜筮。這些記錄直到今天還保存在部分楚墓之中。

同樣的，戰國楚簡中卜筮祭禱簡或遣策，如有記大事紀年及楚祖先之名的，所出墓葬就應是受楚國體系影響的墓葬。這種代表性的楚墓有：①望山一號墓、二號墓；②天星觀一號楚墓；③新蔡葛陵楚墓（見表 2）。其中望山楚墓和天星觀楚墓位於紀南城的西北和東方，與包山楚墓一樣均處在楚國都城的周邊。

望山一號墓位於紀南城西北約 7 公里的八嶺山古墓區，為有五級臺階的二椁三棺結構。^②墓中出土了卜筮祭禱簡，根據其內容，一般認為墓主為“悼固”，是戰國中期的王族墓。其紀年有兩個年度的記載，包含有對楚的祖先，以及可能與墓主有關的“聖王（聲王）、悼王”的祭祀。望山二號墓還隨葬了遣策，其中也有采用楚國大事紀年的記載。

天星觀一號楚墓位於紀南城以東約 24 公里，北臨長湖。^③帶有十五級臺階和一椁三棺，根據墓中出土的卜筮祭禱簡和遣策，一般認為墓主為鄧陽君“番乘”。據報道，竹簡中也有楚國的大事紀年。

河南省新蔡縣的葛陵楚墓，距紀南城甚遠，其北為鄭州，東方通往安徽省方向。有七級臺階，有內椁和五個外椁，其南室隨葬卜筮祭禱簡。^④竹簡在記載楚國大事紀年的同時，

① 在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二年律令·史律》中，可見對當太史、太祝、太卜等人的規定。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中華書局，199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家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

③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 年第 1 期；湖北省荊州博物館：《荊州天星觀二號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工藤元男：《平夜君成楚簡〈卜筮祭禱簡〉初探——戰國時期楚國的祭祀儀禮》，《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3，2005；等。又表 3 所列曾侯乙墓遣策，也采用楚國大事紀年的形式。

還載有楚祖先的名字。祇是包山楚簡所記的祖先“老僮、祝融、鬻熊”，新蔡楚簡記作“老僮、祝融、穴熊”。據《史記·楚世家》，當了祝融的吳回之子為陸終，生子六人，其一即楚始祖季連之孫穴熊，其後周文王時季連的苗裔曰鬻熊。據此，相比新蔡楚簡列有時代較早的祖先，在包山楚簡中，鬻熊、熊麗或熊繹以至晚後的楚王世系似乎占據更大的比重。

如此看來，在戰國時代，編制楚曆，祭祀祖先，在這種體系下進行卜筮的人們的存在，乃是楚文化的一種要素。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即是其部分記錄。除包山楚墓外，像望山一號、二號墓和天星觀楚墓那樣，葬於紀南城周邊、部份有臺階的楚墓，也同樣看到以楚國體系記載的形式。還有新蔡楚墓，雖遠離紀南城，但在記錄楚國紀年、祭祀方面仍具共性，也當是受到楚國體系的影響。作為隨葬品清單的遣策，以及為墓主的健康等事進行占卜的卜筮祭禱簡，研究其中所蘊涵的楚文化的要素，應該能夠理解在同一社會背景下的隨葬狀況。^①

不過，有了這種紀年、譜系等特徵，還不能立即說明戰國時期楚國的國家機構。包山楚簡尚有文書簡，從中可以考見連結楚國中央和地方的社會體系。

二、文書簡的社會體系之一：案例處理記錄

關於包山楚簡的文書簡，《包山楚簡》與陳偉《包山楚簡初探》的釋文在分類上存在差異。例如，陳偉氏將“所誼”35枚另作劃分，131—139簡則依據正、反面的內容修正了排列。我基本贊成陳偉氏的意見，但就受期簡和集筮言而言，有些地方仍贊成原來的分類；此外他將置於西室的278簡一起排列，放在墓葬中考量，我認為不太合適。這裏依據表3的劃分，對文書類的信息作一些分析。^②

首先，依據記載形式，文書簡分為兩種：一是不記具體內容的簡略的記錄形式，例如有受期、所誼、疋獄。二是記有具體案情等的形式，有集筮、集筮言及其他文書。

簡略的記錄形式中，受期和疋獄以一枚簡記述一件事；“所誼”是用數枚簡列出某一官員處理的事項，而均非具體的案例，因而暫將它們視為同一類。

首先，“疋獄”這一名稱，記於84簡背面略居中的位置。整理小組援引《說文》讀“疋”為“記”，認為是“獄訟記錄”或“關於起訴的簡要記錄”。陳偉氏指出，這樣處理大致妥當，但《說文》中“疋”又讀“胥”，或可釋為“等待審理”。^③因此，疋獄有與

① 工藤元男《由祭祀儀禮所見戰國楚的王權與世族、封君——以〈卜筮祭禱簡〉、〈日書〉為主》（《歷史學研究》768，2002）以卜筮祭禱為基礎，考察了楚國的整體結構。

② 關於文書簡，拙稿《包山楚簡所見戰國時期楚國的縣和封邑》（《中國出土資料研究》3，1999）、《中國古代國家與郡縣社會》（汲古書院，2005），討論了左尹官府的资料。

③ 陳偉前揭《初探》第二章《文書制度》。

訴訟相關的內容，84 簡簡文如下：

荆戾之月己丑之日。庸人之州人陳德訟聖夫人之人宗漸、宗未。謂殺其兄、臣。
正義強識之。秀其爲李。

陳偉氏將其分爲：①受理訴訟的時間；②原告；③被告；④訴訟事由；⑤簽署等幾部分。
廣瀨薰雄氏根據原告（甲）與被告（乙）的訴訟，分爲兩種形式^①：

甲訟乙，以～（之故）

甲訟乙，（言）謂～

正獄大致都有日期，文末留有空白，然後記有可能是文書的簽署。簽署形式有“A 識之、B”、“A 識之、B 爲李”、“A、B”、“A、B 爲李”、“A 識之、B 李”等幾種。這樣 84 簡可表述爲：

○月△之日。甲訟乙、謂～。〔空白〕 A 識之、B 爲李。

在這種基本形式下，記有各種訴訟。整理小組歸納其內容，有殺人、逃亡、反官、土地糾紛、強占妻妾、繼承權之爭、執法不公等，認爲它們是各地的官員呈送給中央政府的文書。陳偉氏則根據原告居於各地，而“識”、“李”中可見相同人名等情況，認爲由這些人簽署的文書均爲左尹官府的記錄。

在訴訟記錄中，原告人連帶記有地名、官職及領屬之人。還有原告與被告可能是同一地、同官屬的案例（83、87、88、96、102 簡），也有“其州人”（80 簡）、“其官人”（99 簡）的記述。據此，可粗略推測訴訟者的大致所在地區和身份。

正獄簡的排列，釋文將 80—102 簡依照從楚國的正月甲辰之日到四月辛巳、四月己丑、四月戊戌、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辛酉日的順序排列。陳偉氏將 90、91 簡歸入《集箸言》，其他正獄簡的排列則大致相同。在楚國四月，若以背面記有“正獄”的 84 簡“己丑”爲朔日，則在十天“戊戌”之後，“辛巳”已不能容於本月，故而採用了辛巳—己丑—戊戌的順序。

然而應該注意的是，爲什麼“正獄”這一篇題書在位於中間的“四月己丑”一簡。如果正獄是一系列的文書，那么在冊書的中間書以標題，其意義就不太清楚了，恐怕不如說

① 廣瀨前揭《包山楚簡〈所訟〉分析》。

是從書有標題的 84 簡開始更為自然。如果按照四月辛巳—己丑—戊戌的順序，可以設想第一為辛巳 85 簡，第二為 84 簡，第三為 86 簡這樣的一組。^①如果這三簡位於起首的話，那麼正獄就是楚國四月至十一月以及正月訴訟的記錄。這和卜筮祭禱簡中占卜一年事務時所採用的“從四月到四月”的形式一致。正獄簡中除陳偉氏移入《集箸言》的 90 簡有公元前 319 年的紀年之外，再未記紀年，所以或許會另有紀年簡的存在。無論如何，由於有墓主死亡的楚六月之後的月份，所以正獄當是早於公元前 317 年書寫的與訴訟有關的資料。

其次，左尹官府必須對各地人提交的訴訟進行審理。關於這一點，廣瀨薰雄氏指出，起訴分兩種：①楚王誼左尹；②直接訴諸左尹。接下來的手續是“誼”（委托審理），即由上級命令下級政府對相關事件進行處理。^②

“所誼”簡在釋文中和其他文書為一類，視為左尹委托下級官員處理的一系列記錄。陳偉氏則另分作一類。其內容分別記載六名官員處理的案件，並有“所誼於（官員名）”的記述，所以作為一類文書是沒有問題的。

以第一位官員正婁恣的所誼為例，開列的是自公元前 317 年四月至九月中每月、某日與案件有關的人物。祇是該案件未記具體內容。今設定人物為某 A、某 B，作一例示：

東周之客許經歸胙於荻郢之荆扉（四月）之月。所誼告於正婁恣。壬申。鄭少司馬龔 A。邱易君之人陳 B。乙亥。周 A。戊寅。某尹 A。| 夏扉（五月）甲寅。陰人陳 A。戊午。B。……| 享月（六月）己巳。中廐某 A。期思公之州里公 B。……| 夏栞（七月）己亥。某君之人登 A。……| 八月辛未。舒 A。……| 九月己亥。陽 A。陽 B。臨易人主 C。……辛酉。登人臧 A。某陵少甸尹 B。

另外，“所誼”簡還有正令翌（四月至十一月）、王私司敗邊（六月、八月）、少里喬舉尹羽（只有標題）、郟路尹弊（四月至十一月）、發尹利（四月至十一月）、僭尹（六月至十月）處理的記錄。因而，所誼確實推定為左尹官員處理案件和人名的記錄，其基本形式如下：

所誼（告）於〔官員名〕。楚國的日期、人名。楚國的日期、人名。……

不過，這裏出現一個問題，即日期後面所記人名，是指受左尹官府委托審理的人物，還是指與事件有關的人物。廣瀨氏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視為起訴人，將其分為：①僅為人名（101

① 85 簡背面上部書有“既發字，逕以廷”。陳偉氏將“字”看作是發給被告的文書；“逕”同整理小組，訓“率領”，認為大致是“帶著出庭受審”。在這種情形下，85 簡背面上部書寫文字，而 84 簡中部書“正獄”，略顯不自然，但仍可設想從背面有記述的 85、84、86 簡開始排列。

② 廣瀨前揭《包山楚簡〈所誼〉分析》。

例)；②官職+人名(117例)；③某地之人+人名(90例)；④某人之人+人名(53例)四種。的確，就正獄而言，原告起訴被告，原告當未必局限於司敗等官員。從邏輯上看，審理應該是委托給原告所屬的官員。因此，就所誼簡而言，如果委托正獄中原告所屬官員審理，則其經過應該是清楚的。但或許年代不同，正獄的原告與所誼的人名之間看不出有直接關係。

與所誼的人名有關聯的是受期簡的人名。受期簡 33 簡背面記有篇題，該文書中包含“受期”等字句。通常認為，其意義大概與指定的日期有關。

八月辛巳之日。羸陽之馭司敗黃異受期。癸巳之日。不遲五皮以廷。升門有敗。(33 簡)

這一形式，其他簡也基本相同。這就是在第一個的日期之後記人名“受期”，在第二個日期“不～以廷”或“不～以告”等之後使用“升門有敗”等用語。多數簡在一段空白之後書寫記錄者的名字。其基本形式為：

某月某日。某A受期。某月某日。不～某B以廷。升門有敗。〔空白〕某C識之。

其日期，從楚國的七月到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年代從釋文當作受期簡的 58 簡來看，為公元前 317 年。但陳偉氏將 58 簡排列在《集箸言》中。總之，受期簡和所誼的年代接近，彼此可見相同的人名。

今將八月的記錄製成表來看(表 5)，可知受期人的身份，以司敗、少司敗、州加公、州里公居多，此外還可見“莫囂之人”、“～某公”、“龔夫人之大夫”等。與正獄的原告相比，受期人似以官員身份居多。由此可以看到受期簡有委托原告所屬地方官吏進行審理的傾向，但看不到和正獄簡相同的地名。不過，所誼簡和受期簡中有些例子是有關連的。

例如，受期類 62 簡的“某郢司德秀陽”在郢路尹葬的所誼(169 簡)中出現了二次。如果他們是同一人，那麼處理的過程如下^①：

九月壬戌(受期，第一天)……九月癸亥(翌日，所誼)……十月戊寅(所誼)……

① 此外，141、142 簡中也有和左尹屬吏相關的資料：“東周之客許經歸於茲郢之歲，食月乙巳之日，秦大夫怡之州里公周愷言於左尹與鄒公賜、僑尹傑、正婁恣、正令望、王私司敗邊、少里喬舉尹羽、郢路尹奔、發尹利。愷言曰……。141……秀齊識之。刀蔡為李。142。”這是公元前 317 年，由秦大夫之州里公提交給左尹官府的訴訟，除左尹外，還列舉了官府的八名官員。這些人物又見於 128 簡和 143 簡，但 128 簡沒有“僑尹旗”的名字。陳偉氏認為，“鄒公賜”以下為左尹官府的官員，大致是按身份的高低順序而記。

十月辛巳（從戊寅開始四天后，受期，第二天）

據此，司德秀陽於九月壬戌從左尹官府接到在十月辛巳前處理的指定期限。另一方面，左尹官府的一名官員於九月癸亥（翌日）對其進行記錄，還記有在期限之前四天左右的十月戊寅進行過某種處理，迎接約定期限的到來。假如“不～以廷”是帶到法庭的意思，其內容則是指將安陸某里之人屈B和少邕之陽C帶來。^①在這裏，案件似是委托給了某郢的司德處理的。

不過，受期41、48簡的情形稍有不同。簡文記八月乙未之日，龔夫人大夫之番羸受期，指示在九月戊申將昱鄴這個人帶來，在九月戊申的受期中同樣指定癸亥為期限。可是，正令望的所誼（188簡）記八月戊寅“龔夫人之人昱鄴”。據此，案件的經過是，先是八月戊寅龔夫人之人昱鄴，在其後18天八月乙未，龔夫人大夫番羸一方受期。這可能意味著，所誼的人名未必是受委托審理的人。

這樣，所誼和受期簡中共見的人名，雖不是那么多，却顯示出一定的關聯性，這在正獄和受期的簽署方面也是一樣。例如，記錄者的人名，就有如下的共同點^②：

秀履：正獄80簡、受期54簡、受期57簡

義強：正獄84簡、受期40簡

從而我們知道見於正獄、所誼、受期的審理和簽署存在一定的關聯。這些文書很難理解為出自各地而由同一文書官簽署的，所以應該將其看作左尹官府對訴訟的記錄。

左尹官府處理案件的地域範圍，從正獄、所誼簡所記地名已可窺知，根據受期簡可作詳細考證。陳偉氏和谷口滿氏認為，受期簡的第一個日期（日期Ⅰ）和第二個日期（日期Ⅱ）的間隔，反映左尹官府（郢，今紀南城一帶）和受期者的居住地（事件發生地）的遠近。^③例如就受期簡而言，這種間隔短的為2、3天，長的達20多天。谷口氏推想，間隔數天的當在國都附近，而間隔20多天的則是遠離國都的地方。

由此看來，上揭受期62簡的“某郢”，其間隔為19天，是離國都相當遠的地方。簡書要求“司德秀陽”按期將安陸之人帶到。自紀南城往返，加上審理的時間，需要19天。如果靠近安陸，那麼這個“某郢”或許是位於湖北省雲夢縣的楚王城。^④

又，受期51簡的“陰侯”之地，如在131—139簡的案件所揭載的那樣，可推定位於

① 29簡僅作“不廷”，其含意有必要從整體上進行探討。

② 陳偉前揭《初探》第二章《文書制度》對有關署名的人物作了考察。

③ 陳偉前揭《初探》第三章、谷口前揭《包山楚簡受期簡釋地》等。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92雲夢楚王城發掘簡報》，《文物》1994年第4期。

湖北省襄樊市西北方向。其中兩個日期的間隔為 16 天。如果它也包含對案件的處理，則似是大致合適的距離。

不過，受期簡中二者間隔超過 40 天的例子，情形有所不同。例如 20 簡（39 日）約定“不貞～以致命”，23 簡（44 日）記“不遲～以盟～”，43 簡（42 日）記“不歸～以致命於郢”，44 簡（42 日）記“不歸登人之金”，67 簡（53 日）記“不軌～以致命”。與其說它們是出於距離上的遠隔，還不如說是因為處理的不同而花費了較長時間。

通過考察正獄、所誼、受期的形式，可知它們雖與左尹對訴訟的審理有關，却不是反映直接處理或傳達過程的文書。因此背面很少有記載，尤其是沒有像其他文書那樣收文和發文的記載。雖然這些文書祇是中央官府的處理記錄，但它一定是反映紀南城一帶與受楚國影響的某個地方的關係。圖 2 表示了其要點。

三、文書簡的社會體系之二：各種案件文書

與上述簡冊相對應，存在著反映更具體的楚國社會體系的文書簡。它們被分為集箸、集箸言及其他等幾類。不過，集箸和集箸言的題目，記於 1 簡（65CM）和 14 簡（64.2CM）上，此外文書簡長為 65 厘米左右的有 3 枚，長約 69 厘米的有 13 枚。這樣，從竹簡的長度看，難以確定篇題與內容的對應關係。其他文書簡還包含很多內容。下面以記有具體內容的竹簡為中心，試探討連結中央和地方的信息。

就本組而言，尤以背面的記載形式為特徵。例如，集箸言 15—17 簡的正、反面為如下形式：

| | | |
|-----------------------|-----------------|------|
| 僕五師宵信之司敗若。敢告視日……15 簡 | 左尹 | 17 反 |
| 於子=左=尹=。誼之新倍让尹丹……16 簡 | 十月甲申。王誼 | 16 反 |
| 尹。不敢不告視日。17 簡 | 五師宵信之司敗告謂……15 反 | |

簡文正面的文書是連續的，是五師宵信之司敗向視日（楚王）的上訴。其中記述視日誼左尹，左尹誼新倍让尹的過程。與此相對，15 簡背面先概括五師宵信之司敗起訴的內容，16 簡背面記王誼左尹的日期，17 簡背面記“左尹”二字。亦即該文書不僅記錄了案件，背面還記錄了收文。記錄在陰侯之地發生事件的文書 132—135 簡也是相同的形式：

| | | | |
|-----------|-------|------------|-------|
| ……敢告於視日…… | 132 簡 | 左尹以王命告湯公…… | 135 反 |
| 〔起訴的經過〕 | 133 簡 | 〔空白〕 | 134 反 |

| | | | |
|------------|-------|----------------|-------|
| 〔起訴的經過〕 | 134 簡 | 〔空白〕 | 133 反 |
| ……僕不敢不告於視日 | 135 簡 | (年月日)某尹某從郢以此等來 | 132 反 |

這件文書也是正面內容相連，記“秦競夫人之人”的起訴，背面左側是公元前 317 年六月“文書從郢來”的收件記錄，右側是“左尹以王命告湯公”的發文記錄。這種文書和正獄、所詎、受期簡的形式不同，反映出案件傳達、處理的實際過程。它不是單純的記錄，而是中央下達文書的副本。

這種文書簡的形式，與里耶古城出土的秦代木牘極為相似。^①里耶秦簡目前僅刊布了 30 件。其形式為正面書寫文書，背面左側為收文記錄，右側為發文記錄。因而，里耶秦簡是秦郡縣制下遷陵縣處理文書的副本。而在戰國時期楚國中央所屬的左尹官府，也記錄了與此非常相似的文書傳遞。包山楚簡的文書簡，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簡都有傳遞記錄，但從上述形式可瞭解連結中央與地方的社會體系的部分情況。

集箸中引人注目的是敘述郢都一帶情況的 7、8 簡^②：

齊客陳豫賀王之歲八月乙酉之日，王廷於藍郢之游宮，焉命大莫囂屈陽為命邦人內其溺典。臧王之墨以內其臣之溺典。惠之子庚一夫，居郢里，司馬徒箸之。庚之子昭一夫、昭之子疋一夫，未在典。

簡文記錄公元前 321 年的楚八月，命大莫囂屈陽，要求進行與“典”即名籍有關的審理。其真實情況雖不清楚，但惠之子庚居住在郢里，其子昭和孫疋未曾登錄一事，似是問題的所在。由此可以窺知楚王居於藍郢的游宮時，中央的大莫囂屈氏以及居住於郢里一族的動向，反映出郢都一帶的形勢。

集箸中也記錄了可能是在國都周邊發生的案件。文書 12、13 簡記公元前 317 年的楚五月，子左尹命漾陵邑大夫審理室人之“典”，漾陵大宦某提出該文書。僅據該文書簡尚不能弄清漾陵是否位於國都周邊，但判讀 126—127 簡和 128 簡，約略可知漾陵的有關情況。

東周之客許經致胙於蕞郢之歲夏居之月癸卯之日，子左尹命漾陵之宦大夫察州里人陽銷之與其父陽年同室與不同室。大宦痄、大駐尹師言謂：陽銷不與其父陽年同室。銷居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故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 年第 1 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里耶秦簡講讀會《里耶秦簡譯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8，2004），初山明《龍山里耶秦簡》（木簡學會研討會報告，2004 年 12 月）等。拙稿《里耶秦簡與秦代郡縣社會》（《愛媛大學法文學部論集》人文學科編 19，2005 年待刊），從信息傳遞的視角討論了里耶秦簡的形式和內容。

② 陳偉前揭《初探》第四章第三節《典與溺典》。

郢，與其季父某連置陽必同室。 大宦疾內氏等。

126—127 簡

該文書記載公元前 317 年的楚五月，子左尹命漾陵邑大夫，審查州里人陽一族同居或是別居。據大宦疾稱，陽銷居於郢。由此可以推知，漾陵之州位於國都周邊。又 128 簡記云：

左尹與鄢公賜、正婁恣、正令望、王私司敗邊、少里喬與尹羽、郢路尹奔、發尹利之命謂漾陵宦大夫司敗察漾陵之州里人陽銷之不與其父陽年同室。夏曆之月己酉之日，思一識獄之主以致命。不致命，升門有敗。 128 簡

夏曆之月癸卯之日，識言市以至。既涉於喬與。喬佐僕受之。 其察，識言市既以返。 128 反

該簡正面記左尹及其官員命漾陵宦大夫司敗，問州里人陽一族同居或是別居。要求在楚五月己酉之日致命。又據背面所載，在楚五月癸卯之日（己酉後第 31 天）答復。^①該日期和 126—127 簡中大宦疾的答復是同一天。因而可以認為，雖然命令和答復的時間有間隔，但左尹官府和陽氏在郢居住的漾陵之州，均位於國都一帶。

同樣，文書 141—144 簡可見左尹屬員與“秦大夫某之州里公”交涉和此州某人的案件。據陳偉氏研究，“州”是受期簡中處理天數少的地區。此案中雙方在同一天向左尹屬員陳述，也可推測州與左尹官府都處在楚都範圍之內。^②因而秦大夫某之州及其州里公，大概就位於國都一帶。如果“州”位於國都周邊，那么其他文書簡所見的州也當位於紀南城一帶。

像這樣判讀文書簡，我們注意到與國都周邊有關的案件出乎意料得多。此外，地方上的案件，陳偉已在《包山楚簡初探》第三章《地域政治系統》中進行過討論；我也就與“黃金”有關的縣級地區，以及下蔡的案件、陰侯之地的案件與封君的地望等作了介紹。^③可以確認的是，通過對包山楚簡中地名的考證，這些案件既有發生在國都一帶的，也有發生在各地的。戰國時期的楚國，除了縣級機構外，還存在許多封君官員及從屬。這一點從有關審判爭執和不公的事實可以窺知。

以上就是文書簡中透露的大致信息。與包山楚簡同時引人注目的是鄂君啓節所見戰國時期楚國的疆域和交通綫路。那是因為鄂君啓節和包山楚簡一樣載有懷王時期（前 322）的大事紀年，以及水陸交通綫路，它向我們傳達出戰國中期的形勢。^④對它的考證表明，懷王

① 請注意：如果假設為同一個月，則已超過 30 天。

② 陳偉前揭《初探》第三章。

③ 前揭拙稿《包山楚簡所見戰國時期楚國的縣和封邑》。

④ 陳偉：《楚東國歷史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拙稿《戰國楚的疆域形成與交通綫路》，前揭《中國古代國家與郡縣社會》。

時期，楚國在核心疆域之外，還對東方展開軍事拓展，大致統合了長江中下游流域。但繼公元前 284 年齊臨淄陷落之後，公元前 278 年秦軍攻陷郢都，在那裏設置南郡，實施統治。楚東遷於陳，最後將都城定在淮水流域的壽春。在這一形勢下，研讀包山楚簡的內容大概能較好地理解連結中央和地方的社會體系。

包山楚簡的文書簡保存了左尹官府受理的訴訟、處理這些案件的官員以及程序的記錄、各種各樣案件的文書。根據文書簡可見相同記錄者的名字，可知它們基本屬左尹官府處理案件的記錄。不過，其內容既有受理楚國領域內各地的案件，又有中央委托各地官員審理的案件。其區域與鄂君啓節所記水陸交通路線相比，大致以國都一帶及楚國邊境、關卡之內的地名為多，湖南省、長江下游、淮水流域方面則很少。^①同時，透過起訴、審理時的官員及其身份，可以知道楚國疆域內多有封君等勢力的存在。這就是包山楚簡所反映的戰國時期楚國的社會形勢，它和戰國時期秦國強力推行的以郡縣制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的形態大異其趣。^②在秦人占領之後，包山楚簡所見的社會體系在江陵地區已不復存在，祇是殘存於東方的淮水流域。

楚國左尹的文書，不是秦漢時代經丞相、御史等官府處理過的律令、命令、行政文書，而接近於與廷尉職掌有關的司法、審判文書。楚卜筮祭禱簡所透露的信息，與秦漢時代執掌祭祀儀禮的奉常官府所屬的太史、太祝、太卜系統具有同樣的機能（王朝體系），而就文書簡的內容來說反映的是中央和地方社會關係的信息。因此，文書簡包含著地方官府所屬官員，以及生活在那裏的人們的情況（楚國的社會體系），是研究地方行政和歷史地理的基礎。

“所誼”簡中，雖然有連續的記錄，但却不是逐月記錄的完整資料，其時間與“受期”簡相合的案件也不一定對應，因此它可能不是原始文書，而祇是抄錄。還有，文書簡中時間比較早的資料，或許包含業已失效的文書。帶有這種信息的竹簡之所以被隨葬在墓中，可能是為了追悼墓主，而將年代較早的已經廢棄的文書或者摘錄出其中一部分用於隨葬。

結語

本文以包山楚簡為中心，對其傳遞出來的戰國時期楚國的信息作了考察。關於楚文化與楚國的社會體系，可以指出如下特徵。

首先，根據卜筮祭禱簡和遺策，可以推想擔任楚國編定楚曆、祭祀祖先以及從事卜筮

① 前揭拙稿《戰國楚的疆域形成與交通線路》、《〈史記〉與楚文化——江陵、雲夢的地域社會》（《〈社會科〉學研究》28、1994）及《〈史記〉與楚文化》（《長江文化論集》第一輯，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等。

② 前揭拙著《中國古代國家與郡縣社會》第一編第一章《中國古代的關中開發》、第二章《戰國秦的疆域形成與交通線路》、第三章《戰國秦代的軍事編制》等。

的貞人是在楚國體系內開展活動的。以漢代而言，他們正好和奉常（太常）所屬的太史、太祝、太卜的職務極為相似。因而可以說，楚國即使曆法、祭祀、卜筮的方法與他國類似，但基於楚國的大事紀年、譜系以及習俗，具有獨立的體系。

戰國時代的楚國不僅在曆法、祭祀體系與習俗方面，而且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社會體系。透露出這一信息的，正是包山楚簡的文書簡。它保存了左尹官府處理審判案件的記錄和具體案件文書。將其與“鄂君啓節”所反映的交通和關卡通行結合起來看，到戰國中期以前，楚國已具有領土國家的形態，屬於地方統治和封君等并存的社會結構。在包山楚墓中，這些簡書有的可能已失效，或者為了悼念墓主的事跡而被抄寫下來，與其他物品一起被隨葬。可以確認，當時卜筮祭禱簡和文書簡乃是基於楚國的社會體系，反映楚文化和社會結構的信息。

由此又派生出這樣的問題，即如何理解古墓出土資料中沒有楚國紀年、月名等信息的書籍。關於這一點，很可能存在兩大傳遞途徑。^①其一，與卜筮祭禱簡、文書簡等一樣，一度進入以都城為中心的首都圈，進而在楚文化影響所及的地域，沿交通綫路傳播。其二，沿著各地的交通綫路，直接被帶到墓主的居住之地。推測其中當有與封君等往來的游說家，以及諸子、客等帶來的。河南信陽楚墓竹簡以及湖南長沙楚墓出土的資料、慈利石板村楚墓竹簡、郭店楚墓竹簡等，要分析其內容和思想，在這種社會信息傳遞中予以理解的視角，似亦不無裨益。

我們認為，這樣對包山楚簡包含的信息進行分析，在探明楚國社會體系的同時，對認識戰國楚簡的性質也有助益。我們期待在楚國的社會背景之中，基於對古墓所出遺策、卜筮祭禱簡、文書簡、書籍等進行定位的視角，歷史學與思想史的討論會取得進展。

① 關於這一點，拙稿《中國古代史中的秦、巴蜀、楚》（《長江流域文化研究所年報》2，2003）及《中國古代書籍與信息傳遞——游說、國策和文書》（《探求資料學的方法》，愛媛大學，2002）略為提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第八講《簡帛古書導讀二：史書類》亦對戰國楚簡的書籍作了分類。

圖 1 包山楚墓的結構與竹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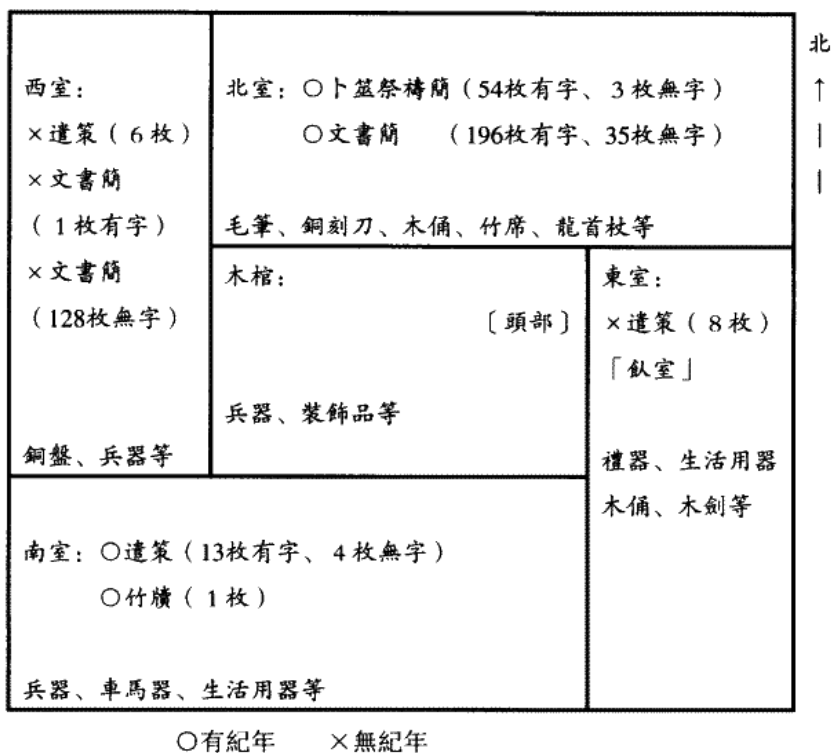


圖 2 文書簡的訴訟與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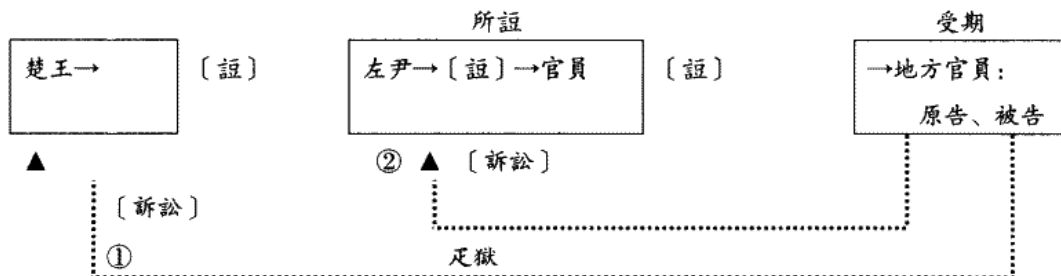


表1 包山楚簡的紀年與先祖名

| 年代（公元前） | 紀年與先祖名 |
|-----------|--|
| 懷王7（322） |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 |
| 懷王8（321） | 齊客陳豫賀王之歲 |
| 懷王9（320） | 魯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 |
| 懷王10（319） | □客監固返楚之歲 |
| 懷王11（318） | 宋客盛公鵲聘于楚之歲 邵王（昭王）（卜筮200簡等） |
| 懷王12（317） | 東周之客許經歸胙于荻郢之歲 宣王之宅州人、宣王之…客（受期58簡） 懷王〔威王〕宅臧嘉（所誼166簡） 邵王（卜筮214簡等） 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卜筮217簡） |
| 懷王13（316） | 大司馬悼滑救郢之歲 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卜筮237簡） 邵王（卜筮240簡等） 荆王自熊繹以就武王（卜筮246簡） |

表2 戰國楚墓的紀年與先祖名

| 戰國楚墓 | 紀年與先祖名 |
|-----------------|--|
| 望山1號墓 （卜筮祭禱） | 齊客張果問〔王〕於荻郢之歲 郢客困易問王於荻郢之歲 聖王、悼王既賽禱（88簡等） □先老僮、祝□（120簡等） |
| 望山2號墓 | □周之歲（遣策） |

| | |
|------------------|--|
| 天星觀一號墓 (卜筮祭禱) | 秦客公孫鞅問王於蕞郢之歲 齊客紳腫問王於蕞郢之歲 |
| 新蔡楚墓 (卜筮祭禱) | 王徙於郢郢之歲 王自肥還郢徙於郢郢之歲 □公城郢之歲 大城茲方之歲 句郢公鄭余穀大城茲方之歲 齊客陳昇致福於王之歲 蕞荅受女於楚之歲 大莫畧陽爲〔獸〕於長城之歲 …至師於陳之歲 王復於藍郢之歲 老僮、祝融、穴熊芳屯一……(甲三: 35) 老僮、祝融、穴熊(乙一: 22) 祝融、穴熊各一牂(乙一: 24) □融、穴□、昭王、獻(甲三: 83) |
| 曾侯乙墓 | 大莫畧陽爲適猶之春(遣策) |

表3 文書類的年代與內容

| 分類 | 公元前 | 內 容 | 記載形式 |
|-----|------------|---------------------|---------------------|
| 受 期 | 317 | 左尹官府指示處理的記錄 61枚 | 正面“○識之” 共同的記錄者之名 |
| 所 誼 | 317 | 左尹官府負責人處理的記錄 35枚 | 背面無附記 |
| 足 獄 | 319 | 受理訴訟的記錄23枚 | 背面有附記 |
| 集 著 | 321、320 | 處理命令等的副本13枚 | 正面“○識之” 背面有附記 |
| 集著言 | 317 (無) | 處理命令等的副本5枚 | |
| 其 他 | 322 | 關於黃金的記錄2種17枚 | 背面有附記 |

| | | | |
|-----|-----------------------------------|---------------------------------------|-------|
| 其 他 | 319 318、317 319、318、 317 | 下蔡的案件 4 枚 陰侯之地的案件 9 枚 具體案件 12 枚 | 背面有附記 |
| 其 他 | 無 | 具体审理的案例 17 枚 | 背面有附記 |
| 其他 | 無 | 西室 1 枚 | |

注：枚數和年代依據《包山楚簡》。

表 4 正獄的原告與被告

| 編號 | 原 告 | 被 告 | 備考 |
|-----|---------------|--------------------------|----------------|
| 80 | 少臧之州人剛士石 A | 其州人剛士石 B | 陳：集著言 陳：集著言 |
| 81 | 周 A | 鄢之兵甲執事人邕司馬競 B | |
| 82 | 舒 A | 呂 B 等 6 人 | |
| 83 | 羅之～里人湘 A | 羅之～國之～邑人只 B | |
| 84 | 朕人之州人陳 A | 聖夫人之人宗 B、C | |
| 85 | 錡岳公 A | 除宋 B 外, 22 人 | |
| 86 | 詹陽君之～邑人 A | 萊陵君之～邑人巡 B | |
| 87 | 鄆陽大主尹宋 A | 範 B 等 5 人 | |
| 88 | 楚斯司敗某 A | 斯邑殷 B、C | |
| 89 | 遠 A | 司衣之州人苛 B | |
| 90 | 竟 A | 繁丘之南里之人龔 B、C | |
| 91 | 某令周震之人周 A | 付舉之闢人周 B、C | |
| 92 | 宛陳午之里人 A | 某尹之里人苛 B | |
| 93 | 宛人範 A | 範 B | |
| 94 | 苛 A | 聖冢之大夫範 B | |
| 95 | ～之州人鼓叢張 A | 鄢之～邑人梅 B 等 | |
| 96 | 繁寔人範 A | 繁寔之南陽里人陽 B 等 | |
| 97 | 中陽～邑人間 A | 坪陽之～里人文 B | |
| 98 | 許 A | 鄆陽君之人～公番 B | |
| 99 | 只陽之～公 A, ～令 B | 其官人番 B 等 3 人 | |
| 100 | ～邑人走仿登 A | 走仿呂 B | |
| 101 | 章 A | 宋 B | |
| 102 | 上新都人蔡 A | 新都南陵大宰樂 B, 右司寇正陳 C, 正弁 D | |

注：人名按先後順序記為某 A、某 B。

表5 受期簡八月的人物

| 編號 | 受期者 | 要求的内容 |
|----|----------------------|----------------------------|
| 21 | 己巳,司豐司敗廖 A | 辛未,不~黃 B、C 以廷 |
| 22 | 己巳,郢司馬之州加公李 A、里公隋 B | 辛未,不~陳 C 之傷之故以告 |
| 23 | 己巳,郢少司敗 A | 9 月癸丑,不~郢大司敗以~ |
| 24 | 辛未,郢司馬豫之州加公李 A、里公隋 B | 癸酉,不~陳 C 之傷 |
| 25 | 辛未,司敗黃 A | 癸巳,不~玉令 B、C 以廷 |
| 26 | 壬申,鄒陽大正登 A | 癸巳,不~鄒陽邕大夫 B 以廷 |
| 27 | 癸酉,鄒陽君之州里公登 A | 乙亥,不以死於其州者之~告 |
| 28 | 甲戌,贅尹之司敗某 A | 辛巳,不~某尹之~邑公遠 B、莫翼遠 C 以廷 |
| 29 | 甲戌,廖莫翼之人周 A | 癸未,不廷 |
| 30 | 戊寅,郢司馬之州加公某 A、里公隋 B | 辛巳,不~陳 C 之傷以告 |
| 31 | 戊寅,尚司敗蔡 A | 己丑,不~尚之己里人青 B 以廷 |
| 32 | 戊寅,鄒陽君之州里公登 A | 辛巳,不以死於其州者之居~致命 |
| 33 | 辛巳,羸陽之取司敗黃 A | 癸巳,不~五皮以廷 |
| 34 | 辛巳,付舉之闢敵公周 A | 己丑,不~付舉之闢人周 B、C 以廷 |
| 35 | 癸未,新游宮中~之州加公弼 A | 乙酉,不~B 以廷 |
| 36 | 丙戌,某 A | 9 月乙巳,不~B 君以廷 |
| 37 | 己丑,福陽~尹之州里公 A | 壬辰,不~苛 B 以廷 |
| 38 | 己丑,張吞君之司敗臧 A | 癸巳,不~張吞君之司馬 B、張吞君之人 C、D 以廷 |
| 39 | 己丑,付舉之闢敵公周 A | 9 月戊申,不~周 B、C 以廷 |
| 40 | 乙未,著陵司敗陽 A | 9 月己酉,不~李 B 以廷 |
| 41 | 乙未,樊夫人之大夫番 A | 9 月戊申,不~某 B 以廷 |
| 42 | 丙申,靈里子之州加公文 A、里公苛 B | 9 月戊戌,不~公孫 C 之恆之死 |

注：第一位受期者為某 A，以下為某 B，以此类推。

表 6 文書類的尺寸與內容

| 分類 | 枚數 | 編號 | 長度(厘米) | 年代與內容 |
|----------------------|----|----------|------------|--------------------|
| 其他 59 枚(不計 所誼) | 12 | 103—114簡 | 54.9—55.2 | 前322年, 有關黃金文書 |
| | 5 | 115—119簡 | 68.2—68.5 | 前322年, 有關黃金文書 |
| | 4 | 120—123簡 | 68.3—69.8 | 前319年, 下蔡的案件 |
| | 2 | 124、125簡 | 68.3 | 背面書“既發筭”等 |
| | 2 | 126、127簡 | 69.5, 69.8 | 前317年, 地方官員的復函 |
| | 1 | 128簡 | 69 | 左尹官員、背面有文字 |
| | 2 | 129、130簡 | 64.6, 64.7 | 前319—317年的案件、背面 |
| | 9 | 131—139簡 | 64.6~66.5 | 前318、317年, 陰侯之地的案件 |
| | 1 | 140簡 | 65 | 前317年的案件, 背面有文字 |
| | 4 | 141—144簡 | 64.8, 65 | 前317年的案件, 左尹官員 |
| | 1 | 145簡 | 64.8 | 前317年的案件, 背面 |
| | 2 | 146、147簡 | 67, 68.5 | |
| | 1 | 148簡 | 64.5 | “客發筭”3字 |
| | 1 | 149簡 | 68.3 | |
| | 1 | 150簡 | 64.5 | 背面有“客發筭” |
| | 2 | 151、152簡 | 66 | 有關食邑的案件 |
| | 2 | 153、154簡 | 65.1, 69.5 | 封邑的界限 |
| | 1 | 155簡 | 69 | 背面有“……誼之左尹” |
| | 1 | 156簡 | 64 | 末尾“……子陵尹誼之” |
| | 1 | 157簡 | 66 | 背面有文字 |
| | 1 | 158簡 | 67.7 | |
| | 1 | 159簡 | 64.4 | |
| | 1 | 160簡 | 65.3 | |
| | 1 | 161簡 | 66.1 | |

論郭店楚簡所見儒家音樂思想

◎ 清華大學歷史系

彭 林

內容提要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等篇有若干關於音樂思想的重要論述，如“樂之動心也，濬深郁陶”，“樂，服德者之所樂也”，“凡古樂龍心”，“樂，禮之深澤也”，本文探討了它們與《禮記·樂記》的關係，認為兩者在思想體系上是一致的，其著成年代應該大致相近。《性自命出》的音樂思想，是心性之學的組成部分，與禮學思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因此，本文質疑《樂記》作者為公孫尼子的傳統說法，認為《樂記》不可能是獨立於心性學說之外的學派或學者作品，而祇是子思學派的作品。

關鍵詞 郭店楚簡、音樂思想、公孫尼子、子思學派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尊德義》、《語叢》等篇有若干關於音樂思想的論述，文字雖然不多，看似斷篇殘句，但聯繫上下文，結合傳世文獻，完全可以探究其深意。由於傳世文獻中有關儒家音樂思想的記載不多，主要集中在《禮記·樂記》中，而《禮記·樂記》的年代學界久有爭議，不少學者認為它晚於《荀子·樂論》，乃是漢儒的作品。郭店楚簡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年代比較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對於解決紛爭、正確理解先秦儒家的音樂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一、東周的音樂成就及其理論研究

中國是音樂文化發皇最早的國度之一。1986年，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所出16隻用仙鶴的

肢骨製作的骨笛，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響實驗室與武漢音樂學院專家，用 strobocoenn 閃光頻譜測音儀對其中保存最為完整的 20 號 7 孔骨笛測試，證明已經具備了七聲音階，其年代為距今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此外，賈湖 341 號墓的 2 號骨笛的音，以及各音之間構成的音程，有 4 個音程與十二平均律完全相同，其餘能構成音程的音分值與十二平均律的音程、音分值相比，最大的音分值系數都低於 5 個音分值，顯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樂理知識和製作技能。^①由此可以推知，《尚書·堯典》中夔為典樂，“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的記載恐非空穴來風。

經過夏、商和西周的累積與發展，春秋時代的樂器製作、演奏技巧與音樂理論的水準，已經進入高峰期。最有力的例證，是湖北隨縣擂鼓墩 1 號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鐘架由長短不同的兩堵立面呈曲尺形垂直相交，為銅木結構。7 根彩繪木樑的兩端，用蟠龍紋銅套加固，由 6 名銅鑄的武士和 8 根銅質圓柱承托。編鐘共 65 枚，包括紐鐘、甬鐘、鎛鐘等三類，依大小、音高編為 8 組，分 3 層懸掛在鐘架上。最大的鐘通高 152.3 厘米，重 203.6 公斤。編鐘的正鼓部和右鼓（或左鼓）部，均能發出兩個呈三度音程的不同基頻的樂音。整套編鐘以姑洗律為基調，形成倍低、低、中、高等 4 個音域區，從最低音到最高音，跨越 5 個八度又一個大二度，與鋼琴相比，僅兩端各少一個八度。其中心區域 12 個半音齊備，構成完整的半音音階，可以旋宮轉調。實驗演奏的結果表明，編鐘的和音、復調、轉調等手法的運用已經非常成熟，具有相當高超的音樂水平。編鐘總重量達 2567 公斤，加上各種青銅飾件，青銅總重量達 4421 公斤。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蕞爾小邦，竟然能有如此氣魄的樂器群，則中原諸侯的樂器有何種場面，令人難以想象。

樂器製作的愈益精密和樂曲風格的日新月異，使得音樂的表現手法和對社會的影響力大為提升，從而引起學界探討音樂理論的熱情：音樂是怎樣起源的，音樂的本質和功能是什麼，如何看待音樂對社會進步的利弊，音樂創作與人類理性的關係如何，等等。一時蔚然成風，熱潮疊起，儒家、道家、墨家無不裹挾其中，相與論辨。在此過程中，儒家對於音樂理論的闡述最為系統，研究也最為深入，並且形成了獨特的音樂思想。除《禮記·樂記》外，《荀子·樂論》以及《呂氏春秋》中的許多篇都有極為精到的論述。郭店楚簡有關音樂的論述，或可與《樂記》相印證，或可補《樂記》之缺環，因而彌足珍貴。

二、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

樂原本是指人在愉悅時表露出來的自然情態，是人類最普遍的文化現象之一。就世界絕

^① 參見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蕭興華《中國音樂文化文明九千年——試論河南舞陽賈湖骨笛的發掘及其意義》，《音樂研究》2000 年第 1 期。

大多數民族而言，樂的功能是娛樂，娛神或者娛己。而儒家之樂的觀念，則有其特定的內涵和深刻的哲理，不得與現代人的“音樂”等量齊觀。《禮記·樂記》說：“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認為樂舞的各種道具，不過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屬於“末節”，樂的大節是德（《樂記》的這一思想我們將在下文詳細談及），這是中國與世界諸古文明音樂思想相區別的基本點，標志著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性自命出》開篇，論述性、命、天、情、教之間的關係，接着話鋒一轉，開始討論音樂與人心的關係。

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聞笑聲，則鮮如也斯喜。聞歌謠，則啗如也斯奮。聞琴瑟之聲，則□如也斯歎。觀《賁》、《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勉如也斯儉。兼思而動心，□如也。其居次也舊，其反善復始也慎，其出入也順，司其德也。

凡是出於真情的聲音，總是最能打動人心。在人性轉為喜怒哀樂之情的過程中，聲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誘情出動的外物之中，作者顯然尤其重視“聲”對人的作用，而這正是《樂記》所反復強調的“樂為心聲”的觀點。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可見，《樂記》的作者把音樂看作是感於外物、生於人心的產物。人的言、嗟歎、咏歌、手舞、足蹈等，與性情一樣，都是人的本能，都會在外物（尤其是音樂）的刺激下被激發出來，成為由內及外、由微漸著、一連串不斷提升、走向高潮的情感、聲音和體態，這是一種盡人皆有的情感樣式。

《性自命出》則更進一步，所謂聲，既包括作為作用於人的外物的聲，也包括人為呼應外物而發出的心靈之聲。外誘之聲，對人情、人心的影響最為強烈。人聽到笑聲、歌謠、琴瑟之聲，以及觀看《賁》、《武》、《韶》、《夏》等樂舞，就會自發而迅速地作出喜、奮、歎以及“齊如也斯作”、“勉如也斯儉”等情感反應，心為之而動，強調指出，“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

樂有音調、節奏，有強烈的感染力，為大眾喜聞樂見，聞聲而心從，潤物細無聲。所以《樂記》說：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子夏與魏文侯談樂教時，引用了《詩·大雅·

板》“誘民孔易”一語。這一思想也見諸《性自命出》：

樂之動心也，濬深鬱陶。

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鬱昏之氣也，人不難爲之死。

凡學者求其心爲難，以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樂之速也。

規範人的言行不難，改造人心卻是萬分的困難。而能夠迅速地、深層地打動人心的則是樂，這種感人的巨大力量，可以達到“人不難爲之死”的地步，不可小視。儒家的音樂思想，正是基於對音樂的強烈感染力的認識，以及無可替代的改造人心的功能而架構起來的。

三、樂，服德者之所樂也

郭店楚簡《語叢三》提出一個命題：“樂，服德者之所樂也。”《五行》也說：“惟有德者然後能金聲玉振之。”在郭店楚簡中，德是宇宙的最高境界：“德，天道也。”^①將樂與德相提并論，認爲樂是有德者之樂，是中國儒家所特有的表述。郭店楚簡的這一命題，與《樂記》的表述是否有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

儒家的“樂”的觀念有其特定的內涵。《樂記》所論之“樂”，可以大別之爲兩類，一類是指包括詩、歌、舞以及樂器、道具等在內的綜合的表現形式，“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②”，這是一種表像化的、通俗意義上的樂。這一層次上的樂，並不反映音樂的本質。另一類是儒家音樂思想中的嚴格意義上的樂。

現代意義上的音樂，在《樂記》中被離析爲聲、音、樂等三個依次遞升的層次。“聲”是最基礎的層次，是人心感於外物之後經由口腔發出的喜怒哀樂之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聲是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音”則是經過文飾的人類情感之聲。《樂記》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也就是說，只有發自內心而又“成文”（如節奏等）的聲，才能稱爲“音”，它是比聲更爲高級的層次，相當於今人的音樂。

聲和音的區別在於，聲是情感的直接宣泄，單調、乏味，沒有審美價值可言。音是通過音階、節奏、音調、清濁等藝術手法來表現的情感，具有審美價值。人與動物都有感知外物和發聲的器官，所不同的是，人有感知音的欲望，具有把聲提升到音的能力，動物則沒有。儒家把是否懂得音，作爲人區別於禽獸的重要標志之一，《樂記》說：“知聲而不知

① 《郭店楚墓竹簡·五行》。

② 《禮記·樂記》。

音者，禽獸是也。”

在創作“音”的過程中，由於作者在情感、修養、審美意識以及構音技巧等方面的差異，形成的樂曲必然是大相徑庭。所表達的情感或者莊重，或者輕鬆，或者張狂；所展示的風格或者細膩，或者粗獷，或者流暢，故能給人以不同的感受。

“音”原本是物誘情出的結果，但它一旦形成，又可以轉化為新的、誘情外出的“物”，調動和引導聽眾的情感。《樂記》說：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①

音所表達的情感是正還是邪，無疑會對聽眾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平和中正、體現君子之道的音，可以涵養人的德性，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的穩定；瘋狂或頹廢的音樂，追求感官刺激，過度宣泄人性，會使人性扭曲，偏離道德規範。因此，音的正邪直接關係到民風的正邪。為此，儒家主張對紛繁複雜的音嚴加區別，只有選擇和提倡合於道的音，民風才會趨向淳樸。所以，《樂記》說：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①
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②

有道與無道之人，只要看其所熱衷的音，便可了然。進而言之，音又與政相通，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樂記》云：“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儒家把合於道的音稱為“樂”。“樂”是在聲與音的基礎上形成的最高層次，《樂記》說：“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把能否辨別音與樂，作為區別君子和眾庶的分水嶺，惟有君子才真正懂得樂，“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③《樂記》中有一個著名的問答：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① 《禮記·樂記》。

② 《呂氏春秋·音初》。

③ 《呂氏春秋·大樂》。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就想卧睡，聽鄭衛之音則不知疲倦。因而請問子夏：“爲何古樂之如彼？新樂之如此？”子夏的回答略帶譏諷：“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連魏文侯這樣喜歡音樂的國君，都不能分辨音與樂。一般民衆在欣賞音樂時，更是隨心所欲，不辨高下，祇要滿足耳目聲色之欲即可，盲目性極大，其結果必然造成人心的紛亂。因此，需要有知識精英來創作或者挑選出德音雅樂，用以教化民衆。《樂記》云：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樂的形式爲人民所喜聞樂見，樂的音調、節奏有強烈的感染力，最難抗拒。《樂記》說“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性自命出》說“其入撥人之心也[厚]”，道理是相同的，而德音的教化力量更是無可替代。

四、古樂龍心

關於樂的功能，《樂記》中有許多討論，而在郭店楚簡中也有類似的內容，如《性自命出》提出了“古樂龍心”的命題：

鄭、衛之樂，則非其聽而從之也。凡古樂龍心，益樂龍指，皆教其人者也。《賁》、《武》樂取，《韶》、《夏》樂情。

所謂“古樂龍心”，是指古樂的功能。“龍”字，《廣雅·釋詁三》訓“和”，《詩·商頌·長發》“何天之龍”，《詩·周頌·酌》“我龍受之”，兩“龍”字毛傳均訓“和”，至確。如此，則“古樂龍心”即“古樂和心”。

文獻每每以“古樂”與“新樂”相對。《性自命出》以“益樂”與“古樂”相對，“益樂”所指不詳。核諸文獻，加之這段文字中有“鄭衛之聲”，因此，“益樂”有可能就是指新樂。“古樂”當指後文的《賁》、《武》、《韶》、《夏》。

上古時代，凡是勤勞天下、吊罪伐惡的君王，都有專門的樂章。大禹治水，萬民歡欣，於是舜命皋陶作《夏迭》九章，以表彰其功。湯商伐桀，黔首安寧，湯命伊尹作《大護》之舞、《晨露》之歌，以展現其善。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於是命周公作《大武》。成王時，殷民叛亂，用象群為虐於東夷。周公奉命東征，馳師驅逐之，於是作《三象》，以嘉其德。相傳夔開始制樂獎賞諸侯，《樂記》說：“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相傳周有六代古樂：黃帝樂《雲門》、堯樂《咸池》、舜樂《韶》、禹樂《夏》、湯樂《濩》、武王樂《武》。《詩·周頌》之《武》，即六代古樂之一，毛傳云：“《武》，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所樂所為舞也。”孔穎達《正義》：“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可見，凡是足以成為一代之樂者，樂名之前得冠以“大”字，故《雲門》以下諸樂或稱《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樂曲一終為一成，《書·益稷》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有九成，其詳則不可得聞。《大武》有六成，據王國維考證，六成的舊第當為：《夙夜》、《武》、《酌》、《桓》、《賁》、《般》。^①可知，簡文提及的《賁》、《武》，同屬於《大武》，是武王的樂舞。《韶》、《夏》是舜、禹之樂。四者同是古樂的典範。

簡文提及的“鄭衛之樂”，屢屢見於文獻，《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是所謂“新樂”的代表，為孔子所深惡痛絕。《論語·衛靈公》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放”與“遠”同義，鄭聲淫、佞人殆，都不可親近之。《論語·陽貨》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紫非正色而足以奪朱，新樂之危害足以亂雅樂之正，不可小視。

新樂是春秋時人所作的淫聲樂曲，恣意放蕩，“淫於色而害於德”，無思想內涵可言。新樂有兩個顯著的特點：

其一，樂器務求其大，音響務求其震，以“駭心氣，動耳目”，刺激感官為主要目的。相傳夏桀、殷紂製作“侈樂大鼓”，“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呂氏春秋·侈樂》：

① 見《周大武樂章考》，收入《觀堂集林》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點校本，2001。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說：“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干戈，載棄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楚莊王所引詩句，見於《周頌》的《賁》、《桓》諸篇，故以往學者以為《賁》是《大武》的第三成，《桓》是第六成。

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
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
若噪。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

已經失去了樂表達人情的初衷。鄭衛之聲、桑間之音，都是亂國之君的所好。這種聲若雷
霆的樂曲，聲音狂噪震動，超越了人的聽覺的生理承受能力，也悖逆了人的正常之情，因
此說，“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其二，表現的形式狂放不羈，內容污穢無聊，背離了“德”的要求。子夏批評新樂說：
“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
可以道古。”

從形式到內容都如此不堪的新樂，勢必對人的心志和一方風俗造成消極影響，進而影響
社會的健康發展。對此，子夏批評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荀子也批評說：“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
人之心淫。”^①

古樂是黃帝、堯舜以來，聖賢相傳的典雅之樂，用於廟堂，節奏緩慢莊重，富有寓意。
它們以歷史故事作為題材，歌頌先代聖賢造福於萬民的功烈和道德教化的成就，主題鮮明、
嚴肅，最易於喚起聽眾的崇敬和思慕之心，並從中受到激勵。如《大武》六成表現武王克
商時的過程，《夙夜》為舞之始，《武》為“勝殷遏劉”，《酌》為告成，《桓》為疆南國，《賁》
為封功臣，《般》歌頌周命。聽者可以生動地感受武王伐紂的艱辛過程與歷史功德。《樂記》
云：“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
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其次，樂器有嚴格的選擇，《樂記》說：“聖人作為鞀、鼓、柷、敔、塤、箎，此六者
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呂氏春
秋·適音》云：“故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
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也就是說，古樂之作，不是
為了滿足感觀的刺激，而是為了教化民衆。

春秋時期，古樂與新樂并存。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於魯，所觀之樂舞有《象
箎》、《南籥》、《大武》、《韶濩》、《大夏》和《韶箎》等。盛行於春秋時代的“鄉飲酒禮”，

^① 《荀子·樂論》。

以尊老養賢為宗旨，席間要演奏或歌唱《詩經》中寓意深遠的篇章。先由樂工歌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說的是君臣之間的平和忠信之道。接著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是說孝子奉養父母之道。然後，堂上、堂下交替演奏樂歌，堂上鼓瑟唱《魚麗》之歌，堂下則笙奏《由庚》之曲；堂上鼓瑟唱《南有嘉魚》之歌，堂下則笙奏《崇丘》之曲；堂上鼓瑟唱《南山有臺》之歌，堂下則笙奏《由儀》之曲。最後器樂與聲樂合起，奏唱《周南》中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中的《雀巢》、《采芣》、《采蘋》，說的都是人倫之道。以上都是鄉飲酒禮中的正歌。一鄉之人在揖讓升降、笙瑟歌詠的愉快氣氛中，受到禮樂的教化。但是，毋庸諱言，列國貴族大多聲色犬馬，迷戀新樂，因而儒家多以抨擊新樂、捍衛古樂為己任。

重視樂的教化作用，孔子為第一人，其對音樂有特殊的理解。孔子向師襄子學彈琴，“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①孔子學習《文王操》，先習其曲，再習其數，復習其志，最後得文王之為人。孔子在齊國聽到《韶》樂，感到盡善盡美，無以復加，居然“三月不知肉味”，并感歎樂對於人心的巨大作用力：“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②

古樂就是德音，是致治之極在音樂上的體現，其功能和在民心、化萬物。《樂記》云：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記》這段文字提到音樂的效用時，在敬、順、親三者之前都加了一個“和”字，成為和敬、和順、和親，這是很特殊的表達。敬、順、親三者既可以用語言教，也可以用德音化，而以德音化成者為最高境界。用德音化成者方可稱“和”。所以，惟有德音雅樂，才能奏於廟堂，播於四方。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一個道理：春秋時期是樂器、樂理高度發達的時代，但是，為什麼孔子却稱之為“禮崩樂壞”的時代？根本原因在於，春秋時代盛行的是新樂，是純粹音

① 《史記·孔子世家》。

② 《論語·述而》。

樂學意義上的樂。從儒家的音樂理論來判斷，它們儘管器衆樂備，華美無比，但卻是發洩狂熱性情的工具，完全悖逆了德治的精神，失卻了音樂的靈魂，都是昏君亂臣的作品，所以稱之爲衰世之樂，敗壞之樂。

五、樂，禮之深澤也

以禮爲教，言談舉止處處合於規範，爲何還要樂教？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儒家的道德評價說起。郭店楚簡《五行》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
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智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
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

文中指出，仁義禮智聖體現於人的身上可以有兩種情況，即“形於內”或者“不形於內”。不形於內者只能稱爲“行”；只有形於內者纔能稱爲“德之行”，即“德行”。仁義禮智聖五端的總和就是德行，德行是內心德性所發出的光輝，是德性的自然流露。如果沒有內在的德性作基礎，僅僅在外表顯示出仁義禮智聖之行，那不過是模仿的結果，或者是偶然相合，與真正的德行有本質的區別。從道德標準而言，只有內外兼備的仁義禮智聖之行才是德行，“五行皆形於內而時行之，謂之君[子]”。

治民必須先治其心，其心正則其行正，其心邪則其行僻。郭店楚簡云：“樂，內也。禮，外也。禮樂，共也。”治民不僅要治標，規範其言行，更重要的是要治本，端正其心志。如前所說，音樂最具影響人心的力量，最能夠從根本上左右心志的走向。因此，“移風易俗，莫善於樂”^①，“故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②，這正是儒家要建立樂教，把樂放在一切教化手段之上的深層原因。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云：“笑，禮之淺澤也。樂，禮之深澤也。”《尊德義》云：“有知禮而不知樂者，無知樂而不知禮者。”筆者認爲，這是楚簡作者對禮樂關係的闡述。所謂禮樂關係，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兩者的分工；二是兩者孰輕孰重。

儒家的理想是實行德治，其途徑則是禮樂之治，《六德》云：“作禮樂，制刑法，教此民爾，使之有向也，非聖智者莫之能也。”《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記》還將治國之道歸納爲禮、樂、政、刑

① 《孝經·廣要道章》。

② 《呂氏春秋·適音》。

四端，“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中，政是推行禮樂的，刑是防範不遵禮樂的，所以四端的核心還是禮與樂。

禮、樂二者為外與內關係，外為末，內為本。樂是禮的本源，深藏於內；禮是樂的表露，顯現於外。“樂，禮之深澤也”，猶言樂為禮之淵藪。樂重於禮。《語叢一》云：“……生德，德生禮，禮生樂，由樂知型。”《樂記》也有基本一致的表述：“德輝動於內”，“禮發諸外”，以樂為禮之深澤，正是楚簡作者對禮樂關係的見解。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有喜愛音樂的傳統，或操琴瑟，或吹簫管，既有調節心情的作用，更有涵養心志的功能。賞樂者對樂情的理解因素養高下而異。《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是古代知音的範例，但并非最高境界。《樂記》說君子聆聽樂章，能從樂聲中感受樂教的要旨。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鐘聲鏗鏘，壯氣充滿，君子會想起慷慨以當的武臣。磬聲清響，節義分明，君子會想起死於封疆的大臣。琴瑟之聲哀怨，婉妙不越，君子會想起志義自立的大臣。竽、瑟、簫、管之聲叢聚，會集攬攬，君子會想起善於蓄聚其眾的大臣。鼓鼙之聲喧囂，歡雜涌動，君子會想起擊鼓進眾的將帥之臣。這是君子用樂自化的例證。

音樂與人心相通，又可以化性導志，所以，考察一地的歌謠，就可以得知當地的風氣。《禮記·王制》等文獻記載，上古帝王有定期到四方巡狩的制度，所到之處，地方官要呈獻當地流行的民歌，作為述職的內容之一。《呂氏春秋·適音》說：“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君王考察民歌，就可以瞭解地方官是否為政以德，民風是否淳樸。發現純正無邪的民歌，則由隨行的官員記錄下來，帶回去推廣，此即所謂“采風”。相傳《詩經》國風就是采風所得。在這一意義上，音樂與政治相通，可以作為判斷為政得失的一項指標。所以《樂記》說：“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呂氏春秋·適音》也說：“凡音樂通乎政。”

觀樂可以知政還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君王是萬民之主，君王的喜好，如日月經天，為萬民仰望，直接影響到民風的走向，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矣”。君王提倡的樂曲，

必然會長期影響人民的情趣，民眾的憂思、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之態，正是樂聲長期薰陶的結果。

其二，樂為心聲。如果君王失政，民眾流離，何來愉悅的樂曲？如果君王有道，庶民安樂，則何處不聞歡歌！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①

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②

所以，聽聽民間流傳的音樂，就可以感覺到他們的生活是否幸福。儒家認為，無論是觀察一個國家，還是觀察一個人，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聽其樂。

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③

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④

人性的宣泄必須合理，不足或過度，都不利於身心健康和社會安定，也不符合天道。《樂記》說：“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先王制樂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快樂有節制，合於天道；又說，儒家的“立樂之方”，是要“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讓民眾在健康的音樂中接受德的薰陶，否則人與禽獸就沒有了區別。《呂氏春秋·適音》說：“先王必托於音樂以論其教”，“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就是寓教於樂。

① 《禮記·樂記》。

② 《呂氏春秋·大樂》。

③ 《呂氏春秋·適音》。

④ 《呂氏春秋·音初》。

六、關於《樂記》的作者

《樂記》是《禮記》中的一篇，現存最早的系統記述儒家音樂思想的文獻，《史記》曾將其收入《樂書》。關於此書的情況，孔穎達《正義》云：

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採《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其道寢以益微。”

可知鄭玄《目錄》、孔疏沒有提及《樂記》的作者問題，《漢書·藝文志》著錄《樂記》二十三篇，應當就是上文劉向校書所得的“《樂記》二十三篇”，也沒有注明作者。推想是《樂記》與古文《記》同時被發現時，就沒有作者可考。

梁沈約首創《樂記》作者為孔子再傳弟子公孫尼子之說，但未列舉證據；張守節《史記·樂書》的《正義》因之。公孫尼子的身世不詳，說者謂是孔子的再傳弟子，或說是西漢雜家。但後世學者對《樂記》的作者看法相當分歧，至少有子夏說、荀子或荀子學派說、河間獻王劉德說、西漢末年說等多種說法，莫衷一是。^①而且，居主導地位的意見是，《樂記》的年代晚於《荀子·樂論》，是漢儒的作品。如今，由於郭店楚簡的出土，我們可以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推斷。

基於本文的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推論：

首先，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等篇所見的音樂思想，與《樂記》基本一致，可以彼此印證、相互闡發。

其次，《性自命出》“始者近情，終者近義”一語，可以看作是子思學派禮學思想的高度概括；而《詩序》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兩者的思路如出一轍，證明兩者的年代相

① 參見余瑾《先秦儒家樂教思想研究——兼論〈禮記·樂記〉的成書年代》，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近。由於郭店1號楚墓的年代為戰國中期偏早，故《樂記》不可能是西漢的作品。

第三，《性自命出》的音樂思想，是心性之學的組成部分，與禮學思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可見《樂記》不可能是獨立於心性學說之外的學派或學者作品，而祇能是子思學派的作品。

《樂記》的作者問題，由於事關重大，筆者不敢遽然斷言，僅僅提出一孔之見，以供學術界討論，進一步的結論，尚有待今後更深入的研究。

《太一生水》補疏

◎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

李 銳

內容提要 本文根據傳世文獻《文子》和出土的馬王堆帛書中的有關內容，疏証郭店簡《太一生水》中的有關文字，清理其文脉，認為原整理者所提出的編連順序比較合適。本文還討論了簡文中的個別字詞，對簡文的釋讀提出了新的意見。

關鍵詞 郭店簡 太一生水 馬王堆帛書 文子

在郭店楚墓竹簡中，《太一生水》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章，發表後引起了學界的極大興趣，研究成果已經很多。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些難以確定之處，不少學者遂提出了新的編聯方案。下面在學界研究的基礎上，對篇中部分文字的理解提出一些個人淺見，不當之處，尚請大方之家指正。

《太一生水》初步校訂後的文字如下：

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¹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²復【相】輔也，是以成寒熱。寒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³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⁴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⁵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為】⁶萬物母。一缺一盈，

以己爲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不能厘^①，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

8

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貴於……9

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以10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托其11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并立，故恚其方，不思相尚。【天不足】12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13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14

強昱先生已經指出馬王堆帛書《十大經·姓爭》篇中有一段文字與之相關：“夫天地之道，寒涅（熱）燥濕，不能并立；剛柔陰陽，固不兩行。兩相養，時相成。居則有法，動作循名，其事若易成。”^②

這兩處文獻，確實有很緊密的關聯性，《太一生水》講的正是天地、寒熱燥濕、陰陽的“兩相養”，以及託名從事。但是強昱先生認為：“不同者是，《太一生水》講‘天地名字并立’，而《黃帝四經》稱天地之道‘不能并立’。”其實，陳偉先生已經指出“不思相尚”的“相尚”，應該與《孟子·公孫丑下》的“莫能相尚”有關，“相尚”意爲相互超出。^③“思”之意爲“使”。^④因此《太一生水》與《十大經·姓爭》講的是一回事，後者反說“不能并立”，前者先正說已經并立，但隨即指出“不思相尚”，也就是不使對立鬥爭。

所以，此處“恚”字當讀爲變化之“化”，是說天地之道本不能并立兩行，故需要變化其方，使不相互對立或者平行重複，而是相輔相成。由此來看，下文接簡13、14描述天地不思相尚是合適的，可以補爲“【天不足】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遠而曠。不足於上】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⑤此段話的意思是說天不足之處（《淮南子·天文》“天柱折……天傾西北”），地反而有餘（西北地高）；而地不足之處（《淮南子·天文》“地不滿東南”），天反而有餘（“天傾西北”，故“東南”天高），正是“化其方”。

以上所說的主要是相反之物的“不思相尚”，這和开篇的“兩相養”是相關相近的。

① 此處劉釗先生曾參照《荀子·儒效》的“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將“厘”字讀爲“埋”（見氏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84頁），爲學界信從。但是龐光華先生在論證上古漢語無復輔音這一問題時，對此提出了疑問，指出根據古文字資料，西漢以前沒有確定的“埋”字，疑今本《荀子》“埋”乃誤字（見氏著《論漢語上古音無復輔音聲母》，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237—238頁，361—362頁）。此一問題牽涉頗廣，恐怕還有待更多的材料來說明，今且將此處讀爲“厘”。

② 強昱：《〈太一生水〉與古代的太一觀》，《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363頁。

③ 陳偉：《〈太一生水〉考釋》，楚文化研究會編：《古文字與古文獻》試刊號，1999，71—72頁。

④ 陳斯鵬：《論周原甲骨和楚系簡帛中的“肉”與“思”——兼論卜辭命辭的性質》，《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402頁。

⑤ “遠而曠”參考了丁四新說，見氏著：《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2000，124頁注釋36。

《十大經·姓爭》簡單的幾句話，包括了《太一生水》前後文中的許多內容。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太一生水》的思想脈絡應該是一貫的，某些學者提出的將《太一生水》分為兩篇之說^①，恐不可從。

“不思相尚”，“兩相養”，這樣的規律和太一有關。《太一生水》簡文中說太一的生化“成歲而止”，本來未涉及萬物，可是接下來又說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爲】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爲萬物經”，太一與萬物有何關係呢？

《文子·上德》篇有一段話可資參看。篇中說：“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這兩處文字，分別在陳鼓應先生所說“道家易學”的“泰、否二卦”和“離卦”之後^②，與易卦的內容似乎并不直接相關，其文本的形成還有待考察。

首先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對比上引《經法·姓爭》篇的“兩相養，時相成”，有利於我們明白《太一生水》開篇部分的宇宙論：太一之生化，生水之後而生天地，此後是天地及其所生者兩兩相輔，這就是“兩相養”；太一之生化，成歲而止，其下略而不言，是因為“時”爲天道地道之“使”，天地順時生成萬物；萬物的生成離不開天地，但天地爲“太一之所生”，而且天地生成萬物需要“一爲之和，時爲之使”（太一“行於時”），所以太一是“萬物母”、“萬物經”。

至於《文子·上德》篇所用的“命之曰道”，“命”、“名”古通^③，《文子·上德》此段很顯然是在解釋“天道”、“地道”之稱“道”的原因，此處的“之”，不可能是指代《文子·上德》中的“（太）一”或“時”，而是指“天道”、“地道”之“道”。若然，《太一生水》中說“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青昏其名。”這裏的“道亦其字也”，指代的可以同《文子·上德》相似，就是天、地，許多學者已經指出了這一點。^④

裘錫圭先生主張將《太一生水》分篇，他認爲“在一章之內，先極力強調天地是物，接著馬上把‘天道’當作‘道’的同義詞來用，終覺得有些別扭。”^⑤其實從上引《文子·上德》尤其是“天道爲文，地道爲理……命之曰道”容易看出，天道、地道是一個道。“道”乃是使天地相反相輔以相成的一種力。天地遵循它，所以雖然名字並立，但會自然地“不思相尚”。從《太一生水》全文來看，太一、水與道的關係沒有論及，還有待進一步探討。

① 丁四新：《楚簡〈太一生水〉研究——兼對當前〈太一生水〉研究的總體批評》，載《楚地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 陳鼓應：《先秦道家易學發微》，載《道家文化研究》第12輯，三聯書店，1998。

③ 參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72頁。

④ 郭沂：《試談楚簡〈太一生水〉及其與簡本〈老子〉的關係》，《中國哲學史》1998年第4期。邢文：《論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不屬一系》，《中國哲學》第20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魏啓鵬：《楚簡〈太一生水〉箋注》，《楚簡〈老子〉箋釋》，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77頁。

⑤ 裘錫圭：《〈太一生水〉“名字”解釋——兼論〈太一生水〉的分章問題》，《古文字研究》第22輯，225頁。

《文子·上德》篇說“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太一生水》中也提到“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資於……”可以對應。強昱先生曾指出：“在‘天道貴弱’下，《太一生水》還應有對地道的論述，不知什么原因遺失了”。但是，論“地道”的文字也有可能“在天道”之前。比照前文“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來看，先說地後說天，這種敘述是很有可能的。

此外，疑簡文“青昏”可以讀為“清昏”，為偏義復詞，偏重於“昏”，意思其實是說不知其名（《呂氏春秋·下賢》：“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或無法命名。學者們都注意到了《老子》第25章所說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古代“名”、“字”雖然有區分，但是在“強為之”名、字的情況下，“名”、“字”之區分就不那麼重要了。所以《太一生水》是說天、地是一種稱謂，就算“道”明白地是其字，其名也不可知。同理，《文子·上德》的“命之曰道”，也祇是一種命名。可是“名”對於人類社會却是很重要的，“以道從事者”和“聖人”在從事的時候，都必須依靠這個“名”。

參考時賢的一些意見，筆者認為整理者原作的編連是可取的，今擬補《太一生水》的缺文於下：

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1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2復【相】輔也，是以成寒熱。寒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3而止。故歲者，濕燥之所生也。濕燥者，寒熱之所生也。寒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4者，陰陽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5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為】6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所7不能厘，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聖。①夫地道賤強②而】8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資於【弱，因時以成萬物】。9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清昏其名。以10道從事者，必托其名，故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托其11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并，并③故化其方，不思相尚。【天不足】12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遠而曠。不足於上】13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14。

① “聖”字從趙建偉說，見氏著《郭店楚墓竹簡〈太一生水〉疏證》，《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三聯書店，1999，387頁。

② “地道賤強”從廖名春說，見氏著《試論郭店簡〈太一生水〉篇的綴補》，《出土簡帛叢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98頁。

③ 原“并”字下有“=”符，一般釋為“并立”。2003年12月18日，在湖北荊門召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龐樸先生審閱拙稿《〈太一生水〉與〈文子·上德〉》後指出當讀為“天地名字并，并故化其方”。此說合韻，當從。

上博藏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的意義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姜廣輝

內容提要 上博藏楚竹書《周易》每卦的首簡和末簡都標有特殊符號，這些特殊符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引起了易學界的普遍關注。筆者認為，這些特殊符號的實際作用是在五千餘字的《周易》經文中畫出大約七個“卦區”，以方便識別和翻查。這個作用就像今人在辭書中貼A、B、C、D、E、F一類標籤一樣。因此這些符號並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為了翻檢方便加上去的。當然其符號的填加方式可能自有它的道理，即可能遵循了大體均分和照顧特殊等原則。

關鍵詞 楚竹書 《周易》 特殊符號

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總共有五十八支簡，與今本《周易》相比較，可知其涉及三十四卦，與今本內容大體一致。其新奇之點在於每卦的首簡和末簡都標有特殊的符號，這些符號一共有六種。整理者說：“楚竹書《周易》中出現一組失佚了二千年的易學符號……這是易學史上的大事，它的形式、內涵有著特殊的意義，這為我們認識、研究先秦易學又提出了一個新的重要課題。”

的確，這個課題是饒有趣味的。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特點及其據此分上、下經的原則，及各耦卦之間的編排順序，是《周易》的深層奧秘，我們可以以此為突破點去探討《周易》一書的起源問題。關於此點，我曾在《政治的統一與經學的統一——孔穎達與五經正義》^①一文的最後一節“《周易正義》的經學思想”中有所論及。我一直關注新的出土文獻資料，看看有無可能對此問題的研究有所推進。

^① 載於《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二十四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周易》面世之後，我注意到了整理者對於楚竹書《周易》分別畫於每卦首簡和末簡的特殊符號意義的研究，整理者正是將它與今本《周易》“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特點來聯繫研究的，並希望由此破解原始《周易》的一些奧秘。對此，我非常佩服。

但我經過反復的研究和思考，以為首先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是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的特點形成更早呢，還是楚竹書《周易》畫於每卦首簡和末簡的特殊符號出現更早？或兩者同時形成的？我研究的結果認為，今本《周易》卦序中“二二相耦，非覆即變”特點的形成可能更早，而楚竹書《周易》畫於每卦首簡和末簡的特殊符號與它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整理者將它們過多地聯繫到一起，可能把這些特殊符號的意義複雜化了。

那麼，楚竹書《周易》中特殊符號究竟透顯了一種什麼意義呢？這裏想談一點我的看法，我想先說出結論，然後再加以說明。

《易經》原是卜筮之書，上博藏楚竹書《周易》正好反映了這一點。這部書不是作為“文獻”書寫形式抄寫的，而是作為“筮人占卜用書”抄寫的。我們首先看到，楚竹書《周易》每支竹簡可抄四十餘字，而每一卦因其字數多寡不同，或兩簡，或三簡，皆單獨抄寫，而不連抄。如井卦的末簡整支簡祇在簡端寫有一字，下面寧可全空著而不連抄下一簡的內容。同時，我們又看到，在每卦的首簡和末簡都標有特殊的符號，這些特殊符號其實際的作用是在五千餘字的《周易》經文中畫出大約七個“卦區”，以方便識別和翻查。按傳統說法，《周易》筮法是通過過揲四十九根蓍草來進行的，三變成一爻，六爻成一卦，卦成後就要翻檢《易經》，讀解該卦的卦爻辭。雖然筮人大多對《周易》卦序很熟悉，可以將六十四卦卦名依次記誦下來，但要迅速找到某一卦還是要費一點功夫。而用一些符號劃分“卦區”，就很方便翻檢。這個作用就像今人在辭書中貼A、B、C、D一類標籤一樣。因此這些符號並不是《周易》原有的，而是筮者為了翻檢方便加上去的，當然其符號的填加方式可能自有它的道理，即可能遵循了大體均分和照顧特殊等原則。

下面我將這個觀點加以詳細說明：

《晉書·束皙傳》記載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也言及此事，說汲冢“《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魏襄王卒於公元前296年，魏安釐王卒於公元前243年。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至少在公元前243年之前，與今本《易經》相近的《周易》已經存在。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周史為敬仲占卜之事記於《史

記十二諸侯年表》中，當陳厲公二年，即公元前 705 年；而“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之語是《周易·觀卦》六四的爻辭，這也說明作為占卜用書的《周易》在相當早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因此，對於上博藏楚竹書《周易》與今本《周易》經文內容大體一致這件事，我們不會覺得很驚訝。

我們可以先對今本《易經》的分章和字數情況作一基本瞭解。今本《周易》上經三十卦，約 2252 字；下經三十四卦，約 2764 字，上下經合計約 5016 字（卦畫作一字算；爻題作兩字），字數最短的卦是兌卦，只有 43 字，字數最長的卦是困卦，有 108 字，六十四卦平均每卦字數約為 78 字。

上博藏楚竹書《周易》因其各卦不是連抄的，我們當然不能確定其卦序如何，但因為有我上面所講的《晉書·束皙傳》等文獻資料作根據，我們最明智的選擇，首先不是設想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的卦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完全不同的，而相反，首先設想兩者可能是基本相同的，並以此作為一種“理論模型”來嘗試分析它，看看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假定楚竹書《周易》曾有一全本，其字數與今本《易經》字數基本相同，而其每簡抄寫字數亦如上博藏楚竹書《周易》每簡約 42 字。這樣，一般每卦要抄兩支簡，而一卦字數若超過 84 字，即須抄寫三支簡，如楚竹書《周易·井卦》首簡為 42 字，次簡為 42 字，末簡 1 字，共 85 字。而今本《易經》六十四卦中超過 84 字的卦，上經有 5 卦，下經有 13 卦，共 18 卦，因此我們所假定的楚竹書《周易》上經簡數約為 65 支，下經簡數約為 81 支，全書總簡數約為 146 支簡。

楚竹書《周易》中的六種符號，其形狀我們不好在本文中用文字一一描述，其實，從分析問題的角度而言，什麼形狀並不重要，這裏我們可以用 A、B、C、D、E、F 代之，其中符號 F 有兩個，一在《大畜》卦末簡，一在《咸》卦首簡，因為《咸》卦是今本《周易》下經首卦，整理者推想符號 F 可能是分篇號，而上經末卦可能不是《離》卦，而是《大畜》卦。這個推論我不反對，按照楚竹書《周易》所標的符號分類，楚竹書《周易》的卦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是大致相同的，但不排除局部卦序有所變化和不同。

我們假定楚竹書《周易》是全本，並且其卦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有一致性，而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祇是它的一部分，即殘本。我們從其殘存內容中看到，每卦的首簡和末簡都有特殊的符號，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楚竹書《周易》原始本的全部六十四卦的首簡和末簡都有特殊的符號，如果我們參照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的分布規律，將楚竹書《周易》原始本六十四卦所有特殊符號全部恢復出來，那可能的與合理的情況是這樣的：

上經分三段：

第一段《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12卦29支簡，各卦首簡和末簡皆用符號A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A者，為什麼上博藏楚竹書《周易》只有《需》、《訟》、《師》、《比》四卦標有符號A，而我要認為此前後8卦都可能標有符號A？這是因為我參照了下面第二段的長度，並且符號A為全紅方塊，符號B為全黑方塊，這是兩個可以相比較的基本形符號。

第二段：《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無妄》、《大畜》14卦28支簡，各卦首簡和末簡皆用符號B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B者。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由《大有》卦起至《大畜》卦，其中有七卦標有符號B，推論中間脫佚了的《臨》、《觀》、《噬嗑》、《賁》、《剝》、《復》各卦也標有符號B。因《同人》與《大有》相耦，故推斷《同人》卦也應標有符號B。

前兩段相比較，卦數相當，可能的簡數也相近。

第三段《頤》、《大過》、《坎》、《離》4卦8簡，各卦首簡用符號D、末簡用符號B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且首簡標有符號D、末簡標有符號B者。這裏要特別解釋的是，第三段祇有此四卦而要特別加以標明，或許因為此四卦與《乾》、《坤》兩卦一樣，是兩對對變卦，因為楚竹書《周易》中已不見《乾》、《坤》二卦，因此也不排除此六卦同用一種符號分類。而在此段中，祇有《頤》卦有此特殊的標法，而推論其他幾卦也作此標法，證據頗嫌不足。

下經分四段：

第一段《咸》、《恒》、《遁》、《大壯》、《晉》、《明夷》、《家人》、《睽》8卦18支簡，各卦首簡和末簡皆用符號C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C者。此段自《咸》起至《睽》共8卦，首尾皆具，其中有四卦標有符號C，推論中間脫佚了的四卦也標有符號C。證據充分，推論也合理。

第二段：《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10卦26支簡，各卦首簡和末簡皆用符號D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D者。此段自《蹇》起至《井》共10卦，首尾皆具，其中有五卦標有符號D，推論中間脫佚了的5卦也標有符號D。證據充分，推論也很合理。

第三段《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8卦20簡，各卦首簡和末簡皆用符號C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 C 者。此段自《革》起至《旅》共 8 卦，首尾皆具，其中有四卦標有符號 C，推論中間脫佚了的四卦也標有符號 C，證據充分，推論也很合理。

（以上三段可以作為研究上博藏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意義的標準段落，實際上是索解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意義的鎖匙，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弄清這三段的原始形態，就可以用同類的方法推論出楚竹書《周易》全本特殊符號的本來分布形態，然後對此形態所標示的意義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斷。）

第四段《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8 卦 17 支簡，各卦首簡和末簡基本用符號 E 標明。

說明：黑體字是楚竹書《周易》存簡并標有符號 E 者。其中存簡《小過》卦以符號 C 標明，而非以符號 E 標明，其原因亦因為《中孚》卦與《小過》卦是一對對變卦，因此於其中有所區別。此段中祇有《渙》和《既濟》兩卦用符號 E 標明，而我推論此段中另有脫佚了的 4 卦也用符號 E 標明，證據稍嫌不足。

以上是對楚竹書《周易》原始全本所有特殊符號所作的一種嘗試性的恢復工作，這種恢復工作在有些段落上證據不夠充分，但因為有下經前三段的“標準段”，可以作為一種“例”，我們可以援此“例”推論那些證據不夠充分的段落，就可以彌補其不足之處。

通上所論，我們假定楚竹書《周易》與今本《周易》在分篇上及卦序等基本情況上是大致相同的，認為楚竹書《周易》的六種符號中，其中一種符號作為分篇號之用，另有五種符號，將上經三十章分為三個段落，將下經三十四章分為四個段落。因此六十四卦可能被分成了七個“卦區”，即第一卦《乾》至第十二卦《否》，以符號 A 標明；第十三卦《同人》至第二十六卦《大畜》以符號 B 標明；第二十七卦《頤》、第二十八卦《大過》、第二十九卦《坎》、第三十卦《離》可能因為是對變卦的原因，單獨組成一段，首簡用符號 D、末簡用符號 B 標明。又因《大畜》卦可能是下經的末卦，因此這三段的前後排列可能還存在問題。從第三十一卦《咸》至第三十八卦《睽》以符號 C 標明；第三十九卦《蹇》至第四十八卦《井》以符號 D 標明；第四十九卦《革》至第五十六卦《旅》再以符號 C 標明；第五十七卦《巽》至第六十四卦《未濟》以符號 E 標明，其中的《中孚》、《小過》為對變卦，另以符號 C 加以區別。

以上研究，不完全是用傳統的純實證的方法，而是嘗試引用一種“理論模型”的方式來分析它，首先是根據下經前三段“標準段”特殊符號的分布狀況，並根據歷史文獻所記戰國時期《周易》與今本《周易》大體一致的情況，認為楚竹書《周易》的卦序與今本《周

易》的卦序是大致相同的，并由此恢復出楚竹書《周易》全本中六十四卦所有特殊符號的可能分布狀況。

我認為，楚竹書《周易》用五種特殊符號將六十四卦分成了七個“卦區”，其目的很簡單，主要是爲了方便筮人從六十四卦中迅速翻檢到某一卦，可能並沒有其他的意義。因此也就不必將這些特殊符號看作原始《周易》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中的經典詮釋傳統

——《關雎》的詮釋及有關方法論問題

◎ 美國三立大學

邢文

內容提要 本文以對《關雎》的解讀為例，論述了出土文獻對於重新認識經典詮釋傳統的意義。指出漢初以來的解《詩》傳統與由簡帛文獻揭示出的先秦解《詩》傳統存在差異，並進而探討了與此有關的方法論問題。

關鍵詞 關雎 經典詮釋 方法論 出土文獻

從新近出土的戰國楚文獻的角度來看，傳世文獻中有關《關雎》的詮釋傳統，在某種意義上誤導了我們兩千多年。這一簡帛材料雖係地方性文獻，但為我們提供了先秦時期《詩經》詮釋的原著，使我們有可能重新認識傳世文獻中的經典詮釋傳統。

有關《詩經》的考古文獻，近年已有多處出土。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的《詩經》竹簡，包括了詩三百中的六十九首詩歌。其中，《國風》六十五首，《小雅》四首。^①學者們認為，阜陽詩屬於三家詩及毛詩之外的另一種《詩經》傳派。^②此外，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郭店楚簡《五行》，以及郭店楚簡《緇衣》與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緇衣》中，都有一些引《詩》的材料，其異文及學術意義已有學者關注。^③此外，1974年在河北平山出土

① 安徽省文物工作隊、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縣文化局：《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8期，12—31頁。

②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8—31頁。

③ 柯馬丁(Martin Kern)：《出土文獻與文化記憶：詩經早期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第25輯，2004。

的“平山三器”，銘文也多引《詩》的材料，有重要的意義。^①

就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研究而言，出土文獻中解《詩》的內容，是至為珍貴的材料。馬王堆帛書《五行》的傳文中，見有說《詩》的文字。王安國已在《哈佛亞洲學誌》撰文，論其解經的意義。^②顯然，這一材料反映的僅僅是漢初的解經傳統。上海博物館近年購藏的戰國楚簡《詩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先秦論《詩》的原始材料。

本文旨在探討出土文獻對於重新認識中國經典的詮釋傳統的意義。通過討論楚簡《詩論》關於《關雎》的釋義，我們將認識到先秦的解《詩》傳統與漢初解《詩》傳統的不同，重新考察《關雎》的本義，進而討論有關方法論問題。

一、詮釋傳統：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

《關雎》一詩向有兩種不同的讀法：毛公分三章讀，鄭玄分五章讀。^③今人多從鄭讀，而忽略了毛公的分章。這兩種讀法是有區別的。試看毛公的分章：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芣之。

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較之鄭玄的五章讀法（每四句一章），毛公的三章讀法敘事的情節性更強、更連貫。那麼，鄭玄為何要打破毛公的這種敘事的連貫性呢？這當與《關雎》一詩的解釋傳統有關。

① 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裘錫圭、李家浩整理《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91—108頁。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175—205頁。

② Jeffrey Riegel, *Eros, Introversi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Shijing Commentary*, HJAS 57.1 (1997), pp. 143—177.

③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6頁中。

《關雎》為《風》之始。在傳世文獻的傳統中，三家詩與毛詩都論及《關雎》。魯詩之例見《後漢書·楊賜傳》。賜曰：“康王一朝宴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曰“事見魯詩”^①。這是說《關雎》詩旨在刺康王不早朝。韓詩與此相似。薛君《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②認為《關雎》是刺人君內傾於色的刺詩。

齊詩與魯、韓不同。《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③《履》之《頤》：“雎鳩淑女，聖賢配偶。宜家受福，吉善長久。”^④顯然認為《關雎》是在美淑女之德。匡衡以《關雎》“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⑤認為《關雎》與后夫人之德與王道、教化有密切的關係。

在毛詩中，《關雎》所美被明確為后妃之德，所謂“后妃有關雎之德”，“后妃說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⑥，指出后妃之德對國家政治的影響。

三家詩與毛詩的說法雖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各家均重視夫人之德。魯詩說之以康王夫人，毛詩說之以文王夫人，其實在《關雎》中全無憑據。^⑦毛公分《關雎》為三章，故事情節連貫，詩中全無后妃之德的線索，更沒有王化之教的痕迹。倘若打碎敘事的連貫性，按每四句分為一章，也許可以分解故事的結構，淡化故事的具象，忽略文獻的內證，增加想像與解釋的空間，這或許就是鄭玄為了延續毛詩的解經傳統而就分章問題作出技術調整的原因。如此，傳統的解釋仍可以《關雎》為喻言詩而成立。^⑧

如果事實確實如此的話，那麼可以認為鄭玄是非常成功的。後世學者每對早期《詩經》

①《後漢書·楊賜傳》附《楊賜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776—1777頁。袁宏《後漢紀》亦記楊賜語：“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宴起，夫人不鳴璫，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②《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中華書局標點本，112頁。

③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中國書店，1990，9頁上。

④同上，12頁下。

⑤《漢書·匡衡傳》，中華書局標點本，3342頁。

⑥《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5頁中。

⑦孫康宜先生在與作者交談時敏銳地指出這關係到文獻內證與文獻詮釋背景關係的問題。

⑧余寶琳（Pauline Yu）先生在 *Allegory, Allegoresis, and the Classic of Poetry* [HJAS 43.2 (1983), pp. 377—412] 一文中，從東西方之學的不同角度對此作了很好的分析，她的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以及 Haun Saussy 的 *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對此及相關問題有更為精到的闡述。

詮釋傳統的商榷攻錯，實難擺脫毛詩的影響。姚際恒《詩經通論》雖指出詮釋《關雎》“不必實指出太姒、文王”，但他仍認為此詩“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可以“正邦國，風天下”。^①至於現代學者把《關雎》說為言情詩、賀婚詩、迎婚詩、求賢詩、婚姻教育詩等等，表面上雖未從毛詩或三家詩之說，頗有作別傳統詮釋之意，但實際上仍在傳統詮釋的窠臼之內：重引申推論，輕詩文本義；雖未坐實文王、世子，但仍在婚嫁的思路之上，與毛詩等說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別。^②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詮釋是否有見於詩文的內證或其他先秦文獻的依據，簡帛文獻的出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遇。

馬王堆帛書《五行》的傳文中，有一段關於“進”的意義的闡說^③。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寐思伏”，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其甚口口口。如此其甚也，交諸父母之側，為諸？則有死弗為之矣。交諸兄弟之側，亦弗為也。口口邦人之側，亦弗為也。口口父兄，其殺畏人，禮也。由色喻於禮，進耳。

在上引段落中，《關雎》的詩句被徵引，用以說明“由色喻於禮”的道理，因為“由色喻於禮”就是“進”。很明顯，這正是對《關雎》一詩的詮釋。如果對於《關雎》的這種詮釋被引以說明或界定其他概念或範疇，那麼，這一詮釋至少在相當的範圍內是人所習知的。祇有引用已為人所熟知或所接受的說法，引用才有意義。

《關雎》的以色喻於禮之說，是有明確的證據的。

上海博物館新近購藏的戰國楚簡《詩論》即有“《關雎》以色喻於禮”之說。李學勤先生的《詩論》釋文，係以《關雎》開篇。^④

《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知，《鵲巢》之歸，《甘棠》之保（報），《綠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終）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於禮十。

開篇七問，首問“《關雎》之改”曷？答曰：“《關雎》以色喻於禮”明確道出《關雎》本義。

重讀《關雎》可見，《關雎》一詩，通篇未及“改”字。而在《詩論》中，《關雎》之

① 參見陳戌國《詩經新議》，嶽麓書社，1997，100—101頁。

② 這就是經典詮釋傳統中讀者為經典戴上面具、揭開面具、再戴上面具的過程。見孫康宜《文學經典的挑戰》，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12頁。

③ 釋文從通行字。參見魏啟鵬《簡帛〈五行〉箋釋》，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0，126—128頁。

④ 李學勤：《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2期，2002，1頁。

“改”與《樛木》之“時”、《漢廣》之“知”、《鵲巢》之“歸”等一樣，是全詩的中心。當孔子在《詩論》中問及《關雎》之“改”時，他並未對“改”作任何解釋，盡管“改”字根本沒在《關雎》一詩中出現。這種提問的方式只能說明，在孔子提問時，《關雎》之“改”的“改”義，是已經為人們所瞭解的。否則，他應該對這一在詩中根本沒有出現的字，作出一定的解釋。可見，在楚簡《詩論》的時代，“改”作為《關雎》的要義，在孔子的心中，是沒有疑義的。

在楚簡《詩論》的第十號簡上，雖然“豐”（禮）字的末筆隨竹簡而毀折，但“《關雎》以色喻於禮”數字仍然歷歷可辨。不言而喻，這裏的“以色喻於禮”與馬王堆帛書《五行》傳文的“由色喻於禮”是完全一致的。根據郭店一號楚墓及其楚簡的材料，以及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簡的材料，可以大致認為楚簡《詩論》的時代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而馬王堆帛書《五行》的下葬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如果《關雎》“以色喻於禮”的說法，在兩百余年間有如此直接或近乎直接的文獻傳流，那麼，我們關於此說至少在一定範圍內為時人所習知的意見，顯然是有直接文獻材料支持的。

從出土文獻記載的這一線索重讀《關雎》，本文認為，《關雎》一詩僅僅記載了一位“君子”對一位“窈窕淑女”的慕戀與追求。詩中的追求，始於君子對於美色的渴慕，終於君子向禮樂的成功皈依——“琴瑟友之”、“鍾鼓樂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改”，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以色喻於禮”。這也是《論語》所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本義。沒有這種由“色”而“禮”的悟變，君子的琴瑟鍾鼓，當本之於色而終之於色；君子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終將傷其身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關雎》之“改”的結果。

如果以上的討論能夠成立，可以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傳世文獻關於《關雎》的詮釋傳統，誤導了我們兩千余年。不幸的是，這種誤導在簡帛材料面世之後仍在延續。對於《關雎》之“改”字的釋讀即是一例。

二、《關雎》之“改”

上博楚簡《詩論》中對《關雎》之“改”字的釋讀頗為不同。

楚簡整理者認為：“改”與“改”不是一字；讀“改”在簡文中無義可應，此字當為從已聲的假借字，讀為“怡”。^①

最早對此提出商榷的是曹峰的《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的有關問題》，認為“改”當讀為“己”，從“止”之義。^②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9頁。

② 曹峰：《試析上博楚簡〈孔子詩論〉中的有關問題》，簡帛研究網（www.BambooSilk.org）。

最早指出此字即是“改”字的是李學勤先生。李先生在清華簡帛研討班上明確指出《關雎》之改，義無可疑，並對《詩論》重新編聯、分章，以《關雎》之改簡為全篇之首，意味深長。^①

然而，學者們似多認同整理者《關雎》之改在簡文中無義可應，但又不接受整理者釋改為怡之說，於是先後有釋為嬰、妃、喬諸說。^②後姜廣輝先生棄妃配之說，讀改為改，由古代思想切入古文字，所論更近文字本義。^③

許多學者之所以尚未接受《關雎》之改，或有兩個原因：一為“改”字本義不傳已久，簡文從已作“改”，難見其義；二為《關雎》之義曲解已甚，簡文“《關雎》之改”，與成說不合。

“改”字從已，並無可疑。

如學者指出，郭店楚簡《緇衣》、《尊德義》所見之“改”，皆從攴從已，已為終已之義。^④此類從已終已之義的字例，並不鮮見。如“祀”。《爾雅·釋天》：“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祀，“取四時一終”^⑤。歲，遂也；載，成也，成萬物之終始。^⑥年，也是禾谷長成、成熟之義。所以，它們都有陰陽氣終、一元復始之義：“十二月為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為一歲。”^⑦如果說，已僅為終已之義，那麼，已與已則無區別。然而，已有有終已之義的同時，又有復生之義。^⑧祀，“取四時一終，則以祀者嗣也，取其興來繼往之義”^⑨。也就是說，祀不僅有終已之義，也有始嗣之義。

又如“汜”。《召南·江有汜》：“江有汜。”鄭箋：“決復入為汜。”^⑩《說文》：“汜，水別復入水也。”^⑪就是說，江水從干流分出而為支流，後復歸於干流，曰汜。汜從已，也是取亦終亦始之義。

“已”的終始之義，與古代歷法及陰陽觀念有關。已配四月，《說文》：“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⑫已居十二支的第六支，陽生於子，終於已，是陽氣之極、陰氣將生之位，

① 見《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詩論〉分章釋文》，《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2期。廖名春、俞志慧先生等也讀改為改。按李先生《分章釋文》以《關雎》之改為全篇之首，涉及先秦詩學的一些重要問題，參見李學勤《〈詩論〉與〈詩〉》，邢文《風、雅、頌與先秦詩學》，《經學今詮三編》，《中國哲學》第24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121—34、197—207頁。

②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簡帛研究網站。姜廣輝：《初讀古〈詩序〉》，《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2期，3—10頁。饒宗頤：《竹〈詩序〉小箋》，簡帛研究網站。

③ 姜廣輝：《三讀古〈詩序〉》，《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2卷第4期，2002，1—11頁。

④ 同上，3—4頁。

⑤ 《爾雅·釋天》，《十三經注疏》本，2608頁上。

⑥ 班固：《白虎通德論·四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7頁。

⑦ 王充：《論衡·難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38頁上。

⑧ 毛氏《韻補》稱之：“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

⑨ 邢昺：《爾雅》疏，《十三經注疏》本，2608頁上。

⑩ 《詩·召南·江有汜》，《十三經注疏》本，292頁中。

⑪ 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232頁上。

⑫ 許慎：《說文解字》，311頁上。

所以已有亦終亦始之義。改從巳，有舊往新來、終而復始之義，在楚簡中寫作“改”。

改字從巳，并有字形上的例子。

《詩論》為楚簡，故郭店楚簡《緇衣》第16、17簡，《尊德義》第1、4、5簡及《六德》第19簡的“改”字均從巳作“改”，即為其例。或因郭店簡中巳、己不分，故未引起爭議。

受楚文化影響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也見“改”字從“巳”之例。帛書《周易·井》：“改邑不改井。”改，從艸從匚從巳。^①《革》九四：“有孚改命，吉。”改，字形亦同，從巳。^②巳字此義，并存於《周易》。

《革》卦卦辭“巳日乃孚”中的巳字，是易學史上長期聚訟的疑難，兼有己、已、巳之說，莫衷一是。以巳之古義讀之，義即通解。

《周易·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無咎。”^③巳日，最為通行的說法是己日。

王弼注：“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也。”^④也就是說，老百姓都比較勢利，革命的當天是不信的，革命過去之後才信。宋程氏《易傳》、清《周易折中》等，均持此說。^⑤干寶注略有不同，認為己日是“天命已至之日也”^⑥，也即把己日坐實為武王伐紂之事。

比王弼己日之說更早的，是三國虞翻的己日之說。

革䷰，離下兌上。虞注：“離為日，孚謂坎，四動離體，五在坎中，故己日乃孚，以成既濟。”^⑦尚秉和指出，這是以離為己日：“離為日，貞己，故曰己日。己日謂二，二離主爻，承陽應五，故曰己日乃孚。”^⑧簡單說，也就是離為日，納己，己日為第二爻，二陰與五陽應，故孚而吉。

以象數說《易》，最能融通，但或去古稍遠。朱駿聲《周易彙通》則以歷法說己日，始近本義。朱氏以為：“己日，天有十日，第六干也。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則明年必己巳日卯初三刻奇冬至也。己日為太陽一歲周而復始之日，舉一年以概三百六十年也。天運有常，不愆於期，故孚。”^⑨所論精密。但關鍵之處，在於“己日為太陽一歲周而復始

① 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108頁。

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按，《馬王堆漢墓文物》所刊照片此字所在行殘。

③ 《周易》，《十三經注疏》本，60頁中、下。

④ 《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60頁中。

⑤ 程頤：《伊川易傳》，18頁上。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6頁下，皆係《四庫全書》本。此說并為《辭源》收為辭條，見“己日”，商務印書館，1988（修訂本），522.1頁。

⑥ 李鼎祚：《周易集解》，9頁上。

⑦ 同上，8頁上。

⑧ 尚秉和：《周易尚氏學》，中華書局，1980，224頁。

⑨ 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中華書局，1953，212頁。

之日”^①，義近我們所說的已。

由前述楚簡《詩論》、郭店楚簡及馬王堆帛書的材料可知，戰國至漢初的楚文字材料中所見改從已之義，實為“已日乃孚”之已的本義。其字雖存《周易》古經，其義不傳久矣，賴出土材料才得以鉤沉。

革，改也；已日，改革之日，即爻辭所謂：“已日乃革之。”既已改革，事實勝於雄辯，何不信之有？所以卦辭說：“已日乃孚。”《彖傳》說：“革而信之。”^②所謂革命當日不信，已日乃信之說，貌似合理，實則愚曲：如革命之初即有疑慮，這種疑慮為何不會與日俱增，反而會是已日乃孚呢？真理往往是朴素的，無須曲轉成說。已，改也，革也；已日，即除舊布新的改革、革命之日，所以，已日乃孚，已日乃革之。

朱駿聲其實瞭知已義。朱氏已日之說，實擬以精密科學之說與王弼已日之說相抗爭，故草草放過已日之說。朱駿聲說已字：“以陽氣至已而盡出，至午則陰生，故轉訓為既為止。”毫無問題；然而，續說已日時却回到了通行的王弼之說：“日在澤下，尚未出地，必如日之加已，照臨萬方，昭著天下，乃信從也。以喻革之初，人心疑懼，必王道大行始信也。乃者，難詞。此以已為辰巳之已。”^③

綜上可見，楚簡《詩論》《關雎》之改，改即改，從已，有亦終亦始之義，即革除其舊，改從其新，義無可疑。學者們對於改字的各種釋讀，多從妃配的角度著眼，係受傳世的《關雎》解經傳統的影響。這一現象要求我們進一步思考有關的方法論問題。

三、方法論問題的思考

對於傳世文獻所載經典詮釋傳統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如果面對共同的文獻，我們有著不同的見解，原因當在考察的角度有別。上舉《關雎》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如前所述，之所以有學者認為“改”不是“改”，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讀改在文中無義可應，而事實上讀改不僅符合文字的本形，而且與簡文之義如合符節。這裏所謂無義可應，實際上是指與傳世的經典解釋傳統無義可應。在《關雎》的例子中，很明顯，祇有走出傳世文獻的解經傳統，才有可能正確認識簡文的本義。這使我們認識到這樣一種方法論原則：當出土文獻的材料與傳世文獻的傳統相悖離時，在遵從傳統成說之前，必須對出土材料作獨立而客觀的研究。換言之，倘若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不合，對於出土文獻的認識，不當為傳世文獻的詮釋傳統所左右。否則，我們不僅會失去正誤的機會，而

① 朱駿聲：“已日，天有十日，第六干也。太陽一周天為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奇，即今年冬至距明年冬至之日數。所謂恒氣也，古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律元以起算。甲子至癸亥名目，古以紀旬，不以紀年。旬法六十日一周，一歲六周。故今年甲子日子正初刻初分冬至，則明年必已巳日卯初三刻奇冬至也。”同上，212頁。按標點係引者改加。

② 《周易·革·彖》，《十三經注疏》本，60頁下。

③ 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212—213頁。

且會製造出新的誤解，而這種新的誤解如果依托了出土文獻的背景，則會有更大的誤導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所說的對出土材料作獨立而客觀的研究，強調的是對出土文獻的重視，而絕非提倡一味地盲從出土文獻的表面文字。從上文可知，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及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的傳文，都明文記載了《關雎》“以色喻於禮”或“由色喻於禮”的要義；從這種詮釋出發，不難理解《關雎》之改的本義。然而，並非所有的竹簡文獻都是這樣可供即時取用的。前文引用《詩論》的材料，係從李學勤先生以《關雎》開篇的分章釋文之序。而在正式公布的釋文中，整理者所從的並非傳統的《風》、《雅》、《頌》之序，而是《頌》、《雅》、《風》之序。釋文作《頌》、《雅》、《風》之序，是有文獻的依據的。在《詩論》的第2號簡中，孔子論詩的順序是與傳世本不同的《頌》、《雅》之序。^①然而，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這種《頌》、《雅》之序祇是一種局部的表面現象。在《詩論》的第21簡，孔子論詩以《宛丘》（《風》）、《猗嗟》（《風》）、《鵲鳴》（《風》）、《文王》（《雅》）、《清廟》（《頌》）為序^②，與傳統的《風》、《雅》、《頌》之序完全一致。重新考察《詩論》的第2簡以及第3、4、5簡可知，第2簡所見的《頌》、《雅》之序，很可能祇是《雅》、《頌》之序往復論述的殘存文字而已。^③如果我們簡單地取用某一枚竹簡的表面文字，忽視與前後文進行綜合考察，那麼，載有真理的出土文獻也同樣會誤導我們，但原因却完全在於我們自己。

作為中國古代文獻的原件，出土文獻的意義與價值是不言自明的。在考察出土文獻所代表的經典詮釋傳統時，不應當忽視出土文獻的地方特徵。黃俊傑先生強調經典詮釋有其獨有的“歷史性”，這種歷史性包括了詮釋者的時代背景、思想氛圍、個人經驗，以及經典詮釋的“特定時空”。^④這種地方學術的空間特徵，與中國古代經典詮釋主流傳統之間的關係，是我們認識出土文獻解經傳統的一個重要方面。《關雎》“以色喻於禮”之說不見於三家詩與毛詩，却同時見於同出於楚地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與馬王堆漢墓帛書的材料，這是否反映了楚地詩學的傳統呢？楚地的詩學傳世文獻未有詳記。昔楚元王劉交與申公等俱從浮丘伯受《詩》，申公為《詩傳》，號《魯詩》。楚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當傳其學。元王作有《詩傳》，號為《元王詩》，曾傳於世。^⑤以目前的材料，稱說楚詩的傳統，尚為時過早，但地域學術的特徵，在考察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經典詮釋傳統時，無疑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因素。

①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127頁。

② 同上，33頁。

③ 《風、雅、頌與先秦詩學》，199—202頁。

④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64頁。

⑤ 《漢書·楚元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21—1922頁。

《上博竹書（四）》閒話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孟蓬生

內容提要 本文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以下字詞進行了考釋，認為：“戡（剗）”當讀為“豈”（疑問副詞）；“溝”當讀為“瀨”（淺水）；“滄”當讀為“汙（汙）”；“格（格）”當讀為“落”，義為“落成典禮”；“寯人”當讀為“寺人”（宮中供使喚的小臣）；“訖”當讀為“詔”（告訴或教導）；“埽”當讀為“禪”（除服之祭），“墓”當讀為“墓”；“古須”當讀為“姑須”（姑且等待）；“安”用同“焉”（相當於“乃”）；“襦”當讀為“裯”（近身衣）；“參”當讀為為“與（予）”（給予），“衽衽”當讀為“衽衽”（指寬大的衣服）；“息君”當讀為“霸君”（指吳王闔廬）；“由”字當隸定為“凶”，讀為“使”；“泊”當讀為“醕”（祭名）；“滄”讀為“創”（創傷），“縹”當讀“帶”（腰帶）；“駐”當為“駟”（傳）；“迺”當讀為“適”（前往）；“塹”當讀為“謙”；“詒”即“訊”字；“勿”義為“無”；“琫”當讀為“躡”（履）。

關鍵詞 楚簡 竹書 文字 訓詁 考釋

甲申歲杪，以友人沈培兄之助，得先睹新出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①，展卷瀏覽，墨香四溢。因通讀數過，於疑難之處，隨手札錄，得若干則。今不揣譾陋，整理成篇，以質諸同好焉。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以下凡引此書均不再加注，祇標明頁碼。

戠 剗

上博簡（四）《逸詩·交交鳴鵲》簡 1：“戠紋是好。”（174 頁）又簡 3：“戠紋是好，佳（唯）心是萬。”又簡 4：“戠紋是好，佳（唯）心是萬。”（177 頁）馬承源先生云：“戠紋讀為‘愷豫’。‘紋’从女得聲，‘女’‘豫’疊韻通假。……《宋書·樂志四·朱路篇》：‘人心惟愷豫。’愷豫，亦和樂之意。”（175 頁）

又上博簡（四）《內豐》簡 8：“剗必又（有）益，君子曰（以）成其孝道。”（226 頁）李朝遠先生注：“‘剗’即‘剗’。《詩》‘愷悌君子’之‘愷’，本冊《逸詩》作‘戠’。‘剗’有規勸之義。《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注：‘道，讀為導。導者，言古以剗今也。’”（227 頁）

今按：“戠”和“剗”皆當讀為“豈”，反詰副詞。“戠紋是好，佳（唯）心是萬”一句話中，“好”和“萬”均用作動詞，“紋”、“心”分別是“好”和“萬”的賓語。簡 4 語意當為，難道是喜好紋嗎，祇是勉勵心志而已。“剗必又（有）益，君子曰（以）成其孝道。”意為“（父母有病時，兒子舉行各種祭祀祈禱活動）難道一定對事情有所補益嗎，君子是借此來成全他的孝道呀。”

從構形來看，戠當即譏之省文。《說文·豈部》：“譏，𡗗也。訖事之樂也。從豈，幾聲。”楚簡中“幾”字作“𡗗”，^①左上部之“𡗗”與“豈”（小篆作“𡗗”）字的上部“𡗗”相近。本書《內豐》簡 8：“剗必又（有）益，君子曰（以）成其孝道。”（226 頁）李朝遠先生以為“‘剗’即‘剗’”（227 頁），其說可從。由此可見，楚簡的“豈”確實可從“𡗗”作“豈”。這樣，𡗗就可以看作豈和幾的共用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借筆，“戠”的結構就可以分析為：从豈，从幾省聲。豈和幾古音相同或十分相近，所以戠（譏）實際上是雙聲字。《說文》對該字字義的說解未必可信，但其字形確實淵源有自。

瀟（瀨）

上博簡（四）《逸詩·交交鳴鵲》簡 3：“交交鳴鵲，集於中瀟。”馬承源先生注云：“瀟，《說文》所無，吾丘衍《周秦刻石釋音·石鼓文五》‘君子鴻之瀟瀟’。‘瀟’讀為‘漫’。《楚地釋名·春秋分紀》：楠木之下（莊四年），‘郡國志云：武陵山亦曰楠木山，傳謂楚武王卒於楠木之下，即此今郢州。’”（176—177 頁）

今按：按《石鼓》原文，“瀟瀟有鯨”連讀，前人皆讀為“漫”，並無實據，亦聊備一

^① 《老子》甲本簡 25，見《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5 頁。

說而已。細繹詩意，“溝”字與第一簡之“沔”及第2簡之“渚”字一樣，均與水相關，而且皆係泛指，似與楠木山無關。“萬”古音可讀入月部，“勦邁”等字从萬聲而讀入月部可證。萬聲與賴聲相通。《史記·范雎傳》“漆身為厲。”司馬貞《索隱》云：“厲音賴。言以漆塗身而生瘡為病癩。”“《漢書·地理志》：‘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注：‘厲讀曰賴。’以音求之，此簡‘溝’字當讀為‘瀨’，義為淺水。《說文·水部》：‘瀨，水流沙上也。从水，賴聲。’《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

此文初稿既成，秦樺林先生發表《楚簡佚詩〈交交鳴鵲〉札記》一文，不以余說為然，而承《經義述聞》之說，訓“溝”為“水涯”。^①其實《衛風·有狐》的“厲”亦當以“淺水”為解。古人行文之法往往互相照應，其法有反復，如《魏風·伐檀》之“河之干”、“河之側”、“河之滸”是也；亦有遞進，如《王風·采葛》之“三月”、“三秋”、“三歲”是也。清人胡承珙《毛詩後箋》讀“厲”為“瀨”，他說：“是瀨為水流砂石間，當在由深而淺之處。上章言石絕水曰梁，為水深之所，次章言厲，為水淺之所，三章言側，則在岸矣，立言次序如此。”^②

死湑之澹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簡1：“邵（昭）王為室於死湑之澹。”陳佩芬先生注：“即‘澹’或‘澹’，《集韻》：‘池水名。’池水不能為室，疑假作‘附’。《說文·阜部》：‘附，附婁，小土山也。’《小爾雅·廣詁》：‘附，近也。’意為在死湑之地築室。”（186頁）

今按：注以“澹”為近水之地，其說可取。但“澹”聲與付聲無論聲紐還是韻部，都有一定距離，讀“附”實不可取。“澹”字當讀為“汧（澹）”。《說文·水部》：“汧，水厓也。从水，午聲。”徐鉉等按：“今作澹，非是。”“澹”聲與午聲古均為曉紐魚部字，故可相通。《爾雅·釋丘》：“岸上，澹。”郭璞注：“岸上地。”又《釋水》：“澹，水厓。”郭璞注：“水邊地。”《集韻·姥韻》：“汧，水厓也。或作澹、澹。”

裕（裕）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簡1：“邵（昭）王為室於死湑之澹，室既成，將裕之。……王入牖裕。”簡5：“爾古須既裕，安從事。”（186頁）陳佩芬先生注：“‘裕’，字書

① 秦樺林：《楚簡佚詩〈交交鳴鵲〉札記》，簡帛研究網站，2005年2月20日。

② 胡承珙：《毛詩後箋》，見《清經解續編》第2冊，上海書店，1988，881頁。

所無，假借爲‘格’，至也。”（182頁）

今按：祿（祿），指宮室始成時的祭禮，相當於現在的落成典禮。傳世典籍皆借“落”字爲之。《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台，願與諸侯落之。”杜預注：“宮室始成，祭之爲落。”這種典禮亦稱爲考。《詩·小雅·斯干序》：“斯干，宣王考室也。”毛傳：“考，成也。”《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禮記·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

雍人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簡 1：“雍（稚）人𠂔（止之）。”陳佩芬先生注：“雍讀爲稚，聲紐旁轉通作‘侏’。‘雍人’即‘侏人’，侏儒，宮中的御侍。”（182—183頁）

今按：“稚”、“侏”聲音較遠，通轉可能不大。侏儒不得省稱爲侏人，且侏儒之職在於供娛樂，與此雍人掌守門通報者了不相涉。“雍人”當讀爲“寺人”。寺人，即宮中供使喚的小臣，以奄人爲之。《詩·秦風·車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清陳啓源《毛詩稽古編》：“闔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楚國方言中之部與脂微部有相混的情形。上博簡《周易》“匪夷所思”作“非台所思”^①，本書《曹沫之陳》中用“幾（微部）”爲“忌”（之部）（134頁），皆其證也。稚字又作“穉”，从屮聲；又作穉，从屮聲；又作穉，从夷聲（見《集韻》）。而“管夷吾”之夷（脂部），《郭店楚簡》正作寺（之部）。然則寺之於雍，猶寺之於夷也。

附帶談一下“稚”字的構形。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中曾說：“（稚）本作‘穉’，从禾屮聲。漢代人有時把屮旁簡寫爲屮（見漢印），因此訛變爲稚。”^②黃文傑先生同意裘先生的意見，祇是認爲“‘穉’訛變爲‘稚’在戰國後期的秦文字已經發生”^③，現在看來，該字的實際演變情況可能正好相反。戰國以前文字還沒有見到“穉”字，可見“稚”字是較早的字形。稚本从禾，佳聲。後來，“佳”形被寫作屮，與“屮”形音并近，於是才有了“穉”的寫法。

①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7頁。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商務印書館，1988，174頁。

③ 黃文傑：《戰國時期形聲字聲符換用現象考察》，見《古文字與漢語史論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242—250頁。

訇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1：“爾必主少_二人_二（小人，小人）牒訇寇。”（183 頁）陳佩芬先生注：“‘訇’，《玉篇》：‘拏也。’《說文》：‘拏，牽引也。’段玉裁注：‘各本篆作拏。’”（184 頁）《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7：“君王至於定盦，而被（披）衲衣，王訇而參之衲衲，葬之脾被之，其衲見。”（188 頁）

《曹沫之陳》簡 29：“必訇邦之貴人及邦之可（奇）士，欽（御）卒（卒）吏（使）兵，毋返（復）遊（失）……”（261 頁）李零先生注：“訇 讀‘約’，指約束規定。”（262 頁）

今按：兩位整理者對“訇”的訓釋似皆有未安。今將三例“訇”綜合考量，疑當讀為“詔”。古音勺聲、召聲相通。《淮南子·道應》：“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又《主術》：“孔子力招城關。”《戰國策·楚策四》：“以其類為召。”《文選·詠懷詩》李善注引“招”作“的”。《呂氏春秋·盡數》：“射而不中，反修於招。”舊校：“招，一作的。”“詔”在傳世典籍中常用作“告訴”、“教導”或“召集”義。《楚辭·離騷》：“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王逸注：“詔，告也。”《爾雅·釋詁下》：“詔，導也。”郭璞注：“詔，謂教導之。”《莊子·盜跖》：“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小人牒訇寇”之“訇”當取“召集”義。著喪服之君子見寺人不肯通報，於是威脅說：“你假如阻止小人的話，小人將召集寇盜（造反）。”“王訇而參之衲衲”之“訇”當取“告訴”義。王知道別人對葬之脾著衲衣一事有異議，於是告訴了他，並給他一身寬大的衣服把衲衣遮住。“必訇邦之貴人及邦之可（奇）士”之“訇”當取“教導”義。意思是說，王在戰前一定要對國之貴人及奇士進行教導和訓誡。

啖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3：“僕將啖亡老。”陳佩芬先生注：“《望山楚簡》二·三是‘啖’讀為‘啖’。……‘啖亡老’，是為亡父啖食，就是祭祀亡父。”（185 頁）

今按：“啖”，當讀為“禪”，除去喪服時舉行的祭祀。《說文·示部》：“禪，除服祭也。”《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禪。”鄭注“中猶閒也。禪，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禪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禪或為導。”覃聲炎聲古音相通。《詩·小雅·大田》：“以我覃耜。”《爾雅·釋詁》郭注引“覃”作“剡”。《左傳·莊公十年》：

“文侯之出也過譚。”《史記·齊太公世家》“譚”作“鄰”。《荀子·非十二子》：“神禪其辭。”楊注：“神禪當爲沖淡。”《說文·木部》：“桼，遯其也。从木，炎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簡文記該君子時著“喪服”，是未除服也。故此云“禪亡老”，義正相應。

薨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牒》簡 5：“虍不知其爾薨。”陳佩芬先生注：“薨，即葬字。《說文·艸部》：‘葬，藏也。从死在艸中。’”《禮記·檀弓上》：“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186 頁）

今按：“薨”从死，莫聲，當讀爲“墓”。《禮記·檀弓上》：“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又：“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鄭注：“脩，猶治也。”又：“易墓，非古也。”鄭注：“易謂芟治草木。”因爲古代的墓沒有標志，所以楚王的宮室雖然建在別人的墓上，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古須 安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牒》簡 5：“爾古須既祿，安從事。”陳佩芬先生注：“《集韻》：‘須，俗作鬚。’‘古鬚’即古稀，謂人年七十爲古稀。”又云：“安，句中語詞，與‘於’通。《經傳釋詞二》：‘安猶於也。’”（186 頁）

今按：“鬚”與“稀”聲韻皆遠，似無關係。“古須”當讀爲“姑須（壘）”，意爲“姑且等待”。《說文·立部》：“壘，待也。”傳世典籍亦多借“須”字爲之。《左傳·成公十二年》：“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安”，用同“焉”，表連接的副詞，乃。整句大意爲：你姑且等落成典禮之後再遷葬你父親的遺骨吧。

褌（裊）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牒》簡 6：“葬之牒駁王將取車。大尹遇之，被（披）褌“裊”衣。大尹入告王：‘僕遇牒，駁取車，被（披）褌“裊”衣。’陳佩芬先生注：“从衣，因聲，《說文》所無，讀爲‘裊’。下有重文，讀爲‘裊衣’。‘裊’，衣服之中部，《玉篇》：‘衣身也。’”（187 頁）

今按：“裊”有三義，一爲衣服的中部，二爲夾衣，三爲近身衣。此文既言“被（披）裊衣”，當取後二義爲是，因爲不能祇穿衣服的中部。結合下文來看，似是昭王爲了包庇

葬之脾，又給他穿上一層寬大的外衣（說詳下條）。則此處“裋”當取第三義“近身衣”。

𡗗 衽褌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7：“君王至於定盦，而被（披）裋衣，王訖而𡗗之衽褌，葬之脾被之，其衽見。”陳佩芬先生注：“‘𡗗’，即‘余’字。青銅器《繼書缶》銘‘畜孫書也’，余字下亦多一撇。‘衽’，《廣雅·釋器》：‘袖也’。……‘褌’，假為‘褌’，《說文》所無，小兒衣也。即緹裙，俗作褌。”（188頁）

今按：“𡗗”當讀為“與”或“予”。古文字中也借從“余”得聲的“舍”字來表示。《令鼎》：“余其舍汝臣十家。”《九店楚簡》：“利呂（以）取貨於人之所，毋呂（以）舍人貨於外。”^①李家浩先生云：“‘舍’，讀為給予之‘予’。”^②“衽褌”當為一合成詞，“褌”字當讀為“褌”，指寬大的衣服。《說文·衣部》：“褌，衣博褌也。”“見”讀“現”。最後兩句原標點為“葬之脾被之其衽，見……”，今據文意調整如上。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楚王到了定，葬之脾穿著王的裋衣（這大約是不合禮制的），楚王怕別人看見（為了包庇葬之脾），於是告訴了他，並給了他一身寬大衣服。葬之脾就把它套在了裋衣的外面，但裋衣的衣襟還是露了出來。

息 君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8：“息君吳王廷，至於郢，楚邦之良臣所嚮（慧）。”（188—189頁）陳佩芬先生注：“息君吳王廷 ‘息’，同‘怕’。《集韻》：‘怕，古書皆作息。’本句語意不明。”

今按：此處吳王為闔廬。“息君”，當讀為“伯（霸）君”。伯，本字，霸、息皆借字。《說苑·政理》：“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中論·審大臣》：“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吳王闔廬“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故可稱為“霸君”。

由（囟）

上博簡（四）《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脾》簡 10：“元子既與虎同車，或口衣由，邦人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50頁。

② 同上，102頁。

虜（皆）見之三日安，命葬之脾見。”（190頁）

今按：此處斷句疑有誤。“由”當隶定爲“囟”。楚簡中多用“囟”爲“使”，此處亦當用爲“使”字。“或”讀“又”，“囟”字當屬下讀，“安”字亦當屬下讀，訓爲“乃”，表示連接的副詞。

上博簡（四）的問世，對於我們認識古文字中“囟”或“思”的用法有很大的幫助。以前劉信芳、孟蓬生、陳斯鵬等論證“囟”或“思”用作“使”，祇是就字形、音韻和文意推測。^①現在我們有了更爲充足的證據，今補充論證如下：

从“囟”、“思”跟使動句式的關係可以看出“囟”或“思”用作“使”。《曹沫之陳》簡 54：“𡗗（重）賞而泊型，思忘其死而見其生，思良車良士取之餌（耳）。思其志記（起），𡗗（勇）者思𡗗（喜），𡗗（慈）者思𡗗（悔），𡗗（然）句（後）改𡗗（始）。”（278頁）

《曹沫之陳》簡 61：“𡗗（勇）者𡗗（喜）之，𡗗（慈）者𡗗（悔）之。”（283頁）“𡗗（喜）之”、“𡗗（悔）之”就是我們常說的“使動”用法，根據上下文可以推定：𡗗（喜）之=思𡗗（喜），𡗗（悔）之=思𡗗（悔）。

从“囟”、“思”與“吏（使）”的互文關係可以看出“囟”或“思”用作“使”。《曹沫之陳》簡 36：“能𡗗（治）百人，吏（使）長百人；能𡗗（治）三軍，思𡗗（治）受民者（？）。”（266頁）

泊（𡗗）

上博簡（四）《柬（簡）大王泊旱》簡 1：“柬（簡）大王泊游（旱），命龜尹羅貞於大頭，王自臨卜。”濮茅左先生注：“‘泊’，《集韻》：‘泊，止也。’《廣韻》同。《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泊，止息也。’‘泊’或通作‘怕’。……王患疥瘡病，疥瘡病唇燥口渴，奇癢，故怕渴。”（195頁）

今按：“泊”的“止”義即“停泊”爲後起，“怕”字上古也不用作“害怕”之“怕”，而是“澹泊名利”之“泊”，而上古的“怕”義實際上是由“怖”來表示的。古音“白聲”、“父（甫从父聲）”相通。《周禮·天官·醢人》：“豚拍魚醢。”鄭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膊。”《老子》：“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薄”作“泊”。本書《曹沫之陳》簡 54：“𡗗（重）賞而泊型。”（279頁）“泊”即“薄”。字有古今本借而已。此處的“泊”當用爲祭名，實即《周禮》的“醢”，其法

① 劉信芳：《子彈庫楚墓出土文獻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孟蓬生：《上博竹書（二）字詞札記》，簡帛研究網站，2003年1月14日。又見《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472—477頁。陳斯鵬：《論周原甲骨和楚系簡帛中的“囟”與“思”——兼論卜辭命辭的性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編：《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信雅達印製公司，2003，393—413頁。

與雩祭或祭祭類似。《周禮·地官·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注：“酺者，為人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蜚蜮之步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孫詒讓《正義》云：“字書酺字無祭神之義，鄭以《黨正》雩祭及漢法約之，知酺亦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後世沿襲，遂以酺爲會飲，而失其祭神之義，乃與醺無重複分別，非其本也。”《說文·示部》：“祭，設綿蕪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榮省聲。一曰：祭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祭祭水旱。”本文記楚簡王爲請命，不惜在烈日下親自祭祀與占卜，因而灼傷之事，簡文稱藉故事中人物之口稱“簡王”爲“元君”，良有以也。本文主旨似并不如濮先生所說是楚簡王因爲自己有病而舉行祭祀。本簡“泊”字訓釋至關重要，不但有助於我們理解本文的主旨，也有助於我們瞭解古代的酺祭之禮。

滄 縹

《東大王泊旱》簡 1、2：“王向日而立，王滄至縹。”濮茅左先生注：“‘滄’，《說文·水部》：‘滄，寒也。’……王憂病心寒。或讀爲蹠，行有節奏貌。……‘縹’……疑讀爲蹠。《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顏師古曰：‘蹠者，繞林木而祭也。’”（195—196 頁）

今按：此解似嫌迂遠。滄，當讀爲“創”，指創傷。縹，當即腰帶之帶。因為王向日而立，被日光灼傷，創傷直到腰部。參見下條。

庶（炆）

《東大王泊旱》簡 1、2：“龜尹智王之庶於日而疒芥。”濮茅左先生注：“‘庶’，《集韻》同‘遮’。”（196 頁）

今按：“庶”，甲骨文作“炆”，本从火，石聲，炙烤之義（參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釋林·釋庶》，中華書局，1979 年）。古音石聲、炙聲相通。《易·晉·九四》：“晉如鼫鼠。”馬王堆帛書《周易》“鼫”作“炙”。這句話意思是，龜尹知道簡王是因爲受了太陽的炙烤而得了疥病。

蕙

《東大王泊旱》簡 16：“三日，大雨，邦蕙之。”濮茅左先生注：“‘蕙’，讀為‘瀝’。”（209 頁）

今按：“邦瀝之”似為不詞。“蕙”當讀為“賴”，利也。《國語·齊語》：“相語以利，相示以賴。”韋昭注：“賴，贏也。”《廣韻》：“賴，利也。”《三國志·吳志·陸遜傳》：“遜開倉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尚書·呂型》：“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疏：“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蒙賴”，即蒙其利。“邦蕙之”，猶言一國受其利。

駢 迺

《東大王泊旱》簡 16：“發（發）駢迺（蹠）四疆（四疆，四疆）皆管（熟）。”濮茅左先生注：“‘駢’，同‘駢’。《集韻》：‘駢，良馬。’《玉篇》：‘駢，健馬也。’‘迺’，讀為‘蹠’，聲符相通……《廣韻》：‘蹠，足履踐也。蹠同。’从辵，从足，義符亦近。”（209 頁）

今按：“駢”當讀為“駢”，驛馬或驛車也。^①“全”為“藝”的省寫。古音執聲、日聲相通。《周禮·考工記·輪人》：“則無桱而固。”鄭注：“桱讀如涅。”《說文·水部》：“涅，黑土在水中者。从水，从土，日聲。”又《衣部》：“褻，私服也。从衣，執聲。”又：“袒，日日所常衣。从衣，日聲。”褻袒音義俱通。“迺”當讀為“適”。本書《昭王毀室·昭王與葬之牒》有“迺聞”之語，陳佩芬先生讀為“適”（183 頁），甚是。這句話是說，楚簡王派驛車到全國視察大雨之後的年成，結果是各地都獲得了豐收。

塹 詁

《相邦之道》簡 4：“孔（孔子）退，告子贛曰：‘（吾）見於君，不昏（問）又（有）邦之道，而昏（問）相邦之道，不亦塹辟（乎）？’子贛曰：‘吾子之答也可（何）如？’孔（孔子）‘如詁。’”張光裕先生注：“塹，从畝得聲，可讀為欽。‘不亦欽乎？’文獻中相同語例多於‘不亦’下綴以‘可’、‘宜’、‘異’、‘善’等字。‘不亦欽乎？’備見贊許之意。”又曰：“‘詁’，字書未見，字既从言，應與語辭相關。‘女詁’，於此疑或讀為‘如斯’。‘西’，古音屬心紐脂部，‘斯’屬心紐，支部，兩者音近可通。”

① 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駢虎節銘文考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662—671 頁。

(237 頁)

今按：讀“不亦塹乎”爲“不亦可塹乎”，屬增字爲訓，不可取。且增“可”字後全句即含被動意義，兩句話意義可謂大相徑庭。疑“塹”字讀若“謙”。歆字古音在侵部，謙字古音在談部，且兩者皆爲喉牙音，故得相通。問話者爲一國之君，不問有國（統治國家）的道術，却問幫助治理國家的道術，有降低身份的意思，故孔子稱之爲“謙”。

“詆”字自古已有，張先生蓋一時失檢。“詆”即“訊”字。《說文·言部》：“訊，問也。从言，卂聲。𠂔，古文訊从卂。”古音西聲與卂聲同屬心紐，而韻部真文相近，故得相通。《字彙》以後，《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皆以“詆”爲“詆”的俗字，非古義也。

“如詆（訊）”的意思是說，君問我以相邦之道，我即以相邦之道來回答他。

勿

《曹沫之陳》簡 38：“戰有顯道，勿兵以克。”李零先生注：“似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意思。”（268 頁）

今按：李先生所說甚是。“勿”，義爲“無”。《小爾雅》：“勿，無也。”《易·益卦》：“立心勿恒。”孔疏：“勿，猶無也。”又《豐卦》彖詞：“勿憂，宜日中。”孔疏：“勿，無也。”“无兵以克”，是說沒有（不依靠）軍隊而取得勝利，亦即不戰而屈人之兵。

琫

《曹沫之陳》簡 64：“弗琫危地。”李零先生注：“琫 待考，疑是據、處之義。”（284 頁）

今按：琫字不識，但其結構當分析爲从玉，卒聲。以音求之，此字當讀爲“躡”或“𨇖”。古音卒、𨇖、躡相同。《說文·卒部》：“卒，讀若簫。”《集韻》：“簫，《說文》：簫也。……亦作躡、𨇖、𨇗。”《說文·止部》：“𨇖，機下足所履者。从止，从又，入聲。”又《足部》：“躡，蹈也。从足，聶聲。”《廣雅·釋詁一》：“躡，履也。”“弗琫危地”即“不蹈危地”或“不履危地”之義。

龍崗秦簡諸“田”、“租”簡釋義補正

——結合張家山漢簡看名田宅制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徵收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楊振紅

內容提要：本文結合張家山漢簡等簡牘材料，對龍崗秦簡中諸“田”、“租”簡進行再考釋。龍崗簡116“吏行田贏律”之“行田”意為“授田”。龍崗“行田”、“田籍”、“程田”、“程租”、“程”、“租”、“匿田”、“盜田”諸簡反映的是秦名田宅制下的土地管理和田租徵收制度。鄉是秦及西漢初年國家實施土地管理、田租徵收的基本單位。鄉部嗇夫及其屬吏——部佐（漢為鄉佐）每年需對百姓土地占有、耕種、收成等情況進行檢核，製成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將副本上交到縣。對占有土地沒有達到法定標準者，國家通過“行田”補其不足。田租徵收實行“程租”制度，以當年耕種的土地即墾田為徵收對象，根據畝產量確定田租額。對侵占公私田宅的“盜田”、部佐在田租徵收中的“匿田”、“遺程”、“敗程”等違法行為，國家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

關鍵詞：行田、田實、田籍、程田、程租、匿田、盜田、名田宅制、土地管理、田租徵收

1989年出土的湖北雲夢龍崗秦簡中有許多帶“田”和“租”字的簡，這些簡無疑是瞭解秦特別是秦王朝土地和田賦制度的重要史料。然而，由於簡文殘損嚴重，給釋讀帶來了很大困難。2001年底刊布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有比較完整的關於土地制度的法律規定，《算數書》中也有數則與“田租”有關的算題。據研究者推測，龍崗六號墓的年代為秦二世二年（前208）九月後至漢三年（前204）九月，其內容主要反映的是秦末的法律和

制度。^①張家山漢簡的年代斷限為呂后二年（前186）。兩座墓葬的年代只相隔二十餘年，而西漢初年的制度多沿襲秦制，因此，將兩批簡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不僅有利於兩批簡各自的釋讀，而且可以更為完整地復原當時土地制度和田租徵收的實態。

一、“行田”

龍崗秦簡出土以後，其中一枚簡最初整理者釋為：

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贏□□□

對於“贏”後面的字，整理者推測可能是“假法”二字，並將此類簡命名為“田贏”。^②1996年胡平生先生撰文指出：

《龍》文^③懷疑“贏”下可能是“假法”二字，據殘痕和文意分析，恐怕難以成立，《龍》文對“田贏”意義的表述，語焉不詳，似乎認為“田贏”是一種法律，這也是講不通的。《龍》文因對簡文的理解有誤而將句讀弄錯，我們認為“行田”即行獵，是進行田獵的意思。“贏”下應是“律”字，“贏律”見於睡虎地簡《秦律雜抄·除弟子律》：“當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審，皆耐為侯（候）。使其弟子贏律，及治（笞）之，貲一甲……”整理小組注釋：“贏律，即過律，超過律，超出法律規定，《史記·傅靳蒚成列傳》有‘坐事國人過律’。”秦律處罰“贏”與“不備”的律文，又見於《效律》等，“贏、不備”都是有罪的，如：“為都官及縣效律：其有贏、不備，物直（值）之，以其貲（價）多者罪之，勿贏（累）。”這是在統計上報官有財產時，多報少報都違法，都要受到處罰。（中略）所謂“吏行田贏律”，應當是官員進行田獵活動超過法律規定次數或規模，須論罪處罰。據《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同），古人田獵有時節約束……^④

2001年出版的《龍崗秦簡》（後文簡稱《龍崗》）採納了胡先生的意見，將此簡釋為：

①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概述”，中華書局，2001，7—9頁。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合撰：《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集刊》第八輯，科學出版社，1994。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科學出版社，1997，釋讀與上同。

③ 胡文對《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及出土簡牘》的簡稱（筆者按）。

④ 胡平生：《雲夢龍崗秦簡考釋校證》，《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省人民出版社，1997。

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贏律（？）詐（詐）田（簡116）^①

胡先生正確地指出了《龍》文句讀上的錯誤，指出應將“行田”讀為一詞。但是，將“行田”解釋為“行獵”亦不妥。“行田”作為一個語彙在文獻中屢有出現。如《漢書·高帝紀下》載高帝五年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顏師古注引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漢書·溝洫志》載史起語：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

顏師古注：“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②《史記·河渠書》裴駟《集解》引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綜上，戰國秦漢時期，“行田”是一專用語詞，專指國家給人民分配土地的行為。對秦、漢國家而言，自商鞅變法實行“名田宅制”後，“行田”即作為“以爵位名田宅制”的一項具體實施手段而存在。《商君書·算地》中有一段文字提到“行”：

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故為國分田數小。^③

杜正勝先生解釋說：“行，行田也，即授田。”^④他的解釋是正確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

① 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本。後文所引龍崗簡文及簡號均據此本。

② 《呂氏春秋·樂成》亦載此事。

③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中華書局，1986，42—43頁。

④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第四章“土地的權屬問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182頁。

令》出土了呂后二年“以爵位名田宅制”的許多相關法律條文，為我們復原和認識這一制度提供了可能。這套制度的基本內容是：國家根據爵位劃分占有田宅的標準，田宅占有的單位是戶，田宅主要通過國家授予、繼承、轉讓和買賣獲得。^①在《二年律令》下列簡中均出現了“行”字，如《戶律》簡310—313：

關內侯九十五頃，大庶長九十頃，駟車庶長八十八頃，大上造八十六頃，少上造八十四頃，右更八十二頃，中更八十（簡310）頃，左更七十八頃，右庶長七十六頃，左庶長七十四頃，五大夫廿五頃，公乘廿頃，公大夫九頃，官大夫七頃，大夫五頃，不（簡311）更四頃，簪褭三頃，上造二頃，公士一頃半頃，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頃，司寇、隱官各五十畝。不幸死者，令其後先（簡312）擇田，乃行其餘。它子男欲為戶，以為其□田予之。其已前為戶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簡313

《戶律》簡318：

□□廷歲不得以庶人律未受田宅者，鄉部以其為戶先後次編之，久為右。久等，以爵先後。有籍縣官田宅，上其廷，令輒以次行之。

《田律》簡239：

田不可田者，勿行；當受田者欲受，許之。

這些簡中的“行”即是“行田”的省稱，指國家將土地分配給個人。而且，如果漢初的確如史載多沿承秦制的話，那麼龍崗簡116中“行田贏律”應與《二年律令·戶律》310—313簡有直接淵源關係。

相反，無論傳世還是出土文獻，均不見“行獵”意義的“行田”。因此，龍崗秦簡上述簡文中的“行田”應指國家分配土地即授田。龍崗秦簡“行田”意義的確定，無論對認識龍崗秦簡本身，還是對認識秦漢“名田宅制”都具有重要意義。

^① 參見拙文《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時期的土地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

二、“田實”

龍崗秦簡中有一枚簡：

黔首田實多其□□（簡 157）

《龍崗》注釋說：

田實多其□，疑指“度田不實”，漢代有“度田不實”之罪。《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又《劉隆傳》：“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劉般傳》：“……般上言：‘……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脫）田同罪。’”李家浩先生說，“田實”與庭實、內實、口實、腹實、豆實、簋實、官實等文例相同，似指田中的農作物。

由此可知，《龍崗》和李家浩先生對此簡的認識不同，李先生將“田實”讀為一詞，認為它與庭實、口實、簋實等一樣是當時慣用的熟語。

我同意李先生的看法。從《後漢書·劉隆列傳》可知，“度田不實”的“實”與“天下墾田多不以實”的“實”詞義相通，即指實際、事實。“實”是修飾“度田”和“占田”的，應以“田以實”或“田不以實”的形式出現，在這種情況下“田”與“實”不能直接合為一詞。而且，從《劉隆列傳》來看，當時“不以實”的除了“墾田”外，還有“戶口年紀”。假如當時確實存在《龍崗》所說意義上的“田實”，那麼，戶口年紀又該用什麼樣的語彙來表示呢？此外，《龍崗》猜測簡 159 “田”後的殘字為“實”：

□或即言其田實（？）□（簡 159）

從字形看，此字所殘的部分的確是“宀”字頭。假如此字確是“實”，則證明“田實”確為一名詞，是“言”的實語，從詞性角度證明李先生的解釋更為合理。

三、“田籍”

龍崗簡 151:

田及爲詐（詐）偽寫田籍皆坐臧（贓），與盜□□（簡 151）

《龍崗》注釋說：

詐偽寫田籍，欺騙或假造田土文書。《唐律疏議·詐偽律》：“諸詐爲官私文書及增減，欺妄以求財賞及避沒入、備償者，準盜論。注：文書，謂券抄及簿賬之類。”《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辨詐偽云：“詐者，虛言相誑以取利；偽者，造似物以亂真。”田籍，占有田地的簿籍文書。《史記·平準書》：“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

《龍崗》的注釋大體是對的。秦漢時期的傳世文獻中不見“田籍”一詞，但大量材料表明這一時期和後代一樣，政府對每家每户占有土地等情況製有簿籍。龍崗簡的出土彌補了文獻材料的不足，揭示了秦帝國時“田籍”的存在。新近刊布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出土了更詳盡的關於田籍的法律規定，將兩者結合起來，可以更好地了解秦至西漢初年田籍的製作、管理等情況。

張家山漢簡中關於田籍的規定見於《二年律令·戶律》簡 331 至簡 336：

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簡 331）官嗇夫印封，獨別爲府，封府戶；節（即）有當治爲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湊）令若丞印，嗇夫發，即祿治爲；（簡 332）臧（藏）□已，輒復緘閉封臧（藏），不從律者罰金各四兩。其或爲詐（詐）偽，有增減也，而弗能得，贖耐。官恒先計讎，（簡 333）□籍□不相（？）復者，輒（繫）劾論之。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簡 334）如戶籍。有爭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勿聽。所分田宅，不爲戶，得有之，至八月書戶。留難先令，弗爲券書，（簡 335）罰金一兩。（簡 336）

由此可知，漢初戶籍是由五個“子簿籍”構成的：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其中關於土地的簿籍占了三種。張家山漢簡整理者注釋說：“田比地籍，依田地比鄰次第記錄的簿籍。”^①它應是記錄每户占有土地的數量、位置和地界等情況的簿籍。田命籍文獻缺載，內容不得而知。田租籍顧名思義應該是關於田租的簿籍。《二年律令·行書律》簡 268：

復蜀、巴、漢（？）中、下辨、故道及雞劍中五郵，郵人勿令繇（徭）戍，毋事其戶，毋租其田一項，勿令出租、易糶。

及《戶律》簡 317：

卿以上所自田戶田，不租，不出項易糶。

表明當時并非所有的土地都要出田租和蜀糶稅，因此，田租籍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記錄需要徵收田租的土地。後文將證明田租籍的內容還應包括每塊地的畝產量、田租率和每户應繳納田租的總額。

秦時田籍是否也被分為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三種，以及龍崗簡 157 中的“田籍”是否就是這三種簿籍的統稱，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材料可以證明。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龍崗秦簡與張家山漢簡年代相距不遠，漢初基本沿襲秦制，我曾撰文論證漢初繼承了秦的名田宅制，^②後文還將證明秦的田租徵收制度也為漢所繼承，因此，照常理推之，秦應該和漢初一樣存在三種土地簿籍，並統稱之為“田籍”。

根據上述簡可知，包括三種田籍的戶籍的副本要由鄉部上交到縣裏保存。簡 331—333 對縣廷封緘、收藏、開封、修改戶籍內容等做了非常具體的規定。簡 333—334 “其或為詐（詐）偽，有增減也，而弗能得，贖耐。官恒先計讎，口籍口不相（？）復者，毆（繫）劾論之”的含義不甚明確，需要加以辨析。“其或為詐（詐）偽，有增減也”的主體應指下文中的鄉部嗇夫。秦漢時期戶籍的內容（包括家庭人口、土地占有、耕作等情況）可能實行自行申報制度^③，但是，對於申報的內容，鄉部主管官吏要進行核實，然後製成簿籍。這可以從鄉部嗇夫在先令券書的製作、管理程序中所處角色推之。前揭《戶律》簡 334—336 載，戶主如果想在生前通過立遺囑——“先令”的形式分割家產，一定要請鄉部嗇夫到場，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78 頁。

② 拙文《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③ 《史記·秦始皇本紀》裴駟《集解》引徐廣語：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聽取“先令”，將其書寫為三份，其中一份要和戶籍一樣上交到縣裏。如果鄉部嗇夫拒絕到場或書寫券書，要處以罰金一兩的懲罰。也就是說，充當分割家產的證人和書寫券書是鄉部嗇夫的職責。由此推之，作為國家重要簿籍文書的戶籍也應該由鄉部嗇夫來書寫製成，而不可能由百姓自己書寫。《二年律令·戶律》簡 328—330 則明示戶籍是由鄉部嗇夫、吏、令史等共同查驗、製成的，副本藏於縣廷：

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祿案戶籍，副藏（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實不徙數盈十日，皆罰金四兩；數在所，正、典弗告，與同罪。鄉部嗇夫、吏主及案戶者弗得，罰金各一兩。

此外，《二年律令·戶律》簡 322 載：

代戶、買賣田宅，鄉部、田嗇夫、吏留弗為定籍，盈一日，罰金各二兩。

如果有代戶或買賣田宅者，由“鄉部、田嗇夫、吏”負責“定籍”，即對戶籍內容進行更改。簡 322 中的“吏”以及簡 329 中的“吏主者”應指鄉佐，秦時稱部佐。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部佐匿者（諸）民田，者（諸）民弗智（知），當論不當？部佐為匿田，且可（何）為？已租者（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〇〇為匿田。”整理小組注釋：“部佐，鄉部之佐，漢代稱鄉佐，《續漢書·百官志》：‘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①因此，在戶籍中進行“詐偽”、“增減”的一定是負責此項工作的鄉部嗇夫或其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218 頁。對於整理小組將“部佐”解釋為“鄉部之佐”，裘錫圭先生持不同意見。他認為田嗇夫是秦漢時期“各縣普遍設置的一種重要官職”，“鄉嗇夫下面有鄉佐、里典，田嗇夫下面有部佐、田典，這是平行的兩個系統”。“田嗇夫總管全縣田地等事，部佐則是分管各鄉田地等事的。”（裘錫圭：《嗇夫初探》，載《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 1981，248—250 頁。）山田勝芳先生進一步依據《二年律令·田律》簡 247—248 “鄉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認為當時存在著像鄉部、亭部一樣有一定管轄區域的田部。（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汲古書院，1993，40—49 頁。）我認為田嗇夫祇是縣的一個行政部門，主管農業生產，如今天的縣農業局，當時並不存在一個像鄉一樣的一級行政組織——“田部”。《二年律令·秩律》簡 450 記載秩八百石官吏（主要是各縣令）的屬官時，說“有丞、尉者半之，司空、田、鄉部二百石”，簡 464 記錄六百石官吏的屬官時也說“有丞、尉者半之，田、鄉部二百石”，均稱之為“田”，而非與“鄉”一樣為“鄉部”，田嗇夫應與司空一樣是官名。而且《二年律令·戶律》簡 328—330 明確規定，戶籍歸“鄉部嗇夫、吏、令史”負責，正文已論戶籍應包括三種土地籍，因此，部佐應指鄉部之佐。“部佐”雖然主要負責與農業生產有關的事宜，但是隸屬於鄉的。同樣，田典雖然也負責里的農業生產事務，但是卻和“里典”一樣是里負責人之一。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廩苑律》：“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答）卅。”《二年律令·戶律》：“由典更換里門簡（鑰），以時開；（簡 305）伏閉門，止行及作田者；其獻酒及乘置乘傳，以節使，救水火，追盜賊，皆得行，不從律，罰金二兩。（簡 306）”《錢律》：“盜鑄錢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贖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四兩。（簡 201）”上述材料都證明，田典與正、典一樣都是“里”的負責人，而非獨立於“里”之外。至少到東漢時，“鄉部”的稱謂簡化為“鄉”，“部佐”的稱謂也簡化為“佐”或“鄉佐”。

屬吏部佐（漢為鄉佐）。

“弗能得”的主體應該指縣主管官吏，即簡中所說“令、丞、官嗇夫”。作為鄉部嗇夫的上級主管官員，縣令、丞等有責任對他們實行監督、檢查，及時發現他們工作中的失誤。如果鄉部嗇夫弄虛作假，篡改戶籍內容，縣令等沒有發現即“弗能得”，就是失職，要對他們處以“贖耐”的刑罰。簡後文說“官恒先計讎，口籍口不相（？）復者，毆（繫）劾論之”，是關於縣令等如何實行監督檢查的規定。《字彙補·言部》：“讎，應驗也。”

《正字通·言部》：“讎，校勘書籍曰讎，比言兩本相對復如仇也。”^①縣令等在接到鄉部呈報的戶籍時，一定要進行審計檢查，看各簿籍中的數字是否吻合，發現問題要馬上處理有關官吏。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確定上述《戶律》簡是針對縣、鄉制定的關於戶籍管理的規定。

可以看出，龍崗簡 151 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簡 333 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十分相象。所不同的是，《戶律》簡 333 所說的“詐僞”、“增減”針對的是包括宅園戶籍、年細籍在內的所有戶籍，而龍崗簡 151 針對的祇是田籍。兩者之間的承繼關係清晰可見，即《二年律令·戶律》簡 331—336 的系列規定是在秦律有關規定特別是龍崗簡 151 等的基礎上形成的。

四、“程田”與“程”、“程租”、“租”及“匿田”

龍崗秦簡中有一枚關於“程田”的簡：

程田以為臧（贓），與同灋（法）。田一町，盡□盈□希□（簡 133）

由於龍崗簡中還有一些涉及“程”特別是“程租”的簡，以往學者認為它們之間關係緊密，因此多將它們聯繫起來考察。龍崗簡中關於“程”的簡主要有如下幾條：

不遺程、敗程租者，□；不以敗程租上□（簡 125）

盜田二町，當遺三程者，□□^②□□□□□□（簡 126）

① 如《史記·封禪書》：“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索隱》引鄭德云：“相應為讎，謂其言語不相應，無驗也。”《漢書·律曆志》：“乃者有司言曆未定，廣延官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顏師古注：“讎，相當。”

② 從圖版上看此字可能是“律”。

一町，當遺二程者，而□□□□□□□□（簡 127）

詐（詐）一程若二程□□之□□□（簡 128）

人及虛租希（稀）程者，耐城旦舂；□□□□（簡 129）

□希（稀）其程率；或稼□（簡 134）

租不能實□，□輕重於程，町失三分，□（簡 136）

□程租□（簡 167）

關於“程”，《雲夢龍崗秦簡》簡 126 注釋指出：“‘程’於秦律中多指一規定數額……簡文‘三程’以及下文‘二程’、‘一程’等，當是一種田賦單位”。簡 125 注釋說“‘遺程’，謂不足租賦數額，‘敗程’謂不合租賦質量。”《龍崗》沿襲了這一思路，但是解釋略有不同，簡 125 注釋說：

程，課率，此處指“程租”，是國家規定的每個單位面積土地應當繳納田租的定量。
遺程租，逃漏應繳田租的份額。

敗程租，降低田租規定標準的等級。“程”是一種法定的國家標準，不是一般的數量、質量規定。《九章算術》卷六：“今有程傳委輸，空車日行七十里，重車日行五十里。”又，“今有程耕，一人一日發七畝，一人一日耕三畝，一人一日耨種五畝。”本簡所說的“程租”，與“程傳”、“程耕”意義相近，應是一畝田繳納多少糧食的定額。

解釋該句大意是：

……不逃漏應繳納的田租及降低田租標準者……不以降低田租標準……

簡 133 注釋程田“為田地計算并規定應繳納的田租標準”，并在《校證》中說“本簡可能是對官吏給農民的田地確定田租標準時的違法行為進行懲處的律文。”南玉泉先生的看法與《龍崗》大致相同，亦認為典籍中的“員程皆為規定的一定數額標準”，“而龍崗簡之‘程’，通常作一定的租賦數額解”，程田“意即評定地畝稅額標準”。^①

以往學者對“程租”的解釋以及將“程租”作為理解“程”和“程田”的關鍵，方向是正確的。新出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有數則關於田租稅的算題，其中多涉及“程”，

^① 南玉泉：《龍崗秦律所見程田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一道算題的標題即為“取程”，進一步揭示田租與“程”之間關係密切。^①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六則與田租稅有關的算題如下：

1. 并租 禾三步一斗，麥四步一斗，荅五步一斗，今并之租一石，問租幾何。得曰：禾租四斗卅七分[斗]十二，麥租三斗[卅七]分[斗]九，（簡 43）荅租二斗[卅七]分[斗]廿六。術（術）曰：直（置）禾三步、吏（麥）四步、荅五步，令禾乘麥為荅實，荅乘禾為麥實，[麥乘荅為禾實]，各□（簡 44）直（置）之以一石各乘之[禾、荅、麥]為實，卅七為法而一斗。（簡 45）

2. 稅田 稅田廿四步，八步一斗，租三斗。今誤券三斗一升，問幾何步一斗。得曰：七步卅七（一）分步廿三而一斗。術（術）曰：三斗一升者為法，（簡 68）十稅田為實。令如法一步。（簡 69）

3. 取程 取程十步一斗，今乾之八升，問幾何步一斗？問得田（曰）：十二步半一斗。術（術）曰：八升者為法，直（置）一升（斗）步數而十之[為實]，如法一步。競（簡 83）程卅七步得禾十九斗七升，問幾何步一斗。得曰：減田十（卅）一（五）步有（又）[一百]九十七分步七十九步而一斗。（簡 84）取程五步一斗，今乾之一斗一升，欲減田令一斗。得曰：減田十一分步五。術（術）曰：以一斗一升數乘五步[為實]，令十一而一[為法]。（簡 85）

4. 耗（耗）租 耗（耗）租產多乾少，曰：取程七步四分步[一]一斗，今乾之七升少半升，欲求一斗步數。術（術）曰：直（置）十升以乘七斗（步）四分步（簡 86）一[為實，七升少半升為法]，如乾成一數也。曰：九步卅四分步卅九而一斗。程它物如此。（簡 87）

5. 誤券 租禾誤券者，術（術）曰：毋升者直（置）稅田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并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斗]者，直（置）（簡 93）與田步數以為實，而以券斗為一，以石為十，并以為法，如法得一步。其券有升者，直（置）與田步數以為實，而以（簡 94）券之升為一，以斗為十，并為法，如·[法]得一步。（簡 95）

6. 租吳（誤）券 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今誤券二石五斗，欲益

① 《算數書》的算題是否可以作為考察秦及西漢初年社會現實的依據，是我們利用這一材料前必須回答的問題。我的看法是肯定的，理由如下：首先，后文將揭示《算數書》算題使用的是 240 步的畝制，這是秦、漢時期的法定畝制。青川秦墓出土的秦武王二年（前 309）“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卅步為則”，30 則即 240 步。（參見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為田”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第十九輯，1983。）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簡 246：“田廣一步，袤二百卅步”。其次，下文將證《算數書》的“取程”即龍崗秦簡之“程租”。再次，《二年律令》表明西漢初年繼承了秦的名田宅制，因此，田租徵收方式應也繼承下來。

與其步數，問益與幾何。曰：九步五分步三而一斗。術（術）（簡 96）曰：以誤券爲法，以與田爲實。（簡 97）

透過這幾則算題，關於《算數書》時代的田租徵收可以清楚以下幾點：

第一，田租徵收的單位是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制。這可以從“租（吳）誤券”一題推導出來，此題說“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據此推算， $\frac{2.4}{0.1} \times 10 \text{ 步} = 240 \text{ 步}$ ，即畝積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以往研究者也指出《算數書》中與土地面積、邊長計算有關的算題如“啟廣”、“啟從（縱）”、“少廣”、“大廣”、“里田”等也都是以二百四十平方步爲一畝。^①

第二，上述算題在計算“租”或“稅”時均採取“若干步一斗”的方式，從算題“取程”來看，這種以“若干步一斗”的方式被稱作“取程”。以此爲“程”（標準），將 240 步的畝制換算成若干程，兩者之積即爲每畝之“租”、“稅”。秦漢時期畝產量大約爲大畝三至四石之間，^②但根據秦漢時期的法定稅率反推上述算題的畝產量要比上述數字高出許多。如“租（吳）誤券”中“田一畝租之十步一斗，凡租二石四斗”，是上述算題中“租”率最低的，按照漢初十五稅一或十稅一的稅率，折合畝產量爲 36 石或 24 石。“并租”中“三步一斗”是上述算題中“租”率最高的，折合畝產量爲 120 石或 80 石，數量驚人，西漢時期除了區種田可能達到這樣高的產量外，通常情況下根本不可能達到。因此，《算數書》上述算題中的數字到底是爲了算題的需要虛擬的，還是這裏的“租”或“稅”實際上指的是產量，不得而知。

第三，“誤券”和“租誤券”表明每畝的田租率要被寫在券書上，券書具有法律嚴肅性，即使誤寫了，也不能修改券書，而要以誤寫的券書爲准，通過增減每程的步數的方式，使每畝的田租率和程租率以及程數三者吻合。由此推之，當時寫在券書上的祇有每畝的田租率即每畝應繳納若干石（或斗）田租，“若干步一斗”的程租率以及一畝合計多少“程”的程田數都不記載在券書上。所謂的“券書”應就是《二年律令·戶律》簡 331 中的“田租籍”。

第四，從“取程”和“耗租”可以看出，當時國家規定要繳納的田租應該是晾乾後的糧食，如果“取程”時糧食沒有晾乾，則要按照晾乾後糧食的重量重新推算“程”，這樣獲取“一斗”的步數勢必增加，而在每塊地所繳納的田租總額不變的情況下，相應要在券書上減少這塊地的步數。

① 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6 頁。

② 參見林甘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237—244 頁。

當我們通過《算數書》對漢代田租徵收的具體方式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之後，再來看龍崗秦簡，許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上述龍崗簡由於不僅有“程”字，而且同一簡中或者有“租”或者有“田”、“稼”等字，因此可以判定是與“程租”有關的簡。但是，各簡中“程”的含義並不完全相同。簡 129 “人及虛租希（稀）程者，耐城旦舂”，“希程”應是簡 134 “□希（稀）其程率；或稼□”中“希其程率”的略稱。《龍崗》認為“希”應為“稀”，注釋說：“稀程，減少規定的租賦指標。”實際上“希”不必改為“稀”，《爾雅·釋詁下》：“希，罕也。”《集韻·微韻》：“希，寡也。”《龍崗》釋文說：“虛，不實。虛租，收繳田租有虛數。”然而，《呂氏春秋·辨土》高誘注：“虛，亦希也。”因此虛租、希程可能同義。由於簡文中有“稼”，而且稱“程率”，因此，“希其程率”顯然也與程租有關。

簡 136 “租不能實□，□輕重於程，町失三分，□”中的“程”應該指規定的田租數額，否則不會用“輕重”一詞。此簡應該針對實際徵收中能否徵收足量的田租而制定，規定假如“一町”少了十分之三，應予以什麼樣的懲罰。下列簡可能均是與此內容有關的簡：

分以上，直（值）其所失臧（贓）及所受臧（贓），皆與盜同□（簡 137）

□分，失廿石以□（簡 186）

□以上，失租廿石□（簡 187）

盈廿石到十石，論（？）□□；不盈〔十〕石到一石，□（簡 188）

以□□□□；不盈□石到□（簡 189）

一盾；不盈十石到一石，諱（？）；不盈九斗到十□（簡 191）

不盈廿石到十石，諱；不盈十石及過十□（簡 193）

簡 125 “不遺程、敗程租者，□；不以敗程租上□”，《雲夢龍崗秦簡》將“敗程租”解釋為“不合租賦質量”，而《龍崗》認為是“降低田租規定標準的等級”。《說文·支部》：“敗，毀也。”但“敗程”與“希程”有什麼區別現在尚無法確定。至於“遺程”，《龍崗》將其解釋為“逃漏應繳田租的份額”是正確的。從簡 126 “盜田二町^①，當遺三程者”以及簡 127 的“一町，當遺二程者”來看，盜田的對象是田畝，二簡中遺程的“程”也應該指田畝數，而不可能是田租數額，因為不可能把不同質的東西放在一起進行類比。因此，“遺程”的“程”應該指一定田租率的土地份額。對此，後文還將從“匿田”的角度加以證明。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討論簡 133 “程田以為臧（贓），與同灋（法）。田一町，盡□盈□希

①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八引《蒼頡篇》：“町，田區也。”

□”的“程田”。“程田”中“程”的對象是“田”，與“程租”不同，因此，將“程田”解釋成“爲田地計算并規定應繳納的田租標準”或“評定地畝稅額標準”不够準確。“程田”應爲計算土地應繳納的田租份額，份額的單位應就是簡 126 和 127 中的“一程”、“二程”。

龍崗秦簡還有一些與“租”有關的簡：

- 租筭索不平一尺以上，貲一甲；不盈一尺到□（簡 140）
 上，然租不平而勑者，□□□□租（？）之（？）□□（簡 141）
 皆以匿租者，詐（詐）毋少多，各以其□（簡 142）
 □□□不到所租□直（值），虛租而失之如□（簡 143）
 租者監者詣受匿（？）租所□□□□□□□□然□（簡 144）
 坐其所匿稅藏（贓），與灋（法）沒入其匿田之稼。□（簡 147）
 租者且出以律，告典、田典，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及□（簡 150）
 □□者租匿田□（簡 165）
 □租故重□（簡 170）
 □雖弗爲輕租直（值）（簡 172）
 □重租與故（簡 174）
 □□租者不丈□（簡 176）
 □□寫律予租□（簡 177）

其中，尤爲引人注意的是簡 150 及簡 177，兩簡中的“律”應該就是《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所說的“田租稅律”。大概每年要收田租的時候，鄉部嗇夫和部佐都要將國家頒布的“田租稅律”先傳達給“典”（里典）和田典，由他們遍告百姓。簡 154：

黔首皆從千（阡）佰（陌）彊（疆）畔之其□（簡 154）

很可能是與簡 150 有關的簡，即部佐進行“程田”、“程租”時，要把百姓全部召集到田間地頭，部佐和民戶共同核准應繳納田租的土地數量（即當年耕種的土地），測評畝產量和田租率，確定每戶應繳納的田租總額。

簡 140 “租筭索不平一尺以上，貲一甲；不盈一尺到□”，可能與租穀的測量、收納有關，解釋的關鍵在於“索”字。睡虎地秦簡《倉律》、《效律》中數見“索”字。如《倉律》：

“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爲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

倉佐主粟者各一戶以氣（饑），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爲發戶。”“禾、芻稟積索（索）出日，上贏不備縣廷。出之未索（索）而已備者，言縣廷，廷令長吏雜封其廩，與出之，輒上數廷；其少，欲一縣之，可毆（也）。”“□□□□□不備，令其故吏與新吏雜先索（索）出之。其故吏弗欲，勿強。其毋（無）故吏者，令有秩之吏、令史主，與倉□雜出之，索（索）而論不備。雜者勿更；更之而不備，令令、丞與賞（償）不備。倉”；《效》：“度禾、芻稟而不備十分一以下，令復其故數；過十分以上，先索以稟人，而以律論其不備。效”；《效律》：“倉扇（漏）朽（朽）禾粟，及積禾粟而敗之，其不可飮（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誅官嗇夫；百石以到千石，貲官嗇夫一甲；過千石以上，貲官嗇夫二甲；令官嗇夫、冗吏共賞（償）敗禾粟。禾粟雖敗而尚可飮（食）毆（也），程之，以其耗（耗）石數論穢（負）之。度禾、芻稟而不備，十分一以下，令復其故數；過十分以上，先索（索）以稟人，而以律論其不備。”整理小組注釋：“索，空。一說，此處餘讀爲予，標點爲：‘皆輒出餘（予）之，索而更爲發戶。’”結合龍崗秦簡，此解釋似不妥。

簡 142 “皆以匿租者，誅（詐）毋少多，各以其□”、簡 144 “租者監者詣受匿（？）租所□□□□□然□”是關於“匿租”的簡。^①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

市陽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半 其六石一升當渠（渠）物 其一斗大半當麥……凡□十一石八斗三升 定卅 □石五斗三升半 監（？）印（？）^②

其中的“監”應就是簡 144 的“監者”，即負責監督田租征收的官吏。“匿租”應是簡 147 “坐其所匿稅賊（賊），與灋（法）沒入其匿田之稼。□”中的“所匿稅賊”，即“匿田”的田租。以往研究者指出，此處的“匿田”與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下段簡的“匿田”義同^③：

部佐匿者（諸）民田，者（諸）民弗智（知），當論不當？部佐爲匿田，且可（何）爲？已租者（諸）民，弗言，爲匿田；未租，不論○○爲匿田。

睡虎地秦律對部佐“匿田”做了法律界定。部佐如果沒有將民田登記入冊但却徵收了田租，這種情況被視爲“匿田”；反之，沒有徵收田租的則不被視爲“匿田”。由此可知，

① 《龍崗》注釋：“監者，監督者。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空倉中有薦，薦下有稼一石以上，廷行[事]貲一甲，令史、監者一盾。’”

② 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 年第 7 期。

③ 劉信芳、梁柱：《雲夢龍崗秦簡》，38 頁。

“匿田”的罪行是否成立主要看其是否收了田租。因此，“匿田”之“田”應指部佐“程田”之田即當年耕種的應登記入田租籍中的“田”，而不是田比地籍中的田。所謂“匿田”即隱瞞應繳納田租的土地，主要與“遺程”等相區別。部佐“程田”時少登記應繳納田租的土地數量可能存在兩種情況，一種為故意所為，一種是工作疏忽造成。前者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了侵吞這些土地上的田租，即秦律中所謂“匿田”；一種是接受了土地主人的賄賂，幫助他們逃避田租，這種情況在現實中應該普遍存在，前揭《後漢書·劉隆列傳》所說“刺史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反映的就是這一現實。龍崗簡所出秦律對這三種情況均有涉及，除了前文提到的“匿田”、“匿租”外，龍崗簡 148：

其所受臧（贓），亦與盜同灋（法）；遺者罪減焉□（簡 148）

所針對的應是除“匿田”之外的另外兩種情況。“其所受贓”可能就是指接受戶主的賄賂，秦律規定這種行為與盜同罪。《龍崗》注釋說：“遺者，疑指簡 125 之‘遺程’”。《龍崗》思考的方向是正確的。“遺程”即由於工作疏漏少登了應繳納田租的土地，國家對此減輕處罰即“罪減焉”。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龍崗上述關於“程田”、“程”、“程租”、“租”以及“匿田”的簡，應是針對鄉部嗇夫、“部佐”等鄉部官吏徵收田租制定的專門法律。龍崗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出土，對搞清楚秦漢時期田租徵收的實態具有重要意義。^①

五、“盜田”

龍崗秦簡中有幾枚關於“盜田”的簡，如：

人冢，與盜田同灋（法）。□（簡 124）

盜田二町，當遺三程者，□□□□□□□（簡 126）。

一町，當遺二程者，而□□□□□□□（簡 127）

以為盜田。反農□□□□□（簡 175）

簡 127 因為句式與簡 126 相同，整理者因此認為兩者是關於同一內容的系列簡，從而將其列在一起，這是有道理的。關於“盜田”，《龍崗》在簡 126 注釋中說：

^① 筆者擬在《從出土簡牘看秦漢時期田租的徵收》（待刊）就此作詳細討論。

盜田，盜占田地，此處疑指申報的田地面積少於實有的田地面積，等於是“盜田”。漢代有“占租”之法。《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顏《注》引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買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參看簡157 注釋一“度田不實”。

并解釋此簡的大意是：

（少報土地面積而）盜占田地二町，相當於逃漏田租三個份額的人……。

《龍崗》以秦漢實行土地申報制度為前提，認為“盜田”是少申報土地面積，并將它與漢代的占租政策相聯繫。這一解釋存在幾個問題。

首先，《龍崗》將“盜田”、“度田不實”與“占租”聯繫在一起不妥，“占租”針對的應是工、商行業，不包括農民的田租。《二年律令·口市律》出土了有關“占租”的法律，可資證明：

市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贓）為盜，沒入其所販賣及買錢縣官，奪之列。列長、伍人弗告，罰金各一斤。嗇夫、（簡 260）吏主者弗得，罰金各二兩。諸詐（詐）給人，以有取，及有販賣買而詐（詐）給人，皆坐臧（贓）與盜同法，罪耐以下（簡 261）有（又）惡（遷）之。有能捕若詞吏，吏捕得一人，為除戍二歲；欲除它人者，許之。（簡 262）

《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針對的就是賣酒業。前文已述，秦漢時期的田租率由國家法律確定，百姓應繳納田租的土地數量和田租率、田租數額等，均由鄉部官吏審核確定。因此，用“占租”解釋“盜田”從方向上就存在問題。

其次，“盜田”是否指“申報的田地面積少於實有的田地面積”呢？《唐律·戶婚律》有“盜耕種公私田”條，是關於盜田的法律規定，可以為考察秦漢時期的盜田法提供借鑒：^①

① 《二年律令》出土以後，我們在秦漢名田宅制與北魏以來至隋唐的均田制之間看到了清晰的沿承發展關係，因此，將兩個時期的土地制度進行比較是可行的。

諸盜耕種公私田者，一畝以下笞三十，五畝加一等；過杖一百，十畝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荒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苗子歸官、主。

《疏議》曰：

田地不可移徙，所以不同真盜，故云“盜耕種公私田者”……“苗子各歸官、主”，稱苗子者，其子及草并徵還官、主。“下條苗子準此”，謂“妄認及盜質賣”、“侵奪私田”、“盜耕墓地”，如此之類，所有苗子各還官、主。其盜耕人田，有荒有熟，或竊或強，一家之中罪名不等者，并依例“以重法并滿輕法”為坐……若親屬相侵得罪……若已上籍，即從下條“盜質賣”之坐。

《疏議》明確指出所以稱作“盜耕種”是因為“田地”不同於其他物品，不可移動。^①此條後是“妄認盜賣公私田”以及“在官侵奪私田”、“盜耕人墓田”等條，這些行為應屬於廣義的盜田範疇，如“在官侵奪私田”顯然屬於“或竊或強”的“強”，唐律對這三種行為單獨立條并加重處罰，應該是因為在當時人看來這些行為比普通的盜田更為惡劣。由此可知，唐律中的“盜田”指的是在自己法定占有的土地之外，採取隱秘或公開手段侵占、搶奪公私田的行為。

那麼，秦漢時期“盜田”的概念是否和唐代一樣呢？我認為如此。漢代文獻記載了一些與上述唐律“盜田”行為相類似的事件。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侵奪民田宅”；衡山王劉賜“數奪人田，壞人塚以為田”，這些日後都成為他們的罪狀。據《漢書·李廣傳》附《李蔡傳》，武帝時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塚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後漢書·方術列傳·公沙穆》記載，東漢桓帝時繒侯劉敞因“侵官民田地”被下獄。結合唐律關於盜田的規定，可以推想這些人之所以獲罪應是因為他們違反了盜田法，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李蔡案，《漢書》本傳直言他的行為為“盜取”，他不僅盜塚地，而且還將其出賣，因此觸犯了法律關於盜田的多項規定。

可以看到，無論是唐律關於盜田的規定，還是漢代關於盜田的實例，盜田的行為不僅與少申報土地的行為有所區別，而且犯罪性質更為惡劣。《唐律疏議》有關法律寫作“諸盜耕種公私田”，其實已經表明其所盜的土地權屬是明確的，“公”即國家的官田，“私”

① 從秦律“盜田”到唐律“盜耕種公私田”語言表述上的變化，表明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中國古代的法律術語日臻完善和嚴謹。

即私有土地。盜田者祇是利用“或竊或強”的手段進行強占，或者進行耕種以收取收穫物，或者將其轉賣，或者通過申報使其占有合法化即將其登記在自己的田籍中。

由此也可以認定龍崗簡 120、121：

侵食道千（阡）、郛（陌），及斬^①人疇企（畦），貲一甲。（簡 120）

盜徙封，侵食冢廬，贖耐；□□宗廟與（塢）□（簡 121）

在秦漢時期也應該屬於廣義的盜田範疇。正如《龍崗》所說，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的下段問答：

“盜徙封，贖耐。”可（何）如爲“封”？“封”即田千佰頃半（畔）封毆（也）^②，且非是？而盜徙之，贖耐，可（何）重也？是，不重。

所問正是龍崗簡 121 的內容^③。結合唐律“盜耕種公私田”條中所說“苗子歸官、主”，可推測下列簡：

逆徙其田中之藏（贓）而不□（簡 160）

□罪及稼藏（贓）論之。（簡 161）

稼償主。 □（簡 162）^④

可能是秦律對盜田的處置辦法，對如何處置盜田上的莊稼作出規定。

①《龍崗》引用李家浩的說法，認為“斬”疑讀為“塹”，訓為掘。實際上，這裏“斬”即解釋得通，不必讀為“塹”。《說文·車部》：“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廣雅·釋詁一》：“斬，斷也。”《廣雅·釋詁二》：“斬，截也。”此簡指截取別人的田地。

②標點據《龍崗》改。

③將龍崗秦簡關於盜田的處罰與唐律進行比較會發現，唐律對“盜耕人墓田”處罰最重，而龍崗秦簡簡 124、121 表明，秦律中盜人塚、侵食塚廬與普通的盜田、盜徙封處罰相同，它表明至少在上述方面，秦代孝的觀念還沒有像後代那樣被充分貫徹到法律中。

④此條也可能是與《二年律令·田律》簡 253 “馬、牛、羊、豕、彘、食人稼穡，罰主金馬、牛各一兩，四豕彘若十羊、彘當一牛，而令攝（？）稼償主”內容有關的簡。

六、結語

本文結合張家山漢簡等出土簡牘，對龍崗秦簡中有“田”和“租”等字的簡做了進一步的考察和闡釋。龍崗簡 116 “廿四年正月甲寅以來，吏行田贏律（？）詐（詐）□”的出土表明，“行田”即授田在秦帝國時期是人們獲得土地最爲重要的一種方式，它和傳世文獻以及張家山漢簡相互印證秦及西漢初期實行的是“名田宅制”。名田宅制下國家對土地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國家對土地實行管理的基層行政組織是鄉，鄉部嗇夫及其屬吏——部佐（漢爲鄉佐）每年要對百姓申報的戶口、宅園、土地以及土地的耕種、收成等情況進行檢核，製成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並將這些簿籍的副本上交到縣，縣令、史等對此進行監督、檢查。對占有土地沒有達到法定標準者，通過“行田”補其不足。每年莊稼即將收穫時，鄉要將國家關於田租徵收的法律傳達給里典、田典，由里典、田典告之百姓。部佐和里典、田典以及戶主一起核算當年耕種的土地，測算田租率和應繳納的田租總額。國家對鄉部官吏在田租籍登記中出現的“匿田”、“遺程”、“敗程”以及百姓盜耕種公私田的“盜田”等行爲從法律上做了界定，並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秦漢國家對徵收租穀的成色、乾濕度、盛裝等也有規定，如果不符合規定或各簿籍間的記載出現誤差，主管官吏也要受到懲罰。

龍崗秦簡上述“田”、“租”簡的出土及其釋義的解明，對進一步探討秦漢時期的土地和田賦制度以及秦漢國家的特質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寫作過程中曾蒙鄔文玲先生提供重要材料，謹致謝忱！）

簡帛札記二則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劉樂賢

內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的兩則讀書札記。第一則指出放馬灘秦簡《日書》中有一條涉及“人日”的簡文，并就這條簡文的釋讀及相關問題作了討論；第二則認為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朔”字可以訓為“月”。

關鍵詞 放馬灘秦簡 馬王堆帛書 人日 朔

一、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的“人日”

所謂“人日”，就是農曆正月初七，它是我國傳統的民俗節日之一，迄今仍然在一些地方流行。因此，知道這一節日的人想必很多。但是，若問“人日”的來歷和含義，能夠回答出來的人恐怕就不多了。實際上，即使在專門研究古代歷史或民俗的學者中，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前幾年曾有一種從創世神話角度解釋“人日”的說法較為流行，這種說法的大意是說，在“人日”的禮俗中隱藏著中國上古“以七天為結構順序的創世神話”，與《舊約》的上帝七日創世神話相類。針對這一說法，胡文輝先生曾撰文辨析。他舉出大量涉及“人日”的文獻記載，證明“人日”是指在正月七日這一天占候人的一年災祥，與所謂創世神話並無關係。^①我們認為，胡文輝的意見十分正確。下面，擬在此基礎上

^① 胡文輝：《“人日”考辨》，《中國文化》1994年第9期。又見氏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339—348頁。

討論一條與“人日”有關的出土文獻。

從胡文輝列舉的材料看，目前所知有關“人日”的記載都出自傳世文獻。以前曾有學者認為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人良日”與“人日”有關，並由此推定“人日之名，已起於先秦時”。我們在討論睡虎地秦簡《日書》時已指出此說不確，胡文輝也認為《日書》的“人良日”與“人日”之間“渺不相涉”。^①那麼，出土文獻中到底有沒有涉及“人日”的資料？最近，我們在《河西簡牘》中看到一條簡文與“人日”相關，特在這裏向大家介紹。先將該簡釋文寫出：

入正月一日而風不利雞，二日風不利犬，三日風不利豕，四日風不利羊，五日風不利牛，六日風不利馬，七日風不利人。^②

該簡出自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秦墓，是《日書》乙種的一支。簡末的“人”字，原書釋文標作“口”，顯然是當作不識字處理。從照片看，該字清晰可辨，原書編者未能釋出，可能是因為他們對簡文的內容不夠熟悉。今按，該簡所載與古代的“人日”有關。關於“人日”的傳世記載，上引胡文輝文已列舉了很多，為節省篇幅，這裏只選錄其中兩則與放馬灘秦簡《日書》比較：

《京房占》曰：“正月初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豬，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和調不風寒，即人不病，六畜不死亡。”^③

《東方朔占書》曰：“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豬，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八日占穀，皆晴明溫和，為蕃息安泰之候；陰寒慘烈，為疾病衰耗。”故杜子美詩曰：“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蓋傷時之言也。推此當由漢世始有其義。^④

簡文和《京房占》、《東方朔占書》雖然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差異，但內容基本一致，都是將正月一至七日分別與雞、狗、羊、豬、牛、馬、人相配，並據以占測吉凶。由此可見，所謂“人日”之占，在放馬灘秦簡《日書》的時代即已出現。

①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123—126頁。胡文輝：《“人日”考辨》，《中國文化》1994年第9期。又見氏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339—348頁。

② 馬建華主編：《河西簡牘》，重慶出版社，2003，9頁。

③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四庫全書》本，776頁。

④ 高承：《事物紀原》，《四庫全書》本，卷一“人日”條。

將簡文和傳世文獻比較，可以看出一些問題，這裏不妨略作分析：

傳世文獻的“人日”材料，其第三日還有占“豬”、第四日還有占“羊”的，^①與上引《京房占》、《東方朔占書》第三日占“羊”、第四日占“豬”有別。今從放馬灘秦簡《日書》第三日占“羊”、第四日占“豬”看，早期的說法應該是第三日占“羊”，第四日占“豬”。至於第三日占“豬”，第四日占“羊”，可能是後起的異說。

上引兩種傳世文獻都有占穀的第八日，但也有一些傳世文獻講到“人日”時只列有七日，而沒有提到占穀的第八日。^②在放馬灘秦簡《日書》的這支簡文中，剛好也只寫了七日。這是否表明，在早期說法中本來祇有七日，占穀的第八日是後來添加的呢？由於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的釋文和照片尚未正式公布，現在還無從判斷上面討論過的這支竹簡是否可以與別的竹簡連讀，因此，我們對上述問題暫時還不能作出明確的回答。

二、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朔”字

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釋文和照片在 1979 年即已公布^③，隨後，陸續有一些學者就其釋讀問題作過討論。^④我們在《馬王堆天文書考釋》一書中，也曾作過一些類似的工作。^⑤儘管如此，《天文氣象雜占》的釋讀問題並未完全解決。例如，最近湖南省博物館的陳松長先生用原大彩色照片對《天文氣象雜占》重新進行拼綴，發現原來的釋讀“頗多可商可補之處，特別是有好些帛書殘片尚可補進釋文和圖版之中”。為此，他還發表了一份新的《天文氣象雜占》釋文。^⑥我們在繼續研讀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過程中也有一些新的意見，這裏先將考釋“朔”字的部分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天文氣象雜占》多次提到“朔”字，現將其較為完整的四條占文抄在下面：

□星刺朔，不□。（上/4）

□□□圍□見朔，其中毋雲，寇□城；有雲，□□。（上/10）

① 胡文輝：《“人日”考辨》，《中國文化》1994 年第 9 期；又見氏著《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中山大學出版社，2000，339—348 頁。

② 同上。

③ 《中國文物》，第 1 期，文物出版社，1979，1—4 頁；又可參看《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154—160 頁（彩色照片）。

④ 顧鐵符：《夕陽芻稿》，紫禁城出版社，1988，202—231 頁。武田時昌、宮島一彥：《天文氣象雜占》，山田慶兒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譯注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昭和六十年，45—82 頁。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13—233 頁。

⑤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00—159 頁。

⑥ 陳松長：《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釋文訂補》，《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小星入朔中，其邦有大客，歲孰（熟）。朔出，數黃惡，歲孰（熟）。（中/1）
日、朔皆出於西方，天下流【血】。（中/7）^①

從四條古文看，“朔”應為某一天體之名。可是，“朔”到底是指哪一天體，却頗費斟酌。較早解釋“朔”字的意見，主要有如下兩種：

朔，《說文》“月一日始蘇也”。下文後上·10條言“見朔”，後中·1條言“小星入朔中”，後中·7條言“日朔皆出於西方”，朔當是新月的微弱的痕迹。^②

“朔”在曆法中是指朔日，這裏疑是指“月”。上列一〇、三和中列一、七各條的“朔”，也是同樣的用法。^③

我們在注釋《天文氣象雜占》時曾經認真考慮過這兩種意見，當時的看法是：第一種既無明確的訓詁根據，又在占文中不易講通；第二種雖然在占文中易於理解，但因沒有舉出訓詁根據，也難以讓人相信。所以，我們在定稿時沒有採用這兩種說法，而祇是推測“朔”可能是指新月。^④

最近，我們在翻閱睡虎地秦簡時找到了“朔”字可以訓為“月”的材料，並且發現于豪亮先生早已就此作過論述。于先生在討論睡虎地秦簡《倉律》“月食者已致稟而公使有傳食，及告歸盡月不來者，止其後朔食，而以其來日致其食。有秩吏不止”時說：

朔字本義為月朔之朔，即每月的初一，因而引申有月字之義，故月字與朔字常以義同而相轉注。《公羊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文公六年》：“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漢書·宣帝紀》：“詔曰：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蕭望之傳》引作“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凡此皆“月”與“朔”以義同而相轉注之例。故“止其後朔食”即“止其後月食”。同樣，《封診式·出子》：“今尚血出而少，非朔事也。”“朔事”即“月事”。^⑤

① 釋文及編號暫依拙著《馬王堆天文書考釋》。陳松長公布的新釋文與此有別，請參看《帛書〈天文氣象雜占〉釋文訂補》，載《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按，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準確釋文，祇有等到馬王堆帛書的全部材料公布後才能寫定，故這裏暫據舊釋。

② 顧鐵符：《夕陽舊稿》，紫禁城出版社，1988，227—228頁。

③ 武田時昌、宮島一彥：《天文氣象雜占》。山田慶兒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譯注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昭和六十年，74—75頁。此段日語的翻譯蒙本所楊振紅博士幫助，謹此致謝。

④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42頁。

⑤ 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135—136頁。

從于豪亮先生所舉的兩條秦簡和古書的訓詁、異文材料看，“朔”字訓“月”之說應屬可信。因此，上引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四條占文中的“朔”完全可以理解為“月”。也就是說，上文所引第二種解釋“朔”字的意見是正確的。至於“朔”字為何會有這種用法，于豪亮先生認為是“朔”、“月”二字因“義同而相轉注”，也很有道理。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初步研究

◎ 山東大學宗教·科學與社會問題研究所

陶 磊

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刑德小游存在較大差異，甲、乙本記載的應是兩種不同的刑德術數；所謂刑德“大游甲子表”，祇是用來標示每年太陰與德的位置，並不能用來描述刑德歲徙。

關鍵詞 馬王堆帛書 刑德 大游 小游

馬王堆帛書《刑德》是秦漢時期最重要的數術著作之一。初以為有三篇，近年陳松長先生指出丙篇與甲、乙篇的內容有較大差異，認為“還不如稱其為隸書《陰陽五行》乙篇”。^①《刑德》乙篇最先發表在《馬王堆漢墓文物》^②，後來陳松長先生又作過《校讀》和《訂補》。^③甲篇的文字，陳松長先生在《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比較研究》中已發表了部分內容。^④最近，陳松長先生將其有關馬王堆帛書《刑德》的論文匯為一冊，並同時公布了甲篇與丙篇的釋文。^⑤

陳松長先生在介紹資料的同時也對帛書《刑德》作過研究，他的《帛書〈刑德〉略說》已對《刑德》的內容作了全面介紹^⑥，《比較研究》則對《刑德》甲、乙本作了詳細比較。

① 陳松長：《帛書刑德〈丙篇〉試探》，《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② 《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

③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乙本校讀》，載《湖南省博物館四十周年紀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帛書〈刑德〉乙本釋文訂補》，載《簡牘學研究》第二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

④ 載《文物》2000年第3期，下簡稱《比較研究》。

⑤ 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該書承劉樂賢先生見示，謹致謝意。

⑥ 載《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

本文重點討論甲、乙本刑德小游的異同，並略述筆者對大游甲子表的理解。文中看法多與陳先生不同，不當之處，請陳先生並學界同好指正。

一、甲、乙本刑德小游的比較

甲本的刑德小游是這樣^①：

十一年十二月己亥上朔，刑德以其庚子（應是“庚午”之誤）并居西宮^②，丙午刑德并居南宮。壬子刑居東北宮，德復居西宮。戊午刑德并居中宮。甲子刑居東南宮，德復居西宮。庚午刑德并居西宮。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西宮。壬午刑[德并居北宮]，戊子刑[居中宮，德]居西宮。甲午刑德皆居東[宮]。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西宮。

十一年乙巳上朔刑[德]以丙午并居南宮。壬子刑居北宮，德復居南宮。戊午刑德并居中宮。甲子刑居東北，德居南。庚午刑德并居西宮。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南宮。壬午刑德皆居北宮。戊[子]刑居中柱北市，德居南宮。甲午刑德[皆]居東宮。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南宮。[丙午]刑德復居南宮。此刑德小游也。

這裏記述了兩例刑德小游情況，一是己亥上朔的刑德運行，一是乙巳上朔的刑德運行，可分別列表如下：

| 己亥上朔 | | | 乙巳上朔 | | |
|------|-----|----|------|------|----|
| | 刑 | 德 | | 刑 | 德 |
| 庚午 | 西宮 | 西宮 | 丙午 | 南宮 | 南宮 |
| 丙午 | 南宮 | 南宮 | 壬子 | 北宮 | 南宮 |
| 壬子 | 東北宮 | 西宮 | 戊午 | 中宮 | 中宮 |
| 戊午 | 中宮 | 中宮 | 甲子 | 東北宮 | 南宮 |
| 甲子 | 東南宮 | 西宮 | 庚午 | 西宮 | 西宮 |
| 庚午 | 西宮 | 西宮 | 丙子 | 西南宮 | 南宮 |
| 丙子 | 西南宮 | 西宮 | 壬午 | 北宮 | 北宮 |
| 壬午 | 北宮 | 北宮 | 戊子 | 中柱北市 | 南宮 |
| 戊子 | 中宮 | 西宮 | 甲午 | 東宮 | 東宮 |
| 甲午 | 東宮 | 東宮 | 庚子 | 西北宮 | 南宮 |
| 庚子 | 西北宮 | 西宮 | 丙午 | 南宮 | 南宮 |

① 文字據《帛書〈刑德〉甲篇釋文》（載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原文所記帛書行數省略。又，本文引《刑德》文字，並據陳氏書。

② 圓括號中是陳松長的校文，見其《比較研究》一文。

比較刑德己亥上朔與乙巳上朔的運行情況，不難發現乙巳上朔刑德的運行更有規律，即它從丙午刑德并居南宮開始，到丙午刑德并居南宮結束，嚴格遵循六十甲子的順序六日一徙，完全符合刑德小游的規律。刑德小游規則見《刑德》乙本：

刑德六日而并游也，亦各徙所不勝。刑以子游於奇，以午與德合於正，故午而合，子而離。

所謂“刑德六日而并游”，指刑德六日同時移徙。所謂“各徙所不勝”，是從五行相勝的角度講的，甲本有：“五行有六康，有十勝，有廢日，有勝日，木不勝金與火，或不勝水與土，土不勝[木與金，金不勝火與水，水不勝土與木]。”日干與五行的搭配是：東方木，日甲乙；南方火，日丙丁；中央土，日戊己；西方金，日庚辛；北方水，日壬癸。看乙巳上朔刑德運行的干支順序，正是所謂“各徙所不勝”。所謂“刑以子游於奇，以午與德合於正，故午而合，子而離”，是指刑以子日居側宮，以午日與德并居於正宮，德常居於正宮，故午日刑德合居一宮，子日刑德分處異宮。對照乙巳上朔的刑德移宮情況，完全符合這個規律。

以此規則看上引甲本文字，部分內容須作校改。己亥上朔：一、“戊子刑居中宮”，據“刑以子游於奇”及乙巳上朔之“中柱北市”，知“中宮”當為“中柱南市”之誤；二、自丙子至庚子的刑德運行，當在首句庚午刑德運行之後，這樣刑德自庚午開始到庚午結束，方符合上面的刑德運行規則。乙巳上朔：“壬子刑居北宮”、“甲子刑居東北”與規則不合，據刑德小游九宮圖^①，壬子為東北宮，甲子為東南宮，知其文字有訛脫。正確的當是壬子刑居東北宮，甲子刑居東南宮。校改後的《刑德》甲本小游的文字當作：

十一年十二月己亥上朔，刑德以其庚午并居西宮，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西宮。壬午刑德并居北宮，戊子刑居中柱南市，德居西宮。甲午刑德皆居東宮。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西宮。丙午刑德并居南宮。壬子刑居東北宮，德復居西宮。戊午刑德并居中宮。甲子刑居東南宮，德復居西宮。庚午刑德并居西宮。

十一年乙巳上朔刑德以丙午并居南宮。壬子刑居東北宮，德復居南宮。戊午刑德并居中宮。甲子刑居東南宮，德居南。庚午刑德并居西宮。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南宮。壬午刑德皆居北宮。戊子刑居中柱北市，德居南宮。甲午刑德皆居東宮。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南宮。丙午刑德復居南宮。此刑德小游也。

^① 見陳松長《比較研究》文圖三、圖四。下引九宮圖同。圖上有些錯字，可據“刑德小游九宮圖所存文字”校改，見陳松長《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133—134頁。

乙本的刑德小游是這樣：

刑德六日而并游也，亦各徙所不勝，刑以子游於奇，以午與德合於正，故午而合，子而離。戊子刑德不入中宮，徑徙東宮。戊午德入，刑不入，徑徙東南宮。

其初發也，刑起甲子，[德]起甲午，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丙午，居各六日。皆并壬午，各六日。刑德不入，徑徙甲午，各十二日。刑徙庚子，德徙庚午，各六日。皆徙丙午，各六日。刑徙壬子，德徙壬午，各六日。德徙戊午，刑不入中宮，徑徙甲子。德居中六日。徙甲午，刑[徙甲]子[十]二日。德居甲午六日，刑德皆并，復徙庚午。

末說“復徙庚午”，對照甲本刑德運行情況，知此處的刑德運行是始於庚午，止於庚午。根據刑德小游九宮圖，可將上引文中的干支換成宮位，列表如下：

| | 刑 | 德 |
|----|----------|---------|
| 初發 | | |
| 甲子 | 東南宮 | 東宮 |
| 庚午 | 西宮 | 西宮 |
| 丙子 | 西南 | 南宮 |
| 壬午 | 北宮 | 北宮 |
| 戊子 | | |
| 甲午 | 東宮 12 日 | 東宮 12 日 |
| 庚子 | 西北宮 | 西宮 |
| 丙午 | 南宮 | 南宮 |
| 壬子 | 東北宮 | 北宮 |
| 戊午 | | 中宮 |
| 甲子 | 東南宮 12 日 | 東宮 |
| 庚午 | 西宮 | 西宮 |

以其與甲本的刑德小游相比，至少有三點顯著差異：

第一，甲、乙本刑德移徙的初始宮位有所不同。甲本刑德移徙的初始宮位顯然受上朔的限制。據馬王堆帛書《式法》，“天一所居曰上朔”^①，又據《式法》“上朔表”，知六

①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式法〉釋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十甲子可以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分爲五組。甲本刑德小游的初始宮位就是上朔的五行方位，查《式法》“上朔”表，己亥五行屬金，故刑德小游從西宮庚午開始；乙巳屬火，故小游從南宮丙午開始。乙本刑德小游，比甲本多一個初發宮位，“其初發也，刑起甲子，德起甲午”，刑與德的初發宮位不一樣，並且從行文來看似不受上朔的限制，因此是固定的。也就是說，乙本的刑德小游祇有一種情況，即初發後，開始由庚午到庚午的迴圈。而甲本刑德小游，根據上朔的不同，可以有五種運行情況。

第二，甲、乙本的刑德小遊規則略有不同。甲本刑德嚴格按前述規則移徙，與其相比，乙本刑德移徙則打破了一些規律，同時確立了一些新的法則。比如，“刑不入中宮”，即當刑德運行到戊子、戊午中宮時，刑不入，徑徙下宮，德一入一不入。這就打破了刑德六日而并游的規律，出現居宮十二日的現象，同時甲本所體現的子離午合的規律也無法保證。

第三，甲、乙本的德的游徙規則有很大不同。從上面的甲本刑德小游表可以看出，甲本德的游徙似乎有一個本宮，當午日刑居正宮時，德與其合處一宮；當子日刑處側宮時，德則還居本宮。而本宮即其初始宮位，即其上朔的五行方位宮。再看乙本的刑德小游表，德的移徙顯然不存在類似於甲本的本宮，而基本是在東、西、南、北、中五宮中迴圈運行。

上述甲、乙本刑德小游間的三方面的不同，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差異，這不能不讓人對《刑德》乙本是甲本抄本的看法產生懷疑。從這些差異看，甲、乙本完全是不同的刑德小游方法，可看做兩種不同的術數。其中乙本的小游規則，當如法國M. 卡林諾斯基先生所論，與其大游規則存在著關聯^①，並且祇有這樣理解，方可正確認識其大游規則。

二、對大游甲子表與小游九宮圖的認識

陳松長先生以鉤繩圖爲刑德大游甲子表的意見，也是值得商榷的。^②甲本鉤繩圖左側有兩行乙本所無的題記：

□□□□也，黑者德也，白者□也。

[今皇]帝十一年太陰在巳，左行，歲居一辰，太陰在所，戰，弗敢攻。

陳先生認爲它們是對鉤繩圖中黑點和白點的注釋，這無疑是對的，但他進而在“白者”後面補“刑”字，認爲鉤繩圖就是刑德歲徙之圖^③，這是值得商榷的。

① M. 卡林諾斯基 (Marc Kalinowski): 《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第一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② “刑德大遊甲子表”見陳松長《比較研究》文圖五、圖六。又，“鉤繩圖”一詞係 M. 卡林諾斯基先生最早使用，見氏文《馬王堆帛書〈刑德〉試探》，《華學》第一期，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

③ 陳松長：《比較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刑德》乙本的刑德大游規則是這樣^①：

| | 德 | 刑 |
|----|----|-----|
| 甲子 | 東宮 | 東南宮 |
| 乙丑 | 西 | 西 |
| 丙寅 | 南 | 西南 |
| 丁卯 | 北 | 北 |
| 戊辰 | 中 | 東 |
| 己巳 | 東 | 東 |
| 庚午 | 西 | 西北 |
| 辛未 | 南 | 南 |
| 壬申 | 北 | 東北 |
| 癸酉 | 中 | 東南 |
| 甲戌 | 東 | 東南 |
| 乙亥 | 西 | 西 |
| 丙子 | 南 | 西南 |
| 丁丑 | 北 | 北 |
| 戊寅 | 中 | 東 |
| 己卯 | 東 | 東 |
| 庚辰 | 西 | 西北 |
| 辛巳 | 南 | 南 |
| 壬午 | 北 | 東北 |
| 癸未 | 中 | 東南 |
| 甲申 | 東 | 東南 |

這裏，刑不僅在東、西、南、北四正宮中移徙，還在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側宮中移徙，這是十二向的鉤繩圖所無法描述的，因此，此圖不能作為刑德大游用圖。退一步講，即使刑祇是在四正宮中移徙，此圖也不能描述刑德大遊。若刑在四正宮運行，第五年當居東宮，德當居中宮，案鉤繩圖，戊辰年黑點標於辰位，白點標於中心，沒有刑的標示。第六年刑在西宮同樣沒有刑的標示。事實上，刑德大游中刑不入中宮，而圖上白點却是在東

① 此刑德大游規則的來歷，參筆者《〈淮南子·天文〉研究——從數術史的角度》，齊魯書社，2003，122—128頁。

西南北中五位運行，將鉤繩圖作為與刑德大游配合使用之圖是有困難的。陳先生以為“鉤繩圖上刑的歲游在五行方位上或與太陰相重，或與德相合，而不另外再作標示”^①，這同樣不能解釋鉤繩圖與刑德歲徙間的不合，因為在第五年，鉤繩圖上黑白二點都不能表示刑的位置。

筆者以為，鉤繩圖不是刑德歲徙之圖，而是標示太陰與德的相對位置的用圖，在十二支運行的是太陰，在五正宮運行的是德。古書中的一些記載有助於我們認識這一點。

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漢書·王莽傳》）

建武三十年，純奏云：“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宮。”李賢注引《前書音義》：“蒼龍，太歲也。”（《後漢書·張純傳》）

太歲即太陰。按鉤繩圖，太陰在癸酉，德在中宮；太陰在甲寅，德在東宮。此兩條記載與鉤繩圖完全相合，足見鉤繩圖是標示德與太陰的相對位置關係的，而與刑德大游無關。

《刑德》甲、乙本中都有關於德的專門記述，是這樣：

德在土，名曰不名，四時以閉，君令不行，以此舉事，必破毀亡，雖勝有殃。

德在木，名曰招搖，以此舉事，眾心大勞，君子介而朝，小人負子以逃。

德在金，名曰清明，求將繕兵，先者□，後者亡，攻城伐邑，將禦有憂，而無後殃。

德在火，名曰不足，以此舉事，必見敗辱，利以侵邊，取地勿深，深之又（有）後殃。

德在水，名曰陰鐵，以此舉事，其行不徑，是胃（謂）不果，必毋迎德。

不名、招搖、清明、不足、陰鐵，是德在五宮時的不同名稱。這裏德的排列順序與方位與鉤繩圖上德的運行規律一致。鉤繩圖實際是與這段文字配合使用的，首先確定某年的太陰位置，然後通過鉤繩圖，可以知道德之所在，再依據這段文字判斷這一年的吉凶宜忌。所以，所謂“大游甲子表”是用來描述太陰與德的運行的，這在帛書及後來的數術實踐中都可以得到說明，我們不妨稱其為“五德終始圖”。

基於上述討論，有必要對《刑德》甲、乙本所附的兩個九宮圖的關係重作探討。陳松長先生已指出，兩本九宮圖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不同，在甲本中四個正宮都祇有‘德’

^① 陳松長：《比較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而無‘刑’，即‘甲午、德，丙午、德，庚午、德，壬午、德，戊午、德’。乙本中則‘刑德’連書，即‘甲午、刑德，丙午、刑德，庚午、刑德，壬午、刑德’”^①。陳先生根據乙本是甲本的抄本的觀點看兩圖間的差異，認為“甲本所繪九宮圖上各正宮中所注的‘德’應是‘刑德’之省，或者說是抄寫的疏漏，因此當以乙本為準，否則就與兩個本子中的文字說明無法對應”^②。但據上文討論，《刑德》甲、乙本記載的是兩種不同的刑德術數，它們所依據的九宮圖上的資訊有所不同是允許的。事實上，甲本四正宮單標“德”，正可以強調“刑以子游於奇”的特殊性，與其側重於刑德小游是符合的。乙本四正宮“刑德”連書，則意在說明此圖不僅用以描述刑德小游，還要用以描述刑德大游。

綜上所述，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的刑德小游的規則不同，說明它們是兩種不同的刑德術數。所謂“大游甲子表”不能用來描述刑德歲徙，而祇是用來標示每年太陰與德的位置。刑德大游、小游用的都是九宮圖，即陳松長先生所謂的“刑德小游九宮圖”。

① 陳松長：《比較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② 同上。

簡帛筆記二則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王志平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討論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與上博楚簡《詩論》中“氏”字的釋讀有關，包括“氏”與“侯”的通假及支、歌、侯三部的膠葛，並附帶論述了“氏”字的省略與文體嬗變的關係。第二個問題是討論尹灣漢簡《神烏賦》中“懼棟”一詞的釋讀，認為“懼棟”當讀為“懼悚”，即古籍中常見的“覈棘”。

關鍵詞 氏 侯 文體嬗變 懼棟 懼悚 覈棘

一、再論《詩論》的“氏”字

我們曾經在《〈詩論〉發微》中討論了《詩經》、《楚辭》中的“祇”字、“些”字與“兮”字。^①當時由於篇幅所限，很多問題未及展開。加之我們續有所見，這裏再詳盡地談談《詩論》中的“氏”字。

我們曾經談到過，《詩論》中“其儀一氏”的“氏”字與“祇”、“些”、“兮”等字的讀音都很接近，當然最接近的還是“祇”字。那篇文章也重點探討了“氏”、“兮”之間的通假關係。

現在看來，“氏”字不僅可以轉為以上這些字，它還可以讀為“侯”字。《潛夫論·

^① 王志平：《〈詩論〉發微》，《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60—65頁。

論榮》：“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而《漢書·敘傳上》說：“賁又不聞蘇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滅於蚌蛤虻？”又，《管子·輕重乙》：“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前其國亡而身無所處。”而《左傳·莊公四年》說：“紀侯大去其國。”有趣的是，“兮”字也可以假借為“侯”。《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禕而’者是也。‘兮’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①《漢書·禮樂志》引《房中歌》“皇皇鴻明，蕩侯休德”，王先謙《補注》以為即“蕩兮”。楊樹達《〈詩〉“宣侯多藏”解》以為《小雅·十月之交》“宣侯多藏”和《大雅·下武》“應侯多順德”之“侯”亦“兮”字。^②可見“氏”、“兮”、“侯”諸字出入支、歌、侯三部。

下面我們詳細論證一下“氏”、“兮”、“侯”諸字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歌、侯兩部的關係。《呂氏春秋·觀表》：“今侯渫過而弗辭。”注：“侯，何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文）：“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注：“侯，何也。”《戰國策·秦策三》“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漢帛書本“何”作“侯”。張衡《東京賦》：“侯其禕而！”“侯其”即“何其”。是“侯”通歌部之“何”。馬王堆甲乙本“兮”作“呵”，與“何”同從“可”聲。

《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注：“故書趨作跲。鄭司農云：跲當為趨，書亦或為趨。”《漢書·禮樂志》：“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顏師古注：“趨讀曰趣。趣，嚮也。”而《食貨志》作：“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趣”、“趨”並為清母侯部字，通支、歌部之“跲”、“趨”。而從“多”得聲之字頗與“氏”字相通假。^③

又“氏”與“族”為同源詞，“氏”為章母支部字，另有精母一讀。而“族”為从母屋部字。杜預《春秋釋例》卷二《氏族例第八》：“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謂之族。”《戰國策·秦策二》：“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注：“費，邑名也。名，字。族，姓。”《呂氏春秋·異實》：“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高誘注：“族，姓。”此處之“族”即指“氏”。“族”是屋部（侯部入聲）字，與支部之“氏”為同源詞。

① 參見饒宗頤《三侯之章考》，收入《固庵文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89—90頁。

②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中華書局，1983，208—209頁。

③ 王志平：《〈詩論〉發微》，《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64頁。

總之，瞭解“氏”、“兮”、“侯”諸字之間的關係，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諸字的文學作用有很大裨益。我們在《〈詩論〉發微》中談到“兮”字等的省略問題，其中也舉了一些例子。^①這裏再補充一些例子。首先以荀況的《俛詩》為例。

因為賦曰：琬玉璫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姁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察焉。（《韓詩外傳》卷四）

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褱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姁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察也。（《戰國策·楚策四》）

琬玉璫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姁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刁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荀子·賦篇》引《俛詩》）

有趣的是這三種文獻，一種句末無“兮”，與下句相連，作“相辭”體；一種有“兮”，作“楚辭”體；一種作“也”，為“散辭”體。可見，有無“兮”字等并非區分歌詩體裁的關鍵。

又如，東方朔《七諫·謬諫》：“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而《鹽鐵論·相刺》作：“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也沒有“兮”字。

對此，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在《漢高祖的〈大風歌〉》中也曾指出：

更細微的差異，是此行或作“安得猛士守四方”。漏引了一個“兮”字。第一例是陳壽的《三國志·蔣濟傳》，其中載有蔣濟不想赴東中郎將任時魏文帝給他的一道詔書。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

第二例是《文選·辨命論》所附唐李善注：“《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同樣漏引了“兮”字。雖說根據上文所引司馬貞關於三侯之章的說明，“兮”字在這首詩裏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本來也不過是輔助性的語辭而已，因為隨便引用，所以就省略了。

另一件與此有關的事，是《文選》把這首歌注為“七言”。我認為此注在原本《文選》

① 王志平：《〈詩論〉發微》，《華學》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3，64—65頁。

中即已存在。九條道秀氏所藏的平安朝寫本是原本《文選》在我國的唯一傳本，其中卷十四末登載這首歌的地方注有“七言并序”四字。也就是說，《文選》的編者決定把這首歌作為七言詩來處理，但這樣，就忽視了三個“兮”字，要讀作：

大風起，雲飛揚，

威加海內歸故鄉。

安得猛士守四方！

不管怎麼說，上面所說的都不是什麼大的差別。^①

按照吉川先生的說法，九條道秀所藏的平安朝寫本《文選》作“七言并序”，依此讀法，“大風起，雲飛揚，威加海內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正是典型的相辭體。從中不難看出文體嬗變的痕迹。

出土文獻中也不乏其例。敦煌漢簡 2253 有《風雨詩》簡：“日不顯目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從（縱）恣蒙水誠（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轉揚波。辟（壁）柱槓到（顛倒）忘（妄）相加，天門狹（狹）小路彭池（滂沱），無因以上如之何，興章教海（誨）兮誠難過。”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自序·序四》中說：

漢人古詩，大抵闕名。蘇、李《贈答》，《十九首》，《柏梁》諸作，久滋疑喙。微論主名難恃，即體制亦異。漢時除《樂府》外，概承《楚辭》之後，發為楚聲。此詩八句四“兮”字，若將“兮”字盡行除去，即為七言古詩。若補上四“兮”字，每句即皆為“楚辭”。今或有或無，初無憑準，蓋時當古辭與古詩遞嬗之際，故獨存此蛻化之遺迹。

所言極為允當。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簡論》也曾指出：

我們還注意到，《阜詩》的詩句中使用虛詞每每比《毛詩》要少，如《騶虞》，《毛詩》“於嗟乎騶虞”一句，阜詩就沒有“乎”字。據此，我們推測《阜詩》殘簡所記某些詩篇的字數（有篇名，無字句）與今本《毛詩》之不同，就在於虛詞的減少。如《野有死麕》，《毛詩》共四十七字，《阜詩》記有四十四字。這首詩的前兩章都是整齊的四字句，惟獨第三章有三個虛詞。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想來大概是《毛詩》第三章的這三個虛詞為《阜詩》所無，所以《阜詩》比《毛詩》

① [日]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52—53 頁。

少了三個字。又如《日月》，《毛詩》九十九字，《阜詩》九十六字，當是《毛詩》第一、二、三章“乃如之人兮”一句中的三個“兮”為《阜詩》所無。《阜詩》較《毛詩》少了這些語詞之後，這幾首詩（《騶虞》、《野有死麕》、《日月》）都成了工整的四字句。這種情形，使我們想到，《詩經》的語詞與記錄者、吟詠者、整理者關係甚密。由於習《詩》者的師承、方言及語言習慣的不同，各家所用語詞也各有不同。^①

其實，很多學者早就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對此問題都作過一定的研究。逯欽立《漢詩別錄》就曾指出：

《漢書·郊祀歌·天門篇》，有云：

蟠比玳回集，貳雙飛常羊。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

欽立案此四句本《楚辭》一類之歌，據王先謙《漢書補注》原歌應作：

蟠比玳兮回集，貳雙飛兮常羊。假清風兮軋忽，激長至兮重觴。

而《漢書》刪其兮字，強使此歌變為五言，如“蟠比玳回集，激長至重觴”，若作五言詩誦之，將乖違文義，而全不可通。^②

又：

欽立案《思玄》之《系》，《笛賦》之《辭》，均在篇末為結音，其即《楚辭》之《亂》，自不待言。又張、馬兩賦，其本辭，仍以含兮之舊體出之，獨於此《亂》，去其兮字而變為七言，是此《亂》必有可去兮字之先例或習慣，使之如此。^③

又：

夫楚《亂》艾“兮”，既可變為七言，而漢人楚歌，適有艾削兮字之習，以及七言代替亂辭之例，其《風雨詩簡》且自示楚《亂》七言嬗變之迹。然則吾人以以上四事，歷證七言變自獨立成章之楚《亂》，固可謂信而有征也夫？讀者三復，當自知也。^④

湯炳正在《楚辭類稿·屈賦與〈詩經〉》中說：“我認為這種‘兮’字的多少，在很大

①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6—27頁。

② 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58頁。

③ 同上，76頁。

④ 同上，78頁。

程度上取決於由口頭歌謠變為書面歌謠時，記錄整理者對泛聲‘兮’字的處理程度。即有時把口頭上的‘兮’字多保留幾個，有時則索性全部簡刪。前者就近於所謂楚歌，而後者則近於所謂北歌。故以“兮”字多少來區分南北歌謠，是很不全面的。”^①

與諸家不同的是，湯先生不是把泛聲“兮”的多少視為時代因素，而是看成地域因素。其實，這些差異不如視為整理時是否忠實於口語形成的區別。古代言文也并不一致，尚文則無“兮”等字，尚言則有“兮”等字。這與我們在《〈詩論〉發微》中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一致的。

對於“相辭”的句式，大翻譯家楊憲益先生認為其與數來寶或蓮花落相同，他在《〈逸周書·周祝篇、太子晉篇〉和〈荀子·成相篇〉》一文中引《周祝篇》“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等後云：《周祝篇》全篇用韻；朗誦起來，它給人的印象與通俗的蓮花落或花鼓相同。顯然的，當古代人朗誦這篇東西的時候，他們也必用著簡單的敲擊樂器，如小鼓和響板之類。古代的“祝”大概也就是唱數來寶或蓮花落的職業樂人。^②

楊先生所說，大致近理。至於“相”為何種樂器，歷來解說頗繁，本文暫不涉及。但是“相辭”的形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其與民間文藝的關係不容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獻談到，這種泛聲“兮”字等與“楚巫”之間有密切關係。《太平御覽》卷五六六《樂部四·歷代樂》引《呂氏春秋》：“宋之衰也，作為十秩（原注：鍾律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些音。”而今本《呂氏春秋·侈樂》：“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高誘注：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高誘注：女曰巫）。”一作“些音”，一作“巫音”，可見其密切關係。據說，現今彝族巫師咒詞中仍然有與古代的“兮”、“些”等相近的歌詞。周振鶴、游汝傑在《方言與中國文化》中寫道：“現代彝族巫師的咒詞和彝民的歌詞每兩句後都有‘啊——梭——只’三個墊襯的音節。其中的‘啊’和‘梭’有可能跟楚辭中的‘兮’和‘些’是同源的。‘兮’的古音據聞一多的考證也是‘啊’。”^③下面是兩段彝巫咒詞和彝民歌詞。

咒詞：人畜清吉求葫蘆（即求祖靈葫蘆默佑），五穀豐收

祈土主（土主指南詔王細奴邏）。啊——梭——只！

歌詞：兩個斑鳩訴苦情，

① 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73頁。

② 楊憲益：《譯餘偶拾》，三聯書店，1983，95頁。

③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83頁。

滿肚苦水吐不清。

啊——梭——只！^①

究竟是否如此，那就需要民族學學者的深入調查了。

二、《神鳥賦》“懼悚”解

尹灣漢簡《神鳥賦》：“絕繫有餘，紉樹懼悚。”裘錫圭先生讀為“跼蹐”^②，筆者以前讀為“拘束”^③，恐怕均不妥當。疑當讀為“懼悚”、“懼竦”、“懼聳”等。“懼”、“懼”同从“瞿”聲，同為群母魚部字。“悚”、“竦”同从“束”聲，“悚”為心母屋部字，“悚”、“竦”、“聳”同為心母東部字，與“悚”字為嚴格的陽入對轉關係。《玉篇》：“悚，懼也。”其本字當作“慄”或“慄”。《說文·心部》：“慄，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駟氏慄。’”又：“慄，驚也。从心，從聲，讀若悚。”二字并音“息拱切”。字又作“竦”。《爾雅·釋詁》：“竦，懼也。”《詩·商頌·長髮》“不懋不竦。”《傳》：“懋，恐。竦，懼也。”《左傳·昭公六年》：“聳之以行。”注：“聳，懼也。”《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王符《潛夫論·慎微》：“人君聞此，可以悚懼，布衣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又作“竦懼”。《韓非子·主道》：“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也作“聳懼”。《左傳·成公十四年》：“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悚懼”、“竦懼”、“聳懼”也作“懼悚”等應是同義駢詞詞序不固定的表現。宋代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三七三《諷諭一·林簡言〈紀鴉鳴〉》：“隣有善作鴉鳴者，每伺宵晦，輒登樹鴉鳴。凡側於樹，若小若大，莫不凜然懼悚，以為鬼物之在槐也，不日而至也。”類似的文例還有一些，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時代較早的用例。

那么時代較早的用例是否不存在呢？并非如此。我們認為這些用例是以其他的異文通假形式存在著，這就是大家熟悉的“覘觫”一詞。《孟子·梁惠王上》：“吾不忍其覘觫。”趙岐《注》：“覘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陸德明《音義》：“丁斛速二音，恐貌。”楊慎《丹鉛餘錄·總錄》卷十三《覘觫》：“《孟子》‘吾不忍其覘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覘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从覘省。覘而角之，是斛也。覘字義兼聲，角

① 劉堯漢：《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0，226—227頁。

② 裘錫圭：《〈神鳥賦〉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

③ 王志平：《〈神鳥傳（賦）〉與漢代詩經學》附錄，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14頁。

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鼎食也。俗作鯨。牛之恐懼當作穀鯨。穀从豕尾，懼之貌。鯨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可通。”看來楊慎還沒有破除字形的束縛，對其詞源也很懵懂。《說文·角部》：“穀，盛饌厄也。一曰射具。从角穀聲。讀若斛。”從古文字來看，這是正確的。古文字中表示量詞的“斛”即从“害”聲^①。可見“穀”字有見系一讀。傳世文獻中也頗有其例。《廣雅·釋詁》：“殞，死也。”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三下《釋詁》：“考《廣韻》云：‘殞，死貌。出《廣雅》。’……殞，死貌。’《玉篇》：‘殞，死貌。’《孟子·梁惠王上》‘吾不忍其殞，若無罪而就死地。’義與殞同。”“殞”从“角”聲，“角”亦爲見母屋部字。是其證。

“穀”、“斛”兩字均爲匣母屋部字。《周禮·考工記·陶人》：“實五穀。”鄭注：“鄭司農云：穀讀爲斛。”此殆爲楊慎所本。“穀”爲匣母屋部字。“懼”、“懼”爲群母魚部字。我們前面已經論證過，“穀”字確有見系字一讀，與群母讀音接近。從韻部上說，“懼”、“懼”雖然是魚部字，但是从“瞿”之字經常與侯部字相通假。《說文》：“瞿讀若章句之句。”又：“𠂔讀若拘。”又：“𠂔讀若劬。”《周禮·考工記》：“鸛鵒不踰濟。”《淮南子·原道》作“鸛鵒”，《說文·鳥部》同。《山海經·中山經》：“其鳥多鸛鵒。”郭注：“鸛鵒也。《傳》曰：‘鸛鵒來朝。’”^②而“句”、“設”音近。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人部》“拘，拘督也”下注云：“拘音寇，督音茂。疊韻字，二字多有或體。《子部》‘殺’下作‘殺督’，《荀卿·儒效》作‘溝督’，《漢·五行志》作‘區霧’，又作‘備霧’。《楚辭·九辨》作‘恂愁’。《玉篇》引作‘恂愁’。應劭注《漢書》作‘設霧’。郭景純注《山海經》作‘殺督’。其音同，其義皆謂愚蒙也。”又《詩經·大雅·行葦》：“敦弓既句。”《釋文》：“句，《說文》作穀。”是其證。因此从“瞿”之字與侯部的入聲屋部字相通假也就并不奇怪了。^③可以說，“懼”、“懼”讀為“穀”，在字音上没有什么問題。

“棟”字从木“束”聲，在《廣韻·屋韻》中與“殞”之“殞”同音“桑谷切”，與“殞”、“鯨”等聲旁相同，同爲心母屋部字，可以通假。它們與同聲旁的心母東部的“棟”、“棟”、“簞”等字在音韻上也有密切關係。

依趙岐《注》及陸德明《音義》，“穀鯨”是恐懼之義，本來訓詁極明。但是前人未能擺脫字形束縛，多不得正解。黃生《義府》卷上《穀鯨》：“《孟子》：吾不忍其穀鯨。二字俱從角。《注》：恐懼貌。無義，此以意爲訓耳。疑穀鯨，角新生貌。此牛必犢子，故齊

① 朱德熙：《戰國記容銅器刻辭考釋四篇》，《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24—25頁。

② 參見高亨《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874頁。

③ 裘錫圭：《〈神鳥賦〉初探》注34指出：“以上六句句末之字中，‘取’、‘柱’、‘去’、‘處’、‘餘’是魚部字（‘取’、‘柱’由侯部轉入），‘棟’是屋部字，似可看作魚、屋合韻。”此說甚是，可以佐證《神鳥賦》時代魚、屋兩部之間的密切關係。”

王謂其無罪就死地也。(唐皎然詩：門前便使鰐鯨來，徑以二字目牛，得其解矣。)”其解近乎臆說。而楊慎以爲“鰐鯨”是“體縮恐懼”之義，將“鰐鯨”與“穀穀”、“繫繫”諸詞等量齊觀，曠若發蒙。蓋牛之“鰐鯨”，係因“恐懼”而“體縮”，“恐懼”是基本語義，其詞源與“懼悚”有密切關係。而“體縮”則是由語境關係所引申出來的新義。“繫”即“穀”字。《廣韻》中有三個讀音，《屋韻》“丁木切”、“呼木切”，《覺韻》“蒲角切”。

《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難字》：“斗擻，繫繫也。江南言斗擻，北人言繫繫。”“斗擻”即“抖擻”等，^①也即哆嗦。“繫繫”或作“穀穀”，《廣韻·屋韻》：“穀穀，動物。穀，丁木切。”“穀”字古音當爲匣母屋部字，與“鰐”讀音相同。“繫”、“鯨”同從“束”得聲，“繫繫”也即“鰐鯨”。至於“穀”字的“丁木切”一讀，我們懷疑是在“繫繫”用爲“抖擻”義時，產生了同義換讀現象。至於是否如此，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總之，我們把“紈樹懼悚”讀爲“紈樹懼悚”、“紈樹鰐鯨”。“紈”讀爲“綰”^②，是指打結纏繞。“絕繫有餘，紈樹懼悚”是指雌鳥身上的斷絲繫得很長，雌鳥只能纏繞在樹上恐懼發抖。如此解釋可以更加突出雌鳥的恐懼無助之感，視以前諸解似要略勝一籌。

① 參見朱起鳳《辭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03頁。

② 王志平：《〈神鳥傳（賦）〉與漢代詩經學》附錄，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14頁。

里耶秦簡“陽陵卒”簡蠡測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宋艷萍

◎ 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邢學敏

內容提要 《文物》2003年第1期和《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分別公布了里耶秦簡中的30餘枚簡牘，其中12枚涉及陽陵卒。陽陵卒都有貨錢或贖錢問題。遷陵是秦朝中西部一軍事重鎮，與越人居住區雜處或臨近，承擔著防範越人反抗及向周邊各郡輸送甲兵的軍事任務，陽陵卒可能是政府出於軍事目的而被遣戍到遷陵的。因貨和贖在秦代都與犯罪有關，所以這些陽陵卒的身份有可能是居貨和居贖。筆者還以陽陵卒簡為依托，探討了秦代對貨錢和贖錢的管理措施及索債的相關流程。

關鍵詞 里耶秦簡 陽陵卒 貨錢 贖錢

2002年5月至6月，在湖南省龍山縣里耶鎮里耶戰國古城一號井中，出土了大批文物，最受人關注的是其中的36000餘枚簡牘。《文物》2003年第1期發表了《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下文簡稱《簡報》），《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發表了《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下文簡稱《選釋》），分別公布了其中的30餘枚簡牘。在所公布的里耶秦簡中，關於陽陵卒戍遷陵的簡占的篇幅最大、內容也最詳盡，竟有12枚簡之多。這些簡大同小異，現舉一例以茲說明（以下關於里耶秦簡的引文都引自《簡報》）。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陽陵孝里士五（伍）衷有貲錢千三百卅四（第1行）衷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爲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衷署所（第2行）縣責以受（授）陽陵司空（司空）^①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已訾責其（第3行）家（家）貧弗能入乃移戍所報署主責發敢言之（第4行）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廚敢言之寫上謁報（報）署金布發，敢言之/僇手（第5行）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甲午陽陵守丞欣敢言之至今未報謁追敢言之/堪手（第6行）

J1⑨4 正面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假）尉鱣謂遷陵丞（第1行）陽陵卒署遷陵以律令從事報之/嘉手（第2行）以洞庭司馬印行事（第3行）卅三[反印它簡文字]（第4行）敬手（第5行）

J1⑨4 背面

這是一枚關於債務的公文簡，事件發生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四月六日，簡文的大體內容爲：陽陵縣孝里鄉的士五衷欠有貲錢 1344，衷在洞庭郡戍守，但不知具體在何縣，陽陵縣已經向他家索債，但他家因貧困無力交付。於是司空騰發送給洞庭尉一個錢校券，讓衷所戍守的縣代爲索債。此事過了一年，洞庭郡仍沒有答復，於是陽陵縣不得不又去追問。洞庭郡查明陽陵卒戍守於遷陵縣，便於秦始皇三十五年四月八日，下令遷陵丞按照律令處理此事。

《選釋》在標點簡文時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一句，作者這樣標點：“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上計在秦漢時期是一項重要制度，地方官吏於歲末把一年中經濟、治安等方面的情況向中央彙報。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專門負責上計的官吏，高敏先生認爲：“主管記帳的官吏，早在秦國就已經出現了專有名稱，總稱謂之‘計’或‘計者’，也叫‘官計’。”^②他認爲“官計”是一專有名詞，是記賬官吏的總稱。馬怡先生在《里耶秦簡選校》^③一文中指出：“‘官計’，官府會計。”并舉出例證：《睡虎地秦簡·效律》中曰：“司馬令史掾苑計，計有効，司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計効然。”筆者亦以爲然，在其他文獻中我們也可找出相關例證，《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④大宰以八法治理官府，其中第八法便是官計。西夏開國皇帝元昊建國後仿宋官制設立文武兩班朝官，中央政府機構中有官計司一職，職掌官吏人事調補。“官計”應當是一專有名詞，所以在“官計”和付署之間斷

① 原簡“司空”爲重名號，所以《簡報》加括弧不恰當。

② 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頁。

③ 此文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刊》第5期。

④ 《周禮正義》第一冊，中華書局，1987，62頁。

句爲好。馬怡先生在《里耶秦簡校注》中對前述簡文斷句爲“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爲報。”^①筆者比較贊同她的觀點。

另外，《選釋》把“陽陵卒署”作爲一個名詞和“遷陵丞”相并列，作者認爲“卒署”是“縣署中負責某一類事務的職官”，其實這裏在理解上有些不妥。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重新審視這批簡文，就會得出不同結論。我們首先對“署”加以辨析，《說文解字》對其解釋爲：“部署有所網”，讓人看後感到不甚明白，徐鍇進一步詮釋曰：“署置之言網羅之若罟網也”。徐鍇解釋亦不很明瞭，大概和軍事防禦有關。《睡虎地秦簡·法律雜抄》“戍者城及補城，令姑（嫗）堵一歲，所城有壞者，縣司空署君子將者，貲各一甲；縣司空佐主將者，貲一盾。令戍者勉補繕城，署勿令爲它事；已補，乃令增塞埤塞。”整理小組加以釋譯曰：“服邊戍者築城和修城，都要叫他們擔保城垣一年，所築如有毀壞，率領戍者的縣司空署君子各罰一甲；主管率領的縣司空佐罰一盾。要命服邊戍者全力修城，所屬地段不得叫他們做其他事務；城已修好，就令他們把要害處加高加厚。”他們把“署勿令爲它事”的“署”對譯爲“所屬地段”^②，即戍邊者所戍守的地段。在此，戍邊者的主要任務是築城和修城，然後是加固要塞，這些都帶有明顯的軍事目的。李學勤先生認爲“署”是“防地”^③的意思。簡文正面說陽陵卒戍洞庭郡，不知何縣署，背面應當是查明了陽陵卒署哪個縣，從簡文看是在遷陵縣，所以洞庭郡下達文書給遷陵縣，指明陽陵卒署遷陵，這才符合公文的格式，所以 J1⑨4 背面這樣斷句爲好：“洞庭段（假）尉繡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以律令從事。報之。”如果這樣斷句，陽陵卒署就不再是一個名詞。這一點其他學者也已經指出，李學勤先生在《初讀里耶秦簡》一文中雖然沒對這一錯誤進行剖析，但他是這樣標點簡文的：“洞庭段（假）尉繡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④，顯然他不認爲陽陵卒署是個名詞。胡平生先生在《讀里耶秦簡札記》^⑤一文中也持同樣看法，馬怡先生在《里耶秦簡選校》中亦與此同。

這條簡中衷的經濟問題是有貲錢，而另一簡則是關於贖錢問題：

卅三年三月辛未朔戊戌司空騰敢言之陽陵仁陽士五（伍）額有贖錢七千六百八十額戍洞庭郡不智（知）何縣署。今爲錢校券一上謁言洞庭尉令額署所縣受責以受（授）陽陵司空（司空）不名計問何縣官計付署計年名爲報已訾責額家（家）貧弗能入額有流辭弗服勿聽道遠毋環書報署主責發敢言之

① 《周禮正義》第一冊，62 頁。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90 頁。

③ 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 年第 1 期，79 頁。

④ 《古史文存·秦漢魏晉南北朝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76 頁。

⑤ 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簡牘學研究》第四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8 頁。

四月壬寅陽陵守丞恬敢言之寫上謁報署金布發敢言之/堪手

J1⑨9 正面

卅四年八月癸巳朔（朔）日陽陵逖敢言之至今未報謁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鵬謂遷陵丞陽陵卒署遷陵其以律令從事報之當騰

（騰）/嘉手·以洞庭司馬印行事

敬手

J1⑨9 背面

關於陽陵卒的 12 枚簡中，11 人有賞錢問題，1 人有贖錢問題。在有賞錢者中，有兩者又有所不同，J1⑨1 正提到：“陽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賞餘錢八千六十四”，有賞餘錢，說明事主毋死在陽陵時已償還一部分賞錢，但因家貧實在無力償還，所以還遺留 8064 錢。簡 J1⑨3 正“陽陵下里士五不識有賞餘錢千七百廿八”也是同一道理。

陽陵卒為何來到遷陵？他們的身份是什麼？他們到遷陵與他們欠有賞錢贖錢有什麼關係？官府如何處置他們所欠賞錢和贖錢？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

里耶秦簡最大的亮點是“洞庭郡”這一名詞的出現。《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初并天下（秦始皇二十九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集解》詮釋這三十六郡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以及內史。此後秦朝勢力發展到南方，又先後設立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史記》所載並沒出現洞庭郡這一郡名，在《漢書·地理志》中也無提及，縱覽其他傳統文獻也無此郡名。

在所公布的 30 餘枚里耶秦簡中，年代最早的簡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而與洞庭郡有關的簡最早發生時間是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如下簡：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谷屬尉令曰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貲贖責（債）急事不可留乃興繇（徭）·今洞庭兵^①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貲贖責司寇隱官踐更縣者（按：下文略去）

J1⑩5 正面

① 從下文“輸甲兵”看，這裏的“兵”當指兵器。

這是由洞庭郡下發的文書，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已經存在，說明它的設立時間應在此之前。此外，此簡還出現了“蒼梧”，它與內史、巴、南郡等郡名并列，應當也是一郡名，而傳統文獻中秦代並無蒼梧郡，《漢書·地理志》注認為蒼梧郡是在“武帝元鼎六年開”，從里耶秦簡上述簡文看顯然這是不對的，至少到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之前蒼梧郡已經設立了。既然洞庭郡和蒼梧郡都有可能是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統一之初設立，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史記》《集解》所述三十六郡的真偽。退一步說，假如傳統文獻記載秦初設立的三十六郡無誤，洞庭郡和蒼梧郡應當在這些郡設立之後很快設立。

里耶秦簡的出土地在秦朝稱為遷陵，它在當時是一個縣級城市。從上引簡文分析，洞庭郡把文書發送到它轄區的各個縣中，其中包括遷陵，不僅此簡，在所公布的30餘枚里耶秦簡中，洞庭郡下發給遷陵的文書就有15枚之多，看來遷陵當屬洞庭郡無疑。遷陵屬於洞庭郡，這一點已被學者論證^①，在此不再贅述。洞庭郡顧名思義應當與洞庭湖有關，其郡址應在洞庭湖附近，洞庭郡應當包括洞庭湖向西一直到遷陵的廣大地區。洞庭湖在《史記》《集解》所述秦初三十六郡中是屬於長沙郡的^②，而遷陵屬於黔中郡^③，這樣，洞庭郡應和開始所設長沙郡及黔中郡所轄有相重合之處。由於資料匱乏，我們無法窺知在秦代這些政區的變動情況，甚為抱憾。從上面所引里耶秦簡J1④ 5正面中提到，洞庭郡把甲兵傳送到內史及巴、南郡、蒼梧等地，甲兵是當時主要的戰略物資，從此看，整個洞庭郡是秦朝中西部重要的軍事物資供應基地。

遷陵在戰國時期屬於楚國，甚至到漢代還被稱為楚地，“楚地，翼、軫之分壑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④。在漢代遷陵隸屬武陵郡，屬於楚地風俗區^⑤。里耶出土的文物中保存著濃厚的楚地文化特色，在一號井的第5層還發現了幾枚戰國楚竹簡。遷陵原屬黔中郡在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80）就被秦吞并了，這裡便成為秦向南進發的軍事基地。遷陵所處地理位置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從地圖上看，遷陵位於沅水主要支流酉水岸邊，而沅水流經洞庭湖，從遷陵到洞庭郡的水陸交通非常方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發表的《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一文中通過援引傳統文獻，證明了里耶（秦代為遷陵）在當時軍事地位的重要性，論述很是精到^⑥。

里耶秦簡中涉及“幫（裙）直”的幾支簡值得注意，如：

① 如李學勤先生在《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76頁）中指出“秦朝廷—洞庭郡—遷陵縣三級的隸屬關係”。

② 參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中華地圖學社出版，1975，7—8頁。

③ 同上。

④ 《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1665頁。

⑤ 周振鶴：《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124頁。

⑥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考古》2003年第7期，15頁。作者指出里耶的“地理特點，使里耶在戰國時期成為秦、楚對峙的前沿和軍事要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內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書舉事可爲恒程者洞庭上幫（裙）直
書到言今書已到敢言之

J1⑧152 正面

這裏的“幫（裙）”指的是什麼？李學勤先生認爲“應即一種軍服”^①，這種觀點很有道理，因爲國家對這種服裝價格如此重視，必然不會是平民百姓的普通衣服，而是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而在當時戰爭還沒有消弭的情況下，軍備建設非常重要，軍人的衣食住行便是必須解決的問題，由國家規定軍服的價格、形制并固定爲制度（恒程）是很有必要的。陝西臨潼出土的兵馬俑，其下半身衣服很像現代人穿的筒裙，不知在當時是不是叫做“裙”？遷陵乃至整個洞庭郡對外傳送的“甲兵”是不是也包括這種軍服呢？

遷陵還擁有自己的武器庫，這一點從里耶秦簡中可資證明：

遷陵已計卅四年餘見（現）弩臂百六十九凡百六十九出弩臂四輪益陽出弩臂三輪臨沅
凡出七今八月見（現）弩臂百六十二

J⑧147

這大概是秦始皇三十五年遷陵武器庫登記簿清單，記載了三十四年的弩臂數、這一年中弩臂輸出地點及數量、剩餘的弩臂數，記錄詳細而準確。弩是遠射武器，具有很強的殺傷力，在當時是戰爭中主要的武器之一，弩臂是其重要組成部份。遷陵縣將這些物資調撥到其他地方，可能出於軍事上的需要。在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的遺物中，出土大量兵器，有矛和鏃，銅鏃數量較多，均爲三棱形薄翼，鏃尖和翼鋒利。這些兵器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和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坑出土的銅鏃相比也不遜色。擁有弩及銅鏃等精良武器，充分證明遷陵是秦朝中西部的軍事重鎮。

南方越人是秦朝鬥爭的主要對象，雙方爲爭奪領地進行了多次迂回戰爭，秦朝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曰：“秦皇……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越人）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秦朝動用五十萬兵卒，在五個重要據點駐扎，此後又陸續增調戍卒把守這些據點。五個據點分別是鐔城、九疑、番禺、南野和餘干。鐔城屬於象郡，九疑屬於長沙郡，番禺屬於南海郡，南野和餘干屬於九江郡，除南海郡外，其他都與洞庭郡相毗鄰，可知洞庭郡爲當時防範越人的大本營無疑。遷陵處於洞庭郡轄下，自然也承擔起這一軍事重任，這一點從里耶秦簡亦可找到證據。

① 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78頁。

鞠之越人以城邑反蠻害弗智

J1 ⑫ 10 正面

廿六年六月癸丑遷陵拔訊猿蠻

J1 ⑫ 10 背面

越人以城邑反，自然要加以鎮壓。這裏的蠻、袁可能是負責越人事宜的官吏，他們沒能及時察覺屬於失職，所以要對他們加以審訊。此簡證明遷陵與越人居住區雜處或者鄰近，鎮壓越人反抗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里耶秦簡中的陽陵卒可能是秦政府為防範越人而被徵調到遷陵戍守的。

里耶陽陵卒簡所起年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對越戰爭已推進到南部地區，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①這是發生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的重大歷史事件：秦政府發兵攻取嶺南地區，在此設立桂林、象郡及南海三郡，并向此大規模遣戍。關於“以適遣戍”，《集解》解釋道：“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若此無誤，則這次遣戍人數多達五十萬人。五嶺為何地？《正義》引《廣州記》解釋曰：“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

《正義》認為五嶺是指五個軍事要塞。這一注釋成為史家注釋五嶺的範本，《漢書·地理志》及《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在注釋五嶺時都是如此。《後漢書·吳延史盧趙列傳》注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從秦代地圖看，衡山郡西南和長沙郡及南郡毗鄰，和洞庭湖相隔不遠。五十萬戍卒遣戍五嶺，不一定光集中在大庾五地，極有可能也被分配到其他重要軍事要點，遷陵是秦朝中西部一軍事重鎮，陽陵卒便有可能是在這次大規模遣戍中被徵調到遷陵的。

三

貲和贖在秦代意味著什麼？《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金布律》中有這樣一條律令：

“有責（債）於公及貲、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整理小組把貲解釋為“有罪而被罰令繳納財物”，把贖解釋為“繳納財物去贖死刑或肉刑等罪”，我贊同整理小組的解釋。

《說文解字》對貲解釋曰：“小罰以財自贖也。”高敏先生在《秦漢史探討》中指出：“在雲夢秦簡中，‘貲’是對社會罪犯的懲罰方式之一，犯有這種罪行的人叫‘貲罪’，詳見秦簡《法律答問》，故‘貲’是有罪被罰之意。但隨著所犯罪的輕重和性質的不同，‘貲’的內容與數量也有差異。有罰出實物和折款的，謂之‘貲一盾’、‘貲一甲’或‘貲二

① 《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82，253頁。

盾’、‘貲二甲’；有罰出錢幣的，如‘貲布’，詳見秦簡《法律答問》，也有罰戍邊的，叫‘貲戍’。還有罰無償勞役的，叫‘貲徭’。”^①貲罪在秦代是獨立的犯罪科目，如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提到：

捕貲罪，即端以劍及兵刃刺殺之，可（何）論？殺之，完爲城旦；傷之，耐爲隸臣。

貲罪包括罰款、罰物和罰勞役三種形式，三者睡虎地秦簡中都能找到例證。陽陵卒有貲錢問題，他們屬於“貲罪”中的罰款類。

貲盾、貲甲在秦初非常普遍，如《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效》規定：“公器不久刻者，官嗇夫貲一盾。”貲一盾就是罰一盾的意思，再如《秦律雜抄》中“任法（廢）官者爲吏，貲二甲”、“爲（僞）聽命書，法（廢）弗行，耐爲侯（候）；不辟（避）席立，貲二甲，法（廢）”。爲什麼秦初會有那么多貲甲、貲盾現象，前人已多有論述^②，在此不再贅述。關於所貲甲和盾繳納的方式，學者們爭論很大，有人認爲是繳納實物^③，有人認爲是折合成錢^④。在統一戰爭前後，貲實物可能性比較大。布在秦漢時期可以直接在市場流通，充當貨幣的功能，如《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中規定：“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但充當貨幣的布也有規格要求：“布袤八尺，幅（幅）廣二尺五寸。布惡，其廣袤不如式者，不行。”布也可以折算成錢，折算比例爲“錢十一當一布”。從睡虎地秦簡看，秦初的貲布還是要折算成錢，《法律答問》中規定“‘邦客與主人鬪，以兵刃、投（投）梃、拳指傷人，擊以布。’可（何）謂‘擊’？擊布入公，如貲布，入贖錢如律。”秦初由於戰爭的需要，貲盾、貲甲形式要多於貲布形式，但在秦統一並鞏固了政權之後，採取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制度，錢幣成爲流通領域主要載體，所貲形式也以錢爲主了，里耶秦簡陽陵卒“有貲錢×××”便可證明。

關於貲是不是刑種問題，學者們分歧很大，梁自玉先生和張晉藩先生主張貲是一種刑罰，張晉藩先生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給貲刑下的定義是：“貲刑屬於剝奪犯人私有財

① 高敏：《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30頁。

② 如熊鐵基先生認爲：“秦簡中動輒貲甲、盾，一方面說明需求量之大，另一方面亦說明戰士的甲盾是國家提供的。”（《秦漢史論叢》第一輯，45頁。）石子政先生認爲：“在統一戰爭的形勢下，秦統治者出於對武器裝備的迫切需要之目的，在經濟貲罰和收贖的法律中，特地採取軍事裝備甲、盾、絡組作爲繳納物，以擴大戰略物資的來源和刺激這些物資的生產，是毋庸置疑的。”（《秦律貲罰甲盾與統一戰爭》，《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114頁。）

③ 如熊鐵基（《秦漢史論叢》第一輯，45頁）、林劍鳴（《秦史稿》，290頁）、梁自玉（《秦的貲刑》，《秦文化論叢》第六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64頁）等。

④ 如高敏（《雲夢秦簡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87頁）、黃今吾（《秦代租賦徭役制度初探》，《秦漢史論叢》第一輯，80頁）、呂名中（《秦律貲罰制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等。

產的刑罰。”另一些學者對此持否定態度，朱紹侯先生認為：“從秦簡中看，‘貲’這種處罰形式基本適用於下層小吏，針對問題的性質是一般的過失、輕微的罪過和工作的失職，當屬於一種行政處罰。縱觀雲夢睡虎地秦簡內容，把‘貲’看作‘刑種’或‘刑名’是很牽強的。”^①有的學者把“貲”稱為“貲罰”，認為“貲罰是一種介於刑與斥責之間的懲處手段”^②。盡管學者對“貲”性質存在分歧，但大家的共同點是：都承認在秦代“貲”是對犯罪行為的一種處罰方式。

贖更是和犯罪有關，“贖刑不同於貲刑的地方，在於貲刑是依法判處的交納相應財物的處罰，而贖刑則是允許以交納法定財物代替已依法判處的刑罰”^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有關於贖刑的律條，如“內（納）奸，贖耐”、“可（何）謂‘贖鬼薪鋸足’？可（何）謂‘贖宮’？·臣邦真戎君長，爵當上造以上，有罪當贖者，其為羣盜，令贖鬼薪鋸足；其有府（腐）罪，【贖】宮。其他罪比羣盜者亦如此”、“內公孫毋（無）爵者當贖刑，得比公士贖耐不得？得比焉”。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秦代已形成了關於贖刑的法律，但各級贖刑與錢財的兌換關係却没有明確羅列出來，我們只能從漢初法律中得到一些相關線索。張家山漢簡中明確規定了贖罪和錢財的兌換關係：“贖死，金二斤八兩。贖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兩。贖斬、府（腐），金一斤四兩。贖劓、黥，金一斤。贖耐，金十二兩。贖遷（遷），金八兩。”這是漢初的贖刑情況，“漢承秦律”，估計秦律中的贖刑也相差不大。

從以上可以看出，秦代的貲和贖確實都與犯罪有關。里耶秦簡中的陽陵卒都有貲錢和贖錢問題，說明他們都在陽陵犯了罪，或者被罰以財物，或者拿財物贖罪。

秦代的經濟處罰，如家貧不能賠償，必須以勞役來抵償。《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中規定：“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今日問之，其弗能入及贖（償），以今日居之。”在此，秦律規定如還不起貲、贖、債錢，馬上就要居作以勞役償還，沒有可商量的餘地。以勞役抵償貲、贖錢者在當時被稱為居貲和居贖，高敏先生為兩者下的定義為：“以服勞役抵償罰款，叫‘居貲’；以服勞役抵償贖金，叫‘居贖’。”兩者都因家貧，不得不勞作以償還債務。日本學者藤田高夫把居貲和貲罪相等同，對貲罪進行論述道：“貲罪實際上是用居作即勞役來支付的。按照一日八錢的規定，可計算出與其數額相當的勞動日，在此期間連續服勞役。也就是說貲罪可以換言為規定天數的勞役刑。”^④作者還列舉出陝西省臨潼縣始皇帝陵西側刑徒墓出土的瓦文，如

① 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5頁。

② 呂名中：《秦律貲罰制述論》，《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54頁。

③ 張晉藩總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二卷戰國秦漢，法律出版社，1998，168頁。

④ [日]藤田高夫著、楊振紅譯：《秦漢罰金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608頁。

以此證明“確實存在因賁罪服勞役的人”^①。

對於居賁贖債，學界有不同看法。朱紹侯先生認為“以勞作還債的，律令上均稱之為‘居賁’，並明確的指出是‘贖債’者。”^②他認為“居賁贖債”並不是并列的三種居作形式，而是一種，即單純的“居賁”，贖債是說明居賁原因的。在朱紹侯先生眼中，“居賁的‘賁’沒有罰的含義，同秦簡中‘有罪以賁贖’的‘賁’一樣，均是指財貨”^③。他認為，因為經濟原因而居作的祇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以勞作方式還債（稱為“居賁”），一種是以勞役抵罪（稱為“居贖”）。與朱紹侯持同樣看法的還有張銘新，他認為在秦簡中“有與‘贖’相連為‘居贖’者，有與‘賁贖’及‘責’合成為‘居賁贖責’這一專門術語者。”^④他眼中的“賁”也是財貨的意思，不過他認為“居賁贖債”是“用服‘居’來代替贖賁及償還債務”^⑤，是因兩種原因而居作。

在漢代，“賁”確實有財貨的意思，如《漢書·景帝紀》後二年五月詔曰：“……今賁算十以上乃得官”，注引服虔曰：“賁萬錢，算百二十七也。”又如《漢書·食貨志》：“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巨萬，而貧弱俞困。”這裡的賁都是財產的意思。但和漢代不同，秦代的賁是指犯有罪行而被罰財物，在所發現的秦簡中幾乎找不到賁為財貨的例證。到漢初還殘留此意，這一點從漢初簡牘——張家山漢簡中可見一斑，如：

《二年律令·興律》：“已（？）繇（徭）及車牛當繇（徭）而乏之，皆賁日十二錢，有（又）賁（償）乏繇（徭）日，車□”

例中的賁是處罰財物的意思，和睡虎地秦簡中的賁没有什么區別。

“居賁”雖然在睡虎地秦簡中没有作為一個單獨的名詞出現，但它却出現在其他出土資料中，如秦始皇陵墓瓦當中有大量“居賁”，此外，剛出土的里耶秦簡中，編號為 J1⑨ 981 簡的正面有“廷曰：令居賁目取船”，這裡也出現了“居賁”這一名詞，看來秦代“居賁”是普遍存在的專有名詞。居贖在睡虎地秦簡中較為常見，如《秦律十八種·司空》中“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赤其衣，勿拘櫝櫟杖。”“葆子以上居贖

① [日]藤田高夫著、楊振紅譯：《秦漢罰金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608 頁。

② 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二卷《歷代法制考·戰國秦法制考》，70 頁。

③ 同上，69 頁。

④ 《關於〈秦律〉中的‘居’》，收入《法史考證重要論文選編·刑制獄訟考》，164 頁。

⑤ 同上，166 頁。

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居債在秦簡中沒有單獨的名詞，但《秦律十八種·金布律》規定：“百姓段（假）公器及有責（債）未賞（償），其日踐以收責之，而弗收責，其人死亡；及隸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減其衣食，毋過三分取一，其所亡眾，計之，終歲衣食不踐以稍賞（償），令居之，其弗令居之，其人【死】亡，令其官嗇夫及吏主者代賞（償）之。”這裏明確規定有債無力償還的，要依法令他居作，居作者的身份其實就是居債。既然賞、贖、債在秦代都能用居作的形式抵償，就有可能被統一稱之為“居賞贖債”，他們是在居作背景下的三種身份者。在睡虎地秦簡中，“居賞贖債”是經常出現的名詞，但也有一處與此不同，《秦律十八種·司空》中“人奴妾居贖賞責（債）於城旦，皆赤其衣，枸櫞櫟杙，將司之；其或亡之，有罪。”此處“居贖賞債”把贖和賞相顛倒，這樣把“居賞贖債”解釋為：“以勞作還債的，律令上均稱之為‘居賞’，並明確的指出是‘贖債’者”就講不通了。陽陵卒欠有本縣的賞錢或贖錢，陽陵縣已經向他們家索債，但他們都是“家貧弗能入”，既然無錢還債，按照法律，他們必須以勞役來抵償債務，11人有賞錢問題便有可能是居賞，另一人有贖錢問題便有可能是居贖。

組織與管理秦始皇陵的官員中有“都司空、左司空、右司空”等，司空的職責是什麼？陳直先生認為：“刑徒為司空所管理，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少府屬官有左右司空，皆主管刑徒之官”^①。《睡虎地秦簡》釋文注曰：“司空，官名，掌管工程，因當時工程多用刑徒，後逐漸成為主管刑徒的官名。”李學勤也認為“司空是管理刑徒一類事務的官吏”^②。里耶秦簡中關於陽陵卒的12枚簡無一例外都是由司空騰首先發起，而且騰要求洞庭尉令陽陵卒署所縣索債後交給陽陵司空，看來這些陽陵卒是由司空負責管理。司空是管理刑徒的官員，這些陽陵卒都有經濟處罰問題，所以他們的身份可能是居賞和居贖。李學勤先生指出司空“也負責居賞贖債”^③，不知他也認為陽陵卒是居賞居贖否？

居賞和居贖並不一定光在自己縣中居作，也有可能被徵調到其他縣中，甚至到邊遠地區去居作。陝西省臨潼縣始皇帝陵西側刑徒墓出土的瓦文中記載有來自各地的居賞，看來秦代居賞是可以隨意徵調的。里耶秦簡中的陽陵卒便也可能是徵調到遷陵的居賞和居贖。

居賞贖債者在秦代比較多，他們從事各種雜役。秦始皇陵瓦當中記載的東武居賞慶忌及其他各地居賞便是被徵調來修陵墓的。里耶秦簡J1④5簡正面有這樣內容：

今日傳送委輸必先悉行城旦舂隸臣妾居賞贖責急事不可留乃興繇（徭）·今洞庭兵輸內史及巴南郡蒼梧輸甲兵當傳者多節傳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

①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8頁。

② 《古史文存·秦漢魏晉南北朝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74頁。

③ 同上。

賞贖責（債）司寇隱官踐更縣者

居賞贖債在此承擔傳送委輸及輸甲兵等重要任務。

陽陵卒在遷陵的身份假如是居賞和居贖，或者曾經是居賞和居贖。根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有關法律規定，以成年男子為例，居賞贖債居作時如自備食物，那麼一天的勞役可以抵償八錢，如果在官府吃飯，一天抵償六錢，如果吃住都在官府，那麼一天只能抵償三錢。陽陵既然離遷陵很遠，這些陽陵卒家中又貧困，所以他們自備糧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遷陵也必須給他們安排住宿，這樣陽陵卒只能是一天抵償三錢了。按照這一標準，就可以計算出這些陽陵卒在遷陵應居作的時間了，我們列表如下：

| 姓名 | 籍貫（里） | 賞（贖）錢 | 應居作時間（天） |
|----|-------|-------|----------|
| 毋死 | 宜居 | 8064 | 2688 |
| 不欽 | 仁陽 | 836 | 約 279 |
| 不識 | 下里 | 1728 | 576 |
| 衷 | 孝里 | 1344 | 448 |
| 鹽 | 下里 | 384 | 128 |
| 徐 | 緹陽 | 2688 | 896 |
| 小欽 | 緹陽 | 11211 | 3737 |
| 越人 | 逆都 | 1344 | 448 |
| 頽 | 仁陽 | 7680 | 2560 |
| 勝日 | 叔作 | 1344 | 448 |
| 采 | 谿里 | 852 | 284 |
| 廣 | | 1344 | 448 |

按照日居三錢的標準，這些陽陵卒有三人居作時間應在一年以下，另五人在一年以上兩年以下，宜居里的毋死要居作七年零四個半月左右，緹陽里的小欽要十年零兩個月左右，仁陽的頽要七年左右，緹陽里的徐要兩年零四個多月。從以上可以看出，這些陽陵卒祇有四人的居作時間應超過兩年，其他都在兩年之內，這就和這些人在遷陵已兩年多的事實不符。出現這一現象存在兩種可能性：一、陽陵卒是居賞居贖，他們居作時間超過預期與秦朝政策有關。我們知道，秦代賦斂無數，由於大興土木、對邊戰爭等種種原因，大批的戍卒被徵發，其中相當部分是刑徒。戍卒超出服役期限而不得歸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長期戍守於外，“賦斂愈重，戍徭無已”^①雖有誇張，但也反映了秦朝徭役繁雜的情形，陽陵卒在遷陵戍守兩年以上的現象便不足為怪了，更別說還有戰死沙場或勞累致死等偶然因素，秦始

① 《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

皇陵大批居賁死亡就是此證。另一種可能性便是他們的身份不是居賁居贖，而是普通戍卒，他們到遷陵是執行軍事防禦任務的。哪一種可能性是正確的，祇有等新簡公布才見分曉。

四

從里耶秦簡有關陽陵卒的簡文，我們可以看到索債文書往來的流程。為追還資金，陽陵縣官府首先向他們家索債，在“家貧弗能入”的情況下，便由司空騰起草一份文書，發送給洞庭尉，讓他負責查明陽陵卒所戍之縣，并向所署縣索債。文書呈送給陽陵守丞尉，尉審批後把文書發送給洞庭尉。在沒得到及時回復的情形下，於第二年由陽陵守丞欣又發出文書，追查此事。洞庭尉在查明陽陵卒所署縣為遷陵後，授意屬下假尉鰲通報遷陵丞，讓他按照法令處理此事，並令他把處理結果進行彙報。

這個文書是由洞庭郡下發的，蓋著“洞庭司馬”的官印。到了這裏，索債文書往來的流程並沒有結束，應當是遷陵丞依法處理完此事，然後上報於洞庭尉，洞庭尉再發出文書給陽陵司空，如果陽陵方面滿意了就到此為止，如果不滿意又會開始新一輪的文書往來。由於公布的資料有限，我們只能看到洞庭郡下發的文件，其他部分只按常理猜測而已。

秦代官方索取賞錢、贖錢的文書流程可以用下圖表示：

陽陵卒欠有賞錢或贖錢→陽陵縣向其家中索債未果→陽陵司空起草文書→陽陵丞審批→發送給洞庭尉→（洞庭尉沒及時回復，於是陽陵丞又重新發給洞庭尉文書）→洞庭假尉發文書給遷陵丞，要求他按律令辦事…>遷陵丞在處理完此事後向洞庭尉報告…>洞庭尉發文書給陽陵司空，把處理結果通報與他。（虛線部分為作者的推測）

秦代對文書的管理很嚴密，如《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行書》：“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毀（也）。書有亡者，亟告官。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書廷辟有曰報，宜到不來者，追之。”里耶秦簡陽陵卒簡正體現了這一法律規定，文書起草及發送日期都寫得非常清楚，並明確寫明讓對方答復，即“報”，在沒有得到回復的情況下，又“追”，這些都與法律規定相符。

如前所述，秦代上計制度非常嚴密，睡虎地秦簡對會計的內容作了種種規定。里耶秦簡中也有上計方面的許多資料。除了陽陵卒簡外，J1⑧154簡曰：

令曰恆以朔日上所買徒隸數

J1⑧152簡曰：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內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書舉事可爲恆程者洞庭上常（裙）直書到言今書已到敢言之

這些都是上計的內容體現。對錢財進行統計是歷代官府重要任務之一，其中包括對貲錢和贖錢的管理。里耶秦簡中司空騰向洞庭尉發錢校券的動因也是爲了“計”。前面我們已初步分析，里耶秦簡中的陽陵卒有可能是居貲或居贖，居貲贖債在秦代有嚴格管理，在它縣居作也要每年上計。《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規定：“官作居貲贖責（債）而遠其計所官者，盡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數告其計所官，毋過九月而甞（畢）到其官；官相紾（近）者，盡九月而告其計所官，計之其作年。”在它縣居作者，所在縣應在每年的年底（秦朝以十月爲歲首，九月爲年底）把居作者的情況報告給其原屬縣，以便原屬縣記錄其居作年數。遠方郡縣要提前一個月出發，以保證在九月份能把資料彙報給原屬縣。里耶秦簡關於陽陵卒的簡文正是這一法律程式的體現，司空騰要求陽陵卒所署縣每年把情況進行彙報，遷陵爲什麼沒及時答復？簡文中說“道遠無環書”，距離的遙遠可能是沒能及時上計的原因所在。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陽陵縣一再向洞庭郡發出文書，是爲了加強對貲錢和贖錢的管理，更是爲了上計的需要。

本文寫到此，似感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由於里耶秦簡公布的資料太少，本文作者祇能對陽陵卒簡進行蠡測而已，不敢妄下結論，希望更多的里耶秦簡早日公布於世，來驗證這些蠡測正確與否。

從湘西里耶秦簡看秦官文書制度

◎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汪桂海

內容提要 里耶秦簡是繼湖北雲夢睡虎地、雲夢龍崗、四川青川縣等地出土秦簡牘之後的又一批有關秦歷史的重要資料，其內容主要是秦的官文書。本文試圖利用目前已經公布的部分簡牘文書的釋文，從文書程式及文書收、發記錄等幾個方面，探討秦官文書制度，揭示秦、漢官文書制度的淵源關係。

關鍵詞 官文書 程式 發送 收文 拆封

2002年5月至6月，湘西里耶戰國古城一號井出土一大批秦代簡牘，屬於秦王政（始皇）及二世時的遺物，內容主要為行政文書。這是繼雲夢睡虎地等秦代簡牘之後的又一次有關秦文獻的大發現，必將更加豐富我們對秦漢史的認識。《文物》2003年第1期和《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分別公布了一部分里耶簡牘的圖版與釋文，兩次公布的釋文數量相差無幾，《文物》釋文共38條，較《中國歷史文物》的釋文多出一條（編號[9]984）。《中國歷史文物》則對釋文作了適當的注釋。

目前公布的這些釋文雖然不多，依然令人興奮不已。熟悉秦漢史的人都瞭解，秦漢兩朝在許多制度上有着淵源關係，所謂“漢承秦制”。但各項制度之間是如何傳承的，需要有相當的資料來說明。官文書制度即是如此。關於漢代的官文書制度，筆者曾作過一些總結和探討^①，當時，苦於秦代相關資料的短缺，未能將二者之間的關係多作闡釋，留下了遺憾。里耶秦簡的出土恰好彌補了這方面資料上的不足，使我們有可能具體地比較秦與漢的

① 《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

官文書制度，瞭解它們之間的傳承、發展關係。《文物》在公布部分里耶簡釋文的同時，刊登了李學勤先生《初讀里耶秦簡》一文，談到了秦官文書的格式、傳遞等問題，頗多精到之見。李先生此文本非專論秦文書制度，故仍有剩義。本文即利用現已經公布的簡牘釋文，試就秦官文書制度的若干問題作一些考述。不當之處，請多批評。

一、發送與發送記錄

先看以下簡文：

- | | |
|---------------------------|-----------------------|
| 1.……即令□□行司空 | [8]134 正面 |
| 2.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圉手。 | [8]154 背面 |
| 3.……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守府快行少內。 | [8]156 |
| 4.……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 [8]157 背面 |
| 5.四月丙辰旦，守府快行旁。欣手。 | [8]158 背面 |
| 6.……丙辰水下四刻，隸臣尚行。 | [16]5 背面 |
| 7.……庚戌水下□刻，走裙行尉。 | [16]6 背面 |
| 8.……己未旦，令史犯行。 | [16]6 背面 ^① |

上面這八例簡文均為文書之發送記錄，它們都大致包含了兩部份的內容：

一、發送時間。雲夢秦簡《行書律》云：“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也。”明確規定，凡是發送、傳遞文書，一定要書寫清楚送出的時間。這七條發送記錄無一例外，都指明了文書發送的具體時間，不僅月、日俱備，而且還詳至時、刻，如“十一刻[刻]下二”、“日中”、“十一刻[刻]下五”、“旦”、“水下四刻”、“水下□刻”等，例 1 雖未明確標出月、日，但“即令□□行司空”之語實際上已經在字面上點出文書發送的時間。因此，里耶文書簡提供的文書實物資料與秦簡《行書律》所言吻合，表明《行書律》之規定確為秦曾經實行過的制度。

二、負責傳送人員的身份、名字。如“郵人得”、“守府快”、“令史犯”等皆屬於此項內容。郵人乃郵驛中負責文書傳遞的人員。令史當為遷陵縣令的屬吏，守府也應是遷陵縣廷中的工作人員。

值得注意的是，例 6 負責文書傳遞者為“隸臣尚”，隸臣是刑徒的一種，該文書何以

^① 本文所引用釋文皆根據《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的釋文。資料蒙吳榮曾先生贈送，特此致謝。

派刑徒傳遞？按，秦《行書律》在談到派遣人員進行文書傳遞時有這樣的話：“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根據律文，年老體弱以及不可靠的隸臣妾不能委派來傳遞文書。這說明秦之官府文書傳遞，有時是派年輕體壯並且可堪信任的刑徒完成的。上面列舉的例 6 和下面將要提到的例 17 分別是實際文書的發送、接收記錄，它們所反映的文書傳遞者分別為隸臣尚、隸妾冉，皆屬於刑徒，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任用刑徒傳遞官府文書，這種做法到漢代也有所保留。居延漢簡中有不少詳細記錄文書傳遞情況的簡，其中有的文書傳遞人員是施刑。

9. 入南書五封：三封都尉印，一詣府，一詣□□大守府，六月九日責（起，□）戍屬行謹□在尉所詣□壽掾革；一合渠甲塞尉印，詣會水塞尉，六月十一日起；一□史候史印，詣官，六月十八日起。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平旦時，橐他隧長萬世受破胡弛刑孫明。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52·3, 552·4^①

10. 入北第一橐一封，居延丞印，廿六日寓中……施刑唐陽行。

《居延新簡》E.P.T49: 27

11. 入北第一橐書一封，居延丞印，十二月廿六日日食一分，受武強驛卒馮斗即施刑張東行。

《居延新簡》E.P.T49: 28

以上三例文書傳遞都有施刑參與。在漢代，司寇以上的刑徒得到皇帝的赦令詔書後，在解除身上的刑具、罪衣之前，需要到邊塞戍守一段時期，此即施刑。^②施刑雖然與正式的刑徒不同，但尚未獲得完全的平民身份，仍應屬於有罪之身。漢用施刑傳遞文書，顯然是受秦制的影響。

里耶出土秦簡中的官文書發送記錄，有的還標注了書寫經手該文書封印、發送者的名字。如例 2 “囹手”、例 5 “欣手”。其中的欣，從其他幾件官文書（如木牘[8]152、[8]157）來看，應該是遷陵縣廷的小吏，而簡文所屬的木牘[8]158 是遷陵縣廷發送給酉陽縣丞主、令史的文書，木牘背面在發送記錄中簽署曰“欣手”，表明欣應是該文書的封印、發送者。“囹手”所反映的情況應該與此大致相同。

一般來說，文書撰寫、發送者不會是同一人，漢簡中這方面的資料不少。里耶秦簡中也有這樣一條。

① 該簡的“責”字，據裘錫圭《談談辨釋漢簡文字應該注意的一些問題》（載《江漢考古》1991年第4期），應釋作“起□”。

② 參見吳榮曾《漢簡中所見的刑徒制》“三、施刑”，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後收入吳榮曾《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

12.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遼陵守丞色敢告酉陽丞主、令史：下絡常直書已到。敢告主。 [8]158 正面

四月丙辰旦，守府快行旁。欣手。

[8]158 背面

審視該木牘正面的文書和背面發送記錄的筆迹，就不難發現二者的筆迹完全不同，應先後屬於二人書寫，從而證明文書的撰寫、發送者并非同一人。

文書撰寫完畢之後，通常是於當日隨即發送，如例 1 之“即令□□行司空”即是。另外，例 2 之“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例 3 之“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例 6 之“丙辰水下四刻”、例 7 之“庚戌水下□刻”，皆為文書發送時間，而其所對應文書的撰寫時間分別是“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癸丑”、“（廿七年）三月丙辰”、“（廿七年）三月庚戌”。這四件文書的撰寫與發送時間亦為同一日。

里耶簡中也有數件文書的發送時間遲於擬撰時間。例如，例 4 反映的發送時間為“正月戊戌日中”，而該文書的撰寫時間為“（卅二年）正月戊寅朔丁酉”（木牘[8]157 背面），可見該文書是在撰寫完畢之次日發送出去的。例 5 所反映的發送時間為“四月丙辰旦”，該文書撰寫的時間則為“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木牘[8]158 正面），說明該文書在撰寫之後越二日始發送。例 8 反映的發送時間為“己未旦”，該文書撰寫的時間則為“（廿七年）三月戊午”（木牘[16]6 背面），文書的發送也是在撰寫完畢之次日。

秦代官文書的發送記錄有幾個特點：

一、隨文標記。里耶秦簡中的文書發送記錄都標記在所發送文書之後，沒有一例是另外用一枚簡作單獨記錄的。這與漢代很不相同。漢代每發送一件或同時發送數件文書，皆以一枚空白簡作一條記錄，格式如下一例所示：

13. 辛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鹽言府□一事集封 八月庚申尉史常封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36·44

也就是說，漢代文書發送記錄的內容，首先是所發送文書的基本內容及發送物件，其次是所發送文書的緘封方式，再次是封印所發送文書的月日與經手人。^①

二、正因為秦之發送記錄皆隨文標記，其內容與漢代就有所不同，不必具備文書基本內容一項。

^① 詳見拙著《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145—146 頁。

三、與漢代相比，秦的文書發送記錄較為簡單，反映出早期文書制度的某些特點。而漢代的發送記錄在內容、格式方面，明顯較秦代有了發展。

二、收文及拆封記錄

如雲夢秦簡《行書律》所言，秦代官府接收到文書之後，對所接收的每一件文書都要作收文記錄。這方面的情況在里耶秦簡牘文書中也有所反映。下面是確認為收文記錄的簡牘文字：

- | | |
|--------------------------------|-----------|
| 14. 八月癸巳水下四刻，走賢以來。行手。 | [8]133 背面 |
| 15. 八月戊寅□己巳以來／慶手。 ^① | [8]134 背面 |
| 16. 四月甲寅日中佐處以來／欣發。 | [8]152 背面 |
| 17. 正月丁酉旦食時，隸妾冉以來／欣發。 壬手。 | [8]157 背面 |
| 18. 九月庚午旦佐壬以來／扁發。壬手。 | [9]981 背面 |
| 19. □時守府快以來。 | [16]1 |
| 20. 三月癸丑水下盡，□陽陵士□勾以來／邪手。 | |
| 七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盜簪襄陽成辰以來／羽手。如手。 | [16]5 背面 |
| 21. □月戊申夕，士五（伍）巫下里聞令以來／慶手。如手。 | [16]6 背面 |
| 22. 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不更成里午以來。肆手。 | [16]9 背面 |

確認這些簡牘文字屬於收文記錄的理由之一是參照了漢代收文記錄。漢代收文記錄中往往有類似“八月乙巳第八卒夏賀以來”（《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8·7）、“正月甲辰門卒同以來”（《居延新簡》E. P. T6: 36）之類的話。上舉里耶簡的文字記載方式與此基本相同，應屬於同一類內容。

理由之二，根據所公布的簡牘圖版（其中[16]1 與[16]9 無圖版），里耶簡牘中的這些文字皆書寫於簡牘背面的最左側，甚至在簡牘背面無任何其他文字的情況下，也沒有將這些記錄文字書寫在右側。這說明它們與正面書寫的文書在內容上有區別，是另一類內容的文字，不屬於簡牘正面文書的內在構成。

第三，從圖版中的筆迹觀察，這些文字與正面文字，或者接續正面的背面文字，在筆迹上完全不同，明顯不是同一個人的手筆。

① “八月”原釋作“十月”，今據胡平生《讀里耶秦簡札記》一文的意見修改。胡平生文詳見簡帛研究網站。

這些收文記錄詳細記載了文書抵達的時間、遞送之人以及收受之人。與漢代相比，秦的收文記錄有幾點值得注意。

秦人記錄文書抵達時間不僅記其月日，更詳盡至時刻，如“水下四刻”、“日中”、“旦食時”、“旦”、“[]時”、“水下盡”、“水十一刻刻下九”、“夕”、“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等皆是。這與雲夢簡《行書律》“必書其到日月夙莫（暮）”的要求相吻合。漢代的收文記錄則只記月日，不記時刻。

所列舉收文記錄諸例中常見“行手”、“慶手”、“壬手”、“邪手”、“羽手”、“如手”、“隸手”，其中的“行”、“慶”等應是負責辦理文書收受者的名字，“手”應是經手辦理之意。這種用詞在漢代的收文記錄中見不到，大約是秦文書制度中的用語特色。

漢代收文記錄都有標記封緘文書的封泥印文的一項內容，封泥破碎了，也要標注清楚“封破”、“印破”。這在秦的收文記錄中尚未見到相關資料。

秦的收文記錄均在文書簡牘的背面標署，漢代則在一枚題署收文單位的封檢上標署。

上舉秦的收文記錄中還有三例可以見到“欣發”、“扁發”等字樣。發，在此處作拆啓文書解釋。說明秦在處理文書過程中已經有了拆啓文書的記錄。里耶出土的一組簡牘文書（編號[9]1至[9]12）中常見有“報署主責發”（見於陽陵司空上呈陽陵縣廷的文書）、“報署金布發”（見於陽陵縣上呈洞庭郡的文書）的記載，其意謂此類文書分別由陽陵縣廷的“主責（債）”吏和洞庭郡“金布”吏拆封的。很顯然，秦文書的拆封記錄與收文記錄基本上是合二爲一，一同題署在相應文書之後。

這種情形大約一直延續到漢初。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一、二與五，在奏呈廷尉府的疑獄文書之後、廷尉府判定罪名的批復之前，分別有“署獄史曹發”、“署如廡發”、“署獄如廡發”，表明廷尉府拆啓這些由地方官府奏呈來的文書時，其拆封記錄也是題署在該文書之後的。

居延漢簡文書中見到的情形有所不同，文書的拆封記錄與收文記錄一樣，都是單獨登記在另外的空白簡上，祇有必須在主管官吏面前拆封或由主管官吏親自拆封的特殊文書的拆封記錄才直接書於文書簡背面。居延簡的拆封記錄包括所開啓文書的件數、文書上的封泥印文、拆封時間，以及何人拆封等項內容。漢在居延築障塞設防始於武帝太初三年，今所見居延簡年代無早於此者。據此，大致可以判斷，這種拆封記錄方式是自漢武帝時才開始出現的，是對以前拆封方式的改進。

總的來說，秦代已經確立了官文書的發送、收受以及拆封的記錄制度，雖然仍有些簡單，實行却很嚴格。漢代的相關制度并非憑空而來，而是在此基礎上的發展與完善。

三、文書程式

秦漢時期，官文書的程式皆有一定之規，此類規定稱為“式”。雲夢秦簡《封診式》就是這樣的文獻，它規定了如何撰寫審訊與調查取證方面的司法文書的標準格式。在里耶秦簡出土之前，研究秦代官府之間往來文書程式的原始資料極少，除《封診式》之外，祇有同出於雲夢睡虎地的《南郡守騰書》，這是郡守下發給縣道的文書，其起首為“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云云。

里耶簡牘則幾乎全部是地方官府之間的往來文書，無疑提供了研究秦官府往來文書程式的豐富資料。從里耶簡牘看，秦的官府往來文書無論是上行文，還是平行文、下行文，都已經具備了較為固定的程式。先看如下的簡文：

23. 廿六年三月甲午，遷陵司空得、尉乘……

廿七年八月甲戌朔壬辰，酉陽具獄，獄史啓敢

[8]133 正面

八月癸巳，遷陵守丞從告司空主，聽書從事

[8]133 背面

24.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櫻（樛）敢言：……敢言之。

十月庚辰，遷陵守丞敦狐郤（却）之司空：……其聽書從事。／慶手。

[8]134 正面

25.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內守是敢言之：……敢言之。

[8]152 正面

26. 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遷陵守丞都敢言之：……敢言之。

[8]154 正面

27. 四月丙午朔癸丑，遷陵守丞色下少內……書到言……它如律令。／欣手

[8]156

28.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啓陵鄉夫敢言之：……敢言之。

[8]157 正面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郤（却）之啓陵：……／氣手

[8]157 背面

29. 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遷陵守丞色敢告酉陽丞主、令史：……敢告主。

[8]158 正面

30.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騰敢言之：……敢言之。

四月己酉，陽陵守丞尉敢言之：……敢言之。／僇手

[9]1 正面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陽陵守慶敢言之：……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假）尉麟謂遷陵丞、陽陵卒署……／嘉手

[9]1 背面

31. 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敢言之。 [9]981 正面
32. 卅年三月丁未，平邑鄉涇下佐胃與平邑故鄉守士五畷、中、哀、佐涅、童禺□□ [16]2
33.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禮謂縣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谷、屬尉：……它如律令。 [16]5 正面
- 三月丙辰，遷陵丞歐敢告尉，告鄉司空、倉主……它如律令。鈐手。 [16]5 背面
34. 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啓陵鄉□敢言之：……敢言之。 [16]9 正面
- 遷陵守丞敦狐告都鄉主，以律令從事／建手 [16]9 背面

從以上的例子看，秦文書結構的第一部分是文書撰寫的日期，基本上都是按照年、月、朔、干支日的格式來書寫。筆者在探討漢代官文書制度時曾提出，整個西漢乃至東漢初期的官府文書在書寫擬撰日期方面，采用的是年、月、朔、干支日的格式，後來才改為在年、月、朔、干支日之後加記數位計日。^①現在知道，西漢至東漢初的日期書寫方法是沿襲自秦，秦代官文書中已將此格式固定下來。

上舉諸例中的文書撰寫的日期也有單作月、干支日的格式。這是因為其前已有一書寫日期完整的文書，二者在此處不是作為獨立文書出現的，而皆為某一件文書的一部分。這種現象在漢代官文書中也常見到。

文書的第二部分是發文者的職官、名字以及表達行文關係的語詞。秦的官府往來文書都已經使用表達行文關係的語詞。里耶簡牘中凡屬於上行文書，通常用“敢言之”。比如上面的例 25 為少內守是上呈縣廷的文書，例 26 為遷陵守丞上呈洞庭郡的文書，例 28 正面為啓陵鄉夫上呈遷陵縣廷的文書，皆用“敢言之”之語。

平行文則用“敢告”。如例 29 為遷陵縣守丞色發給酉陽縣丞主的文書，例 33 背面為遷陵縣丞歐發給本縣縣尉的文書，皆用“敢告”一詞。

下行文用“告”、“下”、“謂”等，這些行文語詞的使用在漢代官文書中基本上保留未改。

另外，秦代下級向上呈送文書，若其陳述之事不合理，上級在駁回時往往用“卻之”一詞。比如例 24 背面“遷陵守丞敦狐郤（卻）之司空”，乃遷陵縣守丞敦狐駁回本縣司空守繆所呈文書，例 28 背面“遷陵丞昌郤（卻）之啓陵”，乃遷陵縣丞昌駁回啓陵鄉夫所呈文書。

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官府往來文書無論上行、下行、平行文書，在表示行文關係的語詞之後均接著書寫收文單位或職官的名字。里耶簡牘文書中祇有平行文和下行文如此，上

① 詳見拙著《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67—68 頁。

行文則缺此項。這是目前所見到的秦、漢官文書結構程式上的一個差別。

文書的第三部分為正文內容，是文書的主幹。

第四部分為結束語。結束語通常用“聽書從事”、“敢言之”、“它如律令”、“以律令從事”、“敢告主”等。“聽書從事”相當於漢代文書中的“承書從事”，意為接到文書後立即執行。“敢告主”的“主”指負責官吏。雲夢秦簡《封診式》“鞠”條、“覆”條皆有“敢告某縣主”、“敢告主”之類的話，注云：“主，負責官吏。”江陵鳳凰山 168 號漢墓木牘中也有這樣的話。居延漢簡中有“主官”一詞，亦指負責官吏。

第五部分為文書撰寫者的名字，通常僅書其名，並在名字後面加一“手”字，應為經手之意，如“慶手”、“欣手”、“氣手”、“儋手”、“堪手”、“嘉手”、“釦手”、“建手”等。撰寫者名字之前一般劃“／”符號，以示與正文區別。

文書末尾簽署執筆的小吏名字，在漢代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漢代在文書吏名字前加署職銜，刪去了“手”字。這是秦、漢官府往來文書程式的另一區別。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湖北江陵高臺西漢墓出土過三枚木牘，屬於移報戶籍的文書及相關資料。第一枚木牘（編號甲）為該文書的封檢。第二枚木牘（編號丙）為江陵丞移安都丞的文書正文。第三枚木牘（編號乙）為文書正文之附件。其中第二枚木牘釋文為：

35. 十月丙子朔庚子，中鄉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與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謁告安都，受[名]數，書到，為報，敢言之。

十月庚子，江陵龍氏丞敢移安都丞。亭手。（以上為正面）

戶手。（以上為背面）^①

江陵龍氏丞移送安都丞的文書末尾所署的“亭手”、“戶手”，即為擬定、撰寫該文書的小吏的簽署。該文書年代當屬於西漢初期，反映了漢初文書程式對秦文書程式的繼承關係。由此也可以知道，在文書吏名字前加署職銜，刪去了“手”字並不是一進入漢朝就推行的制度，而應是經過了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 18 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 年第 8 期；黃盛璋：《江陵高臺漢墓新出“告地策”、遺策與相關制度發覆》，《江漢考古》1994 年第 2 期。

關於《二年律令》題名之再研究

◎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

李 力

內容提要 關於《二年律令》題名，意見不一。今見《二年律令》為抄本、節選本，是 M247 墓主使用過的本子，因隨葬得以流傳至今。其抄寫時間是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朝廷有自名《二年律令》的正本，係彙編漢初律令而成，是一個開放性的律令集合體。因始編纂於高祖二年，故名。自高祖五年起，作為西漢王朝的法典推行於全國。

關鍵詞 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 題名

自《二年律令》出土以來，關於其題名的含義，眾說紛紜，至今未有共識。本文擬梳理 20 年來有關該問題研究的狀況，評述其得失，進而辨析其題名的含義。

一、有關諸說及其得失

今見《二年律令》，有 526 枚竹簡，包括律 28 種、令 1 種，計 29 種。^①其題名書於首簡背面。關於“二年”所指，主要有四種觀點：“呂后二年”說，“高祖（漢）二年”說，“惠帝元年”說和“惠帝二年”說。

1. “呂后二年”說

^① 經考，《二年律令》當為 28 種律、1 種令，共計 29 種。詳見拙作《關於〈二年律令〉簡 93—98 之歸屬問題的補充意見》，《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此說首先由其發掘者提出，竹簡整理者也明確贊成，後來就發展成為通說。^①

1985年初，發掘者在簡報中並沒有明確出土竹簡的年代。^②而整理者則指出，這批竹簡漢律“的確有蕭何所造的律文”，“也有一些制定在蕭何以後的律文”，即呂后時（不早於呂后元年）的律令。^③將其制定視為一個動態過程，符合《二年律令》的實際情況。可惜未言及“二年”問題。

1985年底，陳耀鈞等先生考定《二年律令》“當為呂后元年之後，文帝之前”，“‘二年’，當指呂后二年，律令成文之年當為呂后二年，即《呂后二年律令》”。^④這是最早提出《二年律令》題名之“二年”問題。張建國先生批評說：“如果以‘呂宣王’的字樣來確定該墓年代的上限是沒有問題的，但要由此斷定出‘二年律令’就是‘呂后二年律令’尚需要斟酌，除非‘二年律令’和那些與呂宣王有關的法律內容同在一支簡上。”^⑤這一意見直接觸及到“呂后二年律令”說的漏洞。

1992年，李學勤先生詳述“呂后二年”說，認為《二年律令》“是當時行用律令的摘抄”^⑥。2001年，整理小組最後表述了“二年律令”說。^⑦對此，高敏先生指摘說，整理者“肯定了《二年律令》的‘二年’是‘呂后二年’，故其製作年代的下限應是呂后二年，這無疑是正確的。至於《二年律令》所收漢律製作年代的上限，‘說明’雖沒有正面指出，却在《曆譜》部份釋文的‘說明’中作了交代”。據此，“則《二年律令》中諸律令的適用年代的上限也應為漢高祖五年。這個推斷雖然也有道理，但不如其下限為呂后二年的判斷有直證”^⑧。王樹金先生也認為，以《具律》簡85有“呂宣王”一詞和《津關令》中廿二律文有“魯侯”來判斷“二年”為“呂后二年”，似乎不妥。這些律文有可能是呂后追加的，不可能廢掉高祖舊律而另頒新律。^⑨其批評意見還是比較中肯的。這一論據祇能證明具律簡85和《津關令》的相關條文，是呂后二年時期制定的。而日本學者宮宅潔先生的批評意見，最為直截了當：“呂后二年”說，目前也沒有找到證據來支持，因而也是建立在一個很難論證的假定（即《二年律令》所收的條文是在某二年都存在且有效力的法令）之上的，其漏洞在於：若按張建國之說，認為也包含有某二年以降被追加的條文，或者認為

①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中華書局，2004，96頁。

②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④ 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1985年第12期。

⑤ 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收入氏著《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9，43頁。

⑥ 李學勤：《論張家山247號墓漢律竹簡》，見《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417頁；同氏《張家山漢簡研究的幾個問題》，《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3期。

⑦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33頁。

⑧ 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讀張家山漢簡札記四》，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⑨ 王樹金：《〈二年律令〉法律內容制定年代考——兼談“二年”的時間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24日。

依然包含著已變成一紙空文的條文，則“二年”就不限於呂后二年。^①這一看法更加明確地指出了“呂后二年”說存在的漏洞，的確是一語中的。整理小組最終的結論確實過於簡單，沒有將《二年律令》律文形成的動態過程揭示出來，僅認定《二年律令》是呂后二年仍施行的法律是很不夠的；更沒有區分《二年律令》的制定年代和抄寫年代；尤其是認定呂后二年的證據力，不夠充分，有以偏概全之嫌。

2002、2003年，高敏先生完善了“呂后二年”說。“《二年律令》的‘二年’應為呂后二年，亦即律令的全部內容都應是從漢高祖五年到呂后二年時施行的律令”。^②其“中所收漢律及津關令，可以肯定是呂后二年之前的漢初律令”，但“是否製作於同一時期，還很難斷定；從情理上來說，漢初的法律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凝固不變的，它至少經過了最初的‘約法三章’階段、漢高祖五年統一全國後建立統一法典的階段、蕭何制定漢律九章的階段和惠帝、呂后時期的增補改易階段”，“不能說《二年律令》中的全部律條都始於同一時期；或者說《二年律令》中諸律令的製作年代，還需要論證”；推斷《戶律》、《賜律》應肇端於漢高祖五年五月詔，《具律》、《秩律》應制定於惠帝即位的五月詔時，《置後律》制定於劉章死後和惠帝即位之初的可能。“《二年律令》中諸律令，是呂后二年總結在此之前諸帝所先後制定的漢律的彙抄”。^③但是，王樹金先生批評說，將其上限定在高祖五年是不正確的，其下限為呂后二年則無疑，上限應至漢王元年，至少也要在漢王二年。^④而周波先生也不同意《秩律》應制定於惠帝即位五月詔時的主張，這從“沛郡”所屬縣名的廢置可知。^⑤不過，其意見有三點值得贊同：第一，不能將全部的條文都視為同一時期制定的，漢初的法律制定是動態的；第二，確定《二年律令》施行的上下限為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第三，《二年律令》是呂后二年前諸帝制定律令的彙抄。其存在的問題在於，沒有指明其抄寫年代的上下限。

2004年，蔡萬進先生也贊同“呂后二年”說，強調“是呂后二年更定的法令的彙集”，“二年”是更定的時間。^⑥2005年，周波先生認定《錢律》、《捕律》、《秩律》三種律文頒行的年代均不得晚於二年。再聯繫曆譜、《具律》、《津關令》所傳達的信息，“祇能將《二年律令》之‘二年’理解為是‘呂后二年’”；其主體部分可能並非都是呂后時期所定，這三種律與其他律令都屬《二年律令》，彼此是不可分隔的整體，因而整個《二年律令》應當

①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2004年3月。

② 高敏：《漫談〈張家山漢墓竹簡〉的主要價值與作用》，《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3期。

③ 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讀張家山漢簡札記四》，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

④ 王樹金：《〈二年律令〉法律內容制定年代考——兼談“二年”的時間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24日。

⑤ 周波：《從三種律文的頒行年代談〈二年律令〉的“二年”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9日。

⑥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後報告，2004年5月，27頁。

也是呂后二年所頒行的。^①其問題在於以點代面，即僅以這三種律的制定時間，來斷定整個《二年律令》的制定時間。從邏輯上來看，這是很難成立的。

日本學者也贊同“呂后二年”說。^②最有代表性的是宮宅潔先生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但其看法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二年律令》收入了成立年代不同的各種各樣的法令，一些法令當起源於秦律。二其注釋[19]提出“呂后二年”說的一個例外：“秩律可見‘南陵’之縣名（457簡），南陵是文帝七年（前173）新設的縣。整理小組疑為‘春陵’之誤。也許是從把‘二年’釋為‘呂后二年’立場的解釋，但是字形很清楚是‘南陵’。”在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關於這個問題，周振鶴按：“此縣（即南陵——筆者注）地望無考。整理者疑為春陵之誤，實不可能，因春陵漢初在長沙國。”^③後修正為：“此縣地望無考。整理者疑為春陵之誤，無據。”^④

經查，確實為“南陵”，其釋文也作“南陵”，其注釋說：“南陵，疑為‘春陵’之誤，屬南陽郡。”^⑤據《漢書·地理志》載，“南陵”確為文帝七年所置，屬京兆尹，治所在今西安市附近。而“春陵”則為侯國，屬南陽郡。兩者所在是兩個方向。在457簡“南陵”之上為“鄧”，其下為“比陽”、“平氏”、“胡陽”、“祭（蔡）陽”、“隋”，均屬南陽郡。整理小組很可能是因此而懷疑“春陵”被誤寫為“南陵”的。“春陵”所處的大方位不會搞錯，但是“春”字與“春”字的字形相近，極有可能是抄錯了。從這點看，整理小組的懷疑是有道理的，符合其簡文的上下文意。可從之。因此，這個例外恐怕是很難成立的。

2. “高祖（漢）二年”說

1996年，張建國先生批評“呂后二年”說，最早持此說。其依據是，《史記·蕭何世家》蕭何在“漢二年”“為法令約束”，和《太史公自序》“蕭何次律令”的記載。^⑥

日本學者宮宅潔先生評論說，“高祖二年”說在論據上存在的危險性是，沒有將三個假定條件（①蕭何所完成的法令集曾流傳於全國，②出土於張家山的簡是其抄本，③“二年”是法典編纂之年。）作為論證的對象，而是作為自明的事實。這實際上是在硬性的假

① 周波：《從三種律文的頒行年代談〈二年律令〉的“二年”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9日。

② [日]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的研究》，“序言”，同朋舍，1998，15頁。[日]山田勝芳：《張家山第247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と秦漢史研究》，《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3號，2002年10月。[日]池田雄一：《〈奏讞書〉解題》，見《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刀水書房，2002。

③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

④ 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義》（修訂），簡帛研究網，2003年11月23日。

⑤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99頁，注釋[55]。

⑥ 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收入氏著《帝制時代的中國法》，44頁；又《中國律令法體系概論》，同書第10頁。

定之上堆積假定^①。這一批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從“高祖二年”說立論依據的兩條史料（蕭何“爲法令約束”和“次律令”）分析，第一個假定條件是可能成立的。而據竹簡整理者等的初步研究，今見《二年律令》是一個摘抄本，其中所抄的律令，有早至蕭何時期的，因而第二個假定條件的成立也沒有問題。關於第三個假定條件，通說是將“二年”作爲律令行用有效的年代，“高祖二年”說將之作爲制定律令的年代，從律令的編纂和制定上來考慮都有可能，祇是角度不同而已。既然都是假說，也是因爲無法確實論證。如果各項條件都成立，也就不必提出所謂假說。假說的關鍵是，要看哪個更具有說服力，更符合邏輯性。

此說最早質疑“呂后二年”說，且“只能靠已發表的有限信息做些推測”。這實際上反映出，其主張者也意識到“呂后二年說”並沒有解決制定《二年律令》的上限問題，可能也感覺到通說之缺陷所在。從這點講，該主張挑戰通說並欲補其漏洞，學術價值不可否定。遺憾的是，此說提出後，未引起“呂后二年”說首倡者的回應。其值得肯定的看法有：①開國皇帝的紀年不需要特別地注明；②“二年律令”在制定時間上可能與蕭何的法令有密切的關係。

2005年，王樹金先生補充此說，推斷在漢元年入漢中後，蕭何就已受命制定了一些法律，二年時正式施行；《二年律令》的絕大部分法律條文，當爲高祖時（包括漢王時期）制定，包括蕭何制定的法律和高祖的詔書，以及由蕭何與御史上奏被高祖批准的，且是以漢王二年由蕭何“爲法令約束”的“法令”爲基礎逐漸添加、完備的，少許爲惠帝、呂后時追加。^②對此，周波先生則指出，“漢王二年”說對於《秩律》顯然是不能成立的。^③但是，若同時從兩方面考慮，則這一指責也未必能夠成立。按“漢王二年”說，《二年律令》大多爲漢高祖時制定的，即使《秩律》是呂后時期制定的，也可以被追加到《二年律令》之中。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可見，表面上針鋒相對的“呂后二年”說，與“高祖二年”說之間，也有共識之處。這是值得深思的一個現象。

3. 漢惠帝元年說

曹旅寧先生本來同意“呂后二年”說，考慮到有29條簡文不避漢惠帝劉盈之諱，進而又主張其年代應爲漢惠帝元年。^④此說一提出就受到批評。王樹金先生認爲，簡78、83等都出現“盈”字，“惠帝名盈，而這些法律並不避惠帝名諱”，據《漢書·惠帝紀》所載惠帝即位五月詔令“凡云‘盈’皆已改爲‘滿’”，完全可以確定，這些法律當爲高祖時制

①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

② 王樹金：《〈二年律令〉法律內容制定年代考——兼談“二年”的時間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24日。

③ 周波：《從三種律文的頒行年代談〈二年律令〉的“二年”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9日。

④ 曹旅寧：《張家山247號墓漢律製作時代新考》，《出土文獻研究》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定而非惠帝時期制定的”。^①周波先生則認為，“惠帝即位的五月詔時”說對於《秩律》顯然不能成立，“曹旅寧先生將張家山漢墓竹簡有‘盈’字，不避漢惠帝劉盈之諱，作為主要的年代判斷標準，看來失之武斷。從我們分析得出的結論，至少在高后二年以前所頒行的法律律文中，是不避惠帝之諱的，其原因我們不敢妄論”。^②日本學者宮宅潔先生也質疑漢初是否實行過嚴格的避諱制度，因為在《二年律令》中未避景帝、惠帝、呂后、文帝之諱。^③這與王樹金先生的看法不謀而合。

這些批評意見是有說服力的。因為不避惠帝諱之律文，不一定就祇有惠帝時制定這一種可能。同樣從避諱的角度出發，審視《二年律令》的制定時間，卻可以得出兩種結論。這表明，“惠帝元年說”僅以 29 條不避惠帝諱的律文來否定呂后二年說，確實缺乏力度。因此曹旅寧先生本人也不能最後肯定，只好含混地表達：既主張 29 條的年代應為漢惠帝元年，又認為一定是在惠帝元年之前甚至有可能是在漢高祖二年律令的基礎上重修的。這實際上反映了其矛盾的心理狀態，是沒有把握徹底解決該問題的真實寫照。也說明僅依靠避諱之說是不解決問題的。“漢惠帝元年”說難以成立，至多只能證實某些條文不是惠帝時期制定的，反證這些條文是高祖時期或在此前制定的，不能據以論證整個《二年律令》的制定年代。

4. 惠帝二年說

臺灣學者邢義田先生提出。因為質疑其賊律仍見有呂后元年已廢之“三族罪”條，所以推測：該《二年律令》“不一定是指呂后二年之律，惠帝二年也有可能”，是其病後將有關法律文書帶回家，“希冀病好復，還用得上。不意一病不起。家人於是依俗，雇請書手將墓主用過的文書資料摘抄若干”陪葬。但“此說面臨的難題尚無法完滿解決。姑言之，佚考”。另，也不排除其是作為明器而由墓主家人請人摘抄的可能。^④這是針對“族刑”仍可見所進行的解釋。依其第一種可能，當抄寫於惠帝二年。而此假說“面臨的難題尚無法完滿解決。姑言之，佚考”。難以令人信服。而按照其第二種可能，當是抄寫於墓主死時之呂后二年。實近於“呂后二年”說。雖然邢氏也不能最後定奪其假說是否可成立，但是其假說對於開拓研究思路仍具有啟發意義。

由上可知，對於其題名之“二年”問題，有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其間出現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簡言之，可形成一個共識：《二年律令》收錄了呂后二年之前所制定的年代不同的律令。

① 王樹金：《〈二年律令〉法律內容制定年代考——兼談“二年”的時間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4月24日。

② 周波：《從三種律文的頒行年代談〈二年律令〉的“二年”問題》，簡帛研究網，2005年5月9日。

③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

④ 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2—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比較起來，這四說之中，“漢惠帝元年”說不能成立。而“惠帝二年”說，其主張者仍有疑問，不能最終確定，能否成立也是個問題。而“呂后二年”說存在的問題就是：以偏概全、以點代面，即以某些條文的年代，來推及整個《二年律令》的年代。這從邏輯上是很難講得通的。但是，此說可取之處在於：（準確地說）呂后二年是《二年律令》中某些律令制定時間的下限。而“高祖二年”說，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或許是其表述不夠清晰，或者其論證的不夠充分，還有不少缺陷，因而未能引起更多的重視。另外，高敏、宮宅潔先生的相關意見頗具啟發性。

二、關於“二年律令”題名之我見

要想準確、客觀地把握《二年律令》題名問題，必須綜合《二年律令》的性質、墓葬年代與墓主的身份與職業、《二年律令》簡的形制、律文的制定時間與抄寫時間及其過程等問題，再聯繫“高祖二年”說和“呂后二年”說，進行合理的推測，以期儘量少的出現疑問。

1. 關於《二年律令》的性質

整理小組認定，《二年律令》為全部律令的總稱。^①但這一表述太籠統，過於簡單，不夠準確。高敏先生認為，是呂后二年之前諸帝制定律令的彙抄。^②蔡萬進先生認為，“也是呂后二年呂后更定的法令的彙集”。^③臺灣學者邢義田先生也認為竹簡《二年律令》是一個摘抄本。^④日本學者宮宅潔先生認為：①《二年律令》是西漢初期法令彙集之抄本。②也可能是墓主為履行職務或出於自身的關心而由私人製作的法律文集。③也可能是全國通用的，即國家層級的編纂物。④至少是在郡一級流傳的共同的詔敕集。其思路還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匯總其比較一致的看法，就其性質問題，可下這樣一個論斷：今見《二年律令》，是一個彙集西漢初期呂后二年之前所制定律令的抄本。

2. 關於墓葬年代及墓主的身份、職業

1985年初的簡報，僅確定M247號墓葬的相對年代。^⑤同年底，陳耀鈞等先生則考證其絕對年代，認定該墓主的死年應是呂后二年。^⑥其下葬也當在此年。2001年，竹簡整理小組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33頁。

② 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讀張家山漢簡札記四》，收入氏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

③ 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27頁。

④ 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1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⑤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

⑥ 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1985年第12期。

也據所出曆譜推定，“墓主人去世當在西漢呂后二年或其後不久”。^①關於墓主去世并下葬於呂后二年的推測，是可以信從的。

不過，關於墓主的身份、職業，各家的看法雖略有些分歧，但仍存共識。1985年初，整理小組認為，“從曆譜和遺冊，可以推知 M247 墓主的一些情況，曆譜中有‘□降為漢’殘簡，初步推斷在高祖五年，即公元前 202 年”。但是“簡文此處是說漢略定楚地，還是記墓主自楚降漢，尚需研究。曆譜惠帝元年，即公元前 194 年條下，記‘病免’，知墓主此時年事已長。他死在呂后時或更晚一點的時間，年紀自己老邁。這與其棺中隨葬老人所用鳩杖，是相合的”。而“由‘病免’記載，可知墓主曾任官吏。他惠帝元年已經免職，卻隨葬有呂后時律令，推想他可能是專精法律的學者”，從其藏書有法律、醫書、兵陰陽言、數學等看，其“可謂多才多藝”。^②1985 年底，陳耀鈞等先生則進一步推定，墓主人生前是個文人，“是朝廷官吏，在惠帝元年六月因病免職而告老還鄉，他的籍貫應是原楚國，居里應在楚都紀南城附近，公元前 278 年，秦將白起拔郢後，他降了秦，在楚漢戰爭中他又‘降為漢’，從他所記《曆譜》年代的始年來看，他降漢的時間應是高祖劉邦五年（原文誤作“月”字）”，“從出土簡文內容分析，墓主人生前學識淵博，他對法律、軍事、醫學、曆法、數學、體育等均有愛好，他應是一個文職官員，或許就是一個斷刑治獄的小吏。”2001 年，整理小組的結論是，“從葬具和隨葬品判斷，墓主人身份并不高，隨葬的各種古書也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級官吏，通曉法律，能計算，好醫術、導引”。^③日本學者池田雄一先生也認為，該墓主生前是官吏，在公元前 194 年退職。是精通法律者，《奏讞書》也很可能與其生前的職責有密切的關係。^④宮宅潔先生也從出土曆譜中有“病免”語和有關法律的竹簡，“推測墓主曾任司法官吏，或者是精通法律的學者”；又因其墓室與隨葬品的形式，認定其身份與江陵鳳凰山 10 號墓墓主即有五大夫爵、曾任里正之職的“張偃”相近。^⑤

據研究，曆譜高祖五年四月條下“新降為漢”記事表明，南郡歸降漢王朝當在漢高祖定陶稱帝（即高祖五年二月）一個月後不久，即曆譜所記的“四月”。該曆譜所記以漢高祖五年四月為始，一方面反映漢王朝的建立，是一次重要的王朝變革和重大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也反映墓主本人親身經歷了這場歷史變革，也就是在這一年，墓主降於漢廷，接受漢廷領導，又因這場變革在南郡有可能發生在四月，故墓主所記曆譜才有可能始自四月。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前言。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前言。

④ [日]池田雄一：《〈奏讞書〉解題》，見《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1 頁。

⑤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 76 冊。案，該文注[3]誤將 1985 年概述所提“學者”說寫作 1985 年簡報所提。

這裏的“漢”，應是指漢高祖劉邦稱帝後所建立的西漢王朝之“漢”。墓主在楚漢交替之際，莊嚴地記了一筆“新降爲漢”，關注這一政權交替變革。由此可知，墓主應是經歷了秦、楚和漢王國（前 206—前 202）及漢初歷史的一名人物，與劉邦、蕭何屬同時代人，同爲秦末至漢初歷史的見證人。而惠帝元年“八月癸酉”條下同時記有“六月病免”字樣，表明墓主生前乃係漢王朝南郡治下的一名官吏。惠帝元年六月後便因病去職閑居在家，直至呂后二年後九月（曆譜最晚記至此，推斷墓主去世當在此後不久）。不過，“新降爲漢”一語也反映出墓主不惟漢初劉邦在位時一直爲官，即或楚漢之爭及秦王朝時亦可能爲官。并贊同 1985 年概述所見整理小組推測墓主人年事已高的論斷，且以《二年律令·傳律》簡 355 所載“大夫以上年七十……皆受杖”爲證。另外，該墓主“新降爲漢”的事實，又見於同時出土的《奏讞書》的案例 2“降爲漢”（3 見，簡 9、12、14）和案例 5“降漢”（簡 38）之中，二者的事實是一致的。^①

根據目前所見《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結合傳世文獻的記載分析，整理小組的注釋與蔡萬進先生的解說是有說服力的。墓主在降漢前定爲楚官吏，甚至很可能也在秦朝、秦國爲官。^②

概而言之，其共同認識是，該墓主自高祖五年劉邦建立漢朝伊始，就降於漢朝，并擔任官吏（估計至少是在縣府中任職）。古代官吏的主要職責之一，就是審判案件。因此，長期擔任基層官吏的墓主，其主要的職責之一，也當是從事司法審判事務。再聯繫到睡虎地秦簡墓主的情況，推定 247 號隨葬的兩種法律文書，也應當是墓主生前在工作中使用過的物品^③，死後隨葬是很自然的。

3.《曆譜》、《二年律令》之簡冊在墓中的位置、出土情況和形制等相關問題

這是以往學者不太注意之處，有必要多費些筆墨，予以較深入的討論。據整理小組 1985

① 蔡萬進、吳亮：《從張家山漢簡看楚漢法統關係》，《中州學刊》2002 年第 4 期。按：就曆譜言，因其表層竹簡有殘斷，不排除原有簡數可能要比現在所見的多，即其上限有提前的可能。這祇是臆測。即使本來如此，對墓主來說，“新降爲漢”是一件大事，故記載下來。這一推斷是合理的。該曆譜可視爲其在漢朝爲官直至去世的真實記錄。

② 1985 年荊州地區博物館的發掘簡報祇說，M247“棺內屍骨腐朽無存”；在隨葬器物“漆器”部份，也祇說有“杖”，但未指明是哪個墓所出（《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 年第 1 期）。同時，整理小組的概述則說，“其棺中隨葬老人所用鳩杖”，并推測該墓主年已老邁（《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可知，M247 號墓出土有鳩杖（但遺冊未列入）。詳細情況，祇有待將來更詳細的發掘報告發表再說了。遺憾的是，棺中已無屍骨，不能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進行鑒定，以確定死者的年齡。祇好據目前所知情況推測，墓主去職時大概不到 60 歲，死時可能約 70 歲左右。按照陳耀鈞、閻頻先生論文的說法，墓主可能死於呂后二年（前 186）之後。由此上推 70 年，他大概出生於秦昭王末年，此時南郡地區已在秦國統治之下，從秦國到秦朝時期（嬴政在位至二世時期），他都有可能在南郡爲官。而陳耀鈞、閻頻先生論文認爲，“公元前 278 年，秦將白起拔郢後，他降了秦”。這一推測恐怕是不正確的。

③ 據研究，《奏讞書》的編訂工作有可能開始於高祖十二年，或在高祖十二年即已完成，至遲不超過蕭何去世，即惠帝二年。此後即已在各級官府流傳，并被官吏抄寫學習。參見蔡萬進《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研究》，25—27 頁。池田雄一先生也指出，《二年律令》與《奏讞書》有密切的關係。[日]池田雄一：《〈奏讞書〉解題》，見《奏讞書——中國古代的裁判記錄一》，14 頁。按：如此，很有可能，在惠帝元年墓主“病免”前，《奏讞書》已完成；其退職前，手頭可能已抄有《奏讞書》，并在工作中學習使用過。

年的概述，張家山 247 號墓的漢簡，除遣冊之外，其他的均被置於一個“位於頭箱內緊靠南壁板底部的竹筩中，其上面堆壓著陶器、漆器及淤泥。竹筩已腐，無蓋。筩內竹簡豎向放置，周圍積滿淤泥，一端的上部疊壓著幾塊無字木牘。表層竹簡多已殘斷，下面的竹簡部分保存完整。推測原來竹簡是分卷放置的，後經水侵入，竹簡漂浮，造成散亂”。^①後來，整理小組又補充說，“從殘存的竹編可知，竹簡原置於筩中。由於受到淤泥及其它文物的積壓，竹簡已有損壞，卷束已散開，並有不同程度的移動。從竹簡的堆積狀況可以判斷，各種書籍是各自成卷，然後堆放在一起的。依從上至下的順序是：曆譜、《二年律令》、《奏讞書》、《脉書》、《算術書》、《蓋廬》、《引書》”。^②遣冊見有“書一筩”的記載，正可與之相對應。^③可見，裝在竹筩中的八種文書和典籍確實都是墓主的隨葬品。

據《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所示，《二年律令》由相鄰的 C、F 組竹簡構成的，是被寬鬆地卷著的一卷冊書，但是在受到壓力後卻被分為兩處。^④《二年律令》的首末簡，與該卷冊的整個形制有密切關聯。其首簡（簡 1）上端的背面僅書有“■二年律令”，為該卷書題；^⑤其末簡（簡 526）上端書有“律令二十九種”^⑥，整理小組注釋為：“本簡是《二年律令》律、令數的小結。”^⑦目前未見有人就《二年律令》首、末兩支簡的編聯提出異議。從其簡文和出土位置示意圖看，整理小組將這兩支簡編聯為《二年律令》的首末簡，是沒有問題的。

由《二年律令》書題獨立寫在首簡的背面，推測該卷冊原來的形制可能是這樣的：以末簡（簡 526）為軸心，有文字的一面向內卷成一冊，首簡（簡 1）在最外邊，其簡背的書題正好露在外面，捆扎好後正好可以看見。其所採用的，是最常用的收卷法。^⑧在呂后二年下葬時，《二年律令》就是以這樣的形態被豎放在竹筩之中的。由此斷定，該《二年律令》在呂后二年時就已經被抄寫好了。末簡當然是在最後抄寫完的。這樣看來，在剛開始抄寫時，是照著《二年律令》的正本，先錄下其書題名；抄寫完後，再注明一共抄了 29 種律令，卷成一冊。首簡上所抄錄的，當為其正本的原始題名；末簡上所寫的，當是 247 號墓主所收藏的抄本的“小結”，不是正式的題名。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定，當時朝廷可能還有一個被稱為《二年律令》的正本。這個正本是朝廷正式頒布的，供各級官府抄寫複製，以便通行。張家山漢簡 M247 號墓所見該《二年律令》抄本恐怕不是足本，祇是一個節選本。弄清楚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①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前言”。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 年第 1 期。《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305 頁注釋[23]。[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 76 冊。

④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 76 冊。

⑤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33 頁。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170 頁。

⑥ 李力：《關於〈二年律令〉簡 93—98 之歸屬問題的補充意見》，《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

⑦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210 頁。

⑧ 參見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168 頁。

關於當時可能存在正本《二年律令》的問題，宮宅潔先生称之为“範本”，是在墓主家或者縣與郡等等特定的官府中所積累的被體系化的法令集，而且是彙集跨越兩個以上的郡，并與更廣泛的地區相關聯的法令集。可能不是為了一個人、一個機關的方便而編纂的，而是給更大範圍內的官府共同配備的，并流傳了下來。^①還提出，漢代的詔敕首先是在各官府中積累、整理的，或許至少在郡這一層級流傳著共同的詔敕集。^②《二年律令》這樣的律令彙編，和各郡流傳著的因積累而經整理的詔敕集（如果確實有的話），二者是否是一回事，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開始，“法令由一統”^③的制度已確立起來，“以法治國”的理念也漸漸融入社會。因此，律令法律體系已成為帝制時代國家政權的重要象徵。^④漢承秦制，制定律令的權力即國家的立法大權，也是由皇帝牢牢把持著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將正本《二年律令》理解為朝廷即中央政府所編纂并頒佈的法律彙編，是比較有說服力的。各郡縣根據其工作需要，從正本《二年律令》抄錄律令。今見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可能就是這樣形成的。在此前提下，《二年律令》首末簡的簡文，就較容易理解了。首簡（簡1）的“■二年律令”，就是其正本的原題名，必須照錄，以明示其來源和法律效力；末簡（簡526）的“律令二十九種”，祇是該抄本的小結，以顯示該抄本的狀況。帝制時代，嚴禁任何個人私自造法律。因此，這個法律彙編及其名稱，絕不可能是墓主個人或其他什么人私下所為。

4. 關於《二年律令》的製作年代與抄寫年代

這是兩個問題。一般說來，大體上是制定在先，抄寫在後。二者可能前後相隨，也可能不盡一致。《二年律令》中各個律令的制定，當處於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點，已為前揭各位學者的研究成果所證實（也許某個律的制定時間還可以進一步推敲）。

據研究，《二年律令》有繼承秦律者。這實際上反映了漢律源於秦律的史實。^⑤其中也有漢制定的，早者可溯及至漢二年蕭何“為法令約束”時（前205）所制定的，晚者則為呂后二年（前186）所制定的。這已為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1985年發表的概述所指明。^⑥可以肯定，《二年律令》所見的諸種律令，不是一次性立法活動所完成的。而關於《二年律令》

① [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

② [日]宮宅潔：《漢令の起源とその編纂》，《中國史學》第5卷（1995）。轉引自上注宮宅潔文。

③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④ 參見張建國《中國律令法體系概論》收入氏著《帝制時代的中國法》。

⑤ 詳見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高敏：《漢初法律全部繼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氏著《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考》。[日]山田勝芳：《張家山第二四七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と秦漢史研究》，《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3號。[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

⑥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具體哪一條律文為漢二年蕭何所造，持“高祖二年”說的學者并未明確指出。整理小組說，《二年律令·史律》有與《漢書·藝文志》所載漢律律文略同者，“這說明我們看到的確有蕭何所造的律文”。

的字體問題，意見則比較統一：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兩個以上的人抄寫完成的。^①

另外，探討《二年律令》的抄寫過程，對於理解和把握其題名也是很有必要的。陳耀鈞、閻頻先生曾就此做過推測，其看法是：墓主“在漢從政祇有九年的時間，即公元前202年至194年（惠帝元年）。從惠帝元年‘病免’至呂后二年還有八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他及時抄錄呂后《二年律令》及其他多種書籍”。^②即，認為這些書籍是墓主在因病去職後至去世前的八年間陸續抄寫的。雖然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因為其中還有呂后時期所制定的律令。但是，仔細推敲一下，這一推測又讓人感到有點疑惑，似乎有不太合常理之處，為什麼去職後要用八年時間來抄《二年律令》？是因為喜好嗎，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③另外，按照李學勤先生的理解，《二年律令》的抄寫當在呂后二年或稍晚一些。^④似乎還不能最後確定。這種說法，同樣也有讓人難以理解的地方。為什麼墓主會在其生命的最後時刻這麼做？況且《二年律令》顯然並不是一個人所抄寫的。

除了上述這兩種可能性之外，也不排除還有第三種可能性，即這些書等是墓主平時（包括在職時期）抄寫、日積月累下來。墓主曾長期擔任官吏，他在工作中根據需要隨時抄寫法律文書，這不是更合理的解釋嗎？

具體說，是否可以作這樣的假設：作為一個在縣府就職的官吏，主要從事司法審判、收稅斂賦的工作，多少還算是個文人，家中有些藏書並不奇怪，而且這些藏書大多與其生活和工作有密切的關係。《脈書》、《引書》，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得上，尤其是在“病免”後可用來健身強體，這些書极有可能是在去職後抄寫的；《算數書》，有助於其收稅斂賦的工作；《蓋廬》，或許是其從軍後留下的，也可能作為下級官吏有機會為其上司出謀劃策，或者有備於其將來從政，總之是對於其為官有益的書；而《二年律令》（可能是出於職業上的習慣，在其“病免”後仍繼續抄錄或請人接著抄錄朝廷頒佈的律令，直至呂后二年去世為止）和《奏讞書》，則與其最重要的日常審判工作密切關聯，經常要用到。因此，從其日常生活、工作使用這個角度分析，這些書不一定都是在去職後的八年時間裏抄寫的（醫書極有這種可能性，《二年律令》中惠帝元年以後的律令也是這個時期抄寫的），很有可能是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手頭常用的書，而且是逐漸抄寫積累起來的。

如果這個假設可以成立的話，那麼今見《二年律令》抄本，就不大可能是集中精力一下子抄寫完成的，應該有一個抄寫過程。而這個抄寫過程，大致是與《二年律令》中有關

① 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1985年第12期。[日]宮宅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解題》，《東方學報》京都第76冊。

② 陳耀鈞、閻頻：《江陵張家山漢墓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1985年第12期。

③ 按：邢義田已提出病免後仍抄錄新發佈的律令，不得其解。故以“病免後希冀早日復出”說釋疑，有其合理性。這也是本文下面所提假說面臨的難題，此說或可釋疑。存疑待考。詳見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新十五期，2—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④ 李學勤：《論張家山247號墓漢律竹簡》，收入《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李學勤卷》，417頁。

律令的制定時間相伴隨的。墓主可能參與抄寫，也可能沒有參與，而是由官府中的職業抄手完成后再配发给墓主的。這樣，《二年律令》的抄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時制定頒布，隨時抄錄，以便於使用。呂后二年，既是某些律令制定的時間，也是抄寫的下限。而關於其抄寫的上限，祇有一種可能：就是始自高祖五年。其理由有二：①同墓所出的曆譜，自高祖五年開始記錄，且墓主自此年開始“新降為漢”作官，因而抄錄漢朝的律令，即是其政治態度的反映，更是出於工作上的需要。②參照《奏讞書》所收錄的漢初案件，最早者也是高祖六年的（案例 16），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墓主在“為漢”官吏後，即因學習和工作需要而抄錄了漢朝的案例的實際狀況。這兩者在時間上大致相同，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西漢王朝正式建立後，在基層司法審判實踐工作中，朝廷要統一掌控制定和運用法律的迫切性。“法令由一統”的格局，在這裏體現得十分鮮明。漢簡《二年律令》，就是在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之間抄寫的。高敏先生曾提到這個時間段，但是僅將之視作《二年律令》的制定時限，是不夠充分的。

今見《二年律令》錄有蕭何在高祖二年制定的律令，也透露出一個信息：很可能在漢二年“為法令約束”時，蕭何就將其受命制定并沿用的秦律，編纂為法律彙編，統稱為“二年律令”。高祖五年二月西漢王朝建立後，仍然沿用并將該法律彙編推向整個國家。其以“二年”作為國家所編纂律令彙編的名稱，就是以示漢朝開國起步、始創法律之紀念。正如張建國先生所說，因為“不需要特別注明的祇有漢高祖時形成的文書”^①，所以時稱“二年律令”不會發生混淆或者不清楚的問題。《二年律令》之“二年”，就是指“漢二年”（前 205）。這是正本《二年律令》這一法律彙編開始制定、編纂的時間，也是其成文的上限。

三、餘論

綜上所述，圍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題名問題，可以有如下的認識：

第一，朝廷有正本《二年律令》，以供各郡縣複製、使用。該正本係彙編漢初的律令而成，其編纂始於漢二年（前 205）蕭何“為法令約束”時。此後，隨時制定頒佈律令，隨時編入。各郡縣也按規定在每年抄錄。從高祖五年起，就被作為西漢王朝的法典推行於全國。

第二，“二年律令”，為其正本原有題名，其抄本祇是照錄而已。“二年”指“漢二年”，是漢始創制法律之年，也是正本編纂成文的上限。因以“漢二年”之紀年為名，故稱為“二年律令”。

第三，今見《二年律令》為其正本之抄本、節選本，包括 29 種律令，是其墓主在高祖

^① 張建國：《試析漢初“約法三章”的法律效力——兼談“二年律令”與蕭何的關係》，收入氏著《帝制時代的中國法》。

五年“新降爲漢”後在工作中使用過而死後隨葬的。其抄寫時間爲高祖五年至呂后二年。

從正本《二年律令》的形成過程可知，《二年律令》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律令集合體。因此，處於帝制時代初期的漢朝，其所謂法典（儘管不規範，但是姑且如此表達），可能祇是法律彙編之類的東西，或許尚未出現魏晉時期那樣的有嚴謹體系和內在邏輯聯繫的封閉性法典。至少目前所見漢代法制史料，可以印證這一點。出土簡牘史料所見的秦律亦如此。現存史料還不能最終證明秦漢時期的法典形態究竟如何，但是懷疑漢代存在國家所編纂的、已固定成形的“法典”之說，^①却不能不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本文寫作中承蒙徐世虹教授提出很好意見，謹以致謝！）

① 參見[日]富谷至《晉泰始へ令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東方學報》（京都）72，2000；陶安あんと《法典編纂史再攷——漢篇：再び文獻史料を中心に據え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紀要》140，2000年；滋賀秀三：《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罰）》，第一章第2節，創文社，2003；胡銀康《蕭何作律九章的質疑》，《學術月刊》1984年第7期；孟彥弘《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歷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鄔文玲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考察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96、142、148、205、275、328、363、408、411、412、490 諸簡的釋文、句讀以及相關問題，校補釋文“審”、“各”、“勿”、“隨”、“迹”、“窮”、“追”、“或”、“赦”、“不”、“行”、“過”、“輒”、“戶”、“皆”、“銅”、“繕”、“治”等 18 處，並訂正幾處句讀。

關鍵詞 二年律令 故誤 群盜 身毋有所與 封泥 案戶 罷癘 銅病 傳送 繕治

自 2002 年 3 月以來，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考古與文獻研究中心李均明研究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謝桂華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徐世虹教授共同組織了張家山漢墓出土竹簡的研讀交流活動，對《二年律令》和《奏讞書》^①各簡之釋文、句讀、編聯、注解做了充分討論，提出許多精當的校改意見，並分別寫成校讀記，其中《〈二年律令〉校讀記》刊載於《簡帛研究 2002、2003》。^②我有幸參加了研讀班的大部分活動，獲益良多，深受啟發。在研讀班暫告一段落之後，我又對《二年律令》的釋文和圖版進行了仔細的校讀，發現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這裏不揣淺陋，試為“續貂”，以就教於方家。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本文所引《二年律令》均出自此書，不另注。

② 張家山漢簡研讀班：《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校讀記》（下稱《校讀記》），載《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鞠（鞠）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止（趾）為城旦，它各以其罪論之。其當穀（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93）罰歲金八兩；不盈歲者，罰金四兩。（94）□□□□兩，購、沒入、負債，各以其直（值）數負之。其受賕者，駕（加）其罪二等。所予臧（贓）罪重，以重者論之，亦駕（加）二等。其非故也，而失不（95）□□以其贖論之。爵戍四歲及穀（繫）城旦舂六歲以上罪，罰金四兩。贖死、贖城旦舂、鬼薪白粲、贖斬宮、贖劓、戍不盈（96）四歲，穀（繫）不盈六歲，及罰金一斤以上罪，罰金二兩。穀（繫）不盈三歲，贖耐、贖遷（遷）、及不盈一斤以下罪，購、沒入、負債、償日作縣（97）官罪，罰金一兩。（98）^①

按：據圖版，簡 95 與簡 96 連綴的“其非故也，而失不□□以其贖論之”一句，未釋的“□□”兩字，筆畫有相當一部分已經缺佚，但是根據殘存的筆畫和文義，可以分別補釋為“審”、“各”二字。簡 93 “故弗窮審者”的“審”字和簡 93 “各以其罪論之”以及簡 95 “各以其直數負之”的“各”字，其字形和筆畫均分別與此兩字相類。因此，全句當釋為“其非故也，而失不審，各以其贖論之”。^②大意是，如果不是故意為之，而是因無意的過失造成的，則各按相應的行為後果處以罰金。

漢代有比較嚴格的官吏法，對官吏的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罰甚為苛嚴，對執法官吏尤甚。由上述簡文可見，執法官吏如果有“鞠（鞠）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以及“受賕”等不法行為，都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同時漢初法律在刑罰適用中亦注意區分故意和過失的行為，即所謂“故”和“非故”或者“誤”的行為，一般遵從“故意從重、過失從輕”的原則。《二年律令》中還有不少相關的規定，比如《賊律》中即有下述條款：（1）“賊殺人、鬪而殺人，棄市。其過失及戲而殺人，贖死；傷人，除。（21）”（2）“諸上書及有言也謾，完為城旦舂。其誤不審，罰金四兩。（12）”（3）“□□□而誤多少其實，及誤脫字，罰金一兩。誤，其事可行者，勿論。（17）”可見，對於故意犯罪者的處罰明顯重於過失犯罪者，而對於未造成危害結果的無意過錯行為甚至可以免予處罰。

有記載表明，注重區分故、誤行為以及遵從“故意從重、過失從輕”的刑罰適用原則，在漢代的司法實踐中得到了嚴格遵行。《後漢書·郭躬傳》載：“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

① 《二年律令·具律》，147 頁。

② 李力先生持同樣的看法，參見氏著《關於〈二年律令〉簡 93—98 之歸屬問題的補充意見》，載《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而王充《論衡·答佞篇》有“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誅故實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等說法，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這些原則在漢代也是人所習知的司法通則。^①

此外，從圖版來看，簡 93 “其當馭（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一句，於“其當馭（繫）城旦舂”和“作官府”右側下均有勾識號“ \angle ”，相當於今天的頓號，應當標點爲“其當馭（繫）城旦舂、作官府償日者”，律文之意係指“馭（繫）城旦舂償日”和“作官府償日”兩種情形。

二

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強盜，即發縣道，縣道亟爲發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將，令兼將，亟詣盜賊發及之所，以窮追捕之，毋敢□（140）界而環（還）。吏將徒，追求盜賊，必伍之，盜賊以短兵殺傷其將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邊二歲。卅^②日中能得其半以上，盡除其罪；（141）得不能半，得者獨除；死事者，置後如律。大瘐臂臑股肱，或誅斬，除。與盜賊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逗（142）留畏與弗敢就，奪其將爵一級（級），免之，毋爵者戍邊二歲；而罰其所將吏徒以卒戍邊各一歲。與吏徒追盜賊，已受令而遁，以畏與論之。（143）^③

按：據圖版，簡 142 及簡 143 “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逗留畏與弗敢就”一句，所釋之“官”字當爲“勿”字，未釋的“□□□□□”五字，雖然筆畫嚴重缺佚，但各有部分筆畫殘留下來，根據殘存筆畫以及文義，可以分別補釋爲“隨、迹、窮、追、或”等五字，其字形、筆畫以及文義可參照《津關令》簡 494 “相國、御史請緣關塞縣道群盜、盜賊及亡人越關、垣離（籬）、格塹、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者得隨出入服迹窮追捕”。因此全句可釋作“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勿隨跡窮追或逗留畏與弗敢就”。簡文大意是，如果搜捕盜賊的隊伍完全有能力追擊并逮捕盜賊，却没有隨迹跟蹤、窮追到底，或者

① 關於漢代“故意從重、過失從輕”的適用刑罰原則的詳細討論，參見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適用刑罰原則》，《鄭州大學學報》2002 年第 4 期。

② “卅”字原釋作“三十”，今據圖版及《校讀記》改。

③ 《二年律令·捕律》，152 頁。

故意逗留、畏懦害怕不敢上前追捕，搜捕隊伍的將領及其所將吏徒都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律文體現出漢代政府對群盜問題的重視以及嚴厲打擊、防範群盜的舉措，下文還會比較詳細地談及這一問題，茲不贅述。

三

□□□□發及聞殺人而不得，官嗇夫、士吏、吏部主者，罰金各二兩，尉、尉史各一兩；而斬、捕、得、不得、所殺傷及臧（贓）物數屬所二千石（147）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能產捕群盜一人若斬二人，掾（拜）爵一級。其斬一人若爵過大夫及不當掾（拜）爵者，皆購之如律。所捕、斬雖後會□□（148）論，行其購賞。斬群盜，必有以信之，乃行其賞。（149）^①

按：據圖版，簡 148、149 “所捕、斬雖後會□□論，行其購賞”一句，未釋之“□□”兩字僅存右半筆畫，根據殘存的筆畫及文義，可以分別補釋為“赦”、“不”二字，全句當釋作“所捕、斬雖後會赦不論，行其購賞”。大意是所捕斬的群盜雖然後來遇到大赦而免予處罰，但是對於捕斬這些群盜的人仍然要按照規定進行獎賞。

何為群盜？歷來對這一問題多有爭議。《晉書·刑法志》云：“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注釋云：“群盜，合夥行盜。……秦代常用為對農民起義的侮辱性名稱”，如彭越、黥布皆曾為群盜。^②于豪亮認為“五人盜即群盜”^③。堀毅亦推測群盜係五人以上。^④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明確規定：“盜五人以上相與功（攻）盜，為群盜。（62）”於此可見群盜罪的界定需同時具備下述要件：一是五人以上，二是有組織地實施了暴力行為，即“相與攻盜”。二者缺一不可。^⑤看來以往對群盜罪界定問題的討論僅限於人數方面是不甚周全的。睡虎地秦簡表明，祇具備第一個構成要件即五人以上的盜竊行為，一般不界定為群盜罪，通常稱之為共盜，比如《法律答問》云：“夫、妻、子五人共盜，皆當刑城旦，今甲盡捕告之，問甲當購幾何？人購二兩。”“夫、妻、子十人共盜，當刑城旦，亡，今甲捕得其八人，問甲當購幾何？人購二兩。”

群盜問題是秦漢時代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往學者對此多有討論，這裏僅就《二年律令》中的相關資料，略作補充。對於政府而言，“群盜”不僅擾亂社會治安，更為重

① 《二年律令·捕律》，153 頁。

② 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120 頁。

③ 于豪亮：《秦律叢考》，載《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143 頁。

④ 堀毅：《秦漢盜律考》，載《秦漢法制史論考》，法律出版社，1988，236 頁。

⑤ 參見曹旅寧《秦律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251 頁。

要的是，群盜通常擁有武器，且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往往對現政權構成一定威脅，正如陳忠所言：“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奸。”^①因此，群盜問題一直備受秦漢政府的關注。已有的材料表明，秦漢政府對於群盜現象的防範和打擊都非常嚴厲。睡虎地秦簡中即有不少關於群盜的條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中有關群盜的條文更為詳細，占有很大比重，茲略舉數例如下：

(1) 智(知)人為群盜而通飲(飲)食餽遺^②之，與同罪；弗智(知)，黥為城旦舂。其能自捕若斬之，除其罪，有(又)賞如捕斬。(63) 群盜法(發)，弗能捕斬而告吏，除其罪，勿賞。(64)

(2) 群盜及亡從群盜，毆折人枳(肢)，肢體，及令跛(跛)蹇(蹇)，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及投書、縣(懸)人書，恐獨人以求(65) 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塚(塚)，略賣人若已略未賣，矯(矯)相以為吏^③、自以為吏以盜，皆磔。(66)

(3) 群盜殺傷人、賊殺傷人、強盜，即發縣道，縣道亟為發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將，令兼將，亟詣盜賊發及之所，以窮追捕之，毋敢□(140) 界而環(還)。吏將徒，追求盜賊，必伍之，盜賊以短兵殺傷其將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邊二歲。卅日中能得其半以上，盡除其罪；(141) 得不能半，得者獨除；死事者，置後如律。大瘻臂臑股肱，或誅斬，除。與盜賊遇而去北，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勿隨迹窮追或逗(142) 留畏與弗敢就^④，奪其將爵一級(級)，免之，毋爵者戍邊二歲；而罰其所將吏徒以卒戍邊各一歲。與吏徒追盜賊，已受令而逋，以畏與論之。(143)

(4) 群盜、盜賊發，告吏，吏匿弗言其縣廷，言之而留盈一日，以其故不得，皆以鞠獄故縱論之。(146)

(5) 群盜、命者，及有罪當命未命，能捕群盜、命者，若斬之一人，免以為庶人。所捕過此數者，贖如律。(153)

以上材料表明，(1) 為了有效地遏制群盜勢力的壯大，除了對群盜的犯罪行為從嚴懲治之外，漢朝政府對知情者為群盜提供飲食等物資供應的行為嚴懲不貸，通常將其視為與群

① 《後漢書》卷四十六《陳寵列傳》附《陳忠傳》。

② “遺”原釋作“饋”，今據圖版及謝桂華《張家山漢墓竹簡[247 號墓]校讀舉例》(《簡帛研究二〇〇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改。

③ “矯(矯)相以為吏、自以為吏以盜，皆磔。”原讀為“矯(矯)相以為吏，自以為吏以盜，皆磔。”今據文義及《校讀記》改。

④ “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勿隨迹窮追或逗留畏與弗敢就”原釋文為“及力足以追逮捕之而官□□□□留畏與弗敢就”，今據圖版及文義改，詳見本文第二部分。

盜同罪，處以極刑，此即漢律中所謂“通行飲食罪”。成帝年間，尹賞為長安令時，即對長安城中剽劫殺人、擾亂治安的數百名閭里少年、輕薄惡子“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群盜”之罪，收捕案驗，置於虎穴中處死。^①（2）政府鼓勵告發、捕斬群盜，對於告發、捕斬群盜的行為大加購賞。正如簡文所示，即使所捕斬的群盜後來遇到大赦而免予處罰，但對捕斬群盜的人仍然要按照規定進行獎賞。尹灣漢墓簡牘“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亦表明，不少縣道的令長及屬吏是因為捕斬群盜績效顯著而獲得升遷的。比如“下邳令六安國陽泉李忠故長沙內史丞以捕群盜尤異除”，“開陽右尉琅邪郡桓王蒙故游徼以捕群盜尤異除”，“利成左尉六安國六殷順故畜夫以捕斬群盜尤異除”，“平曲丞琅邪桓胡毋欽故亭長以捕格群盜尤異除”。^②（3）政府明令各縣道嚴密警戒群盜動向，一旦群盜出動，各縣道要及時組織力量進行追捕，力求一網打盡。對追捕不力者以及群盜事發而未及時發覺、及時報告者，均嚴加懲處。武帝時頒布“沈命法”，規定“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③

儘管政府關於禁絕群盜的律令越來越嚴苛，但群盜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徹底消除。漢政府認識到僅僅憑藉強制打擊手段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也不時採取溫和的拉攏、分化政策，緩解緊張的局勢，比較有效的做法即是頒布大赦令。在大赦制度下，一般除了特別規定不在赦免之列的罪行之外，其他犯罪均可得以免除。大赦令頒布之後，對於一定時限內的犯罪，無論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已擒獲未擒獲，都予以赦免。對於未擒獲的逃亡藏匿者遇到大赦免予追究的情形，史籍中通常表述為“會赦出”^④，對於已經捕獲、正在審理的案件當事人遇到大赦免予追究的情形，則通常表述為“會赦不治”^⑤。這與簡文中的“會赦不論”含義相同，而且有證據表明群盜通常也在赦免的效力範圍之內，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即有關於“群盜赦為庶人”的內容。事實證明對所謂盜賊問題採用溫和的寬免政策，常常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宣帝時期龔遂成功地解散了渤海一帶的“盜賊”^⑥，章帝時期曾頒布赦令，成功平定了一度波及濱海九郡、以張伯路為首的“海賊”。^⑦

① 《漢書》卷九十《酷吏傳·尹賞》。

②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85—89頁。

③ 《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王溫舒》。

④ 《漢書》卷九十《酷吏傳·嚴延年》。

⑤ 《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劉非”、“廣川惠王劉越”。

⑥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龔遂》。

⑦ 《後漢書》卷三十八《法雄列傳》。

四

捕盜鑄錢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級。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許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隸臣妾、收人、（204）司空三人以爲庶人。其當刑未報者，勿刑。有（又）復告者一人身，毋有所與。訶告吏，吏捕得之，賞如律。（205）^①

按：據文義，簡 205 “有（又）復告者一人身，毋有所與”一句，“身”字當屬下讀，全句當讀爲“有（又）復告者一人，身毋有所與”。大意是又免除一名告發者的賦役，免除者本人無須承擔徭賦。張政烺先生在解釋王杖十簡第四簡“市賣復毋有所與”時指出，“復毋有所與”是漢代公文中之成語，常見於律令。如《漢書·高帝紀》：十二年“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文帝紀》：四年“復諸劉中有屬籍家無所與”。《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郊祀志》：武帝禮登中嶽，“以山下戶凡三百封畝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復毋有所與”即免除賦役。古代養老常復其子孫，《管子·入國》篇“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八十已上二子無征，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漢書·賈山傳》：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謂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復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夏四月己巳詔曰：“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②

簡文所謂“身毋有所與”表明，此種情形之下的賦役免除僅限於被免除者本人，不包括其家人，亦不得讓與家人。居延漢簡 306·22 云“千戶一人復，身毋有所與，身不當事”^③，亦強調了同樣的含義。如果賦役的免除不僅限於本人且及於家人的話，有關令文也會明確規定復除的對象，比如《漢書·高帝紀》：五年夏五月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詔文表明，復除的對象不僅限於軍吏卒本人，而且包括其家人，即所謂“皆復其身及戶”。可見，關於免除賦役的令文通常都會明確限定免除的對象，或爲本人，或爲子孫，或爲全家。

又：據文義，簡 204、205 “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隸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爲庶人”一句，當讀爲“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

① 《二年律令·錢律》，160 頁。

② 張政烺：《王杖十簡補釋》，載《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382 頁。

③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

白粲二人，隸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爲庶人”。律文實際上包含了三種免除罪人的方式：（1）免除死罪一人以爲庶人；（2）免除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以爲庶人；（3）免除隸臣妾、收人、司空三人以爲庶人。

五

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過半日至盈一日，笞百；過一日，罰金二兩。郵吏居界過書，（273）弗過而留之，半日以上，罰金一兩。書不當以郵行者，爲送告縣道，以次傳行之。諸行書而毀封者，皆罰金（274）一兩。書以縣次傳，及以郵行，而封毀，□縣□劾印，更封而署其送徼（檄）曰：封毀，更以某縣令若丞印封。（275）^①

按：據圖版，簡 273 “不中程半日”前漏釋一“行”字。又簡 275 “□縣□劾印”一句未釋“□”、“□”兩字的筆畫有部分缺失，但根據殘存筆畫及文意，可以分別補釋爲“過”、“輒”二字，其字形和筆畫可分別參見簡 273 的“過”字和簡 247 的“輒”字。因此，全句當釋爲“過縣輒劾印”。意思是在文書的逐縣傳遞過程中，所經過的縣要仔細檢查封印是否完好，如果遇到封毀的情況，需要重新封緘鈐印，且附文說明，隨同文書一并繼續傳送。大量出土簡牘資料表明，漢代官文書在傳遞過程中施行了比較嚴格的文書收發登記制度，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則是登記封泥的完好與否，以及遇到封毀或者封破時進行更封或者旁封的情況。封泥完好則記爲“封完”，比如居延漢簡 128·2 “入南書二封 居延都尉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起詣府封完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時 時狐受孫昌”，130·11 “□□□封完□□□明受□□”。^②封泥殘破則記爲“封破”，同時還要記錄有無旁封以及旁封者的姓名。比如居延新簡 E. P. T7:31 “□北行詔書一封封破□□□”，E. P. T59:504 “丁丑到留遲封破毋旁封記到各推□”，E. P. W:53 “書一封封破宋詡”，E. P. C:24 “□一封張掖大守章 詣府 ●一封封破張尊爲旁封 ……”^③居延漢簡 505·39 “北書五封 一封遣杜陵左尉印詣居延封破□□旁封 十月丙寅起 卒順”。^④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107 “入西臯布緯書一封，大司徒印章，詣府。緯完，賜……從事宋掾書一封，封破，

① 《二年律令·行書律》，170 頁。

②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④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詣府”^①。[II 0114(2):89]

根據以上資料，所謂封毀似指封緘文書的封泥及封印在傳遞過程中毀敗不存，需要所經過的縣道重新封緘鈐印，并附文說明用印的情況，此即“更封”。所謂封破，似指封緘文書的封泥及封印在傳遞過程中有殘損破裂，並沒有完全毀壞，在這種情況下，不需要重新封緘，祇需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加固，并注明加固者的姓名，此即“旁封”。

六

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副臧（藏）其廷。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328）及實不徙數盈十日，皆罰金四兩；數在所正、典弗告，與同罪。鄉部嗇夫、吏主及案戶者弗得，罰金（329）各一兩。（330）^②

按：據圖版，簡 328 “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籍，副臧（藏）其廷”一句之“戶”字下有重文號，全句當作“恒以八月令鄉部嗇夫、吏、令史相襍案戶，戶籍副臧（藏）其廷”。

簡文中所謂“案戶”，也即“案比”或者“案戶比民”，是漢代按戶調查登記并核實人口的一種制度。^③其“案”的對象當是“戶”即各戶民人而不是戶籍，主持案戶的官員必須按戶逐人親閱年貌、檢視性別及其健康狀況，然後登記造冊，形成戶籍，并將戶籍的副本上交縣廷集中收藏管理。且後文即簡 329 中有“案戶者”之語可與“案戶”之說相互呼應和印證：如果“案”的對象是“戶籍”的話，則後文之“案戶者”當為“案戶籍者”。

案比制度起源甚早，《周禮·地官·小司徒》云：“及三年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玄注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賈公彥疏曰：“……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時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④

案戶的方式當是由各縣道派遣有關官吏到下屬各鄉，與鄉部嗇夫一道，以鄉為單位將民戶集中起來，逐人驗看，檢視其年貌、性別及健康狀況，并登記造籍。正如《管子·度地》云：“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

①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9 頁。

② 《二年律令·戶律》，177—178 頁。

③ 參見錢劍夫《漢代“案比”制度的淵源及其流演》，載《歷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

④ 《周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1991，711 頁。

輒免之；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

《後漢書·江革傳》載：“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動搖，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可見，案比時，不論老幼必須親往指定的地方，以便細閱年貌，所以才有江革親自挽車載母參加案比之舉。關於案比，李賢注曰：“案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又《張遷碑》云：“八月算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①意思是張遷為縣令時，改變以往的案比方式，選擇近便處集中鄉民，不需要他們像從前一樣遠赴指定的地點集中。這不失為一項體恤鄉民的德政，因此得到吏民的稱頌。

《後漢書·皇后紀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算賦，故曰算人。”這裏的算人即是案比。也說明：（1）案比必須按戶逐人親閱年貌，所以是選聘良家美女的最好機會。^②（2）案比通常是在鄉中進行的，因此才有中大夫、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之舉。^③

由於通過案比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高年之人數及具體年齡，因此在東漢時期案比之時通常兼行養老之禮。《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舖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後漢書·安帝紀》也說：“《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案比之時須詳細紀錄民人之姓氏、年貌、性別以及健康狀況等，編造“戶籍”。戶籍造成之後，正本留於鄉中，此即所謂“鄉戶籍”，又稱“戶版”，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七“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條引鄭衆注曰：“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孫氏案曰：“鄉戶籍者，即謂鄉里戶口之名數也。漢時戶籍亦以版書之，故又謂之戶版。”^④居延漢簡 81·10“建平三年二月壬子朔丙辰，都鄉嗇夫長敢言之。□同珍^⑤，戶籍臧（藏）鄉，名籍如牒，毋官獄征事，當得□”^⑥。簡文中所謂“戶籍藏鄉”，

① 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489頁。

② 參見錢劍夫《漢代“案比”制度的淵源及其流演》，《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 關於漢代案比的地點究竟是在縣還是在鄉的問題，邢義田先生有過詳細的討論，參見氏著《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二分冊。

④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2000，229頁。

⑤ “珍”原釋文作“均”，今據邢義田《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居延漢簡整理近況簡報》（載《古今論衡》2000年第4期）改。

⑥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即是指戶籍正本留存於鄉中。同時需抄錄副本一份，呈送縣廷集中保管。《二年律令·戶律》明確規定：“民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謹副上縣廷，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官畜夫印封，獨別爲府，封府戶。”

七

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者，以爲罷癯（癯）。（363）^①

按：據圖版，簡363“及天烏者”之“者”字當爲“皆”字，全句當讀爲“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皆以爲罷癯（癯）”。

“罷癯”一詞之本義當是指某種身體殘疾，尤其是先天性的肢體殘疾，猶如今言殘廢。

《史記·平原君列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正義云：“躄，跛也。”索隱云：“罷癯，謂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這是稱跛或背疾爲罷癯。又《漢書·陳湯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陳湯的兩隻手臂不能屈伸，自稱爲罷癯。^②

後來“罷癯”一詞逐漸演變爲對因身體殘疾而喪失或者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群體的稱謂，除了上述身體殘疾者之外，還包括以下幾種情形：一是身材異常矮小，已達到傅籍年齡但身高不夠“六尺二寸”者，正如簡文所云：“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皆以爲罷癯（癯）。”又《史記·項羽本紀》如淳注引漢律云：“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癯。”與簡文內容一致。於此亦見秦漢時代之傅籍標準當是雙重的，既有年齡標準，亦有身高標準。如果遇到年齡無法確認的特殊情況，很可能會根據身高推定其年齡。《二年律令·戶律》云：“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母、同產爲占者，吏以口比定其年。自占、占子、同產年，不以實三歲以上，皆（325）耐。產子者恒以戶時占其口（326）口罰金四兩。（327）”其中“吏以口比定其年”句之“口”字，整理小組未釋，檢視圖版，此字尚殘存部分筆畫，似可釋爲“高”。如此，則全句似可釋爲“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母、同產爲占者，吏以高比定其年”。

① 《二年律令·傅律》，182頁。

② 參見于豪亮《秦律叢考》，載《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138—139頁。

二是有嚴重的兵器創傷及長期患病者。《二年律令·徭律》云：“金瘕、有錮病^①，皆以爲罷瘠（癘）。”國家通常給予這部分“罷瘠”人群免除或者部分減免徭役賦稅的優待，如《二年律令·徭律》規定：“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眊老，若其父母罷瘠（癘）者，皆勿行。金瘕、有錮病，皆以爲罷瘠（癘），可事如眊老。其非從（408）軍戰瘕也，作縣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勿（？）以口眊（？）瘳之令、尉前。（409）”因此，在進行戶口統計、編造戶籍時，對“罷瘠”之人，要特別加以申報，以便作爲享受免除徭賦優待的依據。正如《管子·度地》所云：“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爲了防止有人冒充“罷瘠”以逃避徭賦，秦律規定，如果申報罷瘠不實，里典、伍老都要受到懲處。《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傳律”云：“匿敖童，及占瘠（癘）不審，典、老贖耐。”儘管“罷瘠”群體原則上享有一定的優待，但實際情況也許並非如此，王莽就曾經批評西漢時期的徭賦過於沈重，以至“罷瘠咸出”^②。

八

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眊老，若其父母罷瘠（癘）者，皆勿行。金瘕、有口病，皆以爲罷瘠（癘），可事如眊老。其非從（408）軍戰瘕也，作縣官四更，不可事，勿事。勿（？）以口眊（？）瘳之令、尉前。（409）^③

按：據圖版，簡 408 “金瘕、有口病，皆以爲罷瘠（癘），可事如眊老”一句，未釋讀的“口”字，尚有部分筆畫殘存，結合文意，可釋爲“錮”字，全句當讀爲“金瘕、有錮病，皆以爲罷瘠（癘），可事如眊老”。意思是凡有金瘕、錮病之人，皆視爲“罷瘠”，在徭役負擔方面，比照眊老行事。錮、痼二字相通，錮病也作痼病。前引《管子·度地》云：“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漢書·王子侯表》：“東莞侯吉……痼病不任朝，免。”錮病即痼疾之意，前引東莞侯吉之事，《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作“侯吉有痼疾，不朝，免”。《漢書·賈誼傳》顏師古注曰：“錮疾，堅久之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長期難以治癒的疾病。根據有關材料看，在秦漢時代，是否身患痼疾通常也是任免官吏的標準之一。《後漢書·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

① 關於“錮”字，整理小組未釋，今據圖版改，詳見本文第八部分。

② 《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中》。

③ 《二年律令·徭律》，188 頁。

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州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可見，“身無金瘡痼疾”當是選任博士的標準之一。又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食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①。亦有官員以身患痼疾爲理由請求辭官致仕，如《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楚國先賢傳》曰：“石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

九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訾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411）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412）敢繇（徭）使。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413）勿以爲繇（徭）。市垣道橋，命市人不敬者爲之。縣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當繇（徭）。戍有餘及少者，隤後年。興□□□（414）□□爲□□□□及發繇（徭）戍不以次，若擅興車牛，及繇（徭）不當繇（徭）使者，罰金各四兩。（415）^②

按：據文意，簡411“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訾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一句，“及益”二字當屬下讀，否則於文意不通，難以理解。整理小組注曰：“益，疑意爲助。”但未舉出充足證據，難以令人信服。如果“及益”二字與下文聯讀，則文通意順，“益”爲副詞，有“增加、追加”之意。因此，全句當讀爲“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訾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意思是，遇有傳送任務時，如果縣道官府的車牛數量不夠，即命大夫以下達到一定財產標準的人家，按照財產的多寡提供相應的車牛，同時又命沒有足夠財產的人家提供牛食、繩索及裝載工具。

居延漢簡中有關於貲家出車牛穀粟及雇用就人行委輸傳送的記載：簡16·2“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車一兩 輪甲溝候官 始建國五年六月 令史 受貲家當遂里王護”。簡267·16“貲家安國里王嚴 車一兩 九月戊辰載就人同里時褒已到未言卿”^③。居延新簡

① 《後漢書》卷三十三《周章列傳》。

② 《二年律令·徭律》，188頁。

③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E. P. T59:100 “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貲家茂陵東進里趙君壯就人肩水鄧宗”。E. P. T59:175 “出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貲家昌里齊惠就人同里陳豐付吞遠置令史長”。E. P. F22:364 “所受適吏貲家部吏卒所輸谷車兩”。E. P. T50:51 “發芘家車牛載輪候官第□”。^①這些所謂“貲家”，應該就是我們所討論的簡文中的“有貲者”。

又據文意，簡 411、412 “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一句當讀為“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意思是，官吏和皇帝的侍從無須承擔傳送及其相關事務，既不需要提供車牛，也不需要提供牛食、繩索及裝載工具。“給……事”當是漢代的習用句式，應連讀，不宜斷開，比如簡 157 有“給通事”，簡 407 有“給邑中事”等用法。

又據圖版，簡 414 頂部殘斷，因此“勿以為繇（徭）”之前當補一斷簡符號“□”，簡 414 的最末一字為“興”，因此簡序編號“414”應置於“興”字之後。

綜上所述，整段簡文當重新讀為“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貲（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貲（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411）與給傳送事。委輸傳送，重車重負日行五十里，空車七十里，徒行八十里。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412）敢繇（徭）使。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413）□勿以為繇（徭）。市垣道橋，命市人不敬者為之。縣弩春秋射各旬五日，以當繇（徭）。戍有餘及少者，隕後年。興（414）□□□□□為□□□□及發繇（徭）戍不以次，若擅興車牛，及繇（徭）不當繇（徭）使者，罰金各四兩。（415）”。

十

一、御史言，越塞關關，論未有□，請關出入塞之津關，黥為城旦舂；越塞，斬左止（趾）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贖耐；令、（488）丞、令史罰金四兩。智（知）其請（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傳，令以關出入者，與同罪。非其所□為□而擅為傳出入津關，以（489）傳令關令論，及所為傳者。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②、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490）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制

①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

② “官屬”原釋文作“官屬人”，衍釋“人”字，今據圖版及謝桂華《張家山漢墓竹簡[247 號墓]校讀舉例》（載《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改。

曰：可。^①（491）

按：簡 490、491 “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句未釋字頗多，據圖版，“□□塞郵”中未釋之“□□”兩字，尚有部分筆畫殘存，借助放大鏡能夠比較清楚地辨認出是“繕治”二字，其字形和筆畫可以分別參照簡 413 的“繕”字和“治”字。因此可補釋為“縣邑傳塞，及備塞都尉、關吏、官屬、軍吏卒乘塞者□其□□□□□日□□牧、繕治塞郵、門亭、行書者得以符出入”。儘管其餘的文字漫漶不清，無法釋讀，但大意可以了然，至少備塞都尉、關吏、官屬、守衛邊塞的軍吏卒，以及修繕塞郵、門亭的人和傳遞文書的人可以憑藉符傳出入關塞。

定期繕治郵塞、郵亭當是漢代重要的邊防事務之一，居延漢簡 157·15 “□燧謹責問第四守候長□以繕治亭隧候望日迹送□爲□”^②。居延新簡 E.P. T52:396 “秋當蚤糴書到豫繕治倉吏部郵辟□□”^③。昭帝時，老將趙充國所條陳的著名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之第六事即“以閑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④。東漢建武十四年，揚武將軍馬成“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⑤。如果障塞、亭燧得不到及時、經常修繕的話，很快就會破敗不堪，失去邊塞防衛的功能。元帝時，以王昭君出塞與匈奴和親，匈奴單于表示願意為漢朝守衛上谷以西至敦煌的邊塞，請求漢朝罷撤原來的守邊吏卒，朝中官員多認為匈奴單于的建議可行，郎中侯應力排眾議，陳述了十條反對的理由，其中第九條說“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⑥。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謝桂華師的悉心指導，亦承馬怡、楊振紅兩位先生指教，謹此并致謝忱！）

① 《二年律令·津關令》，205 頁。

②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③ 《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

④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傳》。

⑤ 《後漢書》卷二十二《馬成列傳》。

⑥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傳下》。

《二年律令·賊律》整理芻議

◎ 甘肅省博物館

初世賓

內容提要 本文從簡牘學、考古學、史學、法學相結合的角度，對漢初《二年律令》賊律的整理研究中有關的簡牘冊式、釋文闕疑、標點句讀、律文編次、罪刑結構，以及律令的名稱、年代、定位，和秦漢法律體現在賊律上的主要區別等等問題，提出一些新的認識和思路。

關鍵詞 《二年律令·賊律》 整理研究 幾點認識

湖北江陵張家山 247 號西漢墓，出土了呂后二年（前 186）的《二年律令》，及其他多種重要簡牘本珍貴文獻，共計有竹簡 1236 枚（不含殘片）。^①其中的《二年律令》是繼雲夢睡虎地《秦律》之後古法律史料的又一次重大發現，將亡佚已久的《漢律》重現世間。

秦漢律法在封建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啓後的地位。漢初律令沿襲秦制，經文、景、武、宣諸朝的改革，日趨完備，奠定了中央集權式國家律法之基礎。漢律和唐以前諸律久已失亡。清末程樹德積廿餘年著漢魏等九朝律令^②，搜輯散佚，鈎稽考定，一代典章，所餘不及十一。敦煌、居延漢簡律法資料雖彌足珍貴，但屬漢武以後制度，又殘章斷牘，研究者頗不得要領。現在有了《二年律令》，漢初律法面目已清楚。不僅可知秦、漢法制之聯繫，即是武帝以後的變革，及下啓魏晉隋唐的軌迹，也是最直接可靠的指南和鑰匙。

① 參見《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② 見程樹德《九朝律考》（商務印書館，1963），包括漢、魏、晉、梁、陳、北魏、北齊、北周、隋共 9 種律令輯考。

一、《二年律令》的冊式問題

《二年律令》見載《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一書^①，（下簡稱《竹簡》）共有竹簡 526 枚。包括二十七種律和一種令^②，雖無目錄，但每種律令尾部都有律名簡，律名寫在該簡上首，如“賊律”、“盜律”等等，全律共有 27 枚律名簡和 1 枚令名簡。

律的排次，依次為《賊律》、《盜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最末為《津關令》。《賊律》首簡背面題署“二年律令”四字較大，為總名稱。整理小組據《具律》有“呂宣王內孫、外孫……”有罪可減刑，及同出曆譜終止於呂后二年，斷定“二年”為呂后二年（前 186）。高、惠時無呂宣王事，文帝誅滅諸呂，律法不容出現呂氏，故其說無大誤，至少是年代的下限，但不一定是制律的最初年代。

總名稱署於首簡背後，收卷時，篇題露在冊卷最外。《竹簡》附錄二“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圖示該首簡（即簡 1，出土號 F14）確實位於冊卷最周邊（按，所見為竹簡下端）。此圖仔細地畫出了 1200 餘枚竹簡出土時的原始放置狀態^③，可見簡牘發掘、整理綴聯是科學的。這對今後的簡牘發掘整理啟益莫大，但還需增加一些必要的說明。例如，圖示為冊卷的上下（天地）哪一頭，各冊是否一致，編聯情況如長度、枚數、內容，以及怎樣收卷，等等。

簡牘冊書一般呈卷狀保存。關於收卷，《蓋廬》出土號 G1—G55 由外而內順時針旋轉，但內容却是篇首居中而篇末在外，知此書從右端卷起向左收卷。圖示當是書簡的天頭。《奏讞書》也呈卷狀，出土號 E1—E197 由外而內逆時針旋卷，也是篇首在中，即由右向左卷的，與《蓋廬》同。但冊書放置位置相反，圖示為書簡地頭。前者 55 枚、後者 228 枚都是編成長冊，再從右向左收卷。這樣，末簡的篇題便可顯露。《二年律令》与之有別，有簡 526 枚，為《奏讞書》的二倍多，是通編到底，還是按律單編分開，或將單編的諸律令再綴聯一起，《竹簡》未作交待。其次，總篇題在首簡之背，收卷時顯然應從左端即篇末向右方卷。再次，據圖示《二年律令》呈較長而扁的卷狀，像一個折疊的被褥，也可能原來為卷狀，后因挪動而拉長。總之，《二年律令》的編綴、收卷、放置等情況值得注意。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

② 《竹簡》發表的二年律令中，無《囚律》。據說，整理小組有人認為，應從現存的《具律》中，分出《囚律》。這樣，全部律令就應當包含 28 種律，一種令。

③ 這一示意圖可能是根據簡牘出土狀態的照片繪製的。

二、《賊律》的內容補闕

《二年律令·賊律》共有竹簡 54 枚，據現存簡數、容字、內容看，基本不缺。

簡 3，文字殘失較多，據《捕律》簡 151 “捕從諸侯來爲間者一人，拜爵一級”的內容，此殘簡可補爲：從諸侯來誘及爲間者磔，及逃亡諸侯論何罪云。簡 1、2 言據城池反叛棄逃降諸侯謀反，皆腰斬、夷三族。此條言爲諸侯耳目說客處磔刑。又，漢初更有諸侯勾結匈奴謀反，如韓王信、趙相陳豨、燕王盧綰等^①，不知原來是否有類似條款。

簡 14，頂端有殘缺，視圖版所缺爲三個字。

簡 17，《竹簡》釋文缺文作三方框，可補爲“諸爲書而誤多、少其實，及誤脫字，罰金一兩。誤，其事可行者，勿論。”所補參照簡 12 “諸上書”，和簡 13 “爲僞書者”兩條。

簡 44、45 開頭殘缺，參照簡 34 及簡 41、42，補出“奴婢毆傷主父母、妻子者，棄市……”。“其與詬詈主、主父母、妻子、同產者，以賊論之”。前後共補九個字。

三、《賊律》的某些句讀標點

《賊律》釋文個別句讀還可斟酌，僅羅列如次，先列出改動了的句讀，然後說明理由。

簡 1：“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斬。”此條三種情況以分號區別。一是據城反叛并降諸侯；二是諸侯來攻而弃守，或投降；三是其他謀反罪。

簡 4、5：“鄉部、官嗇夫吏主者弗得，罰金各二兩。”鄉部、官嗇夫，分別是鄉里、城廂負責治安、捕捉盜賊的官吏，即“吏主者”。

簡 6、7、8：“船嗇夫吏主者贖耐”，“船嗇夫吏遷”。此二處足證嗇夫即吏或吏主者，二者是一。

本條後半：“其敗亡粟米它物，出其半，以半負船人，舳舻負二、徒負一。其可紐繫而亡之，盡負之，舳舻負二，徒負一。罰船嗇夫吏金各四百。流殺^②、傷人、殺馬牛，又亡粟米它物者，不負。”理由是舳舻和徒就是船人，而負二、負一是半負、盡負的承擔比例，即分別承擔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渡船將粟米它物泡水淹沒造成損失，和本可拴繫避免而損失，管理船人的嗇夫吏均需罰金。又，流殺、傷人是兩種罪。這裏援用數罪罰重不并罰的原則，既定流殺傷罪，就不再承擔粟米它物的損失責任。

① 均見漢書本傳。

② 流殺，《竹簡》釋淹死。按，流當釋漂流、流失之流，即渡船因洪流或駕駛原因而失控、覆傾、撞岸、落水造成之傷亡。

簡 12，首句應句斷，作“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即上書謾和有言謾兩種罪。

簡 14、15：“諸詐增、減券書”，“爲書故詐、弗副”。詐增、詐減是二罪，前者“受賞賜財物”大其數，後者減少“以避負債”。二者又分別與“所不當得爲”、“以避論”相對應。《晉書·刑法志》引張斐注律云^①：“背信藏巧謂之詐。”爲書故詐，是蓄意以不實的文書詭詐。副，可以釋作文書副本。但券契都是一式數份。弗副就是不做券契的另份，與故詐改數位不是一回事，但弗副也帶有欺詐的性質。

簡 17：“誤多、少其實。”亦應點開，多少和多、少，詞性不同。

簡 18：“或命糴謂騷毒，詔所令縣官爲挾之，不用此律。”《竹簡》詔字前作句號。據文意，是詔書允許縣官挾用的騷毒等。

簡 19：“軍吏、緣邊縣道，得和爲毒，毒矢謹藏。即迫外蠻夷盜，以假之，事已輒收藏。匿，及弗歸，盈五日，以律論。”軍吏指軍事系統，緣邊縣道指邊郡行政民事。匿是私藏匿不交，弗歸是其他丟失、失盜、毀壞等不歸回的情形。

簡 27、28：“其毋傷也，下爵毆上爵，罰金四兩；毆同列以下，罰金二兩。其有疥瘡及口，罰金四兩。”罰四兩、二兩，皆屬毆擊未傷人。又毆擊形成皮膚破傷腫瘡，不僅限於毆擊同級及以下，下爵毆上爵也會有疥瘡破傷。故不論下毆上，還是毆同列，有疥瘡一律罰金四兩。或是有疥瘡本身罰金四兩，毆擊另按未傷計算。這樣，下毆上致疥瘡便要罰金八兩。

簡 34：“賊殺、傷”，殺人、傷人爲二罪。簡 38、39、50 等均同此。

簡 42、43：“……泰父母之同產，及夫父母同產，夫之同產；若毆妻之父母，皆贖耐。”分號前爲妻毆夫之親屬，此之後爲夫毆岳父母。

簡 52 應作：“亡書、符卷、入門衛木久、塞門城門之顛，罰金各二兩。”

以上諸處，謹從古籍之整理、研究和流傳的角度考慮，做一點小小的修改。

四、賊律的編次

律條編次，是罪名、罪目、刑名的定性、次序和相互關係。例如《賊律》，根據“賊”的法理罪則，將賊的行爲分類定爲諸罪名。罪名之中，又據實情和推理，概括其不同情況、情節、檔次，定爲罪名分目，最後處以不同刑罰。律條是犯罪、治罪的基本標準、原則，而不是繁瑣細微的條文。故律有原則性、包容性、可參比性。《二年律令·賊律》體現了這

^① 程樹德：《九朝律考》引此或作“張斐律表”。晉志云：“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以注律，表上之，其要曰……”云云，下文又有“表陳之”、“上書”、“上奏”、“上言”、“上議”等，均指所上表奏，故當稱《律注》。《竹簡》注釋引程書亦皆作《律表》。

些特點。如相同、相似、相近之罪，編次相近。從總體看，重罪在前，輕罪在後；近親在前，遠親在後；一般在前，特殊在後；處罰總則在前，分則在後；重刑在前，輕刑在後，其規律、邏輯性很強。當然，這也與《竹簡》整理小組的工作密不可分，使我們能見到接近於原貌的古律。

據以上認識，試檢驗《賊律》律文編次，並略做調整。

首先，以下三組，據出土位置、次第和內容，編次可靠。一是開篇的簡 1、2、3 三枚，有總署名，內容為謀反、降諸侯、助諸侯反，必定在律首。二是簡 11 至 21 (C4—C14) 10 枚。排列整齊連續，內容依次為偽書、挾毒和殺傷人，符合制律規則，編次無誤。三是簡 29 至 35 (C321—315) 7 枚，出土特徵同前，包含毆擊、殺傷親屬等，編次亦不誤。此三組可作為全篇排次的三個基礎點，其分居於篇首、中部亦大致不誤。

簡 4、5 (F17、16) 兩枚出土位置近篇首，賊燔城池民室，屬於逆亂的政治罪，當接謀反罪之後。

簡 6 (F14)、7 (C24、C15B)、8 (C3) 三枚，簡文連續，但渡船流殺傷人畜、損亡糧物，屬過失罪，並非故意犯和賊罪，位於此律縱火、偽造璽印罪之間，頗可疑。但其出土位置恰在篇首與第二組之間，只能如此。

簡 9 (F1A)、10 (C15A) 兩枚相距較遠，內容均為偽造璽印，後者接近第二組，第二組多作偽，編次無誤。

簡 22 (C300) 至 26 (C324) 5 枚，簡 24 出土距離較遠，其餘集中，內容皆為殺傷人，上承第二組最末簡 21 (C14) 殺人條，但有紊亂，現試調整。簡 21 為殺人總則，包含賊殺、鬪殺、過失殺、戲殺。下來是簡 23 (C301) 賊殺、合謀及殺未逞。再下為簡 26、22，為謀劃賊殺傷和未逞。最後簡 25 (C325)、24 (C308) 分別為賊傷和鬪傷致死。這樣，調整後的次序（括弧內為原簡號）是 22（簡 23）、23（簡 26）、24（簡 22）、25（簡 25）、26（簡 24）。

第三組簡 29 至 35 之後，簡 36、37 與簡 35 內容相連。其中，29、30 是刑徒、奴婢毆擊人；31 為毆擊孕婦，均屬毆擊特例。以下，32 為夫毆妻，33 為妻毆夫。從 34 轉為子殺父母和奴婢殺主，35、36、37 是殺父母未逞、打罵父母等親屬和父母告子不孝。

從簡 28 (F137) 開始，諸簡出土位置較紊亂且分散。其中也有三組各為兩枚而內容連接，即簡 42、43，簡 44、45，簡 46、47。46、47 加 48，內容為因公事打罵官吏、官吏打罵爵者、長吏罵少吏、官吏笞刑徒，同屬一類。簡 49、50 為殺傷畜產和犬殺傷人畜產，同屬一類。簡 51、52 出土位置很近，為亡官印文書，也是同類。簡 53 為盜弃官印封書，與前接近。這些小組的內部編次無誤，但其前後次序需慎審。

簡 38 (F137) 為殺傷、毆詈父母和不孝者之妻、子的法律待遇，應排簡 37 之後。下接簡 40 為婦賊傷、毆詈夫之父母長輩，與簡 38 對應。再下簡 41 為毆兄姊、伯叔。簡 42、簡

43 爲毆父偏房之父母、祖父母、公婆、丈夫父母、丈夫同產及毆岳父母。親屬殺傷、毆冒由親及疏，由近而遠，至此結束。下當接簡 44 爲奴婢賊傷、詬冒主人及親屬之條。再下應爲簡 39 調整於此，乃父母毆笞子及主人毆笞奴婢致死，屬特例。再下接 46、47、48、49、50 的次序不變。以上，僅變動了簡 39 (F162) 的編次位置。

簡 51、52、53，失亡官印、官書、符券、門額，以及盜竊并拋棄封有官印以上的文書，與賊律簡 9、10 偽造印璽，簡 11 以下之矯制、欺謾、詐僞、毀封等屬於同類或近似，是否應編於彼等之次，也是一個疑問。

五、《賊律》的罪名刑罰

制律必先擬定各種罪名，凡罪名皆有其犯罪基本特徵與事實。同一罪名又有各種不同的情況、情節、檔次，即不同罪目，其下或又有分目。而不論哪種罪目、分目，皆定有相應刑罰的刑名，或另附處置原則。

現可將《二年律令·賊律》的條文內容列爲簡表，這實際是律文內容與結構的概括示意。

《二年律令·賊律》簡表

| 原簡號 | 罪 名 | 罪 目 | 刑 名 處 罰 |
|--|---------------|---|---|
| 1、2 3 | 謀反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據城反叛降諸侯 · 不堅守弃城亡 · 同前降諸侯 · 其他謀反 · 謀反者父母、妻、子、同產 · 坐謀反能徧捕 · 同前先自告謀反 · 爲諸侯來誘 · 爲諸侯來間 · 亡去諸侯 | 腰斬 腰斬 腰斬 腰斬 弃市 除罪 除罪 磔 磔 ? |
| 4、5 | 燔城官民室廬舍 積聚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賊燔城 · 賊燔官府 · 賊燔縣官積聚 · 燔寺舍 · 燔民室廬舍 · 燔民積聚 · 同上失火延燔 | 弃市 弃市 弃市 黥爲城旦舂 黥爲城旦舂 黥爲城旦舂 罰金四兩，償所燔 |

| | | | |
|----------|---------|---|---|
| | | · 同上吏主者弗得 | 罰金各二兩 |
| 6、7、8 | 流殺傷人及畜產 | · 渡人流殺人 · 流殺馬牛 · 流傷人 | 船人耐，吏主者贖耐 船人耐，吏主者贖遷 船人耐，吏主者贖遷 |
| | 流敗亡糧物 | · 流敗亡粟米它物 · 同上可繫而敗亡 · 流殺傷人畜又敗亡粟物 | 船人負半（舳艫大半、徒少半） 船人全負（舳艫大半、徒少半） 船人不負粟物 |
| 9 10 | 偽寫璽印 | · 皇帝信璽、行璽 · 徼侯印 · 小官印 | 腰斬、徇市 弃市 完為城旦舂 |
| 11 | 矯制 | · 矯制害 · 矯制不害 | 弃市 罰金四兩 |
| 12 | 欺謾 | · 上書謾 · 有言謾 · 誤不審謾 | 完為城旦舂 完為城旦舂 罰金四兩 |
| 13 | 偽書 | · 為偽書 | 黥為城旦舂 |
| 14、15 | 詐偽 | · 詐增券、書，受賞賜財物 · 詐減券、書，避負債 · 為書故詐 · 為券、書弗副 | 坐所增為盜賊，不當得為 坐所減為盜賊，以避論， 罪所避之罪，或皆罰金四 兩（？） ？ ？ |
| 16 | 毀封 | · 毀文書封以它印封 | 耐為隸臣妾 |
| 17 | 上書誤 | · 誤多、少其實 · 誤脫字 · 同前，事尚可行 | 罰金一兩 罰金一兩 勿論 |
| 18 19 | 挾毒、制毒 | · 挾毒矢、莖糲毒 · 合莖毒 · 詔令縣官挾糲毒 · 追外蠻夷盜，假縣官毒矢匿及弗歸 盈五日以上 | 弃市 弃市 不用此律 以律論，棄市 |
| 20 | 毒殺傷人 | · 脯肉毒殺人 · 脯肉毒傷人 · 脯肉毒病人 · 縣官脯肉毒殺傷害人 | 亟熟燔其餘 亟熟燔其餘 亟熟燔其餘 同上，弗燔、吏主者坐盜 脯肉賊 |
| 21 | 殺、傷人 | · 賊殺人 | 弃市 |

| | | | | | |
|----------------------|--|--|------------------------------------|--|--|
| 23 22 26 25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闕殺人・過失殺人・戲殺人・傷人 | 弃市 贖死 贖死 除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賊殺人與同謀・同上未殺 | 皆弃市 皆黥爲城旦春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謀賊殺、傷人 | 與賊同法，弃市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賊傷人・賊傷人自賊傷避事 | 黥爲城旦春 黥爲城旦春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闕傷人以傷二旬中死・金鐵銳刃闕傷人・非以金鐵刃闕傷目、折齒指肢、斷決耳鼻 | 爲殺人，弃市 完爲城旦春 耐 | | |
| 24 27、28 | 毆擊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下爵毆上爵，毋傷・毆同列及以下，毋傷・同上有痕瘡 | 罰金四兩 罰金二兩 罰金四兩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鬼薪白粲毆庶人以上・奴婢毆庶人以上・闕毆變人・孕者與人闕而變 | 黥爲城旦春 黥額、與主 耐爲隸臣妾 爲變者罰金四兩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夫非以兵刃毆笞傷悍妻・妻毆夫 | 毋罪 耐爲隸妾 | | |
| | | 29 30 31 32 33 | 殺傷、毆詈父母、主人、親屬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賊殺、傷父母・婢奴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牧殺父母・毆詈大父母、父母、後大母、主母、後母 | 梟首於市 梟首於市 弃市 弃市 |
| | | | | 不孝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父母告子不孝・子爲完城旦、鬼薪白粲以上和奴婢，父母告不孝・年七十以上，三環各不同日告子不孝・教人不孝 |
| 教人不孝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賊殺、傷、毆詈父母者妻、子・父母告不孝者之妻、子 | | | | 收帑，禁錮，毋以夫爵償、免、除、贖罪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婦賊傷、毆詈夫泰父母、父母、主母、後母・毆兄、姊、親父母同產 | | | | 弃市 耐爲隸臣妾 |

| | | | |
|-------|----------------------|--|--------------------------------|
| 42、43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賣詬詈同上 · 毆父偏妻父母、男子同產妻、泰父母同產、夫父母同產、夫同產 · 夫毆妻之父母 · 賣詬詈同上 | 贖黥 贖耐 贖耐 罰金四兩 |
| 44、45 | 奴婢賊傷主、親屬 奴婢詬詈主、親屬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婢奴賊傷主及父母、妻子 · 奴婢謁殺悍主 · 奴婢賣詬詈主及父母、妻、子同產 | 弃市 弃市，謁斬若刑，爲斬、刑之 以賊論之、弃市 |
| 39 | 毆笞子、奴婢死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父母毆笞子以辜死 · 主毆笞奴婢以辜死 | 令贖死 令贖死 |
| 46、47 | 毆詈吏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以縣官事毆、詈吏有秩以上 · 同上吏毆詈五大夫以上 · 同上長吏詈少吏 | 黥爲城旦舂 黥爲城旦舂 ……毋用此律 |
| 48 | 笞刑徒死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同上諸吏笞城旦舂、鬼薪白粲以辜死 | 令贖死 |
| 49 | 殺、傷畜產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賊殺、傷人畜產 · 畜產爲人牧殺傷…… | 與盜同法 |
| 50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犬殺、傷人畜產 | 犬主償…… |
| 51 | 亡官印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亡印 | 罰金四兩，布告縣官 毋聽亡印 |
| 52 | 亡官書符券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亡書、符、券、入門衛木久(?)、塞門城門額 | 罰金各二兩 |
| 53 | 盜弃官印封書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盜弃封官印以上文書 | 耐 |
| 54 | (律名題署) | | |

據以上概略統計，《二年律令·賊律》列出罪名共二十八種，含罪目一百零五。刑名簡要，但交互參合，量刑細微。罪名、罪目、刑名等組成了《賊律》的律則和法網。

六、幾個問題

(一)《二年律令》的名稱、年代和定位

目前，學界對此律令爲“呂后二年所施行之法律”說頗有質疑。^①我以爲，此說雖無大誤，但却比較籠統、簡單。問題癥結在於竹簡抄錄時間不一定是始作律令之時。又“二年”

① 參見曹旅寧《張家山 247 號墓漢律制作時代新考》，中國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如果不是呂后二年，是否可能是高祖、惠帝的二年？答此疑問，還須先考察漢初法制律令的具體史實。

漢初法律，過去只知蕭何作九章，從未聞呂后二年律令。有學者指出，《二年律令》不避惠帝諱，用“盈”字達 29 條，證明制律必在孝惠元年之前，很可能在高祖二年（前 205）。

《漢書·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不足以禦奸，於是相國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晉書·刑法志》、《唐律疏議》皆同此說。司馬遷去漢初未遠，史漢《太史公傳》皆云：“漢興，蕭何次律令。”可見蕭何取捨秦法而編次為漢律，是漢初的大事。現在，呂后二年墓中出土廿八種大部頭律令篇章，而九章律却了無蹤迹，這當作何解釋？

按高、惠、呂后三朝，新政伊始，極重視立法制律，迅速建立漢家法制體系，而且均頗有作為。

史載高祖元年初入咸陽，諸將爭分金帛財物，獨蕭何“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劉邦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余悉去秦法”。二年（前 205），漢王出征，“留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等，漢朝建國立制諸要務，皆籌備於此時。蕭何作九章亦此時，看來他是早有準備。是年，封降將，繕塞要，弛苑囿，賜民爵，復民、卒賦稅，舉縣鄉三老，定項羽“大逆無道”罪，律令法制，多有建樹。

惠帝雖仁弱，但其初年命叔孫通定漢儀法；又它如定吏喪事賻錢；減田租；爵吏五大夫、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者有罪頒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城旦舂耐為鬼薪白粲；老年、幼子有罪皆完；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者唯給軍賦、它勿所與；令民買爵贖罪免死等。這些，在《二年律令》中均能找到痕迹。蕭何事惠帝至二年七月病薨，惠帝元、二年所頒諸法令，或亦出之蕭何。

呂后佐高祖，剛毅專制，惠帝時已取而代之，帝崩又挾其非親生子“臨朝稱制”，“號令一出太后”，大封諸呂，背逆高帝之約。這在漢初是特大政治變故，後遭圍剿而失利。呂后的法治作為，有如除惠帝欲除之三族罪、妖言令；初置孝弟力田；弛商賈之律；以功次定列侯朝位；定擅議宗廟令等。又《漢書·高后紀》二年七月“行八銖錢”，注引應劭曰：“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初貨幣直至武帝初皆為“半兩”，約共五六種，而以呂后八銖最大。《二年律令·錢律》簡 198：“錢徑十分寸八以上，雖缺鑠，文章頗可知，而非殊折及鉛錢也，皆為行錢。金不青赤者，為行金。敢擇不取行錢、金者，罰金四兩。”錢徑 0.8 寸以上，雖有缺損但文字可識，又非折碎、含鉛，就是法定通行貨幣。

此決爲呂后二年新鑄八銖半兩無疑，可證錢律首條爲呂后二年新頒錢法。又高祖末年頒“盜鑄令”，禁私鑄錢，犯者棄市，孝文時弛其令。故《二年律令·錢律》其他條款如簡 201 “盜鑄錢，及佐者，棄市”等，正是高祖所頒“禁盜鑄錢令”。

從對漢初律令歷程的剖析，可見其複雜、曲折、特殊之處：（1）政治上否定秦法而實際上承用秦法。（2）最初的漢律如法三章、九章律，都是秦法的壓縮和重編。（3）本欲簡法輕刑，或淡化秦律，但實踐中很難做到，反而越來越繁雜和依靠秦律。（4）積極不斷地修改秦法和增補新的漢律內容。此乃因漢初一切草創，百廢待興，所謂勢出必然。劉邦廢秦法、約三章，與暴秦示別，是一種農民的政治理念和決擇。而蕭何一批智囊則以爲，完全拋棄秦法，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蕭何律祇有賊、盜、捕、囚、雜、具、戶、興、廩律九篇，睡虎地秦律 36 種爲其四倍，蕭何約各取其相宜者分別歸入九篇，其他擯之莫用，但也比法三章多了二倍。頒布當在高祖二年，當稱“漢律”、“漢某年律”，九章爲俗稱。蕭何之後，九章肯定屢有增補，到呂后二年爲廿七種律、一種令，又增了二倍。九章律名，二年律令中已有七篇。囚律或佚入具律之中。而均輸、傳食、行書律爲廩律基本內容。除此九篇，其餘當是蕭何之後的擴充。連班固《刑法志》對九章也語焉不詳，可知漢律變化之激烈。魏晉時，又演變而爲十八篇。當時律家深感漢律之雜亂無章，與其演變的錯綜複雜有著直接關係。

《二年律令》就是呂后時漢律的正本（不是全部），是從三章法、九章律到惠、呂時期二十餘年，不斷增修積累的結果。人們發現，其條款具有不同時期的特徵和痕迹，原因即在於此。亦可證呂后時，漢初九章以來諸律令曾被增修整頓一番。當然也加入本朝所制，形成現存規模。故不應強調其某朝、某時或某條與呂后二年不合，甚至懷疑史籍記載追諡呂宣王之年有誤，而應全面剖析各律條的來龍去脈，給予定位，方能透析漢初律法的全貌、特點及其間的因襲演變。

總之，《二年律令》是呂后二年頒布施行的漢律，也是呂后時漢律的集成。前文已述，漢律當突出漢字。《二年律令》不書“漢”字，正反映呂后執政的特殊性。《史記·呂后紀》四年惠帝太子崩，復立常山王劉義爲帝，“以太后制天下，不稱元年”，可爲佐證。但書二年不書漢，就祇能是呂后二年，不可能指高祖、惠帝二年，儘管其中包含大量高、惠時期的律條刑罰。

（二）漢律以賊律爲首

律令中各律的次序反映法律的總體結構、社會性質及各方面的法、治關係。

漢律以何律爲首？過去靄靄不明，班書甚至不書九章律名。《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先盜律後賊律，曰李悝“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唐

律疏議》曰：“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廩三篇，謂九章之律。”程樹德《漢律考》據此排列漢律次第先盜後賊，并作盜、賊辨，成爲不易之論。《二年律令》之出土，《賊律》列在首篇，證據鑿鑿，表明漢律、九章律皆以《賊律》爲首，徹底厘清了此一懸疑。

古時治罪原則對盜賊的認識，多著重其行爲的性質，見《周禮》、《左傳》、《孟子》、《荀子》、《說文》及注。《晉書·刑法志》引張斐注律：“無變擊斬謂之賊，取非其物謂之盜。”

“賊”多爲逆亂反叛、毀仁壞法、賊殺僞欺之類，“盜”則偏重不正當劫竊物質利益。故前者屬政治、人倫性質，爲大罪，在諸律中當次首位。約魏晉時，賊盜二律次序發生顛倒，到北齊、隋、唐代又糾正之，名爲“賊盜律”。

《二年律令·賊律》罪名 28 項、罪目 105 種，基本符合賊罪的立罪、治罪原則。“無變擊斬謂之賊”強調了殘害人命，而忽略謀反政治、欺詐犯上、惡逆人倫等，所占比重相當高。尤其謀反、降諸侯、不孝罪爲秦律所不見。

賊律首條“謀反、降諸侯”具有時代特徵，乃是當時第一要務。高祖滅項羽之前，祇是反秦諸勢力之一。五年滅楚稱帝建都，分封諸侯，與統一前不同，出現君臣、宗主與藩國等名分區別。而後，燕、趙、韓、九江諸王侯，相繼謀反不絕。謀反罪 10 條罪目主要指五年以後，而惠、呂時諸侯謀反並不顯著。故這幾條是高帝後半期制定，而被惠、呂所承用。

（三）連坐、夷三族與大逆無道罪

賊律簡 1、2 “謀反，皆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坐謀反，能偏捕，或自告吏，皆除罪”。按此即漢律著名的大逆無道罪款。孝文夷新垣平三族，景帝腰斬晁錯，夷三族，皆用此律。但此條僅言謀反，而不稱“大逆無道”。《漢書·高帝紀》二年三月，發使告諸侯：“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又四年十月，劉邦數項羽十大罪狀，第十爲“大逆不道”，文帝前二年五月詔中也有“大逆”罪名。二年賊律無“大逆”，大約其時罪名已具，於律尚無文。也可能是史家習用晚出詞語，非當時實錄。而事物從醞釀到形成有一個過程。史遷記商鞅、呂不韋、嫪毐、李斯等，皆以“謀反”、“爲逆”罪而梟首、車裂、戮屍、滅族。但睡虎地秦律却無其罪其刑。這些以封建政治思想、倫理道德爲最高準則所定的罪，如謀反、不孝，及不道、不敬、欺謾、詐僞、誣罔、祝詛等約始於漢初。正如《唐律疏議》言：“漢制九章，雖并湮沒，其不道、不敬之目見存。原夫厥初，蓋起諸漢。”此正是秦、漢律法的分野之一。這種政治、思想罪在實踐中難以掌握。《漢書·杜周傳》：“酷吏大抵盡詆以不道。”《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不道無正法。”《文帝

紀》二年五月詔：“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無正法，即法律正文無明白準確的規定表述。這些大逆罪到魏晉時又形成系統理論。晉張斐注律，云：“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無變斬擊謂之賊”，“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等等。北齊律將罪大惡極之罪總爲所謂十惡：反逆、大逆、叛、降、惡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內亂。隋唐大致因之，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種。這些罪名和其所指，有具體罪目、罪狀，基本上都屬於賊罪，列爲“十惡”，標示它們是全社會嚴厲懲戒的重點。這種傳統自茲一直傳續到明清。

前引“其坐謀反者”，即謀反者本身。非指連坐。連坐或從坐，指與犯者有親屬關係而“連及”、“隨從”其罪。《漢書·伍被傳》：“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事，蹤迹如此。天子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爲王劃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唐律》名例第五：“諸犯罪未發而自首，原其罪。”因是首謀，自首也不得免罪。謀反而先自首，或提供信息盡捕得同謀，即可除罪。如果連坐、從坐之家屬如此，自然更可獲免。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即“夷三族”、“族”刑。學界咸以三族之誅襲於秦，但出土秦律不見“族”刑，也可能是秦律法不載而實際上存在，即所謂“無正法”。《晉書·刑法志》引曹魏大逆無道仍“夷三族”，但“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又載“魏承秦漢之弊，未及草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所述如不誤，則漢時夷三族包括祖、父、已、子、孫五代和出嫁的女子。晉時仍夷三族。北魏有“夷五族”之刑。明初朱棣殺方孝孺又有所謂“十族”。^①

（四）賊律罪大惡極罪之刑罰

前引張斐注律云：“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腰斬），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二年律令·賊律》的某些罪名，用刑最重，充分體現了此一重罪極罰的原則。

“謀反、降諸侯”包括四種罪目處以“腰斬”，兩種罪目處以“磔”。最後一種亡逃諸侯，未言投降，似比“降諸侯”的量刑輕一些，非磔即弃市。僞造皇帝璽印“腰斬”并“徇市”。“賊殺父母”、“奴婢賊殺傷主及親屬”，即“梟首”於“市”。以上，謀反、叛降爲最大之罪，殺父母、主人爲最極端之惡，《賊律》中僅此二罪最爲突出，使用“腰斬”、“梟首”。^②

“賊燔城官府庫稟弃市”。爲何同是燔燒城池官府民舍積聚，却處以不同刑罰？除“失

① 見《辭源》（商務合訂本，1988），“十族”條。

② 《二年律令·盜律》之最重罪，爲徼外來盜，（簡61），及群盜、盜殺劫人等（簡65、66），分別處以腰斬、磔刑。

火延燔”，其餘分爲“賊燔”、“燔”兩種性質或情況。或釋“賊燔”爲“故意焚燒”，非是。按漢律對犯罪意圖歸納爲“故”、“誤”、“過失”、“不知不見”等。二年律令《具律》已載見“故”、“誤不審”、“失”不直等，但多屬界定官吏執法的主觀動機。約在武帝時才變爲普遍的犯罪動機律則。而兩漢之際，據犯罪意圖而增減刑罰的法理也已成熟。故、賊二者，一是犯罪動機，一是犯罪類屬，範疇、概念不同，不可混淆。但其間也有聯繫。例如，多數“賊”罪具有“故意”的成分，甚至比“故意”更嚴重。“失火”以外的燔燒都是故意罪，之所以一曰賊燔、一曰燔，是指燔者、被燔及情節有差。加賊字，是強盜流寇攻剽燒搶城廓官府，屬逆亂。不加，性質情節均輕，乃治安罪而非政治罪。故將賊字釋故意，有違法理律則。二年《賊律》加賊字的罪名最多，若“賊”作“故意”解，則失去律法“賊”的意義。其他屬賊律不稱“賊”的罪，不等於不是故意犯罪。賊罪是故意還是過失犯？對定罪量刑而言均在“賊”之次，是第二位的。例如，不論動機，只要謀反降諸侯就腰斬，而無辜的“三族”無論少長一律殺絕。這就是賊律罪的典型特徵和屬性。

其他弃市罪，見第五節賊律簡表，都是以維持社會、家庭的政治、倫理秩序爲目的。《賊律》全部的罪名、罪目處“弃市”以上死刑的，就有30多項，占十分之三，可謂嚴酷。有些不明顯，如簡19追外蠻夷而藏匿不還官毒弩矢，“以律論”即弃市。簡26謀劃賊殺傷人“與賊同法”，比照簡23“皆弃市”。簡24，鬪傷人二旬死爲殺人，比照簡21“鬪殺人”棄市。簡45奴婢詬詈主人及親屬“以賊論之”，即論之“弃市”。又可比照簡40，婦賊傷、毆詈夫之祖、父輩皆“弃市”；又簡45奴婢毆詈主及親屬，“以賊論之”當減賊殺傷主及親屬“梟首”一等，必爲“弃市”。

秦和漢初的死刑究竟有哪些，目前認識不一。《晉書·刑法志》載魏晉死刑有“梟首”、“腰斬”、“弃市”三種。漢之死刑，程樹德以“磔”刑附上三者，是據秦有磔刑而《漢書·王吉傳》、《云敞傳》有“磔屍”的實錄。《二年律令·賊律》有磔刑，足證秦與漢初確有此刑，死刑至少有四種。《史記》和睡虎地秦律的死刑名目更多。秦律祇有磔、棄市與二年律令相合，缺梟首、腰斬、夷三族，多出“定殺”（水淹）、“生埋”（坑）兩種非常設死刑，以及大量使用的戮刑。秦的死刑比漢代複雜得多。

死刑刑狀，梟首，爲斬首懸示於市或亭，見《漢書·高帝紀》、《傅介子傳》、《陳湯傳》、《薛宣傳》、《西域傳》鄯善條、《後漢書·竇武傳》等，“斬（樓蘭）王當歸首，馳傳詣闕，懸首北闕下”。又“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有議“宜勿懸”，後又“懸十日”，首足共埋之。但梟首另有一說，即以尖木、長矛之屬戮舉其首示衆，見於考古和民族資料。我懷疑秦之戮刑即漢之梟首，戮即凌戮，先斬而再凌戮其首，重要人物戮於

宮闕，一般人物梟於亭市，是古代獻馘告天儀式之孑遺。腰斬，《張蒼傳》臨刑裸伏木質，從腰中斬斷，受刑不立死，最為殘酷。弃市，於市亭斬首級棄之。至於“磔”，俗謂車馬肢解身體，又稱車裂。《漢書·云敞傳》：吳章“坐腰斬，磔屍東市門”。程樹德《漢律考》引王吉傳，凡殺人，皆磔屍車上。是先殺而後凌戮其屍，載車以徇示。

總之，漢律死刑五種，從罪名、刑名次序看，謀反（包括偽寫皇帝璽）處腰斬最重，凡謀反皆腰斬，助謀反皆磔，連坐夷三族皆弃市。其次為梟首，皆惡逆賊殺。其他死罪則處弃市。圍繞腰斬、梟首兩類罪行的其他重罪，也以弃市處罰。如此，四檔、五種死刑的輕重次第似當是：腰斬和夷族、梟首、磔、弃市。

（五）其他一些不同的認識

完、耐。《漢律考》引說文段注：“耐之罪輕於髡，髡者剃髮也。不剃其髮，僅去鬢鬚，是曰耐，亦曰完。”程樹德據此認為漢制四歲刑至二歲刑統稱為耐罪。按，文獻和《二年律令·賊律》有耐、贖耐，和耐為鬼薪白粲、司寇、復作隸臣妾三檔，不見耐為完城旦，是耐與完有別。還是耐為一至三歲徒作刑另加的刑罰，值得研究。

害、不害。簡 11 矯制（詔）條，《竹簡》釋害為“造成不良後果”。不良後果無客觀標準。所謂害、不害，乃對文法即法律而言。《漢書·蕭何傳》：“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應劭、蘇林、晉灼、師古、劉奉世諸家注似不得要領。《高帝紀》：五年五月詔“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文毋害為倒置詞，即毋害文，亦即毋傷害於國家法規，猶今奉公守法，照章辦事。矯制傷害法規，即成大罪。不害，可從輕處理。《功臣表》注引如淳引律曰：“矯詔大害，腰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後漢書·郭躬傳》：“尚書奏（孫）章矯詔當腰斬。”由此知武帝時，律復有矯詔大害之罪目，直至東漢依然。大害腰斬，較矯詔害的弃市加增一等，按謀反大逆對待。本律在呂后初年，其時尚無“大害”之目。

謾。見 12 簡：“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上書謾與有言謾，是兩種場合。《竹簡》釋：“謾，故意欺誑。”未妥。上書或廷議有不忠誠老實的，稱欺謾，一般指數字不實，是官場上下的一種弄虛作假的不正之風。《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上具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但是否直釋故意犯罪，尚需斟酌。13 簡“為偽書者，黥為城旦舂”，較本條“完為城旦舂”，處罰重一等。“為偽書”，才是故意作假。又簡 14、15，“詐增、減券書”和“為書故詐”，詐增減本身即有主觀犯罪之意，然而又有“故詐”的界定，可見詐、故詐和謾、故謾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誤不審。見同上。《竹簡》釋作“偶不確切”。不審，不審慎周密，反義為疏漏大意。

此條是說欺謾由錯誤疏漏形成的，則罰金四兩。不審見於它律。《二年律令·具律》簡 93，“辟故弗窮審者”，即故意不詳細周密案訊。《具律》簡 112，“劾人不審，爲失，其罪輕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爲不直”。舉劾罪人而不嚴密周詳，等於縱放罪人，故判“失”罪。而故意將輕罪判重，爲政不直。此二者，又稱加減人罪或出入人罪。所以，“誤不審”即“不審而誤”，亦即疏誤大意而造成不實。又《具律》簡 114“乞鞠不審，加罪一等”。犯人定罪後，要求復審，如果將罪責縮小，原罪之上再加罪一等。

“賊傷人，及自賊傷以避事者，皆黥爲城旦舂。”此條《竹簡》引《漢書·高帝紀》，以爲乃自賊傷以逃避徭役。但也可能是賊傷他人再自傷，企圖逃避賊傷人之罪。

“亡印，罰金四兩，而布告縣官，毋聽亡印。”意思是通告所有官府，宣布該亡印作廢。

“盜書弃書官印以上。”《竹簡》釋作“疑指弃去文書上的封泥，然後呈上”。按，“以上”爲犯罪等級、數量的界限詞。此處“官印以上”成句，指盜弃封有官印以上的文書。當然，非官印以上所封文書不在此例。官印以上，約指小官印以上直至皇帝璽印所封。

《二年律令》中的“守將”

◎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陳 偉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守將”一詞，原注釋恐有不確。在古書中，守、將二字在主管、守護這兩層意思上辭義相近或相通，大概是由近義詞組成的複合詞，為“監管”、“看守”之意。《潛夫論·斷訟》“守將抱執”之說，可相印證。雲夢睡虎地秦律“將司”一語，當是與“守將”類似的說法。漢唐律令中的“主守”也與“守將”相近。

關鍵詞 二年律令 守將 將司 主守

“守將”之語，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先後出現兩次。《盜律》65—66號簡寫道^①：

群盜及亡從群盜，毆折人枳（肢），肤體，及令彼（跛）蹇（蹇），若縛守將人而強盜之，及投書、縣（懸）人書，恐獨人以求錢財，盜殺傷人，盜發冢（塚），略責人若已略未責，橋（矯）相以為吏、自以為吏以盜，皆磔。

又《具律》107—109號簡寫道^②：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43 頁。“橋（矯）相以為吏”之後原釋文作逗号，依文意改為頓号。

②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48 頁。彭浩先生指出：107 號簡之前應補接 121 號簡，121 號簡末字與 107 號簡首字“誣”“告”連讀。見《談〈二年律令〉中幾種律的分類與編連》，《出土文獻研究》第 6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告，告之不審，鞠之不直，故縱弗刑，若論而失之，及守將奴婢而亡之，篡遂縱之，及諸律令中曰同法、同罪，其所與同當刑復城旦舂，及曰黥之，若鬼薪白粲當刑爲城旦舂，及刑畀主之罪也，皆如耐罪然。

針對 65—66 號簡，整理小組注釋云：“將，押送。《爾雅·釋言》：‘將，送也。’”整理小組未對 107—109 號簡中的“守將”作注，蓋因承前省略。

我們在研讀中感到，律文中這兩處“守將”大致是“監管”、“看守”之意，原注釋把“將”訓爲“押送”恐有不確。在 2002 年 3 月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們提交論文《張家山漢簡雜識》，即對此作了一些討論。因會有朋友提出質疑，我們自己一時又未能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所以在稍後提交給準備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時，刪去了這段文字。這兩年看書時，不時思及此事，並找到一些新材料，因而寫下這篇小文，對“守將”再作考察。

守將，在上揭二條律文中，都用作動詞。^①在古書中，守、將二字在兩層意思上辭義相近或相通。一是主管，如《說文》：“守，守官也。”《廣韻·守韻》：“守，主守。”《說文》：“將，帥也。”《呂氏春秋·執一》：“軍必有將。”高誘注：“將，主。”二是守護，如《周禮·天官·內宰》：“糾其守。”鄭玄注：“守，宿衛者。”《詩·大雅·鳧鷖序》：“能持盈守成。”孔疏：“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漢書·兒寬傳》：“有廉知自將。”顏注：“將，衛也，以智自衛護也。”《釋名·釋言語》：“將，救護之也。”律文中的“守將”大概就是由兩個在這些意涵上的近義詞組成的複合詞。其具體含義，在 65—66 號簡中，既可能是主管，也可能是守護（對象是財物）；而在 107—109 號簡中，則應是守護、監視之意（對象是奴婢）。

相同的用語在傳世的漢代文獻中也有出現。《潛夫論·斷訟》在說逼迫寡婦再嫁時寫道：“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緩，與強掠人爲妻無異。”汪繼培箋云：“《說文》云：‘扃，扶也。’‘將’即‘扃’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傳》云：‘女逃匿，扶將出拜。’《後漢書·列女·陰瑜妻傳》云：‘扶抱載之。’”^②其實，這裏守將的用法應與律文相當，是監看一類的意思。時代相近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可相互印證。

在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有“將司”一語。《秦律十八種·司空》133—140 號簡記云^③：

① 在 65—66 號簡中，是以動詞作定語。

②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中華書局，1985，237—238 頁。

③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注釋，51 頁。

……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贖貨責（債）於城旦，皆赤其衣，拘繫標杙，將司之；其或亡之，有罪。葆子以上居贖刑以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

又 145—146 號簡記云^①：

毋令居貨贖責（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貨贖責（債）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

又 147—149 號簡記云^②：

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拘繫標杙之。仗城旦勿將司；其名將司者，將司之。……

《法律答問》125—126 號簡記云^③：

將司人而亡，能自捕及親所智（知）為捕，除毋（無）罪；已刑者處隱官。……

在《秦律十八種·司空》133—140 號簡“將司”首次出現時，整理小組注釋云：“監管。”按之律文，其說應可信。“司”亦有主管、監察義^④，秦律“將司”當是與漢律“守將”類似的說法^⑤。

在漢唐律令中，還常見“主守”之語。《漢書·陳萬年傳附子咸傳》：“主守盜，受所監。”注引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弃市。”同書《刑法志》：“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顏注：“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唐律疏議》卷十九《賊盜》“監臨主守自盜”條云：“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疏議曰：“假如左藏庫物，則太府卿、丞為監臨，左藏令、丞為監事，見守庫者為主守，而自盜庫物者，為‘監臨主守自盜’。”^⑥居延漢簡 516·19 也有“主守而即盜”的記載。^⑦“主守”之意，似乎也與“守將”相近。《二年律令》中未見“主守”一詞，因而我們目前還不清楚“主守”是由“守將”演變而來，還是曾與後者并行的一個近義詞。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釋文、注釋，53 頁。

② 同上，53 頁。

③ 同上，123 頁。

④ 《廣雅·釋詁三》：“司，主也。”《周禮·地官·師氏》“司王朝”，鄭玄注：“司，猶察也。”

⑤ 秦律“將司”的對象為刑徒，與《二年律令》107—109 號簡中的“奴婢”類似。不過，《二年律令》65—66 號簡中“守將”的對象應是錢財，秦簡“將司”未見這種用法。

⑥ 《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358 頁。

⑦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631 頁。

鳩杖與徭役制度^①

◎ 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

山田勝芳 著

◎ 北京大學歷史系

莊小霞 譯

內容提要 鳩杖是以古代鳥文化和鳩的生物學特長及其象徵性為背景演變而成的養老杖。漢代，鳩杖賜予 70 歲以上的老人，並伴有各種特權。其制度可以上溯至高祖時期。新近漢墓出土了許多免除受鳩杖老人家中成年男子徭役特權的史料，本文通過對上述材料進行全面考察，探討了秦漢、三國時期女子徭役和優待老人的徭役問題。

關鍵詞 鳩杖 王杖 養老制度 侍丁 女子徭役

序 言

在中國，自古以來作為天子德治的一個環節，就是對老人實行各種優待政策。在儒家經典中，這一點甚至被提高到禮的範疇。其政策之一就是授予他們一根上部安有木制鳩飾的木杖，這種杖被稱為鳩杖或王杖。鳩杖的授予，不僅僅祇是給予一根木杖，還伴隨著各種恩典，比如免除看護老人的侍丁的稅役，授予米穀、布帛，在判處刑罰時實行優待，給予相當於官員的禮遇，等等。而且，其特色還在於它不專以官僚為對象，更是面向一般百姓的。當然，也不是針對所有老人，而是達到一定年齡比如 70 歲或 80 歲的高齡老人（不

^① 本稿以拙稿《鳩杖的去向——東亞的老人優待政策——》（《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 10 號，2005 年 3 月，1—60 頁）為基礎，集中討論與鳩杖授予問題有關的徭役制度。

同時代年齡標準有變化)。^①

和這種伴隨著各種恩典的優待老人的政策不同，我們還可以發現很多其他尊老事例，比如一般年長的老年人都持有一根特別的杖，另外，出於敬老精神，王朝、近親以及有深交的友人也會向年長者授予或贈予各種杖。

這種鳩杖即王杖的授予，在漢代呈現出更多的多樣性，無論是在文獻史料還是各種出土資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鳩杖本身的出土數量和相關的出土文字史料也在不斷增加。從這些史料中瞭解到的恩典內容也多種多樣，特別是在稅役制度方面，為研究稅役制度的根本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本文即想以鳩杖及其授予所帶來的稅役方面的恩典為線索，就相關的徭役制度進行討論。

一、鳩杖的淵源

杖的發展，推測最初源於自然樹木的長木棒，或者經過少許加工、用石器削好的長棍，它既可以作為武器，也可以用於輔助步行，比如用來撥草，發生危險時成為防身工具。此後，隨著神和宗教權威以及各種級別的權力的產生，擁有權威者、權力者開始用石、青銅、金銀、寶石等材料對這種顯示權威、權勢的杖進行裝飾。

在這種杖得到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以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廣大區域則出現了將鳥裝飾在杖上的情況。長江下游發現了2例鳥杖，長江上游的四川省也發現了戰國時代的鳥杖。與四川省鄰近的青海、雲南等地也有發現。^②鳥杖和鳥的造型，不僅見於長江流域、四川、雲南、青海地區，黃河流域也有發現。其中比較重要的有1990年以來發掘的河南省三門峽市西周晚期虢國墓出土的玉鳥杖頭，其中1件是帶有巨大“雞冠”的站立着的鳥，其他玉制鳥有3件，還有1件象鳩的鳥。^③

此外，山西省曲沃縣曲村近郊的天馬、北趙一帶的西周中期至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銅

① 關於老人優待政策，請參看拙稿《中國古代中世的老人優待政策——王杖十簡與侍丁——》（《東北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1號I，1984。以下簡稱“拙稿A”）、《王杖十簡與王杖詔令書——漢代老人優待政策——》（《東北大學教養部紀要》第49號，1988。以下簡稱“拙稿B”）等。另外，關於包括女子徭役問題在內的秦漢徭役制度，請參看拙稿《漢代的算與役》（《東北大學教養部紀要》第28號，1978。以下簡稱“拙稿C”）及拙著《秦漢財政收入的研究》（汲古書院，1993）。

② 有關研究很多，這裏只列舉其中一部分。石興邦：《我國東方沿海和東南地區古代文化中鳥類圖像與鳥祖崇拜的有關問題》《中國原始文化論集——紀念尹達八十誕辰》，文物出版社，1989；楊菊華：《淺談良渚文化的崇鳥習俗》，《江漢考古》1994年第3期；李修松：《上古時期中國東南地區的太陽崇拜》，《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期；蔡曉黎：《浙江紹興發現春秋時代青銅鳩杖》，《東南文化》1990年第4期；《青海大通縣黃家寨墓地發掘報告》，《考古》1994年第3期；林巳奈夫：《中國古玉研究》，吉川弘文館，1991；谷口滿：《虎座鳥架鼓的另一方——戰國楚文化的淵源——》，《東北學院大學論集》歷史學・地理學第32號，1999；杉本憲司：《吳越文化的鳥》，《廬陵史學》第19號，1994。

③ 《上村嶺戰國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第1期。

鳥。西周晚期晉侯夫人墓出土的銅盃，上蓋有鳥，蓋後側的支撐上有熊，出水口為龍首，背面把手也有一條銜尾龍，圓形的扁平器身上有渦旋紋，並且在最下端的足的前後裝飾著兩個屈膝雙手支膝、背負銅盃的人形。64 號墓被確定為晉侯墓、62 號墓為晉侯正夫人墓、63 號墓為晉侯次夫人墓，其中，62 號墓的銅壺上有一隻頂著“雞冠”的鳥。63 號墓的銅壺上方有一個小“雞冠”狀的鳥形把手，器身圓形，最下層為方形，支撐四面的足做成屈膝、背手的四個人的形狀。^①

來自女性墓葬的出土文物都產生了女性與鳥的關係、象徵性等問題。並且，這種器物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上方是鳥，最下層是支撐整個器物的人”的形狀，和馬王堆一號墓、三號墓帛畫所描繪的“天——地下”的構造很相似。

鳥杖和鳥造型的分布，範圍很廣泛。一般認為自中國史前文化以來，鳥杖就是被那些擁有一定地位、或者巫祝等擁有宗教地位以及長老等人所持有。這種杖也有可能被這些人的妻子所持有，因此今後有必要對女性墓葬的發掘加以確認。

在這種鳥杖的文化傳統中，授予老人的杖被特定化為鳩杖。對於這種特定化，需要從鳩這種鳥的文化意義和生物學特徵上進行探討。

關於文化意義，可以參考希臘、羅馬等地的情況。^②鳩具備多種象徵性：它象徵著女性，其旺盛的繁殖力和生命力使其成為豐饒的象徵，很强的歸巢本能也被用作通信手段的象徵。另外，白鳩也是和平和神聖的象徵。而且，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鳩飲水有一個特點，就是將喙置於水中直吸而入。對這種特徵，羅馬人已經有所記錄。

中國古代授予養老杖，并在上面裝飾鳩的含義，應和鳩具有很強的繁殖力即具有強韌的生命力等文化象徵，以及鳩低頭飲水時喉部不噎的生物學特徵有著緊密的聯繫。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中國古代對鳩的看法。

《周禮·夏官·羅氏》載：“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鄭玄注解釋為“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這種“鷹化為鳩”的看法，自《呂氏春秋》十二紀《仲春紀》以來，一直在月令思想中得到繼承，《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中也可以看到。鄭玄解釋說，這是通過鳩所擁有的變化、新生的生命力來幫助老人延緩衰竭的生機。《續漢書·禮儀志》載：“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這是由於鳩是不會噎的鳥。另外，根據《太平御覽》卷九二一所列舉的有關鳩的文獻可知，鳩還被用於占卜吉凶，三國以後關於白鳩的記錄增多、可知白鳩作為祥瑞而被人們捕捉，這一

① 《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② 芭芭拉·沃克（Barbara Walker）著、山下主一郎主編、青木義孝等共譯《神話、傳承事典——失落女神們的復權》（大修館書店，1988）等。

點和西歐古代的象徵性有相通之處。

如上所述，中國殘存的文獻往往祇從儒家道德的角度來談鳩杖的意義，但是我們從中卻可以體會到古人是因為鳩旺盛的生命力和飲水特性而賦予其養老意義，這一點很重要。鳩所衍生出的神話、生死觀或者生命力觀等確實需要從倫理方面加以解釋；但是，在中國古代鳩本來就包含有旺盛生命力和性的意義。而且，對於鳩不會噎這一特徵的把握，也表明古人對鳩進行了生態觀察，從而準確地捕捉了其飲水的特性。

這樣就從鳥類中特別選擇了鳩用來作養老的特製杖上的裝飾品。至少在戰國時代這種鳩杖就已經出現了。正如《呂氏春秋》十二紀《仲秋紀》所載：“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授杖很早就成為養老儀式之一^①，在杖上以鳩作裝飾也可能很早就出現了。

這可以從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的鳩杖得到證實。該墓於1993年8月緊急發掘，墓深7.44米，該墓的墓道位於東方，有一棺一槨，墓主頭朝東。804枚竹簡出土於頭箱，隨葬品有青銅鏡等器物和武器、木漆樂器和器物等290件，兩件青銅鳩杖頭出土於邊箱。報告認為，該墓屬於“戰國中期偏晚”的墓葬，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公元前3世紀初，墓主身份為“田祿之士”、“上士”。^②

這兩件青銅鳩杖頭，肯定與墓主生前的地位密切相關。之所以有兩件，根據下文所引《國語》對70歲以上賜予恩典的例子，以及漢代授鳩杖是70歲初授、80歲再授等事例推測，墓主很可能以高齡而被兩次授予鳩杖。

《國語·晉語七》記載了晉悼公（公元前572—前558年在位）即位時實行的諸多政策，其中有“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敢不承”的記載，這是有關禮遇70歲老人的例子。70歲這一年齡成為禮遇的對象應當是某種傳統的反映。法家的代表作《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也提到“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同樣是對70歲以上實行的養老政策。

如果考慮到上述中國史前文化以來的鳥文化、杖文化，那麼以出仕戰國各國王廷的官僚等人為對象，那些達到70歲等一定年齡的老年者被授予“几杖”即扶手和杖，而將杖上裝飾鳩頭，以此為前提來看《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記載的養老恩典“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基本上是吻合的。這種養老制度，很有可能在戰國時期的秦國就已經實行了。

① 與此相關的記載，還有《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月令》仲秋之月“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以及《王制》“凡養老”以下所記載的內容。

②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再舉2件戰國時期的杖，1件是《包山楚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91）中所提到的2號墓出土的龍形銅杖頭杖（長1.55m），另1件是《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睡虎地13號秦墓棺內塗以黑漆的杖（長1.25m）。

二、鳩杖（王杖）的制度化

在各種出土史料和實物出現以前，關於授予一般百姓高年者鳩杖的起始時間，均依據《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的記載，認為是從東漢章帝時開始的^①，並且因為其中的“玉”字而誤以為鳩杖是玉杖。但其實它是“王杖”的誤寫，如下所述，鳩杖等同於王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漢前期。

又，《太平御覽》卷七一〇“杖”也引用了上文，“長尺”作“長九尺”，相當於2.08米。出土的實例從1.9米左右到2米多，以此來看“九尺”是正確的。實用的話，1.5米以下的長度比較合適，因此這種授予高年者的杖應不是實用物，而是基於德治觀念的養老禮儀杖，表明授予者的權威、權勢，象徵著被授予者所得到的特殊恩典。在這一點上，和先秦的鳥杖沒有什麼不同。在鳥杖的漫長發展過程中，至少在漢代鳩杖已經完全特定化、成為賜予年長者的養老杖。

關於這種王杖＝鳩杖的最早的出土史料，是1959年甘肅武威縣（漢代武威郡姑臧縣）磨咀子18號漢墓和2根鳩頭杖一起被發現的“王杖十簡”（以下簡稱“十簡”）。該墓出土的鳩杖，1件長約1.9米，另1件殘長40厘米。此外，13號墓出土的鳩杖長約1.81m^②。

1 · 蘭臺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卅三、尚書令減受在金。

2 制詔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官廷不趨。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徵召侵辱

3 · 者、比大逆不道。建始二年九月甲辰下。

4 制詔丞相·御史、高皇帝以來、至本二年、勝（朕）甚哀老小。高年受王杖、上有鳩、使百姓望見之

5 · 比於節。有敢妄罵詈毆之者、比逆不道。得出入官府郎第、行馳道旁道。市賣、復毋所與

6 · 如山東復。有旁人養謹者、常養扶持、復除之。明在蘭臺石室中。王杖不鮮明

① 《後漢書·章帝紀》章和元年（87）秋7月“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注“月令、仲秋之令”。又，史遊《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一句的前提即是漢代對看護老人者實行復除。

② 《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考古》1960年第9期）及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等。

7 · 得更繕治之。河平元年、汝南西陵縣昌里 先年七十、受王杖、●部游徼吳賞使從者

8 · 毆擊先、用訴、地大（太）守上讞。廷尉報、罪名

9 · 明白、賞當棄市。

10 · 孝平皇帝元始五年、幼伯生。永平十五年、受王杖。

根據上述十簡，可知墓主幼伯生於西漢平帝元始 5 年（5），東漢明帝永平 15 年（72）68 歲時被授予王杖。其之所以有 2 根鳩杖，推測或者是像 6 簡、7 簡記載的那樣由於損壞而授予新杖，或者是 80 歲再次授杖。“十簡”文中明確記載為“七十”，很清楚地表明法律規定對 70 歲以上老人授杖，這一點從後面提到的尹灣漢墓簡牘等近年的出土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證明。不過，或許在從西漢末到王莽新及新莽末東漢初年的戰亂時代背景下，因為某個理由而在比較早的階段就給該墓主授杖了，但“十簡”紀年中很有可能存在著誤字。

再談鳩杖，根據這份“十簡”，可以明確地知道不是“玉杖”而是“王杖”，而且“王杖”的形態即是“鳩杖”，授鳩杖（王杖）至少可以明確地追溯到西漢成帝建始二年（前 31 年）9 月甲辰（20 日）所下的詔令。而根據 4 簡“高皇帝以來，至本二年”的記述，甚至有可能追溯到武帝以前，1984 年拙稿 A 就曾經指出可能追溯到高祖時代。

1981 年 9 月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文物調查中，從一位農民手中得到共 26 枚簡的“王杖詔書令”（以下簡稱“杖令”。第 15 簡缺失），1984 年發表了報告。^①1988 年拙稿 B 對此進行了討論。下面，我列舉與本文討論相關的部分簡文。

1 制詔御史、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非首殺傷人、毋告劾、它毋所坐。年八十以上、生日久乎。

3 人有養謹者扶持。明著令。 蘭臺令第卅二。

4 · 孤獨盲侏儒、不屬律人、吏毋得擅徵召、獄訟毋得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6 臣咸再拜受詔。 建始元年九月甲辰下。

7 · 汝南太守讞廷尉、吏有毆辱王杖主者、罪名明白。

12 [·] 長安敬上里公乘臣廣昧死上書

20 元延三年正月壬申下。

21 制詔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趨。吏民有敢毆辱者、逆

① 武威縣博物館（黨壽山執筆）：《武威新出王杖詔令冊》，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大庭脩：《武威出土〈王杖詔書·令〉冊書》，《關西大學文學論集（創立百周年紀念特輯）》上，關西大學出版社，1986。

不道

- 22 棄市。令在蘭臺第卅三
24 司馬護、坐擅召鳩杖主、擊留、棄市。長安東鄉嗇夫田宣、坐繫
25 鳩杖主、男子金里告之、棄市。隴西男子張湯，坐桀黠毆擊王杖主，折傷
27 ■右王杖詔書令 在蘭台第卅三

有必要先簡單地看一下這一“杖令”的全部構成情況。首先，“十簡”的2簡、3簡是蘭臺令，4簡—9簡是御史令，“杖令”1簡—3簡是蘭臺令，而與蘭臺令有關的“杖令”4簡—6簡的建始元年九月令與7簡—11簡、以及12簡—20簡都以附上黑圓點的形式附載。針對成帝河平元年事件下達的河平二年詔書雖然被編入御史令第43中，但是由於對蘭臺令第43中的王杖相關詔令來說是很重要的內容，經過適當的刪節後又收入蘭臺令。“十簡”的4簡—9簡是直接引用自御史令，“杖令”的7簡—11是從編入蘭臺令的御史令中選抄的。我認為，“杖令”9簡的“本始二年”，並不是宣帝的本始二年（前72），而是像“十簡”4簡記載的那樣，應該還是“本二年”的意思，是成帝河平二年（前27）。

這道蘭臺令將另外纂集的河平二年御史令附載於蘭臺令，略為：“汝南太守讞延尉、吏有毆辱受王杖主者。廷尉當報、罪名明白。制詔丞相御史曰、……得更繕治之。河平二年〇月（干支）下”。

這種形式的蘭臺令、御史令是在中央官府或地方官府複製的。實際上在給高年者本人看的時候，已經相當簡略，而且那些負責抄寫的最底層官吏發生抄寫錯誤和進行適當的省略，也毫不奇怪。我們在利用這一史料時必須注意這一點。

根據這兩份史料來考察其構成，我的看法如下：

○ 編入蘭臺令第43的令包括：

- ①元帝令……“杖令”1簡—3簡。推測為元帝時代的令。
②成帝建始元年九月令……“杖令”4簡—6簡。
③成帝建始二年九月令……“十簡”2簡—3簡及“杖令”21簡—22簡

○ 編入付載的御史令第43令的包括

- ④河平二年令……“十簡”的4簡—9簡及“杖令”的7簡—11簡
⑤元延三年令……“杖令”的12簡—20簡

通過上述考察，授鳩杖（王杖）至少可以追溯到元帝時代，根據“高皇帝以來”這句話甚至可追溯至高祖時代。具體考證如下。

《太平御覽》卷七一〇“杖”及卷九二一“鳩”引用的《風俗通》中，列舉了關於高祖和鳩的關係的“俗說”，可以作為旁證。不過，更重要的是王充《論衡》卷十二《謝短

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何說？”的一段話，它充分表明授鳩杖的時間肯定早於那些只知道身邊事而缺乏教養的俗吏回答不出“70歲授王杖始於何時”這個問題之前，而且也要早於東漢前期地方郡縣官吏熟知的70歲授王杖這一詔令所記載的年月（元帝、成帝時代）（拙稿A、B）。

其他新出史料表明，“杖令”與“十簡”具有同樣的史料價值。這就是後文要談的1989年8月甘肅省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和木鳩杖同時出土的16枚木簡。不僅第1簡和蘭台令相同，而且第11簡“長安鄉嗇夫田順坐徵召金里老人榮長罵詈口口”和“杖令”的24簡、25簡，都明確記載了“長安鄉嗇夫”侵害鳩杖（王杖）被授予者的事件。^①

曾有人認爲“杖令”是偽作，但是隨著武威旱灘坡鳩杖、木簡的出土，與其內容大體一致的“杖令”的史料價值得到了提高。與其說授鳩杖（王杖）時，地方以及負責的官吏們在把鳩杖（王杖）授予高年者時，交給他們的文書在書寫範圍和省略方式上有所不同，倒不如認爲由於起草文書所根據的詔令是相同的，因此鳩杖被授予者的墓中經常出現類似內容的記載。

爲起源問題提供決定性史料的是1983—1984年發掘的張家山247號漢墓，它不僅證明至少在西漢初期就對高年者授予與其爵位相應的杖，而且，雖然報告中著墨不多，但該墓中確實出土了鳩杖。

1985年張家山247號漢墓發掘報告的注意力集中在以法律文書爲主的竹簡上^②。但是，報告中的247號墓的棺槨圖，棺內祇有一件隨葬品，即被記錄爲“53鳥形拐杖”。另外，報告中的漆器單裏有“杖”，由於“杖”祇有這1件，因此這件漆杖很可能就是247號墓棺內的鳥形杖頭。從報告來看，我們只知道是“鳥”，如果考慮到前面所提到的鳥杖傳統，該杖可能就是漆鳩杖頭。因此，我們認爲墓主是一位被授予鳩杖的老年人。

1985年的報告之所以對漆鳥杖未多加注意，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十簡”記述的制約，認爲西漢初期不可能有向高年者授鳩杖的例子。但是，只要報告記載本身沒有錯誤，那麼“鳥杖”的存在就是確然無疑的。而且，從它是棺內唯一的副葬品來看，很明顯這根杖對墓主應該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如果結合呂后二年（前186）的《二年律令》簡文來考察，報告者對這根“鳥杖”也許就不會這樣漠視，但由於竹簡的保存、釋讀需要耗費時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不過，曾希望2001年竹簡的正式報告出版時能提到這點。

① 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均載《文物》1993年第10期。

② 《江陵張家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簡》、《江陵張家山漢簡考述》（均載《文物》1985年第1期）。竹簡的正式報告書是張家山247號漢墓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拙稿《張家山第247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與秦漢史研究》，《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3號，2002。以下稱“拙稿D”。

《二年律令》中有關於向高年者授杖的條文。2002 年拙稿 D 曾經提到，“在優待老人政策中，從漢初開始就已經實行和爵位相應的授杖了，這一點可以從《傳律》得到證明。可以認為它就是授王杖的政策。在關於授王杖的傳說中，有一種說法認為是始於高祖，我雖然強調它祇是有這個可能，但還是認為追溯到高祖時代的可能性極高，甚至能追溯到秦、戰國時代。”我的“鳩杖（王杖）授予起源說”大體上就是上述內容，這裏再根據史料稍作闡述。

《傳律》中關於老人的條文，首先有一條是關於向高年者賜物的，“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褭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伍九十五以上者，稟鬻米月一石”。（354 簡）

每月發放米穀一石的高年者的年齡，根據爵位的不同而呈階梯式分布，第五級爵大夫以上是 90 歲，其下根據爵位年齡相應提高，位於第一級爵公士之下的公卒、士伍是 95 歲。1984 年拙稿 A 曾根據《漢書》卷四《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推測向高年者賜物等優待政策在文帝即位以前就已經實施，為了改善實施情況，以詔書的形式“為令”，作了新的修訂，其修訂的內容是將賜 80 歲以上老人肉酒等措施著為定制。如《傳律》所示呂后時代是賜物於 90 歲以上老人，而文帝則將其降低到 80 歲以上，並且明確規定增加賜物數量，證明拙論的推斷是正確的。而且，考慮到西漢大多數法令都是繼承秦朝法令，似乎也不能肯定秦朝沒有這項制度。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褭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七十五，皆受杖（杖）”（355 簡），這段簡文和王杖授予本身有關。根據這段話，可知對高年者的賜杖也與爵位相應，大夫以上的有爵位者是 70 歲，公卒、士伍是 75 歲。把它看作是王杖授予規定沒有錯。而且這種杖的頂端應該裝飾有 247 號墓主所持的鳥即鳩。

拙稿 A、B 根據文獻和“十簡”、“杖令”等出土史料，提出授予鳩杖（王杖）的制度可能應追溯到高祖時代。根據上述確鑿的證據，可以確定能追溯到呂后時代，而《二年律令》的規定極有可能追溯到高祖時代，甚至這種與爵位對應的措施也有可能追溯到秦。

其次，還有一條與老人、高年者有關的徭役制度方面的簡文，“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為免老”（356 簡）。根據這段簡文可知，徭役免除的對象——“免老”也是和爵位相應的，大夫以上的有爵位者是 58 歲，不更以下從 62 歲開始每級增加一歲，公卒、士伍等是 66 歲。第五級爵大夫以上和以下有相當大的差別。

這一規定和“不更年五十八，簪褭五十九，上造六十，公士六十一，公卒、士五六十二，皆為皖老”（357 簡）的皖老規定有密切的聯繫。第四級爵不更以下的有爵者，在達到 60 歲以上、免老之前，還存在一個中間階段即皖老階段。不更的皖老年齡是 58 歲，公卒、

士伍等是 62 歲。

1993 年拙著根據文獻與雲夢睡虎地秦墓法律文書等推斷，從秦代到西漢中期，承擔稅役義務的“大”免除義務的免老年齡是 60 歲。但是，根據漢初的這條法律條文，至少可以知道在西漢初期這是和爵位對應的，公卒、士伍的免老年齡為 66 歲，同時還有一個減輕徭役的對象——眊老，公卒、士伍的眊老年齡為 62 歲。現在有必要修正一下我的推斷：也許在這以後，隨著民爵授予的實行，與爵位對應的免老政策，發展成民爵第 8 級公乘以下一律 60 歲免老。

和女子徭役問題有關的養老政策簡文，是“民產子五人以上，男傅，女十二歲，以父為免□者；其父大夫也，以為免老”（358 簡）。這段話的解釋比較困難，可以解釋為“如果民生有 5 個以上的子女，作為獎賞，如果男子傅籍，女子 12 歲了的話，其父可以為免老”。就像《具律》記載的“女子庶人，毋算事其身，令自尚。”（124 簡）^①《復律》中“工”的“丁女子”“算徭賦”，表明當時存在女子徭役。我們必須以此為前提進行考量，應當認為這裏的“女十二歲”就是女子達到為國家承擔某種勞動義務的年齡。

秦最初是根據身高來區分年齡的。關於這種身高制度，1993 年拙著認為，從 10 歲左右開始，女子身體往往比男子發育快，因此這是出於成長期的少男少女在達到同一年齡時體力不均等的考慮。推測 5 尺以上為“使”，年齡相當於 11 歲，5 尺 2 寸以上為“作”，年齡相當於 12、13 歲。這裏的“女十二歲”大體與“作”相當。男子身高 6 尺 5 寸，女子 6 尺 2 寸，相當於年齡 17、18 歲的人“傅”為“大”，但是“作”比“大”的年齡要低很多。成為“大”之後，男子有義務服徭役、兵役，女子雖然也要服徭役，但是在 12 歲時為國家服一定勞役，這和男子對國家的義務——兵役有所不同，因此優待有 5 個以上孩子的百姓。

女子 12 歲時為國家服勞役相當於“作”，其服役內容是在官府等地從事紡績、機織、縫製等。另一方面，必須和漢初以來向 3—14 歲的未成年人征收 20 錢的口錢聯繫起來看，女子不用服兵役，因此就在她們 12 歲能夠用手靈巧地幹活時役使她們。如果同時還對她們徵收口錢的話，那就是雙重負擔了。

這種男子“傅”或者女子“十二歲”後，就給予其父“免老”的特殊恩典，所適用的情況可能是指 5 個以上的孩子中的最小的那個。也就是說，由於已經有 5 個以上的子女為國家服役，於是就對這樣的家庭實行優待政策，特別給予其尚未達到免老年齡的父親以免老資格。又，女孩如果出嫁的話，即使年齡還小，也要被視為“大”，負擔為國服役的義務。也有可能對母親實行免老，不過應該還是兵役義務沉重的父親會優先得到免老待遇。

① 拙稿 D 解釋為“女孩不處以隱官而為庶人，在其所屬縣不‘算事’其身，讓她自己自謀生路”，“‘算事’的意思大概就是計算 1 算、2 算，以其‘身’充當徭役”。

這種政策與《管子》中所見的政策很相近。關於漢朝的優待高年制度與《管子》記述的相似性，在拙稿 A 等文中已經指出。這就是《管子》卷十八《入國篇》“八十已上”那段文字，“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食”與“八十者二算不事”很相似，而 5 子以上免老制度則和“四幼者，盡家無征”類似。又，1978 年拙稿 C 曾經論述存在女子徭役制度，並且指出像“有三幼者，無婦征”這樣的話是以女子徭役為前提的免除政策。這樣一來，《管子》的記述與西漢初期的徭役制度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關於“皖老”，《徭律》中有相關規定。407 簡“皖老各半其爵繇（徭），口入獨給邑中事。”雖然有個別地方不清楚，大致可理解為皖老承擔一半的徭役義務，並且只服縣內的徭役。此外，409 簡“諸當行粟，獨與若父母居老如皖老，若其父母罷癢（癢）者，皆勿行”是關於皖老的養老規定，漢代的“罷癢”是“半事”（《周禮·地官·大司徒》“寬疾”鄭玄注），在西漢初期規定皖老和罷癢一樣只負擔縣內徭役、半事。

目前還不清楚這種皖老政策是什麼時候制定的。雲夢睡虎地秦簡^①中有免老但沒有皖老，因此不清楚戰國時代秦國的情況。也許是西漢時才制定的制度。新近發現了秦帝國時代的里耶秦簡，^②目前還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相關的新史料，因此比較穩妥的看法是秦帝國時代可能已有這一制度。

皖老政策應和與爵位相應的鳩杖（王杖）授予制度一樣，隨著民爵授予的發展、爵位對應原則發生變化後廢止。漢初軍功受爵者較多，文帝以後盛行授予民爵和買爵，武帝時代大規模實行武功爵，秦以後的爵位制度在經過上述幾個階段後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至遲在武帝時代就已經取消了與爵位對應的免老政策，皖老政策也被廢止，而鳩杖（王杖）授予制度也從與爵位對應變為一律與年齡對應。

《賊律》中還有一條相關簡文：“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36 簡），它和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免老告人以為不孝”（472 簡）內容相同。根據《二年律令·賊律》這條簡文，我們知道了《答問》中的律文就是上述內容。

有必要考慮一下為什麼該簡文以 70 歲以上的老人為對象。正如拙稿 A 等已經指出的那樣，在授予 70 歲老人鳩杖（王杖）的恩典中，由於必須有家族內的男子照顧老人，因此免除了照顧老人的男子的徭役。該律文即與此有關。總之，70 歲以上的老人告發兒子時，按照法律規定應該處以死刑或遷徙遠方，但是這樣可能會出現家庭內無人照顧老人的情況。該簡文應承自秦律，假如秦律中也規定是“七十以上”的話，那麼秦代已經存在某種針對

① 只記錄前揭《雲夢睡虎地秦墓》的簡號碼。又，請參照《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90）的釋讀。

② 《湖南龍山里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李學勤：《初讀里耶秦簡》，均載《文物》2003 年第 1 期。《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

70 歲以上老人的養老政策、以及至少免除家庭內 1 名男子徭役政策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如果這種解釋可以成立，鳩杖（王杖）授予制度與爵位對應針對的是 70 歲以上至 75 歲以上者，那麼作為優待老人的政策之一——免除相當於後代侍丁的 1 名男子的徭役政策，就有可能是一律規定為 70 歲以上。如果是這樣的話，加上很早就有復除照顧 70 歲以上老人者的制度傳統，鳩杖（王杖）授予制度也從爵位連動制改訂為一律按 70 歲以上，在這一過程中，各種針對高年者的優待制度得到了完善。

也就是說，以復除照顧 70 歲以上老人者、根據爵位向 90 歲以上老人賜物以及同樣根據爵位授予鳩杖（王杖）為核心，後來又對恩典內容進行了追加和修訂，特別是對 80 歲、90 歲老人追加了更多的恩典。爵位對應制度的消失，如前所述可能在武帝時代。

經過上述過程，武帝時形成如下制度：70 歲被授予王杖的人 1 子免役、80 歲 2 子免役、90 歲 1 子免兵役、1 子免役，以及根據年齡賜予相應的米酒肉等物。元帝、成帝時代又增加了新的恩典。據“杖令”元帝令，以 70 歲復 1 子為前提，對 70 歲以上的老人增加了刑法上的恩典，對 60 歲以上既無兒子也沒有配偶的老年男女經商免稅，免除老年男女身邊盡撫養義務者 1 人徭役。據成帝建始元年九月令，對 60 歲以上無子的老年夫婦，增加了經商者免除市租、耕作者免除田租以及允許販酒的恩典。接著的建始二年九月令增加的恩典是：給予相當比六百石的待遇、刑法上規定毆辱王杖持有者為大逆不道、棄市、以及允許在馳道旁道通行。元帝以後儒家影響逐漸加強，為了超越《禮記·王制》等儒家經典中的養老制度，顯示皇帝的德治，恩典授予的內容越來越多。

又，在以一般百姓為對象授予鳩杖（王杖）的同時，對王侯和高級官僚也授予特殊的養老杖或養老几杖，但不限定為 70 歲以上。而且，除了禮儀上的優待，由於沒有必要向他們賜予面向一般百姓的免除稅役、刑法上優待等特殊恩典，因此在授予年齡上，雖然也存在“七十致仕”觀念的影響，但是卻沒有規定授予年齡。

不過，對一般百姓來說，鳩杖（王杖）所帶來的恩典是很重要的。關於鳩杖（王杖）授予的具體實施情況，可以從尹灣漢墓簡牘的統計記錄中得知。

1993 年發現的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 6 號漢墓，是西漢末年東海郡功曹師饒的墓。他死於成帝元延三年（前 10）或其後不久，墓內出土了東海郡的行政文書、占卜以及日記等簡牘，其中還有前所未見的《神鳥賦》。^①這篇描寫一對夫妻鳥的賦，與前述長江下游流域地區的鳥崇拜文化有關。

① 《江蘇東海縣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尹灣漢墓簡牘概述》（均載《文物》1996 年第 8 期）等論文。簡牘的正式報告書為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拙稿《西漢時代的地方“文人”——東海郡功曹師饒——》（《中國文人的思考與表現》，汲古書院，2000）。

1 號木牘《集簿》記錄了東海郡的縣數、侯國數、鄉亭里數、三老等數量、官吏員數、戶口數、80 歲以上口數等、各種面積、1 年內錢谷出入數等東海郡的各種統計數字。東海郡全部人口數為 1394196 人（男 706064，女 688132），80 歲以上 33871 人，90 歲以上 11670 人，70 歲以上的“受杖”者為 2823 人，合計為 14493 人，“多前”718 人。由此可知 1 年內被授予鳩杖（王杖）的人數。但是，這個數字並不一定能夠進行完全合理的解釋。

首先，90 歲以上的人數 11672 人與受杖人數 2823 人合計為 14493 人，不清楚這個數字是怎樣算出來的。根據“多前”這個詞，可知這個合計人數比上一年的統計多了 718 人。由於 90 歲以上的人數視為男女的合計數是不錯的，因此授予鳩杖（王杖）的祇是 70 歲以上的男子，但是否也授予 90 歲以上的女子呢？由於有的東漢墓中發現了 2 根鳩杖，我們認為這是 70 歲授予鳩杖後，80 歲會再次授予，那麼 90 歲是不是男女都授予鳩杖（王杖）呢？如果像這樣 80 歲追授、90 歲男子追授、女子新授，那麼當年內新被授予鳩杖（王杖）的人數，就應當是 70 歲男子、80 歲男子和 90 歲男女的合計。但是，我們不知道這樣考慮是否合適。我們只能等待出現其他新史料來證明上述推斷是否可能或者出現明確的證據。

80 歲以上的人口有 33871 人，占總人口的約 2.3%^①，90 歲以上 11670 人，約占 0.84%^②。由於嬰幼兒死亡率高，一般情況下平均年齡較低，從這一點來看高齡者之多超乎我們的預想。世界平均壽命最高的是現在的日本，80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 4.6%^③。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的上海，公開數字是 80 歲以上者占 2.8%^④。與此相比，東海郡高齡者的比率相當高。由於 70 歲以上老人可以獲得恩典，存在偽造數字、導致申請者和被認定者數量增加的可能性。遺憾的是，現階段還無法對此展開討論。

根據這份新出史料，可知僅東海一郡就有數千人以上的鳩杖（王杖）授予者，因此官吏、百姓平時就可見到鳩杖（王杖）持有者。特別是老人及其家庭因為某種原因需要和官吏交涉時，被強有力的恩典保證的鳩杖（王杖）的威力就會增強。西漢後期鄉吏毆辱鳩杖持有者的事件多有發生，大概是因為平常驕橫慣了的秩百石以下的官吏，由於建始二年九月令後不得不向獲得“比六百石”權利的持鳩杖者跪拜，心中氣惱以至忘記了令中“毆辱者，大逆不道，棄市”的規定，而毆打了老人。從“杖令”和武威旱灘坡木簡可知，這些人被作為棄市者被記錄了下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西漢後期，高年者被授予鳩杖，而鳩杖等同於王杖，還伴隨著各種恩典，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儘管如此，班固《漢書》中却對此毫無記錄（拙稿 B）。東漢也授予鳩杖（王杖），元帝以後恩典日盛。鳩杖（王杖）授予和恩典授予本應是德治的最好體現，但是，《漢書》對此卻沒有記載。這大概是因為漢代的優待老人制度雖然和儒家的

① 根據日本國政府總理府統計局網站的人口推算月報。

② 根據人民網、上海日報等公布的資料。

禮制相似，但仍不同於《禮記》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等禮制，而這是班固所不能容忍的吧。這個事例表明，對於《漢書》這樣必須依據的文獻，也需要時常從史料觀的角度加以分析。

三、武威旱灘坡出土木簡與鳩杖

東漢時代，與“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同樣重要的發現是旱灘坡木簡。^①1989年8月在甘肅省武威旱灘坡地區墓群進行調查時，發現了一座已遭盜掘、墓道和墓門都被破壞的合葬墓。緊急調查時，發現男棺的上部有一根被認為是生前使用的木鳩杖（鳩長15.6厘米，杖殘長1.1米）、和包括斷簡在內的16枚木簡。同時出土的器物、五銖錢等屬於東漢中晚期，第16簡上有“建元十九年”（43）的字樣，推測該墓年代應為東漢中晚期。

問題是，雖然這16件木簡被認為和鳩杖授予有關，但卻記載了很多沒有直接關係的法律條文，它也暗示墓主是地方上的官吏。這裏只討論和本文有關的內容：

1 制詔御史，奏年七十以上，比吏六百石。出入官府不趨，毋二尺告刻（劾），吏擅徵召□

5 民占數以男為女辟更徭論為司寇。

11 長安鄉嗇夫田順坐徵召金里老人榮長罵詈□□

當初這些簡應當是以冊書的形式放進墓中的，從各簡的內容來看，各簡很零散，內容不連續。很可能是在埋葬的時候，將有關的法律條文進行節選抄寫。

第1簡與前述建始二年九月令基本一致，而且有些部分和建始元年九月令也一致，很明顯和鳩杖（王杖）授予有關。第11簡和“杖令”的“長安東鄉嗇夫田宣，坐繫鳩杖主，男子金里告之，弃市”密切相關，兩者對照來看，可以解釋為“長安東鄉嗇夫田順（或宣）徵召了金里的鳩杖主人老人榮長，辱罵毆打他，坐毆辱王杖主之罪，被弃市”。它們肯定是因同一事件而頒佈的法令抄本。

除這2件木簡之外，其他簡似乎都和鳩杖（王杖）授予沒有直接關係。第5簡的意思是，“百姓在登錄戶籍時，如果以男為女、逃避更徭的話，論決為司寇”，該簡內容完整，是關於女子徭役問題的重要史料，但“更徭”的含義存在問題。狹義的“更徭”主要指地

^① 武威地區博物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均載《文物》1993年第10期。

方輪換服徭役的“更役”，廣義的“更徭”還包括“兵役”^①。

《秦律雜抄》的《傳律》規定，偽造戶籍登記要被“貲二甲”、受遷刑（360—361 簡）。根據《唐律疏議》卷十二《戶婚律》，因違反戶籍登記而“免課役”者，處 1 人徒 1 年，此罪最高刑是徒 3 年。因此，第 5 簡的規定與唐代法規相近。

秦和西漢時代，成年女子需要服更役，至新莽時代被廢除，東漢時又重新恢復。但是，東漢服兵役的男子是成為“衛士”，實際上和一般的徭役接近，當時主要採取征收更賦以代替實際就役，因此我在 1993 年拙著中提出女子不服實役但負擔更賦。最早提到女子徭役制度的，是以西漢前期鳳凰山漢墓簡牘為線索的 1978 年拙稿 C。對我的觀點有很多不同意見，現在，根據張家山漢墓竹簡可證明西漢初期存在女子徭役，而長沙走馬樓出土的三國時代吳國簡也有相關記載。

第 5 簡乍一看上去，好像是否定女子徭役的，不過，律文是東漢時期的，而且“更徭”是否特別指“兵役”值得懷疑，也存在誤寫的可能，總之我認為它不能成為否定東漢時代存在女子徭役制度的證據。

必須考慮一下 16 簡與墓主及鳩杖（王杖）的關係。該墓比出土了《儀禮》的武威磨咀子 6 號墓^②要稍小一些。但和發現鳩杖的 13 號墓、18 號墓差不多大小，祇是若干墓制稍小。由於隨葬品已被盜掘，無法做整體的把握，但竹木品比較少，墓主應該是姑臧縣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地方官吏、知識階層。

由此可知墓主人生前是地方官吏，70 歲後因長壽而被授予鳩杖，並享受了恩典。因此，親屬將他下葬時，不僅將鳩杖，而且還將與此有關的顯示恩典的部分法令，和為了顯示其曾為官吏而將法令的一部分予以刪節、或以斷片的形式簡略書寫後放入墓中，這種看法是比較穩妥的吧。

從東漢墓特別是甘肅省武威地區出土了很多鳩杖（王杖）。但是，從前述尹灣《集簿》和《續漢書·禮儀志》可知，鳩杖授予絕不是這些地方的特例，而是兩漢時代在全國普遍實施的一項制度。又，四川省出土的畫像磚上有作為養老恩典向手持鳩杖的老人發放米穀的圖案^③，這種情景在全國應到處可見。

西漢後期恩典不斷追加的情況是否持續到東漢，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後漢書》和《續漢書》記載了章帝時代鳩杖（王杖）授予制度，表明這一時期可能對西漢以來的優待制度進行了一定的調整，而形成東漢制度，恩典方面也有了實質性的減少。

據此，我已在拙稿 A 提到，相當於《周禮·地官·鄉大夫》“舍”的“老者”的西漢

① 參照 1993 年拙著。又，拙稿《書評：重近啓樹著〈秦漢稅役體系的研究〉》（《唐代史研究》第 3 號，2000 年）。

② 關於武威磨咀子墓群，請參照前揭注《武威漢簡》、《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發掘》。

③ 參照劉志遠、余德章、劉文傑：《四川漢代畫像磚與漢代社會》（文物出版社，1983）等論著。

武帝到東漢的制度內容如下：

70 歲以上……1 子免役（作為父後的男子）

80 歲以上……2 子免役（作為父後的男子，及羨卒）

90 歲以上……1 子免除兵役免役（作為父後的男子）、1 子免役（羨卒）

并且，這種徭役免除政策和後代的侍丁政策是有聯繫的。這種對照顧老人免除徭役的恩典，和刑法上的恩典一起，對鳩杖（王杖）被授予者而言是最富實際意義的恩典。

結語：長沙走馬樓簡牘和優待老人政策

最後，我想通過 1996 年發掘的長沙走馬樓 22 號井遺址出土簡牘，討論一下三國的問題^①。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曹操令“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對此，拙稿 A 認為這不是免除表現為“小徭”的徭役，而是和漢代一樣，是免除照顧 90 歲老人者的兵役。但是，在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曹操時代，徭役免除也可能祇限定在特別情況下，或者要到 90 歲才能免除 1 名男子的徭役。在這一點上，下斷言還需謹慎。

不過，到了晉代，據《晉書》卷五十《庾純傳》載，泰始三年律令遵從了《禮記·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的制度，反映魏晉時期遵循儒家禮制的意識很強烈，法律政策也與此相應。不過，如果只考慮由魏到晉的發展，還不能夠徹底瞭解這一時期的整體面貌。還有必要根據走馬樓簡牘文書，對三國時代吳國的情況進行分析。

根據走馬樓簡牘文書，可推測地處對魏、蜀最前沿的長沙郡平常的稅役負擔相當沉重。目前已發表的簡牘中，與老人優待政策有關的有 3 件竹簡，上面都記有“八十”這個年齡和“復”，而且也有和女子徭役制度有關的簡。^②下面，我們針對具體事例進行一下討論。

宗妻大女妾年卅二 算一 八十一復（2971 簡）

子公乘宗廿四算一八十 復（2993 簡）

① 據《文物》1999 年第 5 期的各篇論文，及報告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與《長沙走馬樓吳簡 竹簡[壹]》上、中、下（文物出版社，2003）。

② 張榮強：《吳簡所見免役資料試釋》（《文物》2004 年第 12 期）也針對包括這 3 枚簡探討了“復”的問題，認為 3 簡都是 80 歲以上高齡者的“侍丁”。

素寡婦大女思年卅六算一 八十可復（3322 簡）

2993 簡是 24 歲的男子，其他兩簡都是女子，分別是 32 歲和 36 歲。“八十一復”和“八十可復”這兩句很重要。如果以前文的論述為前提，即漢代成年女子有徭役義務，以及漢代對 70 歲以上老人實行的優待政策中，有免除照顧高年者徭役這一條，那麼這兩句無疑表明當時吳國對照顧 80 歲以上高年者的男女也實行免除徭役的制度。

正因為 80 歲才開始免除徭役，所以稱“可復”。由於這些都是散簡，我們不知道戶籍以及類似戶籍的賬簿的整體面貌，如果能知道女性的家庭構成，這 2 簡所記載的女子家庭中必定有 80 歲以上的老人。順便說一下，竹簡中也可以看到 80 歲以上的老人。雖然和 70 歲相比，人數較少，但是可以確認當時是存在著一定數量的 80 歲以上的老人的。

目前，由於還沒有看到記載有“七十可復”以及“七十二可復”等針對 70 多歲老人復除的簡文，因此吳國很可能沒有實行東漢 70 歲以上授予鳩杖（王杖）、1 子免役的恩典，而是對照顧 80 歲以上者實行免役。前面提到的魏國，可能實行的是免除照顧 90 歲以上老人者徭役的制度，它們均表明臨戰狀態對老人照顧者徭役免除制度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並且，吳國的這項制度和西晉的優待老人政策很相近。

在這些數量龐大的竹簡中，有很多關於女子“算”“復”的記載。詳細情況這裏就省略了，只談一下結論。“復”即免除徭役，在吳國成年女子也負擔徭役義務，身體殘障者等可根據情況採取相應的免除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對照顧老人者實行復除。

也許，該地區男子負擔著沉重的兵役和向遠方輸送軍糧等任務，或者丈夫戰死，有不少家庭中達到“大”年齡的只剩下了女性。從這樣的家庭徵發女性就等於奪走了照顧老人的人，吳政權針對這種情況採取了優待政策。

先談一下“算”的意義，“算”包含著“口算錢”的意思，如果考慮到“算”和免除徭役的“復”的關聯，它和漢代一樣，“算”也是計算口算錢、徭役負擔者的單位如一算、二算等。而且和魏國不同，很明顯吳國也和漢代一樣是征收口算錢的。

前文已經討論了與優待老人政策有關的 3 枚簡，這裏我想確認的是吳國的稅役制度和魏晉不同。魏自曹操以後以戶為對象的調征收定額的絹、綿，按照面積徵收定額田租。這項制度對漢代傳統進行了很大的改變。與此相對，雖然吳國的徵稅項目多種多樣，但基本上鄉——里系統是以口算錢、田租、徭役為主、鄉——丘系統是以調布等各種調和田租為主，兩者還都可以隨時征收各種臨時稅役。雖然鄉——丘系統的負擔在某些方面和魏、晉的傳統相近，但即使臨時課稅和各種課稅項目繁多，然而包括女子徭役制度它基本上還是繼承漢代制度。可以說，相對於魏國的求新，吳國採取的是按照實際情況對舊制度加以改造和權宜運用的方法。

相對於秦漢以來迫使女子走到“家”外、在官府等地直接役使的方式，魏的戶調制形式上停止了女子徭役，將其封閉於“家”內勞動的範圍，徵收她們的勞動成果。也就是說從古代的直接役使轉變成中世的間接役使。

總而言之，吳國是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漢制、保存著濃厚的古代性質的政權，以漢的後繼者自居的蜀國這種傾向也很強烈，與此相對，曹操以降的魏晉制度的設計者們，儘管標榜依據的是儒教特別是《周禮》^①，但實際上卻創造出了新的統治方式。最終，吳國的稅役制度在平吳之後，也被魏、晉的制度所代替。

① 關於《周禮》和曹操以後的制度上的關聯等問題，參照拙著《中國的烏托邦和“平均的理念”》（汲古書院，2001）。

漢律中有關行爲能力及責任年齡用語考述

◎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徐世虹

內容提要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所見“老小不當刑”之“小”，其年齡下限當在 15 歲以下，其制可溯源至秦律，83 簡之“不盈十七歲”係惠帝新政之舉；就無爵者而言，“小未傅”指 15 歲以下，“未傅”或指 15 歲以上至 17 歲以下，“傅”則指 17 歲以上；罷癘指先天殘障與衰弱多病者，是國家服役救濟制度的對象；狂易亦為由法律確認的行爲能力不完整者。

關鍵詞 行爲能力 責任年齡 小 未傅 罷癘 狂易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戶律》325—327 簡為有關“自占年”的規定，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相當詳細的涉及申報年齡的法律條文。年齡是判斷成人與否的基本依據，而成人與否又關係到自然人行爲能力的完整與否，關係到權利享受與義務履行，故探討散見於漢律中的相關用語及其內涵，對瞭解漢律的多元功能或不無裨益。

一、老小不當刑

語見《二年律令·具律》91 簡：

（前略）隸臣妾及收人有耐罪，貲（繫）城旦舂六歲。貲（繫）日未備而復有耐罪，完為城旦舂。城旦舂有耐罪以上，黥之。其有贖罪以下，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

百。^①

“老小不當刑”，意謂老小不受肉刑。儘管此“老小”前的限定語為“城旦舂”，但既然“老小不當刑”的原則適用於刑徒，則亦當適用於庶人，其恤刑之舉不別良賤。老小得以不受肉刑，一般而言是由於其行為能力有所欠缺。關於“老”的年齡起點，徵以《二年律令》36、83、342—343 諸簡：

年七十以上告子不孝，必三環之。三環之各不同日而尚告，乃聽之。

公士、公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前略）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異其子。

知為 70 以上。以無爵者而言，其年齡的界定小於受杖之年（75 歲）而大於免老、曉老之年（66、62 歲）。70 歲以上的老人，在訴訟權利上有所限制（三環之），而在刑事責任的承擔上則有所寬鬆（免受肉刑）。限制與寬鬆，皆因行為能力不完整所致。

關於“小”的年齡上限，論者一般以上述 83 簡為據，推測為不滿 17 歲。如 17 歲以上的男子為成人；10 到 17 歲基本承擔刑事責任，但可免於肉刑；^②83 簡規定了公士、公士妻及老人與未成年人犯當處肉刑之罪時，將肉刑換為完刑的情況。二年律令中所見的“老小不當刑”，或指見於此條的 70 以上、不滿 17。^③

在秦漢法律中，“小”的界定涉及身份地位、權利義務及責任的完全與相對，是相當重要的法律概念，故在秦律中“小”即有較為清晰的形態。所謂小、大，是以行為能力完整與否為基準劃分的。《二年律令·金布律》418—420 簡所見的“大男”、“大女”、“使小男”、“使小女”、“未使小男”、“未使小女”，是當時社會對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固定稱謂。^④這種稱謂的年齡內涵經居延漢簡記載而得以揭示，即大男大女的年齡為 15 歲以上。

楚漢戰爭時，項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⑤，論者認為這“顯然是把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下文所引《二年律令》簡文皆出此書，為避文煩，不逐一出注。

② 韓樹峰：《秦漢律令中的“完”刑》，《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③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之一），《東方學報》第七十六冊，2004 年 3 月，172 頁。

④ 大男大女的稱謂亦可見《管子·海王》：“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三升少半，此其大曆也。’”

⑤ 《漢書》卷三一《項籍傳》。

15 歲以上的人看成是可以從軍作戰的‘成人’”^①。漢初，衡量行為能力的完整與否亦以 15 歲左右為界。《二年律令·戶律》342—343 簡：“寡夫、寡婦毋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瘠（癯），及老年七十以上，毋異其子。”此條律文規定了幾種“毋異其子”的限制，“子年未盈十四”為其中之一。其限制的目的顯然在於“未盈十四歲”者尚不具備完全、獨立的行為能力。又據論者廣為徵引的惠帝六年（前 189）詔，知女性的婚齡下限為 15 歲。對 15 歲即具有完整行為能力的認定，當一直延續至西漢末。成帝時，沛郡一富翁擔心身後已嫁女與幼子爭財，遂立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富翁子年滿 15 歲後，因姊不肯歸劍，遂訟至郡府。時太守何武斷道：“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治，（下略）悉奪取財以與子。”^②所謂“智力足以自治”，猶今言有獨立的判斷與行為能力，可以以訴訟主體的資格進行訴訟。同時亦反證年 15 歲以下，無論心智與體力均未達到成熟階段，尚無獨立參與民事活動的能力。又據揚州儀征胥浦 101 號漢墓所出平帝元始五年（5）先令券書記載，當事人之一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為姓”，而在家長遺囑中仍被視為合法的財產繼承者。這多少可以窺見當時的民間社會已經認為男子年 15 以上已具有獨立為戶、自主謀生的能力，與上述戶律之文暗合。

與此相比，15 歲以下不僅在稱謂上被冠以小男、小女，在法律責任的承擔上也大有別於大男大女。《二年律令·具律》86 簡：“有罪年不盈十歲，除，其殺人，完為城旦。”既然 10 歲以下兒童犯罪，除殺人罪外完全免除刑事責任，則 10 歲以上犯罪必須承擔刑事責任，但據“老小不當刑”的原則，10 歲以上屬於“小”的範疇，故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中仍不包括肉刑。如據 83、91 簡可推知，10 歲以下或以上的城旦刑徒二次犯罪，且犯當處肉刑之罪，則改為笞百。^③

問題在於，“小”的上限以何年為界。對此或可求證於秦律。《法律答問》6 簡：

甲盜牛，盜牛時高六尺，鬻（繫）一歲，復丈量，高六尺七寸，問甲可（何）論？當完城旦。^④

① 彭衛：《漢代婚姻形態》，三秦出版社，1988，87 頁。

② 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588 頁。據《漢書》卷八六《何武傳》，成帝綏和元年（前 8），何武為御史大夫，而此前因所舉方正“詭眾虛偽”而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故決斷此案當在成帝綏和元年前。

③ 相關律文的理解，可參見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三國時代出土文字資料研究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之一），《東方學報》第七十六冊，2004 年 3 月，176 頁。張建國：《張家山漢簡〈具律〉121 簡排序辨正》，《法學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④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 年重印本。以下所引睡虎地秦簡皆出此書，不再逐一出注。

這是一個被人頻繁徵引的案例。平民男子甲盜牛時身高六尺（1.38 米），拘繫一年後身高達到 6 尺 7 寸（1.54 米），被認為當處完城旦刑。值得注意的是，甲所獲得的完城旦刑，是否就是秦律中對盜牛罪的一般量刑，答案未必是肯定的。《法律答問》5 簡曰：

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偕邦亡，出徼，得，論各可（何）毆（也）？
當城旦黥之，各界主。

該答問涉及三罪：一，甲謀遣人盜；二，乙受謀遣盜主牛；三，甲乙邦亡。關於謀遣人盜的制裁規定，可參《二年律令·盜律》57 簡：“謀遣人盜，若教人可（何）盜所，人即以其言□□□□□及智（知）人盜與分，皆與盜同法。”即謀者視同盜者。關於邦亡罪，據秦簡整理者對《法律答問》48 簡的分析，當處黥城旦刑。^①又據《法律答問》131 簡“盜罪輕於亡罪，以亡論”之文，似乎不易判斷簡中的“當城旦黥之”是對盜牛罪還是對邦亡罪的量刑。然而揣測“論各何也”一句，其着眼點在“各”，即謀遣人盜及盜這一盜竊行為，而非“偕邦亡”。《法律答問》4 簡“甲謀遣乙盜，一日，乙且往盜，未到，得，皆贖黥”之文，可視為謀遣者與盜同法的解釋，即謀者與盜者同等量刑。又依《法律答問》2 簡“盜……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而小畜生即價值 250 錢^②，且“四獬豸若十羊、豕當一牛”^③，則盜牛無論如何是應當被處以黥城旦的。又以《法律答問》中，該簡的前後簡文內容皆涉及盜竊，在性質上具有同一性，故此簡所見量刑當為盜牛而定。

對此，再辨析張家山漢簡《奏讞書》99—123 簡所載盜牛案，或可求證一二。該案為乞鞠案件。盜牛人毛不堪捶楚，誣樂人講與己共謀盜牛，講亦不堪笞掠而自誣與毛謀盜牛，最後被判為黥城旦且被執行。以後講提出乞鞠，於是案件重審，真相大白，講由刑徒變為隱官。有論者以為，黥城旦之判，是因為此案為共同犯罪，為加重懲罰所致。秦漢律中確實有共犯加重的原則。如《法律答問》12 簡：“其前謀，當并臧（贓）以論；不謀，各坐臧（贓）。”《二年律令·盜律》58 簡亦云：“謀偕盜而各有所取也，并直（值）其臧（贓）以論之。”可見“前謀”是共犯的重要前提，“并臧以論”是加重制裁的基本方式。然而以本案所見，其關鍵在於講是否盜牛而非共謀，故原判官吏之一鈹曰“與丞昭、史敢、賜論盜牛之罪”，廷尉的最終判決也是講不盜牛而非講不謀盜牛。如果是加重懲罰，按秦律“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且一頭牛的價值總會超過 660 錢^④，則當

① 參見張全民《秦律責任年齡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 年第 1 期。

② 《法律答問》92 簡：“小畜生入人室，室人以投（殳）挺伐殺之，所殺直（值）二百五十錢，可（何）論？當費二甲。”

③ 《二年律令·田律》，253 簡。

④ 參見張建國《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8，272 頁。

黥劓爲城旦。如此看來，講被黥爲城旦，非但不是加重，反而是減輕了。即使依照漢律的“盜賊（賊）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爲城旦”，也無加重之理。再以《奏讞書》69—74 簡所載醴陽令恢盜賣官米案見之，其審判意見爲：“律：盜賊（賊）直（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爲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以此當恢。”其文律令并徵，前者適用盜竊本罪，後者則是對官吏犯盜罪不以爵優待的規定。因此在判案時，若對本罪有加重或減輕的律令規定，在判決中當有所體現。即使採用重罪吸收的原則，其定罪量刑的過程也不會省略。

鑒此，筆者認爲黥爲城旦是秦律對一般盜牛罪的量刑。

假設上述推論可以成立，則以《法律答問》6 簡比較 5 簡及《奏讞書》案例即可發現問題所在：同爲盜牛之罰，何以一處完城旦，一處黥城旦？前者免處肉刑的優待理由何在？推敲簡文，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就是，平民 6 尺在法律上屬於“小”的範疇。《論語·泰伯》中的“可以托 6 尺之孤”及鄭注，爲論者頻繁徵引。鄭注的“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正可解釋六尺男子盜牛爲何不判黥城旦而處完城旦的原因。即盜牛者受完刑優待的根本原因在於“小”，未成年與成年是一罪二罰的根源所在。^①《唐律·名例》云：

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

從中可歸納出唐律所確定的刑事責任年齡及對象爲：完全責任年齡：70 以下至 15 以上；相對責任年齡：70 以上、15 以下及廢疾，犯笞杖徒流罪，收贖；80 以上、10 歲以下（至 7 歲以上）及篤疾，犯十惡等重罪，上請，盜及傷人，收贖；無責任年齡：90 以上、7 歲以下。其完全責任年齡的下限爲 15 歲以上，而相對責任年齡的下限則爲 15 以下至 7 歲以上。相對責任年齡的下限與漢代的使男、使女的年齡段一致，而無責任年齡的下限爲 7 歲以下，又與未使男、未使女的年齡段一致，皆在“小”的範疇。這種一致，恐怕并非偶然所致（參見表 I）。因此筆者認爲，“老小不當刑”之“小”的年齡段，即可以免受肉刑的未成年人的年齡在 10 歲以上至 15 歲以下。10 歲以下的兒童只對殺人罪承擔責任，但仍然免除肉刑。據此甚至還可以推知，《二年律令·具律》91 簡所見“老小不當刑”原則，至少在秦律即已存之。

^① 有論者認爲《後漢書》卷一五《來歷傳》所見“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即爲《新論》所引《法經》之文，即“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亦可佐證。見張全民《秦律責任年齡辨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 年第 1 期。

表 I

| 漢 | | | | 唐 | | | |
|------------------------------------|-----|-----------------|--------|------------------|--------|-----|--------|
| 年 齡 | 罪 行 | 量 刑 | 責 任 | 年 齡 | 罪 行 | 量 刑 | 責 任 |
| 10 歲以下 | 有罪 | 不制裁 | 免除 | 90 歲以上 | 死罪 | 不加刑 | 免除 |
| | 殺人 | 完城旦 | 相對 | 7 歲以下 | | | |
| 15 歲以下(惠帝時 改為 17 歲以下) 10 歲以上 | 有罪 | 制裁而 免肉刑 | 相 對 | 80 歲以上 10 歲以下 | 反、逆、殺人 | 上請 | 相 對 |
| | | | | | 盜、傷人 | 收贖 | |
| | | | | | 餘罪 | 勿論 | |
| 15 歲以上 70 歲以下 | 有罪 | 制裁而 不免肉 刑 | 完 全 | 15 歲以下 70 歲以上 | 流罪以下 | 收贖 | 相 對 |
| | | | | 15 歲以上 70 歲以下 | 有罪 | 制裁 | 完 全 |

既然如此，又當如何理解具律 83 簡中的“年不盈十七歲”？誠如論者已經指出，83 簡的內容與《漢書》卷二《惠帝紀》所見詔令相同。所不同者，83 簡為“十七歲”，而惠帝令為“十歲”。於是人們或認為簡文“十七”可能是“十歲”之誤抄；^①或認為班固筆誤，抄寫詔書時漏掉“七”字；^②或推測《二年律令》所載刑事責任年齡比惠帝時更寬鬆。^③

惠帝令為其即位後所發，其內容由賜爵、賜錢、賜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寬刑、輕賦等諸項新政構成。其中與寬刑相涉者有三：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其所涉優待對象各有不同：頌繫，適用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犯罪後當刑為城旦舂而改作耐為鬼薪白粲的適用對象，為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肉刑改作完刑的適用對象，則為老小之民。細揣上述記載不難發現，惠帝的寬政之舉正是通過改

① 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製作年代試探》，《史學月刊》2003 年第 9 期。

② 韓樹峰：《秦漢律令中的“完”刑》，《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③ 南玉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所見刑罰原則》，《政法論壇》2002 年第 5 期。

革舊制而體現新政中對有爵者、官吏以及老小的優待傾向，否則便無頒布新令的必要。換言之，繼舊律中既存“老小不當刑”原則後，惠帝令又將“小”的年齡（15歲以下）確定為“未盈十七歲”，從而將免受肉刑者的年齡範圍放寬到17歲以下。

因此，83簡關於庶民的恤刑內容，實際是對91簡“老小不當刑”原則的適時變通，體現了寬仁之政。簡文“十七”之“七”不是衍文，17歲也不是成年界綫。論者關於班固誤書之見，可從。

83簡的恤刑對象還涉及了公士與公士妻。對此，惠帝令并未涉及，只言“上造以上”，且優待後的刑罰為“耐為鬼薪白粲”。《商君書·境內》云：“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言自一級公士以下，因無爵級可貶，故有刑罪則當承擔，不免肉刑。秦律《秦律雜抄》5簡：“●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知其時公士犯罪不除肉刑。^①然而據張家山漢簡《奏讞書》182簡“當黥公士、公士妻以上，完之”之文，其制當有所改變，至少在惠帝前，公士、公士妻即可以完易黥。^②如此，83簡所言“公士、公士妻（中略）有罪當刑，皆完之”，應為已行之律，但偏偏83簡的內容又與惠帝令關係密切。如果“公士妻”之後的內容屬惠帝令，則之前的內容未見惠帝令又何以入此，是否是以令入律後的整理編纂結果？論者指出：“在圖版中，‘公士……若年’文字不鮮明，不能確認。”^③此姑且存疑待考。

二、小未傅、未傅、傅

徭律 412—413 簡：

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未敢繇（徭）使。

“小未傅者”指尚未達到傅籍年齡者，它與未傅者的最大不同在於其屬於未成年人，故與免老、女性及法定可不服役者一起，被視為免徭對象。以其前冠以“小”字，故對應的年齡段當在15歲以下至7歲。這個年齡段的未成年人被稱為使男使女，是已經具有相對行為能力者，故需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但在國家徭役中，尚不至履行法定義務的年齡。

不過與漢初法律規定有所不同的是，此後小未傅者出現於邊境事務之中。新出敦煌懸泉

① 論者注意到了此簡與83簡的關係，認為以秦簡所見公士當“刑”，有必要考慮與該條文的關係。見前引《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之一），172頁。

② 《奏讞書》該案無紀年。據整理者說明，《奏讞書》22件案例的排列，大體年代較早的在後，較晚的在前。故此案所涉年代或在高祖之前。

③ 前揭《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二年律令〉譯注稿》（之一），172頁。

置漢簡有如下簡：

效穀平望騎置一所第四，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①

據論者介紹，懸泉簡紀年簡中，最早為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最晚為安帝永初元年（107）；敦煌郡轄有廄置九所，效穀置為其中之一；又轄有十二個驛，平望驛亦為其一。^②小未傅為其中的配備人員。^③此時的小未傅內涵是否與漢初有異，或是否因特殊原因被配置於驛置，尚不明。

與小未傅理解相關者，又有“未傅”。語見戶律 413 簡：

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為繇（徭）。

其中“自公大夫以下”之“下”，整理者已指出當為“上”。對第一句釋文，論者與整理者有不同理解，認為當讀作“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④，此從。不過對“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一句的理解，欲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上再加探討。

據戶律 364—365 簡，知公大夫以下（至上造）子的傅籍年齡分別是 22 歲（公大夫至大夫之子）與 20 歲（不更至上造之子），故“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自然可指爵級為公大夫以下、年齡為 15 以上的有爵者之子。法律規定，當國家有“載粟”之役時，因爵位優待而傅籍年齡遲於平民之子的大夫、士等有爵者之子可被徵用，在地方從事“補繕邑”等輔助正役的勞役。

以上所言為有爵者之子，平民之子則又如何？筆者推測，自“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一句，或正可推出平民之子的傅籍年齡，即此句不僅僅是指有爵者之子而言，其下限當至平民之子。

以秦律及《二年律令》的律文表述結構而見，其文固然往往以“以上”或“以下”區分有爵者及其權益等級，但是“以下”的下限也并非僅至公士而止，亦可見超越公士而至無

① 簡文引自張俊民：《二年律令與甘肅漢簡》，簡帛研究網，2004 年 6 月 22 日。

② 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02 頁。

③ 見上引張俊民文。

④ 高敏：《西漢前期的“傅年”探討》，《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第 8 期。

爵者。如秦簡《秦律十八種》182 簡：

上造以下到官佐、史毋（無）爵者，（中略）糲（糲）米一斗，有采（菜）羹，鹽廿二分升二。

《二年律令·賜律》283 簡：

賜衣者（下略），五大夫以上錦表，公乘以下縵表，皆帛裏；司寇以下布表、裏。

《二年律令·戶律》309 簡：

□□□□令不更以下更宿門。

以上第一簡涉及飲食標準，可享受這一標準的，為上造以下到無爵的官佐、史。第二簡為賜衣標準，公乘以下一檔明顯包括公卒、士伍、庶人在內。第三簡為輪值義務，“不更以下”也不可能僅指有爵者有此義務而無爵者與此無關。因此“公大夫以下子”未必僅指有爵者之子。換言之，此句應當包括兩種“年十五以上未傅者”，一是公大夫以下有爵者之子，二是公士至無爵者之子。

關於前者的傅籍年齡，已可知最低為 20 歲（不更至上造之子），故所謂“年十五以上未傅者”，當指 15 以上至 20 以下及 15 以上至 22 以下。關於後者的傅籍年齡，律文并未明言，只言“公士、公卒及士伍、司寇、隱官子，皆為士伍”。不過以《二年律令》所見五大夫以下爵位與權利義務的對應關係，或可推測公士及無爵者之子的傅籍年齡與上造之子（20 歲）相比，不會有很大差異。如表 II：

| 身份 | 受田 | 受宅 | 受賜比照 | 受杖 | 免老 | 曉老 | 傅籍年齡 子 小爵 | | 粟 鬻 | 賜衣 | 賜棺而欲 受資 |
|-----|----|----|-------|----|----|----|--------------|----|--------|---------------|-----------------------------|
| 五大夫 | 25 | 25 | 800 石 | 70 | 58 | | 22 | 24 | 90 | 五大夫以上 錦表帛裏 | 五大夫以下 棺錢級 六百，槨 級三百 |
| 公乘 | 20 | 20 | 600 石 | 70 | 58 | | 22 | 24 | 90 | | |
| 公大夫 | 9 | 9 | 500 石 | 70 | 58 | | 22 | 24 | 90 | | |
| 官大夫 | 7 | 7 | 500 石 | 70 | 58 | | 22 | 24 | 90 | | |
| 大夫 | 5 | 5 | 300 石 | 70 | 58 | | 22 | 24 | 90 | | |

| | | | | | | | | | | | |
|----------|---------|--------|--------------------------------|----|----|----|--|----|----|--------------|-------------|
| 不更 | 4 | 4 | 有秩 | 71 | 62 | 58 | 20 | 22 | 91 | 公乘以下 繆表帛裏 | |
| 簪裹 | 3 | 3 | 斗食 | 72 | 63 | 59 | 20 | 22 | 92 | | |
| 上造 | 2 | 2 | 佐史 | 73 | 64 | 60 | 20 | 22 | 93 | | |
| 公士 | 1.5 | 1.5 | 佐史 | 74 | 65 | 61 | 公士、公 卒及士 伍、司 寇、隱官 子，皆為 士伍 | | 94 | | |
| 公卒 | 1 | 1 | 飯一斗，肉 | 75 | 66 | 62 | | | 95 | | |
| 士伍 | 1 | 1 | 五斤，酒大 | 75 | 66 | 62 | | | 95 | | |
| 庶人 | | | 半斗，醬少 半升 | | 66 | | | | | 司寇以下 布表裏 | 無爵者棺 級三百 |
| 司寇 隱官 | 50 畝 | 半 宅 | 飯一斗，肉 三斤，酒少 半斗，鹽廿 分升一 | | | | | | | | |

自表可見，低爵者與無爵者的差異并不明顯，受田宅不過半頃半宅之別，受杖、免老、詭老、寔鬻亦不過一年之差。至於賜衣，則公乘以下直至庶人，皆為繆表帛裏而無差異。就傳籍年齡而言，不更以下子皆為 20 歲，如果至公士以下子為 15 歲，則差異較大，較其他諸項權益反差明顯。

總之，對 413 簡或可作如下理解：15 歲是大男大女（具有完整行為能力）的界定標準，但不是傳籍（法定的服役）之年。可以說傳籍者必已成年，但未必成年即傳籍。景帝時規定“二十始傳”，昭帝時改為 23 歲，在“寬力役之政”的背後，恰好表明傳籍之年與成年之年無必然聯繫。如前所述，15 歲以上的大男大女被視為具有完整行為能力者，因而在立戶、婚姻乃至繳納賦稅上可獨立參與行為，但在為國家服正役上則未必如此。413 簡以 15 歲為界，證明 15 歲以上者已具有完整的行為能力，故可徵而役之。然而這些人又與已傳者不同，故令其從事與正役有所區別的“補繕邑”等輔助性力役。景帝二年（前 155）“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傳”，意味著是在原傳籍之年的基礎上將年齡放寬到 20 歲，即將原為不更以下子享受的優待擴大到整個平民階層。如此，漢初公士以下子 17 歲傳籍，在目前看來是可以求證的結果之一。秦簡《秦律十八種》190 簡有“除佐必當壯以上，毋除士伍新傳”的規定，從中可辨析出新傅士伍當屬青年；自《二年律令·史律》474 簡“史、卜子年十七歲學”，亦可窺其一二。^①

① 參見李學勤《試說張家山簡〈史律〉》，《文物》2004 年第 4 期。張家山漢簡面世後，主張 17 歲傳籍者，又見臧知非《秦漢“傳籍”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人文雜誌》2005 年第 1 期。

自《二年律令·戶律》331簡可知，鄉吏需要呈報縣廷的戶民籍冊副本，不僅有戶籍，還有年細籍，並規定“有移徙者，輒移戶及年籍爵細徙所，并封”^①，即戶民移戶時，不僅要遷戶籍，還要遷年細籍及有關爵位的詳細情況，反映出年齡、爵位、身份與國家力役中的權利義務關係密切。因此律文中的“小未傅”、“未傅”、“傅”，當皆有相應的年齡含義。就無爵者而言，小未傅當指15歲以下，未傅則指15以上、17以下，傅則指17歲以上。

三、罷癰與狂易

罷癰亦指行為能力不完整者，其人可分兩種情況。一見《二年律令·傅律》363簡：

當傅，高不盈六尺二寸以下，及天烏者，以為罷癰（癰）。

整理者注“烏”，疑讀為“亞”，指天生殘疾醜惡之人。《史記》卷七六《平原君列傳》：“臣不幸有罷癰之病。”《索隱》：“罷癰謂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一見《二年律令·戶律》342—343簡：

（前略）及夫妻皆癰（癰）病，及年老七十以上，毋異其子。

《說文·疒部》：“癰，罷病也。”段注：“病當作癰。罷者，廢置之意。凡廢置不能事事曰罷癰。”《漢書》卷七〇《陳湯傳》：“（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痛，兩臂不詘申。（中略）湯辭謝曰：‘將相五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癰，不足以策大事。’”即先天殘障與衰弱多病者為罷癰，其在法律上被視為特殊人群，在權利義務上與常人不同。

以上述363簡所見，法律要求衰弱多病的夫妻不得與子分戶，以使其生存贍養得以保障。同類規定又見徭律408簡：“諸當行粟，獨若父母居老如眊老，若其父母罷癰（癰）者，皆勿行。”另一方面，罷癰者又可享受全部或部分免除服役的權利。秦律允許罷癰者“占癰（癰）”，其目的當在視罷癰程度的輕重而減免徭役義務，故若“占癰（癰）不審”，里正、伍老要負連帶責任。^②《周禮·地官·大司徒》“五曰寬疾”鄭注：“寬疾，若今癰不可事，

① 《二年律令·戶律》328簡。此當襲秦制。湘西里耶秦簡069正面：“廿六年五月辛巳朔庚子，啓陵鄉□敢言之：都鄉守嘉言：渚里□□劾等十七戶徙都鄉，皆不移年籍，令白移言，今問之劾等徙□書告都鄉曰：啓陵鄉未有業（牒），毋以智（知）劾等初產至今年數□□□□謁令，都鄉具問劾等初產年數，敢言之。”背面：“□遷陵守丞敦狐告都鄉主，以律令從事。/建手。”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簡牘選釋》，《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秦簡《秦律雜抄》32簡：“匿敖童，及占癰（癰）不審，典、老贖耐。”

不算卒，可事者半之。”謂漢代對罷癰者的服役義務有兩種規定，一是對完全無能力服役者，免除其服役義務；二是對尚有部分服役能力者，雖不令其服重役，但令其服力所能及之役。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所出民籍，亦時見因病殘而“復”的記載：

妻大女□年廿五，算一，腫兩足，復。(9—3067)

富貴里戶人公乘李平年卅五，算一，盲右目，復。(9—3048)

子公乘客年廿八，算一，苦腹心病，復。(9—3075)^①

腫兩足、盲右目、苦腹心病等，顯然與“復”互為因果。這似乎表明，至少自秦以來，對罷癰者的服役救濟制度是一以貫之的。上引《周禮》“五曰寬疾”孔疏：“云寬疾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者，漢時癰疾不可給事，不算計以為士卒，若今廢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者也，謂不為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似今殘疾者也。是其寬饒疾病之法。”以唐開元二十五年（737）令所見，唐代對罷癰的認定標準相當具體：

諸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大拇指，禿瘡無發，久漏下重，大瘻瘡，如此之類，皆為殘疾。癰疽，侏儒，腰脊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為廢疾。惡疾，癲狂，兩肢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②

《宋刑統·戶婚律》引此令為戶令。殘疾、廢疾、篤疾之區分，當對應於戶民服役能力的完整與否，“寬饒疾病之法”仍屬其功能之一。

漢代對罷癰者的救濟制度，還體現在生活資料的賜予上。西漢時期，鰥寡、孤獨、高年往往是國家於改元、立太子、祥瑞、災異之際賜帛的對象^③，而自東漢以後，鰥寡、孤獨、篤癰、貧不能自存者則被賜以粟米^④，篤癰者成為國家道德政治的實施對象^⑤。

在罷癰者成為法律優待及國家救濟對象的另一面，則是罷癰者的政治權利一般不予以保護。高祖十一年（前196）二月求賢詔規定：“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癰病，勿遣。”^⑥年老癰病者屬行為能力受限制對象，即使是賢者，也不能躋身國家官吏之列。成帝綏和二年（前7），丞相翟方進受責

① 王素等：《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5年第5期。

② 仁井田陸：《唐令拾遺·戶令》，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3，228頁。

③ 例見《漢書》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紀。

④ 例見《後漢書》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各紀。

⑤ 范忠信認為，中國古代的福利救濟制度和慣例有三大精神，第二是以福利救濟貫徹或體現道德教化。見氏著《中國古代福利救濟制度及其精神》，載《中西法律傳統》第二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18、219頁。

⑥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自殺。杜延年之孫杜業上書，指責“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但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①，可知方進用病殘之人許商，因不合漢制而遭杜業之譏。

在漢代，行為能力受限制者還應當包含精神病患者。時稱精神病為狂易、狂病或病狂。如《漢書》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

（貫鄉侯平）建昭元年正月封，四年，病狂自殺。

又卷九七下《外戚傳·孝元馮昭儀》：

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

在刑事責任上，最初對重大的狂易犯罪不赦。《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

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王褒帶劍入宮室，其罪與闖入宮殿門無異，雖系狂易，亦難免死罪。^②《太平御覽》卷六四六引《廷尉決事》：

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

此二案所涉皆係重罪，一涉危害皇帝安全，一涉殺死尊長，故最終皆處死刑。然而狂易者為“人至病狂而改易其本性，則凡病中之所為皆非出於其本性”^③，在刑事責任上終究不能與常人等同。《後漢書》卷二九《鄧惲傳》：

（鄧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中略）。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

① 《漢書》卷六〇《杜欽傳》。

② 闖入宮殿門下獄死之例，又見《漢書》卷九七上《孝昭上官皇后》：“又（上官）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

③ 沈家本：《漢律摭遺》卷五，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1470頁。

“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從中可見，假設鄧惲聽從黃門近臣之言，自訴因狂病而不覺所言，便有可能減輕甚至免除刑罰。這或許是當時具有實效的刑罰原則。即在言論罪上，狂易而言不同於有主觀故意的誹訕。至東漢安帝時，尚書陳忠提出“狂易殺人，得減重論”^①，將狂易殺人改為負相對刑事責任，從法律上確認了狂易者為無獨立或受限制行為者。

由於狂易者在法律上被視為行為能力有所欠缺，因而在爵位繼承上也受到限制。《漢書》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樂平侯詡）病狂易，免。”又卷七三《韋玄成傳》：“（韋）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中略）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玄成之佯為病狂，在於不願取代坐罪之兄而作為第一繼承人襲爵。儘管以後又不得已受爵，但由此亦可反證，若玄成狂病屬實，便不能立繼襲爵。狂易者在立繼、襲爵、為官上受到限制，也使一些志行高潔者往往以佯狂為手段，或躲避為權勢者服務，或讓位於賢者。公孫述僭號於蜀，犍為人費貽不肯仕之，“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②。順帝時，尚書侍郎雷義歸鄉，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發走，不應命”^③。

① 《後漢書》卷四六《陳忠傳》。

② 《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列傳·譙玄》。

③ 《後漢書》卷八一《獨行列傳·雷義》。

漢代婚姻家庭另類形態的法律依據

◎ 中華書局
李解民

內容提要 以男子為中心，是漢代婚姻家庭的主要形態。但我們發現，與此同時還存在着以女子為主角的婚姻家庭。因為它有別於當時社會通行的一般婚姻家庭，所以稱之為另類形態。筆者曾在討論雲夢睡虎地秦簡所載魏律、東海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文字、儀徵胥浦簡書等出土資料的文章中，揭示分析過漢代所存在的另類形態婚姻家庭。本文則在此基礎上，逐一討論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之《戶律》、《置後律》、《收律》和《奏讞書》中的有關記載，從中揭示、分析漢代婚姻家庭另類形態的法律依據，並對中國婚姻家庭史的認識和研究提出看法。

關鍵詞 張家山漢簡 婚姻 家庭 女子 寡婦 立戶 繼承 婚姻史

人類從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後，在一個很長時期內，男子成為婚姻家庭的主角，漢代也不例外。以男子為中心，是漢代社會婚姻家庭的基本特徵。婚姻的締結，家庭的組成，財產的繼承，男子均處於主導地位，而女子則處於從屬地位，這就是漢代婚姻家庭的主要形態。

但我們發現，與此同時還存在着以女子為主角的婚姻家庭。因為它有別於通行的一般婚姻家庭，所以稱之為另類形態。筆者曾在《睡虎地秦簡所載魏律研究》^①、《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所書其他文字初探》^②、《揚州儀徵胥浦簡書新考》^③中，根據簡牘資料揭示討論

①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7年第1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載《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③ 2001年6月提交“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05。

這種現象，指出：漢代（涉及漢以前的秦代、戰國時代）有的家庭婦人當家、寡婦掌門，而男子上門入贅，成為當時婚姻家庭的一種補充形態。由於資料的限制，還未能就這種社會現象的法律背景作進一步的探討。《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①的出版，為探討漢代以女子為中心的另類婚姻家庭形態提供了原始的法律文本依據，其中《二年律令》裏的《戶律》、《置後律》、《收律》以及《奏讞書》等，明確、具體地記載了有關規定。本文即依此展開討論。

一、《戶律》中的有關規定

《二年律令·戶律》的出土，對於認識、揭示漢代社會的真實面貌，其意義是多方面、多層次的，異常巨大。它對本文主題的討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戶，民戶，具有戶籍身份的家庭，是漢代社會最基礎的結構單元。《戶律》對戶的基本政治經濟地位、權利和義務作了法律上的規定。其中核心的部分有三個方面。

一是“比地為伍”，即被編入國家正式地方行政最基層的組織——伍，居住在國家正式地方行政最基層的單位——里，民戶要接受嚴格的約束和監督，沒有遷徙的自由。簡305—306云：“自五大夫以下，比地為伍，以辨口為信，居處相察，出入相司。有為盜賊及亡者，輒謁吏、典。田典更挾里門鑰，以時開；伏閉門，止行及作田者；其獻酒及乘置乘傳，以節使，救水火，追盜賊，皆得行。不從律，罰金二兩。”編伍居里，既是一種約束，一種從空間角度的規定，從此打上籍貫的印記；也是一種權利，一種可以從政府取得相應生活和生產資料的標志。沒有取得戶籍身份的家庭入伍居里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懲處。簡307云：“隸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論之。”

二是民戶可得到法律規定的相應的基本生產資料——田。簡310—313云：“關內侯九十五頃，大庶長九十頃，駟車庶長八十八頃，大上造八十六頃，少上造八十四頃，右更八十二頃，中更八十頃，左更七十八頃，右庶長七十六頃，左庶長七十四頃，五大夫廿五頃，公乘廿頃，公大夫九頃，官大夫七頃，大夫五頃，不更四頃，簪褭三頃，上造二頃，公士一頃半頃，公卒、士五、庶人各一頃，司寇、隱官各五十畝。不幸死者，令其後先擇田，乃行其餘。它子男欲為戶，以為其口田予之。其已前為戶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

三是得到法律規定的相應的基本生活資料——宅。簡314—316云：“宅之大方卅步。徹侯受百五宅，關內侯九十五宅，大庶長九十宅，駟車庶長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

^①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以下所引張家山漢簡均據此書。

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長七十六宅，左庶長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褭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隱官半宅。欲爲戶者，許之。”宅和田，都是地，但被賦予了不同的功用。

在一般情況下，立戶受田宅者即戶主爲男性，但同時也存在着戶主爲女性的情況。這從《戶律》的有關條文中看得很清楚。

簡 337—339 云：“民大父母、父母、子、孫、同產、同產子，欲相分予奴婢、馬牛羊、它財物者，皆許之，輒爲定籍。孫爲戶，與大父母居，養之不善，令孫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勿貿賣。孫死，其母而代爲戶。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

“其母而代爲戶”，母親當戶主，表明女性有立戶當戶主的資格。值得注意的是，“其母而代爲戶”之後，有“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贅，及道外取其子財”的規定，這與見於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兩條魏國律文，顯然是一脈相承的。《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①《爲吏之道》簡 16 伍—21 伍云：“·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野，入人孤寡，徼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假門逆旅、贅婿後父，勿令爲戶，勿予田宅。三世之後，欲仕仕之，仍署其籍曰：故某處贅婿某叟之仍孫。魏戶律。”簡 22 伍—28 伍云：“·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將軍：假門逆旅、贅婿後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殺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從軍，將軍勿恤視。烹牛食士，賜之參飯而勿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將軍以堙壕。魏奔命律。”兩條魏律，直接針對假門逆旅、贅婿後父，規定限制懲處措施；而《戶律》“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贅”，則從女戶方面設置防範阻止這類人進入的屏障：兩者的精神吻合一致。漢律承自秦律，而秦律承自魏律，魏律當承晉律，其間的傳承關係清晰可見；當然，還可以繼續往上追溯。再看《戶律》“公卒、士五、庶人各一頃”、“公卒、士五、庶人一宅”，而“宅之大方卅步”，一宅即九百平方步，合九畝，與《商君書·境內》“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的記載相比勘，均爲田一頃配宅九畝，其間的承繼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

簡 340 云：“諸後欲分父母、子、同產、主母、段母，及主母、段母欲分孽子、段子田以爲戶者，皆許之。”此條明文規定“主母、段母欲分孽子、段子田以爲戶者，皆許之”，更是女性可以立戶受地的正面規定。

簡 345 云：“爲人妻者不得爲戶。民欲別爲戶者，皆以八月戶時，非戶時勿許。”“爲人妻者不得爲戶”，換言之，“不爲人妻者得爲戶”，對女性立戶作了限制，以否定的表述形

① 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

式肯定了女性立戶接受田宅的合法性。

《戶律》對女性為戶的確認，為漢代以女性為主的另類婚姻家庭的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根據。

二、《置後律》中的有關規定

從一定意義上說，《置後律》是關於家庭的繼承法。這裏所指的家庭，上起徹侯之家，下及無爵的平民（公卒、士五、庶人）和“亞平民”（司寇、隱官）之家。

作為一家之主的戶主，是一種資格、一種身份，享有政府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政府對百姓的統治，首先是通過對家，即主要是戶主的管理來實現的。“編戶齊民”為治國平天下之本，這種統治理念和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秦漢時期已經非常成熟。《大學》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天下——國——家——身到身——家——國——天下這樣一個完整的循環模式中，可以清楚看到：家是溝通每個百姓與最高統治者天子之間聯繫不可或缺的一環。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國家的基礎，是要不斷延續的，《置後律》就是對家庭延續的規範。

如前所揭，《戶律》對戶主性別的界定，為女性保留了一定的空間；而在《置後律》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

“置後”，換言之就是設置戶主的繼承人。這與天子諸侯要有繼承人是一個道理。有無爵位、爵位的高低是戶主身份的基本標志，它決定戶主相應的權利、義務。因此戶主的繼承，最核心的是爵位的繼承。《置後律》對女子的爵位繼承權有明確的規定。

簡367—368云：“疾死置後者，徹侯後子為徹侯，其毋嫡子，以孺子（子、良人）子。關內侯後子為關內侯。卿後子為公乘，【五大夫】後子為公大夫，公乘後子為官大夫，公大夫後子為大夫，官大夫後子為不更，大夫後子為簪褭，不更後子為上造，簪褭後子為公士，其毋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這顯然是針對一般有男性下一代的家庭而言的，男性在繼承方面享有與立戶一樣的優先權。

簡369—371云：“口口口口口為縣官有為也，以其故死若傷二旬中死，皆為死事者，令子男襲其爵。毋爵者，其後為公士。母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毋母以男同產，毋男同產以女同產，毋女同產以妻。諸死事當置後，毋父母、妻子、同產者，以大父，毋大父以大母與同居數者。”明確規定了關於死於官事者襲爵、置後的法定序列。其爵位繼承序列為：

1子男——2女——3父——4母——5男同產——6女同產——7妻

儘管體現了男性優先的精神，但也肯定了女性有位的原則，2、4、6、7位次均為女性。

簡371云：“女子比其夫爵。”更是從法律上確認了女性對於爵位的享有權。

過去由於觀念的局限和資料的缺乏，對秦漢時代女爵的認識不足，並存在嚴重偏差。

事實上，傳世文獻中還是保留了這方面一鱗半爪的痕迹。如《史記·文帝紀》載大臣擁立代王繼位為帝上言，首云“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據《集解》引蘇林曰，陰安侯是“高帝兄伯妻，羹頡侯信母，丘嫂也”；引徐廣曰，列侯頃王后是“代頃王劉仲之妻”，此事又見《漢書·文帝紀》。作為女性的陰安侯和列侯頃王后，居然成為當時劉漢皇室最重要的兩位成員（這當然是由於她們在存世的皇室人員中輩分最高）。她們身為列侯，並名副其實地享有參與決策皇位繼承人的權力。

《漢書·蕭何傳》云“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史記》、《漢書》之《樊噲傳》均云樊噲之妻呂須亦為臨光侯。《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祖六年，又有奚涓無子而以其母為魯侯的記載。

這方面值得重視的資料，還有《後漢書·皇后紀》的記載，云：“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李賢注：“《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常使、少使之號。’”又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李賢注：“婕妤一，嬪二，容華三，充衣四，以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為一等也。”《皇后紀》又云：“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那麼，西漢至東漢初內宮有一套女官爵秩制度是顯而易見的。呂后稱制，后妃干政，絕非偶然，是與當時女性享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歷史背景密不可分的。

在出土文獻裏同樣也有反映。如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高臺18號墓發掘簡報》^①報道該墓出土木牘4塊，分別編為M18:35甲、乙、丙、丁，其中M18:35乙云：“新安戶人大女燕關內侯寡，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家復，不算不口。”據M18:35丙“七年四月丙子朔庚子”，可知時當西漢文帝前元七年，即公元前173年。筆者認為：此墓主應為“新安戶人大女燕”；其身份是“關內侯寡”，即爵為關內侯的寡婦。“關內侯”也見於張家

^① 載《文物》1993年第8期。

山漢簡《奏讞書》，簡88云：“診問蒼、信、丙、贅，皆關內侯。”這位名燕的女子，作為一戶之主，由於爵位的關係，享受“家復，不筭不口”的優待。

《周禮·春官宗伯》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鄭玄注：“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賈疏：“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鄭注、賈疏不承認女性有爵，故別為釋解。如前所揭，“內女之有爵者”、“外女之有爵者”，存在於西漢初期，已是不爭的事實。《周禮》的這一記載，可以說反映了春秋戰國乃至秦漢的情況。

女性既然可以擁有爵位，當然也就可以享受爵位所包含的權益，那麼可以作為繼承人而取得戶主的資格，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前揭簡369—371中規定的置後序列是：

1 子男——2 女——3 父——4 母——5 男同產——6 女同產——7 妻——8 大父——
9 大母——10 同居數者

序列中的2、4、6、7、9均為女性，而10同居數者也應有近半概率的女性。

簡379—380云：“死毋子男代戶，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孫，毋孫令耳孫，毋耳孫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產子代戶。同產子代戶，必同居數。棄妻子不得與後妻子爭後。”“代戶”、“置後”都是就戶主繼承而言，但角度有所不同。這裏規定的戶主繼承人的法定次第序列是：

1 子——2 父——3 母——4 寡——5 女——6 孫——7 耳孫——8 大父——9 大母——
10 同產子

它跟簡369—371中規定的置後序列存在一些差異，值得深入研究，但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其共性，它們同樣肯定了女性代戶的資格。

簡382—383云：“死毋後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為庶人，以口人律口之口主田宅及餘財。奴婢多，代戶者勿過一人，先用勞久、有口子若主所言吏者。”這裏還從法律上確認了女性奴隸——婢代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

簡384云：“女子為父母後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復取以為戶。棄妻，畀之其財。”已經被立為繼承人的女子，如果出嫁的話，法律允許她帶走娘家的田宅來充實夫家的田宅；丈夫去世后，她還可以立戶。這又表明：女性法定繼承人享有較一般女性更大的繼承權利。

簡386—387云：“寡爲戶後，予田宅，比子爲後者爵。其不當爲戶後，而欲爲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爲戶。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爲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這是關於寡婦的條文。主要是對兩種情況的規定。一是：“寡爲戶後，予田宅，比子爲後者爵。”寡婦作爲合法繼承人立戶，政府給予田宅，比照子繼父的爵次標準。二是：“其不當爲戶後，而欲爲戶以受殺田宅，許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爲戶。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爲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寡婦不是合法繼承人，如想立戶，政府也可允許，但祇能分給無爵庶人標準的田宅。後面“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爲戶”的話費解，或有訛誤衍脫；疑第一個“其夫”之後脫“子”字，大概在講寡婦去世後的繼承人次序：子（當指與前夫所生之子）——夫【子】（當指與後夫所生之子）——夫（當指後夫）。“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令毋買賣田宅及入贅。其出爲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戶。”是對寡婦當戶主的一些約束：“夫同產及子有與同居數者”，寡婦不能變賣田宅和入贅；如果要再出嫁或去世的話，戶主的身份就要按法定順序被頂替。江蘇連雲港東海尹灣六號漢墓出土的6號木牘所書文字有一段云：“臣請：寡代戶者，得以同居，毋次以不同居長者代。”^①講的也是寡婦當家繼承的問題，可以對看。尹灣木牘書寫年代已在西漢末年，約漢成帝元延三年（前10）稍後，說6號木牘所書那段文字是對《置後律》的繼承，應該是没有問題的。

這裏還應提到的是揚州儀徵胥浦簡書。1984年江蘇揚州儀徵胥浦101號漢墓出土了一組竹簡，數量爲16枚。經筆者考證，這組簡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文件。第一個爲元始五年（5）九月辛丑所立的“先令券書”抄件，即墓主人朱交病重時所立書面遺囑。券書的主題是：“交自言：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欲令子各知其父家次。”意思很明確：朱交自己說，有三個父親生下的子女六人，都有不同的父親，想讓孩子各人知道自己的生父和在家中的排行。接下來，就將六個子女與三個父親的關係依次分組逐一說明。第二個爲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墓主人嫗（即朱交）關於子女田產分配的口述記錄。合而觀之，胥浦簡書十分清晰地揭示了當時一個以女性爲中心的家庭。戶主先後有過三個丈夫，生育六個子女，臨終還在爲子女的田產分配操心。其時間、背景很明確，是漢平帝元始五年（5），距呂后二年（前186）已近二百年，與《二年律令》同樣反映出漢代存在以女性爲主的婚姻家庭的事實，胥浦簡書可以說爲《二年律令》之《戶律》、《置後律》的有關條文提供了一個具體而生動的實例。

還應指出的是，胥浦簡書的“先令券書”，可以與《二年律令·戶律》對勘。簡334—

① 詳參《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所書其他文字初探》，載《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336云：“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財物，鄉部嗇夫身聽其令，皆參辨券書之，輒上如戶籍。有爭者，以券書從事；毋券書，勿聽。所分田宅，不爲戶，得有之，至八月書戶，留難先令，弗爲券書，罰金一兩。”不難發現，胥浦簡書的“先令券書”，完全符合《二年律令·戶律》律文的規定，而胥浦簡書所表明的女子也有權立“先令券書”的事實，可以說是對《二年律令》的一個補充。

三、《收律》中的有關規定

除了《戶律》、《置後律》，在《收律》中也可發現相關佐證。

簡174—175云：“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財、田宅。其子有妻、夫，若爲戶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爲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這裏的“其子有妻、夫”很值得注意，說明此“子”泛指下一代，包括男性和女性，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子女”，反映法律對女性的獨立性和獨立法人地位有相當的尊重和認可。後面說“若爲戶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爲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進一步證明“子”的確是兼指兒子女兒。女性可以“爲戶有爵”，應該是合乎邏輯的，也與前揭《戶律》、《置後律》的有關規定完全吻合；至於“若爲人妻而弃、寡者”，則表明出嫁的女性一旦與丈夫脫離了實際關係（被拋棄或喪夫），將不再受原來丈夫的刑事牽連。

簡177云：“毋夫及爲人偏妻，爲戶若別居不同數者，有罪完舂、白粲以上，收之，毋收其子。內孫毋爲夫收。”這條律文規定女子無夫或爲人偏妻，自立門戶或別居他戶，但當與之有性關係的男子犯了“完舂、白粲以上”的罪，也要受連坐，又從一個側面表明女子可以獨自爲戶，同時可以當人的偏妻。

四、《奏讞書》中的有關規定

在《奏讞書》中，可以發現一個與本題關係極爲密切的案例。

《奏讞書》簡180—196云：

故律曰：死夫（？）以男爲後。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爲後。律曰：諸有縣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歸寧卅日；大父母、同產十五日。教悍，完爲城旦舂，鐵頤其足，輸巴縣鹽。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弃市。弃市之次，黥爲城旦舂。當黥公士、公士妻以上，完之。奸者，耐爲隸臣妾。捕奸者必案之校上。今杜瀘女子甲

夫公士丁疾死，喪棺在堂上，未葬，與丁母素夜喪，環棺而哭。甲與男子丙偕之棺後內中和奸。明旦，素告甲吏，吏捕得甲，疑甲罪。廷尉殺、正始、監弘、廷史武等卅人議當，皆曰：律，死置後之次，妻次父母；妻死歸寧，與父母同法。以律置後之次人事計之，夫異尊於妻，妻事夫，及服其喪，資當次父母如律。妻之為後次夫、父母，夫、父母死，未葬，奸喪旁者，當不孝，不孝弃市；不孝之次，當黥為城旦舂。教悍，完之。當之，妻尊夫，當次父母，而甲夫死，不悲哀，與男子和奸喪旁，致之不孝、教悍之律二章。捕者雖弗案校上，甲當完為舂，告杜論甲。今廷史申繇（徭）使而後來，非廷尉當，議曰：當非是。律曰：不孝弃市。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吏且何以論子？廷尉殺等曰：當弃市。有（又）曰：有死父，不祠其家三日，子當何論？廷尉殺等曰：不當論。有子不聽生父教，誰與不聽死父教罪重？殺等曰：不聽死父教毋罪。有（又）曰：夫生而自嫁，罪誰與夫死而自嫁罪重？廷尉殺等曰：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有（又）曰：欺生夫，誰與欺死夫罪重？殺等曰：欺死夫毋論。有（又）曰：夫為吏居官，妻居家，日與它男子奸，吏捕之弗得，□之，何論？殺等曰：不當論。曰：廷尉、史議皆以欺死父罪輕於侵欺生父，侵生夫罪輕於侵欺死夫，□□□□□□與男子奸棺喪旁，捕者弗案校上，獨完為舂，不亦重乎？殺等曰：誠失之。

這個案例，講的是應如何審理女子甲在丈夫病死停靈的晚上與男子丙和奸的案子。

與本題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開首所引的兩條律文。第一條律文，即見於前揭的《置後律》；第二條律文規定，丈夫為妻子服喪比同父母，重於祖父母和兄弟，又從一個側面顯示了作為妻子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廷尉等人的判詞云：“律，死置後之次，妻次父母；妻死歸寧，與父母同法。”它具體解釋了兩條律文，再次肯定妻子在繼承序列中的位置，并以此作為斷案的法律根據。

更值得注意的是廷史申後來駁正原判的那段話。廷史申從兒子侍奉父親的法律規定推導出妻子侍奉丈夫的法律規定。先說兒子侍奉父親：“有生父而弗食三日，吏且何以論子？廷尉殺等曰：當弃市。有（又）曰：有死父，不祠其家三日，子當何論？廷尉殺等曰：不當論。有子不聽生父教，誰與不聽死父教罪重？殺等曰：不聽死父教毋罪。”接著說妻子侍奉丈夫：“有（又）曰：夫生而自嫁，罪誰與夫死而自嫁罪重？廷尉殺等曰：夫生而自嫁，及取（娶）者，皆黥為城旦舂。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有（又）曰：欺生夫，誰與欺死夫罪重？殺等曰：欺死夫毋論。”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子對父、妻對夫都遵循同一原則，即為“孝”，即：生事死止。這跟儒家及後來一般傳統的觀念認識有較大的出入。事死如生，那是儒家的主張，并非秦漢社會的主流思想及法制理念。史料的缺乏和後來按

照儒家對傳世史料的改造，使人們對歷史產生認識上的誤區。

“夫死而妻自嫁、取（娶）者毋罪”，丈夫去世，妻子享有再嫁的自由和權力；“欺死夫毋論”，妻子對亡夫，不再承擔侍從的義務。這種尊重生存現實的理念，可以從古籍裏找到一些蛛絲馬迹。如《左傳·桓公十五年》：“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襄公三十年》：“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人盡夫也”，“婦義事也”，可謂是此種理念之先聲。

五、餘 說

以上，我們討論了張家山簡書《二年律令》之《戶律》、《置後律》、《收律》和《奏讞書》中的有關規定，清晰地揭示了漢代以女子為中心的另類婚姻家庭形態的法律依據；換言之，也就進一步揭示了漢代存在以女子為中心的另類婚姻家庭形態的社會現象。正確理解這一社會現象及其法律依據，將使我們對中國古代的婚姻家庭，對中國古代的社會演變產生一些新的認識，其意義應是多方面的，深遠的。

例如關於首見於西漢文帝即位（前180）閏九月所頒詔書賜“女子百戶牛酒”的記載，應該如何解釋，爭論了近兩千年，現在可以藉此獲得新的資料、新的視角。

又如關於唐代女戶的記載，《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元和二年五月戊申詔云“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下的李賢注：“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為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又《唐律疏議》卷十二：“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議》曰“若戶內并無男夫，直以女人為戶”。現在也可以藉此獲得新的溯源資料。

至於近現代女戶主的現象，如李景漢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河北定縣從事農村家庭人口的分析，調查5255個家庭，發現除了男家主5044戶之外，還有221戶是女家主^①，更可以聯繫當時、通觀歷史加以考察，從而作出更為科學的詮釋。

祇有這樣，一部新的更為接近歷史真實的中國婚姻家庭史才能產生，而當今的婚姻家庭狀態及其走向，也將可由此得到更為準確的把握。

① 李景漢：《農村家庭人口統計的分析》，第一表，《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二卷第一期，1936。

尹灣漢墓簡牘軍吏“以十歲補”補證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卜憲群

內容提要 尹灣漢墓簡牘中關於軍吏“以十歲補”的記載，反映了漢代官僚制度中存在着一條由軍吏向地方長吏升遷的制度化途徑。“十歲”雖然不是漢代官僚升遷年限制度上的唯一規定，但却有着特殊的意義。尹灣簡豐富了我們的認識。

關鍵詞 軍吏 十歲 升遷

《尹灣漢墓簡牘·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①（以下稱《名籍》）記載了西漢晚期東海郡長吏任用的許多情況，大大深化了我們對漢代官僚制度的認識。特別是《名籍》中關於長吏升遷途徑的具體記載，極大地彌補了文獻的不足。學者們雖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是仍有可進一步研究的地方。本文擬就《名籍》（四）中關於軍吏“以十歲補”以及軍吏升遷的問題，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再提出一些補證材料和看法。^②

《名籍》（四）中有兩條關於軍吏“以十歲補”的材料，茲摘錄如下：

① 中華書局，1997。

② “軍吏”一詞頻見於春秋戰國至魏晉的歷史材料中。關於“軍吏”的研究也逐漸引起學界的重視，如黎虎先生在《說“軍吏”——從長沙走馬樓吳簡談起》（《文史哲》2005年第2期）一文中，對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軍吏”內涵作了分析。關於漢代軍吏，他認為：“漢代以校尉為將軍與軍吏的分界綫，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員亦屬‘軍吏’範疇。”可備一說。

建鄉相山陽郡□□管(?)費故將軍史以十歲補
鐵官丞臨淮郡淮陵龔武故校尉史以軍吏十歲補

關於這兩條材料，學者們先後作出過若干分析。李解民先生在《〈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研究》一文中指出^①：

將軍史與校尉史一樣，也是軍吏，所以(115)“以十歲補”的完整表述也應寫作“以軍吏十歲補”，“軍吏”二字當係省略或脫漏。補官前，二人有兩點共同之處：(1)軍吏身份，(2)十歲資歷。《史記·張釋之傳》云：“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強調“十歲不得調”，似謂十歲是在一個職務上任期的大限，一般不應超過這個期限。這與二人任職10年而調補它官的情形十分吻合。軍吏在同一職務上經歷十歲應獲調補，大概是當時官吏任用中的一個規定。將軍較校尉高一個檔次，作為他們屬吏的史自然也應相差一個檔次，因而所補之官的俸秩也正好差一個級別。校尉基本與太守相當，同處二千石檔次，兩者相應屬吏俸秩也應大致相當，與校尉史對應的太守卒史俸秩為百石也就可以定下來。(126)從校尉史補為二百石鐵官丞，當屬晉升無疑。同樣道理，不難推知(115)從將軍史補為三百石建鄉相也為晉升。^②

陳勇先生在《尹灣漢墓簡牘與西漢地方官吏升遷》一文中指出^③：

校尉史一職，文獻未載，惟《敦煌漢簡》(1300)：“制曰可。賜校尉人錢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候丞人二萬；書佐、令史人萬。”據此可知校尉史乃校尉屬吏。……軍吏之補地方文職，也需要特殊的理由，表2中將軍史“以十歲補”，校尉史“以軍吏十歲補”一句推測，軍吏的升遷，大概是以十年為限。

于琨奇先生在《尹灣漢墓簡牘與西漢官制探析》一文中說^④：

牘文中有2人均是因任軍史滿十年得補地方長吏。這說明漢代有以年資任官的制度

① 文載《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

② “115”、“116”係作者給這兩條材料的編號。

③ 《尹灣漢墓簡牘綜論》。

④ 《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存在，也有在軍中服役滿10年可轉任地方長吏的制度存在。

廖伯源先生在《簡牘與制度》一書中關於此兩條材料解釋說^①：

爲軍吏十歲得補朝廷命官之縣長吏，此非特異，蓋制度。此一升遷途徑爲前此所不知，述漢代之仕進途徑，應多此一途。（39頁）

爲軍吏十歲得補縣長吏，蓋爲軍吏十歲無功，故不得以功升遷，以其年資晉升爲朝廷命官。無功且得升遷爲朝廷命官，則漢人官至朝廷命官，並無傳統所了解之難。（55頁）

各家觀點大體如上，綜合以上諸說可以歸納出如下兩個基本觀點：第一，管費和龔武二人所任長吏係軍吏向文官的轉化，漢代存在着一條以往人們所不知的由軍吏遷補地方長吏的正常仕進途徑。第二，漢代軍中或地方仕進途徑中存在着一個以十年年資爲限的升遷制度。我以爲，以上看法是接近歷史真相的，但仍有不甚清楚的地方，簡牘、文獻、碑刻仍有可進一步論證這個問題的材料，試析之如下。

二

關於管費和龔武二人的身份問題。管費爲將軍史，龔武爲校尉史，文獻或簡牘有證。先談將軍史。漢代將軍十分複雜，《西漢會要·職官二》“軍官”條所列將軍名稱就很繁多。實際上，漢代的將軍就其名稱而言不僅限於授給武官，亦可加之於文官，其職能甚至與武事無涉，安作璋、熊鐵基先生《秦漢官制史稿》（上冊）第三章第一節有詳細的分析^②。管費所任將軍史之“將軍”當係武職，與一般文官兼稱將軍及泛稱將軍者有別。因爲在尹灣簡這樣的人員管理名籍中，其稱呼必然是十分嚴格而規範的。因此李解民先生認爲“將軍史以十歲補”中間省略或脫漏了“軍吏”二字是完全正確的。漢代將軍開府置史史家多有論述，屬吏中即包括“史”一職，如《會要》即檢索出有“大將軍史”、“右將軍史”（《漢書·律曆志》），“驃騎將軍史”（《漢書·藝文志》師古注引劉向《別錄》）。關於將軍史的職責，安作璋、熊鐵基先生云：“另一類是長史、從事中郎以及各種掾、史，這些是管府內事務的，或者‘壹決府事’，或者‘與參謀議’，其中不少是文人。”^③這個分析無疑是

① 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② 齊魯書社，1984。

③ 前揭著 256—257 頁。

正確的。管費任將軍史，所從事的事務也應大體與此相同，其性質類似於現代軍隊中的文職人員。次析校尉史。校尉是將軍之下的武官。黃今言先生云：“將軍之下的中級武官，有諸‘校尉’和諸‘都尉’等。”^①如《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及《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就有很多校尉，跟隨將軍出征，並因此而封侯或升為將軍的記錄。漢代校尉設置也很複雜，除了軍隊中的武官校尉外，還有掌糾察的司隸校尉，還有特設的各種校尉，如八校尉、戊己校尉等。^②校尉設史，文獻也有記載。《會要》即檢索出司隸校尉史（《漢書·趙皇后傳》）、戊己校尉史（《漢書·王莽傳中》）。敦煌簡中亦有校尉史。《名籍》明確說校尉史龔武為“軍吏”，當屬於軍中武官校尉之史。

關於二人的遷補途徑問題。管費、龔武二人之升遷涉及到漢代軍吏如何向地方長吏遷補，以及軍吏向地方長吏遷補是否是制度化的問題。從前所述可以看到，管費、龔武二人皆為軍吏，而所任建鄉相、鐵官丞皆為地方（包括中央直屬機構）長吏，系由軍吏向行政長官的遷補。由軍吏向地方官遷補的情況在尹灣簡中還有以下諸例：

《名籍》（三正）：“海西令琅邪諸王宣故漁陽□□左騎千人以功遷”；

《名籍》（三正）：“下邳左尉沛郡相□□故腹土候□□□請詔除”；

《名籍》（三反）：“建陽丞京兆尹奉明王豐故戊校前曲候令史以功遷”；

《名籍》（四）：“建陵侯家〔丞〕梁國蒙孟遷故象林候長以功遷”。^③

儘管由軍吏遷補的地方官在東海郡官吏總數中並不占主要地位，但顯然也不屬於“特例”，而應是如廖伯源先生所說的“蓋制度”。那麼這一制度是否完全是“為前此所不知”呢？我以為并非如此，在以往的材料中這一制度還是可以尋見其蹤迹的。首先，在秦漢史籍記載中由軍吏向文職人員轉化，以及文職人員向軍吏轉化的實例都不罕見，文武官吏的界限並不是絕對不可逾越的。這個制度可追溯到戰國時的秦國。如《商君書·境內》云獲爵者“乃得入兵官之吏”，“爵吏而為縣尉”。《韓非子·定法》云：“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都是指獲得爵位方可獲得官職。秦爵位的獲得固然并非戰功之一途，但戰功必占主要地位。戰功獲爵從制度上保證了軍吏向地方行政吏員的轉化。漢初情況亦是如此。《史記·張丞相列傳》云：“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

① 《秦漢軍制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31頁。

② 安作璋、熊鐵基先生說：“諸校尉和都尉官，除行軍作戰時是一級帶兵官之外，平時，以上所說這些都尉和校尉，隨着大將軍等屬於內朝官，也算是內朝官。”（前揭著250頁）

③ 廖伯源考證將軍史、校尉史、象林候長、戊校前曲候令史皆為軍吏，腹土候□□□“乃候之屬吏，是軍吏”，漁陽□□左騎千人為“軍官”。（前揭著，33—34頁，38頁，20頁。）

公卿皆軍吏。”《漢書·景帝紀》云：“先是吏多軍功。”《漢書·任敖傳》云：“公卿皆軍吏。”《漢書·儒林傳》云：“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張家山漢簡《秦讞書》中所反映的漢初縣令及低層吏員皆有爵位甚至高爵的情況，足證“吏多軍功”之語不誤。這些擁有爵位的地方官吏，應當是從軍立功獲得爵位，再向地方行政吏員轉化的。嚴耕望先生的《秦漢郎吏制度考》和廖伯源先生的《簡牘與制度》論著中徵引《史》、《漢》材料，確證了漢代軍吏向郎吏轉化的事實。^①出將入相及為高級官吏者在秦漢官僚隊伍中，特別是文獻記載中也是常見的。由行政人員向軍吏的轉化同樣也較普遍地存在於秦漢官僚隊伍中。大家熟知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編年記》中的“吏誰從軍”，即從行政管理人員中選拔從軍者。墓主人喜任過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等職，後從軍，顯係地方文職人員向軍吏的轉化。漢代從公卿到太守出任將軍領兵作戰，史籍亦多載，無需一一例舉。其次，在秦漢仕進中，軍吏向地方吏員的遷補也有若干制度化的途徑綫索可尋。秦及漢初，由於軍功爵制的盛行，軍吏向地方吏員的轉化是有制度保證的。但是以功獲爵與從事國家行政管理畢竟還是兩回事，因此爵與官的逐步分離也是必然的，此點學者們已經多有論述。那么在官爵分離之後，是否完全阻隔了軍隊中的立功人員、各級軍官以及軍中文職人員向地方行政吏員的轉化呢？文獻、簡牘等材料中大量的關於軍人積功勞的意義何在？漢代一般仕進制度是否向軍人開放？怎樣開放？無疑是我們解釋這個“制度化”的關鍵。我們認為，軍中廣泛實行嚴格的、規範的積功勞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證軍吏可以因此而制度化的向地方吏員轉化。蔣非非在《漢代功次制度初探》一文中例舉史料證實後認為：“士卒從軍時斬首立功一般升遷為郎吏或太子舍人等職”，而“官吏因軍功而獲得提升的事例在兩漢 400 年間十分普遍”。^②（指提升為地方長吏而非軍中提升）以上之“功”當然僅指戰功，其實除了“斬首立功”和“攻城野戰”之功外，“積功勞”也是包括軍中一般人員在內的軍人更為普遍的升遷途徑。《漢書·爰盎傳》載爰盎責難申屠嘉云：“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注引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漢書·申屠嘉傳》云：“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帥。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太守。”申屠嘉由隊帥遷為都尉再遷為淮陽守，是由軍中小吏因積功勞而遷為地方長吏的。這說明積功勞制度是漢代軍人向地方吏員轉化的一條正常途徑，尹灣簡更進一步證實了這個途徑的存在。漢代軍中各種積功勞人員很多，

① 為使讀者查證簡便，茲列之如下：《史記·李將軍列傳》：“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史記·平准書》：“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史記·衛將軍驍騎列傳》：“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廖伯源先生說：“軍功除郎當是軍功仕宦的一部分……兩漢邊患不少，戰爭甚多，此外，內郡討逆平亂亦史不絕書，有軍功者必多。漢代文武官界限不嚴，常交互任用，以軍功入仕者必不在少。”（前揭著，14頁）

② 《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一般來說，他們既不可能都能封侯，也不可能長期留在軍中并向上升遷，而政府把他們向地方吏員轉化無疑是一個積極而穩妥的政策。

除了積功勞之外，察舉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向軍人開放，我們試對如下記載略作分析：

《漢書·馮奉世傳》：“（馮遂）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遷為復土校尉。光祿勳子永舉茂才，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尉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

《漢書·敘傳》：“（班彪）避地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

《北軍中候郭仲奇碑》：“為郡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

《梁相費汎碑》：“察孝廉，除郎中，屯騎司馬，遷蕭令。”

《郃陽令曹全碑》：“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遷右扶風槐里令。”

《漢書·成帝紀》建始三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漢書·哀帝紀》建平元年詔：“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漢書·哀帝紀》建平四年：“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漢書·哀帝紀》元壽元年詔：“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目錄》：“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八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後漢書·桓帝紀》永康元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

從上述不完全的統計中可以看到，漢代的軍吏可以通過正常的察舉而遷至地方官吏，如馮遂、班彪、郭仲奇、費汎、曹全等。漢代的將軍（不包括大將軍所具有的選舉權）、校尉等

軍官也都擁有察舉制下若干舉主的資格。察舉的科目涉及“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明兵法”等諸科。^①他們察舉的條件應當是在軍吏範圍之內。因此，軍吏向地方官吏的升遷也可以從漢代仕進制度上尋求到一般解釋。

關於“十歲”問題。管費與龔武皆因為軍吏十年而遷補地方官。這兩個“十年”是偶然巧合還是具有特殊意義？前述諸家中惟有李解民先生引用《史記·張釋之傳》從文獻上解釋說“似謂十歲是在一個職務上任期的大限，一般不應超過這個期限。”我想就此再徵諸文獻，試圖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應當看到，管費、龔武與尹灣簡中其他幾位軍吏升遷的不同之處是：他們二人既非立功，亦非請詔，更不是因察舉科目而遷補地方官的，而是因為在軍中待了“十年”才被遷補出去的。這與司馬遷所說的“累日積勞”，董仲舒所說的“以日月為功”、“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的情況相似。但尹灣簡中又將其與“以功遷”、“以功次遷”分別開來，似乎彼此之間還有細微的差異。那麼“十年”在秦漢官僚升遷制度中是否具有特殊意義呢？我以為是有的。除了李解民先生所引張釋之“十歲不得調”外，前揭蔣非非文還徵引《漢書·朱博傳》：“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後漢書·盧植傳》：“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及崔寔《政論》：“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黃霸為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為公卿”諸材料證明：“漢代官吏黜陟之法規定的每一秩等任職期限為九年，滿九年則稱為‘功滿’”，又云：“在一般情況下，官吏任職滿九年升遷至高一秩等的職務，也有增秩等而仍任原職的規定。”也就是說居官九年既不升遷，也不增秩、獎勵，也許就不正常了，張釋之可能就是如此。但由於各種原因的延遲，或者說功滿九整年後才能升遷，那麼第十年獲得升遷或增秩、獎勵也不能說是一種不正常的情况。管費和龔武“以十歲補”還應屬於是正常的升遷。當然，漢代官吏不能按時遷轉，甚至超過十年的人員也不少，如《後漢書·馬融列傳》云融“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此簡帛、文獻記載漢政府還有一些特殊措施針對這些人：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史律》：“史、卜年五十六，佐為吏盈廿歲，年五十六，皆為八更；六十，為十二【更】。五百石以下至有秩為吏盈十歲，年當皖老者，為十二更，□□踐更。”^②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十五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視事〕二

① 黃留珠先生推測將軍舉茂才很可能“是從安帝時開始的。”（前揭著，167頁）閻步克先生在《察舉制度變遷史稿》一書中認為：“漢代三公府及將軍府可以舉掾屬為‘高第’”，並認為“公府與軍府之掾屬‘高第’，應為常科之察舉科目。”（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29頁。）

② 這裏的“八更”、“十二更”並不應指漢代服役之踐更。曹旅寧先生認為這些詞“而應是指卜、祝的等級”，是“晉升不同的榮譽職位。”可備一說。參見《秦律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324、325頁。

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十匹，十歲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

中元十七年：“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

《安帝紀》延光元年：“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以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奸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

這裏視事年限是按職位統計的，應是指在該職位所處的年限。“十歲”還是限制擅離職守者再仕的年限之一，《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詔：“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

東漢桓帝時，還將察舉之前必經十年吏職作為一項制度貫徹實施。《後漢書·桓帝紀》云：“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奸舉善。……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閻步克先生依據文獻將此解釋為“試職”的時間為十年，目的是“吏職實習”，“強調實際經驗和工作能力”，無疑是正確的。^①這個“試職”實即為官之前所需經歷的吏職。但閻先生認為“‘試職’的時間又驟增至十年”，其實如果結合張家山簡及尹灣簡中管費、龔武的材料來看，這個“十年”的職限并非沒有制度上和實踐上的依據的。如為吏十年已不罕見，管費和龔武就是任吏職十年後才升遷為官的。只不過在此之前“十年”時間可能官、吏不分，時間也不固定，而此時有了更明確的限定。

漢代官吏任職時間有無限定，學界看法並不一致。前述蔣非非先生認為任職期限為九年。而閻步克先生認為“漢代官職大多沒有確定任期”^②。的確，我們在尋求“十歲”的制度依據時，同樣可以看到其他許多情況存在。如上引延光元年詔中即包括“一歲”至“十歲”的各類任職期限的人，甚至有“無拘官簿”的情況。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二年詔：“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後漢書·祭彤傳》：“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贛令。”這些並不能否認“十歲”在漢吏升遷、獎勵上的特殊意義，而只能反映“十歲”是漢吏升遷、獎勵的一條綫，但不是惟一的。漢吏任職時間應存在着多元化的狀況，許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最後談一下管費和龔武的秩次問題。《漢舊儀》云：“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但管費與龔武由將軍史、校尉史分別遷至建鄉相和鐵官丞，其秩次分別是三百石、二百石，這是否是貶秩呢？顯然不是。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并非大將軍史，而祇是其他將軍府中一般的百石吏職。

以上對尹灣簡中軍吏的“十歲”升遷問題作了一點簡單的探討，以期望引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文中難免有理解上的缺點和錯誤，企盼指正。

① 前揭《察舉制度變遷史稿》，47頁；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68頁。

② 《品位與職位》，中華書局，2002，162頁。

尹灣十號木牘師君兄貸師子夏券文初探

◎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蔡萬進

內容提要 尹灣六號漢墓十號木牘反面記錄了墓主生前的一次貨幣借貸，這是我國漢代貨幣借貸契約文本實物的首次發現；通過考察有漢一代官方及民間的各種貨幣借貸活動，本文認為該券反映了西漢晚期尤其是成哀年間官吏“為人起責”這一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關鍵詞 尹灣十號木牘 錢約 西漢

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村六號漢墓發掘出土木牘 23 方，其中編號為第十號的木牘正面為漢成帝元延元年曆譜，反面為墓主貸錢之券，券文曰：“元延元年三月十六日師君兄貸師子夏錢八萬約五月盡所子夏若□卿奴□□□□□□□丞□時(?)見者師大孟季子叔”^①。雖有缺損文字，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此券的基本內容與格式。遺憾的是，其學術價值至今未被學界關注。本文擬就其文字內容、格式以及所反映的漢代社會歷史等問題予以考察。

一、墓主貸錢之券的內容與格式

尹灣十號木牘墓主貸錢之券是墓主生前一次貨幣借貸的記錄。在分析考證其文字內容與格式之前，我們首先對券文試作句讀。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圖版，21—22 頁；釋文，127 頁。以下凡引尹灣漢墓簡牘，皆見本書。

尹灣十號木牘墓主貸錢之券共 48 字(包括未釋之字), 豎兩行, 隸體頂格書寫於十號木牘反面右側。券文中“約”字的句讀, 是認識該文書的關鍵。鳳凰山十號漢墓二號木牘的“中販共侍約”是比較典型的契約, 其文為: “□□三月辛卯中販販長張伯□□□□陳伯等七人相與爲販約(一)入販錢二百約二會錢備不備勿與□販……販吏□□”, 依黃盛璋研究, 約文“相與爲販約”應有兩種讀法: 一是“相與爲販”, 意思是張伯等人共同合夥經營商販; 二是“相與爲販約”, 意思是共同在一起商訂商販的契約。今據全文和下文的“約二”, 斷“約”字屬下讀。^①我們認爲該“約”文中有“約二”, 上文當有“約一”, “約一”即“相與爲販, 約: 入販錢二百。”又, 玉門花海二號木簡賒買契約, 依文意斷句為: “元平元年七月庚子, 禽寇卒馮時賣橐絡六枚楊卿所, 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斗, 過月十五日, 以日斗計。蓋卿任”^②, “約”亦屬下讀。因此, 尹灣十號木牘墓主貸錢之券券文亦應作如此句讀, 即: 元延元年三月十六日, 師君兄貸師子夏錢八萬, 約五月盡所, 子夏若□卿奴□□□□□□□□丞□, 時見者師大孟、季子叔。

首先, “元延元年三月十六日”是借貸發生與立契時間。元延, 西漢成帝晚期年號, 元延元年即公元前 12 年。尹灣七號木牘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紀年字樣, 考古發現與文獻所載的西漢各類契約紀年有“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僮約》)^③、“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④等等, 墓主貸錢之券紀年符合武帝以後西漢紀年習慣和通例。標明借貸發生與立契時間, 這是契約的最基本條款, 這一時間標志著借貸關係的建立和在法律上的時效性。

第二, “師君兄貸師子夏錢八萬”, 明確了借貸雙方和借貸錢幣數額。債務人(舉貸者)師君兄, 即墓主師饒, 由 YMD₆《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與《元延二年日記》所記可知, 墓主師饒(字君兄)元延元年間乃東海郡一名官吏。債權人(放貸者)師子夏, 依“師君兄”例, 子夏應爲其字, 其名不詳, 但與墓主師饒同姓。“錢八萬”是師子夏一次借貸給墓主師饒的錢幣數額。

第三, “約五月盡所, 子夏若□卿奴□□□□□□□□丞□”應是雙方商訂的履行該契約的具體條款。因此處未釋之字太多, 具體內容無從知曉。但從《居延漢簡甲乙編》26·1: “建昭二年閏月丙戌, 甲渠令史董子方買鄣卒歐威裘一領, 直七百五十, 約至春錢畢已, 旁人杜君隼”^⑤及“元平元年七月庚子, 禽寇卒馮時賣橐絡六枚楊卿所, 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斗, 過月十五日, 以日斗計。蓋卿任”知, “約”字之後都是有關履行該契約具體要求的內容, 像“約至春錢畢已”、“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斗”, 甚至還包

① 黃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文物》1974 年第 6 期, 67 頁。

② 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③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四十二,中華書局,1958。

④ 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170 號簡,文物出版社,1984,43 頁。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簡 26·1,中華書局,1980。

括有懲罰性規定，如“過月十五日，以日斗計”。墓主貸錢之券券文中“約”及以下文字（包括未釋之字），亦應作如是解。鳳凰山漢簡“中販共侍約”是一份有標題和完整約文的典型契約，其契約行文我們可以簡化為：“□□三月辛卯，中販販長張伯、□□、□□、陳伯等七人相與爲販，約（一）：入販錢二百。約二：會錢備、不備勿與□販……販吏□□。”其“約”字後面皆是有關“相與爲販”的具體規定和違規處罰措施。墓主貸錢之券“約五月盡所，子夏若□卿奴□□□□□□□丞□”，雖缺損文字太多，不能卒讀，但絲毫不影響我們對“約”字後面內容的理解，這部分內容是契約文書中關鍵條款之一。

第四，“時見者師大孟、季子叔”，這是契約文書中常見的見證人、中保人。漢代契約中常見的有“任者”、“旁人”、“時見者”、“知券約”等稱謂。有的在契約上祇書姓名，有的書籍貫和任職，多數中保人、見證人不是專業人員，而是雙方親友或鄰居，墓主貸錢之券券文中“師大孟、季子叔”即屬此類。師大孟，與墓主師饒（君兄）、債權人師子夏同姓，季子叔，與二者關係不詳，疑爲鄰居或親友。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尹灣十號木牘墓主貸錢之券是一份成熟的漢代契約文書，條款齊備，文字嚴謹，格式固定，與考古發現和文獻所載的已知的漢代各類經濟活動契約僅有內容上的不同，其行文、格式却別無二致。依鳳凰山二號木牘“中販共侍約”、王褒《僮約》題名及漢代買地券、賒買契約等“約”文書特點，墓主貸錢之券或可全稱爲“師君兄貸師子夏錢約”，或仿“僮約”而徑稱其爲“錢約”。這是漢代貨幣借貸契約文本實物的首次發現，增添了漢代契約文書研究的新資料。

二、墓主貸錢之券反映的漢代社會經濟問題

尹灣六號漢墓十號木牘墓主貸錢之券是一份西漢成帝元延年間的貨幣借貸契約，反映了西漢晚期貨幣借貸方面的經濟活動。考察西漢一代官方及民間的個人貨幣借貸，大致有如下情況：

第一，“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史記·貨殖列傳》：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吳、楚七國景帝三年春兵反，“長安中列侯封君”要“行從軍旅”。行從軍旅的費用，《漢

書·貨殖傳》顏師古注曰：“行者須齋糧而出”，長安列侯封君倉猝間缺乏現金，軍事又極緊迫，所以祇能“於子錢家貸之也”，即向“子錢家”（專門經營高利貸的人）貸款。又因關東戰事勝敗難卜，其他“子錢家”“莫肯與”，惟獨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結果吳楚戰事三月平息，無鹽氏從中獲取“息什倍”，由此“富埒關中”。“列侯封君”不惜“其息什之”，貸錢於“子錢家”，可見當時“子錢家”的威勢。

第二，家有變故，貸錢應急。《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圖》記道：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

董永之例，乃是西漢一典型貧苦者貸錢事例。放貸者的目的自然是爲了取息，但舉貸者的貧困背景與高額的貸息，使放貸者在收回本息時往往遇到一定的困難。《史記·孟嘗君列傳》所記孟嘗君之客馮諼的一段收債經歷，很清楚地反映了戰國時代貨幣借貸的基本情況。傳載：

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諼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諼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

西漢亦是如此，桓譚《新論》曾論道：

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仆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

“中家子弟，爲之保役”，即是債主們募集的爲之趨走收息的人。對於那些著實無力償還者，他們是不會像馮諼那樣焚燒文契，一筆勾銷，而是要催逼債戶破產償還甚或賣身償付，

晁錯所言“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相當一部分舉貸者的去路，董永謂錢主說“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爲奴”，正是這一歷史現象的真實寫照。

第三，替人放貸，從中牟利。《漢書·貨殖傳》：

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營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營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又《漢書·谷永傳》載谷永上書言：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上引史載說的都是達官貴人、外戚，依仗權勢，替“子錢家”或“富商大賈”放債而共同分取利息，或者是坐收“子錢家”的重謝。這些達官貴人，自己不出一分錢，祇是假借他的名義，憑藉他的威勢，爲人包攬，債務人逼於威勢，不敢不還。他們既是舉貸者，又是放貸者，成爲西漢後期嚴重的社會問題。

尹灣六號漢墓墓主爲西漢成帝東海郡郡府卒史、功曹史，雖爲“百石”小吏，但地位重要，爲太守心腹股肱，位次太守、太守丞。《漢官儀》云：“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其職責，《續漢書·百官志五》云：“主選署功勞”，主要承擔一郡吏員考績和升遷的具體事務。同墓隨葬的名謁，上至東海郡太守、沛郡太守、琅邪郡太守、容丘侯、良成侯，下至五官掾、卒史等，遣吏奉謁向之問疾請安，也足顯其生前地位的尊榮。一個百石小吏，收入不高不豐，考察同墓所出諸簡牘，元延元年間，墓主又無重大家庭變故，何以一次借貸“八萬”，用途何在。我們認爲，“錢約”中的“放貸者”師子夏有可能是將錢貸於墓主師君兄，利用師君兄權勢利於放貸的條件，大放高利貸，這應該是“錢約”背後的真實所在，亦即該錢約反映的西漢晚期尤其是成哀年間漢代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首先，西漢晚期，尤其是成、哀年間，達官貴人、外戚等“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現象相當普遍，上引谷永上書及羅裒之例，都是成哀間事，尤其谷永上言，如果不是當時嚴

重的社會問題，已引起有遠見的官員的憂慮與注意，是不可能陳述“許”、“班”等外戚，政治上為所欲為，經濟上“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同時，西漢後期，吏治的腐敗，也使這些子錢家及商富大賈有可能利用賄賂手段，打通關節，利用這些官員的權勢放貸牟利，以至“賁貸行賈遍郡國”^①。“錢約”的時代正是谷永所言這一嚴重社會問題之時，谷永雖然追述的是建始、河平年間，但此時距河平僅數年，都為成帝年間，這種現象當更嚴重。墓主位極權重，交通廣泛，師子夏此人通過師君兄行貸東海郡，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次，墓主師君兄雖為百石小吏，收入不豐，但依其權勢，不至於淪為舉貸者；再，師君兄一下子貸錢八萬，也遠遠超出了其收入和償還能力。另從尹灣諸簡考察，墓主這期間也無重大家事，木牘七記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禮單”一份，疑是墓主師君兄家的一次重大活動。秦漢時代，民間及官吏間送往迎來之風盛行，《漢書》多有記載，木牘七有可能是這類活動之一，根據木牘七、八“●外大母”、“●季母”標記，推測可能與葬禮有關^②，但這並不能構成其舉債之原因。木牘六《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乃係元延元年之前一年事，這是鎮壓山陽徒暴動後重整武庫的記錄，這也應與墓主無太大關係，重整軍備乃是國家和一郡之事，墓主也不可能為此舉債。以上諸方面都決定了墓主在該“錢約”問題上祇能是為“為人起責”。

第三，債權人師子夏有可能為“富商大賈”或“子錢家”。“錢約”表明，債權人“師子夏”、債務人“師君兄”，見證人“師大孟”等，皆係同姓，不排除為同宗同族。再，木牘七、八二份“禮單”中多記有“師子儀”、“師君長”等兩人，師氏家族有可能因墓主師饒地位而日隆，或經營牟利致富，進而賁貸郡國。東海郡有漁、鹽之利，更有發達的經濟，此地在西漢武帝及成哀間以儒學故而出卿相；但此時隨著土地兼井及高利貸盛行，人們多“慕仿”富商大賈等，因此有可能盡置產業，成為富商。史載，西漢後期，東海郡就存在有豪姓大族奸滑橫行之例。《漢書·尹翁歸傳》：“東海大豪鄒許仲孫為奸滑，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表明尹翁歸時東海郡豪族大姓已有很大勢力，另外，東海多丞相和高官如蕭望之、薛宣等等，他們或家在東海，或免歸故郡東海，或在任請託東海，如廷尉于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於翁歸，因見翁歸正直而不行。墓主隨葬“禮單”中多有薛姓、蕭姓、于姓等諸姓人員，可能都與此有關。由此種情況推斷，師族亦東海郡大姓，同姓師子夏貸錢師君兄，讓其下貸，可以說是保險至極了，因此無論從哪一方面講，該“錢約”反映的實際社會問題是官員“為人起責”，這與史載西漢末期的歷史現象是完全吻合的，這正是該“錢約”的價值所在。

①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② 蔡萬進：《尹灣漢簡〈贈錢名籍〉性質考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三集，商務印書館，2004，179—204頁。

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織物考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馬 怡

內容提要 西郭寶墓衣物疏，1985年出土於江蘇省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一座西漢墓葬，墓主西郭寶生前係東海郡太守。該衣物疏由兩枚木牘組成，墨書，字迹清晰，是墓主的隨葬物清單，記錄了衣、袴、被、緤、履、刀劍、飾物、文具等數十種名物。^①這件衣物疏蘊含了不少漢時俗尚與物質文化的寶貴信息，包括一些有關古代紡織史的資料，頗值得研究。本文是對其中所見若干織物名稱的釋讀與考證。^②

關鍵詞 縹 流黃丸 冰 相穀 縷 纁紵 緒巾

一、縹

西郭寶墓衣物疏A第1欄：“縹綺複被一領。”A第2欄：“縹丸合衣一領。”A第3欄：“縹複襦一領。”A第4欄：“縹穀合襦一領。”

“縹”，絲帛顏色名，或絲帛名。《集韻·質韻》：“縹，黃色繒。”^③繒是絲帛的通稱。《說文·糸部》：“繒，帛也。”而此處的“黃色”是指“蒸栗”色，即一種黃如蒸熟的栗子果肉的顏色。

① 見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東南文化》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石雪萬《西郭寶墓出土木牘及其釋義再探》所附圖版，《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390頁。本文將這兩枚木牘分別稱作西郭寶墓衣物疏A、西郭寶墓衣物疏B。

② 對本衣物疏所記載的其他器物的考證，見拙文《西郭寶墓衣物疏所見漢代器物雜考》，即刊。

③ 《集韻》卷九《入聲·質韻》，四部備要本。

古人常用“蒸栗”來形容黃色之物。例如，魏文帝《與鍾大理書》：“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①梁元帝《謝東宮賁蒸栗牛啓》：“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②又尹灣六號漢墓“君兄衣物疏”：“蒸栗棺中席。”^③“蒸栗”，即“蒸栗”。

但“蒸栗”更多地是用來指稱織物之色。《急就篇》：“蒸栗絹紺緹紅縹。”顏師古注：“蒸栗，黃色若蒸熟之栗也。”^④《釋名·釋采帛》：“蒸栗，染紺使黃色如蒸栗然也。”^⑤因此，這種織物之色又被徑稱為“縹”。《玉篇·糸部》：“縹，蒸縹綵色。”“縹，五綵備。”^⑥《廣韻·質韻》亦曰：“縹，蒸栗，色綵。”^⑦《廣雅·釋器》：“蒸縹，縹也。”^⑧

“縹”亦見於其他簡牘資料。例如，尹灣六號漢墓所出“君兄衣物疏”記有：“縹被一領。”^⑨尹灣漢墓簡牘的整理者將此字釋為“縹”，這是不正確的。查看該衣物疏的照片圖版，此字右半部分的“西”之下是一橫，而非兩橫，故此字當釋為“縹”，而不是“縹”。

其實，在“君兄衣物疏”中另有“縹”字，但皆寫作“縹”。如：“縹綺復衣”、“縹丸合衣”、“縹丸復襦”、“縹段領”等。^⑩此“縹”字在衣物疏中顯然是指一種顏色，且“縹”“票”同音，故“縹”當通“縹”，是指淡青色。此外，在尹灣二號漢墓衣物疏和西郭寶墓衣物疏中亦有“縹”字，亦皆通“縹”。^⑪

二、流黃丸

西郭寶墓衣物疏 A 第 2 欄：“流黃丸複衣一領。”

“流黃丸”即“流黃紬”，絲織品名。“流黃”，本指硫黃。《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銅錫鉛錯，赭堊流黃。”^⑫《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列傳》：“（悅般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或因其色黃，故又用來指一種黃的顏色。《西京雜記》卷二：“會稽歲時獻竹簞供御，世號曰流黃簞。”^⑬張載《擬

①《文選》卷四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99—1900 頁。

②《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628 頁。

③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130 頁。關於“蒸栗”的考述，詳拙文《尹灣漢墓遺策札記》中“蒸栗”一節，載《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264 頁。

④《急就篇》，四部叢刊續編本。

⑤王先謙撰集：《釋名疏證補》卷四《釋采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本。

⑥《大廣益會玉篇》卷二七，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

⑦《宋本廣韻》卷五《入聲·質韻》，中國書店，1982 年影印本。

⑧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七《釋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影印本。

⑨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圖版見 23 頁（圖版 YM6D12 正），釋文見 129 頁。

⑩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129—130 頁，凡九見。

⑪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圖版見 74 頁（圖版 YM2D1），釋文見 151 頁。西郭寶墓衣物疏的圖版，見《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390 頁；釋文見本文附錄。

⑫《文選》卷四《賦乙·京都中》，150 頁。

⑬《西京雜記》卷二《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 年影印明刊本，306 頁。

四愁詩》：“佳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①

“流黃”也用作絲織品名。古辭《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②織流黃的織機則被稱作“流黃機”。梁元帝《藥名詩》曰：“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③顧野王《陽春歌》：“薊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④因蠶繭本身分黃、白、水紅等色，故“流黃”或有可能是指以黃色繭爲絲製作的織物。

一說“流黃”即“驪黃”。“驪黃”是一種間色。古人以青、黃、赤、白、黑五種純色爲正色，兩色相雜爲間色。《禮記·玉藻》：“衣正色，裳間色。”孔穎達疏引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驪黃是也。”^⑤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五行間色》：“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黃。然間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則青黃合爲綠；金克木，則青白合爲碧；火克金，則赤白合爲紅；水克火，則黑赤合爲紫；土克水，則黃黑合爲驪。”^⑥可知間色“驪黃”是指褐色。又《文選》江文通《別賦》：“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此“流黃”是指具有該顏色的織物，李善注引《環濟要略》：“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⑦这里稱“流黃”爲“間色”，則知“驪黃”亦可作“流黃”。不過，若要確認“流黃”色就是“驪黃”色（即褐色），似乎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證據。

文獻記載中又有“留黃”。《後漢書》志第六《禮儀下》：“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三國志》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大秦多“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以上兩條材料中，對於《後漢書·禮儀下》所記載的“服留黃”、“服留黃冠”之“留黃”，尚難以判斷其與“流黃”或“驪黃”有否關聯；而對於《魏略·西戎傳》所記載的“留黃”，因其在文中與“黃”、“金黃”并提，且排在眾雜色的末尾，可知此“留黃”應當就是“驪黃”，也就是褐色。^⑧

“紬”是一種質地細滑的絲織品。在漢墓所出衣物疏中，“紬”多寫作“丸”。例如，尹灣六號漢墓木牘一二正：君兄衣物疏：“早丸大綺一。”“早丸諸于一領，纈丸諸于一領。”尹灣二號漢墓木牘一正：“霜丸衣一領。”“霜丸合衣一領。”“霜丸復繡一領。”

①《藝文類聚》卷三五《人部十九·愁》，619頁。

②《樂府詩集》卷三十四《相和歌辭九》，中華書局，1979，508頁。

③《藝文類聚》卷五六《雜文部二·詩》，1010頁。

④《樂府詩集》卷五十一《清商曲辭八》，742—743頁。

⑤《禮記正義》卷二九，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1477頁。

⑥《癸辛雜識後集》，《欽定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文淵閣本，1040冊，51頁。

⑦《文選》卷十六《賦辛·哀傷》，754頁。

⑧王念孫認爲留黃、驪黃與流黃是同一種顏色：“‘留’、‘驪’、‘流’并通。”見《廣雅疏證》卷七下《釋器》，227頁。

“纈丸合幫一。”^①又如，江蘇連雲港海州侍其繇墓木牘：“紅野王綺復襪綌紅丸緣一領，衣。”“□黻復襪一領白丸緣，衣。練襪襪一領白丸緣，衣。白丸復絳一，衣。□綺復衣涑黃丸緣一領。□皂丸復襪綌一領。”“涑黃丸復絳一。白丸復□一。白丸吉□一。”^②《說文·糸部》：“紬，素也。”段玉裁注：“素者，白致繒也。紬即素也，故从丸，言其滑易也。”《釋名·釋采帛》：“紬，煥也。細澤有光，煥煥然也。”^③《急就篇》：“縹緗綠紬阜紫礎。”顏師古注：“紬，即素之輕細者。”

以“素”訓“紬”，則紬似應是白色絲織物。但如上所引，簡牘資料中有“早丸（皂紬）”、“纈丸（縹紬）”、“霜丸（縹紬）”^④和“紅丸（紬）”、“白丸（紬）”等記載，說明紬可有多種顏色。而本衣物疏所記之“流黃丸”，大約是一種類似硫黃、黃蘭之黃色的絲織品，或是褐色的絲織品，輕滑而有光澤。

三、冰

西郭寶墓衣物疏A第1欄：“白冰複衣一領。”A第2欄：“□黃冰合衣一領。”

冰是“冰”的異體字。冰，絲織品名，即綾。《潛夫論·浮侈》：“冰紬錦繡。”汪繼培箋：“按‘冰’蓋即‘綾’之古文……‘綾紬’即‘冰紬’也。”^⑤《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織作冰紬綺繡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紬，紬細密，堅如冰者也。”顏師古注：“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

綾是在斜紋或變形斜紋地上起斜紋花的絲織物。綾的出現比綺晚，是在綺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綾的表面呈特有的冰凌紋，即疊山形的斜紋組織，這是其名稱的由來。^⑥《說文·糸部》：“綾，東齊謂布帛之細曰綾。从糸，菱聲。”《釋名·釋采帛》：“綾，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

將該織物稱作“冰”，是因其具有這種特殊的花紋，而非謂其質薄清涼。在西郭寶墓衣物疏中，“冰”被用來作“複衣”（絮有絲綿的綿衣）與“合（袷）衣”（有襯裏的袷衣）的衣料。又，江蘇連雲港海州侍其繇墓木牘亦記有“涑黃冰復襪綌一領”，“復皂冰襪綌一”。^⑦這裏的“冰”，亦絲織品“綾”，用來製作絮有絲綿的服裝“復（同“複”）襪綌”。

①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129、151頁。

②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94—95頁。

③ 《釋名疏證補》卷四《釋采帛》，228頁。

④ 關於“霜丸”即“縹紬”的考述，詳拙文《尹灣漢墓遺策札記》“霜”一節，載《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63—264頁。

⑤ 王符撰、汪繼培箋：《潛夫論箋》卷三，中華書局，1979，130—131頁。

⑥ 參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科學出版社，1984，317—318頁。

⑦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94—95頁。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齊地有三服官，專為皇室供應衣服織物等，^①“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為其中三種。則“冰”係精細之品。西郭寶墓、侍其繇墓皆位於今連雲港市，古時屬齊地，與此記載相合。

四、相縠

西郭寶墓衣物疏 A 第 2 欄：“相縠合衣一領。”

“相”，讀為“縐”，絲帛顏色名。《說文新附·糸部》：“縐，帛淺黃色也。从糸，相聲。”《急就篇》：“鬱金半見縐白紵。”顏師古注：“縐，淺黃也。”《玉篇·糸部》：“縐，桑初生色。”^②則“縐”是指絲帛之色淺黃，如桑葉初生。

“縠”，絲織品名，即皺紗。《釋名·釋采帛》：“縠，粟也，其形戚戚，視之如粟也。”《漢書》卷四五《江充傳》：“充衣紗縠禪衣。”顏師古注：“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皺者為縠。”“縠”的生產工藝較為複雜。須先將絲綫撚縮，并煮練定型，織出的成品才能夠凸凹起皺。^③

本衣物疏所記之“相（縐）縠合（袷）衣”，是指用淡黃色縐紗製作的袷衣。

五、縷

西郭寶墓衣物疏 A 第 2 欄：“白縷禪衣一領。”第 3 欄：“黃縷禪衣一領。皁縷禪衣一領。”

“縷”，織物名。尹灣二號漢墓衣物疏有“縷巨巾”。^④海州西漢侍其繇墓衣物疏有“枝縠口衣、縷上禪各一”。^⑤疑“縷”讀為“縵”。《說文·糸部》：“縵，綫也。从糸，婁聲。”“縵，布縵也。从糸，盧聲。”《廣雅·釋器》：“縵，縵也。”^⑥“縷”、“縵”音近，且字義互訓，故二字可通。

縵，紵屬。《左傳·昭公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預注：“因紡縵……縵，力吳反，麻縵也。”^⑦《史記》卷六九《貨殖列傳》：“夫山西饒材、竹、縠、縵、旄、玉石。”裴駰集解引徐廣曰：縵，“紵屬，可以為布。”司馬貞索隱：“縵，山中紵，可以

①《漢書》卷九《元帝紀》：“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絀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

②《大廣益會玉篇》卷二七。

③參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295 頁。

④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151 頁。

⑤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95 頁。

⑥《廣雅疏證》卷七下《釋器》，235 頁。

⑦《春秋左傳正義》卷四八，中華書局，1980 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2087 頁。

爲布。”尹灣二號漢墓衣物疏記有：“盧絮一。”“絮”是頭衣，^①而“盧”應就是“繡”。漢代將麻織品統稱作“布”，以別於絲織品之“帛”、“繒”。“繡”是布的原料，而“繡”、“縷”互通，故“白縷禪衣”、“縷巨巾”、“縷上禪”等服飾名稱中的“縷”字，表明其所用織物爲麻布。

漢晉時，隨葬品中的禪衣似以布質爲多。例如：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漢墓遣策：“早（皂）緒（紵）禪衣一。故布禪衣二。”^②尹灣六號漢墓“君兄衣物疏”：“白毋尊單衣一領。白布單衣一領。”尹灣二號漢墓衣物疏：“毋尊單衣一領。”^③西郭寶墓衣物疏A第3欄：“白毋尊禪衣一領。白毋尊禪衣一領。黃毋尊禪衣一領。”“毋尊”，布名，亦見居延漢簡。^④又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衣物疏：“故麻疎單衣一枚。”^⑤江西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1號晉墓衣物疏：“故黃麻單衣一領。”^⑥上述記載，或可作爲“縷”係麻織品的一個旁證。

本衣物疏所記之“白縷”、“黃縷”、“皂縷”禪衣，是分別用不同顏色的麻布製作的禪衣。

六、縠紵

西郭寶墓衣物疏A第2欄：“縠紵禪衣一領。”

“縠紵”，應即文獻中所記載的“綸幣”。从“頁”得聲的字可與从“俞”得聲的字相通假。例如，《公羊傳·隱公二年經》：“紀裂繡來逆女。”^⑦“裂繡”，陸德明《經典釋文·春秋公羊音義》引作“履綸”：“履綸，（綸）音須，左氏作‘裂繡’。”^⑧《漢書》卷九七《外戚傳》顏師古注則引作“履須”，可知“須”通“綸”。“綸”屬心母、侯部，“縠”同“須”一樣从“頁”得聲，亦屬心母、侯部，故“縠”亦通“綸”。而“紵”、“幣”二字，聲旁“此”相同，形旁“糸”、“巾”可互換，二字亦可通。故“縠紵”即“綸幣”。

綸幣，細布名。《急就篇》：“服瑱綸幣與繒連。”顏師古注：“服瑱，細布織爲連瑱之文也。綸幣，縵布之尤精者也。言此二種雖曰布類，其質精好，與繒相連次也。繒者，帛之摠名，謂以絲織者也。”又《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被阿縠。”李善注引張揖曰：

① 關於“絮”的考述，詳拙文《尹灣漢墓遣策札記》中“絮”一節，《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67—268頁。

②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55頁。

③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129、151頁。

④ 居延漢簡325·11：“毋尊布一匹。”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治：《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下），文物出版社，1987，517頁。李家浩在《毋尊、縠及其他》一文中對“毋尊”有詳考，見《文物》1996年第7期。

⑤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91頁。

⑥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86頁。

⑦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十三經注疏本，1718頁。

⑧ 《經典釋文》卷二一《春秋公羊音義》，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306頁。

“阿，細縵也。縵，細布也。”^①可知“縵”是細布，而“縵幣”則是“縵”之精好者。又《潛夫論·浮侈》記載：“飾襪必縵此。”^②此處的“縵此”，當同“縵紕”、“縵幣”。

西北邊塞漢簡記載了一種名為“寶此”的紡織品，見居延漢簡 262.28A：“綃系二斤，直四百卅四。寶此丈五尺，直三百九十。”^③裘錫圭先生指出：“寶”字屬定母、侯部；“縵”字除屬心母、侯部外，亦屬定母、侯部；故可推定“寶此”是“縵幣”的另一種寫法。^④則“縵紕”、“縵幣”、“縵此”和“寶此”為同一種紡織品。

本衣物疏所記之“縵紕禪衣”，應是用一種精緻的細麻布製作的禪衣。

七、緒巾

西郭寶墓衣物疏 B 第 1 欄：“白緒巾一。”

“緒巾”，或即“紕巾”。“紕”，《說文·糸部》桂馥義證：“亦通作緒。……字又作緒。”^⑤唐蘭在考釋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遺冊時指出：“緒即紕字，《說文》紕或作緒，從緒省，正是由於緒讀如寧，因而既從緒，又從寧聲的。《通典》說：‘晉俳歌云：交交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紕，疑即白紕也。’紕是用苧麻織成的細布。……《樂府詩集》五十五引白紕歌古詞，‘其譽白紕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可見當時人對白紕的貴重。”^⑥“巾”是頭衣。《風俗通義·愆禮》：“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⑦《玉篇·巾部》：“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後人著之於頭。”^⑧據此，可知“白緒巾”大約是用白紕製作的頭衣。

或說“緒巾”即“絮巾”。“絮”，心母、魚部，“緒”，邪母、魚部，二字音近可通。《墨子·非命下》：“多治麻統葛緒。”孫詒讓問詁引蘇云：“‘緒’，蓋與‘絮’通。”^⑨在文獻記載中，有名為“絮巾”的服飾。《三國志·魏書·管寧傳》：管寧隱居遼東，“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三國志·魏書·閻溫傳》引《魏略》：趙岐避禍，“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此“絮巾”，當是頭衣。^⑩

①《文選》卷七《賦丁·畋獵上》，353 頁。

②《潛夫論箋》卷三《浮侈》，133 頁。

③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文物出版社，1987，436 頁。

④裘錫圭：《漢簡零拾》，《文史》第十二輯，1981；并參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175 頁。

⑤《說文解字義證》卷四一《糸部》，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本。

⑥唐蘭：《長沙馬王堆漢墓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遺策考釋》，《文史》第十輯，1980。

⑦應劭撰、吳樹平校釋：《風俗通義校釋》《愆禮第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118 頁。

⑧《大廣益會玉篇》卷二八。

⑨孫詒讓：《墨子問詁》卷九《非命下》，中華書局，2001，283—284 頁。

⑩關於“絮巾”的考述，詳拙文《尹灣漢墓遺策札記》中“絮”一節，《簡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267—268 頁。

西北邊塞簡牘中也有不少關於“絮巾”的記載。如居延新簡 E. P. T56:101A: “布囊一。布巾一。絮巾一。”^①又如敦煌漢簡 1144: “絮巾、布巾各三。” 2327: “絮巾一見。白布巾一見。”^②在晉墓所出衣物疏中，亦有“絮巾”。如江西南昌東吳高榮墓木牘: “故絮巾二枚。”又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一號晉墓木牘: “故白絮巾二。”^③後者所記之“白絮巾”，或與本衣物疏所記之“白緒巾”是同一種物品。

附錄： 西郭寶墓衣物疏釋文^④

A

【第一欄】

紅繡（繡）複被一領

縹綺複被一領 [按：“縹”，L 釋作“縹”。^⑤]

錦複被一領 [按：“錦”，L 釋作“錫（？）”。]

縹綺複衣一領 [按：“縹”，L 釋作“縹（？）”。]

□黃丸襪衣一領

黃丸複襪衣一領

白冰複衣一領

□丸複衣一領

【第二欄】

流黃丸複衣一領 [按：“流”，L 釋作“漆（？）”。]

阜複衣一領

阜複襪衣一領

縹丸合衣一領 [按：“縹”，L 釋作“縹”。]

相穀合衣一領

□黃冰合衣一領 [按：“□”，L 釋作“冰（？）”。]

白縹襪衣一領

縹（？）襪衣一領 [按：“縹（？）”，L 釋作“□”。]

縹縹襪衣一領 [按：“縹”，L 釋作“縹”。]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314 頁。

② 吳永良、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118、253 頁。

③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87 頁，91 頁。

④ 本釋文以發表於《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的西郭寶墓衣物疏的照片圖版為底本。釋讀時，參考了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一文中的相關部分（《東南文化》第三輯，20 頁）。

⑤ 拼音字母“L”，代表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陶灣黃石崖西漢西郭寶墓》一文。下同。

【第三欄】

- 白毋尊禪衣一領 [按：“毋”，L釋作“母”。]
白毋尊禪衣一領 [按：“毋”，L釋作“母”。]
黃毋尊禪衣一領 [按：“毋”，L釋作“母”。]
黃纁禪衣一領
皁纁禪衣一領
縑禪短襜褕一領
縑禪長襜褕一領
縑(?)羅複襦一領 [按：“縑”(?), L釋作“縑”。]
縑複襦一領 [按：“縑”，L釋作“縑”。]

【第四欄】

- 縑縠合襦一領 [按：“縑”，L釋作“縑”。]
練禪襦三領
白丸大綈一
皁大綈一
練小綈一 [按：“練”，L釋作“縑”。]
縑禪被一領
紅綺複衣一領
縑中衣一 [按：“中”，L釋作“牢”。]
□一

【第五欄】

- 素合紩一兩 [按：“素”，L釋作“紩”；“紩”，L釋作“紩”。]
白布紩一兩 [按：“布紩”，L釋作“布(?)紩”。]
青糸力帶一 [按：“糸力”，L釋作“丝刀”。]
備刀一 素巾一 [按：“素”，L釋作“紩”。]
劍一
□(檜?)囊一 [按：“□(檜?)”，L釋作“檜”。]
節筭一
相丸粉囊一
□□粉囊一 [按：“□□”，L釋作“縑□”。]

B

【第一欄】

- 一 [按：“□”，L釋作“扇”。]
 阜(?)幘一 [按：“阜(?)”，L釋作“阜”。]
 玉幘一
 □黃面衣一
 白緒巾一
 節一具
 費節一
 印一
 印衣二
 □帶一

【第二欄】

- 藥囊一
 阜系履二兩 [按：“系”，L釋作“絲”。]
 板硯一
 墨囊一
 白緒□一 [按：“緒”，L釋作“繡”。]
 劍青系帶一 [按：“系”，L釋作“絲”。]
 帕帛簪(頓牟簪)一
 捏一 [按：“捏”，L釋作“握”。]

【第三欄】

• 被四

- 衣廿七領 [按：“七”，L釋作“十”。]
 大綺二
 小綺一
 錢萬萬 [按：“萬萬”，L釋作“萬二”。]
 玉吟(含)一具 [按：“吟”，L釋作“含”。]
 銖(珠)一枚 [按：“銖(珠)”，L釋作“銖(?)”；“枚”，L釋作“支”。]

(筆者在釋讀本衣物疏的過程中，曾蒙謝桂華先生賜教，謹致謝忱。)

西北漢簡所見祠社稷考補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謝桂華

內容提要 西北邊塞有關祠社稷的活動，於史籍無徵。自 20 世紀 30 年代首次發現一萬餘枚居延漢簡以降，勞幹等衆多海內外學者雖然相繼撰文，但因相關簡文終屬鳳毛麟角，無法展開深入討論。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居延新簡公開發表以後，高恒所撰《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一文才有重要突破。本文在史料和論述上均作了若干補充。

關鍵詞 西北漢簡 祠社稷 考補

本文中的西北漢簡，主要是指居延漢簡和居延新簡，但亦包括馬圈灣新出敦煌漢簡。衆所周知，自 20 世紀 30 年代首次發現一萬餘枚居延漢簡以降，勞幹先生便率先在《居延漢簡考證》已“邊郡生活·社”條，列舉出下列四簡：

簡 1 買芯卅束，束四錢，給社。

《合校》^①32·16 《圖》^②119

簡 2 官封符，爲社市賈□□。

《合校》63·34 《圖》125·605

簡 3 入秋社錢千二百，元鳳三年九月乙卯□□。

《合校》280·15 《圖》18

① 《合校》是指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的略稱。

② 《圖》是指勞幹《居延漢簡 圖版之部》的略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21，1957。

簡 4

雞一， 酒二斗，

對祠具：黍米二斗，鹽少半升。

稷米一斗，

《合校》10·39 《圖》29

且考證云：“右四條俱為漢人祠祀之事，前三條為社，後一條未言是否為社，然以社之作用言，似亦當屬於社者。居延雖遠處塞上，而社之信仰則已隨內地移民而至矣。”^①爾後，他又在《漢代社祀的源流》一文中，列舉前引簡 1、簡 2 和簡 4 這三條簡文之後，再一次指出：“第一、二條[指簡 1、簡 2，筆者加]是提到社的，第三條[指簡 4，筆者加]所指的是一種祠祀，是否為社，在本條中無從知道。不過究社祭一事在漢代民間最為普遍這一端而言，自然屬於社祭的可能性較大。雖然不敢貿然下斷語，但決無法確指為別一種的祭祀。”^②

簡 1 出土於肩水金關，編號為 A32。勞先生於《漢代社祀的源流》注釋一中云：“‘苾’字不見於較早的字書，未知何物。不過在原簡上確是苾字。”誠然從圖版上看，字形的確與“苾”字相同。今據《合校》506·10A（《甲》^③2001A）：“城官中亭治園條：韭三畦，蔥二畦，葵七畦，凡十二畦，其故多過條者勿減。”其“蔥”字寫作“苾”，與簡 1 中“苾”字的構件相比，唯多出中部的“△”。《隸辨》卷第一“苾”：“嚴訢碑，華澤青苾。按即蔥字，蔥從忽，苾，俗忽字也。見《廣韻》。”又“苾”：“無極三碑，楸林苾青。”《說文·艸部》：“蔥，菜也。從艸，忽聲。”段注：“《爾雅》：‘茗，山蔥。’《管子》：‘冬蔥，皆蔥之屬。’”故《合校》將簡 1 中的“苾”字改釋作“蔥”，讀作“買蔥卅束，束四錢，給社。”值得補充的是，和簡 1 同在《居延漢簡 圖版之部》119 頁的無號簡：“出錢百六十”，不僅這兩枚斷簡的材質、木紋、寬度和墨色、筆畫、筆迹完全相同，且簡文內容相關，文意亦前後貫通。雖然無號簡出土地點無法確認，且兩枚斷簡的裂痕因有缺佚不能完全吻合，仍疑其可以綴合，讀作“出錢百六十，買蔥卅束，束四錢，給社。”果真如此，該簡當屬於一枚完整的現錢出納簿。《合校》簡 258·13（圖 236）：“出錢廿，買腎二具，給御史”，簡 276·15（圖 529）：“出錢四千三百卅五，糴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其文例均與此簡相類。

簡 2 出土於破城子，編號為 A8，即甲渠候官所在地。“官”前尚可補釋作“詣”，“買□”，似應改釋作“買馬”，此簡可讀作“□詣官封符，為社市買馬□□”。其文例與《合校》簡 286·11（《甲》1560）：“臨之燧長威為部市藥詣官封符，八月戊戌平旦入”，簡 482·16（《圖》433）：“□詣官封符，□”相類。“詣官”之“官”是介於都尉府和部之間，

① 勞榘：《居延漢簡 考釋之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40，1960。

② 《勞榘學術論文集甲編》上、下，藝文印書館，1976。

③ 《甲》是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編》的略稱，考古學專刊乙種 8，科學出版社，1959。

相當於縣、道一級的官署。日本學者永田英正教授認為簡 2 等均屬“詣官”簿，從簡端依次書寫官職名和姓名、赴候官的事由與月、日、時刻，係候官統轄下的候長、候史和燧長赴候官辦事時的簽到簿。所謂“詣官封符”，是指凡屬候官統轄下的屬吏外出辦事，均必須赴候官簽發出入關津的符券，作為通行的憑證。如前面所引的《合校》簡 286·11（《甲》1560），依次記載了臨之燧長威為他所在的部，外出購買所需藥品而赴甲渠候官，簽發作為通行憑證的符券。“八月戊戌平旦入”，是臨之燧長威到達候官的月份、日期和時刻。雖因“馬”字後簡文缺佚而無法確認簡 2 所購買的究竟為何物，但此簡應為某位屬吏為祠社外出購買所需物品，而赴候官簽發出入關津的符券，作為通行的憑證。

簡 3 出土於地灣，編號為 A33，即肩水候官所在地。此簡係昭帝元鳳三年（前 78）現錢出入簿的入簿，簡文用草體書寫。日本學者田中有教授曾經指出，從圖版來看，此簡中的“入秋社錢千二百”之“社”字，應當釋作“賦”字。^①即“入秋社錢千二百”，乃是“入秋賦錢千二百”的誤釋，甚是。“秋賦錢”和“賦錢”屢見於居延漢簡，如《合校》簡 45·1A（《圖》470）：“熒陽□秋賦錢五千。東利里父老夏聖等教數，西鄉守有秩志臣、佐順臨，□□親具。”簡 49·2A（《圖》466）：“□□七月秋賦錢五千”，簡 21·1A（《圖》456）：“廣鄉□秋賦□五千。王德少三，□四。”簡 526·1A（《圖》457）：“□呼鄉□秋賦錢五千。□□里父老□□，正安釋□□，嗇夫京佐□□。”簡 285·22（《圖》371）：“凡入賦錢卅萬八千八十”等均是其證。此簡簡端書寫“入秋賦錢千二百”，雖與“入秋社錢千二百”文例相同，且均屬於現錢出入簿的入簿，但從都內和內郡運往居延邊塞的賦錢，主要用於吏員的俸錢和其他行政支出。如《合校》簡 111·7（《圖》102）：“入都內賦錢五千一百冊，給甲渠候史利上里高何齊地節二年（前 68）正月盡九月積九月奉”，簡 57·8（《圖》134）：“居延甲渠次吞燧長徐當時，神爵二年（前 60）正月庚午除。未得七月盡九月積三月奉用錢千八百，已得賦錢千八百。”簡 161·5（《圖》293）：“出賦錢八萬一百，給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簡 4·11（《圖》380）：“斗食吏三人，一月奉用錢二千七百，一歲奉用錢三萬二千四百。”均可資佐證。說明賦錢和社錢的用途有所不同。

簡 4 亦出土於地灣，誠如勞榦先生推測所云，此簡雖“未言是否為社，然以社之作用言，似亦當屬於社者”。此簡“鹽少半升”之“升”，田中有教授亦曾指出，勞榦起初釋作“斗”，後來改釋作“升”，從圖版來看，釋作“升”是正確的。^②甚是。又“黍米二斗”，應該釋作“黍米一斗”。陳直先生在《居延漢簡綜論》十九《漢晉社祭通考》中，曾列舉此簡，並給予高度評價：“祭社之品，在古籍僅約略記載，在居延漢簡，則品類分明。”對於用於祠社供品的類別和數量，諸如雞一[枚]、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鹽少半升

① 田中有：《民俗思想に關する漢簡資料》，《漢魏文化》3，1962。

② 同上。

(即三分之一升)等“皆有詳確的記載,亦為可寶之新史料。”^①特別有趣的是,1973—1974年又於破城子出土了下列兩枚與簡4相類的殘簡:

簡5 雞一枚, 鹽少半升。

《新簡》^②EPT2·31

簡6 黍米一斗, 黍米一斗, 雞。

《新簡》EPF22·633

均可互相印證和補充。

繼勞榦先生之後,陳槃先生於《漢簡牘義之續(增修本)》壹、都吏社錢條,補充舉出下簡^③:

簡7 入錢六千一百五十 (以上為第一欄)

其二千四百受 六百都吏社錢

二千八百五十受吏三月小畜計(以上為第二欄)

《合校》254·1 《圖》299

簡7亦出土於破城子(A8),屬於甲渠候官現錢出入簿的入簿。第一欄為現金收入總計,第二欄為現金收入的明細賬目。從圖版來看,“六百都吏社錢”,其中的“六百”,應改釋作“九百”,這樣三筆收入明細賬目之和恰好等於總計。“都吏”之“都”,田中有教授改釋作“郿”,并云:“勞榦初釋作‘都’,後改釋作‘郿’。”^④疑均非是。“都吏”乃是“部吏”的誤釋。“部”,是介於候官和燧之間,相當於地方鄉一級的官署。《新簡》EPF22·174—186已經判明,新莽時期甲溝候官(甲渠候官的改稱)共統轄十個部,依次為萬歲部、第三部、第十部、第十委部、第二十三部、鉗庭部、推木部(臨木部的改稱)、誠北部、吞遠部、不侵部。所謂“部吏”,係指各部之候長、候史和下轄之燧長等屬吏。《新簡》EPT51·409:“出臨木部吏九月奉錢六千:候長呂憲奉錢千二百,臨木燧長徐忠奉錢六百。窮虜燧長張武奉錢六百,木中燧長徐忠奉錢六百,(以上為第一欄)終古燧長東郭昌奉錢六百,口口燧長元禹奉錢六百,候史徐輔奉錢六百,武賢燧長陳通奉錢六百,望虜燧長晏望奉錢六百,凡吏九人,錢六千。(以上為第二欄)建昭五年(前34)十月丙寅,甲渠

①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② 《新簡》是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上、下(中華書局,1994)的略稱。

③ 陳槃:《漢晉遺簡識小七種》上、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3,1975。

④ 田中有:《民俗思想に關する漢簡資料》,《漢魏文化》3,1962。

尉史彊付終古燧長昌，守閭卒建知付狀。（以上為第三欄，此簡上端右側有刻齒）”可知臨木部之部吏，應當包括候長、候史各一人，再加上燧長七人，共為九人。《合校》簡 101·26（《圖》427）：“臨木部吏九，人五十四。誠北部吏十一，人六十六。”亦可資佐證。“九百”，係收取某部部吏社錢的總計，平均每名部吏繳納一百錢。

與簡 7 收取某部部吏社錢總計有關，還可以補充舉出下列這枚斷簡，疑當屬於某位部吏繳納社錢的賬簿：

簡 8

出錢百四社計□

□奉千二百

餘錢千□

《合校》180·25（《圖》319）

此簡亦出土於破城子（A8），屬於現錢出入簿。第一欄“□奉千二百”，為某位部吏向候官領取奉錢的入簿。第二欄之“出錢百四社計□”，係指從他所領取的俸錢中，扣除應繳納的一百零四錢社錢，尚結餘一千[一百九十六錢]。如果，“□奉千二百”，為某位部吏一個月所領取的俸錢，則這位部吏的職務很可能為候長。如果他的職務為候史或燧長，則所領取的當為兩個月的俸錢。《合校》簡 35·5（《圖》509）：“居延甲渠候長張忠，未得正月盡三月積三月奉用錢三千六百，已賦畢。”簡 507·4（《圖》115）：“居延甲渠候史王武，未得正月盡三月積三月奉用錢千八百，已賦畢。”簡 26·19=26·30（《圖》141）：“□延甲渠第二燧長任尊，未得十月盡十二月積三月奉用錢千八百，已賦畢。”均可資印證。此簡為簡 7 的部吏繳納社錢，增加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具體例證。

簡 9 □八日戊午社計。

《合校》40·9《圖》266

此簡亦出土於破城子（A8），筆迹漫漶不清。從圖版來看，“□八日”，《合校》改釋作“□八月”，甚是。“計”指賬簿，“社計”，即對祠社稷的收入和支出，均要進行專門的治計。誠如陳直先生所云：“祭社之時，還有社員治計，制度亦頗為完密。”此簡亦為居延邊塞每年八月秋祠社稷提供了一個實證。^①

如前所述，當 1973—1974 年出土的居延新簡釋文尚未公開發表以前，以勞榦先生《居延漢簡考證》和《漢代社祀的源流》為嚆矢，隨後陳槃、陳直、寧可^②、薛英群^③和田中有

①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② 寧可：《漢代的社》，《文史》第 9 輯，中華書局，1980。

③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

等眾多中外學者，也都相繼撰寫專文，對漢代包括居延邊塞的祠社稷，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深入探討和詳細論證。在他們的論著中，除充分挖掘傳世典籍記載外，亦盡可能地結合到了首批出土的居延漢簡中與祠社稷有關的簡牘。

二

直至 20 世紀 90 年代，隨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和《居延新簡——甲渠候官》相繼正式出版，高恒先生在《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以下略稱《高文》）（一）祠令（祠社稷）條，列舉出居延新簡中如下兩件與祠社稷有關的牒書。今移錄其所引用的簡文如下：

1 建武八年（32 年）三月己丑朔，張掖居延都尉謹行丞事，城騎千人躬告勸農掾禹謂官縣令以春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

掾盛、守屬業、書佐宮

[附]牒：三月廿六日甲寅齋

2 建武五年（29 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初五），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書事，以居延倉長印封，丞邯告勸農掾褒、史尚謂官縣以令秋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侍祠者齋戒，務以謹敬鮮潔、約省爲故。褒尚考察不以爲意者輒言，如律令。

掾陽、兼守屬習、書佐博

[附]牒：八月廿四日丁卯齋

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

《高文》上面列舉出的兩件牒書，均出土於破城子（A8），爲甲渠候官所在地。其中第一件牒書，從破城子探方 20 出土，第二件牒書，從破城子房屋 22（即發掘者擬定爲甲渠候官文書檔案室）出土。這裏需要對《高文》所引用的簡文，作如下的補充。

首先，第一件牒書，除《高文》已舉出的簡 10 至簡 12 外，還應補充簡 13 這枚牒。

簡 10 建武八年三月己丑朔，張掖居延都尉謹行丞事、城騎千人躬，告勸農掾禹謂官、縣：令以春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

令、丞以下，當

《新簡》EPT20·4A

簡 11 掾盛、守屬業、書佐宮。

《新簡》EPT20·4B

簡 12 三月廿六日甲寅齋。

《新簡》EPT20·25

簡 13 三月廿八日丙辰直建□。

《新簡》EPT21·1

簡 10 係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三月己丑（初一），以居延都尉諶代理張掖郡丞事務和城騎千人躬兩人聯名，由勸農掾發出張掖郡太守府關於春祠社稷的府書，下達到所轄的候官和縣廷。居延都尉諶和勸農掾禹，亦見於《新簡》EPF22·693：“五月甲寅，守張掖居延都尉諶、丞奉，告勸農掾禹、督蓬掾遷等謂官、縣：寫移書到，如莫府書律令。掾循、兼守屬丹，書佐萌。”

據第二件牒書的文例，知簡 10 的“令、丞以下，當”字後所缺失的簡文，或可補作“[侍祠者齋戒，務以謹敬鮮絜約省爲故。禹考察不以爲意者，輒言，如律令。]”從“令以春祠社稷”起，至“輒言，如律令”，爲張掖郡太守府府書的內容。

簡 11 簽署的“掾盛、守屬業、書佐宮”，屬於郡太守府負責起草、謄抄和寄發府書的屬吏。

簡 12 和簡 13 分別爲郡太守府所選擇的齋戒和春祠社稷的吉日。簡 13 因從破城子探方 21 出土，所以被《高文》所漏舉，但據第二件牒書的文例，不僅此簡當與簡 10 至簡 12 同屬於一件牒書，且於“三月廿八日丙辰直建”之後的佚文，或可補作“[可祠社稷]”。

其次，第二件牒書，除了《高文》已舉出的簡 14 至簡 18 由居延都尉府下達給所轄候官和縣廷有關秋祠社稷的府書外，還應補充簡 19 至簡 22 由候官將府書下達給所轄的部，兩者原本屬於一份完整的冊書。

簡 14 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書事，以居延倉長印封，丞邯，告勸農掾

褒、史尚謂官、縣：以令秋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令、丞循行，謹修治社稷，令鮮明。令、丞以下當

《新簡》EPF22·153A

簡 15 掾陽、兼守屬習、書佐博

《新簡》EPF22·153B

簡 16 侍祠者齋戒，務以謹敬鮮絜約省爲故。褒、尚考察不以爲意者，輒言，如律令。

《新簡》EPF22·154

簡 17 八月廿四日丁卯齋。

《新簡》EPF22·155

簡 18 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

《新簡》EPF22·156

簡 19 九月八日甲辰齋。

《新簡》EPF22·157

簡 20 八月庚辰，甲渠候長 以私印行候文書事，告尉謂第四候長憲等，寫移

《新簡》EPF22·158

簡 21 檄到，憲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鮮明。當侍祠者齋戒，務以謹敬鮮潔約省
為

《新簡》EPF22·159

簡 22 故，如府書律令。

《新簡》EPF22·160

簡 14 至簡 19，是居延都尉下達給所轄候官和縣廷，以令秋祠社稷的府書。由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代行都尉文書事務和都尉丞邯兩人聯名，用居延倉長印封，由勸農掾褒、史尚負責發出的。又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代行都尉文書事務和都尉丞邯兩人聯名下達的府書，亦見於《新簡》EPF22·68：“八月戊辰，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書事，以居延倉長印封，丞邯，下官、縣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上赦者人數罪別之如詔書，書到言，毋出月廿八。掾陽、守屬恭、書佐況。”另據《新簡》EPT59:338：“十月丁卯，張掖大尹融、尹部騎司馬武行長史事、丞博□□□□行庫事□□□如律令書。掾戎、兼屬護、書佐定。”可知張掖居延城司馬武以近秩次代理都尉文書事務，又曾擔任過張掖大尹融的佐官，即尹部騎司馬，且代理張掖長史事務。

府書於建武五年（29）八月甲辰朔戊申（初五），由居延都尉府寄往所轄各候官。至八月庚戌（初七），即兩天後，又由收到府書的甲渠候官下達給所轄各部。至於各部是否還要行文下達到最基層的燧，目前尚不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居延都尉府所選擇的齋戒和秋祠社稷的吉日，除了簡 17：“八月廿四日丁卯齋”和簡 18：“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外，還有簡 19：“九月八日甲辰齋”。無論就出土地點、材質和形制，抑或就內容、文例和筆迹，這三枚簡均彼此相類，但尚存在兩點疑竇：第一，從八月廿六日己巳以後接着數到九月八日，不是甲辰，而是庚辰，不知屬於原簡抄寫有誤，還是有別的原因。第二，按照第一件牒書，簡 17 和簡 18 是居延都尉府為所轄各候官所選擇的齋戒和秋祠社稷的吉日，則簡 19 疑是居延都尉府為所轄各部所選擇的齋戒和秋祠社稷的吉日。誠然，也有這種可能，無論是八月的兩次或者九月的一次，都是為各候官選擇的，最後由各候官決定在八月或者九月。此外，還有下面這枚簡：

簡 23 令修治社稷，令鮮明。當侍祠者齋戒，謹敬鮮潔約省為故，方考行如

《新簡》EPF22·161

其簡文內容與簡 10、簡 14、簡 16、簡 21、簡 22 相類，而從筆迹來看，與簡 20 至簡

22 尤為接近。根據“當侍祠者齋械<戒>，謹敬鮮絜約省為故，方考行如”的簡文來考察，很可能是甲渠候官或者所轄各部，按照居延都尉府所提出的有關秋祠社稷的要求，進行檢查以後所作的彙報。還有一種可能是因為抄寫有關秋祠社稷的文書，發生抄錯而被廢棄的簡。如將“齋戒”的“戒”誤抄作“械”，即是其證。

第三，有關祠社稷的府書，除了《高文》前已舉出的兩件牒書外，還可以補充從破城子塢外灰堆出土的兩枚斷簡：

簡 24 騎守千人晏告勸□

《新簡》EPC·10

簡 25 □□農掾戎，謂官、縣：以令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皆修治社□

《新簡》EPC·35

這兩枚斷簡不僅出土於同一地點，且材質、形制、筆迹亦相類，內容和裂痕銜接，應當綴合為一枚簡，讀作“騎守千人晏，告勸農掾戎，謂官、縣：以令祠社稷，今擇吉日如牒。書到，皆修治社□。”雖祇保留了一枚簡文，但借助前面所列舉兩件牒書的文例，仍可確認此簡屬於另一件有關祠社稷的府書。

“勸農掾戎”，亦見於《新簡》EPT52·490：“九月己卯，行延亭連率事、偏將軍□□□，勸農掾戎官縣承書從事下□□。”《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元年（21）二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如兩簡中之“勸農掾戎”果為同一人，則他最早需至新莽地皇元年（21）二月以後，方能擔任此職。

下面僅就居延漢簡包括居延新簡和敦煌馬圈灣漢簡中所見西北邊塞有關祠社稷的活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略作考補。

三

首先，關於祠社稷的律令。《漢書·郊祀志下》：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盛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師古注引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興，不立官稷，

相承至今也。”

《高文》根據《新簡》中兩件建武年間張掖郡和居延都尉下達的關於春、秋祠社稷的牒書，歸納簡 10 的“令以春祠社稷”和簡 14 的“以令秋祠社稷”，將其稱之為“祠令（祠社稷）”或即臣瓚所云的《漢祀令》，且又指出“東漢初社與稷在一處并祭。”^①

這裏還可以補充舉出敦煌馬圈灣遺址出土的三枚簡文：

簡 26 祠律 J □

《敦》499^②

簡 27 ●社曰衆人盡坐爲卿明讀爰書 約京令卿=盡知之

《敦》217

簡 28 賣社下賤平所市一牒以上及發養所作治飲食若塗墼社皆不莊事=事罰平一石穀賞以社

《敦》218

簡 26 爲“祠律”的標題，簡 27 和簡 28 疑屬“祠律”的正文。簡 27 的“社曰”之“曰”，似應改釋作“日”，兩見之“卿”，疑爲“鄉”的誤寫，“約京”，或應釋作“約束”。果真如此，與簡 29 至簡 22 將居延都尉有關秋祠社稷的“府書律令”，一直下達給各部（相當於地方的鄉級官署），讓全體吏卒和庶民百姓“盡知之”，不是頗爲相類嗎？簡 28 因簡文筆迹漫漶不清，不能全部準確辨認和讀懂，但其中的“塗墼社”，和簡 14 中的“謹修治社稷，令鮮明”完全吻合。這三枚新出的“祠律”簡，無疑爲《高文》所歸納的“祠令（祠社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其次，西北邊塞祠社稷的實態，不僅文獻無徵，即使首出萬餘枚居延漢簡，直接涉及的有關資料，仍屬寥寥無幾，幾乎無法深入展開討論。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從居延新簡中出土了三份有關祠社稷的牒書，特別是通過其中第二份基本完整的牒書，對它的整個過程，有了大致的瞭解，起到了填補史籍空白的作用。

一、如前所述，西北邊塞的祠社稷，均是遵照皇帝的律令規定進行的。

二、屆時，先由郡太守府或都尉府向所轄各候官和縣廷，下達祠社稷的府書。

三、郡太守府或都尉府預先選擇好齋戒和祠社稷的吉日，寫在牒上，作爲府書的附件同時下達。

四、再由候官向所轄各部，傳達祠社稷的府書。

五、府書逐級下達到候官、縣和部之後，是否還需要下達到最基層的烽燧，或者進行口頭傳達，雖不得而知，但要求各候官和縣廷以及各部巡視和修理社稷，使其鮮明。要求參加侍祠的候官和縣令、丞以下吏員，屆時提前兩天齋戒，務必做到謹敬、鮮絜和約省。

① 高恒：《漢簡牘中所見令文輯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② 《敦》是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上、下的略稱，中華書局，1991。

六、祠社稷的府書，均由勸農掾史負責傳達給所轄候官和縣廷，再由塞尉傳達給各部候長。并責令他們對不認真貫徹“府書律令”的吏員進行檢查和考核，一旦發現立即舉劾上報。

綜上所述，西北邊塞自都尉府到候官和部以下，雖屬屯戍系統，但其祠社稷，與郡、縣、鄉等地方行政系統毫無二致，它是從都尉府到候官、部等各級官署的重要政事活動，屬於典型的官社稷。

第三，關於選擇齋戒和祠社稷的吉日以及“當侍祠者齋戒”。如簡 12：“三月廿六日甲寅齋”，簡 17：“八月廿四日丁卯齋”，簡 19：“九月八日甲辰齋”，為齋戒吉日。簡 13：“三月廿八日丙辰直建，[可祠社稷]”，簡 18：“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為祠社稷吉日。所謂“直建”，係指“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建。”“直成”，係指“於建除之次，其日當成”。與《漢書·王莽傳》：“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其文例和文意皆同。《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釋文注釋》秦除：“建日，良日也。可以為齋夫，可以祠。利棗（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車。有為也，吉（14 正 2）。”又同書同篇：“成日，可以謀事，起口，興大事（22 正 2）。”注釋：“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語·周語上》：‘民之所急在大事。’注：‘大事，戎，祀也。’”和簡 13、簡 18 中的“可祠社稷”完全吻合。又下列兩枚術數簡：

簡 29 車祭者占牛馬毛物黃白青聊以取婦嫁女祠祀遠行入官遷徙初疾□。

《新簡》EPT40·38

簡 30 □……祠祀遠行入官遷徙□。

《新簡》EPT43·175

或可作為“祠社稷”需要選擇吉日的一個佐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面寫在牒上有具體月份和日期的齋戒和祠社稷的吉日外，還有下面這枚僅寫有“宗廟齋”三個字而缺載具體月份和日期的牒：

簡 31 宗廟齋

《新簡》EPT8·11

至於簡 14、簡 16 中的“令、丞以下，當侍祠者齋戒”，與《續漢書·祭祀志下》：“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可以互相印證。“侍祠”，陪祭。《史記·孝文本紀》：“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集解》引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大唐開元禮·諸里祭社稷儀》載云：“前一日，社正

及諸社人與祭者，各清齋一宿於家正寢。”是指唐代諸里祭社稷禮儀規定，凡是主持和參加社祭的人，均需在舉行社祀之前一日進行齋戒。現據《新簡》的齋戒吉日牒，不僅得知侍祠者需於祠社稷前兩天齋戒，且知這種禮儀，從漢至唐，一脈相承。誠如《高文》指出“漢時重視‘齋戒’，‘齋戒不謹’為一罪。如《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載，孝景二十一年，嗣侯蕭勝不齋耐為隸臣。《百官公卿表》載，元狩五年，衛尉充國，三年坐齋不謹棄市。”

第四，關於西北邊塞每年祠社稷的時期和次數。據簡 10 至簡 13，建武八年的春祠社稷為三月。據簡 14 至簡 22，建武五年的秋祠社稷為八月和九月。此外，簡 9：“八月戊午社計”，和下面這兩枚簡：

簡 32 ●建始二年三月丙午社賁買□。

《新簡》EPT51·424

簡 33 第三候長樊隆為社市詣官，九月乙酉蚤食入。

《新簡》EPT59·173

亦分別屬於三月、八月和九月舉行祠社稷的佐證。

簡 32 為春祠社稷購買物品的標題簡，建始為成帝紀年。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建始二年（前 31）三月戊子朔，丙午為十九日。

簡 33 亦屬於“詣官簿”。簡文將“四”寫作“三”，是新莽時期特有的習慣。第三部候長樊隆為了秋祠社稷外出購買物品，於九月乙酉蚤食赴候官，其目的如下面這枚簡文中的“詣官封符”，即簽發作為通行證的符券：

簡 34 □第十七守候長詡敢言之□□□□□

□□隆迺癸亥詣官封符為社□

（五枚殘觚）《新簡》EPT11·9A.B

但從文獻記載來看，《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漢書·食貨志上》載，李悝言戰國時期農夫一家每年“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續漢書·祭祀志下》：“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如果證之以簡牘遺文，西北邊塞祠社稷，通常均為每年舉行兩次，與《漢書·食貨志上》所載之“春秋之祠”符合，具體來說，春祠社稷分別在二月或三月，秋祠社稷分別在八月或九月。

第五，漢代祭祀社稷供品的一個顯著特點，按照其級別高低，差別頗為懸殊。《續漢

書·祭祀志下》載云，祭祀太社，“皆太牢具”，意即并用牛、羊、豕三牲。而郡、縣祭祀社稷，則減為“牲用羊豕”。《漢書·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說明祭祀里社時，供品祇剩下豬肉一牲了。西北邊塞祭祀社稷的用品，除了前面已經舉出的雞、黍米、稷米、酒、鹽、蔥外，還可補充舉出下列兩簡：

簡 35 □□肥豬社稷□□□□酒曰昔。

《新簡》EPF22·832

簡 36 候吏所貸黍稷米計：（以上為第一欄）

王子亦取粟五升直一斗，又貸稷米□斛。

候虜張卿稷米三升，黍米二升，為社。

張憚君稷米三升，黍米二升，為社。（以上為第二欄）

□□□□□。

為稷米三升，為社。（以上為第三欄）

《敦》364

其中，簡 35 雖因漫漶不清，無法辨認其全文，但已辨認出的“肥豬”和“酒”，均屬祠社稷的用品。簡 36 詳細地記載了某些部吏為祠社稷所借貸的黍米和稷米賬目。此簡雖無明確紀年，但因將“四”寫作“三”，是新莽時期所特有的習慣，故此簡當屬於新莽時期。

第六，從簡文看，西北邊塞祠社稷的費用，通常是由領取俸錢的部吏來分攤的。如前所述，已經舉出兩個收斂部吏社錢的個案。一個是如簡 7 的現錢出納簿，其中有一筆收入的明細賬為“九百部吏社錢”，係收繳某部部吏社錢的總計。如該部部吏如同前面所列舉出的臨木部，包括候長和候史各一人，燧長七人，共為九人，則每名部吏平均繳納一百錢。這與另一個個案即從簡 8 的某位部吏的俸錢中，扣除應繳納的社錢一百零四文，也是基本吻合的。又如：

簡 37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乙丑，張掖大守良、長史威、丞宏，敢告居延都尉卒人：言珍北守候、塞尉護，甲渠

候誼，典吏社受致厘飯黍肉，護直百卅六，誼直百卅二。五月五日，誼以錢千五百償所斂吏社錢，有

書。護受社厘不謹。誼所以錢千五百償吏者，審，未發覺，誼以私錢償□罪名。書到，如

《新簡》EPT52·99

此簡係西漢成帝建始元年（前 32）九月辛酉朔乙丑（初五），張掖郡太守良、長史威、丞宏三人聯名給居延都尉的復文。內容是對居延都尉彙報其統轄的珍北守候、塞尉護和甲

渠候誼於祠社稷時，利用他們“典吏社受致塵飯黍肉”的職權之便，借負責向部吏收繳祠社稷聚餐費用，護坐“受社塵不謹”，誼坐“以私錢償口”，應當受到處罰。且據此簡可知，殄北守候、塞尉護和甲渠候誼應繳納的“社受致塵飯黍肉”錢，分別為百卅六和百卅二文，比前面所列舉的候長、候史、燧長等每名部吏平均繳納一百錢要多出卅六或卅二文。此外，如：

簡 38 ☐……千八百五●大凡社☐

《新簡》EPT51·431

簡 39 ☐入穀錢六百，償中舍。

又負丞☐☐☐。

☐ 又二百八十五，償中舍。

又負官簿餘錢二百廿。

☐ 又二百八十三，梁粟。

又社貸千二百七十。

又九十，黍粟計。

受子恩還☐貸二百六十。

《新簡》EPT52·185

簡 40 ☐☐出稍入錢市社具☐。

《新簡》EPT54·22

簡 41 ☐當治社直亭☐。

《新簡》EPT65·420A

簡 42 ☐大業社=便為禱之母☐☐。

《新簡》EPT65·420B

等均與祠社稷密切相關。其中，簡 38、簡 39、簡 40，均屬於賬簿，簡 36 的中圓點“●”之前“……千八百五”，疑為分類明細賬目，而其後的“大凡社☐”，當為社錢的總計，與前舉簡 9：“☐八月戊午計”相類。簡 39 的賬簿中，載有一筆“又社貸千二百七十”有關祠社稷的貸款。簡 40 “☐☐出稍入錢市社具☐”，疑屬購買祠社稷用品的出納簿。簡 41 和簡 42，屬於同一枚簡的正、背兩面，正面的“當治社”，疑與前舉簡 10、簡 14、簡 21、簡 23 等四枚簡文中的“修治社稷”同義。

（本文係應邀參加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於 2004 年 9 月 17 日—19 日，在南開大學舉行的“中國社會史史料研討會”而撰寫。2004 年 9 月 15 日完成一稿，2005 年 7 月 15 日修定。）

“不和”與“不節”： 漢簡所見西北邊地異常氣候記錄

◎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王子今

內容提要 敦煌、居延等地出土漢代簡牘資料中有關於異常氣候的文字遺存。其中有些反映了中原人對西北邊地氣候未能適應的異常感覺，有些則是災變的記錄。保留了相關社會文化信息的“不調”、“不時”、“不和”、“不節”等簡文，與當時民間通行的“風雨時節”吉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分析有關現象，有助於漢代環境史研究的進步。

關鍵詞 西北 漢簡 氣候異常

漢代氣候史研究已多有論著面世。文煥然先生認為，秦漢時代的氣候，“無論是常態或者變態，雖然與現今有一定的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並不很顯著”^①。竺可楨先生則指出，秦和西漢屬於氣候溫和期，“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②。後來又多有學者就此用心考論，或助證文說，或充實竺說^③，或提出新見^④，推進了研究的深

① 文煥然：《秦漢時期黃河中下游氣候研究》，科學出版社，1959，78頁。

②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收入《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480—481頁。

③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22頁，62—72頁；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④ 滿志敏認為，戰國至西漢初的氣候向寒冷方向波動，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要比現代寒冷，西漢中葉開始氣候回暖，東漢後期的氣候與現代相差很少，東漢以後，氣候略為轉涼，但從幾個物候情況來看，大體上與現代相差不大。（鄭逸麟：《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17—18頁。）牟重行對竺可楨的論據進行了許多否定性的評論，但是他沒有明確提出對漢代氣候形勢的判斷。（牟重行：《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再考證》，氣象出版社，1996。）

入。

竺可楨先生說：“《呂氏春秋》、《夏小正》、《禮記·月令》是秦、漢時代的作品，但仍不失為世界上最早講物候的幾本書。”總結中國氣象學史，西漢時期有關鍵的意義。竺可楨先生還指出，“從西漢以來我們氣候知識逐漸的累積，逐漸的增多”，“一般的來說從西漢以來，我們的氣象知識從三方面發展着：（1）觀測範圍的推廣和深入。（2）氣象儀器的創造和應用。（3）天氣中各項現象的理論解釋”。關於第1點，正如竺可楨先生所指出的，“從西漢以後，關於特殊的氣候，如大旱、大水、大寒、霜、雪、冰、雹等記載不但繼續增加，而且記錄的地域範圍，也不斷擴大。”不過，“這類記錄詳略很不一致。在各時代，凡是首都所在地的區域，總特別被重視，如東漢時代的河南……”^①

相關史料的嚴重缺乏，是研究漢代氣候形勢的主要困難。而不同地域氣象記錄的不平衡，尤使得研究的進步面臨更突出的障礙。而通過對敦煌、居延等地出土漢代簡牘資料中有關信息的發掘和分析，有益於填補文獻資料的缺失，對於“記錄詳略很不一致”情形中西北邊地相關記載的貧乏，自然也可以有所匡救。

一、中原人對西北邊地氣候的異常感覺

漢武帝時代，因用兵匈奴的需要，開始經營西北。河西四郡的設立，長城防務的延伸，通信體系的拓展，使得漢王朝成功實現了對西北邊境地區的控制。數以萬計的中原人以戰爭、戍防、屯墾、行商等形式參與了這一地區的開發。

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方的人們來到西北邊地，對這裏的環境往往都表現出明顯的不適應。這種感覺，在簡牘文字中有所體現。例如懸泉置出土漢簡可見：

（1）縣泉地熱多風塗立乾燥毋□其濕也度得棧六枚今遣效穀倉曹令史張博

II 0211②：26^②

研究者指出：“地熱：熱，通勢。”“操，通燥。”“毋□其濕也：原釋‘毋急其濕也’，‘急’字恐不確，文意不通。”“棧，疑為‘輶’之假字，車輶。”^③從簡文內容看，似是

① 竺可楨：《中國過去在氣象學上的成就》，《科學通報》2卷6期，1951，收入《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267頁。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年第5期。所刊釋文為：“縣泉地熱多風塗丘乾燥毋急其濕也度得棧六枚今遣效穀倉曹令史張博”，簡號為II 90DXT0211②：26。今據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5頁。

③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5頁。

說“塗”這種勞作形式的效率，然而原簡書寫者對於敦煌地區“地執多風”的環境的感覺，是鮮明的。此外，我們還看到：

(2)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長史淵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謂
南塞三侯縣郡倉令曰敦煌酒泉地執寒不雨蚤殺民田貸種穡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

II 0215③：46^①

簡文內容的解讀尚有疑點，而其中所謂“敦煌酒泉地執寒不雨蚤殺民田”，是對當地氣候條件的總體評價，並非個別年代季節異變的記錄，是明白的。有研究者分析說：“大意是敦煌、酒泉氣候寒冷少雨，應多種那些能適應氣候的有芒的作物。今祁連山南北坡低地即適應種青稞、大麥之類。”^②

對於西北邊地環境條件類似感受的文字遺存，在居延漢簡中也有發現。例如：

(3) 成伏地再拜請

卿足下善毋恙□苦候望春

45·6B

(4) 四年十一月建□

E.P.T54：7A

苦暑幸賜書存問

E.P.T54：7B

這兩件文書都是私人書信。(3)寫在冬盡依然嚴寒苦盼春暖時。(4)寫在苦耐酷暑時。二者都突出了一個“苦”字，氣候條件對書寫者心境的壓力，特別值得注意。

敦煌漢簡中又有一則簡文，也說到對氣溫的特殊感受：

(5) 於蘭莫樂於溫莫悲於寒中子對曰文莫隅於秬復莫薶於

1409A

第三

1409B

這段文字，看來是一篇不名文著的殘存，全句尚難以通解。其中所謂“莫樂於溫莫悲於寒”，也許並不是針對西北邊地氣候發表的感觸。姑且暫列於此，是因為至少在河西邊塞抄錄和誦讀這篇文章者的實際心態，當時或許表露了同樣的“樂”與“悲”。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所刊釋文為：“南塞三侯縣郡倉令曰敦煌酒泉地執寒不雨早殺民田貸種穡麥皮芒厚以廩當食者小石”，簡號為II 90DXT0215③：46。今據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5頁。

②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6頁。

二、災變的記述

對於異常氣候的記錄，也包括有關自然災害的歷史信息。

生態環境是文明發育和歷史進展的舞臺背景。生態環境史的研究因此逐漸為歷史學者所重視。有識見的考古學者建議，“今後的發掘要注意對古環境、古氣候等多方面信息的采集。”^①實際上，近年出版的多種考古發掘報告中，都列有回顧當時生態環境的內容。

明確記錄相關信息的文字資料，自然是更值得珍視的考古發現。

敦煌懸泉置漢代郵驛設置遺址出土了大量簡牘。發掘者和整理者在介紹這批簡牘的文化內涵時，說到有關“漢代敦煌地區的自然災害”的簡文內容：“敦煌地處沙漠、戈壁的包圍之中，自然條件較差，時常有各種災害發生。從簡文間接反映的主要災害有乾旱、地震和風暴。”^②

被歸入“自然災害”一類的簡例，有前引簡（1）（2）。^③此外，還有：

（6）五鳳二年十一月己卯朔侍謁者光持節使下敦煌太守承書從事今敦煌太守書言
今年地動如詔書 II 90DXT0115③：77

（7）☐送使渠犁校尉莫府掾還會大風折傷蓋☐十五枚御趙定傷
II 90DXT0215④：36

（8）☐二月中送使者黃君遇逢大風馬驚折死☐☐
II 90DXT0215④：71

（6）“地動”是與氣候沒有直接關係的災害。（7）（8）“大風”，在西北邊塞地區很可能是經常發生的異常氣象。《西嶽華山廟碑》：“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④“風”竟然列於“旱”之前。可知風災的危害，在漢代農業社會曾經受到特殊的重視。

在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⑤發布的簡例釋文中，“自然災害”題下一共列有5例。此外，在“詔書與各種官府文書”題下，首列泥壁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這一文書，一開頭就說到了自然災害：

（9）太皇太后詔曰往者陰陽不調風雨不時降農自安不董作☐☐是以數被災害☐

① 趙化成：《在湘西里耶秦簡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國文物報》，2002年8月9日。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內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

③ 這兩枚簡是否可以看作災變的記錄，似乎還有討論的必要。

④ 《隸釋》卷二。

⑤ 《文物》2000年第5期。

□惻然傷之^①

有學者釋文寫作：“大（太）皇大（太）后詔曰：往者陰陽不調，風雨不時，降（隋）農自安，不堇作【勞】，是以數被菑害，惻然傷之。”^②詔文內容，或許斷句也可以改定為：“往者陰陽不調，風雨不時降，農自安不堇作，是以數被菑害，惻然傷之。”這裏“太皇太后”以沉痛的語調所說到的“數被菑害”，當然並不是僅指西北邊地，但是也未必不包括西北邊地。^③

三、不調・不時・不和・不節

如果將前引懸泉置泥壁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中文句讀作“陰陽不調，風雨不時降”，則可以與《淮南子·時則》以下文字相對照：“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不時降”和“以時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不時”，是漢代使用相當普遍的語彙。

我們看到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四度》中說到“動靜不時”：

| | |
|--------------------------------------|------|
| 君臣易立（位）胃（謂）之逆，賢不宵（肖） | 35 下 |
| 并立胃（謂）之亂，動靜不時胃（謂）之逆，生殺不當胃（謂）之暴。逆則失本， | |
| 亂則失職，逆則失天，【暴】 | 36 上 |
| 則失人。 | 36 下 |

“動靜不時”一如“生殺不當”。“動靜不時胃（謂）之逆”，這種“逆”，則又如同“亂”與“暴”，形成某種破壞性的災難。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論》寫道：

| | |
|------------------|------|
| 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 | 55 上 |
| 地之道逆矣。 | 55 下 |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年第5期。

②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92頁。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年第5期。

所謂“動靜不時”，直接影響了“種樹”也就是農耕生產的正常條件。前言“失天”，此言“失地之宜”。總之，是“天地之道逆矣”，也就是自然秩序遭致嚴重的破壞。

漢簡資料中多有反映相關現象的內容。例如居延漢簡：

☐方春時氣不調愿子陳近衣盡☐

(10) ☐

☒ (E.P.T50:50)

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寫在一枚“觚”上的文書，以“制詔皇太子”開篇，被看作漢武帝的遺書。^①其中有“方春不和時”辭句：

(11) 制詔皇太子 體不安今將絕矣與地合同眾不復起謹視皇天之苛加曾騰在善禹百姓賦

敕以理存賢近聖必聚諸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滅名絕紀審察騰言眾身

毋久蒼蒼之天不可得久視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絕矣告後世及其孫子

忽忽錫錫恐見故至毋貳天地更亡更在去如郅廬下敦閭里人固當死慎毋取

悞

賤 第時謹伏地再拜請翁系足下善毋恙甚苦候望事方春不和時伏願翁系

將侍近衣便酒食明察蓬火事寬忍小人毋行庶安時便甚。

伏地再拜請

時伏願翁系有往來者便賜記令時奉聞翁系級急嚴教 (1448) ^②

所謂“方春不和時”，可以參考“方春不時”與“方春不和”理解。

敦煌漢簡可見“春時風氣不和”語：

(12) 息子來卿叩頭多問丈人無恙來卿叩頭春時風氣不和來卿叩頭唯丈人慎衣數進酒食寬忍小人愚者 (779)

居延漢簡中又有：

^① 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② 釋文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下冊，中華書局，1991，274頁。

(13) 司便致言解俱叩頭頃得謁見始除盛寒不和唯爲時平衣強奉
酒食愚慙毋倫甚焉叩頭數已張子春累毋已子侯奉以彭故不
達亡至意得已蒙厚恩甚厚謹因子春致書彭叩頭單
記□□□不謁彭叩頭(494·4B)

又如:

(14) □緩急始春未□
□緩急始春未和□(435·4)

“始春未和”就是“始春不和”。又如:

(15) □□□出相見始春不節適薄合強飡食往可使來者賜寄 E.P.T43:56

這些涉及氣候異常的出現“不調”、“不時”、“不和”、“不節”字樣的簡文，多屬於私人書信。(14)似是習字練習的遺存，也是爲了熟練地寫信。(11)即使可以確定是帝王遺書，實質上也是一種特殊的書信。其中“苦候”字樣，正可與(3)所見“苦候”對照讀。這篇詔書中多取用民間用語，也是值得注意的。

大多作爲民間書信用語的“不調”、“不時”、“不和”、“不節”等文句，反映了在較廣闊的社會層面，人們對氣候異常的感覺。與此相反的，是以“風雨時節”形式表達的對適宜農耕生產的氣候秩序的慶幸和祝願。例如漢鏡銘文多見“某某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風雨時節五穀孰，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告後世樂毋亟”文句。“風雨時節五穀孰”，又寫作“風雨時節五穀熟”。又《三公山碑》：“皇靈□佑，風雨時節。”^①《曹全碑》：“風雨時節，歲獲豐年。”^②也都體現了“風雨時節”作爲一種社會理想所形成的廣泛的影響。

① 《隸釋》卷三。連讀上下句，爲：“恭肅神祇，敬而不怠。皇靈□佑，風雨時節。農□執耜，或耘或耔。童妾壺醢，敬而賓之。稼穡穰穰，穀至□錢。”或讀作“穀至兩錢”。杜香文：《元氏封龍山漢碑群體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93頁。關於《三公山碑》的發現和認識，參看王子今：《〈封龍山頌〉及〈白石神君碑〉北嶽考論》，《文物春秋》2004年第4期。

② 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474頁。

漢代邊境防禦制度初探

——以出土漢簡日迹簡爲中心的考察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張俊民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根據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的相關資料，探討漢代邊塞防禦體系中的“天田”制度和“日迹”制度。文章主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天田”的淵源、形制、分布以及功能；（二）“日迹”的人員、方式、符券、時間、記錄以及獎懲規定；（三）“日迹簿”承載的信息對於解讀相關簡牘資料的價值。

關鍵詞 漢代邊塞 居延漢簡 天田 日迹 軍事防禦

漢代在西北構築了長達三千餘里的邊境防綫，那麼，漢朝是通過怎樣的防禦體系來確保漫長的邊境綫的安全有效發揮其防禦功能？守邊吏卒的軍事生活場景如何？他們通常需要履行什麼樣的常規軍事活動？由於缺乏詳細的文獻記載，長期以來我們無法究明這些問題。幸賴 20 世紀出土的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中有大量與之相關的材料，使我們有可能在兩千年之後進一步瞭解漢代的邊境防禦制度和守邊吏卒常規的軍事活動情形。

居延漢簡中有一部分是專門記錄日迹活動的文書，可以稱作“日迹簡”。所謂“日迹”，簡言之就是每天查看天田上的痕迹，並將其如實地記錄下來。爲數衆多的日迹簡表明，“日迹”是構成漢代邊境防禦體系的重要制度之一，在西北邊塞地區得到了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對於漢代邊防意義重大。本文擬以西北地區出土簡牘中所見“日迹”簡爲中心，探討漢代的天田制度和日迹制度，以期從一個側面揭示漢代邊塞防禦體系的實態。不妥之處，敬請賜教。

一、“天田”及其相關問題

1. “天田”及其淵源

“日迹”制度與“天田”密不可分，所以不妨先從“天田”入手。近世以來，對“天田”的討論主要有王國維、賀昌群、勞幹、初師賓、侯丕勳、李均明等諸家。現分別簡述如下。

王國維在《流沙墜簡》中對“天田”的按語為：

……天田未詳。唐《崔敦禮神道碑》：“左校叛換，亟擾天田”。天田二字惟見此，蓋用古語。殆謂天然之田，未經墾治者也。畫者，謂疆理之……則天田固可耕之田，非徒區畫而已。^①

勞幹在述及天田時，綜合了王國維和賀昌群的看法，他說：

王氏《考釋》謂：“天田未詳，唐《崔敦禮神道碑》，‘左校叛換，亟擾天田’蓋用古語。”賀昌群以為即《漢書·晁錯傳》注之天田，今按其說是也。《晁錯傳》：“為中周虎落，”注：“鄭氏曰：‘虎落者，外番也，若今時之竹落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連，遮落之也。’顏說雖是，然虎落與天田本非一物，蘇林之說以釋虎落，以釋天田則是。^②

初師賓引喻唐代之“土河”對天田作了進一步的解釋：所謂“天田”，例同“土河”，義若不稼之田。唐代稱作“土河”，見《通典·守拒法》：“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斬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③。

侯丕勳的基本結論如下：（1）漢代“强落”與“天田”分設，“强落”不是“天田”，蘇林之說有誤。（2）兩漢時期“天田”與邊境地區的“塞”、“部”、“燧”及“沙”、“河”等邊防設施及自然實體有著密切關係。（3）漢代“天田”業已形成為一種模式化的禦敵工程設施，基於禦敵的實際需要修治於不同的處所，并因之有“塞天田”、“部天田”、“燧天田”、“沙中天田”、“河水中天田”等不同的稱謂，天田在禦敵中主要發

①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中華書局，1993，146頁。標點為引者加。

② 勞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1960，43頁。

③ 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1984，195頁。

揮偵迹作用。^①

李均明認為：天田是漢以來人們在邊塞鋪設或加工成的沙土帶，寬約 5 至 7 米，凡人馬越過，都能留下足跡，至唐代稱作“土河”。^②

今按，“天田”一詞，《漢書》中共有二見^③，其一出自卷二十五《郊祀志上》張晏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辰）見而祭之。”與本文所論含義較遠；其一出自上引《晁錯傳》注，蘇林將虎落與天田相混，足見三國時人們對何謂天田已不甚明瞭。近世諸家的討論日漸深入，已經接近天田的實態，筆者贊同他們對天田形態的一般描述，但對“天田”這種防禦設施以及“日迹”制度的起源有不同看法，我認為其出現的時間當上溯至戰國時期，在《墨子》中可以找到其原初形態。

《墨子·號令》云：“空隊要塞，人之所往來者，令可以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

《雜守》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

《雜守》又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④

從上引三段文字可知，《墨子》書中所言“可以迹”的方式和功用，同漢簡文書中的“日迹”極相類。祇是因時代背景不同，兩者的分布地帶有差異，但其作用和功效則是相同的，即“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可以將“天田”、“日迹”的源頭上溯至戰國時期。

綜合各家之說，對於“天田”可以歸納如下：“天田”是漢代邊塞地區一種偵迹人馬非法出入情況的防禦設施。具體方法是將一定寬度的地表鋤劃鬆軟^⑤，或鋪以細沙。人馬經過，必然在其上留下足跡。負責巡查的戍卒則根據天田上留下的痕迹判斷是否有人偷越邊塞，此即漢簡文書中所說的“日迹”活動。對於天田上發現的痕迹，要適時進行辨識、分析，判斷是人是馬還是野駱駝留下的痕迹；若係人非法偷越，則需查清出入人員的多少以及出入地點，並及時上報，協查追蹤。實際上，在漢代邊塞的常規軍事活動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日迹制度，後文將會詳及於此。

“天田”，同後來的“土河”有一定的聯繫，甚或有人認為其例同唐代的“土河”。

① 侯丕勳：《“塞天田”制度考述》，載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

② 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330 頁。

③ 經過《漢籍全文檢索系統》幫助檢索。

④ 張純一編著：《墨子集解》，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543、551、549 頁。

⑤ 漢簡中作“畫”，與今天“劃”的用字有區別。為避免造成誤解，除簡文外本文用“劃”。

但根據前引《通典》的相關記載不難發現，“天田”與“土河”二者有一定的區別，主要表現在（1）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土河”僅限於交通要道，地理位置要求十分嚴格；“天田”則為漢代邊塞的一種形制或輔助設施，對地理位置要求不甚嚴格，分布區域甚廣。（2）製作方式有別，“土河”要在挖溝和坑，內填細沙或散土；“天田”要在保持地表鬆軟，勿需挖溝或掘坑。

2. 漢簡所見天田分布與管理

首先，關於天田分布。

根據居延漢簡資料，存在天田的烽燧比較多。在漢塞存在的百餘年時間裏，防禦工事的修築與布局亦隨時間的早晚而有所變化。從出土地點與數量來看，目前居延漢簡中比較多的是甲渠候官及其下轄部、燧的文書，其中有不少是關於燧、部、候官等各級防禦機構的天田、日迹記錄文書。這至少表明在居延都尉府甲渠候官下轄的區域內，“天田”是廣泛存在的。

甲渠候官是集中出土日迹簡與日迹簿的地段，在這些日迹文書中涉及的防禦機構有燧^①、部、候官，涉及的人員有燧卒、燧長、候史、候長，他們均有日迹記錄。甲渠候官所轄北部塞包括第四部、第十部、第十七部、第廿三部、鉗庭部和萬歲部等六個部，南部塞包括臨木部、不侵部、吞遠部和誠北部等四個部。^②這些部基本上都有關於天田和日迹的記錄。

卅井候官相關的簡文比較少，A8 破城子甲渠候官出土的文書即簡 231·91^③確切提到卅井候官所轄的誠敖北燧有天田。P9 博羅松治出土的日迹簿殘簡即 455·3、455·20 與 459·3 也提到卅井候官所轄區域的天田。另在《居延新簡》^④ 卅井次東燧出土的第 13、91 簡提到卅井候官和止蜚燧：

簡 1 𠄎樂部𠄎樂放詣今言卅井徽迹卒李孝𠄎

ESC·13^⑤

簡 2 止蜚燧長吳賞 六石弩𠄎三分 五日有人迹

吏不知烽火品約

ESC·91

地灣、大灣、金關出土的與日迹、天田相關的簡文均出奇的少，出現這種情況，除地理位置原因外，可能與文書出土地功能性質不同有關。以金關為例，它是邊塞地區控制人

① 漢塞防禦系統中的“燧”，簡文中出現多種寫法，為行文方便一律用燧。

② [日]吉村昌之著、楊振紅譯：《居延甲渠塞的部燧設置》，《簡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③ 此類簡號參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下同。

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化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中華書局，1994。

⑤ 前揭《居延新簡》上，254 頁。

員往來的重要關卡之一，其文書自然與甲渠候官所出的文書有別。在舊金關漢簡中沒有發現與天田、日迹相關的簡文，新金關漢簡一萬多枚也祇有 39 見。其中提到的地名與官名有：驛北亭（73. E. J. T27:44）、金關燧（73. E. J. T29:107）、平樂燧（73. E. J. T21:356）、金關有秩候長（73. E. J. T31:153）、肩水中部候史（73. E. J. T37:56）、河上守候史（73. E. J. T37:1163）。大灣出土的簡文中，明確記錄有天田或日迹的烽燧有樂昌燧與水門燧，簡號有 19·5、317·25A、336·32。與地灣有關的簡文共 8 條，其中明確提到的烽燧是臨莫燧。簡號有 13·4、36·16、219·15、236·26、239·22、280·17、306·21、562·19。

在敦煌漢簡中，有關天田與日迹記錄的文書共有 29 處，散見於《敦煌漢簡》^①所收錄的 2485 枚漢簡中。其中，1979 年馬圈灣出土的 1221^②枚中有 3 處相關記錄，而且其中一枚簡的記錄是以敘述候史職務的形式出現的，簡文如下：

簡 3 守候史以迹候盜賤爲署昂迹見隆出所部大薪舉滿刻時毋長吏□

敦·190^③

簡 4 □燧傳天田道里簿一

□明燧天田五里其二里 煎都塞三里亭以東皆沙石井深十丈五尺

敦·1035B

簡 5 出西書封二 ……天田二里見□

二里已獲

敦·1079

敦煌漢簡出土的地點比較分散，其中一個集中出土地點斯坦因原來編號爲 T. VI. b. i，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編號爲 D3。這一地點或曰是凌胡燧（漢代大煎都候官）所在地^④，共出土簡牘 239 枚，其中與日迹相關的簡牘 14 枚。

從已有資料來看，天田分布的具體位置在簡文中未見直接記載，祇有幾處簡文提供了一些間接的信息，如：

簡 6 收降候長賞候史充國 四月乙巳日迹積一日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 迺丙午日出一千時虜可廿餘騎萃出塊沙中略得迹卒趙蓋眾 丁未日迹盡甲戌積廿八日毋越塞

①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

② 馬圈灣出土簡牘數量有二說，一爲 1217 枚，依據是《敦煌漢簡釋文》；另一說是 1221 枚，依據是前揭《敦煌漢簡》下冊第 67 頁的統計表，而實際釋文祇有 1217 枚。

③ 此類簡號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下同。本簡“賤”實爲“賊”之誤。

④ 前揭《敦煌漢簡》下冊，78 頁。

蘭渡天田出入迹

E.P.T58: 17^①

簡 7 遇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長王閔子男同攻虜亭長趙常及客民趙閔范翕一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藏千錢以上帶刀劍及鉞各一又各持錐小尺白刀箴各一蘭越甲渠當曲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

E.P.T68: 59—63

簡 8 六人畫沙中天田六里 率人畫三百步

敦·1714

簡 6 是收降部候長、候史日迹簿，其中記錄了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出一干時，有虜廿餘騎突然從沙丘中出來將日迹卒趙蓋眾擄去，這表明天田位於塞外的可能性較大。簡 7 提到“河水中天田”，可見在河道之中也有天田分布，這類天田當是修治於干河道或有少量河水的河道中。簡 8 則直接說明，天田是直接通過劃沙形成的，表明天田亦修治於沙漠、戈壁之中。^②

其次，關於天田的管理。

為確保天田的偵迹功能能夠正常、有效地發揮，必須保持天田表面的疏鬆，要經常對天田進行管理、修治、鋤劃，此即漢簡之中常見的所謂“畫天田”^③。劃天田是守邊吏卒的常規職責之一，在對吏卒的考核中也包括其畫治天田的數額是否達到規定量，因此，對於吏卒畫天田的情況要按照特定的文書格式進行詳細記錄。敦煌漢簡中即有相關的文書格式簡：

簡 9 若干人畫天田、率人畫若千里若干步

敦·1584

事實表明，這些格式在實際的記錄文書中得到了嚴格遵行，如：

簡 10 六人畫沙中天田六里 率人畫三百步

敦·1714

這些關於“畫天田”的記錄，當會成為對部、燧吏卒進行考核的依據之一。簡文中有關於“天田不畫”的考核記錄，如 E.P.T57:108 著名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其中提到第十三至十八燧“天田不畫”，雖然未見對“天田不畫”的懲治記錄，但可以肯定，對於守邊吏卒來說，“天田不畫”當是一種瀆職行為。

① 此類簡號見前揭《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下同。

② 參見侯丕勳《“塞天田”制度考述》，載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一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

③ 《居延新簡》E.P.T5: 59。

二、日迹文書反映出來的制度

前面談到所謂“日迹”，就是每天查看天田上是否有人馬經過所留下的痕迹，並對這些痕迹進行分析、判斷，且如實記錄下來，及時上報，以便作出相應的對策。日迹跟候望一樣，也是漢代邊塞重要的防禦措施之一，而且它能彌補夜間無法候望的問題，因為天田表面疏鬆，無論白天黑夜，只要有人馬經過都會留下痕迹，所以天田算得上是一種全天候的防禦偵迹設施。不論是內地人非法闖越邊塞，還是匈奴人馬自塞外入侵，只要他們經過天田地帶，在完備的日迹制度下都可以進行有效的偵迹，並及時作出反應。西北地區出土的漢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專門記錄日迹活動的文書，我們稱之為“日迹簡”。通過對這些“日迹簡”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漢代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日迹制度，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日迹人員

日迹簡中體現出來的與日迹有關的最高級官員是士吏。簡文中多有關於“士吏”以“迹候、通蓬火”為職的記錄，但士吏是否直接參與部、燧常規的日迹活動，目前還沒有見到相關資料。所謂士吏“以迹候、通蓬火”為職，也很可能僅是指士吏對部、燧有督察之責，其本身並不直接參與日迹活動。根據簡文資料，直接參與日迹活動的最高長官是候長，比如居延新簡 E. P. T65：292 云，候長“以主領亭燧吏卒迹候為職”。其次是候史，居延新簡 E. P. T59：1 說候史“以日迹為職”。此外，還有許多關於候長、候史日迹活動的記錄文書。燧長和燧卒作為漢塞戍邊的基層官兵，當然是日迹活動的主要參與者。

2. 日迹方式

簡文中多有“平坦而迹”之說，表明日迹活動從凌晨開始，主要是在白天進行。從事日迹活動的燧卒多採用輪流工作的方式，或每天輪換，或十日輪換，或半月輪換，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一名戍卒也可能要從事一整月的日迹活動，比如：

簡 11 臨木燧卒三人(以上為第一欄)

卒陳盧癸未日盡壬辰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卒汜□癸巳日迹盡壬寅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卒□漢癸卯日迹盡壬子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凡積卅□(以上為第二欄)

E.P.T43：32

簡 12 不侵燧卒更日迹名 (以上為第一欄)

郭免乙亥戌寅辛巳甲申丁亥庚寅癸巳丙申己亥辛丑癸卯

李常有丙子己卯壬午乙酉戌子辛卯甲午丁酉庚子壬寅

李相夫丁丑庚辰癸未丙戌己丑壬辰乙未戌戌省不迹 (以上為第二欄)

E.P.T56: 31

3. 日迹符、券

符在這裏指一種身份證明。燧卒、燧長、候長等進行日迹時，需佩帶或持有用於證明其身份的符，此即簡牘文書所謂“日迹符”，比如：

- 簡 13 ●甲渠八月廿六日庚午遣燧長韓況徒□覆單迹虜到故候官知虜所出符符左
留官 E.P.T26: 6
- 簡 14 第廿三候長迹符左 E.P.T44: 21
- 簡 15 第廿三候長迹符右 E.P.T44: 22
- 簡 16 □ 第六平旦迹符 E.P.T49: 69
- 簡 17 第□□□□ □ 旦符
施刑朝文山迹持出入 E.P.T49: 70AB
- 簡 18 鉗庭月廿三日燧長日
迹符以夜半起行詣官 □ E.P.T65: 159
- 簡 19 八月庚申候史持第卅符東迹 敦·1602
- 簡 20 正月乙卯候長持第十五符東迹 □ 敦·1763

本文所说的券是完成日迹的證明物。漢代邊塞自然條件惡劣，如果没有相應的制度保證，吏卒很可能會偷懶取巧，在日迹的時候有意放棄那些邊遠地帶的天田。因此，燧與燧之間的戍卒爲了證明彼此均已盡界完成日迹，雙方要剖符刻券，以便在界上合符對券，以爲憑證。比如：

- 簡 21 十二月戊戌朔博望燧卒旦微迹西與青堆燧卒會界上刻券
十二月戊戌青堆燧卒旦微迹東與博望燧卒會界上刻券 明顯 敦·1392AB
- 簡 22 四月威胡燧卒日迹西與玄武燧迹卒會界上刻券 敦·2296

簡 21 是一枚比較厚的簡，可以在簡的側面刻齒，具有合符勘驗的功能，證明雙方在一定的地點完成了日迹任務，防止日迹途中戍卒半途而歸。簡的正、背面書寫相關烽燧名稱，標明本券的適用範圍。

4. 日迹時間

居延漢簡中有關於不同人員、不同日迹時間的記載，簡文如下：

簡 23 建武泰年六月庚午領甲渠候職門下督盜賊鳳謂第四守候長恭等

E.P.T22: 166

簡 24 將軍令月生民皆布在田野以塞候望為耳目檄到恭等令燧長旦蚤迹士吏候長常以日中迹

E.P.T22: 167

簡 25 加慎務如將軍令方循行考察不以為意者必舉白毋忽如律令

E.P.T22: 168

上述三枚簡文的內容連貫、文義通暢，可以組成一個冊書。“七”字寫作“泰”，是王莽改制後的習慣用法，這通常也是判斷王莽簡的重要標志之一，但并非所有有“泰”字的簡都是王莽簡，簡 23 之“建武泰年”就是很好的證明。當時居延地區雖然因為竇融的關係可以看到已經奉行東漢光武帝的正朔，但同時仍然沿用許多固有的制度。簡文表明，鳳以將軍門下督盜賊之職兼領甲渠候，向甲渠第四部守候長恭等發布指示，要求各地完善候望、日迹制度，務必按照將軍令行事。由於馬上要有人來視察工作情況，因此必須加強督促檢查，保證不出錯。具體方法是燧長旦蚤迹，士吏、候長常以日中迹。從中可以看出一天之中，不只日迹一次，而是要在不同的時段進行多次日迹，以確保偵迹巡邏及時、有效，達到防禦的目的。

具體的日迹時間在前引有關符、券的簡文中已有反映。如簡 16 所記為“平旦迹符”，而簡 21、22 則全為“旦微迹”刻券。另外，下面兩簡反映出來的時間也大致相同：

簡 26 □□以為虜舉火明旦踵迹野馬非虜放舉火不應□

E.P.F22: 414

簡 27 □平旦微迹□

敦·2273A

5. 日迹記錄

漢簡中有集中記錄日迹人員、時間、範圍、結果的文書，此即簡文中所謂“日迹簿”。各級機構都有年“日迹簿”和月“日迹簿”，比如有燧年、月“日迹簿”，部年、月“日迹簿”，候長、候史年、月“日迹簿”和候官年、月“日迹簿”。“日迹簿”需逐級上報，比如，燧將日迹簿匯總報部，部在收集各燧日迹簿的基礎上，再加上候長、候史的日迹簿，形成部“日迹簿”，并送到候官處匯總，成為候官“日迹簿”，最後要送到都尉府。常見的“日迹簿”形態如下：

- 簡 28 七月癸酉卒張垣迹盡丁亥積十五日
 第十七燧 七月戊子卒吳信迹盡壬寅積十五日
 七月癸酉卒郭昌省莛
 ·凡迹積卅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51: 211
- 簡 29 ·第四燧建昭三年八月卒日迹簿 E.P.S4.T2: 4
- 簡 30 ·臨木部初元五年吏卒日迹簿 E.P.T59: 28
- 簡 31 候長尊 候史長秋丁未詣官不迹 閏月己卯從當曲燧北界迹南盡不侵燧南界
 盡丁未積廿九日毋越塞出入迹 E.P.T56: 28
- 簡 32 甲渠候史公乘徐惠倩日迹簿
- 神爵四年二月丙申視事初迹盡晦廿九日三月廿九日四月甲午迹盡丁未十四日四月戊申
 疾盡五月丙子廿九日不迹……凡迹積二百六日 E.P.T53: 38
- 簡 33 甲渠官 東門輔 閏月乙亥第七卒以來 誠北部迹簿 E.P.T51: 129
- 簡 34 ·甲渠候官建昭五年九月卒日迹簿 E.P.T51: 13
- 簡 35 肩水都尉府 迹候簿 280 · 25

上引八條簡文，僅是從眾多“日迹簡”中篩選出來的，頗具代表性，基本體現了日迹文書所涉及的機構和人員。比如，其涉及到的直接參與日迹的機構及人員有燧的燧卒、部的候長和候史；日迹文書需匯總上報的機構有候官和都尉府。上述簡文中，有的是日迹簿標題，有的是日迹簿正文，有的則是封檢。如簡 28 是建昭五年七月第十七燧戍卒的日迹簿正文，第十七燧在當月裏有戍卒三人，其中一人省作，沒有參加日迹，另二人輪流日迹，每人十五天；簡 29 是第四燧建昭三年八月卒日迹簿標題；簡 30 是臨木部初元五年全年日迹簿的標題；簡 31、簡 32 為候長、候史日迹文書；簡 33 是將誠北部“日迹簿”文書送到甲渠候官的封檢；簡 34 是甲渠候官建昭五年九月卒日迹簿標題；簡 35 則是某機構將“日迹簿”文書送到肩水都尉府的封檢。

6. 日迹結果的記錄

日迹結果通常有兩類，一是未見異常，二是發現了異常情況，無論哪種結果都要如實記錄下來。一般對於前者的記錄相對簡單、籠統，表述也比較一致，多記曰“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對後者的記錄則相對複雜、詳盡，表述多據所發現的異常情形而定，比如：

- 簡 36 市陽里張延年蘭渡肩水要虜燧塞天田入今 10 · 22
- 簡 37 □蘭入不知何一步入迹安所到而不得從迹又不勅候史 13 · 4

- 簡 38 ☐不知有蘭出塞不發覺至今吏[□]候長所寬解[□] 49·20
- 簡 39 ☐迹入塞及出塞爲踵迹窮追以檄[□] 123·60
- 簡 40 煮踵迹逐到第十燧 178·16
- 簡 41 田北行出俱起燧南天田夾河還入燧南天田 231·88
- 簡 42 ☐☐☐虜[□]入卅井誠教北燧天田出入臨木
☐誠北部守尉萌士吏區捕得虜馬審 231·91
- 簡 43 ☐迹二里所地石堅失迹輔等郭迹東[□] 310·25A^①
- 簡 44 ☐即野馬也尉亦不詣迹所候長迹不窮[□] E.P.T8:14
- 簡 45 蚤食時到第五燧北一里所見馬迹入河馬可二十餘騎…… E.P.T48:55A
- 簡 46 移檄書居延守尉移檄部亭吏從迹逐捕…… E.P.T56:128
- 簡 47 ☐第廿三燧長韋從迹卒張[□]道不以時乘迹狀[□] E.P.T56:162
- 簡 48 收降候長賞 候史充國 四月乙巳日迹積一日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迺丙午日出一千時虜可廿餘騎萃出塊沙中略得迹卒趙蓋眾 丁未日迹盡甲戌積廿八日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 E.P.T58:17
- 簡 49 ☐☐曰居延[□]關塞遠何得出牛子曰欲渡天田以杖畫之疑齊[√]牛子[√]赦共 112·10A
- 簡 50 ☐所持木杖畫滅迹復越水門 336·32
- 簡 51 此迹類奴利迹當不遠拓[□][□] E.P.T51:341
- 簡 52 日迹行廿三里久視天田中目玄有亡人越塞出入[□]
 它部界中候長候史直日迹卒坐匿不言迹[□] E.P.T51:411

上引簡 36 至簡 52，均是關於日迹發現有出入天田的異常情況的記錄。其中簡 36 是關於市陽里張延年蘭渡肩水要虜燧所轄天田的記錄，“無符傳出入爲蘭”^②，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非法出入。按照規定，“蘭渡”邊塞的行爲會受到懲罰。簡 37 至簡 42 記錄日迹時發現有出入的痕迹以及跟蹤追擊的情況。簡 43 記發現有出入天田的痕迹，跟蹤二里左右，之後，因地面堅硬，痕迹消失，不知去向。簡 44 記發現有出入痕迹，但塞尉沒有前往發現痕迹的地方進行勘驗，候長也沒有對所發現的痕迹追查到底。簡 45 記蚤食時，在第五燧北一里左右的地方發現有二十餘匹馬的痕迹一直抵達河水邊。簡 46 記居延守尉緊急命令所屬吏卒跟蹤追捕某人。簡 47 記第二十三燧的燧長和一名隨從燧卒沒有按時日迹和沒有跟蹤追逐的原因。簡 48 爲收降部候長和候史某年四月的日迹簿，其中記錄了當月丙午日有胡虜二

① 簡號 310·25A，實爲 317·25 之誤。

② 《史記·鄭當時傳》裴駰《集解》引臣瓚語。

十餘人將日迹卒趙蓋眾擄走的情況。簡 49 和簡 50 記齋、牛子、赦三人偷越天田後，又用他們隨身攜帶的木杖將痕迹抹去以掩蓋事實。簡 51 是追捕名叫利的逃亡奴隸的文書。簡 52 前半段記錄日迹工作的艱苦，後半段記錄候長、候史因屬下戍卒不如實反映日迹情況而受到連坐。

7. 對日迹人員的獎賞

漢代邊塞環境惡劣，嚴寒、酷暑以及常年風沙使日迹工作極其辛苦，比如：

簡 53 □檄□曰亭卒一人候望徼迹晝治天田人力不足□

敦·2017

簡 54 日迹行廿三里久視天田中目玄……

E.P.T51:411

為此，漢政府對從事日迹活動的士吏、候史、候長進行額外獎賞，並以令的形式作了明確規定，比如：

簡 55 北邊絮令第四北邊候長候史迹二日當三日

562·19

其中，簡 53 記錄了邊塞戍卒日常工作的三個方面，即候望、日迹與劃天田，這三項工作不是一個人所能勝任的，因此可能會要求採取對應措施，增添人手。簡 54 記錄久視天田，日迹人員會出現頭暈目眩的現象。可以想見，在夏天酷暑高溫的戈壁、沙漠中，日迹人員頭頂烈日，腳踏熱沙，異常艱苦。簡 55 記以絮令的形式對從事日迹活動的候長、候史作出獎賞規定，“候長候史迹二日當三日”。“日”是“勞”的單位，而“勞”和“功”則是漢代記錄官吏政績的標準，或以為一功相當於四年之勞。絮令所謂“候長候史迹二日當三日”，意指候長候史每日迹二日則計為勞三日，也即每日迹二日，就賜勞一日。相關的簡文如下：

簡 56 □建昭元年十月旦日迹盡二年九月晦日積三百八十三日以令賜勞六月十一日半日……

145·37

簡 57 五鳳三年十月甲辰朔甲辰居延都尉德丞延壽敢言之甲渠候漢彊書言候長賢日迹積三百廿一日以令賜賢百六十日半日謹移賜勞名籍一編敢言之

159·14

除上述獎賞規定之外，對於不按規定從事日迹活動的行為也要嚴懲。這一點敦煌懸泉漢簡中有所反映：

簡 58 候史王宗坐不日迹，耐爲□

V92DXT1812②：328

“耐”，相對肉刑而言，是一種比較輕的處罰，不傷及人的肉體。《說文解字》段注稱“耐之罪輕於髡。髡者，髡髮也。不髡其髮，僅去須鬣，是曰耐”。^①本簡殘斷，無法知道確切的處罰。《漢書·文帝紀》蘇林注：“一歲爲罰作，二歲以上爲耐”。^②漢代有“耐爲司寇”、“耐爲隸臣妾”、“耐爲鬼薪白粲”等刑名。居延漢簡比較常見的處罰是“適”，“適”是一種勞役性質的處罰，一般適用於不認真履行職責的下級官吏。^③而“耐”的處罰顯然重於“適”，表明對於“不日迹”行爲的處罰是比較重的。

8. 關於“謹迹候”

由於“日迹”具有重要的防禦偵迹功能，因此凡是有緊急情況出現，有關方面都會要求邊境各處加強防禦、加強“日迹”，此即簡文中所謂“謹迹候”。“謹迹候”的要求通常見於“檄”類文書中，比如：

移檄明畫天田謹迹候□□□迹部□

203·29A

吏卒謹迹候望禁止往來行

278·6

候長各循行部嚴告吏卒明畫天田謹迹候常 □

E.P.T5:59

□ 吏卒明蓬火謹迹候吏各清□□

E.P.T 59:153

寫移疑虜有大眾不去欲并入爲寇檄到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驚烽火明天田謹迹候望禁止往來行者定烽火輩送兵便戰鬥具毋爲虜……

278·7A

三、日迹簿所揭示的信息

除了漢代邊塞防禦體系中的日迹巡邏制度之外，簡牘文書中的“日記簿”還傳遞出許多其他方面的信息。這些信息對於我們研究漢代歷史、解讀相關簡牘資料具有重要意義。

1. 部和燧的關係

已知部轄燧，通常一部下轄若干燧。但究竟哪些燧屬於哪一部呢？弄清這個問題需要多方面的材料支持。就目前的資料狀況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迹簿”。由於候長和候史的日迹範圍正是其所轄部的範圍，因此，“日迹簿”所記錄的某候長或候史日迹巡視的各燧，即歸此候長或候史所在的部統轄。所以“日迹簿”對於復原部與燧的關係極有幫

①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54 頁。

② 《漢書》卷四，中華書局，1983，114 頁。

③ 李均明：《居延漢簡“適”解》，《文史》第 32 期。

助，我們可以甲渠候官所轄的序數部、燧為例來證明這一點。根據簡文資料，甲渠候官下屬的序數燧共 38 個，從第一燧到第卅八燧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常見的序數部則有第四部、第十部、第十七部和第廿三部（甲渠候官所轄的萬歲部偶稱第三部，管轄序數燧的第一、二、三燧，但多數情況下稱萬歲部）。根據“日迹簿”的記錄，可以初步判定這些部和燧之間的統屬關係為：第四部轄第四至九燧，第十部轄第十至十六燧，第十七部轄第十七至廿二燧，第廿三部轄第廿三至廿九燧，第卅至卅八燧則屬於鉞庭部。相關簡文如下：

簡 59 候長武光候史拓 閏月辛亥盡己卯積廿九日日迹從第卅燧北盡鉞庭燧北界毋蘭

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52 : 82

簡 60 候長壽候史勝之 七月丙午迹盡乙亥積卅日日迹從第十燧南界盡第十六燧北界毋越塞天田出入

E.P.T56 : 22

簡 61 候長充候史誼 三月戊申積^①丁丑積卅日日迹從第四燧南界北盡第九燧北界毋蘭

越塞出入天田迹

E.P.T56 : 25

簡 62 候長□閏月……積□□日日迹從第廿三燧南界盡第廿九燧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候史□……丁未積□□日□□從第廿九燧□□盡第廿三燧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56 : 32

此外，“奉錢簿”也有助於判斷部與燧的統屬關係。根據“奉錢簿”可以判定：萬歲部下轄第一、二、三燧、萬歲燧、却適燧和臨之燧（E. P. T51 : 193）；臨木部下轄窮虜、木中、終古、臨木、望虜、武賢和毋傷燧（E. P. T51 : 409）；第四部所轄的燧除前面提到的序數燧外，還有一個實名燧即臨桐燧（E. P. T50 : 12）。

2. 判斷紀年

根據簡文所記月朔、干支日，可以推算其紀年。比如上引簡 59 至簡 62，各簡均記有月份、月份的起止干支日和月的大小。大者每月 30 天，小者每月 29 天。根據月朔可推算出簡 59 的紀年為五鳳二年，簡 60 至簡 62 的紀年為甘露四年。推斷簡牘文書的紀年，除了依據月朔、月之大小和干支日之外，還可證諸有相關人名和職官名的紀年簡。比如，前引簡 59 提到“候史拓”，根據簡文所記月朔校諸陳垣《廿史朔閏表》，其紀年當為五鳳二年。而

① “積”應為“盡”，原簡誤寫。

簡 E. P. T5 : 47 “五鳳四年候史拓有劾”的記載，則可反證先前根據朔閏推斷的紀年結論是正確的。又如：

- 簡 63 吞遠候史李赦之
三月辛亥迹盡丁丑積廿七日從萬年燧北界南盡次吞燧南界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206 · 2
- 簡 64 第三燧
卒呂弘二月壬午迹盡丙申迹十五日
卒邳安世二月丁酉迹盡庚戌積十四日
卒橋建省治萬歲塢
凡迹積廿九日毋人馬越塞天田出入迹 214 · 118
- 簡 65
十月戊寅卒董益迹盡丁亥十日
十月戊子卒王相迹盡丁酉十日
十月戊戌卒王俱迹盡丁未十日
凡卅日迹毋越塞出入迹 257 · 19

按照朔閏表推演，簡 63 和簡 64 的紀年應該是建昭四年。而簡 65 與建昭四年、建平三年的干支均相符，但參照前二簡，其屬於建昭四年的可能性比較大。類似的簡還有：^①

- 簡 66 □候長充 六月甲子盡癸巳積卅日日迹從第四燧南界北盡第九燧北界毋越塞蘭出入天田迹 6 · 7
- 簡 67 候長武光候史拓 七月壬子盡庚辰積廿九日日迹從第卅燧北盡鉗庭燧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24 · 15
- 簡 68 九月己酉卒吾丘受迹盡丁丑積廿九日
九月庚戌卒董輔省作廿一燧
九月癸亥卒孫安世省作廿一燧
· 凡迹積廿九日毋人馬□ 145 · 33
- 簡 69 次吞燧 卒魯外人九月甲午迹盡庚申積廿七日省殄北

① 張俊民：《居延漢簡紀年考》，《簡牘學研究》第三輯，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卒滿常魯當時壽樂九月甲午迹盡癸亥積卅日

285 · 1

這些簡因為記有比較完整的月朔晦，根據朔閏表可以斷定：簡 66 的紀年為甘露元年，簡 67 為五鳳二年，簡 68 為建昭四年，簡 69 為初元元年。

3. 校補簡牘釋文

秦漢時代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文書制度，比如對不同類型的文書都有相應的格式規定，這一點可從下述兩個方面得到證明：一是有不少純粹的文書格式簡的存在，比如前引簡 9。二是簡牘所見各類應用文書都是遵照一定的程式寫就的，乃至許多用語都是固定的，比如未發現異常情況的日迹結果都表述為“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候長、候史“日迹簿”都包括官名、人名、月份、干支、日期、日迹方向、日迹範圍等要素。依據各種文書格式，我們就可以對相應的文書簡的釋文進行校補。比如前引簡 62 即可補釋為：

候長□ 閏月己卯盡丁未積廿九日日迹從第廿三燧南界盡第廿九燧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候史□ 閏月己卯盡丁未積廿九日日迹第廿九燧北界盡第廿三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56:32

又如：

| | | |
|------|-------|--------|
| 簡 70 | □□□日迹 | 戊寅十一日迹 |
| | 甲戌七日迹 | 己卯十二日迹 |
| | 乙亥八日迹 | 庚辰十三日迹 |
| | 丙子九日迹 | 辛巳□□□□ |
| | 丁丑十日迹 | 壬午□□□□ |
| | | 癸未□ |

219 · 15

原來的釋文爲了保持簡牘實況，並沒有進行推演。但按照文書格式，簡文中未釋之處可以分別補釋為“癸酉六”、“十四日迹”、“十五日迹”。

說“有方”與“方”

——從《由漢簡“方”與“幡”看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一文談起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張小鋒

內容提要 漢簡中所記的“有方”與“方”是指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有方”為漢代之兵器，它是側出小枝近乎硬折向上的戟，至遲出現在西漢中後期；“幡”是指一種旗，多用於軍事；“畫方矢”未見諸史籍，漢簡僅有一見，很可能是箭矢之一種。這三者均與邊卒的日常文化學習或書寫記事無多大關係。將“有方”中的“方”理解為書寫工具、將“幡”理解為拭“觚”或“方”之布，將“畫方矢”理解為在方上書寫的工具，均是不正確的。在漢代，方和觚雖均為書寫之材料，但二者之間的差別十分明顯。

關鍵詞 有方 幡 畫方矢 方 觚

近年來，學界對漢代戍邊吏卒的文化生活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收穫。^①《由漢簡“方”與“幡”看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②就是一篇探討漢代邊卒文化學習的佳作，它使人們對各種文獻資料中記載十分匱乏的漢代邊卒的實際生活，有了更為深入和真切的認識。但從該文引用的材料和論述過程來看，文章對漢簡中記載的“有方”、“幡”、“畫方矢”及“方”與“觚”等的認識，尚有模糊之處，而這些認識在學

① 代表性的論著有：邢義田《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三》，載《簡帛研究》第2輯；李振宏《吏卒社會生活研究》之三《屯戍吏卒的精神文化生活》，見氏著《居延漢簡與漢代社會》，中華書局，2003，111—131頁，等等可參看。

② 陳曉鳴：《由漢簡“方”與“幡”看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

界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擬對此問題做一探討，不妥之處，祈望方家指正。

一、問題的提出

爲了敘述方便，茲贅引一段原文：

漢簡中關於“方”與“幡”的記載頗多。據《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以下簡稱《合校》）和《居延新簡》中所收錄的簡文有如下列：

| | |
|-------------------------|-----------------------|
| □持有方一劍一 ● | 7 · 25 |
| 第廿五車父平陵里辛盈川……有方三……新幡十…… | 10 · 37 |
| 驛北亭卒東郡博平□里皇歸來 有方一 新干幡各一 | 14 · 2 |
| 俱起燧戍卒樂得成漢里徐偃 有方一 | 33 · 12 |
| ■臨木隧卒有方一完 | 163 · 15A |
| □有方六 盾六 劍六 東部 | 232 · 28 ^① |
| 戍卒東郡清世里鞠財有方一完 | E. P. T51 : 111 |
| 戍卒魏郡鄴安眾里大夫呂賢 有方一完▲ 橫一完 | E. P. T51 : 113 |
| 戍卒東郡須昌上里徐何有方一完 | E. P. T51 : 372 |
| □可置 有方一完 | E. P. T51 : 592 |

何謂“方”？許慎《說文解字》：“方，并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凡方之屬皆從方。”這祇是從形制上對“方”加以解釋，并未具體指爲何物。然考諸文獻，“方”是作爲書寫工具來用。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司空》載：“令縣及郡取柳及桼（柔）可用作書者，方之以書，毋方則用版。”“方”作爲書寫工具在秦代業已較爲普遍。

至漢代，“方”作爲書寫工具和觚并行，且兩者已無甚差別。《史記·酷吏列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觚，方。”何謂“觚”？《急就篇》顏師古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蓋簡屬也。”也就是說兩者本同爲書寫工具。《急就篇》段玉裁注：“按觚以學書或記事，若今書兒及貿易人所用粉版，既書可拭去再書，揚雄齋油素四尺亦謂素之可拭者再書也。”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則認爲“并則爲方，折則爲觚，本是一物”。而簡文之“幡”，則是作爲拭“觚”或“方”之布。許慎《說文解字》：“幡，書兒拭觚之布也，從巾番聲”；《急就篇》段玉裁注：“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苦，按苦謂之鑰，亦謂之觚，蓋以白塼染之，可拭去再書，其拭觚之布曰幡。”

① 該簡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一書編號爲 232 · 31，文物出版社，1987，381 頁。

無怪乎在漢簡中記載士卒物品時一般均是“方”、“幡”并記。可見“方”、“幡”作為日常文化學習或記事書寫工具，在漢代廣為採用。

……

作為日常書寫工具“札”多用於戍所的日常工作記錄，多出現在烽燧物品記錄之中，如前引《合校》之 7·8 和 10·9 即是；而“方”則為戍卒私人習字或記事之用。因此，漢簡中關於士卒對象記載中多見“方”而不見“札”，如前引《合校》之 10·37 和 14·2 等等。

既有方、札、簡等物存在，漢代邊兵用來書寫主要有畫方矢、筆、墨等物。畫方矢：《合校》498·14A, B: “田卒淮陽郡翼堂邑上造趙德……畫方矢——……。”畫方矢，就是在方上書寫的工具。畫方矢，類似刻書刀一類的工具。……畫方矢、筆、研、墨作為書寫工具之用似無可疑。^①

上引文字，似可歸納出這樣一些觀點：第一，漢簡中關於“方”的記載頗多，上引 10 例簡牘材料就是例證。第二，到了漢代，“方”與“觚”兩者并行且已無甚差別。第三，“方”為戍卒私人習字或記事用的書寫工具。第四“幡”為拭擦“觚”或“方”的布，所以漢簡中記載士卒物品時一般均是“方”、“幡”并記。第五，同為書寫工具，“札”多用於戍所的日常工作記錄，而“方”則為戍卒私人習字或記事之用，這就是漢簡中關於士卒對象記載中多見“方”而不見“札”的原因。第六，“畫方矢”是類似刻書刀一類的工具，是邊兵用作書寫的工具之一。事實上，這些論述，皆經不住推敲。理由是：

其一，引用 10 例簡中，“方”字之前總有一個“有”字，這使人不得不考慮，“有方”很可能是一個名詞，而不能斷章取義的將“有”與“方”分開來理解。這樣的例證很多，如 40·5 簡載：“●右鄣吏弩十二，有方六，五三石，矢三百。”^②如果將“有”與“方”分開，即將“有”理解為動詞，將“方”理解為名詞，那麼這句簡文就變得難以理解了。事實上，若將“有”與“方”分開理解，前揭引文中所引例二的簡文內容也同樣難以理解。該簡原文為：

第廿五車父平陵里辛盈川

| | | | |
|------|-----|-----|------|
| 官具弩七 | 紺胡一 | 弩幡九 | 承弦十四 |
| 承弩二 | 由度一 | 蘭七 | 私劍八 |
| 有方三 | 新干十 | 蘭冠七 | |

① 陳曉鳴：《由漢簡“方”與“幡”看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史學月刊》2004 年第 6 期。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69 頁。

棗矢三百五十 新幡十 服七

棗室千五十

10·37^①

此為居延漢簡中多見的“車父”簡之一，所載內容顯然皆為兵器。李均明先生標點斷句為：“第廿五車父平陵里辛盈川。官具弩七，承弩二，有方三，稿矢三百五十，稿室千五十，紺胡一，由皮一，靳干十，靳幡十，弩幅九，蘭七，蘭冠七，服七，承弦十四，私劍八。”^②無疑，李先生的斷句是正確的。

其二，眾所周知，秦漢之際，簡帛是主要的書寫材料，而簡牘的使用範圍則更為普遍。就簡冊而言，當時的書寫習慣是用筆蘸墨^③，將其書寫在簡牘之上。若書寫的內容有誤，或被書寫過的簡牘再次使用，常常是用書刀將筆誤的字迹或簡牘表面的文字輕輕削去。錢存訓在其《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一書中寫到：“表皮文字刮去之後，舊簡仍可用，名為‘削衣’。被刮去的表皮木片名為‘柿’，說文：‘柿，削木札樸也。’遇筆誤時，錯字可以刀刮去重寫。史坦因在敦煌曾發現為數上千載有文字的柿，都是古人在木簡上習字時，刮削木簡，以便再用的證明。1944年，前中央研究院亦發現載有文字的柿，顯然是‘書刀’刮削的遺迹。正如西洋羊皮退漬後，可供重寫一樣，簡牘亦可刮削後重複使用。簡上文字寫錯了，除可用刀刮削後再使用外，也可立即用水或口水塗抹掉墨字，然後再書寫正確的字。甘肅武威發現儀禮簡上就留有此種痕迹。”^④“簡牘可重複使用，祇要將舊簡表層的字迹刮掉，露出空白的層面，便可書寫新的內容。”^⑤也就說，簡牘表面的文字，通常不是用布拭去的，而是用刀刮去的。習字時也不應例外。事實上，用布也根本擦不去或擦不乾淨簡牘表面的文字。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日常書寫習字，發現錯字，也隨時用水抹掉，再重新寫上去，而不是用書刀刮削。東海尹灣漢墓出土簡牘就留有這兩種方法處理錯字的痕迹。”^⑥但這也僅是處理寫錯的字的一種權宜之計，並且也不一定是用布拭擦的。所以，將“幡”理解為拭“觚”或“方”之布，無論是從情理上，還是從史實上，都是說不通的。

其三，不可否認，今以西北屯戍遺簡觀之，其中確實有習字、習《倉頡篇》、《急就篇》的例證，甚至在屯戍遺址中也發現了筆、墨等實物。但漢代邊卒到底有多長的學習時間，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7頁。

② 李均明：《“車父”簡考辨》，載《簡牘學研究》（第二輯），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79—82頁。

③ 墨，包括黑色和紅色兩種，詳見錢存訓《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第八章《書寫工具》，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111—125頁。

④ 錢存訓：《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67—68頁。

⑤ 李均明：《古代簡牘》，文物出版社，2003，137頁。

⑥ 劉洪：《從東海尹灣漢墓新出土簡牘看我國古代的書籍制度》，載《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163—168頁。

他們到底有多能力購買、或有多大權力來支配多少枚素簡（即製作好的用來書寫的簡牘），從而用於專門的習字和文化學習，他們的文化學習是出自個人內心的需要還是軍營的特殊規定，等等問題，都需要進行審慎地探討。漢代邊卒的主要職責是戍守，戍邊期間的任務極為繁重，除守望亭隧、繕治鄣塞、巡視天田、傳檄郵書等之外，還因各自分工的不同，而承擔屯土營田、伐茭采薪、輸糧運水、造壑除沙等工作，不可能有很多時間，也不會有太多的心思去學習。筆者認為，探究漢代邊卒的文化學習很有意義，但應該對其有一個正確的估價，切不可任意誇大。

二、“有方”、“幡”與“畫方矢”

《韓非子·八說》篇云：“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墨子·備水》篇云：“并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有四方，必善以船爲幘輜。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方，十人，人擅苗。”對“有方”一詞，先賢已不明其義，多有誤解。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云：“舊注：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鉞不相稱適也。顧廣圻曰：適，讀爲敵。有方，未詳。舊注全偽。孫詒讓曰：‘有方’，當爲‘酋矛’。（酋、有音近，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奇猷案：顧讀適爲敵，是。此文蓋謂文德不敵武備。”^①孫詒讓《墨子間詁》云：“方，畢本作‘弓’，云：舊作‘方’，以意改。王云：‘擅與揮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詒讓案：《備蛾傳》篇云：令一人操二丈四矛，‘矛’誤作‘方’，則此方亦‘矛’之誤。‘有’疑當爲‘酋’，音近而誤。《韓非子·八說》篇云：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鉞，‘有方’亦‘酋矛’之誤，與此正同。此文疑當云：人擅弩，什四酋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酋矛。’‘什’、‘計’草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人執兵主擊刺。此云‘什四酋矛’，即四兵也。然則臨三十人，蓋擅弩者十八人，擅矛者十二人與？”^②而漢簡中屢見的“有方”一詞，則印證了《墨子》、《韓非子》記載的正確和孫詒讓等人理解的偏誤。漢簡中的“有方”一詞，除前揭引文所引10例外，又如：

[1] 乘與有方、矛、□戈囊刃三百八十七

……

有方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二

①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0頁。

② 清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墨子間詁》（下），中華書局，2001，547—548頁。

.....

有方□欽積十六萬三千二百五十一^①

[2] 第廿隧卒□丘定 有方一刀生 右卒兵受居延

311·2^②

[3] 六石具弩二完 蘭三完 積□

窮虜隧 三石具弩一完 蘭冠二完

弩帽三完 有方一完

囊矢銅鏃百五十完備

E·P·T53:3^③

[4] 新干廿七

新幡廿七

有方五

曲反三

522·4^④

從上引諸簡可以看出，有方常與戈、矛、弩、矢等物同時記載，有“刃”^⑤，且被明確載入“（武庫）兵車器集簿”，說明它很可能是一種武器，《居延新簡釋粹》認為有方為兵器^⑥的見解無疑是正確的。有方為何類兵器，其形制如何？初師賓先生在《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一文的注釋（1）中則寫道：“居延漢簡所見邊塞兵器，有弓、弩、矢、刀、劍、有方（戟），弓弩附件的蘭、帽、服、犢丸、承弦，盔甲類的鎧、鞬、鞬。此外，斬干、幡有時也列入兵器簿。”^⑦大庭脩先生亦將有方歸入長柄武器戈戟類^⑧，他們認為有方是戈戟類的兵器，連劭名則認為“有方就是戟”。^⑨然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出土實物，都證實了漢世“戟”的存在，漢簡中也有戟、有方并載的例證，如“戟六千六百卅四、有方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二”^⑩。也就是說，在漢代，兵器“有方”與“戟”同時存在。那么有方與戟的區別何在呢？對此，學者鮮有論及。李均明先生認為：“有方，戟類長兵，旁枝伸出又上翹為鉤刺，戟刺與旁枝及上翹之枝刺之間三折成近似方形的兩個直角，故稱。集簿見有方78392件，存量甚多，無疑為實戰用器。”“戟與有方雖為同類，其旁枝之功能卻異，戟枝

①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見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②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506頁。

③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280頁。

④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640頁。

⑤ 刀字後常有“生”、“缺生”的記錄，于豪亮先生在《居延漢簡叢釋》一文中指出：“刃生”，為“刃主”之誤釋，“刃主”必是指刀刃生銹。“主”讀為荒，因為有奄、蒙、覆之義，引申為鏽。詳見氏著《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195頁。

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87頁。

⑦ 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142—222頁。

⑧ 大庭脩：《居延漢簡索引》，關西大學出版部，1995，293頁。

⑨ 連劭名：《居延漢簡中的有方》，《考古》1987年11期。

⑩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利勾拉與橫擊，而有方利前刺及叉擊。”^①這一論斷頗有見地，既道出了戟與有方之別的根本所在，也揭示了戟與有方之間的內在聯繫。也就是說，有方是戟發展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種類。

通常認為：“戟是中國古代一種將戈的勾、啄和矛的直刺功能結合在一起的格鬥兵器。”“戰國晚期開始，鋼鐵兵器逐步取代了青銅兵器，產生了鋼鐵戟頭，由於取消了青銅戈類兵器傳統的後內，故成為‘卜’字形。‘不’字形鋼鐵戟是步騎兵裝備的主要格鬥兵器，在西漢末，‘不’字形戟的形制又發生了變化，側出的小枝漸次向上彎曲，東漢以後則變為硬折向上，從而更增強了前刺的功能。至於原有的勾、啄功能，則隨著結構的變化而逐漸消失。”^②換言之，側出小枝硬折向上的戟，最早出現在東漢以後。今以簡牘記載證之，側出小枝向上彎曲或硬折向上的戟，最遲在西漢中後期就已出現。^③

儘管戟和有方同時存在，但不難發現，在出土簡牘中，無論是記載數量，還是記錄次數，戟都比有方少得多。^④這說明，兩漢之際，為了適應騎步兵已取代車戰而成為主要的作戰方式的這種變化，為了提高殺傷力，昔日主要用於車戰的可刺、可啄、可勾的戟，在形制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日漸突出了衝刺的功能，而弱化了啄擊功能，這也許就是大量出現有方的原因。^⑤“令人奇怪的是，（有方）這一名稱從不見於漢代文獻，所以逐漸湮沒無聞，不為後人所知。”^⑥至於有方一詞何以不見諸漢代乃至其後歷代的文獻記載中，尚待進一步探究。

幡，史籍屢載。《漢書》卷二十六《天文志》云：“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間，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載：“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縫（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對於“牡荆畫幡”，李奇注曰：“牡荆作幡柄也。”師古注曰：“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卷七十《陳湯傳》載：“明

①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見《尹灣漢墓簡牘綜論》，科學出版社，1999，86—120頁。

②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439—440頁。

③ “有方”，簡文雖常見，但有明確紀年的簡則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永始為西漢成帝年號，四年為公元前13年。

④ 西北屯戍漢簡中幾乎沒有戟的記載，而有方卻很常見。《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正面第五欄載：“戟六千六百卅四。有方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二。”見《尹灣漢墓簡牘》。

⑤ 楊泓先生在《中國古兵器論叢（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第2版，184頁）中論述西漢鐵戟的出現和形制變化的原因時指出：“在西漢，特別是對抗匈奴騎兵的戰爭中，騎兵成為軍隊的主力，自然迫切需要發展適用於騎兵戰鬥的長柄格鬥兵器。過去以鉤斫為主要功能的青銅戟，很適用於兩車錯轂時格鬥，但當雙方騎兵相對馳馬衝擊時，祇有借助快速衝刺的力量來加強兵器的效能，才能更有效地殺傷對手，如果像車錯轂時那樣橫揮兵器再回拉鉤斫，就完全不適用了。為了達到新的騎兵戰鬥的需要，戟在改變了質料以後也改變了形狀，由鉤斫為主改為前刺為主，而以戟枝橫擊和鉤斫為輔。這也是戟刺加長，而且刺鋒更加尖銳的原因。”其實，這段文字，也可看作是論述“有方”出現的原因。

⑥ 連劭名：《居延漢簡中的有方》，《考古》1987年11期。

日，前至致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陣。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陣，講習用兵。”卷七十二《鮑宣傳》載：“宣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卷四《文帝紀》載文帝二年五月詔有“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語，應劭注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卷十《成帝紀》載：“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如淳注曰：“合軍聚眾，有幡校擊鼓也。《周禮》校人掌王田獵之馬，故謂之校獵。”師古注曰：“如說非也。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耳。《校人》職云‘六廐成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之幡旗雖有校名，本因部校，此無豫也。”很顯然，幡是指一種旗，多用於軍事。今出居延漢簡和尹灣漢簡皆有記載。如：

[5] □九枚幣謹遣尉史承祿齋弩新幡詣府

57·11^①

| | | |
|---------|----------|----------|
| [6] | 候史一人 | 六石具弩二—— |
| 甲渠武賢隧 | 隧長一人 | 弩幡二—— |
| | 卒四人 | 囊矢百—— |
| 北到誠北隧四里 | 凡吏卒六人 | 蜜矢五百五十—— |
| | | 服三—— |
| | 蘭蘭冠各二—— | |
| | 糸承弦十—— | |
| | 臬長弦五—— | |
| | 革甲鞬轡各四—— | |
| | 靳干幡各四—— | |

99·1^②

[6]乘與幡胡鋸齒六百□

……

幡胡□□鋸齒十六萬四千一十六^③

可以看出，“幡”常與“胡”、“靳干”等并載，說明它們是同類的事物。其具體差別，于豪亮先生在《居延漢簡釋叢》一文中指出：“曲繕就是曲旃”，“曲旃就是有著彎

①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0頁。

② 同上，164頁。

③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見《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曲大柄的旗”，“居延漢簡常常把靳干、幡、胡放在一起敘述，表明這三者是一件器物的三個組成部分，其形狀在西周的金文中還可以看到。《金文編》中西周金文中的‘旅’字和‘旂’字，像人舉大旗之形，豎立的是靳干，靳干上飄起的部分是幡，幡的下面窄而長的部分便是胡”。^①

“畫方矢”，史籍未見，漢簡僅有一見，其義難明。大庭脩先生將其歸入投射武器“矢”類^②。矢，也稱為箭。《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周已有“六弓四弩八矢”之分，其形制、用途、名稱各異。^③秦漢以降，隨著戰爭進程的推進和軍事技術的不斷提高，弓弩與箭矢殺傷力日漸增強，且種類日漸繁多。揆諸漢簡，箭、矢之名并用^④，且已有數十種之多^⑤。許多漢簡中出現的箭矢名稱，史籍闕載，它們之間的差別也一時難以辨明。但是，按照漢語習慣並結合該簡出土於西北屯戍邊境的事實來推斷，“畫方矢”很可能是箭矢之一種，是邊兵用來防禦的武器之一，而不可能是用來書寫的工具。大庭脩之論，值得肯定。

三、方與觚

簡牘之形制，名目繁多，對此學者已做了較多的探究^⑥，方與觚則是指兩種形制不同的簡牘，二者之間的區別十分明顯。

《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簡牘”條云：“根據已發現的簡牘形制，可以分為五種”，即簡、牘、觚、檢、楬。薛英群先生認為：“居延簡牘，若按其本身書寫名稱區別，有槧、檢、檄、札、冊、符、傳、柿、以及觚等。”^⑦何雙全先生《居延漢簡研究》一文將1973—1974年甲渠候官所出土的七千餘枚簡牘分作四類七種，即“A類：1簡，2牘，3觚。

① 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172—175頁。

② 大庭脩：《居延漢簡索引》，297頁。

③ 《周禮·夏官·司弓矢》：“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林尹注譯《周禮今注今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331—332頁）注曰：“八矢：枉矢、繁矢、殺矢、鏃矢、矰矢、莠矢、恒矢、庫矢也。枉矢、繁矢可以火著箭頭頸，射往敵營，殺矢、鏃矢、箭頭較重，宜於近射，力銳中深，殺傷力頗大，中者多死，矰矢、莠矢，前部較輕，以生絲繩系於箭末，用以升高射取飛鳥。恒矢、庫矢前後輕重平均，其行較平穩，用以禮射習射等。”

④ 如《永元器物簿》，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11—213頁。李均明先生指出：“但尹灣漢墓及西北屯戍遺簡所見，簡多稱為‘矢’，極少稱為‘箭’。”見氏著《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器器集簿”初探》，載《尹灣漢墓簡牘綜論》，86—120頁。

⑤ 如茹矢、弩矢、畫方矢、雕郭矢、蚩矢、陷堅蚩矢、槁矢、茹尖槁矢、陷堅槁矢、雕郭槁矢、稿蚩、竹箭、弩箭、盲矢銅鏃箭、羊頭銅鏃箭等，詳見大庭脩：《居延漢簡索引》，297—299頁。

⑥ 如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載《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第四章《簡牘制度》，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劉洪《從東海尹灣漢墓新出土簡牘看我國古代的書籍制度》，載《尹灣漢墓簡牘綜論》，163—168頁；胡平生《簡牘制度新探》，載《文物》2000年第2期，等等。

⑦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127頁。

B類：4檢，5緘。C類：6簽。D類：7檣”^①。這些分類當中，並未出現“方”之名，事實上，方是被歸入牘類之中。《春秋·序》孔疏云：“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并容數行。”^②《儀禮·聘禮》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賈疏云：“名者，即今之文字也。……方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板也。”^③《儀禮·既夕禮》曰：“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注云：“方，板也。……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④李均明先生在其《古代簡牘》中指出：“制牘材料稱‘方’、‘板’或‘版’，……以上所見方、板、版互訓，當屬一類。但據《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則‘方’與‘版’當稍有區別。”^⑤儘管學者對於方、版、牘之間的區別，並未做更詳盡的辨析。但據此可見，學者通常將方歸入牘類。有學者認為，根據書寫需要，簡牘的寬度可增加，“這種增寬的簡牘，很可能使寬度與長度幾乎相等，近於方形。古人稱這種簡牘即為‘方’”^⑥。一尺見方的板曰“方”^⑦。筆者認為，方可能是比較寬的牘，可正反兩面書寫。

觚，本作𣪠，《說文》：“𣪠，棱也。從木瓜聲。”段玉裁注曰：“𣪠與棱二字互訓，爰以積行八觚，觚當作𣪠，觚行而𣪠廢矣！《通俗文》曰：‘木四方為棱，八棱為𣪠。’”^⑧顏師古注《急就篇》云：“觚，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漢書》卷二十一《律曆志上》載：“其演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棱也。”卷九十《酷吏傳》載：“漢興，破觚而為圓，斫珣而為楮，號為網漏吞舟之魚。”孟康注曰：“觚，方也。”《史記》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傳》載“漢興，破觚而為圓”，《索引》引應劭曰：“觚，八棱有隅者。”據此可知，觚是多面體，可多面書寫。有六棱形觚、八棱形觚。“一根圓木條，削出一個面，可以寫一行字，削成三個面，四個面，甚至更多一些就可在一枚簡牘中容下更多的字，這種多面體的簡牘，可以稱為‘觚’”。^⑨從出土實物可知，觚有三棱^⑩、四棱^⑪、五棱^⑫、七棱^⑬等，其多面皆可書寫。

① 何雙全：《居延漢簡研究》，載《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二號），蘭台出版社，1996，31頁。

②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1704頁。

③ 同上，1072—1073頁。

④ 同上，1153頁。

⑤ 李均明：《古代簡牘》，文物出版社，2003，137—138頁。

⑥ 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27頁。

⑦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130頁。

⑧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68頁。

⑨ 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29頁。

⑩ 如敦煌馬圈灣發現的三棱觚，其截面多為等腰三角形，詳見《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簡報》，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⑪ 如12·1簡，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0頁。

⑫ 如E·P·T14：7簡，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62頁。

⑬ 如玉門花海出土的七面棱形觚，詳見《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載《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可見，方和觚雖均作為書寫之材料，但二者之間的差別十分明顯。學者所云“至漢代，‘方’作為書寫工具和觚并行，且兩者已無甚差別”之論，是不甚嚴密的。

綜上所論，有方為漢代之兵器，但由於文獻中的相關記載甚少，導致後人產生誤解。漢簡中大量關於有方的資料，證明《墨子》和《韓非子》的記載是正確的，而孫詒讓等人的理解有偏誤。有方是指側出小枝近乎硬折向上的戟，是戟發展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種類，它至遲出現在西漢中後期，從而修正了人們通常認為側出小枝近乎硬折向上的戟出現於東漢以後的看法。這種兵器比起以前適用於車戰的既可鉤斫又可直刺式的戟，其前刺功能更為突出，從而更適用於騎兵作戰。幡是指一種旗，多用於軍事；“畫方矢”未見諸史籍，漢簡僅有一見，它很可能是箭矢之一種，是邊兵用來防禦的武器之一，這三者均與邊卒的日常文化學習或書寫記事無多大關係。方和觚雖均為書寫之工具，但二者之間的差別十分明顯。方可能是比較寬的牘，可正反兩面書寫，而觚是多面體，可多面書寫。

漢代的家貲與貲家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于振波

內容提要 兩漢時期影響家貲評定的因素，除了有關官吏“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等各種人為因素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客觀因素。估計在一般情況下，官府在登記、評估家貲時，大概祇注重大宗的財產，不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貲家的政治地位不高，屬於普通平民，因此與普通平民一樣，需要繳納賦稅、服徭役；另一方面，貲家在經濟上比較富裕，官府把一部分人確定為貲家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他們承擔更多的經濟負擔。

關鍵詞 家貲 貲家 戶等 爵位 官秩

“貲”又寫作“訾”，在漢代文獻及簡牘中多用來表示財產。在漢代，家貲的多寡，不僅關係到一家人的生活狀況、經濟地位，還關係到他們的賦稅和徭役負擔，乃至入仕和遷徙的條件。與家貲密切相關的“貲家”，有其特定的含義，他們在漢代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對貲家身份、地位的考察，有助於瞭解兩漢時期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狀況。

一、有關貲家的資料

貲家或訾家之稱，為傳世文獻所未詳。居延漢簡中保存了很多由貲家（訾家、訾家）或貲家所雇之人（就人）運輸糧食的記錄：

入粟大石二十五石 車一兩

輸甲溝候官 始建國五年六月 令史 受訾家當遂里王護

16·2

貲家安國里王嚴 車一兩 九月戊辰載就人同里時褒已到未言卿

267·16

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訾家茂陵東進里趙君壯就人肩

水里鄧宗

E.P.T59:100

出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訾家昌里齊憲就人同里陳豐付吞
遠置令史長

E.P. T59:175

☐亥甲渠掾譚受訾家平明里高護就☐

154·5

☐受訾家延壽里上官霸就人安故里譚昌

214·125

☐☐掾譚受訾家利上里崔廣

E.P.T7:4

吏及訾家所載☐

E.P.T7:17

所受適吏訾家部吏卒所輸穀車兩

E.P. F22:364

☐居攝二年正月甲午倉嗇夫戎付訾家平☐里☐☐

E. P.T43:65

發訾家車牛載輸候官第☐

E.P.T50:51

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就人戶籍均在西北邊塞本地^①，而貲家則不然，例如簡 E. P. T59:100 中的貲家為茂陵人。在漢簡中尚未見貲家從事其他活動的記錄，也沒有提到貲家的爵位、官秩或其他身份。陳直先生認為“人民家財可以出緡算之人，稱為貲家”。^②值得注意的是，貲家自己出車、牛及人力為官府運輸糧食，尤其是貲家僱人從事這項勞動，一方面說明此項勞動是無償的，屬於徭役性質，另一方面說明貲家有一定財力。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徭律》規定：

發傳送，縣官車牛不足，令大夫以下有訾（貲）者，以貲共出車牛及益，令其毋訾（貲）者與共出牛食、約、載具。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諸有除者，縣道勿敢誅（徭）使。節（即）載粟，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補繕邑☐，除道橋，穿波（陂）池，治溝渠，塹奴苑；自公大夫以下（？），勿以為誅（徭）。^③

① 王子今：《關於居延“車父”簡》，《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279—299頁。

② 陳直：《算收家貲與官吏考績之得算負算》，收入《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29頁。

③ 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188頁。

在這裏，承擔“傳送”（物資運輸）徭役的人包括“有訾者”和“毋訾者”。在官府車、牛不足的情況下，“有訾者”還要負責提供價值較高的車輛及畜力，而“毋訾者”則提供飼料以及運輸用的輔助工具。上述居延漢簡中的有關記錄，應該就是這一規定具體實行的例證，其中的“貲家”與這裏的“有訾者”大體屬於同一性質。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條法律規定中，承擔“傳送”徭役的人，只涉及爵位在大夫以下者，且不包括“吏及宦皇帝者”。如果說此處的“有訾者”相當於居延漢簡中的“貲家”，那麼，“貲家”一詞便不是一個單純表示家庭財富的經濟概念，而是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含義。換句話說，“貲家”必須具有一定的財產，同時又不享有免除賦稅徭役的特權。因此，考察漢代的貲家，一要瞭解貲家與家貲的關係，二要瞭解貲家與賦稅徭役的關係，而賦稅徭役負擔又與戶主的身分地位密切相關。

二、漢代家產的計貲範圍

顧名思義，“家貲”即家庭財產。勞榦先生指出：“漢世算貲之目見於文獻中，今有漢簡為證，則不動產所有者為田及宅，而動產中所有者為奴隸、車（牛車及輅車）、牛、馬，其他用具衣物，則不在算訾之中。”^①黃今言先生認為，“當時凡論及家訾者，多指其全部的家產”，既包括貨幣財富，也包括實物財富，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有時甚至衣服釜鬲一類的生活資料，也列在計訾的範圍之內”。^②

考諸史實，漢代計貲的實際情況儘管因時因地而存在著很大不同，但大體上與勞榦所言比較接近。例如居延漢簡中的徐宗簡：

三壙燧長居延西道里公乘徐宗年五十

| | |
|-------|----------------------|
| 妻 | 宅一區直三千 |
| 子男一人 | 田五十畝直五千 |
| 男同產二人 | 用牛二直五千 |
| 女同產二人 | (24·1B) ^③ |

①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冊，1959，337頁。

② 黃今言：《漢代的訾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③ 據日本學者永田英正考證，原簡文字當如此。見〔日〕永田英正著、姜鎮慶譯《論禮忠簡與徐宗簡——平中苓次氏算賦申報書說的再探討》，載《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35—37頁。本文所引居延漢簡，如未特別注明，均來自：(1)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該簡所登記的家貲，包括田、宅、牛三項，計 1.3 萬錢。然而，居延漢簡中還保存著有關徐宗的其他記錄：

三壩燧長徐宗 自言故霸胡亭長寧就舍錢二千三百卅數責不可得（3·4）

燧長徐宗 自言責故三泉亭長石延壽錢少二百八十數責不可得（3·6）

上述二簡表明，徐宗出租房屋，還出賣飼草（茭），其全部家貲，當不止 1.3 萬。陳直先生對此已有論述。^①還有一枚衆所周知的“禮忠簡”（37·35），也祇登記奴婢、車、馬、牛、田、宅幾項，“凡皆直十五萬”。禮忠比徐宗富裕得多，根據徐宗的情況判斷，禮忠的全部家貲恐怕也不限於此，祇是沒列入計貲範圍而已。

東漢和帝永元五年（93）二月丁未詔曰：

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核，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②

從這個詔令中不難看出，“以衣履釜鬻爲貲”不是通常的做法，因而受到皇帝的指責，並明令禁止。東漢安帝延光二年（123），大臣陳忠上疏：

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府庫單竭，杼袖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③

根據陳忠的說法，漢武帝（前 140—前 87 年在位）時“算至舟車，貲及六畜”也是權宜之策，不屬於正常的情况。

史載，東漢光武帝（25—57 年在位）時，劉平任全椒縣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④。爲了報答縣長劉平的德政，全椒百姓可以多申報家貲以便多繳納賦稅，既然如此，那麼，有些地方的百姓爲了逃避苛政而少申報家貲以便少繳納賦稅，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劉平的事例除了讓我們知道“爲政以德”的效果之外，還向

①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29 頁。

②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③ 同上書，卷八十八《西域傳》。

④ 同上書，卷三十九《劉平列傳》。

我們透露出當時家貲申報與評定過程中存在著大量隨意性因素。

又如，東漢末年，曹操任司空，“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①曹洪（子廉）是曹操的從弟，家富於財，譙縣縣令在評定家貲時，認為曹洪與曹操家貲相同，引起曹操的不快。可見官府所登記的家貲未必能夠與真實情況完全一致，能夠大體上反映出貧富差別來就已經很不錯了。

兩漢時期影響家貲評定的因素，除了有關官吏“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等各種人為因素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客觀因素。例如，有些貴重物品容易隱藏（如金銀、珠寶等等），戶主若不如實申報，官府未必知曉；而有些財產因為無法隱藏（如土地、房屋等等），不論價值高低，都被列入家貲評定範圍之內。^②有鑒於此，估計在一般情況下，官府在登記、評估家貲時，大概只注重大宗的財產，不是也不可能面面俱到。^③

三、貲家與戶等

關於貲家與財產的關係，還涉及戶等的評估。黃今言先生認為，“家訾不同，戶等有別。而戶等的差品，一般是由家訾的多少來評定的”，通過對漢代大家、中家和小家每年繳納貲算的數額進行估算，他指出：“這種戶等不同訾算有別的情況，大概就是賦稅制度中‘九品混通’的最早起源。”^④那麼，在漢代，貲家與大家、中家、小家之間是什麼關係呢？

三國與漢代在時間上前後相繼，走馬樓吳簡屬於孫吳前期的地方行政文書；^⑤吳簡中有上品、中品、下品、下品之下四個戶品名稱，與漢代的大家（豪富、富人）、中家、小家（貧民）、下貧（尤貧、貧不能自存者）等等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係。^⑥因此，吳簡所反映的戶品情況對研究漢代有關問題極具參考價值。遍查所公布之上萬枚吳簡，在登記戶籍的簡牘

① 《三國志》卷九《魏書·曹洪傳》裴松之注引《魏略》。

② 唐德宗（780—805）時，宰相陸贄陳時弊：“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困倉，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奸，驅之避役也。”在“以資產為宗”徵收賦稅的時代，資產的評估尚且存在這麼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兩漢時期家貲的評定就可想而知了。參見《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二》。

③ 南朝齊高帝蕭道成（479—482）時，竟陵王蕭子良上疏，指陳弊政，其中之一就是“守宰相繼，務在哀克，園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說明官府在評定家貲時過於苛細，是不得人心的。參見《南齊書》卷四〇《武十七王列傳·竟陵文宣王子良》。

④ 黃今言：《漢代的訾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⑤ 詳見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走馬樓 J22 發掘簡報》，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均載《文物》1999年第5期。本文所引走馬樓吳簡資料，如未特別注明，均出自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查），文物出版社，2003。

⑥ 參見于振波《漢調與吳調》，載氏著《走馬樓吳簡初探》，天津出版社會有限公司，2004，77—104頁；張榮強《吳簡中的“戶品”問題》，北京吳簡研討班《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190—202頁。

中，有一些對不同戶品的戶數分別加以統計的記錄。其中，關於上品戶數的統計，有如下幾條：

| | |
|--------|--------|
| ☑ 一戶上品 | (1365) |
| 其二戶上品 | (5324) |
| 其二戶上品 | (5492) |

關於中品戶數的統計，有如下幾條：

| | |
|------------|--------|
| 其六戶中品 | (5426) |
| 其九戶中品 | (5433) |
| ☑ 其二戶給庫吏中品 | (5472) |

關於下品戶數的統計，有如下幾條：

| | |
|-------------|--------|
| 右卅六戶下品 ☑ | (1238) |
| 右十三戶下品 ☑ | (1241) |
| 右廿六戶下品 ☑ | (1290) |
| 其卅二戶下品 | (5499) |
| 其一戶給度卒下品 | (5327) |
| 其七戶給郡吏下品 | (5447) |
| ☑ 其一戶給州吏下品 | (5452) |
| 其十二戶給縣吏下品 | (5467) |
| 其一戶給縣卒下品 | (5474) |
| ☑ 其十三戶給縣吏下品 | (5648) |
| ☑ 其十二戶給郡吏下品 | (5677) |

關於下品之下戶數的統計，有如下幾條：

| | |
|-------------|--------|
| ☑ 其八十四戶下品之下 | (5319) |
| ☑ 五十戶下品之下 | (5445) |
| 其一戶給鍛佐下品之下 | (5429) |

- 其一户給三州倉父下品之下 (5435)
- ☐ 其 ☐ 户 ☐ 給 ☐ 鍛佐下品之下 (5440)
- ☒ 其一户給度卒下品之下 (5490)
- ☒ ☐ 其 ☐ 户 ☐ 給 ☐ 吏下品之下 (5602)

將上述諸簡中的有關數字累計，上品計有 5 戶，中品計有 17 戶，下品計有 154 戶，下品之下計有 139 戶。上品與中品合計尚不及總戶數的 10%。儘管這樣統計的隨機性很強，且有重復計算的可能，存在很大誤差，但至少可以據以做出這樣的推測，即當時下品和下品之下兩個戶等占總戶數的大多數。而這樣推測也有其他史料作為參證，如漢景帝後二年（前 142）五月詔曰：

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憐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算，十萬也。”）^①

漢景帝之所以把爲吏的財產資格由十萬錢降低到四萬錢，說明家貲達到十萬錢的民戶在當時所占比例不高。家貲十萬（十金）在漢代被視爲中家之產^②，據此，我們認爲，從戶數上說，漢代是一個以小家爲主的社會，中家以上的戶數只占總戶數的一小部分。

筆者曾經考察過居延漢簡中燧長和候長的經濟狀況。一般而言，燧長多出自小家，收入微薄，生活貧寒；而候長多出自中家，對於家貲在十幾萬錢的家庭而言，其收入較小家爲多，經濟雖不富裕，尚能維持溫飽。^③家貲越高，也就意味著擁有更多的田宅、奴婢和牲畜，因而會有更多的收入來源，生活也更富足。因此，從財產的角度看，漢代的貲家大體上應該在“中家”以上，而那些貧民、尤貧乃至貧不能自存的“小家”不太可能成爲“貲家”。

四、貲家與爵位

我們知道，賦稅、徭役負擔之輕重與爵位的高低有關，爵位不同，享受的待遇也有別。根據前面所引《二年律令·徭律》的有關條文，承擔“傳送”徭役者是爵位在大夫以下的

① 《漢書》卷五《景帝紀》。

② 《史記》卷十《孝文本紀》。

③ 于振波：《居延漢簡中的燧長和候長》，《史學集刊》2000 年第 2 期。

人。其中提到“乃發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也要負擔修橋補路等勞役。衆所周知，秦漢時期實行傅籍制度，達到一定身高或年齡的男子需要傅籍，有義務承擔國家的徭役和兵役。《二年律令·傅律》規定：

不更以下子年廿歲，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及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年廿二歲，卿以上子及小爵大夫以上年廿四歲，皆傅之。^①

也就是說，爵位越低，傅籍越早。年齡在 15 歲以上者雖然沒有達到傅籍年齡，但已具有一定勞動能力^②，因而也被徵派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之所以徵發“公大夫以下子”，是因為《二年律令》有如下規定：

《二年律令·置後律》：疾死置後者，徹侯後子爲徹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子、良人？〕子。關內侯後子爲關內侯，卿〔侯〕〔後〕〔子〕爲公乘，〔五大夫〕後子爲公大夫，公乘後子爲官大夫，公大夫後子爲大夫，官大夫後子爲不更，大夫後子爲簪褭，不更後子爲上造，簪褭後子爲公士，其毋適（嫡）子，以下妻子、偏妻子。^③

《二年律令·傅律》：不爲後而傅者，關內侯子二人爲不更，它子爲簪褭；卿子二人爲不更，它子爲上造；五大夫子二人爲簪褭，它子爲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爲上造，它子爲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爲公士；不更至上造子爲公卒。^④

“後子”可以理解爲首位繼承人，通常情況下爲嫡長子。根據上述律文，在二十等爵中，除徹侯和關內侯可以由後子原封不動地繼承而外，爵位都實行降等繼承。對於公大夫而言，其後子繼承大夫之爵，其他子嗣只能繼承上造、公士之爵。比公大夫爵位更低的人，其後子及其他子嗣所繼承的爵位也更低。由於“公大夫以下子”所繼承的爵位最高不會超過大夫，已傅籍者固然要承擔傳送之徭，雖未傅籍而年齡在 15 歲以上者，也要承擔與傳送有關的較輕的勞役，其原因或在於此。

①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82 頁。

② 漢代年齡在 14 歲以下統稱爲“小”（其中，6 歲以下爲“小”，7—14 歲爲“使”），而 15 歲以上者統稱爲“大”。參見：(1) [日] 森鹿三著，金立新譯：《論居延出土的卒家屬廬名籍》，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100—112 頁；(2) Michael Loewe, *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 2, pp. 67—69。戰國時期齊國勞動力有“作”與“半作”之分，漢代有“使”與“大”之別，西晉占田式有“正丁”與“次丁”之目，都是根據年齡劃分的。參見于振波《筭與事——走馬樓戶籍簡所反映的算賦和徭役》，《漢學研究》22 卷第 2 期，臺北，2004 年 12 月，189—209 頁。

③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182—183 頁。

④ 同上，182 頁。

“傳送”祇是漢代徭役中的一種，這種徭役主要由爵位為大夫以下的人承擔，並不意味著所有徭役都由大夫爵以下的人承擔。漢高祖五年（前202）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①其中“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一語表明，官大夫（第六級爵）以下的普通平民，本來並不享受“復其身及戶”的待遇，祇是因為這些人是軍吏卒，有功於漢，作為對他們的慰勞，才特予優待。劉邦在詔書中一再強調第七級爵公大夫即為“高爵”，享有“食邑”，“令丞與抗禮”，據此推斷，當時貴家的爵位最高不會超過第六級官大夫。

朱紹侯先生指出，軍功爵自漢高祖劉邦以後，由於濫賜濫賣，趨於輕、濫，高爵的界限逐漸上移。經過文景時期及其後不斷地賜爵與賣爵，高爵的界限便由原來的公大夫、公乘而上移到第九級五大夫。^②漢文帝時，晁錯主張“入粟拜爵”，指出“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③漢武帝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④。與西漢初年相比，此時五大夫爵所享受的待遇也大不如漢初了。如果說西漢初年“貴家”爵位最高不過官大夫，則此時第八級公乘爵以下的民戶，只要家貲達到一定的數額，都有可能成為貴家。

五、貴家與官秩

由於漢代官秩與爵位已經開始分離，有爵者未必做官，做官者未必有爵，而官秩的高低也是影響徭役、賦稅負擔之輕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貴家與官秩的關係也很值得關注。前引《二年律令·徭律》中有“吏及宦皇帝者不與給傳送”一語，說明秩次達到某一級別以上的官吏便享受減輕或免除賦稅徭役的待遇，因而不被列為貴家。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賜律》：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裹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⑤

① 漢高祖五年詔，見《漢書》卷一下《高帝紀》。

② 朱紹侯：《軍功爵制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8—49、53—62頁。

③ 《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上》。

④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⑤ 《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173頁。

上述律文所列出的“吏”的最低秩次為斗食、佐史。尹灣漢簡《東海郡吏員簿》所列東海郡太守府、都尉府及各縣、邑、侯國、都官吏員人數時，只及斗食、佐史以上。^①廖伯源先生曰：

又《漢書·百官公卿表》述全國之官吏人數謂“吏員自佐史至丞相”云云，丞相為秩階最高者，佐史則秩階最低者，從最低至最高，涵蓋全部官吏員額。此條亦可證佐史為漢官最低級之秩階。^②

上述各例表明，漢代正式吏員只及斗食、佐史，而不包括里正、里父老之類的基層小吏。

有資料表明，官秩為斗食、佐史的吏員，以及不為正式吏員的里吏，等等，也要承擔一定的賦稅和徭役。漢昭帝（前86—前74年在位）時舉行的鹽鐵會議上，有賢良指出：“今小吏祿薄，郡國徭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③所言大概符合事實。史載，漢桓帝元嘉（151—153）年間，“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當時有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嚙胡。”其中，“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④有秩之秩次高於斗食、佐史，為百石吏^⑤，“調發重及有秩”被視為苛政，說明在一般情況下，有秩以上的官吏在賦稅、徭役方面享有較多的優待，而斗食、佐史以及不為正式吏員的里吏，則秩次越低，賦役負擔越重。^⑥儘管如此，斗食、佐史等基層小吏之地位畢竟略高於普通平民，而且本身已屬於職役性質，繁重的職役已使他們不堪重負，官府不必再將他們列為貲家而加重其經濟負擔。當然，由於史料缺乏，這樣推斷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① 參見(1)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79—81頁之《東海郡吏員簿》；(2)謝桂華《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3)廖伯源《漢代郡縣屬吏制度補考》，載氏著《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57—84頁。

② 廖伯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72頁。

③ 桓寬：《鹽鐵論·疾食》，《諸子集成》第8冊，上海書店據世界書局本影印，1986，37頁。

④ 《後漢書》志第十三《五行一》。

⑤ 參見《後漢書》志第二十四《百官一》“太尉”條；志第二十八《百官五》“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條。

⑥ 參見高敏《試論漢代“吏”的階級地位和歷史演變》，載氏著《秦漢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2，213—254頁。

六、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一方面，貲家的政治地位不高，屬於普通平民，因此與普通平民一樣，需要繳納賦稅、服徭役；另一方面，貲家在經濟上比較富裕，官府把一部分人確定為貲家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他們承擔更多的經濟負擔。這說明，僅僅擁有貲產而沒有相應的官秩或爵位，並不自然成為特權階級，甚至其貲產本身也是缺乏保障的。

《鹽鐵論·散不足》賢良云，秦始皇為求不死之藥，四處巡遊，“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①，這是賢良通過批評秦始皇來指責漢武帝的過失，因此，其中富人出錢，貧者出力的做法應該也反映了漢代的現實。南北朝時期，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其與秦漢時期的歷史淵源關係還是很明顯的。^②《二年律令·徭律》對於貲家（有貲者）的有關規定，大體上也體現了富者出錢，貧者出力的原則。

根據不同家庭的經濟狀況來攤派賦稅徭役負擔，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減免擁有較高官秩和爵位者的賦稅徭役負擔，本身就非常不公平，因為這些人手中集中了更多的財富。而且，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由於家貲的申報和評估中存在種種問題，官府所登記的家貲、戶等未必能夠與真實情況完全一致，以致各家賦役負擔與其實際的經濟地位未必相符。

另一方面，即使家貲評估完全做到了客觀公正，如果官府橫徵暴斂，超出百姓的實際承受能力，其後果也是非常嚴重的。例如《鹽鐵論·散不足》指出秦始皇巡遊無度的後果就是“小者亡逃，大者藏匿”。王莽時，“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③。東漢安帝永初元年，龐參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④

在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法生存的情況下，統治者的根基受到削弱，社會將面臨嚴重的危機。

① 《鹽鐵論·散不足》，35頁。

② 《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③ 《漢書》卷二十四下《食貨志下》。

④ 《後漢書》卷五十一《龐參列傳》。

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看孫權時期的 商品經濟狀況

◎ 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高 敏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流行東漢以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看法，全漢升先生即其代表人物之一。我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時，也多少受此影響，以致對三國時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估計不足。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出土以後，簡牘中有關吳國商品經濟的種種狀況，不能不使我們產生新的看法，本文就是根據三國吳簡對三國時期的商品經濟狀況的種種表現作出探索。

關 鍵 詞 三國吳簡 自然經濟 商品經濟

一、引言

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和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大都認為自東漢以後，商品經濟成分開始在我國古代社會衰落；到三國時期，商品經濟成分進一步下降，以致官府給各級官吏的俸祿出現了由現金支付到實物支付的轉變；國家對境內居民的租賦徵收，也相應地發生了由貨幣稅到實物稅的巨大變化；甚至連錢幣鑄造和流通也接近於全面停頓，形成了所謂“中古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時期，全漢升先生就是此說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者，罕有表示不同看法者。因此，寫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我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下冊，對三國時期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水

平的估計，就顯得有些不夠。自走馬樓簡出土並先後整理出版以後，事實迫使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不能不發生變化。例如，通過《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荊》，可以看到長沙地區的“吏民”普遍存在以錢幣向官府交納部分佃田租稅的事實；再通過《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又可以看到孫權時期仍在實行秦漢以來的以現金繳納的口錢、算賦制度，表明國家的賦稅徵收並未完全實物化；更可以看出孫吳政權的錢幣鑄造量和流通量都很龐大，給人以商品經濟相當興盛的感覺。為此，特作此短文，以示我對三國時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狀況的新認識，兼補上述拙作之不足。

二、孫吳時期長沙地區錢幣的大量存在和流通

都鄉謹列五十□億錢……□ (176)

錢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付庫吏殷連領與前所入合八十七萬八千□□斛五斗嘉禾元年 (1121)

平出錢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五錢雇元年所調布麻水牛皮并□ (1144)

□□五錢定合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五錢付庫吏殷連領□□ (1152)

錢五百萬□□ (2523)

斛詭課負者簿入錢卅萬八千一百米八十斛錢付縣吏 (4355)

右三月上承余新襍錢一百七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① (5167)

上面所列六支竹簡所載，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事實：臨湘侯國所在的長沙郡內，有儲存錢幣的由專門人主管的“庫”，而且錢幣儲存數量相當巨大。其他關於“入錢”若干、“出錢”若干的竹簡，不勝枚舉。以上例 176 號簡來說，雖是一枚殘簡，全簡的意思並非十分清楚，但從“都鄉謹列五十□億錢”的話來看，說明這個“都鄉”有儲錢五十億以上。所謂“都鄉”，按照秦漢之制，是指“設於國都或郡縣治所等城市內”的鄉而言，拙著《秦漢史探討》中的《秦漢“都亭”考略》一文，已對“都鄉”一名的涵義及其由來作了比較詳細的解釋。此處的“都鄉”，或是長沙郡郡治所在地之鄉，或是臨湘侯國治所所在之鄉。這個“都鄉”的儲錢，或屬於長沙郡，或屬於臨湘侯國所有，否則，一個鄉是決不可能有這麼多的儲錢的。據第 1121 號簡所云，知某一錢庫由庫吏殷連主管的錢幣多達“八十七萬八千”，數量也相當驚人。再據 1144 號簡所云：“平出錢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五錢雇元年所調布、麻、水牛皮并□”語，官府一次就支出錢幣 2211765 錢，自然還不是官府儲

① “右”上原有墨筆點記。又“新”下似脫“入”字。

存錢幣的全部。因此，從這些竹簡所載，可以確知長沙郡或臨湘侯國官府儲存了大量的錢幣，而且表明錢幣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的儲藏手段與支付手段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爲了發揮官府大量儲藏錢幣的流通手段的作用，官府還採取了一系列的便民措施。

出具錢八萬一千爲行錢八萬五錢二百九十五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 (5359)

出具錢三萬爲行錢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錢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 (5379)

右出行錢九萬五千二百九十五錢 (5462)

□□錢一萬四千爲行錢十二萬□千三百…… (5240)

右出行錢廿二萬□□□□ (5600)

□□□□今狩書言起正月一日訖六月卅日合領具錢□□□四千一百收除□□ (4374)

在此六簡所記內容中，多次出現了“具錢”與“行錢”兩個當時流行的關於錢幣的名稱，而且“具錢”與“行錢”之間有一個兌換的比例關係。特別是 5359 號簡與 5379 號簡所記都是以“具錢”兌錢爲“行錢”去購買“調布”，可見“具錢”之兌換爲“行錢”多發生於實際的交易之中，有便利交易的作用。從簡文中的“具錢”與“行錢”兌換的比例看，表現出“具錢”貴而“行錢”稍賤的跡象。根據上述“具錢”與“行錢”的這些特徵，可以想像出“具錢”是官府儲藏的錢中，具有完備性、合法性的錢幣；反之，價值稍賤的“行錢”，則有可能是不具有完備性和合法性的錢幣。再從“具”字的意義來說，它具有供置、備辦、完備、器具和才能等多種詞義，把它和錢幣結合起來考慮，“具錢”應當是比較完備的優質錢幣，“行錢”則應當是不甚完備的劣質錢幣，故于振波同志認爲：“把‘具錢’理解爲官方認可的標準幣（法幣），而把‘行錢’理解爲市面上流通的良莠不齊的貨幣，當與事實相去不遠。”^①根據漢代史籍謂當時流通的多有輕、重不等和翦鑿等情況去考察，我傾向於同意于同志對“具錢”與“行錢”的解釋，祇是“法幣”一詞過於現代化，且“行錢”雖良莠不齊，也是當時允許流通的貨幣，同時也是官府儲存的錢幣，如 5462 號簡所云“右出行錢九萬五千二百九十五錢”的話即可證。何況竹簡中關於“出行錢”的記述還有很多，而且數量比較巨大，如 5600 號簡云：“右出行錢廿二萬□□□□”便是例證。可見，

① 見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初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227—228 頁。

“行錢”的量還是多於“具錢”，那麼，“行錢”又何嘗不是“法幣”呢？

如上所述，可見孫吳政權之所以作出允許“具錢”與“行錢”同時并存，而且規定一個“具錢”與“行錢”兌換的比例，都是為了便於金屬貨幣的流通，以促進商品交易的發展。據于振波的計算，“具錢”與“行錢”的比價為 100: 104 到 105.3^①，其所以二者的比價不固定，也許正是“行錢”的良莠程度不同的情況決定的。這種比價的不固定，更有利於解決實際貿易中買賣雙方的許多實際問題。

如上所述，孫權統治時期的長沙地區，不僅官府對錢幣的儲藏量大得驚人，而且錢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流通量也很巨大；為了促進錢幣的流通，官府還專門為錢幣作出了“具錢”與“行錢”的區分，並規定了二者大致的比價以促進其流通。這些情況，顯然同自然經濟成分占支配地位的情況不符合。何況孫權統治的長沙地區，相對於孫權統治的三吳地區來說，顯然還是社會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比較落後的地區尚且如此，則孫權統治的整個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更與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的說法是不相容的。

三、孫權統治時期的長沙地區，以錢幣納稅的稅種繁多

說到孫吳政權的租稅種數，見於現存史籍者十分有限，而見於《嘉禾吏民田家莧》者，卻大有增加。雖然如此，仍祇限於租米、稅米、限米與布、錢之徵，較之《三國吳簡·竹簡·壹》所載，實大有遜色。見於《竹簡·壹》中的以錢幣納稅的稅種之有名可舉者，大致有如下一些：

(1) 口錢、算賦：關於這一稅種，可參閱《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看孫權時期的口錢、算賦制度》一文。

(2) “陶租錢”與“綯租錢”：

| | |
|--------------|--------|
| 入……一萬四千二年陶租錢 | (5215) |
| 入……一千八百二年綯租錢 | (5223) |
| 其八百二年綯租錢 | (5280) |
| 其一萬四千二年綯租錢 | (5279) |

此四簡所載，三個作“綯租錢”，一個作“陶租錢”，而“陶”與“綯”字義明顯不同，不能以“陶”為“綯”。查圖版，“綯”字與“陶”也不同，可見“陶租錢”不同於“綯

① 見前引書，225 頁。

租錢”。但二者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課之於手工業者的租稅。如果說“陶租錢”是課之於製陶手工業者的租稅，則“絢租錢”是課之於製繩手工業者的租稅。

(3) “市租”或“市租錢”：

| | | | |
|-----------------------|------|-----|----------|
| ……市租錢六百 | 嘉禾二年 | □ | (1395) |
| 入……一日……七月錢九月十一日市租錢……錢 | □ | ……□ | □ (3963) |
| □□市租錢三千二百 | | | (5271) |
| 承十二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市租錢十萬七千二百 | | | (5242) |
| 承二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市租錢一千八百 | | | (5332) |
| 領三月市租錢十一萬二千七百 | □ | | (9280) |
| 承正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市租錢三千三百 | | | (5376) |
| 其七萬一千三百二年市租錢 | | | (5317) |
| ……千二百六十市租租錢 | | | (5451) |
| □□市租錢一萬四千 | □ | | (5573) |

上述十枚竹簡，雖甚殘破，但“市租錢”之名目灼然可見，特別是5451號簡的“市租租錢”一名，表明“市租”是課之於市場的租稅。關於我國古代“市租”的徵收之制，起源甚早。《商君書·墾令篇》有“重關市之賦”的話，這裏的“關”即指關津之稅，“市”即指“市租”而言。入漢之後，齊國的臨淄城，還有“市租”的徵收，《漢書·高五王·齊悼惠王劉肥傳》就說“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顏師古注曰：“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可見漢代的“市租”是徵之於市場內部的商賈營業稅。三國時期吳國，在都城建康，孫權時曾設置“大市”、“東市”，孫休時又增設“北市”，詳見《太平御覽》卷827《資產部·市門》引山謙之《月陽記》。東吳既有專門市場的設置，就為市租的徵收創造了條件，故我曾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册第509頁指出：“東吳可能還有市租的徵收”，“祇是史書缺乏準確記載而已”。今證以吳簡所載，亦知此說不誣。

長沙郡的治所與臨湘侯國之所在地，史書雖無在此設置專門市場的記載，但從竹簡所載“市租”的徵收來看，孫權統治時期的長沙郡城或臨湘侯國治所也應有專門的市場設置。從5242號簡文來看，僅嘉禾二年除支出之外盈餘的市租錢就多達十萬七千二百錢，可見全年的市租徵收量必大大超過此數。至於“市租”的徵收辦法，由於簡文太殘而且簡數有限，無法確知，不過從3963號殘簡似可窺見市租是按月徵收的痕迹。孫權時期的市場，還有專人管理的情況，1247號簡有“入市吏李□所□……□”的話，即其例證。“市租”徵收量之多，正是長沙郡治所及臨湘侯國境內商業貿易興盛的反映，更是商品經濟發達的

表現。

(4) 柚租錢：

右新入柚租錢一萬四千

(5449)

有關徵收“柚租錢”的竹簡雖然僅此一枚，但其為徵收“柚租錢”之意甚明。按“柚”，為果木名稱，其果實即為柚子。然則，“柚租錢”實際上是一種當地的土特產稅。一次便收入“租錢”一萬四千，既表明土特產稅之重，也說明當地土特產柚子之多。

(5) “酒租錢”：

入二年四月五日酒租錢二萬~~五~~嘉禾二年五月九日吏潘有[□]

(31)

二月領酒租錢一萬四千七百

(4379)

右領酒租錢四萬四千一百

(4418)

三月領酒租錢一萬四千二百^百[□]

(5122)

其[□][□][□]百二年酒租錢

(5330)

承正月旦簿餘嘉禾二年酒租錢一千八百

(5346)

承正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市租錢三千二百

(5376)

……千二百六十市租租錢

(5451)

^出三年酒租錢四萬三千雇桓^王[□]

(6037)

[□]……酒租錢具錢[□]

(6039)

凡四家一歲領酒租錢具錢十萬二千^千[□]^①

(6365)

[□][□]言部吏唐王[□][□][□]收責酒租錢者入[□]

(6376)

我曾在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上册第508-509頁，根據《三國志·吳書·顧雍傳》所說呂壹“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鄣管之利”時指出：“所謂榷酤，是指對酒實行官府專賣或課取酒稅”。今據吳簡所云，孫權統治時期的臨湘侯國和長沙郡地區，確實對酒實行了“酒租錢”的徵收。從諸殘簡的內容看，不曰“入”酒租錢若干，而曰“領”酒租錢若干，這一“領”字，即有管理之意，同不少的竹簡謂“某鄉領吏民若干戶”的語法相同，這正符合官府專賣酒類商品的情況。因此之故，“酒租錢”的徵收必須是完好優質錢幣，從而當提到“酒租錢”時，兩次出現了“酒租具錢”的說法。

① “凡”字上原有墨筆點記。

(6) 租具錢：

□□及禁絕□租具錢一萬五千八百無所課應^① (4341)

合爲租具錢九千無所收責…… (4342)

臨湘丞橡副言縣領三年租具錢五萬六千八百都吏唐王□□民□□入四 (6935)

竹簡中有關“租具錢”的簡文甚少，此二簡雖有殘缺，但“租具錢”之名稱却比較清楚。從 4342 號簡所云：“合爲租具錢九千，無所收責”的話來看，“租具錢”是一個稅收名目。顧名思義，它很可能是無力購置鐵質農具的民戶向官府借用農具時徵收的稅。徵收辦法和稅率均不明白。

(7) “財用錢”：

有關“財用錢”的竹簡甚多，茲擇要錄寫幾枚簡文如下：

入中鄉嘉禾元年財用錢八百貳嘉禾元年二月十日湛龍丘潘□ (1615)

入模鄉嘉禾元年財用錢七千貳嘉禾二年二月十日吏鐵霸付庫吏殷連□ (1663)

入平鄉嘉禾二年財用錢四千四百 (5322)

入西鄉嘉禾二年財用錢一千 (5226)

同樣的竹簡還有多枚，此不悉錄。上述的中鄉、模鄉、平鄉、西鄉，於嘉禾元年、二年都有“財用錢”的收入。據孟彥弘同志考證，這表明“財用錢”是當時政府所徵收的正式賦稅項目之一。爲什麼用“財用錢”命名呢？孟彥弘同志根據《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守官令”條本注所說“主御紙草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的話，認爲始於漢代的“財用錢”徵收之制，“最初正是徵收上來專門用於尚書購置紙、筆墨、封泥等的行政辦公之物，後來則變成了政府一項固定的財稅項目。”^②我以爲此說比較準確。

此外，還有“除龍錢”的徵收，如 4340 號竹簡所云：“百收除龍錢一萬二千四百卅一合一萬二千九百卅一□□”。還有 4406 號簡亦云：“□□收責應□□□定額□錢卅□萬七千□百爲除龍行錢卅七萬七千二”。此二簡中的“除龍錢”與“除龍行錢”，實爲一事，此類竹簡僅此二見，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及如何徵收，均不明白，但它是一種稅收卻是有疑問的。姑錄於此以存疑。

除上述徵收錢幣的各種賦稅之外，還有一種祇對部分居民徵收的租稅，如“復

① “禁絕”下□，右半殘缺，左半從“金”。

② 詳見孟彥弘《釋財用錢》，載《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 年 7 月。

民租錢”和“僦錢”或“地僦錢”，也有一種強迫居民以錢幣購買官府掌控并經營的鐵質農具的“鋸錢”，也叫“鋸買錢”或“官鋸錢”，實質上也是一種變相租稅。試分別述之於次：

(1) 關於“復民租錢”：

| | |
|------------------|--------|
| ……復民二年租錢…… | (5150) |
| ……二千復民三年租錢…… | (5180) |
| 其二千三年復民租錢…… | (5287) |
| 入邑下復民楊樊租錢四千 | (5328) |
| 右領新入復民租錢四百 已 | (5377) |
| 承正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復民租錢一千 | (5625) |
| 承三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復民租錢四千 | (5639) |
| 承四月旦簿餘嘉禾二年復民租錢六千 | (5647) |

上列諸竹簡都說到官府對“復民”徵收“租錢”，從 5328 號竹簡所記來看，表明這個居住在“邑下”的“復民楊樊”一次繳納的“租錢”就多達“四千”。可見復民向官府繳納租錢數量不少。這些“復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我已在《文物》雜誌 2000 年第 10 期的《〈嘉禾吏民田家荊〉中的“士”和“復民”質疑》一文中論及；竹簡公布後，又寫有《再論長沙走馬樓簡牘中的“復民”問題》一文，對之予以探討，此不贅述。因此，這種“租錢”是專向“復民”徵收的，故不涉及所有居民，屬於官府向部分特殊的居民徵收租稅。

(2) “僦錢”或“地僦錢”：

| | | | |
|-------------------------------|-----------|-----------|--------|
| 大男張順僦錢月五百 | 大男樂□僦錢月五百 | 大男冀士僦錢月五百 | (4346) |
| 大男趙□僦錢月五百 | 大男楊樊僦錢月五百 | 大男王而僦錢月五百 | (4362) |
| 右冊五戶月收僦錢合二萬二千五百 | | | (4462) |
| 臨湘言部吏潘矜責食地僦錢起正月一日訖三月卅日有人悉畢 | | | (4345) |
| 領四月地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 | | (4351) |
| 臨湘謹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錢人名爲簿 | | | (4357) |
| 府前言絞促市吏書收責地僦錢有人言請叩頭死罪死罪安文書輒絞足 | | | (4397) |

據宋超同志統計，吳簡中有關“僦錢”的竹簡多達二十七枚；關於“地僦錢”的竹簡多達十一枚。他認為這裏的“僦錢”即“地僦錢”，而且這裏的“僦”，同屢見於秦漢三國時

期史籍中的“僦費”、“僦直”之“僦”不是一個意思。但從“僦”的本義為“租賃”這一點出發，再結合南朝史籍中的課之於“吳市”的“僦稅”去考察，證以4397號吳簡所云長沙郡府曾督促“市吏”行文臨湘侯國“收責地僦錢”之事，就表明“地僦錢”應是臨湘侯國內居住於侯國治所的居民向官府租賃一定的地段以從事商業活動時所繳納的租金，故被稱為“地僦錢”，而且是戶五百^①。我以為宋超同志所考，頗有見地。由此可見，“僦錢”或“地僦錢”的徵收，也是官府強加給部分居民的特殊租稅。

(3) “鋸錢”或“鋸買錢”、“官鋸錢”：

- ☒鄉入鋸買錢十萬五千一百 (45)
- ☒入模鄉鋸買錢五千四百☒ (92)
- 入都鄉鋸錢☐☐☐☐嘉禾二年五月☒ (1385)
- 入都官鋸錢一萬☐☐☐☐嘉禾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1393)
- 入都鄉紡☒丘男子劉曼鋸錢二百☒ (1419)
- 入模鄉番丘男子區帛鋸錢五千☐☐☐☐嘉禾二年閏月十一日☒ (1517)
- 入西鄉鋸買錢五千六百☐☐☐☐嘉禾二年閏月☐☐☐☐ (1561)
-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鋸買錢二千☐☐☐☐嘉禾二年四月十三日雅丘男子唐陸付庫吏殷連受 (2811)
- 入南鄉鋸買錢八萬一千七百☒ (2826)

同樣內容的竹簡還有多枚，此不具引。單從上引竹簡，可知“鋸錢”又名“鋸買錢”或“官鋸錢”。按“鋸”字與“鑄”同，多是江南地區使用的鐵質農具；而“買”字與“價”同義，多見於古代文獻。再結合“官鋸錢”的名稱去考察，可知所謂“鋸錢”，是農民向官府繳納的用以購買農具的錢，因為冶鐵業和鐵制農具自秦漢以來就是由官府經營的，由於孫權統治時期的吳國也繼承了這種制度，正如《宋書·百官志》“東冶令”條所云：“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吳所置”，因而這種用於購買農具的錢，便成了“官鋸錢”了。因此，這種“鋸錢”，雖然是農民用以購買官府的鐵制農具的錢，因為出於官府強迫，農民不能不買，故實質上也是官府強加的一種變相的租稅。

(4) “蓋錢”或“租蓋錢”：

- 入南鄉嘉禾元年蓋錢☒八千☐☐☐☐嘉禾二年二月四日烝弁付庫吏殷連受 (1614)

① 詳見宋超《吳簡所見的“何黑錢”、“僦錢”與“地僦錢”考》，載《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年7月。

| | | |
|--------------------------------|------------|--------|
| 入模鄉嘉禾元年蓋錢二千八百 | 嘉禾二年二月三日□□ | (1659) |
| □鄉嘉禾元年□蓋錢一萬七百卅 | □ | (2524) |
| 承三月旦簿餘嘉禾二年租蓋錢三萬四千七百九十 | | (5251) |
| 入西鄉嘉禾二年蓋錢一千一百廿 | | (5642) |
| 入中鄉嘉禾二年蓋錢二千四百 | | (5650) |
| 右四月旦承餘新入蓋錢廿七萬七百八十 ^① | | (5672) |
| □萬七千□黃武六年蓋錢…… | | (7161) |
| 入黃武六年蓋錢准米一百卅五斛中 | | (9543) |

從上述七枚殘簡所載，我們仍可以看出，臨湘侯國所轄各鄉每年都要向官府上交“蓋錢”，而且蓋錢的盈餘量多達廿七萬七百八十錢，可見“蓋錢”的徵收量不少。從 5251 號簡來看，可知“蓋錢”又名“租蓋錢”。“蓋錢”的徵收方式，主要以錢幣繳納，但也可以折成實物繳納，如 9543 號竹簡所載“入黃武六年蓋錢准米一百卅五斛”即其例證。按蓋，為植物名稱，名曰蓋草，又名黃草，可以染色，亦可入藥。由此可見，“蓋錢”或“租蓋錢”實為當地土特產稅的一種。大約是凡以種植蓋草為業者，就需要交納這種租稅，故我把它列入部分居民課取的租稅名目中。

如上所述，孫權統治時期對不少地區特別是臨湘侯國內的居民普遍徵收口錢、算賦、陶租錢、綢租錢、市租、柚租錢、酒租錢、租具錢、財用錢和除龍錢等租賦；還對部分居民徵收“復民租錢”、“地僦錢”（或稱“僦錢”）、“鋸錢”（或“鋸賈錢”、“官鋸錢”）、“蓋錢”（或“租蓋錢”）等租稅，合計不下十餘種，可謂名目繁多，而且都是以錢幣繳納，而不是以實物繳納的實物稅。這些情況，充分反映出當時長沙地區的居民以錢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情況十分興盛，錢幣在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流通量也十分巨大，特別是一些以手工業、土特產業和商業為徵收對象的租稅，直接反映出當時這一地區的手工業、土特產種植業和商業的發達，這同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幾乎是格格不入的。

四、孫權統治時期長沙地區的官府所需物品除來源於賦稅徵收外，亦多以錢幣購置，實開南朝與隋唐時期和市之制的先河

關於官府以錢幣購置其所需物品如布、麻、水牛皮等物的情況，在下面的竹簡中有明顯的反映：

① “右”上原有墨筆點記。

- 平出錢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五錢雇元年所調布麻水牛皮并□ (1144)
- ☑四匹一丈六尺匹直三千六百布付縣庫吏殷連領如解盡力絞促 (3732)
- ☑萬四千斛直一千八百付庫吏殷連當市二年調布 (3733)
- ☐八萬二千九百冊七錢其☐☐就留☐今年調布廿三匹☐丈一尺匹直三千六百☐☐ (4370)
- ☑百廿就留付☐市今年所市布☐十四匹一丈六尺付庫吏殷連☑ (4372)
- ☑☐☐☐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寸布匹直三千六百錢為米百廿斛悉畢謹列市得布 (4405)
- 匹 出具錢八萬一千為行錢八萬五千二百☐九十五錢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 (5359)
- 出具錢三萬為行錢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錢市嘉禾二年調布嘉禾三年正月卅 (5379)
- ☑☐付市吏潘玗市所調布廿三匹二尺 (8723)

上面所列九枚竹簡所載，儘管有所殘缺，但都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事實：官府或以糧食、或以錢幣（主要是以錢幣）去購買當年的調布、麻、水牛皮等物。其中的 1144 號竹簡的“雇”字，應作購買講，以後諸簡均作“市”，購買的涵義更明白。每次用糧、用錢的數量都相當巨大，以用錢幣來說，最多一次出錢二百廿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以糧購物來說，最多一次用糧一萬四千斛。由此可見，官府所需布、麻、水牛皮等物幾乎大部分來源於用錢幣、糧食購買於社會市場。我們知道，南朝和隋唐時期，官府以“和市”方式向社會市場購買物資以滿足需要的情况，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和市”制度，今吳簡所見上述情况，實開後世“和市”制度之先河，充分反映出孫權統治時期的長沙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已相當驚人。

由於官府從社會市場購買各種物資的頻繁出現，因而引發了商業貿易中中介人物的產生，見於吳簡中的“價人”，有可能就是這種中介人或這種中介人的前身。請看下列諸簡：

- ☑還價人李綬米十二斛八斗 (1736 甲)
- 入民還價人李綬米一斛 ☑中 (2022)
- 其九斗六升價人李綬黃龍☐年米 已 (2074)
- 其一百廿三斛五斗二升價人李綬黃龍三年…… 中 (2353)
- ☑其九斛四斗六升價人李綬☐☐ (2470)

入劉陽還價人李綬米卅四斛

(6718)

入吏文水鄧鐵所貸價人李綬米十九斛八斗

(9539)

上述七簡中，都有價人李綬，如果這個李綬僅是一般商賈之人，何以會多次出現？何以多次與人發生借貸關係？這表明李綬不是一般的商賈之人。上述六簡除 2470 號簡詞意不明外，都提到了“價人李綬”接受“民戶”和“文水鄧鐵”所貸價人李綬米糧之事，足見價人李綬不僅是貿易活動的中介人，而且是交易時糧食的出貸方，並已有得到官府保護的跡象。基於這些特徵，則“價人”的作用已經具有提供貿易資金的性質，即已經具有後世糧食行和錢莊的某些特徵。果如此，則孫權時“和市”制度的萌芽和“價人”的出現，實為當時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以後引起的社會經濟變化，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此文初稿寫於 2004 年 2—4 月間。後因目疾而被迫停頓。2005 年 5 月修改。此文及其相關論文，均已列入鄭州大學“十五”規劃“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中國古代文明與考古學》之內。）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 地名、人名釋文校證

◎ 中國文物研究所

胡平生

內容提要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已於2003年出版。走馬樓竹簡保存情況很差，殘損嚴重，字迹斑駁，加上許多草率的寫法、俗體字和錯別字，很容易造成誤釋，特別是竹簡中的地名、人名因為缺少可以通讀的上下文和可以比對的辭例，釋讀難度最大。本文是對我們在閱讀第二卷時所發現的一些地名、人名的釋寫錯誤或需要討論、考證的字所進行的考訂和校正。其中的地名的錯釋如“杷縣丘”、“內口丘”、“夫唐丘”、“夫興丘”、“上儺丘”、“雅丘”、“孫丘”、“真緯丘”、“領上丘”、“大片里”、“淇丘”、“東天里”、“軟丘”、“榴丘”、“泠丘”等；姓氏與名字的錯釋如“胡建”、“棟”、“蔭”、“區順”、“谷蘇”、“傅米”、“車刀”、“孫直”、“聿”、“何誠”、“漢”、“王蜀”等。總之，我們感到，在第二卷的地名、人名中凡有特別怪异之字形或扞格難通，與整體文例、辭例不合者，都應當仔細核對圖版加以審核，其中有一些釋讀可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關鍵詞 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 人名 地名 校證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以下簡稱“第二卷”）已於2003年10月出版。^①該卷收錄竹簡1萬餘片，逐寫錄文的工作早在多年前就已初步完成，1999年，

^①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

編者曾發表《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一文（以下簡稱《新收穫》）^①，報告整理情形。筆者參加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荊》（以下簡稱《田家荊》）的整理^②，目前又正在從事第三卷《竹簡》[貳]的編撰工作^③，我們十分重視吸取過去整理釋讀工作的經驗與教訓，翻看全書，我們感到，正式公布的竹簡釋文比起《新收穫》所引用的釋文已有較多的改進，質量有了明顯的提高。但簡牘釋文是一項十分繁難的工作，走馬樓竹簡保存情況很差，編者初次接觸簡牘整理，錯誤在所難免。這裏將讀書中發現的第二卷釋文中的一些錯誤，主要是地名、人名需要討論、考證的字，提出來加以考訂校正，其中一些考訂文字還是讀《新收穫》時寫下的筆記，第二卷出版後又做了些整理修訂。我們對第二卷釋文的校訂可能也有錯誤，還請方家多多指教。此次先後發表的還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二卷釋文校證》、《說“步兵還民”》、《完全不能成立的“畫諾”說》等幾篇相互關聯的拙文，敬祈垂注。筆者一向主張整理漢晉簡牘文書皆應加注標點，本文所引簡文即儘量加了標點。

一、地名誤釋舉隅

走馬樓簡牘文字的釋讀，以地名、人名為最難，簡牘保存情況很差，殘損嚴重，字迹斑駁，常常很難看清，加上許多草率的寫法、俗體字和錯別字，也容易造成誤釋。我們在翻閱第二卷的過程中，摘出了一些可能有問題的地名、人名釋文，加以考證訂正，茲列舉如下。

（一）縣、丘、里

在第二卷丘名中有個“杷縣丘”，是因誤釋與闕釋而衍生的。有所謂“杷縣丘”的竹簡已經從中裂為左右兩片，今存右側大半片，因而有些字不能確釋，整理者原釋文作：

1. □□□[餘縣得入多少今已畢未杷縣丘]□[治下遣各所言] □

1159

從右側殘存的部分推測，釋為“餘”的字才能確認，也可能是“除”。釋為“杷”的字，僅存右旁“巴”形，釋“杷”欠安。“縣丘”下一字，應釋為“里”。因此，我們認為，并不存在叫做“杷縣丘”丘名。

① 王素等：《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年第5期。

②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荊》，編者胡平生、李均明，文物出版社，1999。

③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第三卷，《竹簡》[貳]，編者為胡平生、李均明、劉紹剛，將於今年內交文物出版社出版。

此簡文的確切意義尚待進一步考證，由於上下有關，全文的意思也還不是很清楚。但是，“縣丘里”在這裏應讀為“縣、丘、里”。它的釋讀對於討論丘里關係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由於在第三卷中發現了“某里某丘”的文例，在討論丘里關係時顯然要綜合考慮這兩種排序。

(二) “內口丘”應釋為“窟[丘]”

第二卷有個祇出現過一次的丘名——“內口丘”，整理者所寫釋文為：

- 1.入：樂鄉所調嘉禾二年新布六匹。𡗗嘉禾二年八月八日，內口丘大男□ 7521

細審圖版，知丘名“內口丘”釋讀有誤。所謂的“內”實為穴字頭；所謂的“口丘”，很清楚是“屈”。整理者所謂“內口丘”，其實是“窟”字。這裏“窟”字下脫去了“丘”字。在走馬樓吳簡中，由於書寫的匆忙，簡文脫漏訛衍是很常見的。“窟丘”，在第二卷中數見，如：

- 2.□𡗗嘉禾二年十一月卅日，窟丘子弟廬□、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 □ 3809

- 3.入：樂鄉嘉禾二年稅米十六斛胄畢。𡗗嘉禾二年十月廿四日，窟丘大男毛表、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4861

- 4.入：樂鄉窟丘毛丟二年布一匹三丈八尺。𡗗嘉禾二年十月十三日，丞升付庫吏殷連受。 7889

- 5.□𡗗禾二年十月廿四日，窟丘郡吏毛鈞、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9808

值得注意的是，1簡經我們校正後的丘名“窟丘”屬樂鄉，與3、4兩簡樂鄉窟丘正相吻合，也從一個側面驗證我們所校訂的釋文的正確性。

應當說明的是，4簡中毛姓繳布人的名字被釋為“丟”也是不對的。這個字寫為“𠂔”形，上部是兩橫一豎，豎畫出頭，與“丟”字上部的寫法有別，不能釋為“丟”。暫時無法確認，可以摹錄其形，以待高明。以我們的經驗推測，這個字有可能是“表”字的訛體，此毛某或許就是4861號簡中的“毛表”。

(三) “夫唐丘”乃“吳唐丘”之誤

第二卷1689號簡所記丘名叫“夫唐丘”，也僅出現一次，整理者所寫該簡的釋文為：

1. □□夫唐丘財用錢冊六𡗗嘉禾□年[十一月]□□[日]……

核對圖版，此簡端首以下部分皆漫漶不清，整理者當是借助紅外線儀器寫出釋文的，但是恰恰“夫唐”二字可以看到，第一字“夫”形之上還有“口”形，雖然不是非常清晰，但仍能確切判定，絕不至於發生歧見。我們甚至懷疑整理者用於表示闕文的“口”號，原來是準備寫成“口天吳”的，後來發生錯誤，變成“口夫唐丘”。“吳唐丘”在第二卷中已出現過一次：

2. 入：都鄉皮五枚。𡗗嘉禾二年四月廿三日，吳唐丘[帥]口口

8541

“帥”下一字存左側言旁，據文例應是“帥”之姓名。此簡中“吳唐丘”三字清清楚楚，1 中的丘名毫無疑問也應當一樣是隸屬於“都鄉”的“吳唐丘”。

（四）“夫興丘”應是“夫與丘”

在前節中，我們已經考定第二卷地名并無“夫唐丘”，其他稱為“夫×丘”的地名還有四例，一個“夫興丘”，兩個“夫與丘”，另一個中間一字不清，整理者寫作“夫口丘”。

1. 口十二月十八日，夫興丘縣吏黃秉、關主記梅[綜]付，口

2770

據圖版，這裏的“興”字釋讀有誤，試對比以下釋為“夫與丘”的兩簡：

2. 口 年二月九日夫與丘[大] 口

718

3. 入：桑鄉嘉禾二年稅米冊七斛八斗九升，甯畢。𡗗嘉禾二年十月廿八日，夫與丘男子李狗、關邸閭董基付。口

4846

2 的“與”字，外框的“𠂔”形很清楚，上部中央的“与”形有一很細的縱向裂紋，但我們可以看到“与”形的書寫特徵為，較窄，左下方空缺。3 的“與”字也很清楚，其中央“与”形書寫特徵也一樣，比較窄，左下方空缺。再來看 1 的所謂“興”字，它的上部中央也是“与”形，寫法與 2、3 很像，較窄，左下方空缺。可知，這個被釋為“興”的字，也應當釋為“與”。我們懷疑，整理者之所以將此字誤釋為“興”，可能是沒有注意到“與”字的中央部分很窄，而認為此簡此處左側有殘破，此字上部左側有一部分殘缺，誤將“𠂔”的左部當作了“興”字的中央部分。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中間一字不清楚的“夫口丘”：

4. 入：桑鄉二年新調布一匹。𡗗嘉禾二年八月二日，夫口丘男子李烏付，庫吏殷連

受。

7828

以前面所作的分析觀察“夫口丘”中間不清楚的這個字，“𠂔”形上部當中竹簡表皮有些破，使得筆畫損傷，但我們注意到它與2、3中的“與”字一樣，“𠂔”形上部當中較窄，可知，這個被釋為“興”的字，也應當釋為“與”。

綜上所述，在第二卷中稱為“夫與丘”的地名就有四個。

（五）不存在的“雅丘”和“孫丘”

第二卷《地名索引》中有不少丘名其實是因為整理者誤釋而增衍出來的，如“雅丘”和“孫丘”。所謂的“雅丘”，見於2811號簡，簡文中整理者釋為“雅”的字，寫作從弓從糸，顯然應當釋為“弦”。又，繳錢男子的名字叫“唐陶”，整理者誤釋為“唐陸”。繳錢的時間“八月”，整理者誤釋為“四月”。簡文經校正後為：

1. 入：廣成鄉嘉禾二年銀賈錢二千。𠄎嘉禾二年八月十三日，弦丘男子唐陶付，庫吏殷連受。

2811

“孫丘”，又見於7555號簡，同是這個“廣成鄉”，同是這位“唐陶”，其文曰：

2. 入：廣成鄉弦丘唐陶二年布二匹。𠄎嘉禾二年九月廿四日，弁付，庫吏殷連受。

7555

整理者亦誤將“唐陶”釋為“唐陸”，又誤將“弦丘”釋為“孫丘”。八月一次是繳銀賈錢，九月一次是繳布。在第二卷著錄的竹簡中，根據整理者的釋文還有一位“唐陶”，可惜簡已殘斷：

3. [十]五日，口丘男子唐陶付，庫吏殷連受。

7723

此簡整理者未釋丘名，整理者加注說：“‘丘’上口下半殘缺，上半從艸。”按，此說恐非是。我們認為，這個殘字不是上下結構的字，而是左右結構的字，缺的不是下半，而是右半。我們認為，這個字應當是“弦”，書寫將左邊的“弓”旁與右邊的“糸”旁寫得非常緊湊。由於此字的中央部位有殘破，右側又缺了一小點，造成辨識的困難。總之，7723號簡中的這個丘名，無疑應當釋為“弦”。這枚簡的丘名也是“弦丘”，那么就與2811、7555兩枚簡中的“弦丘唐陶”為同地同人了。

我們注意到，第二卷出現的地名中所謂的“孫丘”都是“弦丘”的誤釋。

- 4.入：廣成鄉二年布二匹。 𡗗嘉禾二年九月廿四日，弦丘唐陽付[庫] □ 6826
5.入：廣成鄉弦丘男子吳遠二年調布二匹。□ 6814

這兩個字左側的偏旁“弓”很清楚。《說文·弦部》：“弦，弓弦也，從弓，象絲軫之形。”段注曰：“象古文絲而系於軫，軫者系弦之處。”馬王堆一號漢墓木籤牌“弦”，即作左弓右糸之形。

應當指出的是，“弦丘”在第一卷《田家荊》大木簡中是出現最多的丘名之一，“弦”字寫法與竹簡完全一樣，第二卷的誤釋原本應該是可以避免的。

（六）地名、人名中的“鴈”和“雁”

走馬樓簡第二卷的地名、人名中有個“鴈”字被誤釋，先看人名，下面一簡的釋文已經訂正：

1. □ 日□下丘大男蔡鴈、關邸閭李嵩付，倉吏黃諱、[史] □ 200

“鴈”字，整理者釋為“鴈”，并加注說：“‘鴈’疑為‘鴈’之別體。”其實此字筆畫沒有那麼複雜，不過是寫作從广頭而已，出土的漢魏文獻中，從厂與從广常可相通用；右旁則是鳥形，顯然應當釋為“鴈”。在《說文》裏，“鴈”與“雁”是兩個字。“鴈”在鳥部，“雁”在隹部。“鴈，鴈也。”“雁，雁鳥也。”段玉裁注云：“‘鴈’與‘雁’各字。鴈與鴈各物。許意隹部‘雁’為鴻雁，鳥部‘鴈’為鴈。鴈為野鴈，單呼鴈，為人家所畜之鴈。今字雁、鴈不分久矣。”

走馬樓竹簡中也有“雁”字，見 2846 號簡，是一個地名，但也被整理者誤釋了。

2. …… 𡗗嘉禾二年六月廿七日，上儼丘男子黃松付，庫吏殷連受。 2846

所謂的“上儼”二字，其實應釋為“雁”。由於整理者的誤釋，這個“雁”字沒有被反映出來。由於竹簡左右兩半從中央撕裂，上下有些錯位，左右筆畫不能吻合，造成整理者識別時的錯覺，遂將“雁”字誤釋為“上儼”二字。

（七）真坪丘

“真坪丘”，在 373 號簡中被誤釋，整理者的釋文為：

1.入：都鄉嘉禾二年柒租米三斛[一斗]。𡗗嘉禾二年七月十三日，真綽丘[男] □

“綽”，應改釋為“坪”。此字左旁從土，左側稍有殘缺，土旁的豎畫右下側有一羨點，早期的土字皆如是作，不能誤為糸旁。右旁很清楚是平字，與卑形差異甚大，不知為何會誤釋為卑。“真坪丘”在第二卷中僅一見，在《田家荊》中也沒有出現過，正確地釋讀當然是很重要的。

（八）領山丘

在 8111 號簡中，有一個在第二卷中祇出現過一次的丘名“領上丘”，此簡殘損嚴重，整理者的釋文作：

1. □月廿四日領[上]丘□

根據我們的考證，整理者的釋文中所謂的“領上丘”，其實是“領山丘”之誤釋。此簡中的那個“領”字左旁“令”的下部稍有一點殘缺，而“山”字因為簡殘去了右側，缺了右邊一短豎。“領山丘”見於 5190 號簡：

2. 入：樂鄉民還所貸三年私學限米，准米四斛，胃畢。𡗗嘉禾二年九月廿九日，領山丘謝 □

在第三卷中亦見“領山丘”和“領山里”，對於探討“丘”與“里”的關係提供了有用的資料。

（九）“大成里”誤釋為“大片里”

第二卷地名中有個“大片里”，也是整理者的誤釋。我們校正後釋為“大成里”，簡文如下：

1. 大成里戶人、公乘王得，年六十二，聾兩耳。 935

“大成里”，之所以被誤釋為“大片里”，是因為此處竹簡右側裂開殘缺，短缺了右側的筆畫。“大成里”，又見於 9054 號簡：

2. [大]成里戶人公……，年廿五。苦風病。

在 935 號簡中，王得登錄的疾患“聾兩耳”，整理者誤釋為“聾耳眇目”，今訂正。

(十) “湛丘”誤釋為“淇丘”

以下兩枚竹簡中的“湛丘”，整理者皆誤釋為“淇丘”，改正後的簡文如下：

1. ☒ 嘉禾二年十一月一日，湛丘縣吏[由]☐☐ 3629

2. ☒ 畢。𠄎嘉禾二年十月廿六日，湛丘縣吏劉愷、關邸閣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4402

在第二卷中所謂的“淇丘”地名凡兩見，也就是說，在訂正了上述的錯釋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淇丘”這個丘名了。“湛丘”，又見於 8458 號簡：

3. ☒ 斗，冑畢。𠄎嘉禾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湛丘州吏烝士、關邸閣董基付，倉吏鄭黑受。

這枚簡中的州吏“烝士”，整理者釋為“烝土”。走馬樓簡牘的“土”字，下面一橫畫都寫得較長，中央一豎與下橫畫相接的右側，都加一小點。而此字上下兩橫畫等長，中央一豎與下橫畫相接的右側也沒有一點，所以應當釋為“士”。

應當說明的是，我們負責編撰的第一卷《田家菑·地名索引》中誤將“湛丘”排印成“淇丘”，見《田家菑》下冊 329 頁第五欄“湛上丘”前一條的“淇丘”是“湛丘”之訛，編號為 5·702（正文不誤）。另一處相關的錯誤是，336 頁《人名索引》中“黃楊，湛丘”下又衍出一個“州”字。兩處錯誤，皆因我們校對把關不嚴造成，特此更正。

(十一) “東夫里”誤釋為“東天里”

“東天里”在第二卷中也祇出現過一次，其實是“東夫里”的誤釋。整理者的釋文作：

1. 東天里大男陳匹，年卅二，☒ 1223

細審圖版即知，整理者所釋的“天”字，中央一豎筆意明顯突出橫畫，因此應當釋為“夫”。“東夫里”據《地名索引》凡兩見：

2. 東夫里大男李震，年卅二。 ☒ 1333

3. 東夫里[佃]☐[唐]☐[年]☐☐☒ 1275

1223 號簡的“夫”字與 1333 號簡的“夫”字，寫法完全一致，這兩枚簡的文字的書體書風也完全一致，應當就是一人所書。

還要指出的是，1223 號簡文中的“陳匹”的“匹”字，釋讀也是錯誤的。此簡左右都有些殘缺，但這個字是基本完整的，在整理者釋為“匹”字的上面，明顯還有筆畫，可能是“艸”頭，假如這一分析不誤，則此字應當是“茝”，通“芷”。“茝”為香草，用作人名，自是相宜。關於字形的分析，請參見下文“區頤”條考證。

（十二）“敷丘”的誤釋

第二卷地名、人名釋文中有些十分怪異的字，一般說來釋讀可能有些問題，如 232 號簡有個地名寫作“敷丘”，其實是“敷丘”之訛。簡文如下：

1. □ □[四斛二斗，胃畢。] 𣎵嘉禾元年十二月八日，敷丘男子由[明] □

此“敷”字，寫作“敷”。《說文·支部》：“敷，敝也。從支，專聲。《周書》：‘用敷遺後人。’”段注云：“欲作敷。”《玉篇·支部》：“敷，布也。亦作敷。”在走馬樓簡牘中，“敷”大多寫作“敷”。“敷丘”又見於 1048、1054、4542、5741、6905、10019 等簡，整理者釋讀無誤。例文如：

2. □ 在敷丘。 1048

3. 入：桑鄉嘉禾二年新調布三丈九尺。𣎵嘉禾二年八月廿三日，敷丘男子潘錢付，
庫吏[殷] □ 6905

可知“敷丘”為桑鄉下屬丘里。

（十三）“撈丘”誤釋為“榴丘”

第二卷中有個“榴丘”，也是由於整理者的誤釋而增衍出來的丘名。整理者所寫釋文為：

1. 入：廣成鄉榴丘吳□□ 6998

所謂的“榴丘”，應該釋為“撈丘”。“撈”字的寫法右旁有些怪，這是因為書寫者將“勞”的上部兩個“火”形訛寫成“艸”頭形。與 6998 號簡的“撈”字寫法相近的有 7567 號、7912 號、7991 號等簡，可以參看。走馬樓吳簡地名“撈丘”又作“撈丘”，應是一字異寫。

順便指出，在《地名索引》“撈丘”條下，7926 號簡重複列出，後面的一條應當刪去。

（十四）“泠丘”還是“洽丘”

第二卷 6923 號簡記一個屬模鄉的丘，整理者釋為“泠丘”，其簡文曰：

1.入：模鄉泠丘彭略嘉禾二年布一匹。𠄎嘉禾二年九月十三日，烝弁[付，庫吏殷]

☐

細審圖版并對比有關竹簡，我們感到情況還比較複雜，第二卷中的“泠丘”和“洽丘”的釋讀需要綜合地加以分析討論。據統計，整理者釋為“洽丘”地名的簡共七枚，茲列舉如下：

2.入：平鄉嘉禾二年稅米十三斛，冑畢。𠄎嘉禾二年十月廿三日，洽丘李成、關邱閭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7313

3.入：平鄉二年洽丘吳有鹿皮五枚。𠄎嘉禾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烝]☐ 8297

4.入：模鄉二年冬賜布一匹。𠄎嘉禾二年三月十三日，洽丘大男蘇明付，庫吏殷連受。 7942

5.入：廣成鄉二年冬賜布一匹。𠄎嘉禾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洽丘男子周持付，庫吏殷連受。 7890

6.☐[年]十月廿七日，洽丘☐☐☐☐ 5020

7.入：平鄉嘉禾二年……畢。𠄎嘉禾二年十月廿七日，洽丘☐☐☐☐關邱閭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7479

8.入：[平]鄉嘉禾二年稅米十四斛，冑畢。𠄎嘉禾二年十月廿四日，洽丘婁☐、關邱閭董基付，三州倉吏鄭黑受。 7326

也就是說，按照整理者的釋讀，在模鄉、平鄉、廣成鄉三個鄉中都有“洽丘”。如果仔細一些觀察，可以發現以上 7 例“洽丘”的“洽”字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洽”字右旁之“合”下部的“口”，皆作方形，“口”下面的一橫很明顯，7313、7326、7479、8297、5020 等簡的“洽”字皆如是作。一種是，“洽”字右旁之“合”下部的“口”，作銳下之形，像一倒三角形，7890、7942 二簡的“洽”字如是作。分析一下上述兩種異構的“洽”字會發現，前者除 5020 號簡的“洽丘”未詳鄉名外，其他皆屬平鄉。而後者一屬模鄉，一屬廣成鄉。仔細看圖版可以發現，7890 號簡所釋“廣成鄉”是靠不住的，根據筆迹辨識，這個鄉名也應當釋為“模鄉”。

現在，再反過頭來看我們在本節開始時討論的 6923 號簡中的“模鄉冷丘”，其實 6923 號簡整理者釋為“冷”的字，與 7890、7942 號簡釋為“洽”的字寫法是完全一樣的。我們知道，在走馬樓簡牘中，“口”形是可以寫作三角形的，既可以寫作銳下之形，即倒三角形，如“區丘”的“區”中的口；也可以寫作銳上之形，如“戰”字左上的口。那麼，這個“模鄉”的丘名，究竟應當釋為“冷丘”還是釋為“洽丘”呢？這種情形很像第四節“領山丘”的“領”被釋為“領”。我們認為，不論是釋為“冷丘”還是“洽丘”，有一個原則是必須堅守的，即幾枚簡的釋法必須統一，不能這裏釋為“冷丘”，那裏釋為“洽丘”。我的意見是，還是釋為“洽”較好些。因為從“領山丘”、“領山里”及其他的“領”字的寫法看，“令”旁的下部一點與勾折一筆一般是分開的，可參看 1872 號簡的“領”字。這樣說來，就要將 6923 號簡的“冷丘”校正釋為“洽丘”了。

二、姓氏與名字的錯釋

（一）“胡建”之“建”應釋為“違”

1329 號簡是一枚殘損的戶籍簡，整理者釋為：

1. ☐ 妻從男弟胡建(?), 年十五。 ☐

那個釋“建”而存疑的字，其實應該釋為“違”，在簡中寫作“𨔵”。按，“違”，從辵韋聲。“韋”，甲骨文作“𨔵”。《說文·韋部》：“韋，相背也。從舛，口聲。𨔵，古文韋。”商承祚《說文中之古文考》說：甲骨文之“韋”字，“象”兩人相背行，又象兩足有揆隔，乃違之本字。後借為皮韋字，而出違代韋，本義廢矣。簡文“違”字所從之“韋”，中部的口形右豎或書寫未到位，或磨滅，下部的“𠂔”形，倒寫為“𠂔”形，應當都是俗寫中的隨意之處，並不影響此字的辨識。

（二）人名“楝”字應釋為“櫟”

走馬樓簡已比較晚近，字體在隸、楷之間，辨認起來基本上無大礙，祇有人名、地名用字因為沒有文句可以上下貫通來讀，有時有些麻煩。以下的人名“楝”字是編者誤釋，在第二卷《竹簡[壹]》中凡五見，其辭曰：

- | | |
|----------------------------------|------|
| 1. 楝子男節，年六歲。見。 | 5826 |
| 2. 章男弟楝，年十五，在本縣。章侄子男口，年廿[七，在本縣。] | 5830 |

- | | |
|---------------------|------|
| 3. 棟妻巨，年卅五。見。 | 5961 |
| 4. 棟子男經，年十六。見。 | 5966 |
| 5. [剛]師、臨湘楊棟，年□三。見。 | 6006 |

“棟”，字書云同“桌”。但簡文此字右旁并不是桌子的“桌”，簡文左旁從木，右旁上部從水，下部從果，編者將上部隸定成“卜”形顯然是不準確的。我們認為此字應當釋為“櫟”，也就是說，右旁應當是“巢”形的訛變。

《說文·巢部》：“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從木，象形。”《說文繫傳》：“曰，巢形也。𠂔，三鳥也。”徐鍇認為上部的“𠂔”形象三隻鳥。

“巢”字早期的寫法上部並不寫作“𠂔”形：

- | | |
|---|-----------------|
| 𣎵 | 甲骨文，京津 3722 |
| 𣎵 | 金文，班簋 |
| 𣎵 | 小篆，《說文》 |
| 𣎵 | 簡牘，阜陽雙古堆漢簡 |
| 巢 | 帛書，馬王堆帛書《稱》 |
| 巢 | 帛書，馬王堆帛書《周易》 |
| 巢 | 璽印，《漢印文字徵》16—14 |
| 巢 | 禮器碑陰 |

又，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收“巢”、“𣎵”兩形，說：“從木，從由，會木上鳥巢之意。由亦聲。”據古文字資料排類看，“巢”字上部的寫作類似“𠂔”形，是西漢晚期以後成熟隸書的寫法。而由“𠂔”形變為“水”形，應當更晚。我們認為，右旁上部寫作“水”形，乃是東漢末以後的人，誤解“巢”字上部的“𠂔”形，以為“𠂔”形是川，是水，因而俗寫將“巢”字上部寫成了“水”。

至於簡文的“櫟”字，《說文·木部》：“澤中守艸樓。從木，巢聲。”段注：“謂澤中守望之艸樓也。”我們注意到，走馬樓吳簡已經整理的第一卷《田家荊》與第二卷《竹簡[壹]》，都沒有出現“巢”字，因此簡文的“櫟”，也可能是“巢”的假借字。文獻亦有徵，《說文通訓定聲》謂：“《禮記·禮運》：‘夏則居櫟櫟。’《釋文》：‘本作巢。’”

“櫟”字右旁上部從水是“𠂔”形的變異，也給我們以啓示，在走馬樓吳簡中那個從走從水的字，可以確定無疑地釋為“巡”。在走馬樓吳簡第一卷《田家荊》中，我們分別釋寫為“巡”和“述”。而第二卷都釋為“述”，皆為人名用字，如：

| | |
|----|-------------------|
| 黃巡 | 5·62、5·810 |
| 誦述 | 5·580 |
| 石述 | 5·867 |
| 謝述 | 5·45、5·115（以上第一卷） |
| 黃述 | 28 |
| 誦述 | 3503 |
| 石述 | 4859 |
| 桑述 | 4859 |
| 桑述 | 4928（以上第二卷） |

其實，以上這個“水”字都應當釋為“巡”，第一卷的釋文沒有能統一，是我們的失誤。總之，現在可以肯定這個俗字應釋為“巡”。

（三）“蓁”為“蔡”字俗寫

4519號簡有個姓氏的“蔡”字，因為以俗寫形式出現而未能正確釋讀，其釋文云：

1. 𠄎禾二年十月十五日，浸頃丘蓁眼，關 𠄎

整理者對此字並無解說，如依字書解釋，《說文·艸部》：“蓁，艸萎蓁”。據徐灝注箋說，“萎蓁”就是“委蛇”、“逶迤”，是草搖動之狀。而簡文此處應是姓氏，從字形看顯然並不是一個從艸從移的字。

我們認為，此字乃是“蔡”字俗寫。上部的草頭和下部的示形皆無問題，祇不過是將中間部位的“夂”形寫成了“多”形。可以參看的寫法有出土漢代簡帛隸書的“處”字，“處”字在漢隸中有簡化的寫法，常常寫作“夂”，其構思與“蔡”字的中間部位的變異很相近。

（四）“區順”是“區頤”之誤釋

4935號簡是一枚繳米殘簡，其文云：

1. 𠄎[嘉]禾二年郡吏區順客限米十一[斛] 𠄎

細審圖版，知“順”字為“頤”字之誤釋。“頤”，從頁臣聲。在出土簡牘中，“頤”字所從的臣聲，常常寫作如下之形：

臣 臣

在戰國、秦漢、魏晉的出土文獻中“臣”寫作“臣、臣”形之例如：

| | |
|--------|----------------|
| 臣 寫作 臣 | 秦陶文（《秦陶文》1217） |
| 臣 | 睡虎地秦墓竹簡 |
| 臣 | 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 |
| 臣 | 馬王堆帛書《養生方》 |
| 臣 | 《漢印文字徵》 |
| 臣 | 《武威醫簡》 |
| 臣 寫作 臣 | 樓蘭遺址出土魏晉簡 |
| 臣 寫作 臣 |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
| 臣 | 馬王堆帛書《周易》 |
| 臣 | 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 |

據上述文例可證，此處 4935 號簡之“區順”應釋為“區頤”。

（四）“烝蘇”誤釋為“谷蘇”

39 號簡人名“烝蘇”，第二卷《竹簡[貳]》的編者誤釋為“谷蘇”。該簡簡文曰：

1. [入]：南鄉頃佃丘烝蘇嘉禾二年口算錢一千三百五十。𡗗嘉禾三年三月□□日□

按，此簡中的“烝”字上部為“丞”，下有四點底，最右邊的一點雖已漫漶，但整個的“烝”字仍然是比較清楚的，編者釋為“谷”，明顯有誤，今訂正。在走馬樓吳簡中，“烝”姓者數量甚多。第一卷《田家荊》中約有一百四十餘人，第二卷中也有約一百餘人，不煩贅舉。值得一提的是，在《嘉禾吏民田家荊》中有同名同姓的兩位“烝蘇”，一位居利丘（4·298），一位居昭丘（5·308）。加上第二卷這位居於“頃佃丘”的烝蘇，已有三人，同名率算是很高的。

（五）烝達與其兄

7903 號簡中有一位烝某及叛走的其兄的名字未被釋出，整理者所寫簡文為：

1. 軍故吏烝□兄□，年卅九，嘉禾四年四月十八日叛走。

7903

該“軍故吏”的名字叫“丞逢”，其兄名“著”，整理者未釋“逢”、“著”二字。此簡因右側開裂，“逢”字的走之旁下方一筆斷開、未能連接，而難以辨識。在走馬樓簡牘中，走之旁的末筆一捺，常常像魏碑體的寫法，寫作向右下帶折筆意味，最後還有一個往回收的小鉤。此簡的“逢”字的走之正如是作。

“逢兄”之名“著”，亦見於第一卷《田家菑》人名，三州丘男子“菑著”，其字上從艸，中從彡，下從日，字書未見，待考。(5·4)

(六)說“船師傅咸備”

1843 號簡有“船師傅咸”，整理者誤釋為“傅米”，且將其下一字“備”誤釋為“貸”，其文曰：

1. 入：船師傅米貸建安廿六年限米卅四斛。

“船師傅米貸”，乃“船師傅咸備”之訛，今訂正。走馬樓吳簡中所錄人名，有時祇寫名，不寫姓，但所記船師都是有姓有名的，簡文的“傅米”應是“傅咸”。今臚列第二卷所見船師名如下，其中也有一位的名字被誤釋。

| | |
|---------------|------|
| 2. 船師梅朋、傅□ | 1267 |
| 3. 船師鄭肅 | 1844 |
| 4. 船師張蓋、何彥、梅朋 | 2067 |
| 5. 船師何春 | 2092 |
| 6. 船師黃廉 | 2241 |
| 7. 船師車刀、趙益 | 3021 |
| 8. 船師張瞻 | 3080 |
| 9. 船師謝道、潘宜 | 7871 |

3021 號簡的船師名“車刀”釋文也有誤，所謂“車”字應釋為“傅”；所謂“刀”字，筆畫有磨損，但斷非“刀”字。

1843 號簡中的“貸”字，不僅字形與“貸”不合，也與同類簡的文例不合，與其他簡文所見“還貸米”、“還貸食”的文例不合，顯然也是誤釋。與“備”字相關的文例可以舉出很多，這裏祇選數例：

| | |
|-------------------------------|------|
| 10. 入：[桑]鄉吏殷連所備[何]黑錢三千。𠄎[嘉] □ | 1434 |
| 11. 入：東鄉所備吏朱讓(?)文入皮賈錢三千[當]……□ | 1696 |

12. 其十斛吏文董備黃龍三年□賈米。 1746
13. 其卅斛吏文董所備黃龍三年醬賈[米]。 1801
14. 入：吏番觀、張樂等所備黃武五年[租]□□ 1867
15. 米四斛三斗四升，監運兵曹張象、柅師徐邵備所運黃[龍]二年八月稅□賈米 □ 2089
16. 入：吏五葱備黃龍二年限米張復田稅米五斛。中。 2240
17. 入：備船師黃廉折咸米廿一斛。已。中。 2241

“備”在這裏是備辦、預辦的意思，而如果用“貸”字在這裏講不通，同類簡文中也沒有一個用“貸”字的，這也可以作為此字應釋“備”、不應釋“貸”的旁證。11 簡“文”下似有脫文，整理者釋為“讓”的字，可能應當釋為“諱”。“倉吏黃諱”即以“諱”字作名字。15 簡“兵曹”下，整理者闕釋“史”字，應補上。

（七）“孫直”係誤釋

2828 號簡，整理者將前渚丘的繳錢男子姓名釋為“孫直”，應當是錯誤的。

1. 入：小武陵鄉嘉禾二年財用錢六千。𠄎嘉禾二年八月三日，前渚丘男子孫直付，庫吏殷連受。 2828

此簡中繳錢男子的姓字釋為“孫”，與殘存的字形相差很大，這個字的左旁已經殘壞，右旁是“木”，不能確釋。他的名字應當釋為“原”，偏旁從“广”，是從“厂”之異形，下部則寫作幾個小點。《廣碑別字》177 頁引《漢衡方碑》“原”字即如是作。^①在《田家菑》4·591 號簡有“潘原”，第二字上部與原字全同，但下部為四點，當時為審慎，依樣照摹，現在看來，也應該釋為“原”。

（八）“辛”誤釋為“聿”

5820 號簡有一個女性的名字叫“辛”，整理者誤釋為“聿”，我們校正後的簡文為：

1. [相]母辛，年卅二，在本縣。留。 5820

此字頂上一筆是一斜點而不是橫畫，也沒有向下彎折的一筆；中央一豎不出頭，不應釋為“聿”；“立”頭以下部分短橫有三畫之多，應是書寫者的習慣寫法，簡文中下面的那個“年”字，橫畫多達五筆，可見這位書寫者喜歡隨意增添橫畫。

① 秦公等：《廣碑別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

(九) 是“何城”，不是“何誠”

1623 號簡有一位“何城”，整理者將他的名字“城”字誤釋為“誠”。此簡簡文為：

1 入：都鄉口算錢五百一十。 𣎵嘉禾元年十一月五日，僕□丘何城付庫[吏] □

1623

“城”字被誤釋為“誠”，是將此字的左側偏旁看錯。此字左旁從土不從言，漢晉時“土”字下面橫畫右側常加一羨點，整理者或誤以為下方作口形，遂誤釋為“誠”。實際上，走馬樓簡牘中“誠”字屢見，如 1146、1348 等簡，左側的言旁很清楚，與 1623 號簡的寫法迥然不同。

順便指出，此簡中的地名“僕□丘”的釋讀，第一個字“僕”，也不準確。此字在正文中釋為“僕”，而在《地名索引》中寫作“僕”（1169 頁）。其實根據都不足，應暫且存疑，待今後發現可參照的字形再釋讀。

(十) “溪”字訛變造成誤釋

走馬樓竹簡因書寫者水準高下不一，常有一些隨意的寫法很不合規範，造成整理者釋讀的錯誤，如 1628 號簡的“漠”字就是這種情形造成的錯釋。該簡簡文為：

1. 右[漠]家口食□二人。

1628

“漠”，應釋為“溪”，右旁的“奚”，寫作“𡗗”，上為十形，中為幺或變形，下為大，是奚的訛變。這種寫法的“溪”字，見於 8271（橫溪丘）、5015（橫溪丘）、8195（橫溪丘）等簡，在這三簡中，整理者都正確地將“溪”字釋出了，而在 1628 號簡中，却誤釋為“漠”。同樣，在 7002 號簡中，整理者正確地釋讀了“東溪丘”，但是却將 6182 號簡中相同的地名誤釋為“東流丘”。這也是對“溪”字的訛變不够了解造成的錯誤。

(十一) “王蜀”應釋為“王署”

1629 號簡中有一位繳納財用錢的男子，整理者疑為“王蜀”，其釋文為：

1. 入：南鄉財用錢一千四百。 𣎵嘉禾元年十一月十日，大男王[蜀]（？）付□

按，疑為“蜀”字的那個字，“𡗗”字頭下並無“勹”形，而是潦草寫法的“者”形，下方的“日”形很清楚。因此，此字無疑應當釋為“署”。

總之，我們閱讀第二卷有一點體會是，凡釋文的地名、人名有特別怪異的字形者，凡與走馬樓吳簡文字扞格難通，與整體文例、辭例不合者，都應當仔細核對圖版加以審視，本文所舉第二卷中的地名、人名的誤釋，祇是筆者讀書筆記中的一部分，限於時間和篇幅，先就此打住，容今後有暇時繼續整理公布。^①

① 為便於排印，本文將原釋文中據殘筆與文例補出的字外面所加的□號，改為[]號。連續數字外加□號，則僅在一頭一尾加[]號。

走馬樓吳簡“地僦錢”考

◎ 中國文物研究所

李均明

內容提要 走馬樓三國吳簡中屢見“地僦錢”的記載，“地僦錢”亦簡稱爲“僦錢”。與“地僦錢”相關的文書形式主要有各級行政機構編制的“僦錢”或“地僦錢”之“人名錢數簿”，它是徵收“地僦錢”的統計賬；“捐除地僦錢名簿”，它是免征“地僦錢”的名單；尚見有關“地僦錢”的往來文書，其中主要是上級督促下級徵收“地僦錢”的下行文及下級彙報執行情況的上行文。

“地僦錢”乃指租賃土地的款項，傳世古籍多寫作“僦地錢”，義同。所租土地當用作宅基地，所以一旦房屋毀壞、無人居住，徵收的前提條件就不復存在，有關官員便須爲之乞請免徵“地僦錢”。今見徵收“地僦錢”的對象皆爲臨湘邑下居民，戶主身份包括大男、大女、郡士、部司馬等，按戶平均攤派，皆爲每月每戶五百錢。

關鍵詞 吳簡 地僦錢 宅基地

走馬樓三國吳簡中多見“僦錢”、“地僦錢”，未見於史載。宋超先生在《吳簡所見“何黑錢”、“僦錢”與“地僦錢”考》一文中已做過考證^①，論說近是，其結論給讀者許多啓發。本文擬在宋文的基礎上，從文書行政的角度，補充新的資料進行考證，有不妥之處，望大家指正。

^① 宋超：《吳簡所見“何黑錢”、“僦錢”與“地僦錢”考》，載《吳簡研究》第一輯，崇文書局，2004，236—248頁。

一、有關資料的文書學考察

有關“僦錢”、“地僦錢”的簡文數量甚多，可劃分為幾種不同的文書類型，每一種類型都有特定的用途與內涵，其間又有緊密的聯繫，是當時行政運作之不同階段的產物，對理解文義有很大幫助，試析如下。

今見數量最多的是“僦錢”、“地僦錢人名錢數”簿，如：

| | | | |
|---------------|-----------|-----------|--------------------|
| (一)大男趙□僦錢月五百 | 大男楊樊僦錢月五百 | 大男王而僦錢月五百 | 4362 ^① |
| (二)大男□□僦錢月五百 | 大男潘□僦錢月五百 | 大男□求僦錢月五百 | 4375 |
| (三)大男王錢僦錢月五百 | 大男周德僦錢月五百 | 大男丁終僦錢月五百 | 4387 |
| (四)大男榮閭僦錢月五百 | 大男史侯僦錢月五百 | 大男趙阿僦錢月五百 | 4401 |
| (五)大男陳□僦錢月五百 | 大男□□僦錢月五百 | 大男董厚僦錢月五百 | 4449 |
| (六)大男張士僦錢月五百 | 大男李自僦錢月五百 | 大男衛朱僦錢月五百 | 4603 |
| (七)大男陳頓僦錢月五百 | 大男□ | | 4727 |
| (八)□僦錢月五百 | 大男冀才僦錢月五百 | | 4740 |
| (九)□僦錢月五百 | 大男吳而僦錢月五百 | | 4916 |
| (一〇)□就昌僦錢月五百 | 大男董直僦錢月五百 | | 4623 |
| (一一)□男趙何僦錢月五百 | | | 13286 ^② |

以上十一例皆為大男月交僦錢五百的登錄。完整的簡通常每簡登錄三人的情況。

| | | | |
|----------------|-----------|-----------|------|
| (一二)□僦錢月五百 | 大女黃□僦錢月五百 | 大女□□僦錢月五百 | 4450 |
| (一三)□□馬僦錢月五百 | 大女黃石僦錢月五百 | 大女尹汝僦錢月五百 | 4465 |
| (一四)□……僦錢月五百 | 大女李汝僦錢月五百 | | 4474 |
| (一五)□大女黃汝僦錢月五百 | | | 4642 |

以上四例交納僦錢者含大女。

| | | | |
|---------------|-----------|-------------|------|
| (一六)大男張用僦錢月五百 | 大男趙馬僦錢月五百 | □部司馬鄭陵僦錢月五百 | 4461 |
|---------------|-----------|-------------|------|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文物出版社，2003。

② 本文引錄走馬樓吳簡凡 10536 號以後的簡例，皆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貳]所載，即刊。

- (一七) □谷僦錢月五百 大男張□僦錢月五百 郡士杜黑僦錢月五百 4490
 (一八) 大男□虎僦錢月五百 [郡士]□ 4728^①
 (一九) 郡士劉岑僦錢月五百 郡士韓主僦錢月五百 大女黃汝僦錢月五百 4549
 (二〇) 郡士張□僦錢月五百 大女王汝僦錢月五百 大女鄭汝僦錢月五百 4601
 (二一) 郡士馬伯僦錢月五百 郡士朱主僦錢月五百 郡士王徽僦錢月五百 4390
 (二二) [郡士錢曼]僦錢月五百□ 4823

以上七例交納僦錢者尚含部司馬及郡士。

- (二三) □毛金僦錢月五百□ 4773

此例當事人身份因簡文斷缺未可知。以上二十三例所交納款項皆稱“僦錢”。

- (二四) 大女袁汝地[僦]錢月五百□ 18137
 (二五) 大女陳汝地僦錢月五百□ 18121

以上二例所交納款項稱“地僦錢”。

- (二六) □僦錢月五百 13286

以上例(一)至(二六)皆為登錄交納僦錢、地僦錢的賬簿正文，通常每簡分三欄，每欄含身份、姓名、月交僦錢或地僦錢數量。身份包括大男、大女、郡士、部司馬。無論“僦錢”還是“地僦錢”，月交數量皆為五百。

- (二七) 右七戶戶月收僦錢五百，合三千五百，右前復被□□ 4491
 (二八) 右六戶僦錢月三千……錢起七月一日訖九月卅日 4608^②
 (二九) 右□□□□□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4550
 (三〇) 右冊五戶月收僦錢合二萬二千五百 4462

以上四例皆為交納僦錢賬簿中的合計項，其中例(二七)、(二八)為六、七戶人家範圍的合計；而例(二九)、(三〇)為四十五及四十七戶範圍的合計。四十多戶人家相當於

① 本文引錄凡[]內文字皆為原簡字迹不甚清晰的釋文。

② 此例原書釋文作“右六十人僦錢月三千……錢起七月一日訖九月卅日”，今據胡平生先生意見修定。

當時“里”的規模，如 5576 簡見某里“領吏民合五十八戶”；10397 簡“右吉陽里領吏民卅六戶，口食一百七十三人”；10229 簡“右高遷里領吏民卅八戶，口食一百八十人”。

| | |
|-----------------------|------|
| (三一) 二月領地[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 4430 |
| (三二) 領四月地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 4351 |
| (三三) 領九月地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 4350 |
| (三四) 領九月地僦錢二萬三□ | 8724 |
| (三五) 領□[月]地僦錢二萬三千五百 | 4369 |
| (三六) □□三月[簿]領地僦錢合七萬五百 | 4432 |

以上五例為行政當局收領地僦錢的統計數，其中例（三一）至（三五）收領的錢數為二萬三千五百，恰好與例（二九）所見錢數合，當為收領四十七戶地僦錢的合計。例（三六）簡文上段缺，但其錢數“七萬五百”亦恰好為月收“二萬三千五百”乘以三的倍數，或為季度統計。

| | |
|--------------------------|------|
| (三七) 臨湘謹列起四月一日訖六月卅日地僦錢□簿 | 4352 |
| (三八) [臨]湘謹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錢人名為簿 | 4357 |
| (三九) □□地僦錢人名錢數□□ | 4431 |

以上三例皆為地僦錢簿之標題，例（三七）、（三八）所見制簿者皆為臨湘侯國，其中例（三七）署明統計期間為“四月一日訖六月卅日”，當為季度統計；而例（三八）未署明統計期間，或為月計。例（三九）簡文上下皆缺，但中段文例與前二例合，故列於此。

賬簿之外，尚見有關地僦錢的往來文書，如：

| | |
|-------------------------------------|------|
| (四〇) 府前言絞促市吏□書收責地僦錢，有入言。靖叩頭死罪死罪。案文書 | 4397 |
| (四一) 所領地僦錢三□□□□言□叩頭叩頭死罪 | 4532 |

以上二例見“叩頭死罪死罪”或“叩頭叩頭死罪”語，為上行文常用語^①，知此二例皆為有關地僦錢的上行文。“靖”為臨湘侯相，見 2885 簡：“月十一日癸酉臨湘侯相靖叩頭

① 對長輩及上級行文稱“叩頭死罪”亦見於漢簡，如《居延新簡》EPT44·4A：“十一月廿二日具記，習叩頭死罪言。”

死罪敢言之。”則知例（四〇）所見為臨湘侯國上報長沙郡府的文書。

| | |
|-------------------------------------|------|
| （四二）臨湘言部吏潘玗收責食地僦錢，起正月一旦訖三月卅日□有入悉畢□□ | 4345 |
| （四三）□中部督郵書掾□□臨湘……責地僦錢□月五 | 4359 |
| （四四）□前言絞促臨湘□□所領地僦錢三月一日 | 4486 |
| （四五）□得□□收責□□僦錢宜□屬領所部吏 | 4348 |
| （四六）月廿日收責□地僦錢悉畢就留…… | 4411 |

以上五例亦為有關地僦錢的往來文書，但運行方向未能確認，大部分或為上行文殘簡。

捐除地僦錢名簿：

| | |
|----------------------------------|--------------------|
| （四七）□右一人地僦錢月五百□遇年九（？）月□被□物 | 18156 ^① |
| （四八）右二人地僦錢月……[屋]□壞敗，地上無人居止， | 18177 |
| （四九）右一人[地僦錢]月五百…… | 18145 |
| （五〇）□病，屋壞敗，地上無人居止，無所收責，乞捐除錢，起今 | 18164 |
| （五一）□……地上[無]人[居止]，錢無所收 | 18158 |
| （五二）□□□地上無人居止，應□ | 18135 |
| （五三）[地上無]人居止，錢無所收□ | 18134 |
| （五四）起今年正月一日[訖]十二月[卅日]…… | 18161 |
| （五五）□……所收責，乞捐除，起□年正月訖十二月卅日，錢合一萬二 | 18151 |
| （五六）□今年正月一日訖十二月卅日為錢六□應捐除名 | 18164 |
| （五七）□正月訖十二月卅日□應[捐除名] | 18152 |
| （五八）□千，應捐除錢名 | 18170 |
| （五九）應捐除[錢]名 | 18364 |

以上十三例為應捐除錢名簿，根據例（五六）、（五七）與例（五四）、（五五）文例之重合部分考察，所捐除者亦當為地僦錢。

① “物”原書釋文作“收”，今據圖版及文例修定，文見例（六一）“被病物故”。

與扣除地僦錢相關的其他文書：

(六〇) □□都吏察□居止，故居地[無]人居止，應□ 17955

(六一) □□地[僦]錢月簿以過□一月十被病物故妻女單身□ □ 18157

以上二例所見皆與地僦錢相關，例(六〇)“故居地[無]人居止”，文例見例(五〇)、(五一)、(五二)、(五三)等；例(六一)則徑見“地[僦]錢月簿”，所謂“地僦錢月簿”即按月徵收地僦錢的賬簿，如前文例(一)至(二六)所見。

二、相關問題的考析

上文引述簡例所見，無論是“僦錢”還是“地僦錢”，其徵收或免除數量都是每户月五百，絕非偶然，當有所據。格式相同之例(一)至(二五)名簿中，例(一)至(二三)款項稱“僦錢”，而例(二四)及(二五)稱“地僦錢”，二者性質相同，所謂“僦錢”當為“地僦錢”之簡稱。

何謂“地僦錢”？不妨從“僦”字談起，《說文新附字·人部》：“僦，賃也。”《漢書·王莽傳》：“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師古注：“僦，送也，一曰賃也。”《後漢書·虞詡傳》：“驢馬負載，僦五致一。”注引《廣雅》：“僦，賃也。”當然，租賃之對象範圍廣泛，既包括人力、車馬，如《漢書·鄭當時傳》：“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師古注：“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又《漢書·田延年傳》：“初，大司農取牛車三萬兩為僦。”師古注：“僦，謂賃之與雇直也。”也包括土地、房屋及其他物品，如《梁書·武帝紀》：“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為蠹已甚。”是說把公田租賃給貧民百姓，收徵高額地租。又韓愈《送鄭權尚書序》：“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僦屋，猶今言租房子。再如《宋史·度宗本紀》：咸淳元年正月詔有言曰：“免徵臨安官私房僦地錢。”此“僦地錢”與簡文“地僦錢”義當同，皆指租賃土地而言，而且所租土地皆用於建屋蓋房（詳下）。

“地僦錢”按戶徵收，每户月交五百錢，例(二七)見“戶月收僦錢五百”，例(二八)及(三〇)雖未寫明“戶月收僦錢五百”，但以交錢總數與戶數相除，亦合每户五百錢。例(一)至(二五)所見每人月交僦錢五百，此人當為戶主，代表所在戶交納僦錢。走馬樓吳簡所見通常皆以戶主代表該戶交納相關租稅，如《嘉禾吏民田家莧》所載皆是。^①今

①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走馬樓簡牘整理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文物出版社，1999。

見戶主身份包括大男、大女、郡士、部司馬等。

今已公布的簡文顯示，徵收地僦錢的對象為臨湘邑下居民，例（三八）見名簿標題“臨湘謹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錢人名為簿”。例（三一）至（三五）所見徵收地僦錢月總額皆為二萬三千五百，徵收對象當較固定，或為臨湘邑其中一個里的定額。與地僦錢相關的上下行文書收發雙方，分別為長沙郡府與臨湘縣廷，故此“邑下”當指臨湘縣（侯國）治所所在城區，亦稱“都鄉邑下”，4404簡即見“都鄉邑下”的稱謂。“邑下居民”猶今言“城鎮居民”。交納地僦錢的居民職業，除郡士、部司馬當與身份相符外，稱“大男”、“大女”者則有多種可能。都鄉之外的諸鄉是否也徵收地僦錢，僅靠現有資料未能得出結論。

據例（四七）至（五五）所見，徵收地僦錢與居屋直接相關，一旦地面房屋毀壞、無人居住，徵收的條件不存在，負責徵收者便乞請“捐除”地僦錢，故此類簡文皆有“屋壞敗，地上無人居止，無所收責，乞捐除”語，以表明“捐除”的理由。例（五六）至（五九）見“應捐除名”，所“捐除”為地僦錢的可能性居多。捐，捐棄，《後漢書·循吏列傳》：“捐上林池籩之官，廢馳望弋獵之事。”《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晉書·元帝紀》：“昔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除，弃除。“捐除”指弃除、放弃，見於較晚的史籍，如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七十三載：“紹興四年二月……如上件金銀絹未可捐除，即乞嚴戒州縣樁簇官錢和買，不得於人戶名丁科配。”明代呂柟撰《四書因問》卷四《子張篇》云：“於凡世上，榮華富貴都要捐除，要淡薄方好。”由此可知，走馬樓吳簡“地僦錢”乃指徵收建屋其上的宅基地錢，與上文所引《宋史》“官私房僦地錢”相類。“地僦錢”平均攤派，戶月五百錢，當與城區房屋密度較大，各戶占地差異不會太大有關。至於為什麼要按月徵收，簡文未透露更多的信息。

例（四〇）見經手“地僦錢”事宜的官吏中包括“市吏”，其原因存在兩種可能：一為房屋土地位於市鎮區域，故由其統管徵收。二是這些房屋土地與商務相關，故由其直接管理。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後者之疑問與居民身份相關：大男、大女無疑有可能經商，但郡士、部司馬受職業之限制當不可經商，除非由其家屬經營。目前尚缺得出結論之佐證資料。

簡帛書籍標題研究^①

◎ 西南師範大學文獻所

張顯成

內容提要 標題是古書體制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我國上古書籍標題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簡帛文獻尚未大批問世以前，這一課題的研究是不具備條件的。本文先縱向描寫戰國楚簡、秦簡、兩漢簡帛書籍中的標題狀況，逐一進行清理分析，然後予以總結歸納，探其規律。通過研究認為：我國書籍的標題先秦就早已大量存在。簡帛書籍標題的位置可歸納為標題在正文後、標題在正文前、標題并在正文前後、標題近於正文首四種類型，其書寫位置處於比較隨意而不固定的階段，認為上古文獻“標題在後”為定式的傳統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若一種文獻總標題與子標題俱在，則總標題與子標題的位置可能有五種組合形式。標題大都有一定的標志。子標題的前或後有時附有相關的文字。有些標題層次較複雜。標題的有些特點是由其自身書寫材料所決定的。研究簡帛書籍標題有利於認識我國上古文獻標題的內在規律，修正和完善過去的認識，有利於建立科學的古籍制度史。

關鍵詞 古書體制 簡帛書籍 標題研究

一、引言

所謂“標題”，就是正文文字的題目。簡帛書籍標題，指簡牘帛書書籍正文文字的題目。我國是個文明古國，古籍極其豐富，標題是古書體制研究的重要課題。後世書籍的標題

^① 2002年7月在上海大學召開的“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提交論文《簡帛標題初探》，後收入大會論文集《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謝維揚、朱淵清主編，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本文是在該文基礎上的進一步研究。本文原稿對簡帛書籍標題曾有頗詳細的描寫，由於版面所限，對此進行了較大的壓縮，特別是對《簡帛標題初探》已述及的內容，壓縮尤多，請讀者見諒，也請讀者參見該文。

是從上古書籍的標題發展而來的，而上古書籍的標題到底是個什麼樣，過去在地下有關材料未問世以前，實際上是不具備研究條件的，因為人們見到的上古文獻，絕大部分是傳世文獻，這些流傳兩千來年的文獻，很難說還保留了多少書籍體制的原貌。

簡帛書籍是現在我國見到的最早的書籍。^①百年來，我國的簡牘帛書陸續大量出土，其驚人的數量是過去誰也想像不到的，據筆者粗略統計，簡帛總數已達約 22 萬枚（件），總字數約 700 萬字，簡帛的數量正向着與傳世的先秦兩漢文獻并駕齊驅的方向發展。簡帛分書籍和文書兩大類，其中書籍十分豐富，為我們研究上古書籍標題這一課題提供了空前良好的條件，使我們可以藉之進行一些探究，弄清上古書籍標題的面貌。本文即擬以已公布的先秦兩漢簡帛書籍為研究材料，對其中的標題進行初步的研究，希望能對中國古籍制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標題的命名應當屬標題研究的内容，但就現有的簡帛材料來看，簡帛標題的命名還看不出與傳世文獻有多少不同之點，故本文不研究簡帛標題的命名。

簡帛書籍和文書各自標題的狀況不盡相同，各有其不同的特點，故對簡帛標題的研究應當分為書籍和文書兩部分來進行。本文僅研究簡帛書籍的標題，至於簡帛文書標題的情況，擬另文研究。

在研究簡帛書籍標題時，我們把標題分為“總標題”和“子標題”兩大類：

所謂“總標題”，是指某一種文獻總的標題。若該文獻是一部書，則這部書的名稱即總標題，如張家山漢簡有一部數學專著《筭（算）數書》，其書名即總標題；若該文獻是一篇文章，則這篇文章的名稱即總標題，如尹灣漢簡中有一篇賦《神鳥傳（賦）》，其篇名即總標題。

所謂“子標題”，是指某一種文獻內各相對獨立的段落的標題。若該文獻是一部書，則指這部書的篇章標題；^②若該文獻是一篇文章，則指這篇文章內的小標題。子標題是總標題的下位層次標題，某一總標題下可能有幾個甚至很多個子標題。如張家山漢簡《筭（算）數書》這部書，下分《相乘》、《分乘》、《約分》等 69 章，其每一章的章名即子標題；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這部書，下分《擒龐涓》、《形》、《火攻》諸篇，這些篇的篇名即子標題。再如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這篇文章，下分《道法》、《國次》、《君正》等 9 章，其每一章的章名即子標題。

簡帛有標題的書籍，不一定總標題子標題都齊全，或祇有總標題，或祇有子標題。

簡帛出土時，有不少文獻無總標題，整理者為便於稱謂都給它們擬加了總標題，本文所稱引的總標題，凡文中未指出是簡帛原件上所書者，均為簡帛整理者所擬加，於此，下文

① 書籍，是指成本的著作，故甲骨文、金文不能視為書籍，祇能說是“文書”。

② 篇章標題，即篇題和章題。篇題，又稱篇名。章題，又稱章名。

不再一一說明。

下面，我們先盡可能窮盡性地縱向描寫簡帛書籍中的標題狀況，逐一進行清理分析，然後予以歸納總結，探其規律。這裏還需要說明幾點：一、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我們把簡帛律文歸入書籍，而不歸於文書。二、對簡帛內容及其標題位置的認定，我們原則上是以文字清楚明白者為準和以整理成果為準，若有與整理者不同的意見，則在行文中予以說明。三、為便於排印，將所引簡帛中個別的生僻字改為通行體，個別生僻的通假字也徑出本字。

二、描 寫

以下按戰國楚簡、秦簡、兩漢簡帛的順序，對其書籍中的標題狀況逐一進行描寫分析。至於六朝簡牘，一則內中無典型的書籍，二則已不屬上古書籍研究範圍，故本文不涉及這批簡牘。

（一）戰國楚簡中所見標題

出土的戰國楚簡牘和楚帛書均有，但帛書未見標題，不屬本文研究材料，故這裏只言戰國楚簡。戰國楚簡書籍中有標題者不多，比較清楚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其書籍“近百種”，“這批簡的背面記有書的篇題，如《子羔》、《恒先》等約 20 篇，失去篇題的竹簡，文字內容也都是古籍”。^①也就是說，這批楚簡中還保留有總標題者有 20 來種。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現祇公布了少部分内容，即馬承源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二）、（三）、（四）。其中 6 種有總標題（未見子標題）：

《子羔》 三道編^②，先編後寫，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共存 14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③總標題“子羔”二字獨立書於第 5 枚簡背面中間編綫上方，正面為正文。^④整理報告於第 2 簡注曰：“據文意其前當殘一簡。”也就是說，今所見的標題簡為第 5 簡，原本實是第 6 簡。

《訟城氏》 訟城氏，讀為“容成氏”。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存 53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總標題“訟城氏”三字獨立書於最末一簡背面中間編綫上方。^⑤整理報

① 恒先，原簡作“互先”，詳下文。

② 有標題的簡冊書籍的編綫情況是，兩道編綫至五道編綫均有，其中三道編綫為多。按一般通行的說法，第一道編綫指上端編綫，也稱“首道編綫”，以下順次為第二道編綫、第三道編綫、第四道編綫、第五道編綫等，下端編綫也稱“末道編綫”，三道編的第二道編綫和五道編的第三道編綫也稱“中間編綫”。

③ 簡牘正文單面書寫者為多，雙面書寫者少；帛書均為單面書寫。

④ 本文所說的簡的“正面”、“背面”，均指正文單面書寫簡而言。正面，指正文書寫面；背面，指正文反面。至於雙面書寫簡整理者編序之“正”和“背”、“反”，則與本文所說的“正面”、“背面”所指各異。

⑤ 本文言及總標題時所說的開篇第一簡或文末最後一簡，均不包括編首或編尾的護葉簡，況本文所述有總標題的簡冊，均未見可確認的護葉簡。

告認為，該簡正文未完，後面當還有一兩枚簡的文字，標題“估計是在倒數第2、3簡的背面”。因為其標題的位置不能確定，故為慎重起見，此種暫不列入下文“三”討論簡帛標題位置之列。

《中弓》 中弓，讀為“仲弓”。正文單面書寫。共存簡28枚，能綴合成整簡者僅3枚。整理報告稱：“本篇第十六簡背有篇題‘中弓’。”因此篇文獻殘損厲害，文意頗不完整，整理者所排簡序難以作為定論，故為慎重起見，此種暫不列入下文“三”討論簡帛標題位置之列。

《互先》 讀為“恒先”。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全篇13枚簡，正文單面書寫。總標題“互先”二字獨立書於第3簡背面中間編綸上方。

《內豐》 讀為“內禮”。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存完殘簡10枚，正文單面書寫。總標題“內豐”二字獨立書於第1簡背面中間編綸上方。

《故蔑之戟》 讀為“曹沫之陳”。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全書共存簡65枚，正文單面書寫。總標題“故蔑之戟”四字獨立書於第2簡背面第一道編綸與中間編綸之中點處。

（二）秦簡中所見標題

出土的秦簡相對戰國簡來說要豐富一些，其書籍中有關標題的材料也要多一些，其中所見標題最多的是“睡虎地秦簡”中的書籍，其次是“周家臺秦簡”中的書籍。

1. 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簡有標題的書籍共7種^①，均為先編後寫的三道編冊，均有天頭地脚。或總標題、子標題均有，或祇有總標題，或祇有子標題。現分述之：

《語書》 共15枚簡，正文單面書寫。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語書”二字獨立書於末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

《秦律十八種》 是對十八種秦律的摘錄。共201枚簡，單面書寫。祇有子標題無總標題。每摘錄一段律文，均獨立成段為一章，子標題章名書於章末，與該章正文末之間大都有有一定的空白距離，空白少者約0.5字，多者10多字。摘錄的同一種法律的不同內容，所書的章名相同（有時章名省稱），如開篇摘自《田律》的文字共6段，分別為簡1—3、4—7、8—9、10、11、12，便在這6段文字後均書章名“田律”二字。章名共18個109見。

《效律》 共60枚簡，正文單面書寫。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效”字獨立書於首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

《秦律雜抄》 同《秦律十八種》一樣，內容也是從秦律中摘錄出的部分律文。共42

① 睡虎地秦簡共出土了兩個《日書》本子，整理者以“甲種”、“乙種”別稱之。本文為研究的方便，將這兩個本子計為兩種。

枚簡，單面書寫。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所摘的各段律文獨立成爲一章，這些章有的有子標題章名（即標明原爲何律），有的無子標題章名（即未標明原爲何律）。章名多緊接該章正文末書寫（不像《秦律十八種》正文末與章名之間留有空位），且多在章名前打上圓點“●”。^①各章之間不提行而連寫，若章名與下一章章首同於一簡，則下一章正文前也打上圓點“●”以示爲另起一章；若章名位於簡末而下一章始於下一簡時，則下一章正文前一般不打圓點“●”。所見章名共9個。

《封診式》 共98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有天頭地脚。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總標題“封診式”三字獨立書於末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子標題章名書於每章首，全書共二十五章，均有章名。每章均提行書寫，先於天頭書章名，然後從第一道編綸下沿開始書正文。

《日書》甲種 共166枚簡，有天頭地脚。雙面書寫，行文先正面後背面。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②簡冊或分欄或未分欄。每章均提行書寫而爲獨立的段落。章名書寫位置較複雜，含以下四類：

第一類，章名書於章首并高於正文。若該章書於未分欄之簡或書於簡之第一欄，則章名書於天頭，正文始於第一道編綸下沿；若該章書於簡之第二欄，則章名書於第二欄正文文字之上，并在章名前打上“●”，以與上一欄文字隔開。這類章名共24個。

第二類，簡冊未分欄，章名第一字、第二字分書於該章第1簡、第2簡天頭，即高於正文。此類情況見於《盜者》章和《土忌》章。

第三類，見於簡118背—128背的《衣》章，簡冊未分欄，該章正文始於簡118背第一道編綸下沿，正文前的天頭打一“■”，表示下文爲另起一章，章名書於簡119背天頭。此類章名位置當屬上述第一類的誤寫：本當將章名“衣”寫於該章第1簡（簡118背）天頭，而書者誤寫於第2簡天頭，發現後便在第1簡天頭打一“■”，表示章首。此誤寫當是書者先抄該章正文後抄章名所致。既然屬誤寫，則不列入下文“三”討論簡帛標題位置之列。下同。

第四類，見於簡156背—160背《馬祿》章，簡冊未分欄，章名第一字“馬”書於首簡天頭，第二字“祿”接着書於第一道編綸下沿，緊接着是正文。此類章名位置當屬上述第一類的誤寫：本當將章名“馬祿”二字一并寫於天頭，而書者將第一字“馬”寫得較大，致使天頭已無法容下二字，遂將第二字“祿”寫於第一道編綸下沿。

《日書》乙種 共260枚簡，單面書寫，有天頭地脚。總標題和子標題均有。總標題“日

① 簡帛中的圓點，在不同的文獻中，有的較大，有的較小，本文統稱爲“圓點”，不再區別其大小。

② 有的學者稱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子標題爲“篇名”，考慮到其子標題中有些所轄篇幅太小，以及縱觀各地出土簡帛《日書》的整體狀況，本文稱“章”不稱“篇”。

書”二字獨立書於末簡上方，與第一道編綸下沿之間有約 2 字的距離。簡冊或分欄或未分欄。每章均提行書寫而為獨立的段落。其子標題章名書寫位置較複雜，茲按清楚明白者列之，有以下六類：

第一類，章名書於該章首簡天頭，即高於正文；個別章名前有圓點“●”。共 26 個。

第二類，章名雙行書寫，書於該章第 1 簡天頭，即高於正文。天頭以下的正文為單行書寫。共 5 個。

第三類，見於簡 80 壹—107 壹的《官》章。章名“官”字書於該章第 2 簡（簡 81 壹）天頭，該章所書的“正月”（簡 80 壹）、“三月”（簡 84 壹）、“四月”（簡 86 壹）等月份名也一并書於天頭（即高於正文）。^①這些月份名以下所轄正文均獨立成段。實際上，書者筆下的這些月份名，為《官》章下一層次的子標題，故均書於各段天頭。因第一個下一層次標題“正月”所書位置，既是該下一層次標題所在段落的首簡天頭，又是該章首簡天頭，致使章名“官”字已無法書於此，故便改書於第 2 簡天頭。

第四類，章名書於該章第 2 簡天頭，即高於正文，第 1 簡天頭有一表示分章的粗橫綫“—”（有的粗橫綫畫成近於方墨塊），共 6 個。此類當屬上述第一類的誤寫：本當將章名書於該章首簡天頭，而誤寫於第 2 簡天頭，遂在首簡天頭打“—”表示章首。此誤寫當是書者先抄該章正文而後抄章名所致。

第五類，見於《有疾》章，章名書於該章第 3 簡天頭，第 1 簡天頭有一表示分章的粗橫綫“—”。此章名位置當屬上述第一類的誤寫，與上述第四類之誤寫同理。

第六類，見於簡 78—79 的《見人》章^②，章名第一字書於上一章末簡（簡 77）天頭，第二字書於本章第 1 簡（簡 78）天頭，均高於正文。此章名位置當屬誤寫：“見人”二字本當分別書於本章第 1 簡天頭和第 2 簡天頭^③，而書寫者誤置於上一章末簡天頭和本章首簡天頭。此誤寫當是書者先抄章節正文而後抄章名所致。

2. 周家臺秦簡

周家臺秦簡中有標題者共 2 種，它們均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現分述之：

《日書》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 178 枚簡，單面書寫。其子標題章名書寫位置有三類：

第一類，簡冊未分欄，各章獨立成段，章名書於章首天頭，即正文之上。共 10 個。

第二類，簡冊分欄，章名書於章首，獨立占該簡所分之欄，見於章名“產子占”。

第三類，簡冊未分欄，章名第一字書於該章第 1 簡天頭，第二字書於第 2 簡天頭，均高

① 該章書寫格式與它章殊不相同，故章首雖無表示分章的橫綫類標志，但章首之起始是清楚的。

② 此章章名整理報告未釋出。

③ 即其標題書寫位置本當如上文所述《日書》甲種的第二類。

於正文。見於章名“此檣”。

《病方及其他》 兩道編，先寫後編，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共存 73 枚簡，單面書寫。內中有不少標志方劑名稱的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第 1 簡首端，與正文文字同高，章名前常有表示分章的圓點“●”。共 6 個。

（三）兩漢簡帛中所見標題

出土所見兩漢簡帛甚為豐富，其數量遠遠超過楚簡和秦簡，故其書籍中所見標題也甚多。下面逐一進行描寫分析。

1.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的抄寫時間為西漢末年^①，該批漢簡的主體是三個《儀禮》本子，甲本、乙本四道編，丙本五道編，均先編後寫，均有天頭地脚。共 469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均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篇題，可分三類：

第一類，在開篇第 1 簡背面獨立書篇次“第×”，在第 2 簡背面獨立書篇題，篇次與篇題并行，均書於簡冊第二道編綫下沿。有的在篇次和篇題前打有圓點“●”。共 6 個 7 見。

第二類，在開篇第 1 簡背面第二道編綫下沿，獨立連續書寫篇題和篇次“第×”。僅 1 個。

第三類，在開篇第 1 簡正面天頭先打一圓點“●”，然後在第一道編綫下沿寫篇題（不書篇次），緊接着寫正文。僅 1 個。

2. 銀雀山漢簡

銀雀山漢簡的下葬年代為西漢武帝初年，這批竹簡抄寫於文、景至武帝初期。已知的銀雀山漢簡書籍有標題者 6 種，其中《唐革（勒）》祇有總標題，其餘祇有子標題。

《唐革》 讀為“唐勒”。未見圖版，材料僅見於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編數不明，頗為散亂，現存 20 多枚簡。僅見總標題書名未見子標題，書名“唐革”書於首簡背面（簡 0184 背）。

《孫子兵法》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存 233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該書另有一枚專記全書子標題篇題（即全書目錄）的木牘，還可以看出木牘上所記似為 13 個篇題。正文可見的篇題獨立書於篇首第 1 簡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共 8 個（與篇題木牘的 13 個不合，這自然是竹簡殘損所致）。

《孫臏兵法》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存 222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子標題篇題可分三類：

第一類，同於《孫子兵法》，獨立書於篇首第 1 簡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共 9 個。

^① 為便於下文“三”總結論述，以下逐一標明兩漢簡帛的抄寫年代或下葬年代。

第二類，書於篇末，在正文文字後空數位書寫。共 2 個。

第三類，在篇首之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和篇末均同時署上篇題。共 2 個。

《尉繚子》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存 72 枚簡，單面書寫。可見的子標題篇題 2 個，均書於篇末正文文字後，並在篇題前打上圓點“●”。

《六韜》 兩道編，先寫後編，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共存 136 枚簡，單面書寫。可見的子標題篇題書於篇末，緊接正文文字後打上圓點“●”書寫。共 4 個。

《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兩道編，先寫後編，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共存 224 枚簡，單面書寫。該書另有一枚專記全書子標題篇題（即全書目錄）的木牘，上書 13 個篇題。正文所見子標題篇題共 6 個（與篇題木牘的 13 個不合，乃簡殘所致。另，篇題“委積”與篇題木牘上所記“委法”不合），均獨立書於各篇之首簡正文上端，篇題前打有一粗橫綫“—”。

3. 武威醫簡

武威醫簡的下葬年代為東漢早期，共存簡 78 枚，牘 14 枚。^①簡三道編，先編後寫，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牘未編聯。簡單面書寫；牘 2 枚單面書寫，12 枚雙面書寫。牘祇有 1 枚為單行書寫，其餘均為雙行或多行書寫。該書記載了醫治各種疾病的醫方 30 多個，每方為一章，方劑名即章名。有些章重複抄寫，重複者祇有個別文字不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其章名可分 6 類：

第一類，章名書於章首，章首提行書寫，簡端多先打“●”、“●”、“●”類標誌^②，然後緊接着書章名。共 24 個。

第二類，章名書於章首，章首不提行而緊接上章書寫，標題前有“●”、“●”、“●”類標誌。共 6 個。

第三類，章名書於章首，章首不提行而緊接上章書寫，章名前無符號標誌。有以下章名：“治人卒（猝）雍（癰）方”，“治湯火凍方”。此類章名前雖無符號標誌，但因章名末字為“方”字，故章之起始還是清楚的。

第四類，章名書於章末，獨立書於一簡，於簡端先打一“●”符號，然後書“右×××方”。見於簡 78：“●右治百病方。”這裏的“右”字不是標題字。

以上四類章名大部分見於祇書一行字之窄簡，少部分見於書兩行或數行字的木牘。以下兩類章名則僅見於書兩行或數行字的木牘。

第五類，章名書於章末，緊接正文書“×××方”。見於簡 83 乙（木牘）“公孫君方”（此方當源自一位叫公孫的人，故名）。

① 簡的編號為 1—78，牘的編號為 79—92。下文括弧內標注標題出處時統一稱為“簡××”。

② “●”、“●”，實是“●”的不規則書寫形式。下同。

第六類，章名書於章首，大字書於木牘上方正中（行文仍從上往下），正文在標題下分數行書寫。共3個。

4. 馬王堆帛書

馬王堆帛書的下葬時間為西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這批帛書的標題較豐富，總標題和子標題均有。已知有標題的文獻計13種，除《天下至道談》屬簡冊外，其餘均為帛書。帛書或抄於高48厘米的整幅絹帛，或抄於高24厘米的半幅絹帛，均為單面書寫。^①現分述之：

《經法》 共77行。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總標題“經法”二字書於全書末，書末先書末章章名子標題“名理”，然後書總標題和尾數。“名理”前有一字空位。全書共九章，各章連寫不提行，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之末。除上述末章的“名理”外，其餘8個章名後均打一方墨塊“■”，再抄下一章（即“■”是下一章的標志）；章名的前後大都有0.3—1字的空位；並且往往章名前的空位要大些（這是因為章名後有“■”標志，章名前無此標志，故然）。

《經》 共65行。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總標題“經”書於全書末，書末先書末章章名子標題“十大”，然後書總標題和尾數^②。“十大”前有三字空位。全書共15章，各章連寫不提行，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之末。全書存章名14個，與《經法》相同，除末章章名“十大”外，其餘章名後均打一方墨塊“■”，再抄下一章；章名的前後大都有0.2—1字的空位；並且往往章名前的空位要大些。

《稱》 共25行。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稱”并尾數書於文末，“稱”字前有1字空位。

《道原》 共7行。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道原”并尾數書於文末，“道原”前有1.3字空位。

《老子》乙本 共78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篇題。分《德經》和《道經》兩篇，兩篇的篇題并尾數均書於篇末。第一篇“德”字前殘損，故篇題前有無空位不明；第二篇“道”字前有約1字空位。

《足臂十一脈灸經》 共存34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篇題。分《足》和《臂》兩篇，兩個篇題“足”和“臂”均書於篇首，並高於正文，其中“足”與正文間有2字空位，“臂”有1字空位。兩篇中各自又分段逐一闡述十一條經脈的有關情況，其中《足》篇六條，《臂》篇五條。除篇名下的第一條經脈外，每闡述一條經脈，就首先在段首高於正文處

① 迄今所見帛書均為單面書寫，未見雙面書寫者，且一般的絹帛祇能單面書寫。

② 《經》，整理小組原命名為《十大經》，後又改為《十六經》，均不確，其總標題當為《經》。並且，原以為該文獻最後一章無章名，亦不確。今依李學勤先生說。

打上圓點“●”，緊接着寫該條經脉名^①，然後是對該條經脉的闡述，故段首的經脉名實際上也可視作標題，當然已是下一個層次的子標題了。

《五十二病方》 共存 462 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每一章獨立成一段或數段，章名均於章首高於正文約兩字處開始書寫，章名與正文間無空位。共 52 個。

《養生方》 共存 219 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也是每一章獨立成一段或數段，章名均於章首高於正文約兩字處開始書寫。共 32 個。

《雜療方》 共存 79 行。無總標題，祇有子標題章名。每一章獨立成一段或數段，每章首高於正文處打圓點“●”，緊接着書章名和該章內容。該書計六章，往往在同一個章下的不同方劑前冠以相同的章名標題，章名共 6 個 13 見。

《天下至道談》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該書與另一種醫書《雜禁方》共為一卷，全卷共 67 枚簡，單面書寫，其中木簡 11 枚，竹簡 56 枚。由收卷式樣可知，木簡捲在外，竹簡捲在內，行文先木簡後竹簡（即先讀木簡，後讀竹簡），木簡編號為 1—11，竹簡編號為 12—67。內中的第 17 簡（即竹簡的第 6 簡）為標題簡，據整理報告，總標題“天下至道談”五字獨立書於該簡正面第一道編綫下沿。整理小組將木簡命名為《雜禁方》，將竹簡依第 17 簡文字定名為《天下至道談》。^②參加馬王堆醫書整理的馬繼興先生將簡 17—67 定名為《天下至道談》，即將第 17 簡作為《天下至道談》的開篇第 1 簡；將第 17 簡以前的文字（簡 1—16）命名為《雜禁方》，但將木簡（簡 1—11）視為正文，竹簡（簡 12—16）視作“《雜禁方》卷末佚文”。^③也就是說，在如何劃分這一編簡文所含兩種書各自篇幅的問題上，目前學術界的意見還未統一。所以，為慎重起見，下文“三”討論簡帛標題位置時，暫不把《天下至道談》的標題列入討論之列。

《要》 共約 24 行。文首文字殘，但尚存開篇頂端墨塊。無子標題，祇有總標題。總標題“要”與尾數并書於文末。

《繆和》 共約 70 行。開篇頂端也有墨塊標志。無子標題，有總標題。正文末空一字書總標題“繆和”。

《昭力》 共存 14 行。緊接《繆和》提行書寫，但頂端無墨塊標志。無子標題，有總標題。正文末空一字書標題“昭力”二字，接着又空一字書尾數“六千”。^④

4. 阜陽漢簡

阜陽漢簡的下葬時間為西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 165 年）。已知保存有標題的文獻

① “●”雖然高於正文，但與正文間無空位，故位置明顯低於篇名。

② 詳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天下至道談釋文注釋》，第 17 簡注，文物出版社，1985。

③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1006—1016 頁。

④ “六千”實是《繆和》與《昭力》二種字數的總計數，故《繆和》無尾數。

是《詩經》^①，但殘損厲害，僅存殘簡約 170 枚。據推測當是兩道編，先寫後編，有天頭地脚。未見總標題，只見子標題國風名和詩名。這些子標題前都畫有一粗橫綫“—”或“■”（前者稍細一些，後者稍粗一些）。《詩經》雖已無完簡，但標題簡的粗橫綫前未見有留白，標題後的餘簡部分留白無字，故整理者研究認為，其標題是與粗橫綫一并獨立占一簡，書於第一道編綫下沿。^②分為兩類：一類是在每首詩後將該詩名稱與粗橫綫獨立書於一簡第一道編綫下沿，如簡 S053：“—此右【柏】州……”。另一類是在《國風》的一國之詩末尾，將該國名稱與粗橫綫獨立書於一簡第一道編綫下沿，如簡 S051：“■右方北（邶）國。”這兩類標題前的粗橫綫大小不同，第二類的比第一類的要略大些，其作用顯然是：詩名前的粗橫綫“—”，標志這是下一級的子標題，所以要小些；國風名前的粗橫綫“■”，標志這是上一級的子標題，所以要大些。

5. 張家山漢簡

張家山 247 號漢墓的下葬時間在西漢呂后二年（前 186）或其後不久。出土文獻共 8 種，均為竹簡，其中有標題的書籍達 6 種：

《二年律令》 三道編，先寫後編，有天頭地脚。^③共 526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兩種標題均獨立書於各簡第一道編綫下沿；標題前的天頭均有墨塊“■”標志（墨塊大都畫成了長方形）。總標題“二年律令”獨立書於開篇第 1 簡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全書共有 27 條律和 1 條令，每條為 1 章。每章章名（子標題）即律名，各章又多分數段。28 個章名均獨立書於各章末簡正面第一道編綫下沿。

《奏讞書》 三道編，先寫後編，有天頭地脚。共 228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奏讞書”三字獨立書於全書末簡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該書每一案例均提行書寫而為一章，章首天頭大都有“●”標志（即高於正文）。但由於標題簡天頭殘損，故標題前有無標志不得而知。

《脉書》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 66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脉書”二字獨立書於開篇首簡的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該簡正面空白無字。

《筭數書》 即《算數書》。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 190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總標題“筭數書”三字獨立書於第 6 枚簡的背面第一道編綫下沿，天頭打有“■”（畫得不規則，且近於長方形）。全書共分 69 章，每章都有子

① 阜陽漢簡已刊布的文獻中，一號木牘是《儒家者言》章題，二號木牘是《春秋事語》章題，但在《儒家者言》和《春秋事語》的正文中，却未見標題（不排除可能是殘損太厲害的緣故）。

②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5 頁、108—110 頁。

③ 此書與下文將述及的《奏讞書》、《引書》雖然均是先寫後編，但所留天頭地脚很整齊，所書文字自然也很整齊，均從第一道編綫下沿起書。

標題章名，共 69 個。每章獨立成一段或數段，章名均書於章首天頭（即高於正文）。其書寫位置可分兩類：一類是章名單行書寫（如同正文），書於天頭（即高於正文），這類章名 68 個。另一類是章名雙行書寫（不同於正文的單行書寫），書於該章第 1 簡天頭（即高於正文），此類章名只一見，即簡 15 “分當半者”。

《蓋廬》 三道編，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共 55 枚簡，正文單面書寫。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總標題“蓋廬”二字獨立書於全書末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

《引書》 三道編，先寫後編，有天頭地脚。共 112 枚簡，單面書寫。有總標題，無明顯的子標題。總標題“引書”二字獨立書於開篇首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

6. 尹灣漢簡

尹灣漢簡的下葬時間在西漢成帝時期。其中的書籍有標題者 3 種，均兩道編，先編後寫，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均祇有總標題，無子標題。現分述如下：

《刑德行時》 共 13 枚簡，單面書寫。總標題“刑德行時”書於首簡上端，并在標題前打上圓點“●”（與正文同高），然後書寫正文。

《行道吉凶》 共 24 枚簡，單面書寫。總標題“行道吉凶”獨立書於首簡上端。

《神烏傳》 即《神烏賦》。共 20 枚簡，單面書寫。總標題位於正文末，獨立書於末簡上端。正文用草書，標題用隸書。

7. 虎溪山漢簡

虎溪山漢簡的下葬時間為西漢文帝後元二年（前 162）。這批簡的整理報告還未公布，但從《文物》2003 年 1 期刊發的《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可知其有關標題的一些情況。發掘簡報稱，該批竹簡完殘共 1336 枚，“推測原有完整簡約 800 枚”，文獻有《黃簿》、《閭氏五勝》和《美食方》。《閭氏五勝》實際上是日書，篇幅最大，“為出土竹簡的絕大部分”，完、殘簡“共 1095 枚”。“《閭氏五勝》首簡自題為《閭氏五勝》，末簡為《閭氏五生》。”（生，讀為“勝”）從發掘簡報所配發的《閭氏五勝》開篇 9 枚簡的照片（1 枚標題簡，8 枚正文簡）和這 9 枚簡的釋文可知，該書單面書寫，三道編^①，先編後寫，有天頭地脚。該書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大致情況如下：

總標題：開篇第 1 簡天頭先打一圓點“●”，然後於第一道編綸下沿書總標題“閭氏五勝”，總標題獨占一簡。文末簡也有總標題，寫作“閭氏五生”，文末總標題是獨立占一枚簡還是緊接正文末書寫而與正文同為一簡，因發掘簡報未披露，現還不得而知。不過，該書前後均署總標題是很清楚的。

① 《沅陵虎溪山一號漢墓發掘簡報》誤為“兩道編繩”。見《文物》2003 年第 1 期，51 頁第 1 行。

子標題：從已知的材料來看，第一章《五勝》（M1N:69-戊 1—M1N:69-戊 8）獨立成段。同總標題一樣，也是先在章首天頭打一圓點“●”，然後於第一道編綸下沿書章名“五勝”二字，接着寫正文。第二章《紅圖之論》提行從簡 M1N:69-戊 9 起書，現在未得見其照片，還不敢斷言第二章章名前（天頭處）也有圓點“●”，但按該書開篇的這種體例來推斷，當有圓點，且全書章名格式可能都與第一章大致相同。^①

三、總 結

通過以上對戰國秦漢簡帛書籍標題的描寫列舉，大致可總結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我國書籍的標題在先秦就已大量存在

我國書籍的標題早已有之，先秦就已大量存在，因為以上所舉有標題的簡帛，有不少在先秦時期就已成書。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經過年代測定，這些竹簡的時代均為戰國晚期”。簡帛時代的書籍從成書到廣為流傳，必然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故包括這批楚簡中有標題（總標題）的 20 來種文獻，應該是在戰國中前期甚至更早就已成書。上海博物館藏楚簡是被不法者從大陸內地盜掘偷販到香港古玩市場，再由上海博物館和香港友人共同設法並出資收購回來的，在這轉輾的複雜過程中，居然還有 20 來種保存了標題。由此可以想象，這批楚簡中原來有標題的文獻是不不少的。“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十種”，竹簡“都是古籍”，由此可知，先秦書籍的數量是巨大的，其有關標題的信息顯然遠遠大於我們原來從傳世文獻中所得來的那點信息。

睡虎地秦簡的《日書》甲種和《日書》乙種，其成書時間也應當是在先秦。劉樂賢先生考證認為：“兩種《日書》抄本的寫成年代都在公元前 246 年之前。”^②

周家臺秦簡的《日書》和《病方及其他》，由其墓葬時間（秦）可知，其成書也應當在先秦。

武威漢簡《儀禮》，自然成書於先秦。

銀雀山漢簡中成書於先秦者不少。如：《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三種兵書，按傳統說法，分別成書於春秋時的孫武、戰國時的孫臏和尉繚，以及他們的門徒，故這些兵書自然在先秦就已成書。《六韜》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按整理小組的觀點，它們也都是先秦的作品（另外，銀雀山漢簡的出土，使《六韜》為後人偽出之說不攻自破）。《唐

① 整理者祇刊布了開篇總標題簡和第一章《五勝》的 8 枚簡照片，未刊布第二章照片，第二章祇發表了該章第一枚簡的釋文。第一章的最末一簡未寫滿，還留白 6 字距離，故由此可知第二章屬提行另簡起書無疑。

另，《文物》刊發的第二章首簡釋文標點不妥，其釋文曰：“《紅圖之論》曰：上徹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安國……”當為：“《紅圖之論》。曰：上徹天文，下知地理，中知安國……。”因“《紅圖之論》”是標題。

②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407 頁。

革（勒）》自然也是先秦作品。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成書較早者也不少。如：《老子》，成書時間應當在戰國以前。雖然此書的成書時間現在還有爭議，但至少成書於戰國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郭店楚簡中就發現了三個《老子》抄本。《經法》、《經》、《稱》、《道原》，據唐蘭先生考證，其“寫成年代，應該是戰國前期之末到中期之初，即公元前 400 年前後。”^①《足臂十一脉灸經》，此書和同時發現的另一種古經脉學著作《陰陽十一脉灸經》（共有兩個本子），都祇講了十一條經脉，較《黃帝內經》缺少一條“手厥陰脉”，說明是較原始的經脉書。所以整理小組認為：“這兩種古灸經的著作年代要早於《靈樞·經脉篇》。”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明確指出：“兩部古灸經要早於《黃帝內經》的這一論斷是有足夠的根據的。如果以《黃帝內經》成書於戰國時期來推定，那麼兩部灸經的成書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之際甚至更早。”^②《五十二病方》，這是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著作，此書與上述經脉書都沒有針法出現（祇有灸法和砭法），而《黃帝內經》中不但有針法，而且詳述有形制、用途不同的九種醫針，故馬繼興、李學勤二先生認為：“（其）產生年代早於《黃帝內經》。”^③《養生方》，其行文風格和用語與《五十二病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區別，故其成書時代也應該在先秦。《要》、《繆和》和《昭力》，都是《易》傳書籍，同時出土的還有經文六十四卦和《繫辭》等。據研究，帛書《周易》的整體應該是楚地《易》學的一派整理《周易》的結果，帛書《繫辭》寫成很早，至少在戰國中葉即已寫成，故《要》、《繆和》和《昭力》三種的成書時間即使晚些，也不會晚多少。^④

張家山漢簡中成書較早者也不少。如：《脉書》，內容基本同於馬王堆漢墓帛書的《陰陽十一脉灸經》、《脉法》、《陰陽脉死候》，可相補足，“依《脉書》作為整體觀察，更能看出它是《（黃帝）內經·靈樞·經脉》的一種祖本”，且同樣是沒有針法出現而祇有灸法和砭法，故其成書年代也應早於《黃帝內經》而在先秦。^⑤《筭（算）數書》，是迄今為止見到的我國最早的算數書，早於《九章算術》，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的水平，

- ① 唐蘭：《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唐文認為這四種屬早已失傳的《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黃帝四經》。有的學者認為不是《黃帝四經》，不能把這四種看作一部書。後一種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僅僅是這四種，篇幅就相差太遠。不過，稱這四種為“黃帝書”，且斷其成書於先秦是不會有問題的。
- ② 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馬王堆帛書四種古醫學佚書簡介》，《文物》1975年第6期。這裏所說的“《黃帝內經》成書於戰國時期”，是指《黃帝內經》的主體而言。按比較通行的說法，《黃帝內經》的主體成書於戰國，其“七篇大論”，和《刺法論》、《本病論》、《靈蘭秘典論》是漢及其以後的作品。
- ③ 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第9期。另參：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出版說明》。
- ④ 李學勤：《帛書〈周易〉的幾點研究》、《帛書〈易傳〉及〈繫辭〉的年代》，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24—40頁。另，楚簡《周易》的發現，也說明《繫辭》寫成很早。
- ⑤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概述》，《文物》1985年1期。連劭名：《江陵張家山竹簡〈脉書〉初探》，《文物》1989年第7期。

其中不少算題是戰國晚期甚至更早時形成的，故內中這部分內容的子標題當形成於先秦。

由以上所舉可知，我國書籍的標題應該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大量存在。即使保守一點，考慮到有些標題的形成有晚於成書時間的可能（例如認為是出於後世抄寫者所命名），那我國古籍的標題也至少在戰國至漢初就已有相當大的數量。并且除以上所舉可確認成書於先秦的書籍外，如前“二”所述，秦簡與漢初簡帛有標題者還有很多，即至少成書於秦或漢初有標題的簡帛還有很多，如睡虎地秦簡的《語書》、《效律》、《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封診式》，張家山漢簡的《二年律令》、《奏讞書》、《引書》、《蓋廬》，虎溪山漢簡的《閻氏五勝》，等等。再者，上文說過，簡帛時代的書籍從成書到廣為流傳，必然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所以，我們現在還不能確認是成書於先秦的有些簡帛，其實際上寫成於先秦的可能性不是沒有，說不定數量還不小。

（二）簡帛書籍標題的位置有 4 種類型

通過歸納可知，簡帛書籍標題的位置有以下 4 種類型：

1. 標題在後

所謂標題在後，即書於全書末或篇章末。若文末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則總標題在子標題後。這類“在後”的標題，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既見於帛書也見於簡牘。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的總標題“日書”二字書於全書末；銀雀山漢簡《尉繚子》的子標題篇名書於各篇末。馬王堆漢墓帛書《經》的最後一章是《十大》，其末尾書曰：“……十大。經，凡四千五十六。”“十大”是子標題。“經”是總標題。

2. 標題在前

所謂標題在前，即書於全書首或篇章首。這類“在前”的標題，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既見於帛書也見於簡牘。細分則有以下幾種情況：

（1）書於帛書第 1 行或簡冊第 1 簡。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脉灸經》的子標題篇題均書於篇首第 1 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總標題書名書於開篇第 1 簡背面。

（2）子標題書於第 2 簡正文背面（以便於辨識），第 1 簡正文背面書編次。如武威漢簡《儀禮》甲本第二篇開篇書曰：“第八服傳。”編次“第八”書於簡 1 背面，篇名“服傳”書於簡 2 背面。

（3）子標題分書於第 1 簡和第 2 簡。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土忌》章，章名第一字“土”書於該章第 1 簡首端，第二字“忌”書於第 2 簡首端。

以上幾種情況，（1）最多，（2）、（3）次之；（1）既見於帛書也見於簡牘，（2）、（3）僅見於簡牘。

3. 標題并在前後

所謂標題并在前後，即同時書於正文首末（書首及書末，篇首及篇末）。這類“并在前

後”的標題，既有總標題也有子標題，但僅見於簡牘。如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的總標題並書於該書首末，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的《八陳（陣）》和《延氣》兩篇的篇題並書於各篇首末。並且，從現已公布的《八陳（陣）》、《延氣》兩篇來看，兩篇的篇首標題均書於正文面的反面即簡背，篇末標題均書於正文面，這種格局顯然說明兩篇簡冊是將有字面朝內從篇末開始收捲的，因為這樣收捲成捆後篇首標題正好在卷捆外，便於得見標題；而簡冊展開閱讀完後也正好得見篇末標題，故標題並在前後，是爲了閱讀及收藏時便於看見標題。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的書首標題也是書於正文反面（簡背），而書末標題是否也是書於正文面，現還不得而知。

4. 標題近前

所謂標題近前，即書於正文中間而近於文首。^①這類“近前”的標題，僅限總標題，且僅見於簡牘。可確認者四例，即上舉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子羔》、《互（恒）先》、《故（曹）蔑（沫）之戟（陳）》和張家山漢簡《筭（算）數書》四種。對此種類型討論如下：

《子羔》殘損較厲害，共存 14 枚簡，但并不妨礙我們的討論。其總標題“子羔”二字獨立書於第 6 簡正文背面。^②該編記述了孔子答子羔所問堯、舜（舜）和三王（禹、契、稷）之事，“內容分兩段，一爲堯、舜（舜），一爲禹、契、后稷等三王，兩段之間相連的文字已缺失”。^③也就是說，該編原本不祇 14 枚簡。從現有內容來看，前 8 簡（簡 1—8）所述爲堯、舜內容，屬第一段；後 6 簡（簡 9—14）所述爲三王內容，屬第二段。所缺失的內容在今簡 8 與簡 9 之間。

《互（恒）先》共 13 枚簡，總標題“互先”二字獨立書於第 3 簡正文背面。

《故（曹）蔑（沫）之戟（陳）》共存簡 65 枚，標題“故蔑之戟”四字獨立書於第 2 簡正文背面。

《筭（算）數書》保存完整，共 190 枚簡，總標題“筭數書”三字獨立書於第 6 簡正文背面。

這四種的總標題位置有以下兩個共同點：

一是總標題均書於正文文字背面（簡背）。

二是標題簡離首簡距離都不遠。如上所述，《子羔》標題簡是第 6 簡，《互（恒）先》是第 3 簡，《故（曹）蔑（沫）之戟（陳）》是第 2 簡，《筭（算）數書》是第 6 簡，也就是說，

① 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標題在中”，祇不過并非是位於正文前後的中點，而是近於首簡之正文中罷了。另，上文“二”談“戰國楚簡中所見標題”時曾說過，《中（仲）弓》第 16 簡背面有總標題“中弓”二字，該文獻共存簡 28 枚。若按整理者所排序，則該文獻就是真正的“標題在中”。但是，因該文獻殘損厲害，文意頗不完整，整理者所排簡序難以作爲定論，故爲慎重起見，我們暫未列入討論簡帛標題位置之列。不過，據我們推測，簡牘書籍中真正意義上的標題在中可能還是存在的，因爲在簡牘文書中已有此類情況。

② 如前所述，今所見的標題簡爲第 5 簡，原本實是第 6 簡。

③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83 頁。

標題簡距首簡最近者為第2簡，最遠者為第6簡。

簡冊與帛書往往都需要收捲成卷以便存放，另外，帛書有時還折疊起來存放。^①簡冊收捲時若祇有一面有字，則大都是有字的一面朝內，無字的一面朝外，目的是保護內文。收捲的順序有兩種，一種是從文末開始自左向右捲，捲好後文末簡在卷捆中心，文首簡在卷捆外面；另一種相反，從文首開始自右向左捲，捲好後文首簡在卷捆中心，文末簡在卷捆外面。陳夢家先生認為簡冊收捲順序祇有一種，即上述第一種。^②今天看來，應該說是上述第一種為多，第二種較少。今簡冊出土時編繩大都朽壞而失卷捆原樣，甚至被擠壓得面目全非，但還是有些簡冊出土時能基本保持原卷的一些面貌，還可藉以看出原卷式樣；再者，卷捆長期掩於地下而受泥土或棺木坍塌的擠壓，出土時卷捆內裏的簡一般會保存得完好一些，卷捆外表的簡一般會保存得差些，故由簡出土時的不同完殘程度往往也可推測其收捲順序。今可斷定卷捆式樣的出土簡冊不少，例如《武威漢簡》的《儀記》是一篇一卷，甲本、乙本的8篇篇題均書於篇首正文反面（簡背），它們均是從文末開始收捲的，捲成卷後，其篇題正好在卷捆表面，便於得見。^③再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二年律令》和《筭（算）數書》三種，出土時均能看出原編收捲式樣：《奏讞書》文首簡在裏面，文末簡在外面，故是從文首簡開始收捲的；該種總標題書於全書末簡背面，收捲成捆後總標題正好在卷捆表面，便於得見。《二年律令》和《筭（算）數書》的文首簡在外面，文末簡在裏面，故此二種是從文末簡開始收捲的；^④其中《二年律令》總標題書於開篇首簡背面，收捲成捆後總標題正好在卷捆表面，便於得見。也就是說，為了在簡冊收卷後便於看見標題，其標題的書寫位置往往與收卷存放式樣有關。上述《子羔》、《互（恒）先》、《故（曹）蔑（沫）之戟（陳）》和《筭（算）數書》四種的標題之所以書寫近於文首，其目的正是為了收卷存放後便於得見標題，其理由如次：

此四種應該都是將正文面（簡背的反面）朝內從文末簡開始收捲的，這樣，捲好後標題簡就位於卷捆外圈，且離首簡有一定距離。將卷捆平着存放，使標題簡位於上方正中，此時，外圈首簡就會垂於卷捆左側，甚至壓於卷捆下面。前者如《筭（算）數書》、《互（恒）先》和《故（曹）蔑（沫）之戟（陳）》：《筭（算）數書》共190枚簡，卷捆較大，標題簡為第6簡，故此時外圈首簡會垂於卷捆左側；《互（恒）先》共13枚簡，卷捆較小，標題簡為第3簡，故此時外圈首簡也會垂於卷捆左側；《故（曹）蔑（沫）之戟（陳）》共存簡65枚，卷捆較大，標題簡為第2簡，此時外圈首簡也會垂於卷捆左側。後者如《子羔》：現存

① 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除《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四種那一幅是文首在內捲成卷存放的外，其餘都是折疊存放的。

② 陳夢家：《漢簡綴述·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收卷》，中華書局，1980。《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一文，實是《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一書《緒論》的第三部分，故此文也見於該書。

③ 詳上注及《武威漢簡·圖版貳拾肆土相見之禮仿製復原模型》。

④ 詳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附錄二竹簡出土位置示意圖》，文物出版社，2001。

14 枚簡（有一些殘脫），卷捆較小，標題簡為第 6 簡，故此時外圈首簡會壓於卷捆下面。由此可知，簡冊如此收卷存放，標題簡就正好位於醒目處，極便看見簡背標題。^①

以上《子羔》、《互（恒）先》和《故（曹）蔑（沫）之戟（陳）》已無法知曉卷捆出土原樣，但《筭（算）數書》出土時從文末簡開始收捲的式樣是清楚的^②，故推測其他三種也應當是從文末簡開始收捲保存的。所以我們認為，總標題近前，即書於近於文首之簡的正文反面的目的是為了收捲成卷後便於看見標題。且僅就收藏擺放而言，它比標題書於文首第 1 簡背面還有優越性，因標題書於文首第 1 簡背面，祇有擺放時將首簡位於上方正中才最利於看見標題，但如果此時卷捆沒有用繩索繞卷捆扎，首簡就很容易滑落於右側，而總標題近前者收卷擺放時則不會有此問題。^③

簡牘的標題往往與簡冊收捲存放式樣有關，而帛書無論是以卷捆形式還是以折疊形式存放，其標題位置與存放形式都無什麼關係，因為帛書是一面書寫，成卷捆時或折疊時有字面大都在內裏，此時是看不到標題的，且帛書往往是一幅抄寫多種文獻，^④成卷捆時或折疊時就更無法看見內中的標題。

以上所歸納的標題在後、標題在前、標題并在前後、標題近前 4 種類型，就其出現的頻率而言，第 1 類最多，第 2 類次之，第 3、4 兩類最少。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簡帛時代書籍標題的書寫位置，處於比較隨意而不固定的階段，可前也可後，還可以近於文首，甚至還有在前後都書上標題者，這自然糾正了過去從傳世文獻中得來的認為上古文獻“標題在後”為定式的傳統觀點。後世書籍的標題，正是從簡帛時代發展而來的。在其發展過程中，標題在前者和在後者得以發展，標題近於前者和前後都署上標題者這兩種形式逐漸被淘汰。標題近於前者被淘汰的原因，應當是後世書寫材料改為紙張，和書籍裝幀逐漸演變為包背裝、綫裝，已不適合在正文中間背面書寫標題

① 上文談武威漢簡《儀禮》標題時曾說過，《儀禮》中有一類標題是在開篇第 1 簡背面獨立書篇次“第×”，在第 2 簡背面獨立書篇題，這類情況我們歸入了“標題在前”類。嚴格地說，這類標題書於第 2 簡者與我們這裏談的“標題近前”類的《故（曹）蔑（沫）之戟（陳）》的標題書於第 2 簡二者沒有多大區別，祇是《儀禮》第 1 簡背面書了篇次，《故（曹）蔑（沫）之戟（陳）》第 1 簡背面空白。因為我們劃分的標準是標題簡前面的簡與標題同面的部分是否有文字，若無，則為“標題近前”，若有，則為“標題在前”，故如此分之。

② 關於《筭（算）數書》是從文末簡開始收捲這一式樣，除上注外，還可詳彭浩：《張家山漢簡〈筭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2 頁。

③ 上文“二”描述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訟（容）城（成）氏（氏）》標題位置時說過，該冊共存 53 枚簡，標題“訟城氏”三字獨立書於最末一簡即簡 53 背面（即正文背面）。整理報告認為，標題簡正文未完，後面當還有一兩枚簡的文字，標題“估計是在倒數第 2、3 簡的背面”。上文我們曾說：“因為其標題的位置不能確定，故為慎重起見，此種暫不列入下文‘三’討論簡帛標題位置之列。”不過，我們這裏可順便作些推測：若其標題果在倒數第三簡，則此種文獻可能是有字面朝內從文首開始收捲成捆的，因為捲好後正好可使標題簡位於外圈正上方而文首簡垂於卷捆右側，其理同於上述《子羔》、《互（恒）先》、《故（曹）蔑（沫）之戟（陳）》和《筭（算）數書》四種。如果這一推測是正確的，則簡帛書籍標題的位置當還有一種：標題近後，即總標題近於文末簡。此推測是否符合客觀實際，還有待於今後出土實物的證明。

④ 如馬王堆漢墓帛書抄《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那兩幅帛書，每幅都抄了 5 種。

所致。在正文前後都署上標題者被淘汰的原因，應當是後世追求行文簡潔所致。

（三）總標題與子標題的位置有 5 種組合形式

若一種文獻總標題子標題俱在，則總標題與子標題的位置存在以下 5 種組合形式（因討論總標題與子標題的組合形式時，標題在前及標題在後兩類已涵蓋標題并在前後類，故以下標題并在前後類不作獨立一類處理）：

1. 總標題子標題俱在後，總標題書於最末一個子標題後

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末，最後一章先書章名“名理”，然後書總標題“經法”和尾數：“……名理。經法，凡五千。”

2. 總標題子標題俱在前，總標題書於開篇第一個子標題前

例如：虎溪山漢簡《閻氏五勝》，開篇首簡書總標題“閻氏五勝”，下一簡書子標題首章章名“五勝”。

3. 總標題在後，子標題在前

例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總標題“封珍式”書於全書末簡，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首。

4. 總標題在前，子標題在後

例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總標題“二年律令”書於開篇第 1 簡，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末。

5. 總標題近前，子標題在前

例如：張家山漢簡《筭（算）數書》，總標題“筭數書”書於第 6 簡，子標題章名書於各章首。

按照現在已知的總標題與子標題位置組合的情況來推測，總標題與子標題位置的組合應當存在如下表所列 6 種形式：

| 組 合 標 題 | 種 類 | 1 | 2 | 3 | 4 | 5 | 6 |
|------------------|--------|---|---|---|---|----|----|
| 總 標 題 | | 後 | 前 | 後 | 前 | 近前 | 近前 |
| 子 標 題 | | 後 | 前 | 前 | 後 | 前 | 後 |

但是，迄今所見總標題與子標題位置組合形式祇有 1—5 種（如上所述），尚缺上表第 6 種形式，即“總標題近前，子標題在後”這一形式，相信隨着簡帛的陸續出土，日後是會

見到這種形式的。

（四）標題大都有一定的標志

標題大都有一定的標志，以區別於正文。常見的標志有以下幾種：

1. 獨書一簡

所謂獨書一簡，即標題獨立書於一簡。此種有以下特點：一是或書於簡端，或書於上方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交界處。書於簡端者，若無天頭，則標題書於接近端頭處；若有天頭，則標題往往正好書於第一道編綸下沿。書於上方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交界處者，若是三道編之簡冊，則標題書於第一道編綸與中間編綸的中間；若是四道編之簡冊，則標題往往正好書於第二道編綸下沿。二是標題大多書於簡背，即書寫標題的那一面除標題文字外無其他文字。此種標志既見於總標題也見於子標題。例如：睡虎地秦簡《效律》的總標題“效律”二字，獨立書於首簡背面第一道編綸下沿。又，《語書》的總標題“語書”二字，獨立書於末簡第一道編綸下沿。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的各篇題，均獨立書於開篇簡背第一道編綸下沿。又，《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各子篇題，均獨立書於各篇之首簡上端（該冊為兩道編，全簡滿書，無天頭地脚）。上海博物館藏楚簡《訟（容）城（成）氏（氏）》的總標題“訟城氏”三字，獨立書於第53簡背面上方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交界處（該冊為三道編）。武威漢簡《儀禮》甲本和乙本的八篇篇題，均獨立書於開篇簡背上方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交界處，此八篇均為四道編，篇題均書於第二道編綸下沿。以上各標題書寫面除標題字外均無其他文字。

2. 打上符號

所謂打上符號，即標題處打有“●”、“■”、“—”等符號。此種標志既見於總標題也見於子標題。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雜療方》的各子標題章名前都打有圓點“●”符號。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總標題和各子標題章名前均打有墨塊“■”符號。銀雀山漢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的各子標題篇題前均打有粗橫綫“—”符號。^①

3. 空位

所謂空位，即標題前或標題後留白一定距離不寫字。此種標志既見於總標題也見於子標題。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道原》的總標題書於正文末，“道原”與前面的正文文字相隔1.3字空位。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子標題章名書於章末，各章名與該章正文末之間大都有一定的空位，少者空約0.5字，多者空達10多字。

4. 高於正文

所謂高於正文，即標題書寫位置高於正文。此種標志僅見於子標題。例如：周家臺秦簡

① 如前所述，該書有一枚篇題木牘，這裏所說的篇題顯然不是指此牘上的篇題。

《日書》的子標題章名“角”、“箕”、“斗”等，均書於章首天頭，即正文文字之上。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的各子標題章名，均於章首高於正文文字兩字起書。

5. 雙行書寫

所謂雙行書寫，即將標題文字分作兩行書於本祇寫一行字之簡，標題書於篇章首，標題以下的正文為單行書寫，標題文字小於正文文字。此種標志僅見於子標題。例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的子標題章名“男子日”三字，於該章首簡天頭自右往左寫作兩行，“男子”二字為一行，位於右，“日”字為一行，位於左。章名以下的正文文字單行書寫。張家山漢簡《筭（算）數書》的子標題章名“分當半者”四字，於該章首簡天頭自右往左寫作兩行，“分當半”三字為一行，位於右，“者”字為一行，位於左。章名以下的正文文字單行書寫。標題分作雙行書寫的原因在於：這些標題均書於簡冊天頭，標題以下的正文均書於第一道編綸以下。天頭的面積一般都不大，而這些標題最少的是三字（如上舉“男子日”），還有些是四字（如上舉“分當半者”），^①故書手如果認為在天頭將標題寫作一行有困難，就會寫作兩行。

6. 分書二簡

所謂分書二簡，即標題文字并行分書於二簡首端。此種標志僅見於子標題。例如：周家臺秦簡《日書》的《此（牝）嶺》章，該章正文始於簡 225，章名“此嶺”二字分別書於簡 225、226 天頭。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的《盜者》章，該章正文始於簡 69 背，章名“盜者”二字分別書於簡 69 背、70 背天頭（如前所述，《日書》甲種為雙面書寫）。此種標題均為兩字，即二簡各書一字，標題均書於天頭處，標題以下的正文均書於第一道編綸以下。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分書二簡的原因有以下兩種：一種是由於標題字筆畫較多，致使天頭寫不下二字，故分書二簡。上舉章名“此嶺”即然，“嶺”字筆畫太多，一字就占了兩字的位置，故祇得將章名二字分書二簡。另一種是書手將這些標題字寫得較大（較下文正文文字大），當第一字寫完後，才發現還有一字未寫，故將第二字寫於第 2 簡并行處，上舉章名“盜者”即然。

7. 另書字體

所謂另書字體，即標題用不同於正文文字的字體來書寫。此種標志僅見於總標題。例如：尹灣漢簡的《神烏傳（賦）》，該賦正文文字用草書，總標題文字“神烏傳”三字用隸書。

8. 大字書寫

所謂大字書寫，即標題用明顯大於正文的文字來書寫。標題書於木牘（木方）上方正中，標題以下的正文分數行書寫，標題與正文所占牘寬相同。此種標志僅見於子標題，且僅見

① 迄今還未見五字及五字以上的此類雙行書寫的子標題。

於木牘。例如：武威醫簡的子標題章名“百病膏藥方”，大字書於木牘上方正中，正文在標題下分兩行書寫，標題文字所占牘寬與正文文字相同。又，子標題章名“治婦（人）高（膏）藥方”，大字書於木牘上方正中，正文在標題下分四行書寫，標題文字所占牘寬與正文文字相同。^①

以上8種標志中，“2”、“3”、“4”既見於簡冊也見於帛書，“1”、“5”、“6”、“7”祇見於簡冊，“8”祇見於木牘（木方）。就出現頻率而言，以“1”、“2”、“3”、“4”較高，其餘次之。

實際上，某一標題常常具有不止一種標志。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足臂十一脉灸經》的兩個篇題“足”和“臂”，既書於篇首正文文字之上，又與後面的正文文字分別相隔2字和1字的空位，即它們同時具有上述“4”（高於正文）和“3”（空位）兩種標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其總標題和子標題均獨立書於一簡上端，標題前均有墨塊“■”標志，即它們同時具有上述“1”（獨書一簡）和“2”（打上符號）兩種標志。上述“5”（雙行書寫）與“6”（分書二簡）兩種，其標題均高於正文，故此二種同時又兼有上述“4”（高於正文）之標志。

（五）子標題前後時附相關文字

子標題的前面或後面有時附有相關的文字。若子標題在正文後，則相關文字附於標題前；若子標題在正文前，則相關文字或附於標題前或附於標題後。例如上舉以下子標題：

阜陽漢簡《詩經》簡S051：“右方北（邶）國。”《武威醫簡》簡78：“右治百病方。”這是子標題在正文後而附有相關文字者，這裏標題前的“右方”和“右”，是說明標題與正文位置關係的文字。這類形式後世一直沿用，如《二十二子》本《管子》卷一《牧民》篇下的幾個位於正文後的子標題：“右國頌”，“右四維”，“右四順”，“右士經”，“右六親五法”等。

再如武威漢簡《儀禮》甲本的以下篇題：“第十犧牲”；“燕禮第十三”。這是子標題在正文前而附有相關文字者，這裏標題前的“第十”、標題後的“第十三”是編次名。這類形式後世也一直沿用，如《十三經注疏》本《論語》的第一篇的標題：“學而第一。”

（六）有些標題層次較複雜

簡帛所見標題有些層次較複雜，主要表現在子標題往往不止一個層次，即某一子標題下又包含有下位層次的標題。例如：上舉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的《官》章，下分《正月》、《三月》、《四月》、《五月》等若干章，章名“官”和這些月份名分別是上下不同層次的兩類子標題。上舉阜陽漢簡《詩經》的子標題國風名和詩名，也是上下不同層次的兩類子標

① 在簡帛書籍中現未見總標題“大字書寫”者，但在簡帛文書中有“大字書寫”的總標題，如尹灣漢簡木牘《集簿》，總標題“集簿”二字大字書於該牘上方正中。

題。這兩類子標題前還分別用大小不同的粗橫線來表示層次，國風名前用大一些的粗橫線號，表示是上一級子標題，詩名前用小一些的粗橫線，表示是下一級子標題。

（七）標題的特點往往是由其自身書寫材料決定的

書寫材料，即文獻載體材料。簡帛的書寫材料是簡牘和帛書，它是在紙張發明和廣泛運用以前的文獻書寫材料。其中簡冊運用最為廣泛，它是一枚枚的竹木條，與後世的紙張大不相同^①，故簡冊這種書寫材料自然會決定簡牘書籍標題的一些特點。例如：標題書於正文反面的簡背，這是由簡冊收捲成捆為便於看見標題決定的。標題書寫近於文首，也是由簡冊收捲成捆為便於看見標題決定的。標題雙行書寫於天頭處，這是由簡冊的天頭面積小這一原因決定的，因天頭長度有限面積小故使用縮小文字雙行書寫的辦法以便能容下標題。

以上是根據現在已知的出土簡帛文獻材料歸納總結出的簡帛書籍標題條例，應該說，大致可以反映出簡帛時代書籍標題的情況。不過，雖然簡帛出土已空前豐富，而現在所能看到的簡帛標題材料畢竟還是有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簡帛的殘損），還不能完全滿足研究的需要，故還不能說上述條例就完全概括了簡帛書籍標題的所有條例。隨着簡帛的繼續出土和研究的深入進行，相信完全能弄清簡帛書籍標題的內在規律，完善現在已知的簡帛書籍標題條例。總的來說，簡帛文獻的問世，有利於我們對古籍標題產生和發展演變過程的研究，有利於建立科學的古籍制度史，我們應當高度重視這批出土材料在古籍制度史方面的研究。

① 而帛書與後世的紙張除質材不同外，其他沒有多大區別，都屬較大的平面，且都很薄。

楚簡“性自命出”篇考察^①

◎ [日] 金谷治 著

◎ 龔穎 譯

引 言

1993年在湖北荊門市郭店村發掘出土的竹簡經整理後於1998年3月以《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書出版，這項成果對學術界的衝擊很大。衝擊不僅表現在發現了大量前所未見的學術資料，而且這些資料中包含有與《老子》、《論語》、《禮記》等重要的傳世文獻關係密切的語句；特別是關於這一楚墓的下葬年代，人們根據考古學的研究和楚國的歷史狀況推定，此墓是少見先例的戰國中期偏晚時代（前350—前278年）的墓葬。上述情況都是使此墓受到重視的原因。人們期待著通過對它的研究能夠為填補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尋找到某些重要佐證。

《郭店楚墓竹簡》共計一萬三千餘字，資料本身被分成兩類，一類是大體上可算作道家文獻的2種4篇（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另一類是儒家文獻的11種14篇（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至四）。出土竹簡各篇本來並無標題，其原始排列也是雜亂無序的，所以對竹簡整體的解釋和對每一篇的組合歸納都還存在許多問題。

本文討論的“性自命出”篇也是一篇尚有不少遺留問題的新發現資料，筆者最感興趣的是對該篇資料的整體定性問題，這是因為該篇一開頭就赫然出現了與儒家著名經典《中

① 原文刊於《日本學士院紀要》第59卷第1號，2004。

庸》中的表述相類似的語句，文中又存在著以篇首之語為核心的、從整體上左右著先秦思想史之動向的大問題。

例如關於《中庸》的成書年代問題，根據《史記》“子思子，作中庸”之說，傳統上認為《中庸》是在孔子之孫的年代完成的；但近年人們認為《中庸》是大大晚於此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的東西，這種看法今日基本已成定論。如果說包括“性自命出”篇在內的這批竹簡全部是在戰國中期下葬入土的話，那麼這就與文獻學家認為的《中庸》成書於秦始皇以後的說法不相容。那麼，根據“性自命出”篇中存在類似語句這一情況是否就應當把《中庸》的成書年代提前到竹簡的年代呢？這是需要認真探討的大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要考察這些所謂的“類似”之處，這就不僅要注意到那些在局部上相似的語句，還需要注意到作為背景的全篇的整合性問題。筆者對“性自命出”篇從整體上的定性問題很感興趣就是指這一點。本文將探尋“性自命出”篇作為一個整體的統一性，並探明其思想特色。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這裏雖然在討論統一性問題，但楚簡資料基本是由現代人整理而成，篇題是最典型的例證，包括篇題在內的整篇內容都不是原典的原貌，這就給研究造成了困難。所以，在進入正文的討論之前，筆者首先粗述一下與“性自命出”篇的原典有關的幾個問題。本文主要依據《郭店楚墓竹簡》展開討論，但在這部郭店本楚簡公布三年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200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這一同類新資料又公布出來，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了。

首先，在郭店本中，本文要討論的這一篇被認為是由67枚簡組成的，第1號簡至第67號簡被看成是一個整體，而第一段第2號簡中的“性自命出”一句被定為這一篇的篇名。上博本中相當於這一部分內容的竹簡共有40枚（至郭店本的第49號簡），另外還有其他的“殘斷”簡。郭店本和上博本在字句的異同和排列順序等方面都有不同，而其中最大的區別是：在郭店本中位於中間部分的第36號至第49號共14枚竹簡在上博本中被排列到了最後。另外，上博本的整理者根據此篇整體的意義將篇名定為“性情論”，還有的學者取第1號簡的第一句即“凡人雖有性”作為篇名。

竹簡資料公布後，各方面的研究都採取了以郭店本為中心並對其加以修正的做法。在此略去以往的具體論證，祇從結論來看，學界基本上達成的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支持以郭店本的解讀和排列作為一個基本框架，將該篇分為上下兩部分，即第1號至第35號簡是上篇，第36號至第67號簡是下篇。（請參照《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4期載廖名春《郭店簡“性自命出”的編連與分合問題》）。筆者也大致贊同上述意見，祇是在劃分全部67枚竹簡的問題上，我認為第15號至第35號簡的部分可以另外列為中篇“禮樂論”，使之與上篇的“性情論”和下篇的“雜篇”相呼應，關於這個問題後面還將論及。

本文的目的是要在正確地把握“性自命出”篇的內容的基礎上，從整體上考察該書的性質，尤其是要探明該篇與《中庸》的思想內容之間的關係，以期在解明二者性質的同時逐漸認清它們各自在思想史上的意義。

在解讀楚簡方面，筆者以郭店本為主并參考諸家，尤其得益於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之處頗多。

一、與《中庸》的類似之處

首先，在這裏列出那些被認為是能夠體現“性自命出”篇與《中庸》的類似之處的語句并加以分析。

《中庸》卷首：“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楚簡“性自命出”篇，竹簡2、竹簡3：“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

在楚簡第二句後，整理者注釋稱“與《中庸》的‘天命之謂性’很相似”。說明從最初整理原文的時候開始，這句話就受到了關注。這裏把楚簡中的後兩句也放在一起多少有些問題，但作為對前一句性論的發展性探討，意義上有連續性，句法也相似，所以應當放在一起討論這四句。

上引《中庸》和楚簡的相似之處單純從語句的對比上看即可一目瞭然，二者都有“性”、“命”、“天”、“道”的概念，表述方式都採用了簡短定義的形式，句法上也很相似。進一步從內容上看，二者都是依據“天”、“命”來為“性”、“道”定性的，它們表達的主旨也一致。由於看到二者間的密切的類似關係，而認為這兩種資料出自同一學派之手——例如主張將這些資料總括到子思學派等等，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傳說《中庸》與子思子有一定關係，而與楚簡同時出土的資料中也包括有“魯穆公問子思子”這類顯示與子思關係的幾篇資料，綜合考慮這些情況，能看出這裏面進一步暗示以子思之名為媒介的兩者之間密切的類似關係。

探討《中庸》首句的文義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排序，即“命”出自“天”、“性”出自“命”、“道”出自“性”（天→命→性→道），最後，“教”出自“道”。而楚簡“性自命出”篇却不同，它認為“性”出自“命”，而“命”自“天”降，順序是“性←命←天”，然後再加上由“性”生“情”、由“情”始有“道”這一序列（即性→情→道）。由

此可知，二者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如果細緻推敲的話，《中庸》的卷首句却没有論及“情”。而且從整體結構來看，《中庸》以“天”為中心，由這個中心生發出萬事；而楚簡是萬事的事象向中心回溯。《中庸》首句之後的一段論述了“喜怒哀樂”的“未發”、“已發”，有學者把這部分解釋為對“情”的說明，即使採納這種觀點，《中庸》和楚簡的行文結構也有顯著的差異。這個差異太大，以至於我們無法輕易地下結論說二者在意義或內涵上很類似。在這裏的一連串相關詞語中，“性自命出”篇中不見“教”一詞，但由於在本篇後面的部分中有大量涉及此問題的內容，所以可以不把這一情況作為一個問題單獨提出；但是，《中庸》沒有“情”的問題仍需要在下文中作些考察。這都是因為在“性自命出”篇中，“情”的觀念格外受到重視。

總之，“性自命出”篇和《中庸》中的類似詞句，二者之間的確好像存在著密切的聯係，但這主要是體現在外在形式方面，當我們對這些簡短語句的內容以及它所反映的背景及其思想狀況進一步加以考察的時候，又會有某些不同的聯係呈現於我們面前。所以，有一種觀點就認為有必要在像“語從一”篇這類與“性自命出”篇同時出土的文獻中廣泛搜集“有天有命、有物有名”這樣的句式上類似的語句（請參照龐樸《孔孟之間》，《國際儒學研究》第六輯），但我認為，這樣做雖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必拘泥於這種方法，而是應當深入探討那些看起來類似的語句的思想內涵，努力解明這兩種思想材料的性質。本文就是依照這一思路進行研究，尤其希望探明“性自命出”篇的思想特色。

二、關於“性”、“心”的概念

《中庸》以“天命”開篇，但“性自命出”篇是從對“性”的解釋開始的。我們無法證明最初的資料在現代的整理工作開始之前就是這樣的，僅為了方便，本文就依照目前的順序先來討論“性”這一概念。實際上，“性自命出”篇的開始部分、上文也說過上篇是性情論（簡1至簡15），對於“性”“情”等心性概念的解說集中出現於這一部分。

首先，“性自命出”這一句，與“命自天降”合起來考慮的時候，“性”的根本即是來源於“天”。這一點與《中庸》相同，由此類推，這個“性”也被認為是秉有“天”的至高的特性。“四海之內，其性一也”（簡9），這是說“性”的秉持人人相同，與“教所以生德於中者”合起來考察可知，這裏的“性”概念與人們通常認為的一樣，它還是一個內在的東西。“性”是所有人都內在具有的本性，它來源於天。這一點與《中庸》是一致的。

但是，《中庸》說“率性之謂道”，把“性”看作道德的根本，而“性自命出”篇說“道始於情”，“道”並不直接到達在“情”之上的“性”。“性自命出”篇中的“性”不具有《中庸》的“天命之性”那樣的尊嚴性。“性自命出”篇中的“性”的引人注意之處就是該篇作者從一開始就強調“性”的有限性。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簡1），開首這兩句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該篇的中心主張。也許有人認為，作為內在的能動性工作，人們只要堅定地持守本性就足够了。但竹簡在這裏提出的是，實際上僅有這一項“心”還是無法發揮使“志”安定下來的內在作用。僅有本性存在還是不夠的。那麼，怎麼辦？“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就是說必須有賴於“物”這一具有外在性質的存在的助成。

該篇的下文中也有與卷首部分相對應的內容，“人之雖有性，心弗取不出”（簡6），也就是說，祇有依靠外在的具體的“心”的作用“性”才能顯現於外。還有“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簡2）。如果“性”僅僅是作為一個內在性存在的話，就不能夠有效地開展活動。它必須要化為顯現於外的有形的存在，即“物取之也”。

“情生於性”，所以“性”是比“情”高一級的概念。但是，“性”要外顯出來發揮作用就必須借助於具備具體形狀的“情”的作用。“情”與“物”的作用相同。於是，其結果是，人們在解釋“性”的時候也帶有了“情”的性質因素，使得兩者的區別變得模糊不清。後代人以性善思想為基礎明確區分“性為善、情為惡”，在這裏沒有如此明顯的劃分。正如“喜怒哀悲之氣，性也”一樣，“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簡4）這類的表述是為了明確“物”的性質而把“情”說成“性”的例句。

上述這種令人覺得把“性”與“情”混為一談的情況在傳世資料中也可以舉出例子。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逸周書》“官人篇”也類同）中說“民有五性”，舉出喜氣、怒氣、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的“五氣”就是一例。“性自命出”篇中把“喜怒哀悲之氣”說成是“性也”，也是同樣用法。《大戴禮》的注釋（清代王聘珍）則說“性，情之本也。

《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一方面明確區別“情”與“性”，同時又加以解釋說“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注釋者不喜歡原文中模糊二者之差別的論述方式。但是，這種論述方式正是與楚簡的共通之處。它所反映的立場就是更重視“情”而不是“性”。

在《中庸》中，“性”的分量很“重”。《中庸》的“天命之性”是“率性之謂道”，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阻礙它的活動。與之相比，由於作者重視“情”、“物”之類，“性自命出”篇中的“性”則成為一種受到外界制約的存在。“凡動性者，物也”（簡10），這是表述得最明確的語句。關於“物”的問題另行討論，在此之前需要論述一下有關“心”的問題。

“性自命出”篇說“凡學者求其心爲難”（簡36），這裏要求修養者要“求心”。這是以“心無僞”爲目標，所以“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有僞也，弗得之矣”（簡37），正如這句話所說，對於具體的“心”要靠“慎”、“信”來排除虛僞。“性”是內在的抽象的存在，而“心”則是更加具體的實踐性的存在。“凡心有志也”，必須要牢固樹立起心中之“志”，但是，並不是單靠我們有“性”就可以無條件地實現“定志”。那是“待物而後作”的事情。“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簡9）“心”能完成多種功用是因為有教育的引導。從這裏也可以很明確地看出“心”與“性”的不同、“心”的特色。而且，正如“凡道，心術爲主”所示，道德活動的基準不是由“性”開始，而是與“心”相伴而生的。作者的興趣指向的是更爲具體的經驗性的存在。

三、關於“情”、“物”的概念

如前所述，對比《中庸》和“性自命出”篇中的類似語句可以看出，《中庸》不強調“情”，它把“喜怒哀樂之未發”當作“情”，特別強調“未發”，這與“性自命出”篇的立場不同。“性自命出”篇更看重已經發顯的“情”。《中庸》中沒有強調“情”的部分，說明它重視“性”而輕視“情”。雖然“性”是比“情”高一級的概念，但是在“性自命出”篇中，具體化的“情”比起抽象化的“性”更受重視。

“道始於情”，人們應當踐行的“道”是在“情”的世界中才清楚地呈現出來。《中庸》認爲服從那個秉承了“天命”的“性”就是“道”，而“性自命出”篇則不然，它認爲秉承了“天命”的“性”這一高尚的立場並不能使“道”變得明確，而恰恰是降低了一級的“情”的世界才使“道”明確地顯現出來。“凡道，心術爲主”也是此義，反映了作者看重“情”的世界的想法。

無論是《中庸》還是《孟子》，性善論者總是在主張“性善”的同時把惡歸於“情”的世界，而“性自命出”篇完全沒有考慮過這種對於善惡的對稱性安排。“性自命出”篇甚至認爲“情”的積極參與有助於發揮“性”的作用。

“性自命出”篇對“情”的重視還體現在該篇的整體結構上。該篇的15號簡至35號簡是作爲中篇“禮樂論”被編纂在此的，其中就有專門討論“情”的部分。“性自命出”篇的上篇部分以“凡人雖有性”爲首句，按照其論述的內容可以將這部分定名爲“性情論”；而從15號簡開始，突然以“詩書禮樂”打頭，明顯地轉入了關於禮樂論的論述。所以，現在通行的分段方式是把1號至35號簡統算爲上篇，而本文認爲把上篇再分成兩部分，後半部分作爲中篇看待更爲妥當。

中篇有兩個內容，一是承接上篇的性情論、一是教育教化論。關於教育教化論的問題留待後述，性情論中引人注意的問題是，篇中對“情”與“心”的論述很多，但對“性”的論述則很少。“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簡 15）的說法中雖然也有這樣的含義，但卻需要“理其情而出入之”（簡 17），而且還說“美其情”（簡 20）。本篇中還特別指出“禮作於情”（簡 18），闡明了“禮”與“情”的關係；關於“樂”，則是“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簡 23），強調了“樂”與“情”的基本關係。“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簡 29），這也是指明，音樂的極致是與以哀樂表真情的思路相通的。

音樂祇能是發自人的內心情感，對這一點的論述最早見於傳統經典《毛詩》“序”，《禮記》“樂記”篇和《荀子》的“樂論”中也有類似論述。“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闡明了詩的起源，還說“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由此出現了“治世之音”和“亂世之音”的區分，使之服務於教化。《荀子》“樂論”也說“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作爲音樂的起源它提出了那個“哀樂之情”的“情”；《荀子》“禮論”還說禮的起源與“人生而有欲”的情況直接相關。《禮記》也是如此，“樂記篇”開篇論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就是說“感物動心”後會作爲“聲音”發出來的道理。“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在對於“音”和“樂”之起源的敘述中，出現了感動“心情”的“物”，這個“物”即是強烈地作用於本性抑制本性的存在。

“凡性，或動之，或逆之，或交之……凡動性者，物也”（簡 10）。對於“性”，從根本上說，存在一種東西從外部推動和制約它。所以“性”是“待物而後作”的。那麼，這個“物”是什麼呢？

“物”，一般用來代稱那些具有外在形態的、具體性的存在以至認識對象。《莊子》的“外物”篇認爲外界的事物不可靠；在《荀子》的“禮論”篇中論述了禮的起源，把“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這種使欲與物能够保持平衡的存在方式作爲自己的理想；《竹簡》所表達的思想與這裏的含義相同。“凡見者之謂物”（簡 12），更明確地顯示出這一點。這種表述方式與靠自身力量無法外顯的“性”形成了一種對比，“物”的作用使內在抽象的、不鮮明易見的“性”轉而成爲具體的、經驗性的鮮明可見的存在。在“性自命出”篇中，“物”的作用就是通過它與“心情”的交流使“物”以更受重視的形式表達出來。禮樂論是很適合它的內容。“物”在推動“心情”的同時，又作用於並且推動著“性”，這一點具有重要的意味。這就是“凡動性者，物也”。

四、關於“道”、“教”的概念

關於“道”，“性自命出”篇稱“凡道，心術爲主”（簡14）。讓我們首先考察這一主張。所謂“心術”是指運思考慮，但這個“心”應與“情”合起來看待。這一表述說的是，“道”依然是停留在“情”的世界中（“道始於情”）並未到達“性”，“性”主要與更高的另外一個層次相關聯。

“道四術，唯人道可爲道也。其三術者，道之而已”（簡15）。這是說，“道有四種發揮作用的地方，但在其中真正應當稱之爲道的祇有人道，其他的三者只不過是借用此名而已”，上文的“心術”相當於這裏的“人道”。也就是說，不是像“性”那樣的抽象的世界，而是更爲具體的實踐性的道。緊接在簡15這段話的前面是“道者，群物之道”（簡14）。

“群物”之“物”就是這裏所說的具象性的經驗性的事物，尊重此“物”，才是“性自命出”篇編著者的立場。的確，被稱作“道”的東西，存在於各種普通事物的活動之中。這裏所說的不是《中庸》中那個稟受了天命的高貴的“率性”之道。“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中庸》之言，可見即便是《中庸》，它也強調“道”不脫離人而存在的卑近性質。但是，相對於“人道”而言，《中庸》認爲更應受到尊重的是“天道”、是“聖人之道”。而“心術爲主”的“道”與“始於情”的道是相同的，而不是《中庸》所說的那個與“性—命—天”關聯深厚的“道”。

把“道”認定爲“心術爲主”的“情”之世界中的存在，這樣就更能够加強對於“教”的訴求。在《中庸》的思路中，“命”貫穿“性、道、教”三者並支撐著它們的存在，但“性自命出”篇的“道”與“性”之間却被割裂開來，因爲不存在一個支撐它們的東西。“性自命出”篇中的禮樂論也是教育論，它所強調的是禮樂這種擁有具體形態的教育手段、由人制定出來的教育內容。

“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於人”（簡15）。這裏的“詩書禮樂”主要是指作爲教科書的“詩書禮樂”以及對它的實踐。《竹簡》認爲這一切的出現全賴於人的心情，而且，正由於禮樂與人的心情密切相關，所以禮樂作爲“教”是有效的。在這裏，看不到《中庸》所說的作爲“天命”降下的是“道”、而“修”此“道”才爲“教”這一意義。在《竹簡》中，禮樂成爲“教”的重要手段的同時，它當然也就與“性”的應有狀態不無關係。

“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簡9）。這句話將“性”的同一性和“心”的多樣性對照起來加以說明，闡明了“教”的作用的特殊性。還有“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簡18），這裏是通過說明與內在的德的生成培育之關係來言及“教”與“性”

的關係。正如“凡動性者，物也”（簡 10）所言，因為“性”是靠“物”、“情”推動的東西，所以是能够依靠“教”來受到感化的存在。正如“人雖有性……”等等所表明的，“性”并不是在其初始就十全十美。因此，通過“教”來補充就是必要的。

“性自命出”篇看重“教”，這一點通過上面的論述已經得到證明，尤其是從作用上來說，該篇尊重“詩書禮樂”這些具體的實踐性方法的主張也值得關注。這與通過“情”將“道”統攝於“教”之中的思想相吻合。“教”的內容是“美其情”、“理其情”。這也與強調“求心”等活動的主張非常符合。

行文至此，令人聯想到《荀子》的思想。《荀子》的卷首就是“勸學篇”，它熱衷於學與教的主張很著名。他的方法也是尊重“詩書禮樂”，他從性惡（“性本始材木”）的立場出發宣揚“化性”和“積偽”，這一點也已廣為人知。“性自命出”篇宣揚實踐性的禮樂、強調依靠外“物”的作用“動性”，這些都與《荀子》相類似。“化性”是將變化了的“性”通過教學的反復訓練使之達到與聖人的典範毫無差異的狀態；“積偽”的“偽”是後天的文化性人爲操作，積累這種“偽”就是教育。“化性”與“積偽”的工作在“性自命出”篇中也能見到。

祇是《荀子》使用的“偽”這一特殊的概念在“性自命出”篇中沒有出現。後者中使用的“偽”是按照其本來意義使用的，如“心無偽”即是善，這與《荀子》的用法不同。所以，雖說“竹簡”和《荀子》的思想在傾向上是一致的，但又不能說二者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

五、“天命”思想——與《中庸》相互對照

本文是以考察“性自命出”篇與《中庸》的類似語句開篇作文的，但行文至此却成了一篇證明二者間存在的差異而不是說它們的類似之處的論文。最後，對事關二者的中心思想的“天命”思想加以考察研究。

首先，就類似句而言，“性自命出”篇和《中庸》都是以“天”“命”為根本，認為“性”“道”等等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生發出來的，這個構圖是二者的一致之處。祇是需要提醒的是二者表現方式的不同，即《中庸》是將“天”“命”放在最開始，它們下降來貫穿全體（天→命→性→道→教）；而“性自命出”篇則是“道”“情”從下方向上回溯、被“天命”總括起來（道→情→性→命→天）。如果僅僅是這種表面形式上的區別的話，那麼意義也不太大，但實際上，下文的探討可以告訴我們，這種差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中庸》更加重視“天命”這一上層世界，主張要把價值的中心置於此，而“性自命

出”篇則不同，它重視“情”或“物”這類具體的經驗性的世界。《中庸》在高深之處強調“天命”之“性”這樣的抽象而理想的東西，但“性自命出”篇却不贊同這一點，甚至是持反對態度的。這是事關二者的基本立場的重要差異。

《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這一句就已經表明了它的“天命之性”這一整體上的基本立場。而“性自命出”篇說“性自命出”，對“性”的解說只停留於此。而且在這之後馬上說“道始於情”，論及“情”的問題。由下文的分析可知，《中庸》對“天命”的解釋很詳細，但在“性自命出”篇中與之相對應的部分就相對地很少。

《中庸》對“天命”的詳解其實就是對“誠”的詳細解說。《中庸》內容的主要意思實際上和它的標題無關，它原本就是宣揚“誠”之哲學的。這個“誠”就是稟承了“天命”的本“性”本身，而發揚和實現“誠”是“君子”的努力目標。“誠者，天之道也”，以其原本狀態呈現本“性”的“聖人”的世界儼然而在。對於此，“誠之者，人之道也”，這是勤勉於修養的“君子”的世界。倫理的世界一時間被二分成“天之道”和“人之道”。把“聖人”高高擡升起來置於難以企及的地位，這是為了高揚“君子”的目標；而作為“君子”修養結果的“至誠”的境地則最終是無異於“聖人”的境地的。這一境地既是自我的完成，同時又“成萬物”，在此意義上也是助天地造化的。這是對“天命”展開論述的《中庸》的主題。以“天命之謂性”的基本命題來貫穿人的本性，通過修養來發揮這一本性，而這一本性又與天地自然的造化相一致，這就是《中庸》的“誠”的哲學的特色。

要言之，《中庸》之“聖人”作為“天命之性”的存在方式本身處在“至誠”的境地，“君子”就要以此為榜樣去磨練自己的本性，爭取側身於“聖人”的境地。這就明確地解釋了“天命之性”。

“性自命出”篇則不然。其中雖說“天”是最高的，由它降下“命”來，而“性”則是由“命”而出的，但對於“天命”並沒有作內容上的說明。通篇沒有出現對“天命”的真正意義上的解釋性語句，而且也沒有對相當於《中庸》的“誠”的這種內在德性的明確思考。“誠”這一詞語及其替代語“信”“慎”祇是出現過，與《中庸》有很大的不同。

“性自命出”篇中“君子”的修養，不是植根於“天命”而去長期培養人們的內在德性，而是要依靠“化性”和“求心”，即借助外“物”去改變本“性”這種經驗性的、具體形象的方法。

“性自命出”篇是一篇將一些斷簡編輯後形成的文獻，所以當然不能因為現在見不到某些論述就斷言說原來也肯定沒有。但是，即便如此，與《中庸》相比較而言，我們仍然很難推想在“性自命出”篇中曾經存在過相當於“天命之性”或“誠”的詞語。因此，如果在“性自命出”篇中原本就沒有那些針對相當於《中庸》的“天命之性”或“誠”的詞

語進行的釋義語的話，那麼二者文中出現的類似詞句其實就是意義不同的存在，即在“性自命出”篇中出現的那些詞句並不是采用了需要配以特殊解釋才能理解的用法，而是采用了更為通常的、人們更易理解的用法。也就是說，“性自命出”篇中的“天命”和“性”也可能是指類似天賦之性這類表述萬物的始源與自此而生的萬象之間關係的、樸素的意義。雖然由於資料欠缺尚無法斷定，但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中庸》以“天命之性”為“誠”，並認為它契合宇宙規律的立場在“性自命出”篇中是不存在的。

在“性自命出”篇中，代替“誠”出現的是“信”或“慎”。作者認為，“凡學者求其心為難”，而且“求其心”之時，“有偽也，弗得之矣”。“偽”是違背“信”與“慎”的，在“心”中有偽，所以，或許可以說這裏存在一些向《中庸》的“誠”發展的元素。但是，“性自命出”篇的內容本身是實踐性的、樸素的，不會達到“誠”的形而上學的境界。“誠”的有無依然是拉開這兩篇文獻之間的距離的要點。

結語

以上試圖盡可能正確地把握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的內容並從整體上確認其思想本質。之所以特意選取這一篇加以討論，是因為該篇與著名的儒家傳世文獻《中庸》有類似的語句，而這種類似又使得人們一般認為該篇的內容也與《中庸》相同，即認為二者都是“天命”基礎上的心性論。這種認識能否行得通？短小語句的類似能否生發出如此重大的結論？為了解決這一疑問，我認為不能祇停留在對類似語句的比較上，而必須要從整體上對這一篇的主要概念進行考察。

首先要考察的是，二者中被認為是類似句的部分究竟是什麼情況。也就是說，由“天命……”開始的句子和由“性自命出”開始的句子，它們所要表達的內容和採取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近似。考察的結果是，二者都同樣採用了“天”“命”“性”等心性論中的重要概念，而且分別以簡潔的語言、後一句重複前一句的最末字這種表述形式來下定義。由此，我們可以承認，二者在內容和形式上確實都存在著密切的類似關係。

但是，餘下的問題是關於意義如何的問題。因為二者間的顯而易見的類似之處主要是停留在表述形式上的，例如，“情”的概念在“性自命出”篇中被着重強調，而《中庸》中却没有。至少二者對這個概念的處理方式不同。還有，《中庸》採用的寫法是以“天命”為中心、自此發展為萬事萬象；而“性自命出”篇的寫法是由萬事萬象回溯到“天命”、被“天命”統括起來。這些區別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不然。我認為這種差別體現著二者在思想立場上的差異，即《中庸》的重點在“天命”，但相比於“天命”而言，“性自命

出”篇的重點在“情”或“物”的世界。換言之，雖然兩篇文獻中確實存在著類似句，但是詳查它們的內容就會發現二者間的差異，尤其是二者所反映的思想的基本立場是不同的。

《中庸》的基本立場是宣揚“天命之性”即“誠”。“誠”之德在《中庸》即為“天之道”，這就是作為“聖人”世界的事情的、高貴的內在本性。對於與“天命”世界不同的一般世界，《中庸》考慮的是與“天之道”相對應的“人之道”，這就與“誠”的本性本身不同，而是為了“實現誠（誠之）”而努力的“君子”的世界。“天之道、聖人、本性、誠”這一“天命”世界與為了要在地上實現它而進行學習的“君子”的世界，在《中庸》中這兩個世界是明確區分開來的，並且，理所當然地，《中庸》的重點是在被看成既是其內在作用同時也參與“位天地、育萬物”的自然造化——這樣一個“天命”世界。

“性自命出”篇的基本立場與《中庸》是對立的，它的重點不在於內在性的“天命”、“性”、“誠”，而外在性的經驗性的具象世界。因此，在該篇中“教學”或者“道”的外在客觀的性質特別受到重視。而那個包容天地萬物的抽象性、理想性的“誠”的形而上學則與“性自命出”篇無關。

要特別指出的是，“性自命出”篇中也反映出人的內在本性會受到制約這種觀點，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在《中庸》當中，因為“性”就是“天命之誠”本身，所以完全不必考慮到對這個“性”的作用進行限制或補充的東西。本性的“誠”是絕對的。這兩篇文獻的立場就是如此地不同。這可以看成是由文獻作者或編者在思想上的差異所致。強調“天命”的世界與重視“道·教”的世界，二者的這種差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由上文的論證可知，因為兩篇文獻中存在類似的語句就會判定這兩條簡略而短小的資料原本是一家，或者即便不到這個程度，也認定二者談論的都是同一個心性論，二者間有密切的關係，這樣的想法無論如何是很危險的。一般來說，對新出土的資料進行解讀或考察時，有效地利用傳世的舊資料是很必要的方法，但也應當警惕，不要被形式上的類似所迷惑，反倒忽視了那些基本立場上的差異。

在《中庸》的形成問題上也存在同樣情況。依近年新說來看，一般認為《中庸》是在秦統一天下後形成的文獻，但由於在戰國楚墓中新發現了看起來類似的竹簡材料，有觀點就據此主張《中庸》的形成年代必須要提前到戰國中期，否定形成於秦始皇之後。成書年代與思想史上的所謂天命思想之變遷問題深刻相關。問題是，《中庸》反映出的那種宏大深刻的天命思想難道在戰國中期就業已存在了嗎？以《中庸》和“性自命出”篇中的形式上類似的短句為根據、按照楚墓的下葬年代來類推《中庸》的形成年代，這種做法無論如何也是過於形式化了。“誠”是最高的、內在“天命”和道德的絕對性終極根元，對於與“誠”相關聯的思想立場的確立問題，需要進行更加謹慎的而不是簡單化的歷史性考察。

本文的主要意圖在於考察“性自命出”篇的內容並把握全篇的主旨，雖然目前仍然遺

留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基本工作已大致完成。本文以“性自命出”篇與《中庸》的類似句為綫索探討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從整體上看，不能把“性自命出”篇看成是與《中庸》相同的心性論。二者在思想方面的基本立場是不同的，這樣就必然產生出一個疑問，即以楚簡為根據考慮《中庸》的性質或者反過來以《中庸》來看竹簡都是過於看重二者聯係的做法。要把握“性自命出”篇的整體性質，只看這個資料本身是不夠的，本文所追求的祇是在澄清它的性質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尤其是本文到此已探明“性自命出”篇與《中庸》相對立的思想上的差異，這一點很有意義。

最後，雖然有點蛇足之嫌，但在這裏想涉及一點資料的形成過程問題，因為事關每種出土資料的性質。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與“性自命出”篇的性質也有關，那就是，我們必須要考慮這篇文獻作為一篇著作它的完整性究竟如何。一般來說，新出土的資料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完整的、有一貫的明確主張的著作性資料；另一類是不完整的斷片集合起來的資料群，這其中還有未編輯完的資料群，即為了以著作的形式歸納自己的主張，準備將斷片式的舊資料收集編輯起來的、尚未完成的作品。這類作品可稱之為“編成書”，其特點就是雖然把自己的主張作為中心貫穿全文，但是在行文中又會受它所採納的原書或者斷簡的影響，以至於不像原創作品那麼觀點鮮明。因為人們之所以不斷地引用、編輯舊資料就是因為考慮到了它的有利之處，因為會使內容豐富，可以吸收到前人的優秀辭彙。當然，也有靠此種方法幾乎可以得到形同於一部著作的一個資料群。象《中庸》這類文獻雖然不是出土資料，但恐怕就屬於這類“編成書”。

我之所以這樣認識《中庸》，是因為從整體上看，它是將兩種性質幾乎完全不同的資料拼湊在一起的，雜亂感極強。雖然如此，貫穿全篇的中心主張（天命、性、誠）卻又很鮮明，而且首章和末章形成呼應。如果以體裁的雜亂和中心主張的統一性這兩條作為標準來定性的話，“性自命出”篇也是符合這一條件的“編成書”。估計“性自命出”篇的原編者是要將自己的主張——獨具特色的心性論安排為中心論點，組合多種文獻斷章將其編輯成書的。但這項工作並沒有全部就緒，以至於留下了一個不夠完整的作品。

“性自命出”篇的主題是它獨特的心性論，上篇（第1號簡至第14號簡）的主題是性情論，中篇（第15號簡至第34號簡）的主題是禮樂論，在這兩部分中，主題的體現是一貫的；但章節語句間的脈絡並不順暢，形式上的雜亂顯而易見。上篇與中篇之間的接續（第15號簡的詩書禮樂以下部分）非常不自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很難想象這是經過了作者認真加工後的作品。稱下篇（第35號簡至第67號簡）為“雜篇”名副其實，這一部分似乎是彙集了一些與本篇的心性論主題相類似的内容，但是闡述主題的傾向並不太強烈。總之，把它看成是尚未完全編輯好的、繁雜的堆砌比較符合情況。“性自命出”篇貫穿全文的首尾呼應不清晰，也找不到作者為全篇確定書名或篇名的痕迹。從此種狀況可以判斷，

這是一部尚未完工的“編成書”。該篇中出現了與《中庸》相類似的語句，也僅僅是形式上的相同，而表述的內涵完全不同，出現這種現象也是由於編著者大量的自由引用造成的。

在新出土資料中，有不少是彙編性質的“編成書”，它們本來應該是經過不斷充實以後最終將成為一部著述模樣的體裁。所以，對於新出土的文獻資料來說，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單純地認為這些文字過去都是已經加工完成的完整的作品，祇是由於年代久遠才造成了目前的散亂形態，祇這樣考慮是不夠的。要思考出土資料的獨特性質就必須要顧及原書形成過程中的多種樣態。

懸泉置及其周邊^①

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

◎ [日] 宮宅潔 著

◎ 李 力 譯

序言——懸泉置的位置

筆者最初訪問懸泉置遺迹，已是 1997 年夏天的事情了。我們在安敦公路下車，順著平緩的山麓步行許久，好不容易才走到了遺迹那裏。但是，說是遺迹，因為幾乎被掩埋著，所以也很難想像其全貌。雖然西南隅的角樓，及其東側、北側的房屋遺迹，有少許露在地面上，但是把這些情況弄清楚，則是自 2000 年遺迹平面圖公開發表之後的事情。（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

因此，在那時，與遺迹的構造相比，毋寧說周邊的景觀給我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那是因為我們對其景觀感到有些困惑之處。首先，南邊山地一帶（截山子、懸泉山、十工山）根本不見綠色。而將目光轉向北邊，雖然安敦公路那邊可見到一些綠地，但是疏勒河應該也在那邊，在 30 公里以上的前方流淌著。如此的遠離水資源，漢代人是如何生活的呢？究竟為什麼要在這樣的地方設置郵亭設施呢？令人難以理解。不言而喻，已成為“懸泉”之名由來的水流，曾經是從南邊流出來的。這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一眼眺望過去，却是想像不到的荒涼。懸泉置漢簡也有如下的證言：

① 原文題為《懸泉置とその周邊——敦煌—安西間の歴史地理——》，載《絲綢之路學研究紀要》（《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vol. 22，第三章，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2005。

縣泉地勢多風塗立乾操毋□其濕也度得棖六枚今遣效穀倉曹令史張博

II 0211②：026 粹 69

至今，從玉門鎮一直到安西這一地區，仍以其強風而聞名，有“風庫”之別稱。在漢代，很可能懸泉置一帶也刮著幹熱風。

如果再試著眺望一下懸泉置及其周邊，即敦煌至安西間的遺迹布局，就有不能理解的地方。疏勒河自東向西流過今安西縣城市街北，其南（往南距離 10 公里以上的地方）有漢代長城穿過及附帶的防衛設施散布（圖 1）。再往南是六工古城與懸泉置遺迹。如果長城的作用是保護綠洲，就不能不對此布局感到疑惑。因為這反映的似乎不是要守衛而是要放棄疏勒河流域貴重水資源。

其後，2002 年再訪懸泉置時，此次跋涉到南邊山中，因而能夠目睹至今雖然是一點點但仍是涌出來的“懸泉”（圖 2）。由於這一體驗，筆者一直抱有的印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迄今仍將自酒泉、安西向敦煌，再從敦煌向西的古代河西走廊，理解為“沿疏勒河之路”，那條河流曾是向邊境運送防衛兵士和屯田者，或者往來那裏的旅客之命脈。若然，筆者感到有些茫然。雖然這也許是我個人堅信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這樣的表現：敦煌郡內出土的竹簡也被稱為“疏勒河流域出土簡”，敦煌郡內的長城穿過“疏勒河南岸”。將敦煌郡內的防衛設施與交通道路的分布聯繫起來談，這不正是學界的一般性傾向嗎？

可是，除了疏勒河之外，還有很多的河流流經敦煌郡內，形成大大小小的綠洲。如果以廣闊的視角來重新領會這樣的地理環境與遺迹分布的話，那麼即使苦思冥想也是不能理解的，即關於懸泉置的位置、疏勒河與長城的位置關係的疑問。本文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來論述敦煌至安西間的歷史地理。

副標題所列的“敦煌至安西”之間，具體是指從漢代敦煌郡的中部往東的一帶，即比敦煌郡治（現在的敦煌市）更東的地區，漢代曾在那裏設有效穀、廣至、冥安、淵泉諸縣。所謂敦煌漢簡的大部分，是出土於比敦煌郡治更西的遺迹。關於那個地區所存在的各種設施，例如玉門關等等，圍繞其分布展開了各種爭論。一方面，關於敦煌至安西之間，因為木簡史料幾乎也不曾在那裏出土過，所以其地理環境與各種設施的布局，並不怎麼引起人們的注意，我以為至少在日本是這樣。但是，如果懸泉置漢簡的全貌變得清晰了，那麼這種狀況很可能也會發生變化。為防備懸泉置研究在根本上出現格式化的傾向，重新認識以往有關歷史地理學的考察成果及其界限，也并非徒勞無益。

本文首先是關於該地區地理的概觀（第 1 節），整理圍繞漢代的縣城、都尉府之所在地的爭論，把握關於各種設施分布的大體的位置關係（第 2 節）。然後，從已知的河道與居住

區之所在，推測漢代的交通路線。最後，決定將那些實地觀察得到的知識，與懸泉置漢簡的內容進行對照，研究其間是否發生矛盾（第3節）。

一、懸泉置周邊的地理環境

懸泉置遺迹，位於北緯 $40^{\circ}15'54''$ 、東經 $95^{\circ}19'45''$ ，海拔 1132 米（圖 3）。距安西的直線距離是 47 公里，距敦煌則不到 60 公里。雖然周邊可見“甜水井”、“空心墩”這樣的地名，但是可惜未見到有聚集在一起的村落。即使距最近的六工一帶的村落，也有 25 公里的距離。在途中平緩的坡地，坡度從其南邊開始變得陡峭。

背後緊靠的截山子，其走向是從安西縣雙塔附近的水壩向西南偏西，是一直延續到敦煌市南方三危山、鳴沙山山系的一部分。由大約 1300 至 1400 米一級的群山構成，說起來惟獨懸泉置附近多為 1200 米一級的山。從遺迹極目遠眺山脉，首先看見的是位於東南方向山上的烽火臺，其正確的位置是北緯 $40^{\circ}15'52''$ 、東經 $95^{\circ}20'15''$ ，海拔 1149 米。登上烽火臺頂遠眺四周，雖然群山中還是看不見一棵樹，但是烽火臺所在山的西麓有已乾涸的河床，從那往南邊尋找，至今仍有細小的水流。據說，該水流就是見於史籍的“懸泉”。

懸泉水，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漢將李廣利伐大宛還，士衆渴乏，引佩刀刺山，飛泉涌出，即此也。水有靈，車馬大至即出多，小至即出少。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敦煌縣條

據李并成研究，其源流似乎是從山中的崖壁上滲透出來，并彙集起來形成細流（李并成，1991）。但是其水量匱乏，沒有離開山中就消失在戈壁灘之中。敦煌文書中的《沙州都督府圖經》（P. 2005）記載：

懸泉水，在州東一百卅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細流，一里許即絕……

可見，在唐代，其水量就已經不豐沛了。

典籍史料與李氏都祇說其水流從山中涌出，並沒有言及其源頭，即關於該泉水是從何處聚集起來的。如果看一看過去的聯制地圖，那么再向南的山中就可以找到懸泉的水流，越過截山子南側，形成一條東西向的細長水流，一直流到開闊的盆地。該盆地被幾塊扇狀地——由昌馬河（疏勒河）、榆林河（踏實河）、或者從野馬山系（祁連山脉的支脉）流出

來的幾條小河衝擊而形成的——包圍著。由這些河的支流與扇端涌出的水形成水流從西向東流著，雖然在盆地中只留下從東向西流的形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被稱為蘆草溝的河流。

蘆草溝是昌馬河（疏勒河）的支流。發源於祁連山脈的疏勒河，向北流，在穿過玉門市昌馬東邊後，形成巨大的扇狀。疏勒河的主流流向扇狀地偏東處，很快沿著扇端轉而向西流，然後西流到截山子南側的盆地。這就是蘆草溝。榆林河也流入這裏，最終在懸泉置以東 10 公里的地方沿截山子的山谷北流而出，消失在戈壁灘之中。將《沙州都督府圖經》所見的“苦水”，視為該蘆草溝，是研究者比較一致的看法。

苦水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澗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餘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之南。山（大概是指截山子——筆者）南號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截山子），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即向北…至…散入沙鹵。

如後所述，唐代的瓜州城被認為是置於鎖陽城（苦峪城，今安西縣橋子鄉之南），如果從那裏變為“西南流一百廿里”，雖然實際上有比蘆草溝更向西的態勢，但是從整個路線來看，其向西北流，離開山脈，最後“散入沙鹵”，這些確實與蘆草溝有很多共同之處。

在“苦水”流出截山子北側的地方，唐代曾一直設有“階亭驛”。叫做階亭的地名，在敦煌文書中的《唐天寶年代敦煌郡會計牒》（P. 2862 背）中，也可見到“階亭坊”，其中還記錄著車、牛及當時的數量。根據這樣的記載，推測苦水的下游一帶在唐代曾是游牧區（乜小紅，2003）。雖然其在漢代的規模也較小，但是大概已形成了一個綠洲。

從蘆草溝消失於沙漠的地點，再將目光轉向西邊，幾條舊河道被刻在從截山子向北的地上，形成了較小的扇狀地（圖 4）。它們是從野馬山系向北流來的無數水流在一部分被截山子堵住後，彙集在幾條山谷中，在截山子北側流出來的。“懸泉”正好就是這樣的水流之一。

在截山子的更北側，首先映入眼簾的河是疏勒河及其幾條支流。在雙塔壩以西的地方，修建了許多將疏勒河水引向南的水渠，一直及於六工古城附近，供給以安西縣為中心、東西細長的遼闊耕地之用水。從鳥瞰安西縣一帶的衛星照片可知，該綠洲的規模遠遠超過榆林河扇狀地等的規模，是安西縣內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但是，不能斷言那已是自古以來不變的風景。這是因為，雖然漢唐時期地理書中所見的“籍端水”、“冥水”被認為是疏勒河，但是其所描寫的那裏的情況與現在的疏勒河的情況不同。

現在的疏勒河東西橫斷安西縣，入敦煌市，與黨河合流後又向西流去，不久消失在沙漠之中。一方面，在史書中，根本未曾言及籍端水、冥水與黨河（氏置水）合流之事，却變成在那之前流入大澤（冥澤）。

南^①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冥澤^②），溉民田。（《漢書·地理志》）

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晉昌縣）

不清楚此處所見“大澤”之所在。徐松《西域水道記》認為，指位於玉門縣北方的“華海子”、“布魯湖”、“青山湖”等（卷三《哈喇淖爾所受水》），《中國歷史地圖集》似乎亦從之（圖7）。但是，也有對此持不同看法者。李并成主張，昌馬河扇狀地的西側、今蘆草溝流經的一帶，曾經是冥澤（圖10）。^③這一帶至今確實還有很多沼澤，據認為從TPC上也可見到這些沼澤。無論如何，不管根據哪種觀點，籍端水都在今安西縣城以東的地方形成湖泊，未曾在其以西流出來。

根據《大清一統志》（卷一七〇“安西廳”），安西的鎮城最初設在布隆吉，到雍正五年（1727）被移至其西百餘里，即今安西縣城附近。灌溉安西縣城周邊田地的“回民渠”，也就是在雍正十一年（1733）吐魯番的額敏和卓避開准葛爾的攻擊、內遷後被開鑿的（《西域水道記》卷三）。對現在的安西縣城一帶進行開墾，也許是更後代的事情吧。

若根據以上的事實想像漢代的敦煌郡中、東部的樣子，則在其範圍內的綠洲有：①昌馬河扇狀地北部一帶；②蘆草溝及榆林河扇狀地一帶；③截山子北的蘆草溝、懸泉水下游地帶；等等。關於安西縣城以西的疏勒河，其存在尚未被搞清楚。

如果這樣的推想是正確的，那麼開頭所述的疑問，即不能理解敦煌至安西間的疏勒河與漢代長城的位置關係，甚至抱有這樣的疑問本身，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這是因為，在漢代長城之北，當時並不存在水流，而長城毋寧是要防衛沿截山子北部的廣闊綠洲而設置的，這樣的理解能夠說明一切。

可是，在此立即下結論可能為時過早。地理書的記述也有很多不完全的部分。僅據此來復原水系、假想與現在不同的景觀，這作為證明的程序畢竟還是不夠充分的。我認為，作

① 現行《漢書》云“南籍端水”，後代地理書也多從之。但是，《太平御覽》卷一六五所引《漢書·地理志》則作“籍端水”，《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三“晉昌縣”條也作“籍端水”。

② 雖然現行《漢書》作“西北入其澤”，但是《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三所引《漢書·地理志》作“西北入冥澤”。

③ 李并成 1997。他假設籍端水漢代的河道是在昌馬河扇狀地之西，認為冥澤形成於榆林河扇狀地與截山子之間的、東西細長的盆地一帶（參見圖10）。李旭東也有同樣的看法，認為最初流經昌馬河扇狀地之西的籍端水（冥水），自唐代就變成流經山扇狀地之東，其後因清代的開發，昔日的冥水完全乾涸了。

為探尋漢代當時的水系與居住區之所在的又一個手段是，在勘察漢代行政設施的分布、遺迹之所在的同時，要研究一下方法。因此，下節將整理一下關於漢代行政地理的研究。

二、懸泉置周邊的行政地理與城郭遺迹

漢代敦煌郡之下，共設有六個縣。首先將《漢書·地理志》該部分內容抄錄如下：

敦煌縣，“中部都尉治步廣（侯官）。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莽曰敦德。”

冥安縣，“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效穀縣，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沙州都督府圖經》為“魚澤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淵泉縣，師古曰：“閼駟云地多泉少，故以為名。”

廣至縣，“宜禾都尉治昆侖障。莽曰廣桓。”

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

其中，敦煌縣治被認為位於今敦煌市街附近，龍勒縣在敦煌市西南的南湖地區。作為本文研究對象的敦煌郡中、東部，除這兩個縣外，還設置有餘下的四個縣。除了縣之外，在其範圍內還設有“宜禾都尉府”的治所。

以敦煌、安西的城郭遺迹來考定其縣城、都尉府的工作，迄今為止也是嘗試性的。但是，這項工作不是很容易。例如，即使出土木簡，其出土地是漢代什麼機構呢？很難進行考定。何況在敦煌郡中、東部幾乎沒有出土木簡，祇有依靠地理書的含糊記述和通過遺迹來采集非文字資料。以下介紹圍繞各縣、都尉之所在的爭論，但是考定其中似乎稱之為鐵案者，坦率地講，一個都沒有發現。可以說，各研究者所進行的工作是試圖將地理書所保存的信息與現存遺迹之所在進行整合。然而，地理書所載的方位與距離有時也互相矛盾；即使與遺迹有關聯，我們所能探討的也不過是“現存遺迹”。整理諸說，同時排除可能性低的，將諸縣大體的領域及其中心地區集中起來，這是以下工作的要點，並想在此基礎上作些推測。

又，關於正史地理志與唐宋時期地理書所載郡縣的廢置情況，另外附表。

（1）淵泉縣

淵泉縣是改“深泉”、“閼泉”之名，同時，北周時代在其他鄰縣的基礎上與涼興縣

合并，唐代曾占有晋昌縣的一部分。《後漢書·張奐傳》李賢注：“淵泉，縣名，其地多泉，故城在今（即唐代）瓜州晋昌縣東北”，《大清一統志》亦云：“在柳溝衛（今安西縣四道溝）東”，都證實其管轄範圍在安西縣的東部。關於淵泉縣治即縣衙門所在地的城郭都市，雖然清許鴻磐《方輿考證》考定柳溝衛城本身曾為淵泉縣治，但是近年來根據遺迹調查結果所進行的研究，幾乎都將四道溝村北的城壕灣遺迹作為候補。

城壕灣遺迹位於四道溝村之北 300 米。周邊是遼闊的耕地，四道溝的河床穿過南側。城郭大體上呈方形，東西 240 米，南北 320 米。但是，損壞得很厲害，只剩下東、北垣的一部分和西北角的角樓。從周邊發現了屬於漢代的地層，也出土了陶器片和五銖錢（岳邦湖、鍾聖祖 2001，89—90 頁；李并成 1995，119 頁）（圖 12）。遺迹位於昌馬河扇狀地的扇端東部，周邊也有很多的涌泉。這一點與《漢書》、《後漢書》的注釋也是一致的。

關於淵泉縣之所在與冥安縣的位置關係也成為問題。徐松《西域水道記》將玉門縣北的湖泊考定為漢代的冥澤，在此基礎上認為祇有玉門縣（今玉門鎮）才是漢代的冥安縣。若據此說法，則冥安縣曾在淵泉縣的更東邊。但是，因這一看法與木簡史料矛盾，故不能從之。這將在下節詳細研究。

（2）冥安縣

漢之冥安縣在晉代屬於晋昌郡，北魏時會稽郡治曾置於此處（《通典》）。隋稱常樂縣，唐武德四年改其名為晋昌縣後，瓜州總督府也被安置於此處。《通典》、《元和郡縣圖志》等，任何一本地理書都認為晋昌縣是昔日的漢冥安縣。

但是，冥安縣的轄地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進而其縣治又在何處呢？關於這些問題，人們的說法不一。不言而喻，唐代的瓜州城（晋昌郡城）是有力的候選，但是圍繞瓜州城之所在本身，已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即使看一下清代的地方志，例如，《嘉慶重修一統志》說：

晋昌故城，在州（安西衛）東。漢置冥安縣，屬敦煌郡。……

但是，《甘肅新通志》（卷十三安西直隸州）說：

晋昌故城，在州（安西衛）西南。本漢冥安縣，屬敦煌郡。……

諸說之中，現在大體上被確認為定說的，是將安西縣橋子鄉的鎖陽城遺迹考定為唐的瓜州城。

鎖陽城位於北緯 $40^{\circ} 15'$ 、東經 $90^{\circ} 12'$ 附近，距安西縣橋子鄉之南 8 公里。從現在的安西縣市街看，大致在其東南方向。在斯坦因勘察該遺迹的時候，雖然周邊已經祇生長紅柳等灌木，但是水渠曾經布滿其四周，耕地好像被圍了起來。斯坦因曾提到往遺迹西南方向延伸的水渠（Stein 1921, 1101 頁），李并成基於實地調查製作了關於水渠與耕地遺址的地圖（李并成 1996c）（圖 13）。的確，鎖陽城位於昌馬河扇狀地的西端，而且流經扇狀地西部一帶的水流流入其附近，從衛星照片觀察，這一點也已被證實（圖 14）。

城郭分為內城與外城。內城的面積為 280,000 平方米，東西 565 米，南北 468.7 米；外城則北垣 1,338.4 米，西垣 1,102.7 米。內城大體上呈正方形，四角有角樓，還留有甕城（圍住城門之外小城郭）和馬面（設在城牆半腰的突出部分）的遺迹。外城則呈不規則的形狀，東西垣特別是東垣因風化而被嚴重損壞（岳邦湖、鍾聖祖 2001, 93—94 頁）。岳邦湖、鍾聖祖 2001 與 Stein 1921 所載的平面圖（plate 46），與衛星照片所見到的情況一樣（圖 15）。

鎖陽城這一稱呼是清代後期的俗稱，史書上則稱為“苦峪城”。明成化年間，哈密人因躲避內亂與吐魯番的攻擊而遷到“苦峪”，在那裏築起了“苦峪城”。這些可見於《明史》。^①後來，清代也進行修築，因此現在留下的城牆不是那麼古老。但是，在周邊發現了晉唐的遺物，還有漢五銖錢，等等（李并成 1996c, 107 頁），據推測由唐曹義金所立的石碑也在城東 1 公里的寺院中（《西域水道記》卷三）。一般論者認為該城郭是建在唐代遺留的建築之上的，也有學者主張可溯及漢代的遺迹（吳初驤、余堯，1982, 29 頁）。

如前所述，從安西市街（清之安西街）看，鎖陽城在其東南方向。清代的地理書說，既不在“西南”方，也不在“東”面。但是，根據此外的很多論據，將這裏考定為唐之瓜州城，是目前比較一致的看法。

例如，1944 年年底勘察鎖陽城的閻文儒，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記載，得出鎖陽城是唐代瓜州城的結論。他首先根據假定唐代的玉門關在雙塔附近、在瓜州之北 50 里的地方的記載，以及玄奘天剛黑就從瓜州出發、半夜左右到達玉門關的記載，等等，考定鎖陽城為瓜州城（閻文儒，1987, 131—132 頁）。

李并成則列舉如下的論據[李并成，1996c, 107—112 頁]：

①據《元和郡縣圖志》等唐宋地理書載，瓜州位於沙州以東約 300 里（168 公里）的地方，該數字與敦煌至鎖陽城的距離大體一致。

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有玉門關至瓜州的距離及行程。

③《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苦水（即蘆草溝）流經瓜州城北十餘里處。

①《明史》卷二一七《西域傳一》等等。《明史》本紀（卷一四憲宗二）作為成化十三年之事，有這樣的記載：“冬十月戊申，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給土田牛種。”徐松將該年作為苦峪城建造之年。

④《元和郡縣圖志》云，瓜州距大雪山 240 里（約 134 公里），這與鎖陽城及其南的山嶽地帶的距離大體一致。

⑤鎖陽城是現在安西縣內所保留的最大級別的城郭遺迹。

⑥唐代的烽火臺之列，在鎖陽城附近交叉。

雖然舉出了很多“論據”，但是其中也有不得不令人疑惑之處。比如，其中的④，祁連山脉南北有數百公里之長，在確定何處是“大雪山”上能有“一致”的說法嗎？歸根到底，將鎖陽城考定為瓜州城的最重要的論據不就是⑤嗎？其所說的正是筆者感覺到的。實際上，也有論者採用②的史料等，但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以下介紹的孫修身的考證（孫修身，1986）即是。

《元和郡縣圖志》瓜州條“八到”云：“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同書肅州條云：“西北至葭蘆泉五百里。”據此，則瓜州就在葭蘆泉東南二十里處。“葭蘆”就是“胡蘆”，即可能指出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胡蘆河。在雙塔堡附近，流入疏勒河的河流曾經是胡蘆河。^①如此，則瓜州城就在雙塔的東南方。在這樣的推測之下，孫氏調查周邊的遺迹，將蕭家地古城作為其候補。

蕭家地古城在安西縣布隆吉爾鄉之南。周邊也有烽火臺遺迹，連接安西與玉門諸縣的交通道路曾穿過此地。城郭遺迹在稍微有點窪的地方，被分成北城與南城。兩者相距 20 米，其規模分別是：北城是東西 25×南北 75 米，南城是東西 143×南北 103 米。從城內發現了陶器片、石臼以及五銖錢、開元通寶等古錢（岳邦湖、鍾聖祖 2001，94—94 頁；孫修身 1986，13—14 頁）（圖 16）。以衛星照片來確認其位置，則其所在的地點正好是昌馬河扇狀地扇端的中央，疏勒河與現在的耕地、幹綫道路在更偏南向下之處。雖然周邊的舊河道可以被認出來，但是却看不見耕地的痕迹（圖 17、18）。

以上是圍繞唐瓜州城之所在的爭論。大多數人持將鎖陽城視作瓜州的看法，但是也不能否認還有不同的觀點。那麼關鍵是漢代冥安縣治大概是怎樣的？

吳初驥等從通說，認為鎖陽城是唐之瓜州，漢之冥安縣治也在那裏（吳初驥、余堯 1982）。但是，實際上，主張不同於“唐瓜州城＝晉昌縣城＝漢冥安縣治”這一圖式的論者更多。那也不是近年提出的新看法，在很早以前，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就認為，唐之瓜州城與漢之冥安城在不同的處所（卷六四）。《通典》云：

晉昌 漢冥安縣地。…（卷一七四州郡四）

① 孫氏依據閻文儒，1987。該河在《西域水道記》可見到是作為西札噶爾烏珠水、窟窿河，徐松將之考定作胡蘆河。

其說法多少有點含糊不清，却成為唐之瓜州（及晉昌縣）城與冥安縣城是不同地點這一認識之源。

那樣的話，除鎖陽城（或者蕭家地古城）之外，要尋找能考定作漢之冥安城的城郭遺迹，在鎖陽城靠東北的地方，就有正符合要求的遺迹。那就是南岔大坑古城。

南岔大坑古城，在距鎖陽城東北 4.5 公里的地方。城址大體上呈方形，西垣 535 米，北垣 550 米，殘存的城垣高為 1 至 2 米。城內發現了漢代的陶器片、五銖錢等。周邊是不低於 3.5 米的窪地，也遭到洪水的嚴重侵蝕。在該遺迹之北 1.5 公里的地方，還發現了有一條約 100 米殘垣的小型城郭遺迹（岳邦湖、鍾聖祖，2001，86—88 頁；李并成，1997，43 頁）。^①即使在衛星照片上，也能清楚地觀察其情況，可以看見周邊的舊河道和耕地（圖 19、20）。

以上，介紹了圍繞唐瓜州城及漢冥安縣城之所在的爭論。總共提出了三個城郭遺迹。雖然打算最後提出拙見，但是不得不保留結論。把冥安考定為現在的玉門鎮近旁的徐松之說，如第 2 節所述，因為已經不能從之，所以布隆吉爾以西、橋子鄉一帶可能就是冥安縣。但是，在其範圍內，冥安縣城具體在哪里呢？要指出特定之地點，現有的史料還不充分。

（3）廣至縣

唐宋的地理書，在將常樂縣視為漢廣至縣這點上是一致的。關於其大概的方位，《嘉慶重修一統志》云：“廣至故城，在州西。……”《甘肅新通志》云：“在州西南。……”很多證言證實，在現在的安西縣西部，或者在西南部。加上這樣的證言，考察廣至縣或其縣治所在時，影響最大的是陶葆廉《辛卯侍行記》的考證。

光緒十七年（1891），陶葆廉跟隨已被任命為新疆巡撫的父親陶模前往新疆，根據旅行途中的見聞和體驗，撰寫了《辛卯侍行記》。其中，陶氏展開了如下的考證：

《元和郡縣圖志》：“常樂縣。東至瓜州一百十五里。”或作一百五十里。唐瓜州在今雙塔堡，其西南至踏實堡一百二十五里。“踏實”蓋“大至”（避隋代煬帝之諱，“廣至”被改成為“大至”——筆者注）之轉音。……按，今踏實堡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漢廣至。……（卷五）

踏實堡在今安西縣踏實鄉，位於榆林河的下游。以王仲犛《北周地理志》為首，很多的歷史地理書都繼承了陶氏的考定，即使作為具體的遺迹，也舉出踏實鄉的破城子遺迹作為候補。

^① 孫修身 1986 也舉出了南岔古城的資料（16 頁），但是其外形却是不同的。

破城子現在所在的地方，也被稱為常樂城。城址呈東西 144 米×南北 250 米的長方形，除了北垣之外，保存狀況良好。遺迹之下有漢唐的文化層，在漢代的文化層與漢以後的文化層之間有斷層。東垣之外發現了漢墓，也出土了五銖錢。在城外約 3 公里的地方，也有耕地的遺迹（岳邦湖、鍾聖祖，2001，89 頁；李并成 1991，83—84 頁）。從衛星照片，也可以找到大概是城郭遺迹者。

但是，在陶氏的考證中，也有很多不能讓人首肯之處。首先，對於“大至→踏實”的轉音，就不能完全讓人信服。因為所謂隋代暫時的新稱呼，其後也作為土著地名生存下來，這大概是難以想像的。陶氏又將唐瓜州規定在雙塔附近，並在此基礎上計算里程。但是，如前項所述，現在很多論者都將安西縣橋子鄉的鎖陽城考定作唐瓜州。破城子，按直線距離，在鎖陽城西約 25 公里，即僅四十五里的地方。這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載的里程不一致[順便說一下，吳初驤 2001 根據懸泉置簡 II 0111③37（未公開），認為廣至到冥安為 80 里]。又，《後漢書·蓋勳傳》李賢注：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

漢之廣至縣城址，在唐代曾是“縣泉堡”。見於《新唐書·地理志》的“懸泉府”，大概也就是被置於此處的。若認為漢之廣至縣城曾在踏實，則唐之懸泉府之所在自然而然也是踏實。要是那樣的話，懸泉府就會在漢之懸泉置，或者在比懸泉水更以東的地方。^①

總之，雖然將廣至縣規定在踏實鄉周邊的陶說，是以如下兩點為前提條件而成立的：

①“大至→踏實”的轉音，②唐之瓜州城曾在雙塔，但是，②與通說不同，①也不能說是確證。如果不拘泥於①，且將②改從通說，那麼也有廣至縣在踏實鄉更以西之處的可能性。

對於“大至→踏實”之轉音抱有疑念的李正宇，又指出破城子作為縣城規模過於小等等，認為“廣至縣=踏實鄉”說是錯誤的。與此同時，他提出將位於安西縣六工村之西北約 12 公里的“巴州城”作為候補。按照他的說法，雖然該城郭因風化幾乎不存在，但是根據土色的差別能夠找到其遺址，這是一邊不足 300 米的正方形。城內有窯遺址與居住遺址，城外發現了可能是漢至北魏時期的墓。隋唐的遺物沒有采集到，推測隋唐時代已經變成無人區了。^②這個可能是“巴州城”遺迹的情形，即使在衛星照片上也能觀察到，可知蘆草溝位於截山子之北所形成綠地的東北端（圖 22）。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也是不能從該考定。在將巴州城考定為廣至縣城上，當然李正宇論

① 關於這個問題，《辛卯侍行記》指出有錯字和漏字的可能性，李并成 1991 與黃盛璋 1987 則認為，懸泉堡與懸泉水、懸泉置完全沒有關係。

② 有關“巴州古城”的資料也刊載於李并成，1996a。

文也擺出了幾個論據，可是讓人感覺勉強，因為巴州城的位置過於偏西。巴州城距離懸泉置（屬效穀縣）僅 20 公里，可以說其位置是在廣至縣西境附近。可是，據史書記載，廣至縣治應該是在縣內偏東的地方。

三國時代自廣至縣的轄地中分置宜禾縣，在晉代與廣至縣同屬晉昌郡。大約到西涼時，宜禾縣與其西鄰的敦煌郡所屬縣合并，構成了涼興州的一部分（據《太平寰宇記》卷一五三“常樂縣”條）。從曾經與西鄰之縣合并這事來看，宜禾縣曾在舊廣至縣的西部一帶，這是沒有錯誤的；三國時代以降的、而且大概漢代的廣至縣治，應該是在縣的東部。因此，不能從巴州城說。

目前，我想提出這樣的假設：廣至縣的中心，可能在現在榆林河扇狀地及穿過其北部的蘆草溝沿岸的什麼地方。但是，關於其正確的地點，仍然缺少下結論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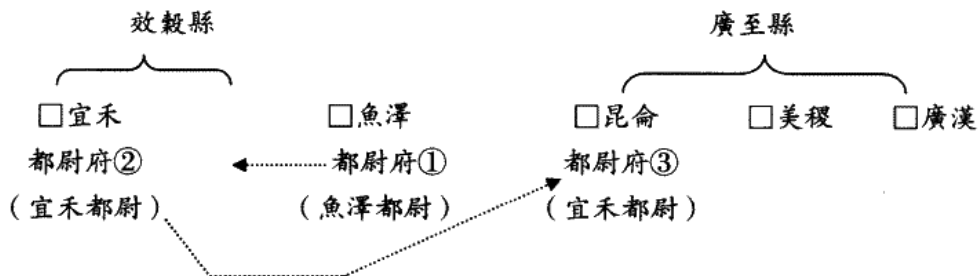
（4）宜禾都尉府

《漢書·地理志》也明確記載，宜禾都尉府置於廣至縣內，治所設在叫做“昆侖障”的砦。《太平寰宇記》云：“宜禾故城……城在（晉昌）縣西北界。”《方輿考證》認為，昆侖障在安西州城西北一帶。敦煌漢簡出土後，從其內容分析，因漢代的宜禾都尉府數次改變其所在，故已經變更的可能性變大了。其論據就是下面的簡：

●宜禾部蠡第廣漢第一美稷第二昆侖第三魚澤第四宜禾第五

D1683（TVIb 出土）

羅振玉等從該簡展開了如下的考證。即，所謂“宜禾部（羅等釋讀為“郡”）”大概是指“宜禾都尉轄境”，此處被并列的“廣漢”、“美稷”、“昆侖”、“魚澤”、“宜禾”，是將宜禾都尉府所屬的砦從東按順序排列的。前三者在廣至縣的轄區內，後二者在效穀縣的轄區內。其中，都尉的駐扎地是“魚澤”，武帝元封六年（前 105）在此處設置了“魚澤尉”（據《漢書·地理志》效穀縣條注）。不久，都尉府遷到“宜禾”，也改稱“宜禾都尉”。在《漢書·地理志》的時代，即西漢平帝（前 1—公元 5）時期以前，雖然都尉府遷到“昆侖”，但是稱呼仍然是宜禾都尉（羅振玉、王國維，1914，屯戍叢殘考釋，烽燧類）。以上的概況，可以圖示如下：



羅振玉等將所開列的“宜禾”、“魚澤”等視為烽火臺的稱呼，雖然讓人覺得奇怪在廣闊的領土上祇有五個烽火臺，但是現在它們已經被理解為候官的稱呼了。

□月十二日庚辰夜大晨一分盡時萬歲揚威燧長許玄受宜禾臨介徒張均

D2189 (T27 出土)

該簡是郵書交接的記錄，其大意是說：在某月十二日之夜，“萬歲候官”揚威燧長許玄從“宜禾”臨介燧之徒張均手中收到（郵書）。在這裏，在與“萬歲候官”對應位置上的“宜禾”，不是“宜禾都尉”而很可能是“宜禾候官”的意思。此外，也可見“敦煌魚澤候”的稱呼（敦煌漢簡 D1871）。可以認為，《漢書·地理志》所說的“魚澤障”、“昆侖障”，分別是“魚澤候官”、“昆侖候官”的治所本身，或者附屬於它的砦。

那么，究竟“昆侖候官”的治所可能在哪裏呢？作為昆侖障之所在，李正宇（1997）與岳邦湖、鍾聖祖（2001，91 頁）都將安西縣南岔鄉六工村的六工古城列為候補。李氏著眼於東漢的竇固等曾經從“昆侖塞”向哈密、吐魯番方面出擊的事實^①，將昆侖障作為從敦煌向吐魯番所謂“北道”的起點與固定位置。其結論是，在此基礎上，如果今天也尋找殘存的“北道”（據說大致沿 312 國道），那么六工古城作為其起點恰恰是合適的。

對此，李并成提出另一個方案（李并成，1996b）。他認為，首先關於六工古城有一個疑問，即其位置過於遠離漢代長城。漢代長城在六工古城北約 12 公里處，因而六工古城作為統帥長城沿綫防衛設施的都尉府是不合格的。在此基礎上，他贊同這樣的觀點，即主張宜禾都尉的管轄範圍，是從安西縣的西沙窩一帶直至疏勒河彎曲部；^②如果按照見於 D1683 簡的排列，那么昆侖候官應該正好位於中央。因此，從這一點看，心中大致有著落，就將安

① 《後漢書·明帝紀》：“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

② 林梅村、李均明，1984，25—27 頁。西沙窩是在懸泉置西北廣闊的沙丘地帶，從那裏到疏勒河的彎曲部，東西約有 150 公里。

西縣小宛農場沈家莊的城郭遺迹作為候補。

小宛破城，位於沈家莊之西 4 公里、斯坦因之 T39a 遺迹之東 2 公里的地方。北垣 180 米，西垣 182 米；城垣的一部分，特別是東南角，因洪水而破損。從城內采集到很多的遺物，也發現了從漢到唐宋時代的陶器片（岳邦湖、鍾聖祖，2001，67 頁、112 頁；李并成，1996b）。^①從衛星照片，也能確認其東南角已被剝掉的情形，也可看見在其周邊疏勒河支流的河道（圖 23、24）。

需要指出，以上兩說^②之中，將小宛破城考定為昆侖障的李氏的看法，在客觀論據方面不够充分。但是，提出六工古城過於遠離長城的問題却值得傾聽。的確，既然都尉府以軍事統帥為其任務，被設置在長城附近的可能性就比較大。若考慮到宜禾都尉府的特殊情況，即因同時設置管轄內的候官而輾轉其所在地，則接近於長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這是因為，居延地區的幾個候官，其所在地目前已經搞清楚了，即其很多[甲渠候官（A8）、卅井候官（P8）、殄北候官（A1）、肩水候官（A33）]是沿長城所設置的。本項開頭所列出的《太平寰宇記》指出“縣西北界”，也暗示宜禾都尉府曾被置於長城附近。

雖然缺少文獻上的論據，但是暫且從小宛破城說。

（5）效穀縣

可以確認的是，效穀縣作為敦煌縣的鄰近縣，在西涼時代尚存。據《隋書·地理志》，直至北周升格為“效穀郡”，但是不久被合併於敦煌郡。其後，唐代在此處置“效穀府”（《新唐書·地理志》）。關於其所在，《嘉慶重修一統志》認為“效穀廢縣在敦煌縣西……”但是，另一方面，《讀史方輿紀要》說：“效穀城在（沙洲）衛（今敦煌市）東北……”指出正好相反的方向。其他的地理書，或者說東，或者說西，也沒有統一的說法。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是敦煌文書中的逸書。例如，《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古效穀城 周四五百步，右在州東北卅里。是漢时效穀縣，本是魚澤障。……（中略）……（前）秦苻堅建安（“建元”之誤——筆者注）二十一年（385）為酒泉郡人黃花攻破，遂即廢壞。今北面有頽基數十步。

又，從敦煌漢簡可知，魚澤候官處於宜禾都尉的管轄；但是，據懸泉置漢簡，今天已經清

① 關於小宛破城，斯坦因的報告書也曾言及（Stein 1921，1139—1140 頁）。

② 李春元 1996 論述說，從“8 號烽燧”（在安西縣西部的漢代長城沿線的烽火臺遺迹）到“宜禾都尉候障”曾發現有字木簡。岳邦湖、鍾聖祖 2001 也說，其附近的“90 號烽燧”是“宜禾都尉昆侖候障城”（56 頁）。兩者都用獨自的遺迹編號，不知道其是否指同一遺迹。因為無論如何從一支簡考定遺迹是很危險的，且其城郭好像也是一邊未超過 100 米的，所以此處暫且將之置於考察對象之外。

楚：懸泉置曾是效穀縣的所屬，效穀縣位於敦煌縣之東、廣至縣之西，這已經是毫無疑義的。

那么，效穀縣治具體在何處呢？關於這點，衆說紛紜。下面，利用梁尉英所作的表（梁尉英，1987，291 頁），來介紹這些不同的觀點。

| | 敦煌縣城的距離 | 城郭的大小 | 論者 |
|-------------|----------|--------------------|----------|
| ①安西縣西湖古城遺迹 | 東北 50 km | 159. 5m × 150m | 閻文儒，1986 |
| ②敦煌縣甜水井遺迹 | 東北 60 km | 80m × 60m | 吳、余，1982 |
| ③敦煌東湖五棵樹遺迹 | 東北 60 km | 110—120 × 120—130m | 岳、鍾，2001 |
| ④敦煌墩墩灣遺迹 | 東北 30 km | 1000m × 150m（平均） | 李并成，1995 |
| ⑤敦煌城灣城遺迹 | 東北 30 km | 31.9m × 30.9m | |
| ⑥敦煌五升（聖）宮遺迹 | 東北 20 km | 80m × 80m | |
| ⑦敦煌戴家墩遺迹 | 東北 20 km | 120m × 92m | 梁尉英，1987 |

據閻文儒介紹，①是一邊有 170 米規模的城郭遺迹（閻文儒 1986，152 頁）。但是，漢代長城位於比現在的疏勒河更北的地方，作為效穀縣址是不合適的。

②見於吳初驤、余堯“漢代的敦煌郡”，將位於“甜水井之北約 12 km”的大小兩個城郭遺迹作為效穀縣址。因為甜水井之北有兩處遺迹，所以如果能夠這樣表達，那么到底是指哪個遺迹并不明確，^①但大概是指甜水井一號、二號遺迹。其中，二號遺迹的別稱是五棵樹遺迹。

吳初驤、余堯 1982 的考定的依據是“（4）宜禾都尉府”中所介紹的敦煌漢簡（D1683、D2189）。首先，根據 D1683，魚澤候官就變為在廣至縣之西。又因為 D2189 出土於 T27 遺迹（參見圖 1），所以認為 T27 附近是宜禾都尉府管轄區的西端，在其東方或許能尋找到適宜的城郭遺迹。

| | |
|-------|----------------------------------|
| 中部都尉府 | 宜禾都尉府 |
| 萬歲候官 | 宜禾候官（屬效穀縣） 魚澤候官（效穀縣治） 昆侖候官（屬廣至縣） |

①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敦煌縣文化館 1975 介紹：甜水井一號遺迹，在甜水井之北 8 km，東西 80 m × 南北 60 m；二號遺迹，在甜水井之西北 7 km，南垣 133 m、東垣 120 m。與吳、余氏的“北 12 km”不同。但是，李并成 1996a 說：五棵樹遺迹（甜水井二號遺迹），甜水井道班之北 12 km，南垣 133 m、東垣 120 m；甜水井一號遺迹，五棵樹遺迹之東北 3.8 km，東西 80 m × 南北 60 m。若從之，則與吳、余氏所說的“甜水井遺迹”為一號、二號遺迹不同。此外，甜水井之北約 10 公里處有甜澇壩遺迹，一條殘垣約 32 米，發現有唐代的遺物。



←T27→

(從宜禾向中部的郵書交接)

一方面，推薦③的遺迹的岳氏等祇是將遺迹之周邊近似於《沙州都督府圖經》的“五百步”這點列為論據。

以效穀縣為“本魚澤障”這一《漢書·地理志》注等史料為前提，若首先從簡牘史料縮小魚澤候官的位置，則②③的遺迹的確成為有力的候補。但是，其所在與《沙州都督府圖經》所表達的“州東北卅里（約 17 公里）”大不一樣。所以④以下的遺迹被列為候補。

④—⑦的遺迹，在敦煌市的東北，從郭家堡鄉、轉渠口鄉周邊到其北部的黃墩子農場一帶。雖然梁尉英論文有示意圖，但是確切位置并不清楚。即使現在耕地遼闊，觀察衛星照片也不能發現其遺迹。

梁氏全部依據《沙州都督府圖經》所見的里程、周垣的大小，選擇⑦作為相應的遺址。雖然出示了若干旁證，但是根本未提從敦煌漢簡得到的信息，即魚澤候官可能在 T27 的更東邊。

李并成也同樣依據《沙州都督府圖經》，但是與梁氏的有兩點不同。一點是不選⑦而選④。其理由是，⑦的城郭作為縣城過於小，必須是④那樣大的規模。另一點不同是，明確提及敦煌漢簡顯示的魚澤候官之所在。

他認為，魚澤候官在比④更偏東的地方，在此基礎上，主張效穀縣治是原來的魚澤障，而置疑《漢書·地理志》注等。其主要基於這樣的認識，縣的核心設施不應該被安排在候官即最靠近前綫的一側。李氏還注意到這一現象，即效穀縣被設置後，魚澤候官依然存在，其結論是魚澤候官與效穀縣城分別在兩個地方。關於《漢書》注，指出所記載的“效穀縣（縣內）有魚澤障”等原史料，有可能是誤引（李并成，1995，120—126 頁）。

李說雖然沒有推測其範圍，但是縣治不應該被置於臨近長城的地方的主張，應該是值得聽取的。長城沿綫的防衛據點候官，變成縣的核心機關之所在，這確實勉強。即使翻一翻《漢書·地理志》，原來的候官，原封不動地升格為縣治，除了效穀縣的場合，其他的未曾見有。

那麼，圍繞以上的爭論，我首先感覺到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疑問：在唐代，已經變成“北面有頽基數十步”這一狀況的舊城，至今果真還存在嗎？因此，在這裏不敢進行將特定的城郭遺迹考定為效穀縣城的工作。但是，必須搞清楚的一點是，效穀縣治是在敦煌市街正東、黨河及其支流形成的綠洲呢？還是在更東、甜水井北的綠洲呢？《沙州都督府圖經》等的確支持前者的可能性，但是完全依靠作為有時缺乏可靠性的《漢書·地理志》的數

字，^①仍然是不可靠的。下節，擬通過分析同時代史料漢簡，嘗試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正如本節開頭所說的，本節的重點不是將特定的遺迹考定為漢代的任何一個設施，而是在於以遺迹的分布為線索，集中討論漢代當時的水系以及居住區之所在。因此，關於縣城、都尉府在何處，沒有勉強確定是哪個城郭遺迹，祇是列出有可能的候選。眺望一下這些候選地就發覺，是分布在現在的幹綫更南方、最遠有 30 公里以上的地方的遺迹。具體整理如下。

若從三道溝、四道溝附近向西尋找遺迹，則蕭家地古城（唐瓜州城？）在距布隆吉西南 12 公里、從疏勒河南下 10 公里的地方。從那裏開始，遺迹分布的情況是，沿著昌馬河扇狀地的扇端，轉著圈到截山子的南側。經過幾個遺迹（旱湖腦城、鷹窩樹城等等^②），位於扇狀地西端的是南岔大坑古城（漢冥安縣城？）與鎖陽城（唐瓜州城？）。再把目光轉向西，在那裏，榆林河扇狀地遼闊，其中央有踏實鄉破城子（漢廣至縣城？）。本文已經指出，廣至縣在踏實鄉更西的可能性。沿著流經榆林河扇狀地之北的蘆草溝，再往西，則還存在叫做老師兔城的漢代城郭遺迹。^③若照舊沿著蘆草溝出截山子之北，則那裏有巴州城，在更以西即截山子之北側，有遺迹散佈。首先，有懸泉置遺迹，從那裏稍微靠北有甜水井遺迹（漢效穀縣城？），然後到了敦煌綠洲一帶有墩墩灣與戴家墩遺迹（漢效穀縣城？）。

將這樣的分布連起來的綫，可能就是連結漢代縣與縣的交通道路。不用說，長城沿綫也有很多的防衛設施，並且有利用它們的人流和物流。但是，與該道路不同的是，已經有一條交通道路穿過了其南方。這些是將政治中心連接起來的道路，與可能多用於軍事通信的長城沿綫的道路，有不同的性質。懸泉置，曾是其沿路所設的郵亭設施之一。筆者當初抱有的疑問是，懸泉置的場所離長城與疏勒河過於遙遠。這個問題已經沒有意義了。

在前一節提出的，關於安西縣城以西之疏勒河的存否問題，還有未解決的部分。可以說，只要看一看遺迹的分布，例如即使今天安西縣城更西邊的疏勒河仍在流淌著，也存在利用其水資源的耕地與居住區，但也不能認為今天的情況等同於古代。在安西縣城以西，長城穿越比現在的疏勒河更南的地方，在這樣的背景下，再重複一下前節末尾所說的長城（不

① 例如，《沙州都督府圖經》認為，“古阿（“河”之誤）倉城”“在州西北二百四十二里（約 135 km）”。該“古阿倉城”，是漢代置於疏勒河沿岸的穀物倉庫，大概就是“昌安倉”[大方盤城（T18）]。但是，從敦煌到大方盤城直綫距離不到約 70 公里，從敦煌到長城北上，即使沿長城西行也祇有 90 公里。

② 旱湖腦城遺迹在布隆吉爾鄉政府之東南約 8 公里、距蕭家地古城西南約 5 公里的地方。城郭分為南城與北城，南城為南北 170m×東西 260m，北城為南北 160m×東西 220m。城垣和四周的壕溝似乎都被沙覆蓋了，從衛星照片也看不到其情形。從城內發現了五銖錢與陶器片，在周邊找到耕地遺址與漢墓。鷹窩樹城在橋子鄉吳家沙窩的東北約 10 公里處，雖然破損嚴重，却是南北 50m×東西 54m 的規模。東北 500 米的地點還有新石器時代後期的遺迹。此外，似乎附近也有叫草城（半個城）的遺迹，但是其位置不明（岳邦湖、鍾聖祖，2001，110—112 頁）。

③ 老師兔城遺迹在安西縣東巴兔鄉的西北約 20 公里的老師兔村北。南北 33m×東西 40m，周邊有烽火臺與漢魏的墓群，被推定為漢代的遺迹（岳邦湖、鍾聖祖，2001，110 頁）。吳仍驥 2001 將老師兔城作為西漢的冥安縣城，其舉出的論據是懸泉置簡 V1611③：39（粹 61，第 3 節所引）。他認為，從該簡可知“敦煌至安西是 210 里”，並進行考定，但是，如第 3 節所述，210 里應該視為懸泉置至冥安間的距離。

是疏勒河)是爲防衛沿截山子北部的廣闊綠洲而設置的。關於冥澤之所在,因爲漢代的冥安縣很有可能位於昌馬河扇狀地之西,所以與其將之規定於玉門縣之北,莫如從李并成之說,即認爲位於在雙塔之南的蘆草溝一帶。

到此爲止,本文擬論述的問題大致已討論完畢。最後,利用懸泉置漢簡來整理一下懸泉置周邊的設施分布、補充地理信息的同時,也看一看交通道路的使用法。

三、懸泉置漢簡考察

在1990年末及1991年5月至1992年底,分兩次發掘的懸泉置漢簡,祇有一部分被公開發表。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的《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及《敦煌漢簡》(上、下,中華書局,1991)介紹了64支簡,其後大約有190支簡載於甘肅考古研究所的《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文物》2000年第5期)。2003年出版的《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已發表的木簡爲中心,收錄了350余支木簡的釋文。可是,如果從出土的有字簡總計23000餘枚來看,這祇是很少的一部分。雖然感覺到這一局限,但是仍想就目前已經清楚的東西進而暫時性的推測進行論述,以驗證一下第2節所得出的結論。

首先,漢簡中有所謂的“里程簡”,其上列出了從某處到某處之距離。懸泉置漢簡之中,也有一些這樣的簡。(以下引用的懸泉置漢簡釋文據《敦煌懸泉漢簡釋粹》,將原簡號同時也是同書中的整理號寫作“粹~”。但是,同書只寫出釋文,沒有保留原簡牘的書寫格式。關於其書寫格式,參見《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祇抄錄《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一書中以句讀斷開的通讀形式的釋文。)

| | | |
|------------|-------------|------------------|
| 倉松去鷓鴣六十五里 | 堽池去鷓得五十四里 | 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 |
| 鷓鴣去小張掖六十里 | 鷓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 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 |
| 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 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 | 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 |
| 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 | 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 | ●右酒泉郡縣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

II 0214①: 130A 粹 60

在該里程簿中,可見到從武威郡蒼松縣到張掖郡、酒泉郡、再到敦煌郡淵泉縣的縣、置名稱。其下部與左右殘缺,不清楚記錄的是從哪里到里的里程。見於末尾的“乾齊”是酒泉郡所屬的縣名,從那裏往西走五十八里就到達敦煌郡淵泉縣。從該簡或許可以獲得種種

的地理資訊，但是關於敦煌郡，很清楚的是其東端的縣即與酒泉郡郡界接壤的縣，曾經是淵泉縣。在前節“（1）淵泉縣”中，介紹了考定冥安縣比淵泉縣更東的徐松說，但是此說難以成立。

作為與此形式不同的里程簿，還可以介紹下面的簡：

張掖千二百七十五一。冥安二百一七。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A）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東南。東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B）

V1611③：39 粹 61

這被認為是列出了以敦煌作為中心、從敦煌到各處之里程的簡。到張掖與武威的里程，確實與現在的懸泉置至張掖縣、武威縣的距離大體上是一致的。據此，則懸泉置距離冥安“二百一七”[“二百一十”的誤記，或者可以讀為“二百一（里）。七。”（七的意義不明）]。這是從懸泉置沿著蘆草溝往東，直到南岔大坑古城的近距離（約 85 公里）。以上兩個里程簡，旁證了第二節所假設的有關縣的分布的結論，即淵泉縣位於敦煌郡的東端，在其西即以昌馬河扇狀地西端為中心的地區，則是冥安縣。

從懸泉置也發現了很多有關郵書遞送的記錄。如果注意看其中所記載的交接郵書的記錄，或者寄給某處的書信是往什麼方向運送，就能夠把握懸泉置周邊設施的分布情況。首先，引用與第 2 節的爭論有密切關係的簡文如下：

| | | |
|-------------------|------------|----------|
| 東書八封板檄四楊檄三 | 一封詣酒泉府 | 一檄詣宜禾都尉 |
| 四封太守章 | 一封敦煌長印詣魚澤候 | 一檄詣益廣候 |
| 出 一封詣左馮翊 | 二封水長印詣東部水 | 一檄詣廣校候 = |
| 一封詣右扶風 | 一封楊建私印詣冥安 | 一檄詣屋蘭候 |
| 一封詣河東太守府 | 板檄四太守章 | 一楊檄敦煌長印 |
| 詣都史張卿 | | |
| 一楊檄郭尊印詣廣至 | | |
| 【一】楊檄龍勒長印詣都史張卿 | | |
| 九月丁亥日下舖時臨泉禁付石靡卒辟非 | | |

V1611③：308 粹 109

敦煌太守與敦煌長、龍勒長(縣長)發出的書信,由“臨泉(亭、驛)”者交給“石靡(郵)”之卒,再向東遞送。在書信的收信人住址一項之中,本文提起的有四處,即魚澤候(官)、冥安縣、廣至縣、宜禾都尉府。但是,冥安、廣至縣在比懸泉置更東之處,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據上簡仍不能確定其所在範圍。在此應該注意的是,魚澤候官位於比懸泉置更東之處這一事實。

效穀縣“本魚澤障”的《漢書》注,被認為非常有助於找到效穀縣之所在。如前節“(5)效穀縣”所介紹的,吳初驤等將甜水井遺迹考定作效穀縣的觀點,也是建立在將該遺迹作為魚澤候官所在地的基礎上。可是,如果魚澤候官在比懸泉置更東之處,那麼甜水井遺迹作為魚澤候官的所在地就不合適。因為該遺迹位於懸泉置西北,或者偏西北的方位。

或者,即使甜水井遺迹不作為候選,效穀縣也始終與被置於魚澤障的記載密切相關,將懸泉置以東的任何一個遺迹考定作魚澤候官和效穀縣,從道理上也是可能的。祇是我個人的私見,將效穀縣之所在往東挪至那裏,讓人覺得猶豫。這樣說是因為,我認為懸泉置靠近效穀縣的東端,從那裏以東已經是廣至縣的轄地。^①如李并成所述,祇有假設《漢書》注的記載有什麼誤記或脫落。在前節“(5)效穀縣”的末尾已保留的結論是,將敦煌市東北的諸遺迹(目前的)作為效穀縣所在地。甜水井遺迹、還有巴州城遺迹等散佈於敦煌至安西間的長城南側的漢代遺迹,可能是都尉府與候官之類的軍事系統的設施,或者後代再利用它們所建造的城郭。

又,東行郵書的記錄也有如下的內容:

出東書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詣勸農掾、一詣勸農史、一詣廣至、一詣冥安、一詣淵泉。合檄一、鮑彭印。詣東道平水史杜卿。府記四、鮑彭印。一詣廣至、一詣淵泉、一詣冥安、一詣宜禾都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時、縣(懸)泉置佐忠受廣至廐佐車成輔。●即時遣車成輔持東。

II 0114②: 294 粹 111

□府、一詣御史、一詣左馮翊府、一詣武威府、一詣京兆尹府、一詣安定、一詣趙相府、一詣金城、一詣南河尹府、一詣□□、一詣護羌、一詣魚澤、一詣□□、一詣淵泉、一詣宜禾護蓬、一詣宜禾、一詣□曹護蓬、一詣定(?)漢尉、

VI 91 F13C①: 25 粹 221

① 在三國時代,將廣至縣的一部分分出來,新設“宜禾縣”。從其名稱看,可以認為新縣是被置於漢代的宜禾候官周邊。本文的第2節“(4)宜禾都尉府”、“(5)效穀縣”,宜禾候官位於宜禾都尉西端,所轄是 T27 遺迹以東一帶。若漢代的廣至縣將直至 T27 附近作為其轄地,則懸泉置就會位於靠近廣至縣境的地方。

相對於此，西行郵書的收件人地址并不是那么多，祇見有“太守府”、“破羌將軍莫府”、“大司農卒史”（粹 188），以及“府”與“敦煌”（粹 112、113）。

最後，將焦點集中在懸泉置的最近鄰地區，擬看一看在其周邊設置了什麼樣的設施。

從郵書的授受關係可知，在懸泉置之東設置了萬年驛、石廩驛、魚離置，在其西則有平望驛、遮要置。

皇帝橐書一封賜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幾少半時縣（懸）泉驛騎傳受萬年驛騎廣宗到夜少半時付平望驛騎……（A）

四。（B）

V 1612④：11 粹 110

在此，有皇帝發給敦煌的書信（即向西傳送的書信），其傳遞路線是：平望驛騎←懸泉驛騎←萬年驛騎。此外也可發現這樣的授受關係：遮要置↔懸泉置↔魚離置。

…建平四年八月庚辰日中佐董仁受遮要主辦李并

[魚]離廄普行

II 0114④：82 粹 119

入西板檄二、冥安丞印。一詣樂祿治所、一詣府。元始四年四月戊午、縣（懸）泉置佐憲受魚離置佐陌卿、即時遣即行。

0214①：125 粹 112

見於前者的“遮要”，在其他簡上作為“遮要置”出現，和懸泉置均是屬於效穀縣的置（粹 238）。魚離置的所屬不清楚，但是為懸泉置之東的置，這是沒有錯的。遮要、魚離置，與懸泉置同時出現於下面的簡：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淵泉丞賀移廣至、魚離、縣（懸）泉、遮要、龍勒。廄嗇夫昌持傳馬送公主以下過、粟穬麥各如牒。今寫券墨移。書到、受薄（簿）入、十一月報、毋令繆（謬）、如律令。

II 0114③：522 粹 202

這是甘露三年（前 51）的冬天，在接送返回長安的烏孫公主解憂^①之際，委託途中的設施要發給隨行的淵泉縣廄嗇夫糧食的文書。這裏所舉出的“廣至、魚離、懸泉、遮要、龍勒”，

① 《漢書·宣帝紀》可見：“（甘露三年）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王女解憂。）”《西域傳》也認為公主歸國是甘露三年。另外，懸泉置漢簡也可見有關出迎公主所下的文書。

可能是從陽關到淵泉縣的、主要的補給地。從該簡可見“遮要—懸泉—魚離”的路綫。

還有一例，應該在本來是作為收件方、交件方的地方寫“懸泉”，但是却寫成了“臨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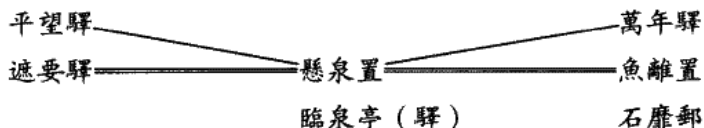
皂繒緯完平望候上

入東軍書一封 始建國二年九月戊子日晝食時萬年亭驛騎張同受臨泉亭長陽

王路四門

II 0115①：59 粹 108

將東行的書信交給萬年驛的，應該是懸泉置的人，但是在這裏却是“臨泉亭長”在交接著。若以圖來表示以上的授受關係，則如下：



另外，在手頭能夠找到的史料中，沒有發現曾使用“平望—懸泉—魚離”或“遮要—懸泉—萬年”綫路的形迹。

關於有兩種以上的授受關係，如下的兩種解說是可能的。一種解釋是各設施的功能不同，另一種解釋認為是路綫的不同。^①

若採用前者的看法，則大概可以說明：在經由例如“置”的場合及其以外的情況下，有不同的移動人與文書的種類、送達法，因此存在上圖中以“—”和以“=”所示的兩種綫路，或者兩種以上的綫路。在認為該說明可靠之時，應該以用例來歸納性地表示各自路綫使用法的不同。如果敢於從現有的史料尋找不同，那么在“遮要—懸泉—魚離”的場合，能夠看到利用“傳”的人的移動（粹 35、168、197、200、202、255）；相對於此，在“平望—懸泉—萬年”的場合，則沒有發現有什麼東西被列舉出來。但是，僅從史料就斷言說“不”是很困難的，在此祇是想指出可能性。

一方面，如果認為存在兩條以上的路綫，那麼說明就是簡單的。若認為，從各個方面都有到達懸泉置的道路，而從懸泉置也有延長至各個方面的道路，則能夠直接說明存在有

① 萬年、平望、魚離、遮要同時并存著，這是很清楚的。隨著時代而廢改的說明是不成立的。

兩種以上的路線。在懸泉置之東西的設施之中，“平望”、“萬年”也曾是長城沿線的烽火臺，或者統率它們的候官之名稱。^①由此推測，“平望—懸泉—萬年”路線是通向長城沿線路線的支脈，“遮要—懸泉—魚離”路線是截山子沿線的、或者越過截山子并穿過其南側的交通路。由綫路反映出使用法的不同，這也可以說明，長城沿線的軍事道路，與非軍事道路是出於不同的計策考慮的。唐代，連接敦煌與安西方面的郵驛路有南北兩條路線，在南路的更南邊，穿過截山子之南側的道路當時也存在過（圖 26）。^②這大概可以作為推測漢代狀況的參考。

關於以上兩說當否，不能超出以上的範圍來進行論證，祇有等待懸泉置漢簡的全面公開。至少目前能知道的史料是第 2 節所得出的結論之一，即在敦煌郡之中、東部，與長城沿線的道路不同的是，連接縣與縣的交通路也是東西走向的，毋寧其綫路就是幹綫。這一理解沒有引起分歧。設置於其沿路的懸泉置之重要性、從那裏所發現的漢簡的意義，會進一步增強。

結束語

本文所進行的嘗試性工作，也受到史料上的制約——懸泉置漢簡只公開發表了一部分，其周邊的遺迹沒有再出土文字史料——常常要附加上“暫時性的”這一附語。在其中，確實可得出的結論之一是，由榆林河、蘆草溝衝擊所形成的綠洲——在此稱為“冥安綠洲”——位於酒泉、敦煌這兩大綠洲之間，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把冥安綠洲理解為河西走廊上的一個據點，假設從那裏擴及四方的交通網絡，就能很容易理解懸泉置為何被安排在那個地方。

聽說，現在榆林河扇狀地一帶正苦於嚴重的沙漠化。但是，20 世紀初曾訪問過鎖陽城

① 關於平望候，因為存在如下的簡：

平望候官馬馳人走行回 D1381 酥油土（D38）出土

所以，D38 就成為其候補。又：

一封中部司馬詣平望候官

入西書二封

十二月丙辰日下舖時受珍故卒張永日下舖付遮奸隊長張卿

一封中部司馬詣陽關都尉府

D2144 T22b（D40）出土

這支簡說明，由中部司馬發給“平望候官”的文書是從 D40 再向西。它補充了該考定。D38 在由敦煌市街向西北的長城沿綫哈拉（淖尔）=台地之西。一方面，關於“萬年”，有如下的簡：

萬年燧長吉守穀卒路詡記口口

D2326B T43h 出土

在敦煌漢簡中，能見到“萬年燧”這一名稱的祇有這支簡，而且內容也沒有顯示出其出土地是萬年燧。又，T43h 在比安西更東的、玉門市花海附近的長城沿綫，在漢代是屬於酒泉郡的地區。雖然有這樣的問題，但是暫且作為萬年驛的候補。

② 根據《沙州都督府圖經》。嚴耕望 1985，篇十二《長安西通安西驛道下》進行考證。

的斯坦因，就橋子鄉周邊留下了如下的感想：

支撐橋子鄉存在的，是從中心沙漠之南與西南廣闊的沼澤地冒出來的大量的、優質的湧水。除此之外還存在的泉，不僅保證現代人對可耕作土地進行豐富的灌溉，而且可以保證 150 平方英里以上豐饒牧草地的供水。在漢民族將侵犯甘肅西部原住民趕到北方以前，對於曾定居在該地的非漢民族，例如月氏與匈奴那樣的游牧、半游牧民族來說，這個地區一定是有魅力的冬季草場。西藏人、維吾爾人、唐古特人，他們始終作為比這裏更南方的高地牧場的所有者，也一定知道該地區的妙處。……一如冬季的草場，向東直至遙遠的甘州，遍及於南山（祁連山脈——筆者注）之麓的各處。在此強調這一地理上的事實是有價值的。歷史學者可以認識到，在本質上游牧民族能夠順利控制甘肅西部，就是由於這些草場的緣故。該地區——假如和在敦煌之西與疏勒河之北的荒地一樣，曾是完全荒涼的沙漠，或者就像整個塔里木盆地實際狀況那樣——若祇是被定居者灌溉、耕作的、人能夠生存的場所，則在物理上是不可能被他們長期占領的（Stein 1921, 1100 頁）。

這是斯坦因的直接感覺。但是，在橋子鄉的東北、鷹窩樹遺迹的附近，發現了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遺迹。^①就是從蕭家地古城沿著昌馬河扇狀地的扇端，到南岔大坑古城路上的遺迹。冥安綠洲是自古以來的居住區，這是沒有錯的，斯坦因的感想大概也是值得傾聽的。

而且，冥安綠洲也是像斯坦因提出的藏族等沿著榆林河通往南方之道路的起點。若溯榆林河而上，穿過著名的榆林窟再南下，則有被稱為“石包城”的古城遺迹（圖 25）。築在榆林河谷西岸山頂上的石砦，其圓形的城牆周長有 300 米，南側設有門，在城內的地下還發現了石窟。該石窟上的壁畫具有唐代的風格。自城南則是被稱為“大公岔”的山谷，直通遙遠的青海（岳邦湖、鍾聖祖，2001）。

沿榆林河行至石包、再進入野馬山系的斯坦因報告說，榆林河到處都設有防禦壁壘（Stein, 1921, 1109 頁）。李并成也說榆林河自山嶽地帶穿過的地方都有障壁，而且從其周邊采集到的遺物推測可能是漢代的障壁（李并成 1995, 232 頁）。建造這樣的防禦壁壘，可能正是因為榆林河是連接南北的交通路。李并成同時指出，漢代很可能不但採取防備北方的策略，而且對南方也是如此。這一點也可從懸泉置漢簡中窺見到。

建昭二年九月庚申朔壬戌敦煌長史淵以私印行太守事丞敞敢告部都尉卒人謂

① 關於鷹窩樹遺迹，參見注 15。

南塞三候縣郡倉令曰敦煌酒泉地勢(勢)寒不雨蚤(早)殺民田貸種穡麥皮芒厚以
當食者小石… II 0215③: 46 粹 70

在此，作為職務名，可以看到“南塞三候”與縣、郡倉并列。“塞”是像長城一樣的障壁之類的東西[初山明，2001，10-4“塞一邊境的防衛壁壘(塞一邊境の防壁)”]，與沿著長城所部署的一群烽火臺等共同構成一個單位，它也可被稱為“塞”。懸泉置漢簡所見“南塞”，是設在什麼地方障壁之中的呢？從一支簡是不得而知的。防備匈奴入侵的障壁有兩個，其中南側的也許就是“南塞”。另一方面，恐怕也不能一概否定，這有可能是用來防備南方的、例如羌族入侵的。

地圖上所描繪的一條綿延的長城線，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因此，我認為，“河西走廊”這一交通線路，也是一條線，而且很可能是南北的疆界線。殘酷的自然環境、南側背負高大險峻山脈的地形等因素，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實際上，河西走廊的交通線路呈網絡狀分布，不僅受到北方入侵的危險，而且也受到南方入侵的危險。在注意地理條件的同時，構築河西走廊的新圖像，可能也將會成為今後必要的研究工作。

引用文獻

- 閻文儒：《河西考古雜記》(上)，《社會科學戰線》1986年第4期；《河西考古雜記(下)》，《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1期。
- 岳邦湖、鍾聖祖：《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考查報告》，文物出版社，2001。
- 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報告》，《文物》2000年第5期。
-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二卷《河隴磧西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 吳初驤、余堯：《漢代的敦煌郡》，《西北師院學報》1982年第2期。
- 吳初驤：《河西漢代驛道與沿綫古城小考》，《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黃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鎮與八鎮考》，《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 文史·遺書編》(上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 孫修身：《唐代瓜州晉昌郡郡治及有關問題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
-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敦煌縣文化館：《敦煌甜水井漢代遺址的調查》，《考古》1975年第2期。
- 也小紅：《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業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 初山明：《在漢代額濟納綠洲：開發與防衛綫的展開》，《流沙出土的文字資料 以樓蘭·尼

雅文書爲中心》(《漢代エチナ=オアシスにおける開發と防衛線の展開》,《流沙出土の文字資料 樓蘭・尼雅文書を中心に》,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京都東山學社 1993 年;中華書局影印再版。

李旭東:《冥水古道探源》,《瓜沙史地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

李春元:《安西漢代長城與漢唐古道的考古調查》,《瓜沙史地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

李正宇:《昆侖障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漢敦煌郡廣至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 年第 3 期。

李并成:《漢敦煌廣至縣城及其有關問題考》,《敦煌研究》1991 年第 4 期。

《河西走廊歷史地理》第一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

《瓜沙二州間一塊消失了的綠洲》,《瓜沙史地研究》,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

《漢敦煌宜禾都尉府與曹魏敦煌郡宜禾縣城考辨》(同前書),1996。

《鎖陽城遺址及其周圍古墾區沙漠化過程考》(同前書),1996。

《漢敦煌郡冥安縣城再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

梁尉英:《漢代效穀城考》,《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 文史·遺書編》(上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

Stein 1921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 Oxf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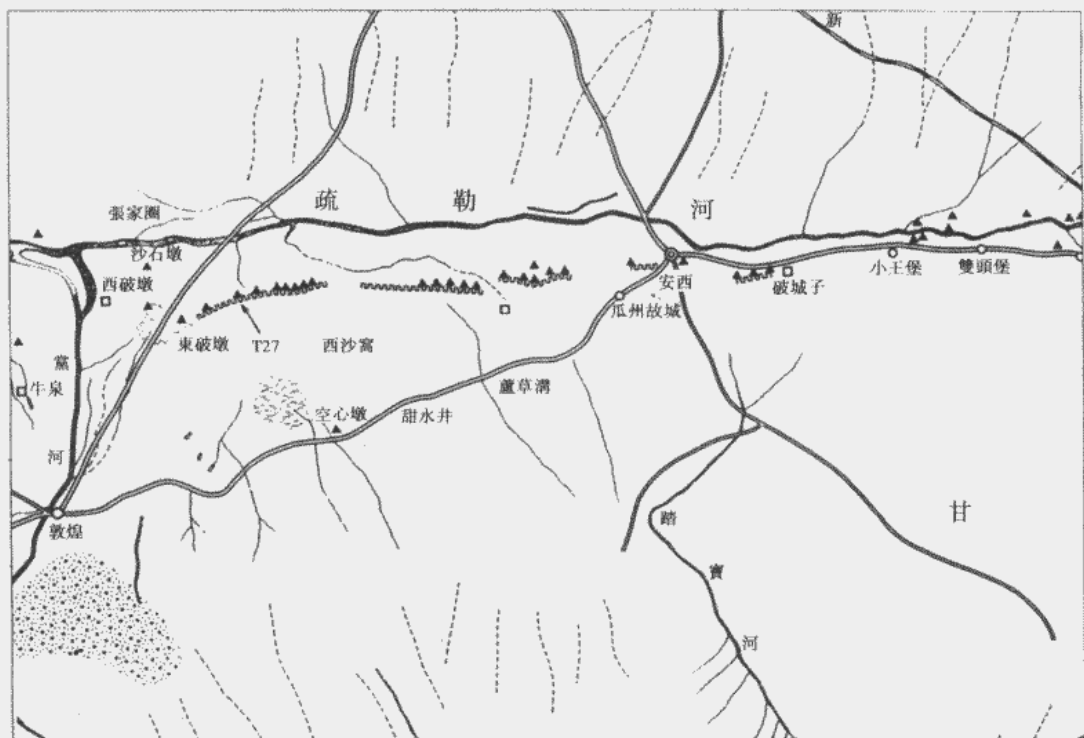


圖 1 安西和它的周邊[據大庭脩《大英圖書館藏 敦煌漢簡》，同朋舍，1990]做了部分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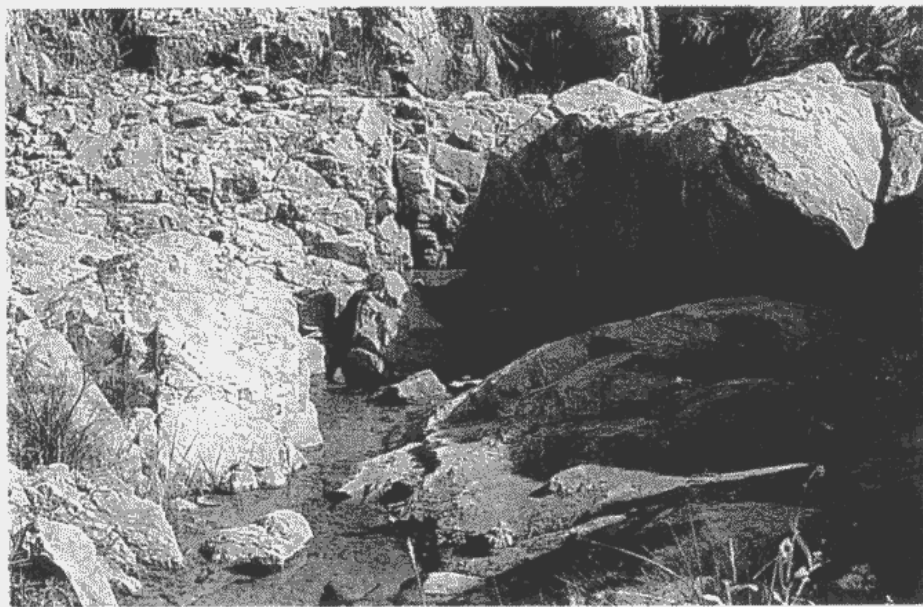


圖 2 現在的“懸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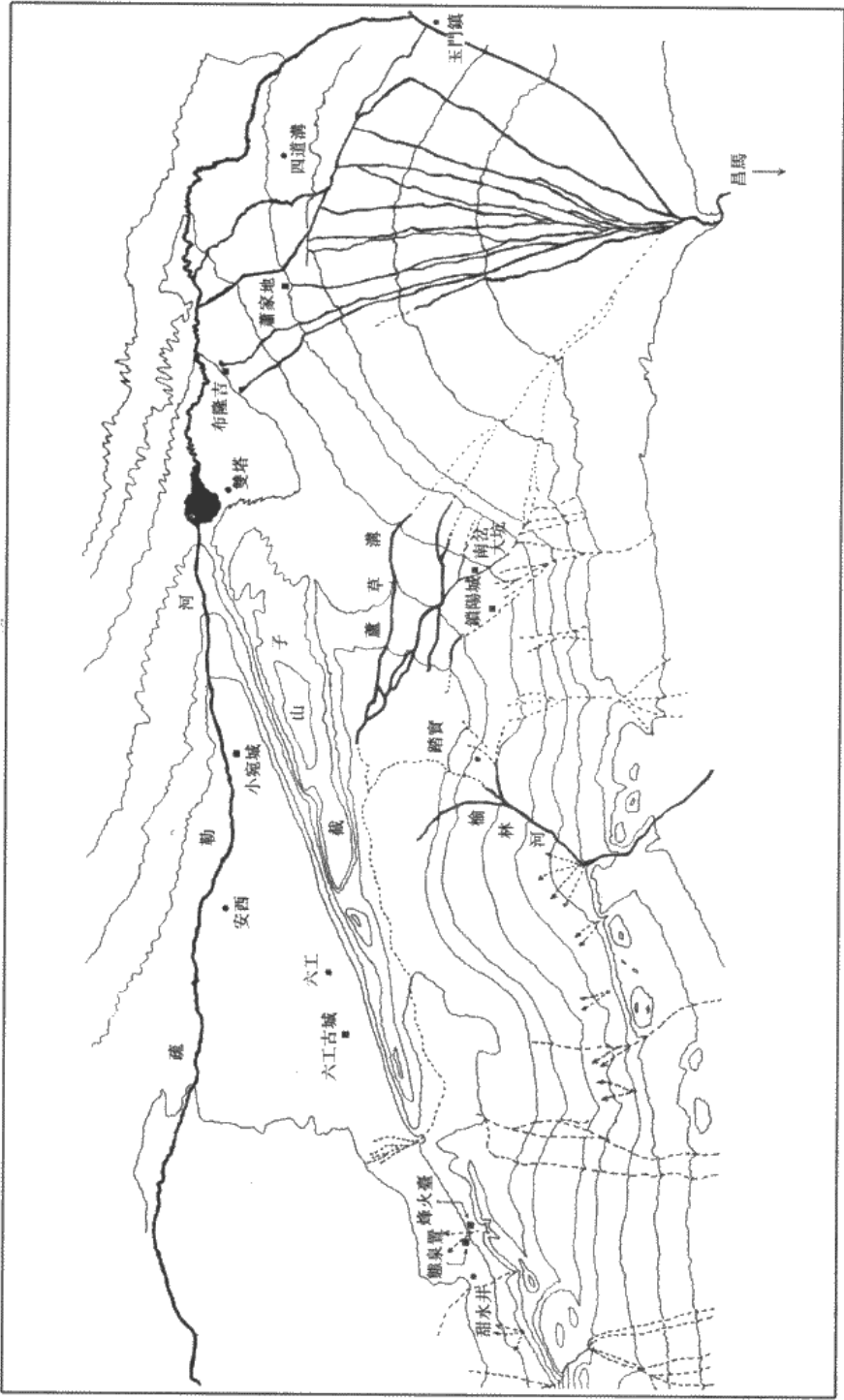


圖3 懸泉置及其周邊(據前蘇聯地圖作成。■為遺迹、●為現在的聚落、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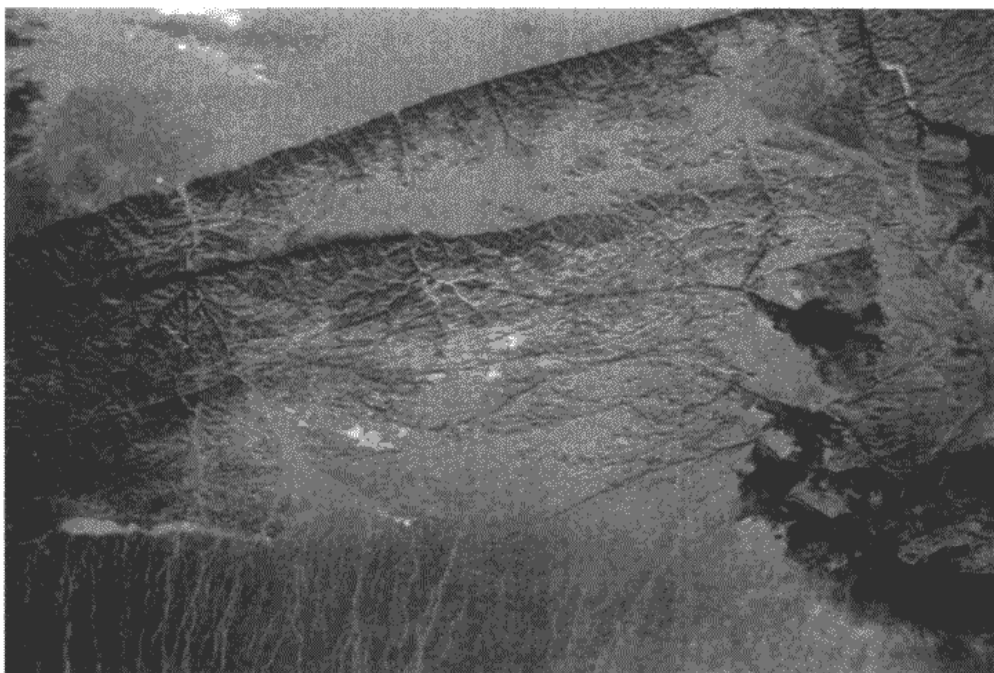


圖 4 懸泉置及其周邊(左上白圓點懸泉置的位置、右上可以看到蘆草溝支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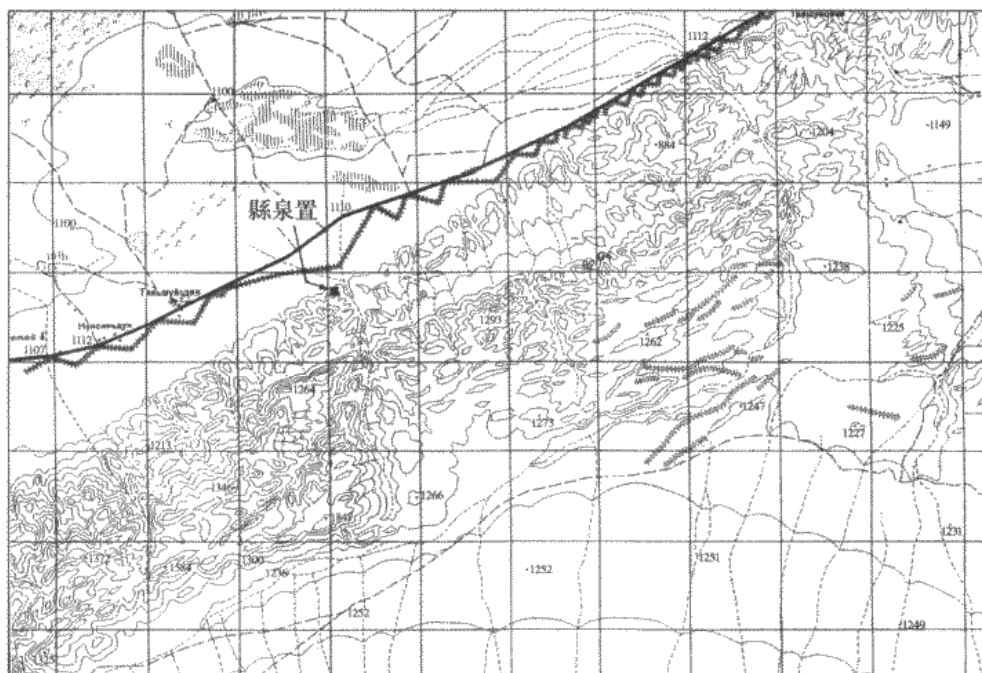


圖 5 懸泉置及其周邊(前蘇聯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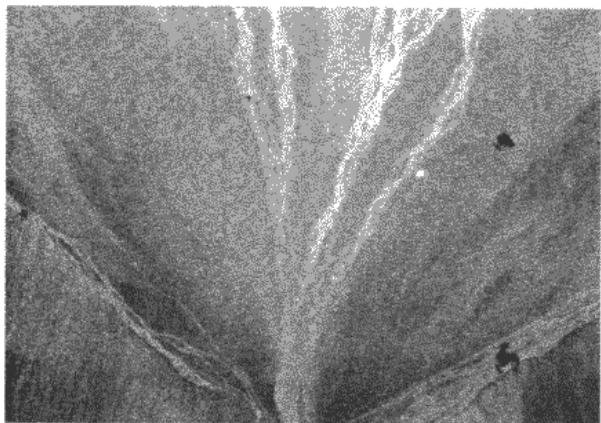


圖6 昌馬河扇狀地扇頂附近(可以看到向西流的支流)



圖7 《中国歷史地图集》的冥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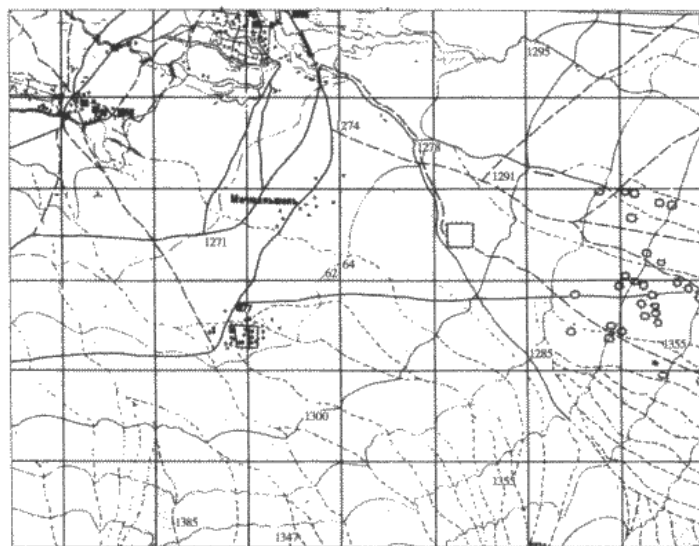


圖8 昌馬河扇狀地西端(前蘇聯地圖)
(大型城郭中右側是南岔大坑、左側是鎮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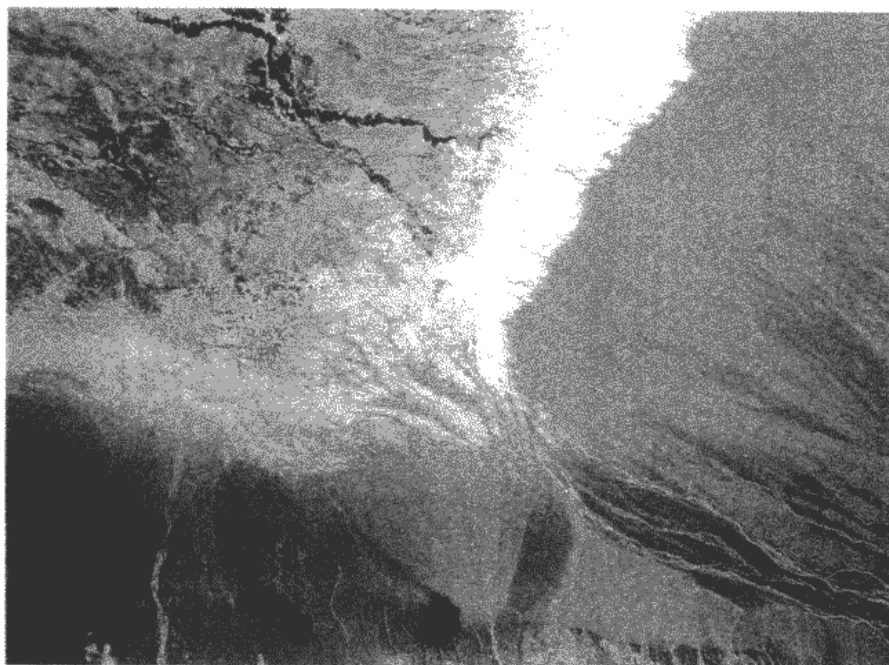


圖 9 昌馬河扇狀地西端(左上看見的水流是蘆草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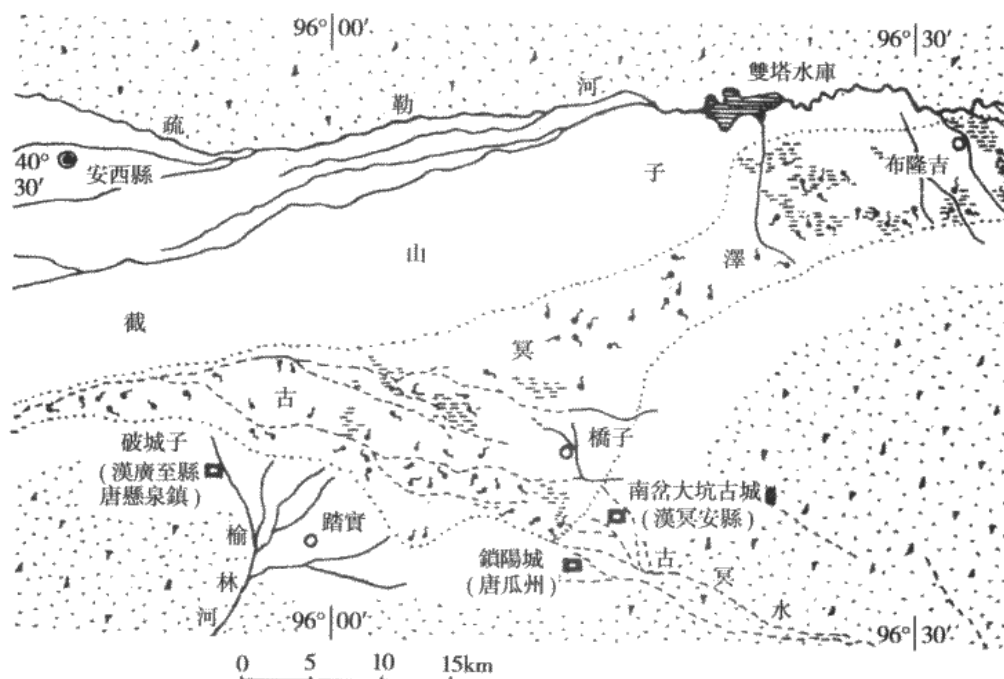


圖 10 李并成氏推測的冥澤的範圍(李并成,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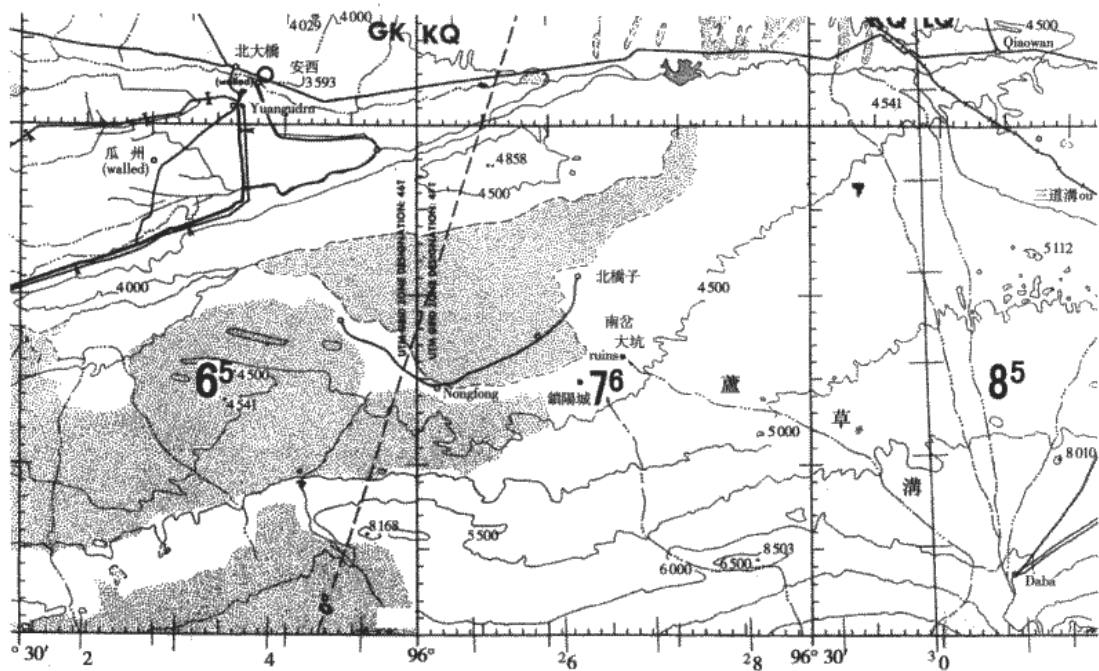


圖 11 TPC(Tactical Pilotage Chart,1:5000,000)F-7C 的安西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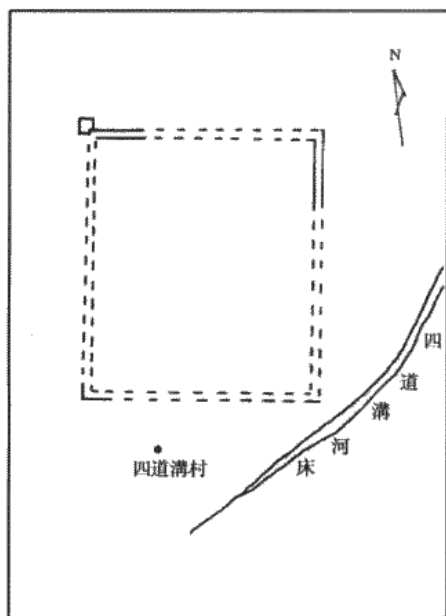


圖 12 四道溝城遺迹(岳邦湖、鍾聖祖,2001)



圖 13 鎭陽城和周邊的耕地遺迹(李并成,1996c)



圖 14 鎮陽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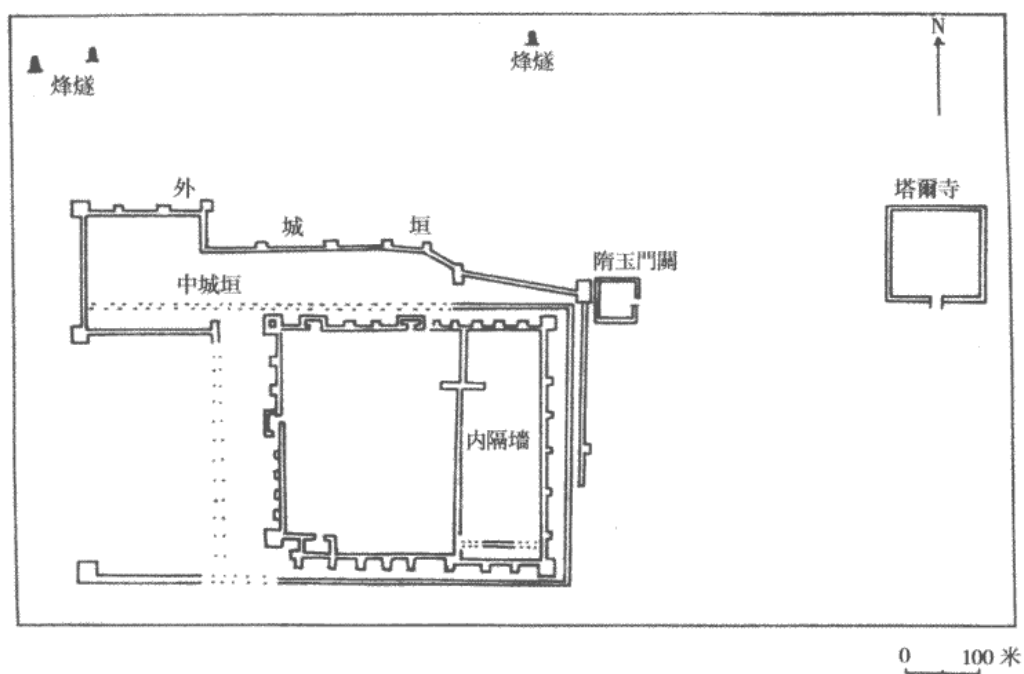


图 15 鎮陽城遺迹(岳邦湖、鍾聖祖,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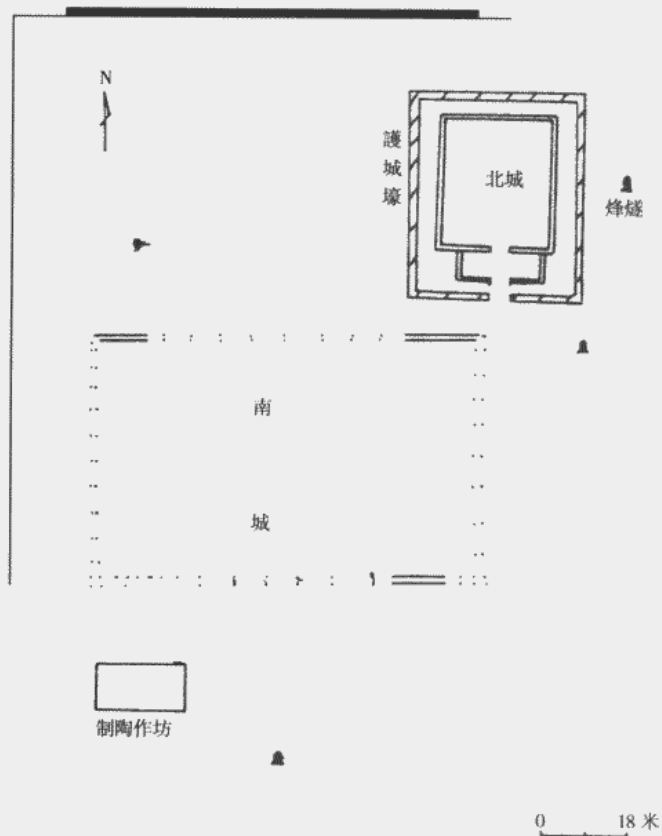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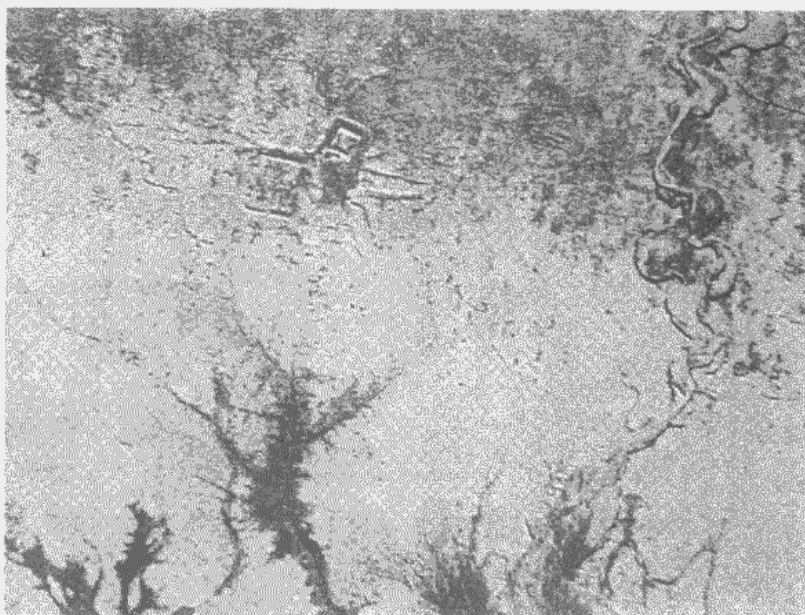


圖 16 蕭家地古城(岳邦湖、鍾聖祖,2001)

圖 17 蕭家地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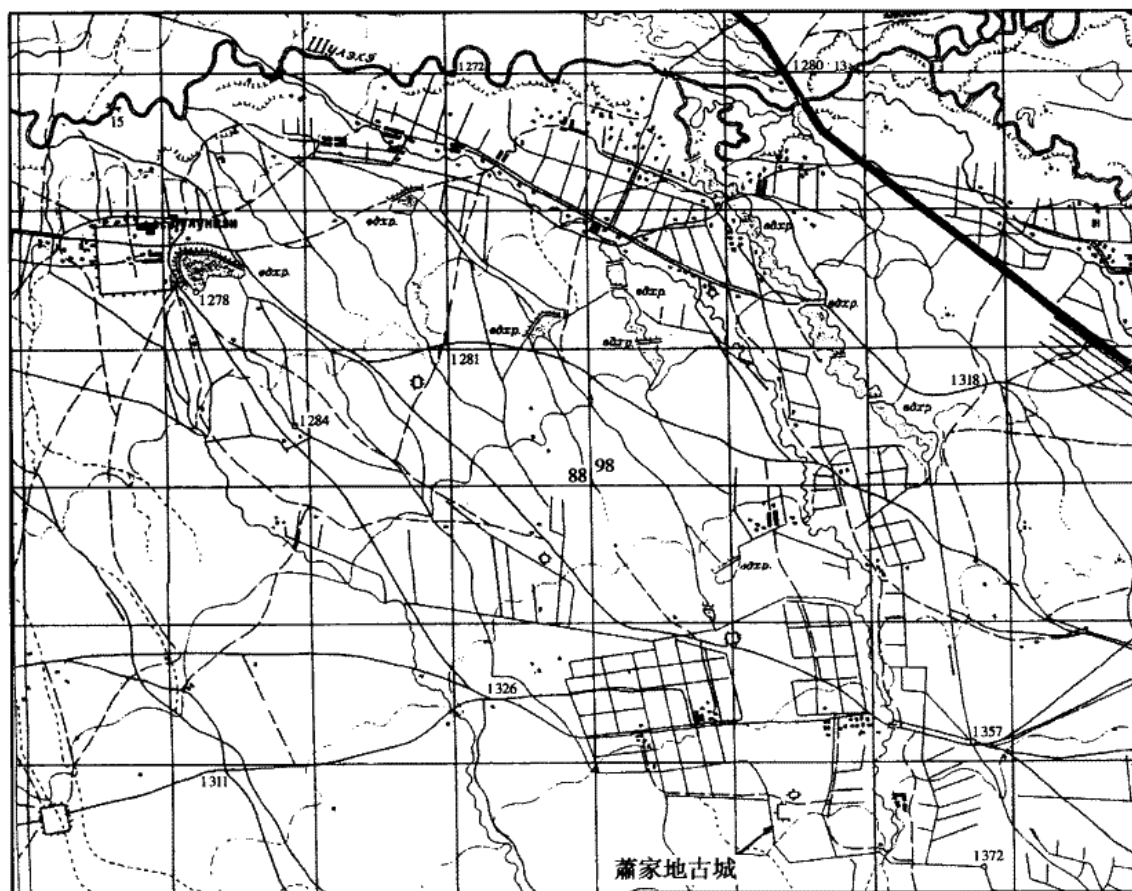


圖 18 蕭家地古城(前蘇聯地圖,上邊的河流是疏勒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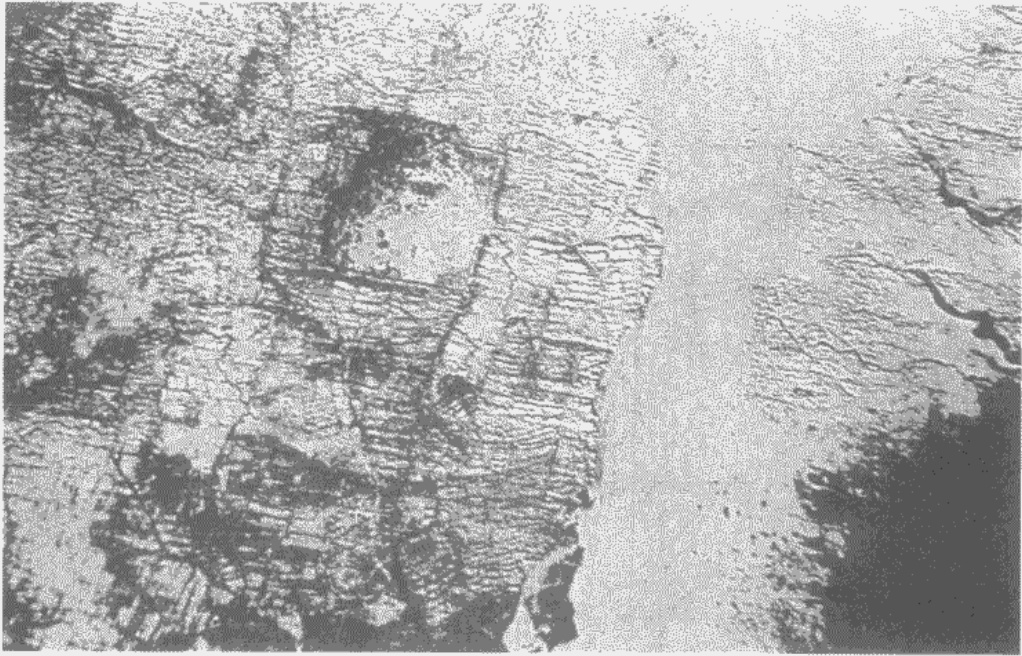


圖 19 南岔大坑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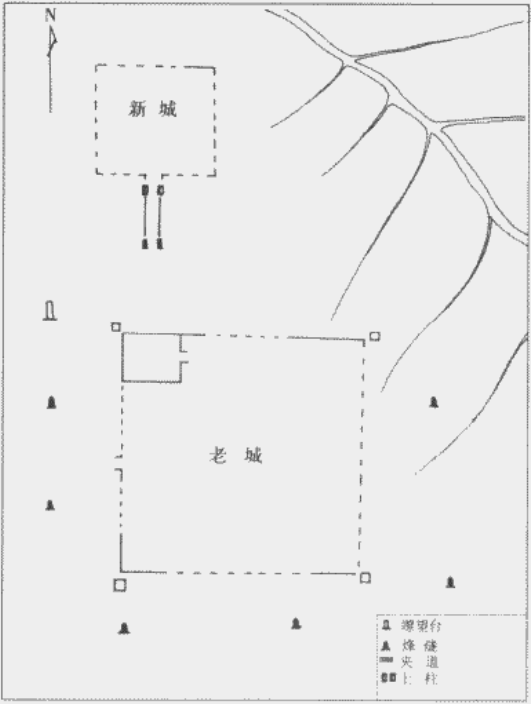


圖 20 南岔大坑遺跡(岳邦湖、鍾聖祖,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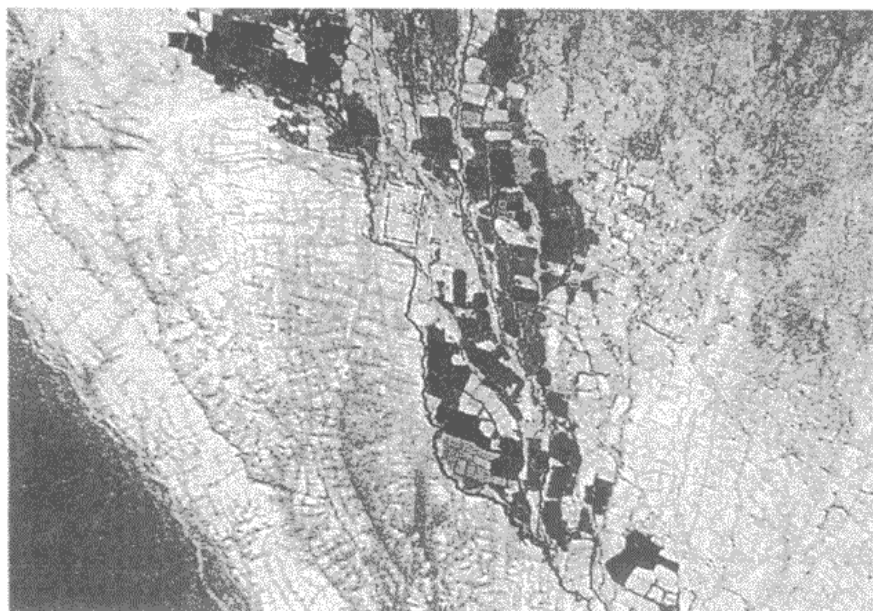


圖 21 踏夷破城子？
(右下向上的水流是榆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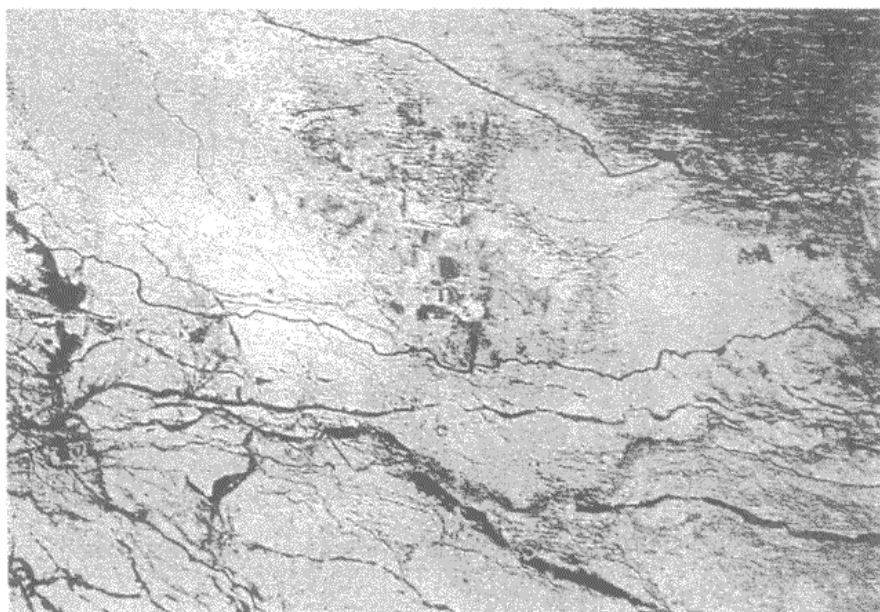


圖 22 巴州城
(左下方向是蘆草溝末流)



圖 23 小宛故城
(上邊的是疏勒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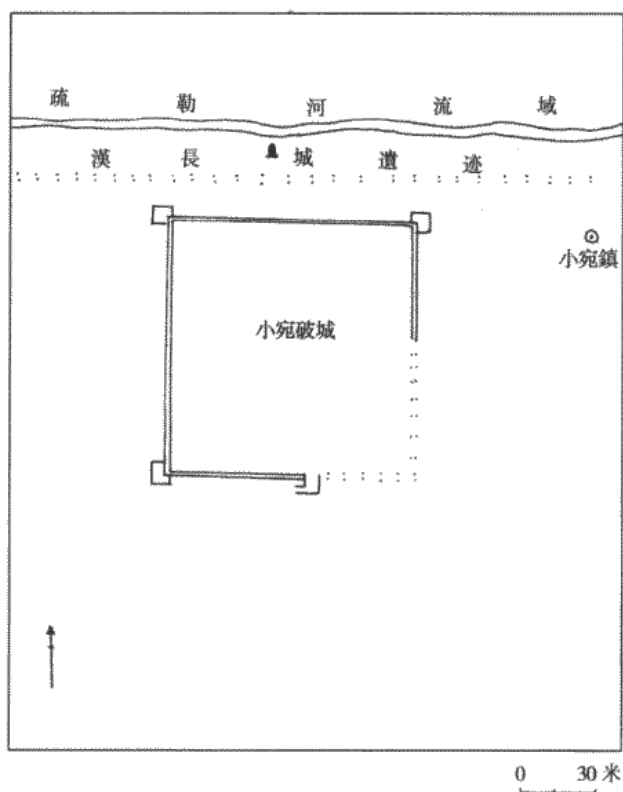


圖 24 小宛故城(岳邦湖、鍾聖祖,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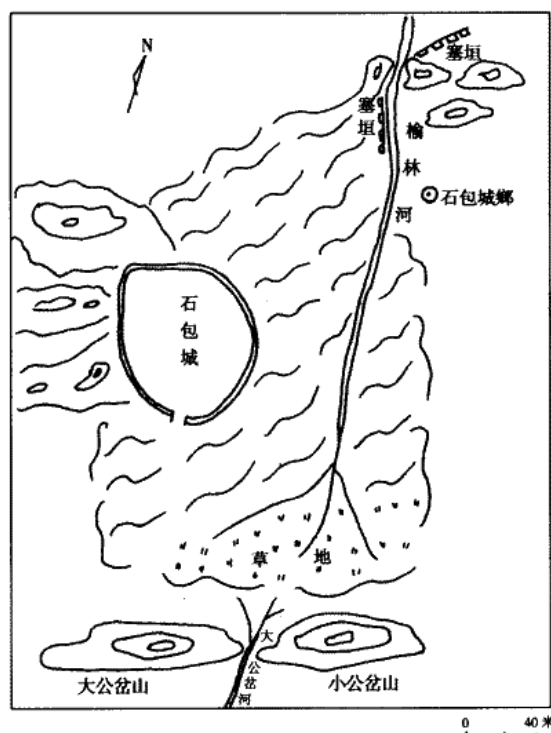


圖 25 石包城(岳邦湖、鍾聖祖,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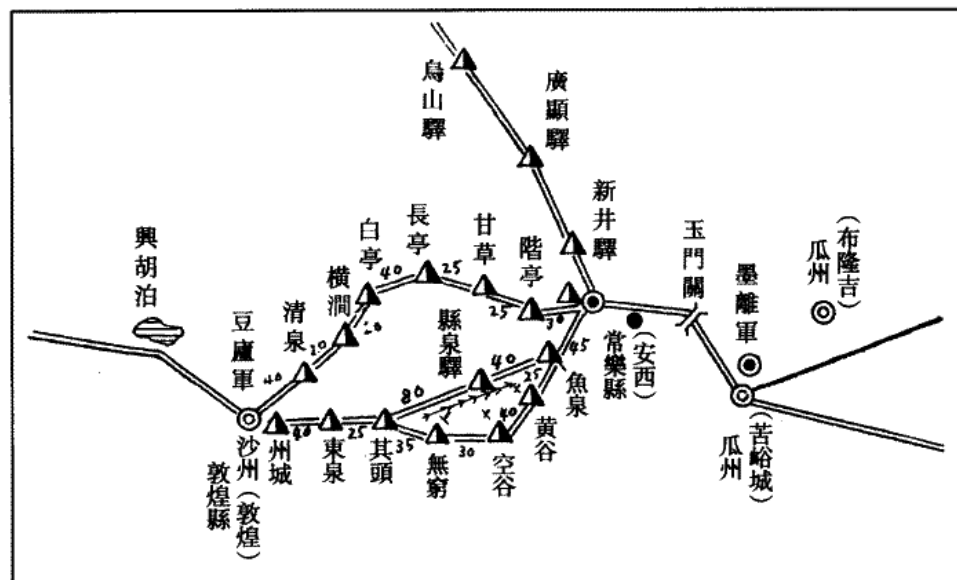


圖 26 唐代安西附近的交通路(嚴耕望,1985)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飲漆”解^①

◎ [日]大川俊隆 田村誠 著

◎ 張愛萍 譯

內容提要 儘管已有許多學者對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的“飲漆”部分進行了解釋，但迄今沒有定論。在本文中，我們試圖通過考察在漆中加入三倍的水即可達到飽和狀態的現象，闡明“飲漆”的含義。

一、序言

1983年12月，於湖北省江陵縣張家山出土了張家山漢簡，其中一篇為《算數書》。^②這個《算數書》，被認為成書於西漢初期，其中數個算題，其成立可以追溯到秦代為止。^③現在傳世的中國數學書中，由於曾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九章算術》成書於東漢時期，^④故《算數書》的出現使得由此上溯二三百年的更古老的數學文獻展現於世人面前。不僅僅是中國，也被全世界的數學家所關注。現在有很多學者都致力於其解讀。我們也於2001年組織了“張

① 原文刊於《大阪產業大學論集（人文科學編）》第114號，2004。

② 作為配有完整照片的版本，祇有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請參照參考文獻[6]。以下，不特別指明的情況下，都使用的是以這本書的照片為根據的釋文。

③ 包含《算數書》的張家山漢簡的年代下限，因在其中的一篇《曆譜》中最後記述的年代是呂后二年（前186），故定為此年。《算數書》的一個個算題，可以認為是起源於為了秦代官吏們的行政管理而進行的計算。

④ 關於《九章算術》的成書期有多種說法。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資料，是三國曹魏的劉徽最終整理而形成的。《九章算術》似乎是從東漢前期開始到曹魏時期為止漸漸地加入增補和編纂的。

家山漢簡《算數書》研究會”，著手於其解讀，到現在為止已將其成果分數篇公開發表^①。

此《算數書》由190枚竹簡組成，其中有69道算題。這些算題中，第66簡和67簡上的“飲漆”題，與其他的算題相比，是相當難的算題。據我們至今所見到的相關研究中，似乎還沒有給予這個算題以正確的解讀的研究者。其文如下(照片1)

(1) 飲(飲)漆(漆) 漆(漆)一斗飲(飲)水三斗而槃(盤) 飲(飲)水二斗七升即槃(盤)
問餘漆(漆)水各幾何曰餘漆(漆)卅七分升卅余水二升卅七分(簡66)

升七●朮(術)曰以二斗七升者同一斗卅七也爲法有(又)直(置)廿七「十升者各三之爲實=如法而一(簡67)

雖然僅僅70餘字的一段文字，但這裏所選取的東西是漆——一種比較特殊的物品，另外，由於它是以怎樣的“操作環境”爲前提也不明確，故正確地解讀起來困難重重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研究會對這個算題的語句和內容進行了解讀，有若干小小的發現。還進行了印證解讀的一個“實驗”。另外，一直無法理解的是，有關雲夢秦簡的漆的一文——

(2) 工稟鬻它縣，到官試之，飲水，水減二百斗以上，貲工及吏將者各二甲，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貲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貲各一盾，不盈十斗以下及稟鬻縣中而負者，負之如故。

效律21

其文意也隨著“飲漆”題的解讀結果，有了某種程度的理解。這就是發表本論文的原因。

二、“漆”字的變遷

在進入正文之前，先進行鬻・漆・漆・鬻在文字學上的討論。

《說文解字》卷六中，“漆”、“鬻”、“𣎵”列入漆部，解說如下：

漆，木汁，可以鬻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

鬻，漆也。從漆𣎵聲。

𣎵，漆坑已，復漆之。從漆包聲。

① 參照參考文獻[1]、[2]、[3]、[12]、[14]、[15]、[16]、[17]、[18]。

現在我們所用的“漆”字，載於《說文解字》卷十一水部，指的是河水的名字。^①

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漆聲。

“漆”原本是象形文字。正如《說文解字》中“漆”的解說那樣，描繪的是在樹幹上刻劃，漆的樹液就呈現出“如水滴下”的狀態。因此“漆”是原字。這個“漆”字，在出土文字資料中，還沒有在秦以前見到過，最早見到的是雲夢秦簡中《日書》甲種的“病”，這個寫著每日宜忌的文中有如下簡：

(3) 甲乙有疾，父母為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裹以漆器^②。 68 正式

其中，“漆器”是指“漆器”。

在“飲漆”算題中，算題名裏有“漆”，除此之外，在漢代初期的資料如馬王堆的竹簡和帛書中也能看到。例如，“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中的《明君》，有作為塗料的“漆”的意義：

(4) 臺室則崇高，汙池則廣深，其所以飭（飾）之者，有（又）以丹、漆、黃、銀（銀）、玉、□□。此其請（情）美才（哉）闌（爛）乎^③。 422·423

這些大概是傳承了“漆”字的原形吧。

“髹”字最初見於雲夢秦簡。本文序言中所舉的《效律》的引文（2），有從其他縣傳來的“漆的溶液”的意思。於此之外，在秦簡中也幾次出現。

(5) 吏、戟、弩，髹汙江相易毆（也），勿以為贏、不備，以職（識）耳不當之律

① “水”字旁原本是河的意思。因此，與各種河流名的音相當的文字結合，用來表示各種河流名這樣的固有名詞，是其最初的意義。（即和“山”旁和“邑”旁是同樣的功能）。“漆”字也是表示這樣特定的河流。以後，“水”旁發展了表示河的特定地形和河流的形態的意義，甚至引申為一般表示水的樣態的意義，不久達到表示液體狀的東西的意義。“うるし（漆）”的意義“漆”字，也是在“水”旁達到這樣階段發展了意義之後所造出的文字，作為河流名的“漆”字，是同形的異字。

② “病”，就是以得病日子的干支，占卜其原因。其大意為，在這些日子裏患病，是由於死去的父母在作祟，起因是吃肉，祟是從東方來的，因此，要把肉放在漆器中密封。漆器是有力量封住依附肉的死者鬼魂的物品。

③ 這裏的“漆”，與丹、青、黃等顏料並列。

論之^①。

效律 45

(6) 繫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繫園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②。

秦律雜抄 20—21

(7) 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灸）之，其不可刻久（灸）者，以丹若繫書之^③。

秦律十八種 102

(8) “木日”，木良日……木忌，甲乙榆，丙丁棗，戊己桑，庚申李，壬申繫^④。

日書乙 67

(5) 和 (7) 的繫，是作為塗料的“漆的溶液”之意。(6) 和 (8) 是“漆樹”的意思。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中，也使用了“𦵿”字。與秦簡的繫相比，沒有“彡”，秦簡中也是“繫”字的“長”上部的橫綫“三”，與“彡”連筆。由於“繫”和“𦵿”的區別是相對的，因而不影響它們作為同一字使用。

另外，這個“𦵿”字，也在漢代樂浪郡遺址出土的漆器上記載的銘文中多次使用（參照梅原末治《中國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1944）。

那麼，“繫”字是怎樣出現的呢？

根據《說文》對“繫”的解釋為“從漆𦵿聲”，即認為其是漆旁的形聲字，從秦簡中“漆”和“繫”字作為同義字使用的情况来看，可以認為“繫”字是“漆”上加了“𦵿”旁的加旁字。

秦簡之中，從“𦵿”的文字中，有“髮”、“髡”、“髻”三個字。“髮”是“頭髮”的意思。“髡”是刑罰的一種，“剃去頭髮”之義。“髻”是“結髮”之義。這三個字中的“𦵿”，都有與頭髮相關的意思。^⑤由此可見，“繫”中的“𦵿”，對於原字的“漆”，大概是為了加上由頭髮引申出來的“黑”的意義而添加的吧。這是因為塗料的漆也基本上是黑色的。

這個“繫”字，在馬王堆的竹簡和帛書中也有出現，與秦簡同樣是“漆”的意思。然而，僅有一例不同的例子出現於《養生方》中。

① 此文，“職耳”這樣的詞的意義不明。從這條律文前面“器職（識）耳不當籍者，大者貲官嗇夫一盾，小者除”和“馬牛誤職（識）耳，及物之不能相易者，貲官嗇夫一盾”這樣的律文的用法來看，當是表示物品的“識別標識”或“識別號碼”的意思。那種行為，具體細節不太清楚，大概的意思是：父、戟、弩根據互相交換塗於其上的丹和漆，明確標志，必須保證沒有多餘和不足。

② 關於此簡，見六種解說。

③ 此簡文中的“刻久（灸）”，是指邊刻邊燒。

④ “木日”中有“木良日”和“木忌”二種。

⑤ 關於“髮”和“髡”、“髻”，在《法律問答》中，使用了“拔人髮”、“父母擅殺、刑（刑），髡子及奴妾”等，在《封診式》中使用了“診首口髻髮”。

(9) ……漆髹之，幹，即善臧（藏）之。^①

這一段有脫字，其中的“髹”無疑是“塗漆”的意思。這是“髹”在西漢時期作為名詞的“漆”的意義而向“塗漆”這樣動詞的意義引申的確鑿資料。

以後專門承擔動詞意義的“漆”，大概是“髹”字中的“髹”以“水”旁替代的產物，或者是“漆”字加上“水”旁而形成的吧。

由於“水”旁原本是作為表示河川固有名詞的偏旁，故“漆”字的情況也如《說文》卷十一中所見的，用於表示“漆水”這樣的河川。不久“水”旁演變為用於表示河川和水波等水的狀態的意義，於此引申為表示液體狀的物質的意義。“漆”加上“水”旁，或者髹字的“髹”以“水”旁代替，為了形成“漆”字，“水”旁的都必須完成那樣的引申。因此，“漆”字的形成，即使是漢代也是漢末吧。動詞意義的“漆”字，《漢印文字徵》卷十一“漆園司馬”和“虞漆之印”等漢印中也可見到，但并不清楚這些是西漢的還是東漢的。建於東漢永壽二年（156）的“禮器碑”上，可以見到“漆”字。

(10) 漆不水解，工不爭賈（價）。^②

這裏明確地是“漆”的意思。因此“漆”字一般地担当了動詞意義的情況，似乎是從東漢開始的。

“髹”字在西漢初期，如前所述，除作名詞意義之外還曾引申為動詞意義，“漆”字擔當動詞意義後，“髹”字不久就主要擔當了動詞的意義。與此同時，名詞意義的字和發音也區別開來。

“漆”的上古推定音，是“tshiet”入聲的音^③。這個“漆”，宋本《廣韻》中定為入聲“五質”。因此其中古音是“ts'iet”。可是，《廣韻》中，“漆”之外，在下平“十八尤”可以見到“髹”和“髹”，甚至去聲“六至”中可以見到“髹”。因此中古音中，前者的音是“xju”，後者的音為“ts'iei”。這一“ts'iei”大概是保留了動詞意義的字“髹”的音

① 《養生法》中的“除中益氣”項闡述了17條製作具有補益作用食物的方法，此文引自其中的1條。引文之前文雖較為詳細地記述了將馬肉中加入幾種藥物做成肉脯，然後將其煮沸、乾燥、光澤化等加工過程，但由於有缺失的部分，無法知道得更詳細。引用部分記述了肉脯塗上漆之後將其乾燥收藏的過程。塗漆是因為漆對肉有防腐作用。（參考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

② 《禮器碑》是魯相韓勣為紀念修繕孔府的禮器和宅廟而建的。其大意是，韓勣在修繕之際，不用混了水的漆，另一方面，工人也被他的志向所感動而不謀求高的工錢而忘我地工作。

③ 李珍華、周長揖編撰：《漢字古今音表》。

最終向“xju”轉變過程中的過渡音^①。

這個“𦵏”字的音變為“xju”後，“𦵏”字中的“漆”，能更加簡便地寫出，而且被能夠表示“xju”音的“休”代替時，“𦵏”字就形成了。不久，作為“𦵏”字的簡略形式的“𦵏”字也形成了。[這些簡略字之外，上述的《中國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的始元二年（85）的銘文有三列，其中“漆”以“𦵏”形式寫著。這個字也是簡略字之一，但似乎後世沒有使用]。

“漆”、“𦵏”、“漆”、“𦵏”、“𦵏”，全部是同一字的異體形式，這於清王筠的《說文解字句讀》中已有論及，^②而這次從出土文字資料中又被再一次證實。

三、“飲漆”題的幾例解釋

那麼，試著看一下諸位學者是如何對此算題進行研究的吧。

郭世榮在《〈算數書〉勘誤》中，對此算題進行了如下的論述：^③“按：由術知此題意為：有漆一斗、水三斗，今將漆和水按十與二十七的比例飲水，盤能容三十七升，問余漆和水各多少。術文將所餘三升按衰分術求漆水各多少，所算正確。惟題問中‘而槃（飲）（盤）飲（飲）水二斗七升即槃（盤）’一語沒有明確說明漆與水之間十與二十七的比例關係，令人難以理解。這是造題的問題。”

由於郭世榮對最初見到的“漆（漆）一斗飲（飲）水三斗”和“飲（飲）水二斗七升”的兩種情況沒有進行區別，故引起了混淆。

郭書春發表了《〈算數書〉校勘》，^④在其文中沒有特別提及關於此算題的解釋。但是，他將這道算題開頭一句句讀為：“漆（漆）一斗飲（飲）水三斗而槃（盤）。飲（飲）水二斗七升即槃（盤）”，這是應予以肯定的。這個“盤”必定是動詞。若是對古文嚴謹的人，肯定應該

① 宋本《廣韻》，使用了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用的也是余氏的推定音。

② 《說文解字句讀》卷十二“漆”字下注：

王氏熙曰：“《漢書·賈山傳》：‘漆塗其外’。鄒陽傳：‘堅如膠漆’。字并如此。《周官·地官》：‘載師’注‘故書，漆林為漆林。杜子春云，當為漆林’。則以‘漆沮（河名）’字為‘𦵏’、‘漆’字，後漢始然”。（王筠）案，“載師”注（“當為漆林”），本作“當為漆”。王汾泉（煦）據鄭他注皆從杜改之。而（劉）宋范蔚宗（曄）《後漢書》儒林傳（上）“（定蘭台）漆書（經）字”，亦不加水。知不當“木”字絕句，“汁”連可以“[𦵏漆]物”為句者。其用在汁。故字形象其汁。以其用名其木也。

同書“𦵏”字下注：

此用靜字為動字也。今人言“漆”不言“𦵏”。《儀禮·鄉射記》、《周禮》春官“巾車”，字皆作“𦵏”。《漢書·外戚傳（下）》（“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字或作“𦵏”。“巾車”（“馳車，蔽蔽，然禕，髹飾”）注“故書，髹作為軟。杜子春讀為漆垠之漆，直謂髹漆也。”《釋文》“軟音次”。韋昭曰“刷漆曰髹”。是髹乃動字。而《鄉射記》“福髹”注云“赤黑漆也”。“巾車”注云“髹，赤多黑少之色也。”則又以為靜字。

僅利用文獻資料來考察，大概是妥當的。（為了讀的方便，句讀和括弧內部分為大川所加）

③ 郭世榮的考證，參考文獻[11]。

④ 郭書春的考證，參考文獻[10]。

是這樣斷句的，就語法來說也是正確的。可惜的是，他并未在此基礎上進行更加深入的解釋。

蘇意雯等的《〈算數書〉勘誤》，對算題“飲漆”加上了如下的注：^①“為確保生漆的供給，政府在生產地設立漆園，以注入水的量的多少（飲水）來確定生漆的質量是否合格。請參考彭浩著《中國最早的數學著作〈算數書〉》。但是，這個算題，由於不知道是如何確定漆的質量，並且不知‘槃’字該作何解，因此無法解釋。”

可以看出，蘇意雯等所示的釋文，也沒有像郭書春那樣句讀，連讀解都沒有進行。

彭浩在《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中，如下標出句讀，并加注。^②

飲（飲）漆（漆）① 漆（漆）一斗飲（飲）水三斗，而槃（盤）飲（飲）水二斗七升，即槃（盤）②。問餘漆（漆）、水各幾何③。曰，餘漆（漆）卅（三十）七分升卅（三十）④，餘水二升卅（三十）七分。（簡 66）
升七⑤。●朮（術）曰，以二斗七升者同一斗⑥，卅（三十）七也為法⑦，有（又）直（置）廿（二十）七⑧^一、十升者各三之，為實。＝（實）如法而一⑨。（簡 67）

彭注①：飲漆，古代用於測試生漆質、量使用的一種方法。生漆是從漆樹上取得的汁液，有一定的含水量，呈稠黏的液態，有流動性。它一般儲於木桶或甕中，表面用油紙封嚴，然後加蓋，以防水分過度蒸發而致生漆乾固失去效用。飲漆是往盛儲生漆的容器中注水，直至容器中生漆留下的最高痕迹。注入的水量即相當於生漆失去的水量，依此確定生漆在儲運過程中質的變化和量的減少。《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與此有關：“工稟鬻它縣，到官試之，飲水，水減二百斗以上，貲工及吏將者各二甲，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貲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貲各一盾，不盈十斗以下及稟鬻縣中而負者，負之如故。”秦律所說“試水”、“飲水”即本題所稱“飲漆”，是用來檢測生漆質和量的方法。本題則是為此而設的計算水、漆減少量的方法。

彭注②：以上簡文意為，飲漆一斗，需水三斗。現盤中有漆一斗，飲水二斗七升滿盤，可知盤的實際容量是三斗七升。

彭注③：本句意為，按盤現有容量（三斗七升）計，漆量和水量各減多少。

① 蘇意雯等的考證，參考文獻[4]。

② 彭浩的考證，參考文獻[8]。另外，彭浩是最早致力於對《算術書》進行研究的學者，關於這個“飲漆”題，在《中國最早的數學著作〈算術書〉》（《文物》2000年第9期），在舉了二處引用的（2）和（6）秦律的律文之上，還指出：“律文規定的試水、飲水的方法，基於注入水量的多少，來確定生漆的質、量是否合格的。《算術書》的‘飲漆’，是這種試驗的計算，管理者也必須使用飲水的計算方法。”他對怎樣的計算方法沒有具體地把握住，但這種指出本身是正確的。

彭注④：據題意計算，“卅七”是“四”之誤；“卅”是“三”之誤。本句應是“餘漆四分升三”。

彭注⑤：據題意計算可知，“卅七”是“四”之誤；“七”是“一”之誤。本句應是“餘水二升四分升一”。

彭注⑥：據題意及計算可知，“二”是“三”之誤；“七”是“一”之誤。本句應是“以三斗一升者同一斗”。

彭注⑦：據題意及計算可知，“卅七”是“四十”之誤。

彭注⑧：據題意及計算可知，“廿七”是“三十”之誤。

彭注⑨：簡文對題意理解有誤。按飲漆一斗需水三斗，盤總容量應不小於四斗。現盤容量僅三斗七升，兩者相差三升。簡文誤將盤的實際容量三斗七升當作應有的容量，因而導致了“術”及計算結果錯誤。正確的題文應是：“曰：餘漆四分升三，餘水二升四分升一。術曰：以三斗者同一斗，四十也為法。又置三十、十升者各三之為實，實如法而一”。其中，“以三斗者同一斗”，即漆量加水量；“四十也為法”，即漆、水量之和四斗（四十升）為除數。術文可理解為，盤容量減少三升相當於應有容量的四十分之三。故漆、水量均應減少四十分之三。列式計算如下：

$$\frac{30 \times 3}{40} = \frac{9}{4} = 2\frac{1}{4} \text{ (升)} \quad (\text{此為水量減少數})$$

$$\frac{10 \times 3}{40} = \frac{3}{4} \text{ (升)} \quad (\text{此為漆量減少數})$$

按照彭浩的注釋進行訓讀，大概如下：

飲漆。漆一斗，飲水三斗。而盤（飲漆一斗），飲水二斗七升，即盤。問，余漆、水各幾何。曰：餘漆四分升三，余水二升四分升一。術曰：以三斗一升者同一斗，四十也為法；又置三十、十升者各三之為實，實如法而一。

彭浩的解釋的缺陷是，數字訂正得過多。彭浩似乎持有“《算數書》不是優秀的抄本”^①這樣先入為主的觀念，進行了大量的數字的訂正。然而，對於經歷了2000年以上時間的文字資料，首先要相信古人，對古人記錄的文字要盡可能保持原樣，不夾雜自我主觀思考地推進解釋，是古代文獻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責任。然後，在不能解釋的情況下，並不強行解釋，作為存疑而等待後人來解開謎底，這樣的勇氣是必要的。

① 參照參考文獻[8]的“緒論”第五部分，“對《算數書》抄本的評價”。

四、我們的解釋

那么，轉到我們的解釋上來。首先，請看算題的譯注。

漆 1 斗①飲水 3 斗則盤（動詞）②。（現在，漆是 1 斗）③飲水 2 斗 7 升則盤（動詞完成時）。問，不足的漆和水各是多少。④曰，不足的漆是 $30/37$ 升，不足的水是 2 又 $7/37$ 升。術曰，2 斗 7 升并 1 斗，以 37 為除數。又，27 升和 10 升各自乘以 3 倍作為被除數。兩者相除就可以了。⑤

① 這裏的漆是沒有加水的純漆。

② “盤”的意思將在後面論述。

③ 這裏可能省略了“今漆一斗”。因開頭處有“漆一斗”，故此處省略。這樣的省略在《算數書》中經常可以見到。但是，這裏的“漆”與前文的“漆”不同，大概是指作為納稅的東西。

④本題的意思如下。期望達到的高品質的純漆 10 升和水 30 升即盤。現因所交納的漆中含有水，故此漆 10 升加水 27 升即可達到“盤”的階段。為達到規定狀態（純漆 10 升和水 30 升即盤的狀態），之後再交納多少漆，再加上多少水合適。

⑤本題的解法如下。交納的漆 10 升與水 27 升即達到“盤”漆。這裏交納的漆和水的比率是 10:27。為了達到規定的狀態，即“盤”漆，還要再加 3 升，故 10:27 的比例分配是合適的。因此，計算如下：

$$\begin{aligned} (\text{餘漆}) \frac{10 \times 3}{10 + 27} &= \frac{30}{37} \\ (\text{餘水}) \frac{27 \times 3}{10 + 27} &= \frac{81}{37} = 2\frac{7}{37} \end{aligned}$$

要而言之，我們把這個算題解釋為，用漆納稅時，收取漆的官吏所進行的漆的質量檢查的方法。現在，沿着算題，追蹤其過程，就得到以下結論。

1) 10 升的純漆加上水 30 升，溶液就達到盤的狀態。（檢查標準）

2) 現在納稅者持有漆 10 升，加水 27 升即可達到盤的狀態。由此可見，納稅者所持有的漆，不是純漆，而是加水漆。

3) 對此漆溶液，再分別加上多少納稅者所持有的多少加水漆和水，能達到 10 升純漆和加水 30 升的盤狀態的溶液 40 升（即官吏所收納的狀態）。這是本算題的問題。

4) 現在盤狀態的漆溶液有 37 升，之後再加盤狀態的漆溶液 3 升合適。

5) 如②所揭示的，加水漆 10 升和水 27 升即可達到盤的狀態，爲了用這種加水漆製作 3 升盤狀態漆溶液，因加水漆 10：水 27 的比率合適，則加水漆是 $\frac{10 \times 3}{10 + 27}$ ，水是 $\frac{27 \times 3}{10 + 27}$ 。

6) 因此，納稅者再多交納自身持有的加水漆 30 / 37 升，官吏方面，在追加納入的漆中加入 81 / 37 升水，即可作出盤狀態的漆溶液 3 升。再加上此前所交納的 37 升盤狀態的漆溶液，就成爲 40 升盤狀態的漆溶液了，那麼納稅者就正好交納了 10 升 = 1 斗的純漆。

也就說，此算題是爲了“必須納稅純漆 1 斗者，在持有加水漆 1 斗的時候，受理的官吏需要檢查漆進行了何種程度的加水，並按照檢查結果，計算必須再交納多少加水漆”而設定的問題。

若以上的解釋可以成立，像彭浩那樣的變更算題中的數字的解釋就不必要了。按照這樣的記述，原樣的數字在此算題中就可以解釋。而且，這個算題的計算方法實際上是應用在官吏受理納稅漆的場合，也就不言自明了。

五、漆中加水實驗和“盤”的意義

如果我們的解釋是正確的，就必須實際操作試著在漆中加水，以證明以下的事項：

A. 純漆中即使加入某種程度的水，也呈現出和沒有加水的純漆同樣的外觀。（因爲如果外觀上有區別，納稅者就不能主張自己所持有的漆是純漆了。）另外，因爲加了水，漆的體積必須增加。（因爲如果體積不增加，納稅者就不能占到便宜。）

B. 純漆中緩緩地加入水，不久漆和水的比率達到 1：3 的時候，目測發生什麼樣的現象。（即“盤”現象。）

C. 即使漆和水的比率達到 1：3 的狀態，也不損害漆本來的性質。即，反過來如果水分蒸發，漆也可以返回原來的狀態。（根據檢查，不可損害漆的品質）

爲了證明這三點，我們進行了向漆中加水的實驗。

實驗所用的漆是生漆和精製漆。這是將常溫的蒸餾水緩緩地加入其中那樣簡單的實驗。2004 年 5 月 22 日，在大阪產業大學化學實驗教室中，在化學系助教授阪本清子的幫助下進行了實驗。

其過程和結果如下：

1. 50cc 的精製漆和生漆各自不攪拌，分別加入 10cc 的水，結果漆沉在下面，水浮在

上面，不能判定兩種漆有何種變化。

II. 各取 50cc 的精製漆和生漆，分別放入燒杯中，向其中注入 10cc 的水并緩緩地攪拌。對於兩者，漆和水沒有混合，即使加水達到 50cc，也不能判定漆有何種變化。

III. 1) 各取 50cc 的精製漆和生漆，分別加入 3cc—5cc 的水，與此同時進行劇烈持續的攪拌。於是，在兩者中，水溶於漆中了。攪拌當初漆的粘著性稍稍緩和，呈現出柔軟的糊狀（照片 2），隨著攪拌的不斷持續，回復了原先的粘著性，從外觀上看和非加水漆沒有區別（照片 3）。從成為這樣的狀態開始，進行下面的加水和攪拌。

2) 不斷反復進行 30—40 次這樣的 3cc—5cc 的加水和攪拌，對於兩者，加水漆的體積慢慢地增加了。正確地進行測定，體積的增加和加入水的體積似乎成比例。而且，此體積的增加，精製漆較為顯著。

3) 不久，加水量達到 150cc 時，對於兩者，加水漆的體積達到原漆的大約 4 倍的同时，失去原來的粘著性，成為膠體狀（照片 4）。

4) 而且，這以後即使再加水也不溶解了，可以看到膠體狀的加水漆周圍的水（這意味著漆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了）（照片 5）。

5) 以上的實驗結束後，兩者的一部分留在燒杯中，簡單地蓋上蓋，置於自然乾燥的狀態，一周之後觀察其狀態。漆溶液的表面形成褐色的膜，內部的物質漸漸地減少了體積而成為糊狀。但是，其品質呈現出沒有變化的樣子。

以上是實驗的結果。可以認為，這個實驗的 III 結果之中，1) 和 2) 可證明上述 3 點中的 A，3) 和 4) 可證明 B，5) 可證明 C。即，我們對這個算題的解釋，從實驗結果也可以確認。^①

① 我們在 5 月 22 日實驗結果的基礎上，6 月 12 日進行了加水漆的體積定量實驗。目的：用體積比，來求精製漆飽和比率（能夠含有純水的限度）。結果：精製漆和飽和漆的體積，假定它們是均勻的，根據運用比重的計算來求得。另外，測定以 mg 為最小單位，假定水的比重是 1.000g/cc 來計算。

1. 精製漆

(1) 比重計算

測定結果（重量）：

| | |
|---------------------|----------|
| (a) 錐形燒瓶 | 74.772g |
| (b) (a) 中裝滿純水之後總重 | 187.455g |
| (c) (a) 中倒入的少量漆之後總重 | 101.455g |
| (d) (c) 中裝滿純水之後總重 | 189.520g |

計算：(b—a) 可知錐形燒瓶的容積是 112.683cc。

(c—a) 可知裝入錐形燒瓶的漆的質量是 26.673g。

{(b—a) — (d—c)} 可知漆的體積是 24.608cc，則精製漆的比重是 1.0839。

(2) 體積計算

| | |
|---------------------|----------|
| 測定結果（重量）：(e) 燒杯和攪拌棒 | 109.318g |
| (f) (e) 中加入精製漆 | 164.483g |

計算：(f — e) 可知燒杯中的精製漆是 55.165g。

由於精製漆的比重是 1.084，燒杯內的精製漆的體積是 50.890cc。

於是，“盤”的意思是，漆以自身體積的 3 倍的水“飲水”的結果，成為體積的最大狀態，失去糊狀粘著力，成為膠體塊狀的飽和狀態。

“盤”，依照文字，是攪拌漆的容器中，從漆的體積成為最大來命名的名稱。或者，也可以認為是為了在檢查時將液狀漆置於“盤”上而不使其流出之意。（參考《後記》）

成為“盤”狀態時，漆的粘度明顯地發生變化，在此之上再加入水也不會溶解。受理納稅漆的官吏，在漆溶液成為此狀態時，判斷為“盤”的狀態而停止注水，從至此為止所加的水量來判定納稅漆是加水漆還是純水漆，若是加水漆的情況下，之後再追加納入多少才合適。

若漆被水溶解，大約達到其體積比為 1:3 之時，漆沒有喪失其品質，而成為“盤”狀態。現代有機化學對此將如何解釋，關於這一點，還必須有待於聽取漆研究專家的意見。^①

2. 飽和漆

(1) 比重計算

| | | | |
|--------------|-----------------|----------|--|
| 測定結果（重量）：(A) | 錐形燒瓶 | 70.110g | |
| (B) | (A) 中裝滿純水之後總重 | 183.857g | |
| (C) | (A) 中倒入的少量漆之後總重 | 86.798g | |
| (D) | (C) 中裝滿純水之後總重 | 183.755g | |

計算：(B-A) 可知錐形燒瓶的容積是 113.747cc。

(C-A) 可知裝入錐形燒瓶的漆的質量是 16.688g。

{(B-A) - (D-C)} 可知漆的體積是 16.770cc，則飽和漆的比重是 0.995。

(2) 體積計算

| | | |
|--------------|------------|----------|
| 測定結果（重量）：(E) | 燒杯和攪拌棒 | 109.318g |
| (F) | (E) 中加入飽和漆 | 306.670g |

計算：(F - E) 可知燒杯中的飽和漆是 197.352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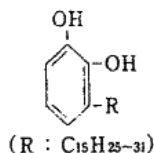
由於飽和漆的比重是 0.995，燒杯內的飽和漆的體積是 198.344cc。

3. 關於漆和水的體積

從 (F-f) 可知精製漆所飲的純水是 142.187g = 142.187cc。體積比相當於精製漆的 2.794 倍。另外，燒杯中精製漆和加入純水的體積之和是 193.077cc，對於飽和程度來說其膨脹到 198.344cc。其比率是 1.027 倍。

① 漆研究專家明治大學理工學部工業化學系的宮腰哲雄教授，對我們的“想知道漆和水的溶合，以及漆和水在 1:3 時飽和的化學方面的說明”的請求，教授親自進行了漆和水的溶合實驗，確認了這個事實，說明如下：

漆液主要由漆酚這種成分組成。漆酚的分子式是 $C_6H_3(OH)_2-R$ (R: $C_{15}H_{52} \sim 31$)，其構造如下圖所示。



作為酚環的側鎖而附著的烷基 (R)，是由連接在一起的 15 個碳原子的飽和基和不飽和基組成。

漆難溶於水，是由於 R 側鎖有疎水性。

在漆中慢慢地不斷加入少量水並用力攪拌，就可以觀察到加入的水被漆吸收並混合起來的現象。而且，漆和水的相互混合是有比例的，漆加的水量是漆的體積的 3 倍。

漆和水的相互混合的現象，可以認為是由於酚環的二個氫氧基 (OH) 有親水性，這個氫氧基和水分子水和時，形成了漆酚和水分子的集合體。但是，漆和水的混合比例有限度，很可能是由於漆酚的疎水性的 R 妨礙了漆和水的無限大的混合。（由於宮腰先生的原說明稍顯專業，為了讓我們這樣對化學是外行的人也能夠理解，就委託阪本清子助教授，對原文稍稍進行改動。）

然而，秦漢時期就運用基於這種知識的檢查方法，是確確實實的事情。如果前文（2）中所舉的秦簡的記載也以這種檢查方法為前提來解釋的話，將更容易理解這個事例。

六、關於秦簡效律的“飲水”

《算數書》的“飲漆”題，是把納稅者和官吏作為前提的。納稅者是指個體經營漆林的人。他們必須把從自己的漆林裏收穫的漆的幾成向政府納稅。但是，在此之外可以自主地販賣。《後漢書·樊宏傳》，有關於樊宏的父親的記載。

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其營理產業，物無所弃，課役童隸，各得其宜……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宏製作容器之前，為得到作容器的梓和塗於其上的漆液而栽培漆樹，結果發了大財，連先前嘲笑他的人都來借錢了。

《史記·貨殖列傳》，對不食秩祿的素封家所興的產業，舉出“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陳、夏千畝漆”等例子。即便是個人的漆林也擁有相當大的規模。

與此相對，官府經營的叫做“漆園”。莊子曾是周的漆園的吏（《史記·莊子列傳》），就是有名的例子。秦簡6中也見到了“鬻園”，漢印中也有“漆園司馬”，故秦漢時期其稱呼沒有被替代。

《秦律雜抄》的（6）釋文如下：

漆園評為下等，罰漆園的嗇夫一甲。縣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罰金二十根。
漆園三年連續被評為下等，罰漆園的嗇夫二甲，并撤職永不叙用，縣令、丞各罰一甲。

秦朝官府管理的漆園為數不少，對各漆園間似乎實行了在漆的生產量或品質上的競爭。而且，對於下等的漆園，有對其園的管理責任者以及管轄漆園的所在縣之政府的責任者施行懲罰的條例。

那麼轉到（2）的效律的條文上來。關於此條文，雖至今為止有數種解釋，但文中的“飲

水”是怎樣施行的，“水減”是以何種標準測定的，在逐句地翻譯中也還是不甚清楚。^①現在，從“飲漆”題解讀的結果再來看其意為何，是能夠作出大致推定的。我們的翻譯如下所示：

工從其他縣受取漆，到達官府時，在官府中測定此漆。向漆桶的漆中注水，（直到達到盤的狀態）。（據此，以準備的水的總量）水減少 200 斗以上（即，全部漆桶的漆總飲水量，達到 200 斗以上的情況），工及率領工的官吏各罰金二甲。水減少 200 斗未滿到 100 斗為止，各罰金一甲。水減少 100 斗未滿到 10 斗為止，各罰金一盾。水的減少量 10 斗未滿以下及在該縣收取後損失的情況下，賠償并保持原樣。

也就是說，運到官府的漆，首先要被檢測運送時是否被進行了適當的管理（水的注入）。似乎期望漆在近乎盤的狀態下被搬運。但是，由於漆從外觀上分辨不出被加入了多少水，接受其上級官吏一方，根據達到盤狀態加了多少水，來判斷管理是否得當。因此，各漆桶達到盤狀態時加入水的總量越多，就說明管理得越不合格。這就是，設計了從 200 斗到 100 斗，從 100 斗到 10 斗，10 斗以下三個標準。“水減”的意思是，官府方面準備的水的總量，在向各個漆桶裏注入水之後，有何種程度的減少。（如果從漆的方面來看，就是應當被注入的水量有何種程度的減少）。

一方面，從搬運漆的下級官吏一方來說，在近乎盤狀態的情況下搬運，體積和重量增加了，負擔加重了。另外，搬運的途中進行加水是非常大的勞動負擔。因此，盡可能減少加水的量。另一方面，上級官吏一方在交接時，想使加水檢查的負擔盡可能地減少。這種上級官吏與下級官吏之間的矛盾，也許是制出這樣的條文的原因。根據這個條文可知，官吏們在漆的管理上利用了“盤”這樣可以用眼判斷的方法。

七、小結

《九章算術》推斷在東漢初期形成原型，東漢時進行了反復的編纂。最後由三國的劉徽整理而形成現在的形式。此《九章算術》中，有關“漆”的計算，僅見一例。即，“盈

①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用現代漢語翻譯如下：“工匠到別的縣領漆，運抵官府，加以測試，飲水，水減在二百斗以上，罰工匠及率領他們的吏各二甲；不滿二百斗而在一百斗以上，罰各一甲；不滿一百斗而在十斗以上，罰各一盾；不滿十斗以及從該縣領漆時虧欠的，應補賠使足原數。”

其餘的，在秦簡講讀會《〈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譯注初稿》（《中央大學大學院論集》11-1）和 A.F.P.Hulsewé “REMNANTS OF CH'IN LAW”（97 頁）已經被譯出，序言和整理小組的譯文幾乎相同，故省略。

不足”章中所見到的，其文如下：

今有漆三得油四，油四和漆五。今有漆三斗，欲令分以易油，還自和餘漆。問出漆、得油、和漆各幾何？答曰：出漆一斗一升四分升之一，得油一斗五升，和漆一斗八升，四分升之三。

在此之外，沒有看到漆的記載。由此可見，大概“漆一加水三漆盤”這樣的檢查方法在曹魏時期已經不施行了。這裏所見的“油四和漆五”，大概是指販賣漆之前的調合行為，“漆中混油”這樣的記載在後世的文獻中也可以看到。

宋代編集的《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十二《神農本草經》“生漆，去長蟲。久服，輕身耐老”的句子後面引用了《名醫別錄》陶弘景注，並且其後“臣禹錫等謹按”的句子中，引了《蜀本草》的注文。即為：

漆性并急。凡取時，須荏油解破，渾者難得，可重重別制試之。上等清漆，色黑如瀑若鐵石者好。黃嫩若蜂巢者不佳^①。

這就是說，採取漆的樹液之時，用荏（蘇子）油來“解破”漆。“解破”的意思不是十分清楚，或者是解除漆的粘著性使其易於使用之意。不管怎樣，這樣的混入油的漆，大概已經不能夠進行加水至飽和狀態再去做試驗了吧。^②

從這樣的例子可見，過了漢代，漆的加水試驗似乎就不再施行了，或者可能採用別的方法來考察漆的品質。我們從中國的後世的典籍當中，沒有找到漆中飲 3 倍的水而達到飽和狀態之類的記載。不僅僅是中國的典籍，有關現代的漆的普及書、實用書、報道等中也沒有記載。大概漢代之後，使用了新的檢查方法，這種知識就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吧。

漢代之後，用怎樣的方法來進行漆的檢查，是今後所要研究的課題，由於超越了本文的論及範圍，故等待著後人的研究。^③

① 引用的語句中“可重重別制試之”部分，“制”在《大觀本草》卷十二作“刷”，“試”在《本草綱目》卷三十五的“漆”條中作“拭”。

② 明代黃大成的《髹飾錄》中，記載了有關漆工塗畫器物之際的技法、工具和用漆。其中，“利用第一”中有“水積，即濕漆。生漆有稠渾之二等。熟漆有揩光、濃、淡、明膏、黃明之六制”之語句。其中關於“熟漆”，《髹飾錄解說》（文物出版社，1983）中，王世襄認為，“‘熟漆’是經過煉製的漆。煉製的方法是，經日曬、煮，或者加上桐油和其他的植物油”。因此可以認為，和采割之後的生漆的檢查沒有直接關係。另外王世襄還在《中國古代漆工雜述》（《文物》1979年第3期）中，其二“關於髹飾用油”，記述了上彩之際，為了顯出各種顏色而使用油的情況。

③ 前注所舉《本草綱目》卷三十五“漆”條稍後部分，以“宗奭曰”記載了漆的檢查方法。即：“凡驗漆，惟稀者以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急收，更又塗於幹竹上，陰之速幹者，并佳。”

最後，在本文結束之際，衷心地感謝擁有豐富的化學知識、給予對漆完全是外行的我們以各種幫助和指導的明治大學的宮腰哲雄教授，指導實驗的本大學化學教室的阪本清子助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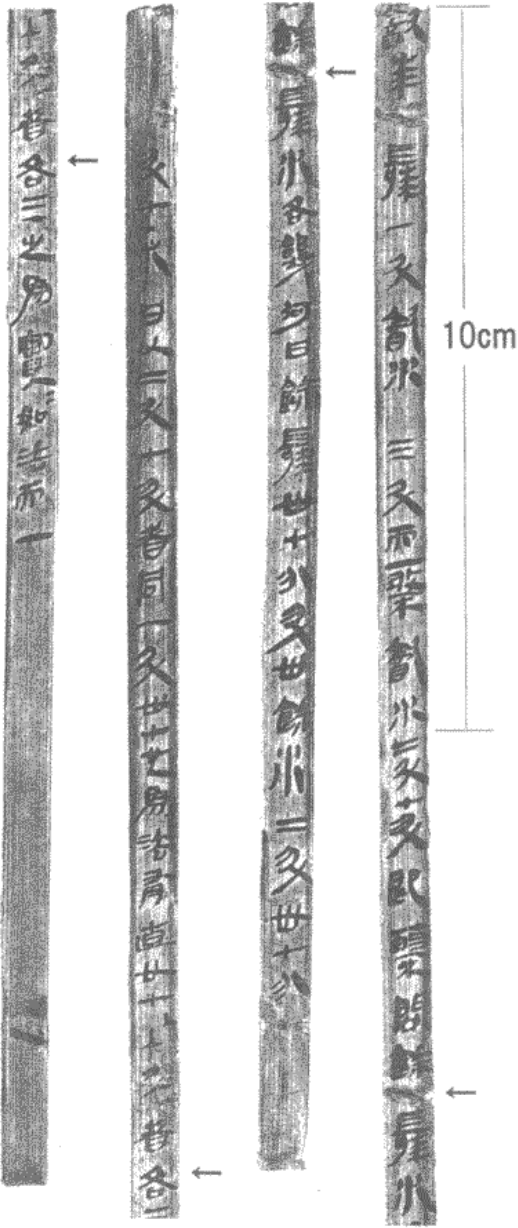
後 記

本文修改期間，有幸參加了8月12—14日在北京舉行的“《算數書》和先秦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此會議中，荊州博物館的彭浩發表了“關於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整理作業的要點說明”。作為張家山漢簡的發掘中的一員，他詳細地報告了該簡的發現、發掘、整理成書這一系列的過程。在這份報告中，指出最初完成的譯文還存在較多的問題，例如，舉出了此“飲漆”題中的“槃（盤）”字。

例如，對於“飲漆”第66簡的槃和澤出的2個字，胡平生指出“亟”從木而為“極”。（從裘錫圭處得知），這個是對的。因此，應該重新思考針對該題的斷句與解釋。

對這個論證，我們回國後，進行金文、楚簡、秦簡、漢簡、帛書等中所見“般”“亟”“槃”“極”字形的討論，結果得出了該簡的字譯成“極”字是合適的結論。（關於此次討論的詳細情況，發表了《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6）》）。因此，本來基於此論證，本文全部的“槃”和“盤”字就必須改成“極”字，但因校正已經在進行之中，為了避免煩瑣，就勉強保持原樣不動。另外，我們的“槃（盤）”解釋為漆溶融於水“達到飽和狀態”，即使“槃（盤）”改成“極”字，也沒有絲毫改變。“達到飽和狀態”，用“極”字來表示，是大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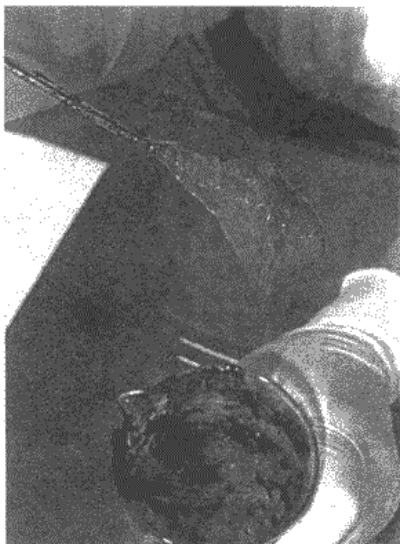
“蘸”是用水浸漬之意。因此，這是將物品用漆浸漬以觀察（其從漆中提起時）漆形狀的變化，而不是和水的意思。現在中國實行的漆的檢查方法，可參考王性炎《中國漆史話》（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的“六，歷史悠久的生漆檢驗技術”和全國供銷合作社土產果品局主編《漆樹與生漆》（中國林業出版社，1981）的“第十章，生漆檢驗”。因解讀古漢語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並非難事，故本文將日文原作注釋中用日語訓讀出的中國古漢語部分均還原為古漢語。——譯者注



照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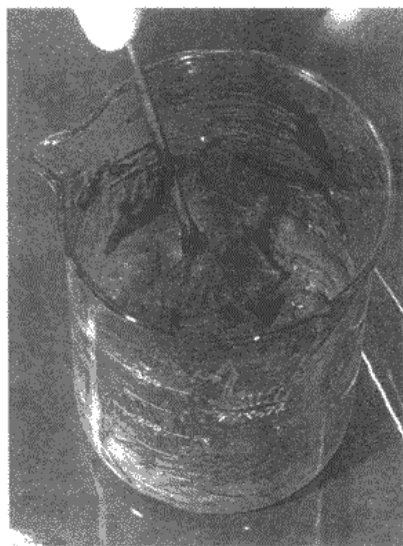
照片 (2)



照片 (3)



照片 (4)



照片 (5)

照片 (2) (3) (4) (5) 全部是精製漆

參考文獻

[1]大川俊隆:《“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研究会”の発足にあたって》,《大阪产业大学论集人文科学编 107 号》,2002 年 6 月。

[2]大川俊隆:《“張家山漢簡〈算数書〉》注釋”序論(釋)》(上),《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

文科學編 107 號》，2002 年 6 月。

[3]大川俊隆：《“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序論（釋）》（下），《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08 號》，2002 年 10 月。

[4]蘇意雯等：《〈算數書〉校勘》，HPM 通訊 33—12，2000 年 11 月。

[5]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江陵張家山漢簡〈算數書〉釋文》，《文物》2000 年第 9 期。

[6]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2。

[7]白尚恕：《〈九章算術〉注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8]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注釋》，科學出版社，2001。

[9]戴內清編：《科學名著 2，中國天文學·數學集》，朝日出版社，1980 年 11 月。

[10]郭書春：《〈算數書〉校勘》，《中國科技史料》2001 年第 3 期。

[11]郭世榮：《〈算數書〉勘誤》，《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2001 年第 3 期。

[12]田村誠：《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1），《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08 號》，2002 年 10 月。

[13]彭浩：《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的“并租”與“啓徙（縱）”》，《考古》2002 年第 5 期。

[14]大川俊隆、小寺裕：《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2），《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09 號》，2003 年 2 月。

[15]田村誠：《張家山漢簡〈算數書〉について I，〈九章算術〉方田章对应部分について》，《數理解析研究所講究錄 1317》，2003 年 5 月。

[16]岡山茂彦：《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3），《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11 號》，2003 年 10 月。

[17]張替俊夫：《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4），《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12 號》，2004 年 2 月。

[18]田村三郎：《張家山漢簡〈算數書〉譯注稿》（5），《大阪産業大學論集 人文科學編 114 號》，2004 年 9 月。

關於漢代材官、騎士的身份^①

◎ [日] 高村武幸 著

◎ 楊振紅 譯

前言

漢代兵制研究在日本、中國都有很多積累，但是，眾所周知，兵制研究的基本史料存在很多問題，很難對它們作出一致的解釋。本文涉及的材官、騎士身份的討論就是其中之一。對此學界意見分為兩派，一派認為他們是經過特殊選拔的，和其他兵士（正卒）不同，有的甚至認為他們是官吏；一派認為他們雖然是經過選拔的精兵，但本質上和其他兵士沒有區別。

材官、騎士是否是官吏，不僅是兵制也是漢代官僚制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搞清楚選任官吏的資格和條件，對於認識漢代甚至秦代的特質都很有意義。以往漢代兵制研究主要是從其與徭役制度相聯繫的角度展開。兵役是徭役的一部分，因此那樣做是理所當然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其與官僚制度的關係還有探討的餘地。本文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來探討材官、騎士身份的。而且，對於漢代兵制的基本史料——衛宏《漢舊儀》和《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上書，學界的解釋幾乎已經窮盡，我想與其在此之上進行繁蕪的再解釋，不如利用其他史料進行研究。對此，可能有學者持不同看法，敬請諒解。

在進入正文之前，先概括介紹一下有代表性的研究觀點。如前所述，漢代兵制是一個研究積累豐厚的領域，這裏祇圍繞材官、騎士問題展開。

大庭脩氏指出漢代兵制中的“士”和“卒”是有區別的，材官、騎士等“士”是與正卒

① 原文《漢代の材官・騎士の身分について》刊於《日本秦漢史學會會報》第5號，2004。

不同的精兵，^①根據史書見到的升遷事例，材官等可能是一種下級官。^②米田賢次郎氏發展大庭說，認為祇有擁有資產四萬錢以上具有任官資格家庭的子弟才有可能成為材官、騎士等“士”，其他人祇能成為“卒”。^③與上述觀點不同，西村元佑氏認為漢代史料中見到的“士”、“卒”區別模糊，北邊騎士雖然是“吏比者”，但其他都是一般徵兵的兵士。^④因此圍繞材官、騎士，在以下兩個問題上存在爭議：①“士”、“卒”是否有區別，②材官、騎士是否是特別的兵士甚至一種官。對此很多研究者在三氏的基礎上進行了討論。

其中，關於問題①，正如西村氏依據大量史料所指出的那樣，漢代傳世文獻史料中“士”、“卒”的使用沒有明顯區別。另一方面，大庭氏指出居延漢簡中騎士之外還存在被認為是指材官的“材士”。^⑤此外，還散見以“○部×曲士”等形式表現的兵士，從下簡：

饒得騎士敬老里成功彭祖 屬左部司馬宣後曲千人尊(546·6, 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可推測他們是騎士或材官等。最近發現的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東漢簡牘10背面也有類似例子^⑥：

□中右部士冊人 伏波卅四人
剽騎士冊人 城中左部卅六人
黃弩卅三人
雁門士五十三人
中部士卅四人
揚武士卅四人

① 大庭脩：《材官攷——漢代の兵制の一斑について——》，《龍谷史壇》三六，1952。

② 大庭脩：《地灣出土の騎士簡冊》，見《漢簡研究》，同朋舍，1992。

③ 米田賢次郎：《漢代徭役日數に関する一試論——特に“三十倍於古”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二七，1957；《秦漢帝國的軍事組織》，見《古代史講座》五，學生社，1962。

④ 西村元佑：《漢代の騎士——士、卒の問題に關連して——》，《龍谷史壇》四四，1958。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不可能將它們一一介紹。下面僅就“士”“卒”的區別和材官等身份的觀點，參考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徭役・兵役”（汲古書院，1993）、重近啓樹《秦漢稅役體系の研究》“兵制をめぐる諸問題”、“兵制の研究—地方常備軍制を中心に—”（汲古書院，1999）所述學術史，做了一個粗略的分類：

“士”“卒”有區別，材官等是職業軍人（包括選拔專門兵、與下級官吏相近等）……大庭脩、米田賢次郎、越智重明、藤田勝久、志野敏夫

“士”“卒”沒有區別，材官等不是職業軍人……西村元佑、重近啓樹、山田勝芳

即使基本觀點相同，但具體主張也不同，因此希望參考原文。越智重明：《前漢時代の徭役について》（《法制史研究》二五，1975）、藤田勝久：《前漢の徭役勞動とその運営形態》（《中國史研究》八，1984）、志野敏夫：《漢の都試——材官、騎士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方學》八九，1995）。此外，中國、臺灣的研究自勞榘以來也有龐大的積累。最近，張仲立《材士材官考論》（《秦文化論叢》第七輯，1999）提出材官的身份比一般百姓高。

⑤ 前揭大庭脩《地灣出土の騎士簡冊》。

⑥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均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撰，載《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

武威士卅六人

惟管卅三人

簡中的伏波是水兵、剽騎士是騎兵、黃弩是弩兵，均應屬騎士或材官。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弩意為強勁的弩，可和“材官蹶張”對應，剽騎士應是一種騎士。同簡中記錄的“××士”也應該是材官、騎士之類。^①像這樣，簡牘中材官、騎士類兵士稱為“士”的例子非常多，沒有材料表明他們之中包含戍卒等。也就是說，從出土材料看，“士”、“卒”的區別相當明確。但是，正如西村氏所指出，居延漢簡中也有“弛刑士”即將刑徒兵稱為“士”的例子，單稱“弛刑”的情況則更多，又模糊了兩者的區別。^②結合文獻史料中士、卒的區別不明顯這一情況，因此，即使材官、騎士和其他兵士確有區別，但是，將這種區別僅用“士”、“卒”的用語來表現也不適當。而且，按照周制，“士”至少應和少吏以上的官吏相對應，^③因此，我想對問題①先不要急於下結論，對問題②材官、騎士是否是一種特別的兵士甚至官，也應該等將來材料增加後再進行討論。

一、文獻所見的材官、騎士的出身郡國

散見於《史記》、《漢書》等的材官、騎士，大多出現在《本紀》、《列傳》等與軍事行動有關的記載、以及《列傳》記錄的人物生平中。我想先列舉《漢書》本紀記載軍事行動的材官、騎士、樓船、輕車等兵士的例子，從出身郡國的角度加以考察。特別是，對騎士學界存在將北邊騎士視為特例的認識，因此有必要注意其地域性。

1. 高祖十一年（前 196）秋七月（對黥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2. 惠帝七年（前 188）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3. 高后五年（前 183）秋九月（對匈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4. 文帝三年（前 177）夏五月（對匈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
5. 景帝後二年（前 142）春（對匈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① 雁門士見於《史記·項羽本紀》、《灌嬰列傳》、《漢書·項籍傳》、《灌嬰傳》，應和“樓煩”有關。樓煩，據《漢書·灌嬰傳》李奇注：“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騎士為樓煩，取其稱也”，是對善於騎射兵的美稱。《漢書·項籍傳》李奇注說樓煩屬雁門。雁門士是源於地名的稱謂，雖然史料表明北方騎士較多，但是，難以想像現實中雁門郡出身的騎士會常置於湖南。考慮到樓煩屬雁門郡，雁門士應該是和“樓煩”同義的兵士的美稱。

② 關於弛刑，請參考石岡浩《漢代有期勞役刑制度における復作と弛刑》（《法制史研究》五〇，2000）、盧星：《漢代刑徒兵考略》（《史學月刊》1992年第5期）。

③ 福井重雅：《漢代の察舉制度と政治体制》（《漢代官吏登用制度の研究》，創文社，1988）。

6. 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秋（對南越）……將罪人以下，江淮以南樓船
7. 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冬十月（對西羌）……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內、河南卒十萬人
8. 武帝征和元年（前 92）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9. 宣帝本始二年（前 72）秋（對匈奴）……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
10. 宣帝神爵元年（前 61）春～夏（對西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

《漢書》本紀記載徵發材官、騎士、樓船、輕車等的軍事行動，如上所示有 10 例。但更多的軍事行動沒有詳細記載徵發兵力的情況，遠征多發生在武帝時，主要是對匈奴作戰，達十數回之多，它們多被籠統地記為“十余萬騎”、“步兵萬餘人”等，郡名以及徵調騎士、材官的數量均沒有記錄。

但是，在相關列傳中卻能見到徵發騎士的例子。其一發生在元朔六年（前 123）對匈奴戰爭中，據《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騎士孟己”因戰功被賜予關內侯，食邑二百戶。還有一例是太初四年（前 101）第二次遠征大宛，《漢書·李廣利傳》載徵發了刑徒兵、惡少年、“邊騎”。其後文說，搜粟都尉上官桀命“四騎士”護送抓到的郁成王，途中“上邽（《漢書·地理志》載在隴西郡）騎士趙弟”斬殺之。邊騎應是“邊郡騎士”的省稱。《漢書·西南夷傳》載，王莽天鳳三年（16）爲了對付西南夷，除徵調了天水、隴西騎士外，還徵發了廣漢、巴、蜀、犍爲郡吏民。此外，據《漢書·西域傳》，宣帝甘露二至三年時，烏孫因爭奪繼承權發生內亂，漢王朝介入此事，敦煌懸泉置出土了甘露三年（前 51）九月派遣守屬迎接從上郡到烏孫從軍騎士的漢簡（II0115③：99）。因此，即使本紀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從其他材料卻可以證明騎士的存在，由此可推當時的軍事行動大多徵調了騎士和材官。

關於被徵發的材官、騎士的出身郡，宋代錢文子的《補漢兵志》已基本搜羅齊備，在此想做更進一步的討論。就騎士來說，隴西、天水、安定的騎士分別出現兩次（例 7、例 10），如前所述，武帝時期對大宛戰爭中徵調了隴西騎士、王莽時期對西南夷戰爭中徵發了天水、隴西騎士，這些郡和西羌、西南夷距離較近，結合例 1 徵發“車騎”的情況，整個西漢對西北諸郡騎士的徵調令人矚目。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和郎官（羽林、

期門)的候選人群——六郡良家子的出身郡相重合。^①天水郡是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從隴西郡、安定郡是從北地郡分置出去的,由此可知在分立之前的西漢前期,大規模軍事行動多派隴西、北地、上郡的騎士出擊。六郡唯一所剩西河郡原來也是上郡的一部分,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單獨設郡,因此,六郡實際都包含在隴西、北地、上郡三郡中。這三郡都是秦時設郡,而且是統一前設立的,^②在構建秦國對匈奴防綫的同時,也因其是騎兵的供給地而受到重視,秦滅亡後很有可能繼續從這裏徵調騎兵。在西漢最早徵發騎士的例1中,徵調三郡車騎作皇太子護衛軍,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其他邊郡的騎士情況雖然不甚清楚,但當該郡成為遠征軍的出擊地點時,有可能徵調當地和鄰郡的騎士。

與此相關,六郡良家子的存在表明邊境居民的騎射技術受到重視。^③但是,在眾多的邊郡中,祇有六郡自秦以來即承擔著供給騎兵和關中防綫的職責,對此,國家是否給予政治上的特權作為回報呢?其他邊郡和關中不相毗鄰,即使受到匈奴的侵攻,對關中的影響也很小。而且,假如考慮到郎官護衛皇帝的職掌,他們的信賴度也會受到重視。如果僅限於西漢,根據《漢書》做成下表,可以看到邊郡出身升至高官高位的人大多出身六郡。^④《後漢書》所見邊郡出身的人,除東漢初的之外,多有從孝廉升遷任官的經歷,而且,其中六郡出身的人很多,出身河西四郡的達數名之多。

| 人名 | 出身郡縣 | 主要官職 | 備考 |
|-----|------|------|-----|
| 李廣 | 隴西成紀 | 驍騎將軍 | 良家子 |
| 李息 | 北地郁郅 | 材官將軍 | |
| 李沮 | 雲中 | 彊弩將軍 | |
| 郭昌 | 雲中 | 拔胡將軍 | |
| 公孫敖 | 北地義渠 | 因杆將軍 | |
| 路博德 | 西河平州 | 伏波將軍 | |

① 關於六郡良家子,請參考堀敏一《漢代の良家について》(收入《中國古代の身分制——良と賤——》,汲古書院,1987);關於期門羽林,請參考黃今言《漢代期門羽林考釋》(《歷史研究》1996年第2期),關於郎官,請參考杉村仲司《漢初の郎官》(《史泉》九四,2001)。

② 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特にその成立の基礎条件——》(不昧堂書店,1965)指出,上郡過去是魏的領地,秦惠文君十年(前329)成為秦的領土,秦昭襄王三年(前304)設立郡。隴西郡是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設置的,北地郡大概也設於這一年。《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武王十年(前689)以郿(上郿)為縣,從很早開始秦的勢力就擴展到後來的隴西、北地地區。如果隴西、北地(包括天水、安定)郡在西北三郡中地位特殊的話,可能就是因為隴西、北地很早就成為秦的疆域,而上郡(和河西)成為秦的疆域較晚吧?關於西漢時期這些地區的情況,請參考浜川榮《徙民七十万人と黄土高原——前漢武帝期における黄土高原の環境と開発——》(《東洋文化研究》六,2004)。

③ 參見前堀敏一《漢代の良家について》。

④ 王子今:《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秦漢人才的區域分布》(《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列舉的關西人物,也大多出身於西北六郡。

| | | | |
|-----|------|------|--------|
| 公孫賀 | 北地義渠 | 丞相 | 騎士 |
| 趙充國 | 隴西上邽 | 後將軍 | 騎士、良家子 |
| 辛武賢 | 隴西狄道 | 破羌將軍 | |
| 傅介子 | 北地義渠 | 平樂監 | |
| 甘延壽 | 北地郁郅 | 西域都護 | 良家子 |
| 段會宗 | 天水上邽 | 西域都護 | |
| 上官桀 | 隴西上邽 | 左將軍 | 羽林、期門 |

材官卻不像騎士那樣有明顯的地域性。例 1 和例 7 的中尉卒假如就是例 4 的中尉材官的話，那麼，徵發中尉指揮下的材官就值得注意。同樣，假如例 7 河內、河南卒和例 10 三河（河內、河東、河南）的材官是一回事的話，那麼，三河的材官亦令人矚目。其餘的材官出身於巴蜀或關東南部地區，可能是因為與騎射相比，弩等技術不太受地域條件的限制，地區分布才較廣。附帶提及，居延漢簡中有蜀和昌邑的“材士”，^①曾任材官的周勃出身於沛，申屠嘉出身於梁，^②這些都是出身蜀和關東南部地區的例證。這樣來看，材官雖然沒有明顯的地域性，但可能存在著徵發中尉指揮下的三輔和三河兵的傾向。和三輔相比，三河也被認為是“股肱之郡”，因此，有必要注意中央政府的重視和這一現象的關係。^③

以上就西漢軍事行動中所見材官、騎士，從出身郡國的角度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大規模軍事行動時，騎士多從以隴西、北地、上郡為中心的西北諸郡徵發，材官的情況雖然不明瞭，但有從三輔、三河地區徵調的。這應是受中央和這些地區關係較為穩固的影響，特別是六郡良家子來源地的西北諸郡，戰國秦以來即是騎士的供給郡，因此受到中央的特別重視。以往，雖然也有學者將“北邊騎士”作為一個群體加以考察，但是考察過於粗疏。除了後揭《史記·平準書》關於課稅優惠的記載外，還沒有發現對西北三郡（六郡）以外的北邊郡騎士特別優待或者軍事行動時頻繁徵發的例子，因此，我想與其將內郡騎士和邊郡騎士區分開來，不如將西北三郡（六郡）和其他郡加以區別更為合適。

二、材官、騎士身份有關史料的考察

為了考察材官、騎士的身份，下面想討論一下相關史料。關於漢代兵制，在傳世文獻史料的基礎上，20 世紀 30 年代開始利用居延漢簡等進行實態研究，利用睡虎地秦簡等新出

① 參見前揭大庭脩《地灣出土の騎士簡冊》。

② 《史記·絳侯世家》載“絳侯周勃，沛人也……材官引彊”。申屠嘉如後文所引。

③ 前揭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徭役・兵役”也觸及三河在衛士徵發中的重要地位。

土材料的研究也在增加。^①將材官、騎士視為一種官吏（或接近）的研究者，主要以下列史料為根據：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

《漢書·申屠嘉傳》；《史記·張丞相傳》文大體相同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

《漢書·公孫賀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邦人也……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漢書·趙充國傳》

上述材料表明，材官、騎士是這些人當官吏的第一步。特別是公孫賀“少為騎士”和趙充國“始為騎士”的表述方式，和列傳記述初任官的表達方式“少為某官”、“始為某官”相同。^②此外，還列舉了居延漢簡中：

□今除為繅得騎士

採用和除任官吏同一方式除任騎士的例子。

與此相對，認為材官、騎士是正卒的研究者，雖然也承認材官、騎士經過一定程序的選拔，但卻把上述例子看成是“吏比者”“北邊騎士”的特例。揭示“北邊騎士=吏比者”的，是《史記·平準書》記述武帝財政改革的一段文字：

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

我認為對這條史料可以作不同的解釋。也可以把“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看成是并列關係，讀作“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與《史記·平準書》大體同文的《漢書·食貨志下》顏師古注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即把三者讀為并列關係。那麼，“吏比者”到底指什麼？雖然是西漢初期的例子，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在規定有爵者的待遇時，將爵位的高低與官秩聯繫起來，^③它可能是

① 利用睡虎地秦簡等的研究以前揭山田勝芳和重近啓樹的著作具代表性。

② 這些材料在大庭、米田的論文中被作為材官騎士是一種官吏的依據。

③ 例如《二年律令》291—292簡：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褭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

關於可比附官秩的有爵者和按照一定規定享受官吏待遇者的規定。考慮到武帝時期財政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對匈奴戰爭的費用和賞賜的財源，那麼，北邊騎士被免除算錢，是不是因為他們是吏比者，而是因為他們經常站在對匈奴戰爭的第一線，為了減輕他們的負擔呢？《漢書·趙廣漢傳》記載他陷害名叫蘇賢的人的事迹：

尉史禹故勅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西村氏將其解釋為尉史禹受趙廣漢旨意彈劾蘇賢被征為騎士，將此作為騎士祇是單純的官役的證據。^①他可能是這樣理解這句話的：“尉史禹因此彈劾，以賢為騎士，不屯霸上……”但是，這段話也可以解釋為：“尉史禹因此彈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到屯所，乏軍興”，即賢為騎士時不履行職責，因此彈劾他“乏軍興”，它反映的是尉史與騎士的管理有關，^②也就是說，這條材料是反映在官吏的權限內管理騎士就役的事例。

如上所述，對關係材官、騎士是否是官吏的史料，學界認識存在分歧。下面對以往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再增加一些相關史料進行考察。

1973、1974年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有反映騎士活動的簡：

甲渠郵候□ 即日壬申 五月壬寅府告甲渠郵候遣乘隤騎士王晏王陽王敞趙康王望
舖後遣 等五人借人乘隤長徐業等自乘隤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EPF22-473AB

甲渠郵候□ 即日癸酉 四月壬戌府告甲渠郵候遣乘隤第五隤騎士郭陽第十八隤候騎士夏侯倉
舖時遣 之官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EPF22-474AB

甲渠郵候□ 己未下舖遣 十一月己未府告甲渠郵候遣新除第四隤長邢鳳之官符到令鳳乘第三遣
騎士召戎詣殄北乘鳳隤遣鳳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EPF22-475AB

□驗問永辭今月十日壬寅代騎士王敞乘隤教教

EPF22-526

●甲渠言隤長趙永代騎士王敞

乘隤殺少永留十三日乙巳到官□

EPF22-586

① 前揭西村元佑《漢代の騎士——士、卒の問題に關連して——》。

② 參見前揭重近啓樹《秦漢稅役體系の研究》“兵制をめぐる諸問題”、“兵制の研究——地方常備軍制を中心に——”。

從編號可以推定上述簡是東漢建武初年的簡，內容與人事變動有關。前面三枚簡都採用了派遣官吏命令書“遣”的文書形式——“遣之官、日時在檢中、到課言”^①，由此可知騎士是按派遣官吏的方式派遣的。關於派遣縣長上任，EPF22·475 明確記有“新除第四縣長”，因此，派遣的也應是騎士。根據 EPF22·526、EPF22·586 推測，派遣的目的應該是代理縣長。另一方面，就筆者管見還沒有發現戍卒（不管出身是否內郡）出任代理職務的例子。^②由於是建武初年動蕩時期的事例，在歷時一個世紀的西漢後期的居延漢簡中沒有見到類似的例子，因此不能匆忙地將其視為通例，但是，不是由戍卒而是由騎士來代理正規官吏的縣長這一點仍值得注意。敦煌懸泉置漢簡中有下列事例：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樂官令充敢言之。詔書以騎馬助傳馬，送破羌將軍、穿渠校尉、使者馮夫人。軍吏遠者至敦煌郡，軍吏晨夜行，吏御逐馬前後不相及，馬罷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謹遣騎士張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縣、官、旁郡，有得此馬者以與世等。敢言之。
V1311④:82

從《漢書·西域傳》來看，它應是與烏孫公主歸國有關的文書，為了派遣騎士尋找道中丟棄的馬，縣令向太守府申請讓提供騎馬的騎士以公務出差的形式尋找沒有回來的馬。從敦煌、居延漢簡因公出差者所用通行証看，這種情況下派遣的幾乎都是官吏。^③此外，在懸泉置漢簡中還有一枚與送迎外國使節有關的簡：

出鞬轡各二、左部騎士高誼里、建平五年二月送昆彌使者…… IO114①: 70

從懸泉置漢簡中類似內容和文書形式的簡來看，送迎使節的也多是官吏。^④這些騎士可能不是單純的隨行警備人員，而是負責送迎或者與此相關的人。前揭《漢書·李廣利傳》中，護送郁成王的就是四名騎士。使節和俘虜雖然身份不同，但都是重要人物，對這樣的人是否要委任普通的兵卒，還有考慮的餘地。

① 參見李均明《漢簡遺書考述》，《簡帛研究》一，1993；鶴飼昌男《漢代郡太守の持つ人事權について——地方長吏の欠員を視點に——》，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書店，2003。

② 同時期的居延漢簡中有記載都尉府派遣“新占男子”代燧長的簡（EPF22·648），由於是殘簡，因此不清楚是代理還是正式任用。

③ 在大庭脩《漢代の関所とパスポート》（《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列舉的事例中，派遣的全部是官吏。即使加上 1973、1974 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等材料，管見認為派遣的仍然是官吏。

④ 由於食糧和衣物有區別，有必要待懸泉置漢簡全部公開後再行探討，但是，在已公開的簡中有一些簡，如：

出粟六升，以食守屬高博送自來烏孫小昆彌使，再食，東等，基本都是與官吏送迎有關的簡。

此外，有隨從也是考察材官、騎士身份的一個線索。秦漢時期官吏因公出差時攜帶隨從，在文獻和出土史料中有很多反映。^①這些隨從是官吏等採用雇用等方式配備的，還是作為一種勞役，由官府從民或奴隸、刑徒等中徵發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東漢中期崔寔《政論》的下述記載表明縣令一級的隨從是雇用來的：

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畝，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散見“私從者”，將兩者聯繫起來，可以推定從者多數是官吏們僱傭的。試舉一例：

羊皮裘二領
相私從者敦煌始昌里陰□年十五 羊皮袴二兩 □
革履二兩 79DMT14·13

因公出差等發生在和平時期，但文獻中也可以見到戰時指揮官攜帶從者和侍者的例子。西漢後期的上孫家寨漢簡^②記載有“私卒”：

□私卒什養數廿八 從馬數使私卒卅六 車□ 341 簡
□虜以尺籍廿二 私車騎數卅□ 093·350 簡
□私卒六（百）石至三百石率百石□ 144·172·180 簡
□將長及死不出營營私卒將吏皆耐為鬼新其□ 351 簡

前兩枚是記錄各種規定的標題，後二枚是規定的正文。這裏看到的“私卒”和“從馬”，在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下列簡中：

吏自佐、吏以上負從馬、守書私卒，令市取錢焉，皆惡（遽）。

① 前揭大庭脩《漢代の関所とパスポート》。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所出《傳食律》雖然不完整，但是其中有對因公出差者和隨行人員（從者等）供給食糧的規定，供給的多少根據爵位和官秩確定。

② 參見朱國炤《上孫家寨木簡初探》（《文物》1981年第2期）；李零《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簡性質小議》（《考古》1983年第6期）；陳公柔、徐元邦、曹延尊、格桑本《青海大通馬良墓出土漢簡的整理與研究》（《考古學集刊》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久保田宏次《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五號漢墓出土木簡の考察——特に漢代の部隊編成を中心として——》（《駿台史學》七四，1988）等。

作守書的私卒和從馬，整理小組解釋為管理各種文書的從卒和馱運行李的馬。飯島和俊氏將從馬解釋為馬子，是和私卒一起雇來的。^①無論如何，國家是允許官吏攜帶私從者、侍者之類的人上戰場的，并按官秩規定了攜帶的人數。這些侍者，除了負責雜務的需要外，也是官吏身份的象徵吧？

《漢書·趙充國傳》“吏士私從者”的記載，表明不僅是官吏，兵士也可以攜帶私從者。趙充國在所上屯田策中說：

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萬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

從文中有“應募”一詞可知，這裏的私從者不是“自願隨行者”即義勇、應募兵之類，而是“吏士”即官吏和兵士攜帶的隨從。佐藤達郎氏在編輯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食糧支出簡時，列舉了給私從者支付食糧的實例，《趙充國傳》也表明要給私從者提供食糧，^②亦可證。上文中攜帶私從者的兵士應是“淮陽、汝南步兵”，此文前一段明確記有“三河、潁川、沛、淮陽、汝南材官”，它和從內郡徵調材官不矛盾。《史記·大宛列傳》載李廣利遠征大宛時：

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和邊騎，歲余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

按照《趙充國傳》類推，“負私從者”不是原為囚徒材官的，而是身為官吏的邊騎即邊郡騎士的從者。

羅布淖爾漢簡中有一枚可能是兵士從者的簡：

士南陽郡涅陽石里宋鈞親 妻璣年卅

私從者同縣籍同里交上□□□ 羅布淖爾漢簡（34）

從開頭的“士”來看，宋鈞親可能是一種“兵士”。在羅布淖爾漢簡（30）中，有“應募士長陵仁里大夫孫尚”和從左馮翊來的“應募士”等。據此簡可知，宋鈞親從南陽郡攜帶了妻子和同縣籍的私從者。

① 飯島和俊：《秦漢交替期の雇用關係——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二二に見えるの“它县人來乘庸”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唐代史研究》三，2000。

② 佐藤達郎：《馬圈灣出土の食糧支給關係簡》，收入富谷至編《邊境出土木簡の研究》，朋友書店，2003。

敦煌懸泉置漢簡有一枚簡，但是否是兵士的從者還有疑問：

戊校右部中曲士皆後□……（A）

故私從者……（B）

II 0216②：547

戊校右部中曲士應是戊校尉指揮下部隊的兵士。B 面的私從者，和 A 面的中曲士有一定的關係，或許是後者的從者。第一節已經論及，史書中“士”、“卒”區別不明顯，出土史料中士、卒的區別比較明確，因此推測這裏的“士”可能是材官、騎士之類。由此可知材官、騎士等可和官吏一樣攜帶隨從。戊卒即使雇從者也應是代人雇用，還沒有發現戊卒與從者聯繫在一起的史料。

上文在以往利用的史料基礎上又增加了若干史料進行了討論。搞清楚了材官、騎士可以代理下級官吏職務，參與送迎外國使節，可能和官吏一樣允許攜帶隨從等。由此，應當認為材官、騎士是一種官吏、至少具有準官吏身份。

但是，材官、騎士和一般的官吏之間還有明顯的區別。那就是俸給的有無。居延漢簡出土了很多關於支付俸給的簡牘，但是，其中沒有支付材官、騎士俸給的例子。^①下節我就這一差別，談一談自己對材官、騎士身份的看法。

三、關於材官、騎士的身份

上一節通過相關史料的考察，證明材官、騎士在現實生活中享受着準官吏的待遇。但在俸給方面，他們是否和官吏一樣還有疑問。前揭史料大多是邊境出土的簡牘，雖然可以將其視為北邊騎士的特例，但是，內郡材官可以攜帶隨從却表明他們是被作為準官吏對待的。而且，正如第一節所述，北邊騎士這樣的分類過於粗疏，將西北三郡（六郡）和其他郡國加以區分的方法更為合理，很難看出漢簡中張掖、敦煌郡的騎士和內郡國的騎士在身份上有什么不同。對揭示“北邊騎士＝吏比者”的《史記·平準書》的記載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很難將前揭史料全都看成是北邊騎士的特例。

假如從其他方面尋求漢代存在準官吏的類似例子，可以列舉以三老為代表的父老和里正（里典、里魁）等。父老、里正等和地方官吏共同承擔著地方行政的職責，這可以從各

① 西村氏在前揭《漢代の騎士——士、卒の問題に關して——》論文中，列舉了騎士接受俸給的例子：

始元三年三月丙申朔□

士奉出入簿一編敢言之

由於是斷簡，因此是否是騎士的俸給出入簿還無法證明。

種史料得到證明。另外，記載各縣正規官吏的尹灣集簿漢墓簡牘《東海郡吏員簿》（木牘二）中沒有三老、里正，亦可證明這一點。試舉一例：

蘭陵吏員八十八人令一人秩千石丞一人秩四百石尉二人秩四百石官有秩一人令史六人獄史四人官嗇夫四人鄉嗇夫十三人游徼四人牢監一人尉史四人官佐八人鄉佐四人亭長卅五人凡八十八人

里耶秦代木牘雖然是秦代的史料，但卻有與任用里正有關的內容：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啟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啟陵
郵人欠除士五成里勾成成爲典勾爲郵人謁令
尉以從事敢言之

據此可知，任用里典采用的是“除”“爲”的方式。^①《史記·田叔列傳》褚少孫補記，任安年輕時移居武功縣不久，

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

由此可知，三老也是被“除”“爲”的。像這樣，任用時采用“除爲”的表現形式，被視爲準官吏而非正規官吏，等等，和我們見到的材官、騎士的特徵十分相像。鑒於這一點，材官、騎士的身份是否和父老、里正等所謂的“半官半民”十分接近呢？如果是這樣，材官、騎士就應該和普通徵兵來的人有一定的區別。

這個問題也和材官、騎士是否要求一定程度的財產有關。山田勝芳氏指出三老和里父老、里正等可能是在具有一定財產的人中選拔。^②假如材官、騎士和他們一樣也是“半官半民”身份，即使在財產方面同樣沒有明確的標準，但可能仍要經過一定的選拔。是否因爲作爲軍隊的主力，除了要求戰鬥技術外，和一般兵士相比負擔也重得多，所以才要求一定的財產作爲保障呢？^③代人雇用還無法得到確認，而攜帶隨從奔赴戰場，貧窮人家通常很難做到。由此可以確定材官、騎士在財產方面也 and 官吏大體相近。以往研究已經指出升任官

① 在這枚木牘中，郵人也是被“除”的，它表明即使在正規官吏之外，從事公務的人也有可能被國家除任。郵人是否與官吏相似還是問題。根據張家山漢簡《行書律》（264—277 簡），可知對他們採取一定的優惠措施，但是還不能說在職務上已是代理官吏。即使同樣是被“除”“爲”的從事公務的人中，應當認爲在公務內容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差異。

② 參見前揭山田勝芳《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之“徭役・兵役”。

③ 前揭重近啓樹著書中，雖然認爲材官、騎士是正卒而不是特別的兵士，但也認爲材官騎士可能有一定的財產標準。

吏者必須擁有一定的財產。^①能夠窺見材官、騎士財產情況的史料極少，^②但是，假如是從比一般人能承受更重負擔的財產擁有者中選拔，僅此一點就可以說他們和官吏相像。如果是從材官、騎士中任用官吏，那麼財產方面的標準問題也就不存在了。而且，由於半官半民和郡縣官府的關係比較密切，被任用為正規官吏的機會也應該隨之增多。

對材官、騎士給予官吏任用方面的優惠，可能就是因為考慮到他們比普通人承擔更重的負擔和軍事服役。以趙充國等為代表的那些出身隴西和北地郡的人，先任騎士，後以六郡良家子選拔為郎官，恰好證明對材官、騎士有地區性的優惠政策，給予他們最好的晉升機會，以作為徵課最沉重的軍役的補償。那些在退役時沒有被任用為正規官吏的材官、騎士，是否像《漢舊儀》說的那樣，可以依令選任為亭長，給予最低限度的機會呢？^③

結語

以上就材官、騎士的身份，對相關史料進行了考察。以往在“北邊騎士＝吏比者”的認識下，多將邊境出土的有關史料視為特例，但本文考察的結果發現，除了西北三（六）郡外，很難看出邊郡和內郡之間有什麼區別。本文以邊境出土史料反映的活動實態為中心進行再探討後認為，關於漢代兵制史焦點之一的材官、騎士的身份，大庭脩氏主張將其視為準官吏是妥當的。但是，以往研究沒有解決在俸給等方面他們和一般官吏的待遇是否相同，以及如果不同實際情況是怎樣的等問題。對此，本文注意到騎士和同樣被“除”“為”而不被視為正規官吏的里正、三老這樣的“半官半民”層有相似點，並從這一角度進行了探討。我認為材官、騎士在身份上也屬於“半官半民”，在財產方面可能也要經過一定的選拔，他們和普通的兵士不同，比起普通庶民他們被任用為正規官吏的機會更多。換言之，眾多的材官、騎士和有資格任官吏層可能是重疊的。這一優惠應該是對材官、騎士軍事負擔的補償。反之，能夠承受這一經濟和軍事負擔的人，被認為是有資格升遷官吏者也不是

① 以下列舉代表性研究。永田英正：《漢代の選舉と官僚階級》（《東方學報》京都四一，1970）；《礼忠簡と徐宗簡について》（《居延漢簡の研究》，同朋舍，1989）、《礼忠簡と徐宗簡研究の展開——居延新簡の発見を契機として——》（《史窓》五八，2001）；好並隆司：《漢代下層庶人の存在形態》（《秦漢帝國史研究》，未來社，1978）；渡邊信一郎：《古代中国における小農民經營の形成》（《中国古代社会論》，青木書店，1986）；山田勝芳：《中国古代の商人と市籍》（加賀博士退官紀念論集刊行委員會：《加賀博士退官紀念中国文史哲學論集》，講談社，1979）、前掲《秦漢財政收入の研究》第三章第四節“財產税と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富の意義”。

② 反映騎士財產的史料祇有居延漢簡的下列斷簡：

第廿三候長趙備責居延騎士常池馬錢九千五百移居延收責重●一事一封十一月壬申令史同奏封（35・4）
根據這一文書發信記錄，居延騎士借了將近一萬錢買馬。如果有償還能力那就是他的財產。不管有沒有償還能力，簡中所書賣馬之事間接證明多數騎士擁有私馬。此外，

〔聞來往者不知狀口起居今騎士皆出谷三石食寒吏寒吏不得便 EPT65・53A
可見貧窮的官吏是由騎士共同提供糧食的，騎士有這樣的餘力。

③ 《漢舊儀》載：“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就田里民（“民”疑為衍字），應令選為亭長。”

不可思議。這應該成為考察秦漢官僚制度和軍事之間關係時的重要線索。

過去對材官、騎士的身份難以判明，意見分歧，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樣是以半官半民——即不上不下——的形式存在的，對於利用同樣史料的研究者，或者從史料記述者的視角來看，他們呈現的面貌不同。

漢代存在“官—庶—奴婢”的身份層，有觀點認為官、庶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①說到漢代的身份制，官庶之間正如本文所看到的那樣，從里正和三老、進而里耶秦簡中的郵人、以及作為精兵的材官、騎士等官吏色彩很強的人，到僅僅是在勞役、役目上有區別的人，可以推想當時存在著廣泛的半官半民層。這一擁有龐大人群、和有資格任官吏層多相重疊的半官半民層，應該是官庶界限不明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始終圍繞材官、騎士的身份展開，對正卒、更卒的問題以及就役年限等漢代兵制的其他問題幾乎無法涉及。而且，史料上推測的地方也很多，因此非常希望能夠得到大方的指正。

本文使用的出土史料的版本如下：

居延漢簡：勞榦《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二十一，1957；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

敦煌漢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

郭煌縣泉置漢簡：胡平生、張德芳：《郭煌縣泉置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羅布淖爾漢簡：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大安影印本，1968。（1948年初出）

里耶秦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處、龍山縣文物管理所：《湖南龍山里耶戰國——秦代古城一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期。

睡虎地秦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

張家山漢簡：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1。

尹灣漢墓簡牘：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海縣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共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

上孫家寨漢簡：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孫家寨漢晉墓》，文物出版社，1993。

① 堀敏一：《中国における良賤身分制の成立過程》，收入前掲《中国古代の身分制——良と賤——》。

《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莧》 釋文補正^①

◎ [日] 伊藤敏雄、阿部幸信 主編

◎ 蔡玫 譯

前 言

1999年9月出版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嘉禾吏民田家莧》（以下略稱為《嘉禾吏民田家莧》），是長沙走馬樓吳簡研究最基本且重要的史料。但是，正如此書釋文注釋等已提出批評的那樣，在被分類為嘉禾吏民田家莧的大木簡中，多見計算之誤和記錄之誤。另外在利用此書之際，也有必要將釋文與圖版及實物對照，以重新認識釋文。由於量大且圖版又不清晰，所以基於圖版補正釋文有一定困難。儘管如此，本研究會的成員在利用此書時，還是發現了有必要對釋文進行補正之處。另外，在釋文注釋以外，也時見計算與記錄錯誤。

因此，本研究會著眼於以下幾點，檢查并改正了計算與記錄錯誤。

- ①確認畝數合計以及田類別、狀況類別畝數合計的計算。
- ②確認田類別、狀況類別畝數以及米、布、錢繳納額的計算。
- ③確認布、錢的米折繳額的換算率。
- ④數值不合時，以圖版確認。
- ⑤在可知前後數值時，以計算或逆算、書寫格式推算不明之處的數值。

① 譯自長沙吳簡研究會編《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2集，2004年7月發行。徐世虹審訂。

以上工作的結果，是對釋文注釋以外部分進行整理所得，是爲本“補正”。若能對長沙走馬樓吳簡研究的進展有所作用，則幸甚。本“補正”的最終整理，由伊藤敏雄、阿部幸信承擔。

凡例

1. 本“補正”的整理成果，是在《嘉禾吏民田家莧》釋文已注內容之外，以計算、書寫格式上的補正所得爲中心，兼收以圖版補正所得而成。另外注明釋文注釋和補正的不同之處。

2. 整理以年（按四年、五年、年次未詳之序）、簡號、行（該簡所處行數）、原文（釋文原文）、以圖版補正、以計算、書寫格式補正爲序。

3. 在“以圖版補正”中，不能確定的文字用〔〕表示，僅限於可能的情況下加“？”。

4. 在“以計算、書寫格式補正”中，對於不明之處的推測用〔〕表示，對欠缺部分的推測在（）內用〔〕表示。另外，應注釋或說明之處，則記在（）內。

5. 此外，對《嘉禾吏民田家莧》釋文做補正者，有高敏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莧〉釋文注釋補正——讀走馬樓簡牘札記之八》（《鄭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黎石生的《〈嘉禾吏民田家莧〉釋文補正》（《中國文物報》2002年10月18日）等公開發表的文章。有重複之處，請一并參照。

| | 年 | 簡號 | 行 | 原文 | 以圖版補正 | 以計算、書寫格式補正 |
|----|---|----|---|-----------------|-------|---|
| 1 | 4 | 4 | 1 | 嘉禾 | 嘉禾四年 | |
| 2 | 4 | 5 | 1 | 六寸六分…… | | 六寸六分。〔凡布七尺九寸二分〕…… |
| 3 | 4 | 8 | 1 | 凡爲…… | | 凡爲〔布五尺二寸八分〕 |
| 4 | 4 | 9 | 4 | 其米廿二斛七斗九升二合 | | 其米十八斛七斗九升二合 |
| 5 | 4 | 10 | 2 | 布一丈三尺七寸 | | 布一丈三尺八寸六分，（注〔二〕作一丈四尺五寸二分，誤。） |
| 6 | 4 | 10 | 3 | 錢 \square | | 錢 \square （〔七百七十七錢〕……） |
| 7 | 4 | 12 | 3 | 凡爲布…… \square | | 凡爲布〔一匹一丈三尺六寸六分……錢二千五百八十七……〕 |
| 8 | 4 | 13 | 1 | 凡 \square 畝 | | 凡〔十五〕畝 |
| 9 | 4 | 13 | 2 | 潘有…… | | 潘有……〔錢五百五十五〕…… |
| 10 | 4 | 14 | 3 | 錢九百廿七 | | 錢八百八十八 |
| 11 | 4 | 15 | 2 | 布五尺五寸 | | 布五尺二寸八分 |
| 12 | 4 | 15 | 2 | 錢二百九十 | | 錢二百九十六 |
| 13 | 4 | 22 | 2 | 布九 \square | | 布九（〔尺二寸四分……錢五百一十八錢〕……） |
| 14 | 4 | 25 | 3 | 凡爲…… | | 凡爲〔錢八百一十四錢〕 |
| 15 | 4 | 30 | 1 | 布三丈二尺 | | 布一丈一尺二寸二分 |
| 16 | 4 | 30 | 2 | 錢…… | | 錢〔六百二十九錢〕…… |
| 17 | 4 | 32 | 4 | 米廿一斛七升三合。 | | 米廿一斛三升四合。 |
| 18 | 4 | 34 | 1 | ……丈六寸六分。 | | ……〔一〕丈九尺八寸。 |
| 19 | 4 | 34 | 2 | 凡爲…… | | 凡爲〔錢一千一百一十錢〕 |
| 20 | 4 | 42 | 2 | 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 | | （注〔一〕作“斛加五升”，是以“斛加七升三合”計算的。另外，“（參見四・三三號簡）”爲“（參見四・三二號簡）”之誤。） |
| 21 | 4 | 52 | 2 | 布一丈七尺六寸四分 | | 布一丈九尺一寸四分 |
| 22 | 4 | 52 | 2 | 錢九百六十四錢 | | 錢一千七十三錢 |
| 23 | 4 | 53 | 3 | 布二匹三丈九寸二分 | | 布二匹三丈九尺二寸 |
| 24 | 4 | 55 | 3 | ……淮米 | | ……〔爲凡布三丈三尺二寸〕，淮米 |
| 25 | 4 | 56 | 3 | 布一匹七尺二寸八分 | | 布一匹六尺六寸二分，（注〔三〕作“布一匹六尺六十二分”，但〔布一匹六尺六寸二分〕爲正。） |
| 26 | 4 | 60 | 1 | 凡十三畝 | | 凡七畝。（注〔一〕也爲七畝。圖版爲十三畝。） |

| | | | | | | |
|----|---|-----|---|-------------------------|---------------|---|
| 27 | 4 | 73 | 2 | 倉吏……八尺四寸 | | 倉吏……〔布一匹〕八尺四寸 |
| 28 | 4 | 78 | 1 | 其卅五畝旱 | | 其卅五畝旱 |
| 29 | 4 | 78 | 3 | 布二匹 | | 布一匹三丈九尺七寸，（以卅五畝計算。以卅五畝計算則布一匹三丈一尺。） |
| 30 | 4 | 78 | 4 | 錢三千四百一十 | | 錢三千四百一十五，（用卅五畝計算。用卅五畝計算則錢三千卅五。） |
| 31 | 4 | 79 | 3 | 一匹…… | | 一匹〔一丈九尺八寸〕…… |
| 32 | 4 | 81 | 3 | 布一匹一丈九尺 | | 布一匹一丈九尺一寸四分 |
| 33 | 4 | 83 | 1 | 凡……畝，皆二年常限。 其口畝旱 | | 凡〔五十七〕畝，皆二年常限。其〔卅〕畝旱 |
| 34 | 4 | 90 | 2 | 爲米廿七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七斛二斗 | | 爲米廿七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七斛六斗 |
| 35 | 4 | 91 | 3 | 錢一千卅六錢 | | 錢一千卅六錢，（注〔二〕爲“錢一千三百六十九錢”，原文爲正。） |
| 36 | 4 | 98 | 2 | ……□ | | ……□（〔凡爲錢一千二百廿一錢〕……） |
| 37 | 4 | 99 | 4 | 錢八百七十三錢 | | 錢八百卅三錢 |
| 38 | 4 | 107 | 3 | 布二丈一尺四寸八分 | 布二丈〔二？〕尺四寸八分， | 布二丈二尺四寸八分 |
| 39 | 4 | 110 | 4 | 錢一千五百卅六錢 | 錢一千五百〔廿？〕六錢 | 錢一千五百廿六錢 |
| 40 | 4 | 112 | 2 | 布……七百六十六錢 | | 布一丈七尺二寸……八百八十錢 |
| 41 | 4 | 113 | 1 | 畝…… | | 畝……〔凡爲布一丈七尺八寸二分……凡爲錢九百九十九錢〕…… |
| 42 | 4 | 114 | 5 | 布二匹三丈二尺五寸一分 | | 布二匹一丈五尺六寸八分，（以旱田十八畝計算。注〔二〕作以旱田五十八畝，則布三匹二尺八分。） |
| 43 | 4 | 114 | 6 | 錢五千三百廿四錢 | | 錢四千一十六錢，（以旱田十八畝計算。注〔三〕作以旱田五十八畝，則錢五千四百九十六錢。） |
| 44 | 4 | 122 | 2 | 畝收錢…… | | 畝收錢〔卅七，凡爲錢七百卅錢〕…… |
| 45 | 4 | 124 | 5 | 布三匹□□ | | 布三匹〔四〕□（〔尺五寸八分……凡爲錢五千九百卅一錢〕……） |
| 46 | 4 | 127 | 2 | 庫吏…… | | 庫吏……〔凡爲錢九百廿五錢〕…… |
| 47 | 4 | 130 | 1 | ……畝。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凡爲布七尺七寸 | | （七尺七寸以畝收布六寸六分除不盡，原畝數不明。即使用概數計算也不合。） |

| | | | | | |
|----|---|-----|---|----------------|---|
| 48 | 4 | 133 | 3 | 凡爲布…… | 凡爲布〔一丈六尺五寸六分〕…… |
| 49 | 4 | 134 | 1 | 凡十三畝 | 凡十五畝 |
| 50 | 4 | 141 | 2 | 布八尺…… | 布八尺〔五寸八分〕…… |
| 51 | 4 | 147 | 1 | 凡□□畝 | 凡〔廿四〕畝 |
| 52 | 4 | 147 | 3 | 爲布三丈三尺…… | 爲布二丈三尺八寸八分，（注〔二〕作“布二丈三尺八分”，不正確。） |
| 53 | 4 | 154 | 1 | 田……皆二年常限。 | 田……〔凡卅四畝〕，皆二年常限。 |
| 54 | 4 | 154 | 1 | 布二丈二尺四寸 | 布二丈二尺四寸四分 |
| 55 | 4 | 155 | 1 | 佃……畝 | 佃……〔凡七十三〕畝 |
| 56 | 4 | 162 | 3 | 布二丈□尺…… | 布二丈〔七〕尺〔二寸四分〕…… |
| 57 | 4 | 171 | 4 | 錢一千二百錢 | 錢一千二百五錢，（注〔二〕作“一千三百五十三錢”，誤。） |
| 58 | 4 | 172 | 4 | 錢七千四百八十二錢 | 錢六千一百二十二錢，（注〔二〕作“一千六百二十二錢”，誤。） |
| 59 | 4 | 178 | 3 | 布三丈一尺七寸八分 | 布一匹一尺七寸八分，（注〔一〕作“一匹一尺七寸八分”，誤。） |
| 60 | 4 | 180 | 3 | 布二匹三尺一寸八分 | 布二匹二尺三寸二分 |
| 61 | 4 | 182 | 3 | 布一匹三丈一寸四分 | 布一匹一丈二寸四分，（注〔二〕作“布一匹二丈二寸四分”，誤。） |
| 62 | 4 | 184 | 3 | 布一丈七尺一寸 | 布一丈七尺八寸八分 |
| 63 | 4 | 187 | 2 | 凡爲錢…… | 凡爲錢〔一百一十一錢〕…… |
| 64 | 4 | 188 | 2 | 爲布一丈…… | 爲布一丈〔九尺八寸〕…… |
| 65 | 4 | 188 | 2 | 凡爲錢…… | 凡爲錢〔一千一百一十錢〕…… |
| 66 | 4 | 210 | 2 | 布二丈四尺五寸二分 | 布二丈三尺七寸六分，（注〔二〕作“二丈七寸六分”，誤。） |
| 67 | 4 | 211 | 1 | 布一丈四尺 | 布一丈三尺八寸八分 |
| 68 | 4 | 211 | 2 | 錢九百九十五錢 | 錢七百七十七錢 |
| 69 | 4 | 217 | 4 | 收錢□□，其熟田畝收錢□□。 | 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
| 70 | 4 | 221 | 2 | 爲米卅斛五升。 | （以定收三十三畝九十步計算則合，若如注〔二〕之定收額則不合。圖版不清楚） |
| 71 | 4 | 223 | 4 | 錢二千五百冊 | 錢〔三？〕千五百冊（圖版不清楚） 錢三千五百冊九（注〔二〕也作“錢三千五百四十九錢”。） |
| 72 | 4 | 241 | 1 | 畝收米四斗五升…… | 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 |
| 73 | 4 | 241 | 2 | 其米……斛六斗…… | 其米〔十三〕斛六斗〔八升〕 |
| 74 | 4 | 248 | 2 | 其米…… | 其米〔二斛四斗〕 |

| | | | | | | |
|-----|---|-----|---|-------------|---------|---------------------------------|
| 75 | 4 | 263 | 5 | 凡爲錢…… | | 凡爲錢〔四千一百三十六〕 |
| 76 | 4 | 275 | 1 | 凡爲布三尺二寸 | | 凡爲布三尺三寸 |
| 77 | 4 | 286 | 3 | 錢六百六十二錢 | | 錢九百六十二錢 |
| 78 | 4 | 297 | 1 | □ | | □（……〔爲錢三百七十〕……） |
| 79 | 4 | 299 | 3 | □ | | □（……〔爲布一丈六寸二分〕……〔爲錢四百六十九〕……） |
| 80 | 4 | 302 | 1 | 布二尺八寸四分 | | 布二尺六寸四分 |
| 81 | 4 | 302 | 2 | 凡爲錢 | | 凡爲錢□（〔一百四十八〕……） |
| 82 | 4 | 304 | 1 | ……畝 | | ……〔凡八〕畝 |
| 83 | 4 | 308 | 1 | ……定收五畝 | | 〔其十四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五畝 |
| 84 | 4 | 308 | 3 | 庫吏…… | | 庫吏……〔凡爲錢八百六十八錢〕，…… |
| 85 | 4 | 311 | 2 | ……三尺九寸 | | ……〔一丈〕三尺九寸 |
| 86 | 4 | 320 | 4 | 其熟田□ | | 其熟田□（……〔凡爲錢三千三十七錢〕……） |
| 87 | 4 | 323 | 2 | 爲米十三斛。 | | 爲米十三斛二斗。（或脫“二斗”？） |
| 88 | 4 | 335 | 4 | □ | | □（……〔凡爲錢一千一百三十二錢〕……） |
| 89 | 4 | 346 | 2 | 米十九二斗。 | | 米十八斛。（注〔一〕作“十九”下脫“斛”字，但計算上也不同。） |
| 90 | 4 | 359 | 2 | 布□丈三尺二寸 | | 布〔一〕丈三尺二寸 |
| 91 | 4 | 369 | 1 | 其廿□畝旱敗 | | 其廿〔七〕畝旱敗 |
| 92 | 4 | 369 | 3 | 布二丈……□ | | 布二丈〔五尺八寸二分〕……□ |
| 93 | 4 | 371 | 3 | 布一丈三尺…… | | 布一丈三尺〔三寸〕…… |
| 94 | 4 | 378 | 2 | 米廿七斛……。 | | 米廿七斛〔六斗〕。 |
| 95 | 4 | 383 | 3 | 布三丈五〔尺〕□〔寸〕 | | 布三丈五〔尺三寸〕 |
| 96 | 4 | 385 | 1 | 皆…… | | 皆……〔定收十畝，爲米十斛二斗〕…… |
| 97 | 4 | 388 | 2 | 凡〔爲〕□ | | 凡〔爲〕□（〔錢一百八十五錢〕……） |
| 98 | 4 | 402 | 3 | 布三丈五尺三寸 | | 布二丈五尺三寸 |
| 99 | 4 | 402 | 4 | 錢九百五十錢 | | 錢九百五十五錢 |
| 100 | 4 | 410 | 4 | 准米四斗五合 | 准米□斗五合， | |
| 101 | 4 | 411 | 2 | ……畝收米 | | ……〔定收卅畝〕，畝收米 |
| 102 | 4 | 418 | 6 | 准入米□斛九斗四升 | | 准入米〔三？〕斛九斗四升 |
| 103 | 4 | 419 | 1 | 其……定收 | | 其〔五十畝旱〕……定收 |
| 104 | 4 | 420 | 2 | ……尺四寸 | | ……〔三〕尺三寸 |
| 105 | 4 | 422 | 4 | 凡爲錢…… | | 凡爲錢〔一千二百一十錢〕…… |
| 106 | 4 | 437 | 1 | 凡廿三畝 | | 凡廿二畝 |

| | | | | | |
|-----|---|-----|---|-------------|--|
| 107 | 4 | 459 | 2 | 定收……其米六斛 | 定收〔五畝，爲米六斛〕……其米六斛 |
| 108 | 4 | 463 | 4 | 合十九斛一斗五升。 | 合十九斛一斗五升二合。 |
| 109 | 4 | 469 | 1 | 凡九十畝 | 凡八十畝 |
| 110 | 4 | 471 | 1 | 其……六寸六分。 | 其〔卅六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 |
| 111 | 4 | 471 | 2 | 定收…… | 定收〔六畝，畝收米一斛二斗〕 |
| 112 | 4 | 471 | 4 | 布一匹二丈二尺六寸八分 | 布一匹二丈三尺六寸八分 |
| 113 | 4 | 472 | 4 |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
| 114 | 4 | 477 | 3 | 布二匹五尺五寸 | 布一匹三丈九尺五寸，（注〔一〕作“布七丈九尺五寸”。） |
| 115 | 4 | 485 | 1 | 凡□□畝 | 凡〔卅八〕畝 |
| 116 | 4 | 487 | 1 | 其□畝……定收 | 其〔廿〕畝〔旱〕……定收 |
| 117 | 4 | 487 | 3 | 凡爲錢…… | 凡爲錢〔一千九十錢〕…… |
| 118 | 4 | 492 | 2 | 布一匹一丈二尺一寸 | 布一匹一丈七尺四寸二分 |
| 119 | 4 | 493 | 1 | 凡□□□皆二年常限。 | 凡〔七十九畝〕，皆二年常限。 |
| 120 | 4 | 532 | 1 | □四畝。 | 〔凡〕四畝。 |
| 121 | 4 | 542 | 2 | ……布□丈□尺□寸□分 | ……〔凡爲〕布〔二〕丈〔四〕尺〔五〕寸〔四〕分 |
| 122 | 4 | 542 | 3 | 錢一千一百五十錢 | 錢一千一百廿三錢 |
| 123 | 4 | 545 | 2 | 布一丈四尺五寸□分 | 布一丈四尺五寸〔二〕分 |
| 124 | 4 | 553 | 3 | 錢一千三百五十八錢 | （“五十八錢”之後，脫注〔二〕符號。） |
| 125 | 4 | 557 | 3 | 布一匹七尺五寸五分 | 布一匹一丈二尺五寸八分，（注〔一〕爲“布一匹一丈二尺五寸五分”，不正確。） |
| 126 | 4 | 574 | 1 | 凡……限。 | 凡〔卅五畝，皆二年常〕限。 |
| 127 | 4 | 574 | 1 | 其……畝收 | 其〔卅六畝旱〕，畝收 |
| 128 | 4 | 574 | 1 | ……畝收米一斛二斗 | 〔定收九畝〕，畝收米一斛二斗 |
| 129 | 4 | 576 | | | （以旱田卅畝得布十九尺八寸、錢一千一百一十錢，則以布合計……丈三尺八寸，錢合計一千七百五十六錢推測，定收的畝數是一位數。定收二畝時，布合計二丈三尺八寸，七畝時則爲三丈三尺八寸。但是不論定收畝數，錢合計不爲一千七百五十六錢。錢計算上明顯有誤。布計算正確於否，不明。） |
| 130 | 4 | 577 | 2 | 凡爲布……六分 | 凡爲布〔八尺五寸〕八分 |
| 131 | 4 | 579 | 2 | 凡爲錢二百…… | 凡爲錢二百〔廿二錢〕…… |
| 132 | 4 | 583 | 4 | 其旱田…… |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
| 133 | 4 | 583 | 4 | 其熟田畝…… | 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爲錢四千四百六十 |

| | | | | | |
|-----|---|-----|---|--------------|--|
| | | | | | 八錢] |
| 134 | 4 | 587 | 1 | 合九十二畝 | 合九十一畝 |
| 135 | 4 | 587 | 4 | 米廿四斛一斗二升六合， | 米廿三斛九斗四升六合 |
| 136 | 4 | 588 | 1 | 其一畝旱……六寸六分。 | 其一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 |
| 137 | 4 | 588 | 4 | 錢…… | 錢[四百五十七錢]…… |
| 138 | 4 | 599 | 3 | ☐ | ☐(……[凡爲布五尺九寸八分……凡爲錢二百五十一錢]……) |
| 139 | 4 | 610 | 2 | 凡爲布一匹三丈口尺口寸 | 凡爲布一匹三丈[五]尺[八]寸 |
| 140 | 4 | 610 | 4 | 錢口口 | 錢[卅七] |
| 141 | 4 | 613 | 1 | 布一匹二丈二尺 | 布一匹一丈二尺八寸，(注[一]作“布一丈二尺八分”，末尾的“分”爲“寸”之誤。) |
| 142 | 4 | 616 | 2 | 凡爲錢三百卅☐ | 凡爲錢三百卅☐([三錢]……) |
| 143 | 4 | 619 | 1 | ……旱畝收 | ……[凡一百畝，皆二年常限。悉]旱，畝收 |
| 144 | 4 | 620 | 1 | ☐口畝 | ☐(……[廿])[五]畝 |
| 145 | 4 | 622 | 1 | ……畝收布 | [悉旱?]，畝收布 |
| 146 | 4 | 624 | 1 | ☐……皆二年常限。☐畝收 | ☐(……[凡廿四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二畝旱)，畝收 |
| 147 | 4 | 624 | 3 | 凡爲錢九百五十二錢 | 凡爲錢九百五十四錢 |
| 148 | 4 | 626 | 1 | ……凡爲布 | ……[其廿一畝旱]，……凡爲布 |
| 149 | 4 | 626 | 2 | 錢口百七十七錢 | 錢[七]百七十七錢 |
| 150 | 4 | 627 | 1 | ☐……一尺二寸 | ☐(……[凡廿七畝]……[其廿畝旱]……[定收七畝，爲米八斛四斗]……[凡爲布二丈])七尺二寸， |
| 151 | 4 | 628 | 1 | ☐……凡爲布一匹二丈 | ☐(……[凡卅?畝]……[定收卅?畝]……[爲米卅六?斛]，)……凡爲布一匹二丈 |
| 152 | 4 | 628 | 2 | 凡爲錢…… | 凡爲錢[二千一百?錢] |
| 153 | 4 | 629 | 1 | ……口畝。悉旱 | ……[凡廿]畝。悉旱 |
| 154 | 4 | 629 | 2 | 凡二丈二尺…… | 凡一丈三尺二寸…… |
| 155 | 4 | 633 | 4 | 十。…… | 十。[凡爲錢四千二百錢]…… |
| 156 | 4 | 634 | 1 | ……悉旱 | ……[凡廿畝，皆二年常限]，悉旱 |
| 157 | 4 | 634 | 1 | 凡爲布二丈三尺三寸 | 凡爲布一丈三尺二寸 |
| 158 | 4 | 649 | 3 | 布一匹二丈六尺四寸四分 | 布一匹二丈四寸四分 |
| 159 | 4 | 649 | 4 | 錢四千五百 | 錢二千五百五十八 |
| 160 | 4 | 651 | 1 | 布一丈九尺五寸 | 布一丈六尺五寸 |

| | | | | | | |
|-----|---|-----|---|-------------------------|----------|---|
| 161 | 4 | 661 | 2 | 布三丈三尺口寸 | | 布三丈五尺七寸六分 |
| 162 | 4 | 693 | 2 | 定收……布一丈九尺一寸 | | 定收〔三畝，爲米三斛六斗……凡爲〕布一丈九尺二寸 |
| 163 | 5 | 17 | 1 | 男子□□ | 男子□〔簿？〕 | |
| 164 | 5 | 43 | 1 | 其十三畝旱敗 | | 其十三畝一百廿步旱敗 |
| 165 | 5 | 54 | 2 | 米□斛四斗 | | 米〔八〕斛四斗 |
| 166 | 5 | 56 | 1 | 其……其□畝餘力田，爲米……斛□斗。 | | 其〔十四畝旱敗不收布〕。其〔五〕畝餘力田，爲米〔二斛〕。 |
| 167 | 5 | 60 | 1 | ……其廿一畝二年常限。其□□畝旱敗不收布……凡 | | ……〔凡廿六畝〕，其廿一畝二年常限。其十七畝旱敗不收布。〔其五畝餘力田，爲米二斛。定收四畝，爲米四斛八斗〕。凡 |
| 168 | 5 | 72 | 1 | 其□畝旱敗 | | 其〔八〕畝旱敗 |
| 169 | 5 | 138 | 1 | ……不收錢米布。 | | 〔旱悉〕不收錢米布。 |
| 170 | 5 | 144 | 1 | 其三畝旱不收布 | | 其四畝旱不收布 |
| 171 | 5 | 173 | 1 | 定收八畝，爲米九斛…… | | 定收八畝，爲米九斛〔六斗〕。（“定收”前脫“其廿畝旱不收布。”。） |
| 172 | 5 | 180 | 1 | 其卅□畝不收布。 | | 其卅〔六〕畝不收布。（注〔一〕指出脫“旱”字。） |
| 173 | 5 | 192 | 1 | 其七畝旱不收□。定收……斛 | | 其七畝旱不收〔布〕。定收〔廿畝，爲米廿四〕斛， |
| 174 | 5 | 226 | 1 | 其三畝百□□步 | | 其三畝百〔八十〕步 |
| 175 | 5 | 241 | 3 | 凡爲…… | | 凡爲〔布三丈八尺〕 |
| 176 | 5 | 257 | 4 | 五年十一月六日 | 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 |
| 177 | 5 | 286 | 3 | 凡爲錢一百冊 | | 凡爲錢二百冊 |
| 178 | 5 | 290 | 1 | 定收一畝 | | （“定收”前脫“其八畝旱不收布。”。） |
| 179 | 5 | 294 | 1 | 定收八畝 | | （“定收”前脫“其四畝一百廿畝旱不收布。”。） |
| 180 | 5 | 302 | 1 | 其……定收十六畝 | | 其〔一畝旱敗不收布〕，定收十六畝， |
| 181 | 5 | 311 | 1 | 凡八十二畝 | | 凡七十二畝，（注〔三〕指出，合計常限田、餘力田的七十二畝與總面積八十二畝不合，應該修改總面積。） |
| 182 | 5 | 320 | 1 | 其卅畝旱敗 | | 其卅畝旱敗 |
| 183 | 5 | 334 | 1 | 皆二年常……畝一百廿步旱不收布……畝一百廿步 | | 皆二年常〔限。其十四〕畝一百廿步旱不收布。〔定收一〕畝一百廿步 |

| | | | | | | |
|-----|---|-----|---|------------------------|--------------|--|
| 184 | 5 | 341 | 1 | 其七畝旱不收布。 | | 其廿畝旱不收布。 |
| 185 | 5 | 356 | 1 | 其卅一畝旱敗 | | 其卅一畝旱敗 |
| 186 | 5 | 399 | 2 | 其……凡爲米廿斛 | | 其〔十畝餘力田，爲米四斛。定收十五畝，爲米十八斛〕。凡爲米廿二斛 |
| 187 | 5 | 401 | 1 | 其□□畝旱敗 | | 其〔十九〕畝旱敗 |
| 188 | 5 | 405 | 1 | 定收…… | | 定收〔一百步〕…… |
| 189 | 5 | 409 | 1 | 其□畝旱不收布。定收…… | | 其〔九〕畝旱不收布。定收〔十一畝一百廿步，爲米十三斛八斗〕…… |
| 190 | 5 | 409 | 3 | 畝收錢八十 | | 畝收錢八十，[凡爲錢九百廿]……) |
| 191 | 5 | 414 | 1 | 凡廿□畝 | | 凡廿〔八〕畝 |
| 192 | 5 | 422 | 1 | 其十四畝旱敗 | | 其十四畝一百廿步旱敗 |
| 193 | 5 | 423 | 1 | 常限……畝 | | 常限。〔其廿八畝一百廿步旱敗不收布。定收十畝〕，畝 |
| 194 | 5 | 425 | 1 | 其十二畝皆二年常限。 | | 其十二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 |
| 195 | 5 | 431 | 3 | 准入米二斛五斗六升 | 准入米〔一？〕斛五斗六升 | |
| 196 | 5 | 466 | 1 | 定收□□畝 | | 定收〔卅三〕畝 |
| 197 | 5 | 466 | 2 | 畝收步二尺……四升 | | 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七斛〕四升， |
| 198 | 5 | 474 | 1 | 皆二年……敗不收 | | 皆二年〔常限。旱〕敗不收 |
| 199 | 5 | 497 | 4 | 凡爲錢六百卅 | | 凡爲錢六百卅 |
| 200 | 5 | 507 | 2 | 七畝爲米二斛八斗。 | | （“七畝”後脫“餘力田，”。） |
| 201 | 5 | 517 | 1 | 其七畝一十步 | | 其七畝五十八步 |
| 202 | 5 | 528 | 1 | 其…… | | 其〔十畝旱敗不收布〕。 |
| 203 | 5 | 549 | 1 | 其……定收卅七畝 | | 其〔八畝一百廿步旱敗不收布〕。定收卅七畝 |
| 204 | 5 | 549 | 1 | 其米五十六斛□□ | | 其米五十六斛〔四斗〕 |
| 205 | 5 | 556 | 2 | 寂收卅八畝一百廿步 | | 定收卅八畝一百廿步 |
| 206 | 5 | 563 | 3 | □□……四斛…… | | 〔收錢〕。〔其熟田畝收錢八十，凡爲錢六百四十錢〕……四斛…… |
| 207 | 5 | 584 | 4 | 錢一千八百卅 | | 錢一千八百卅 |
| 208 | 5 | 591 | 3 | 米六十三斛 | | 米六十三斛二斗 |
| 209 | 5 | 603 | 1 | 凡廿三畝 | | 凡廿二畝 |
| 210 | 5 | 606 | 1 | 其四畝旱 | | 其十二畝旱 |
| 211 | 5 | 624 | 1 | 凡……其六畝旱不收布。定收……爲米一七斛…… | | 凡〔廿畝一百廿步〕。其六畝旱不收布。定收〔十四畝一百廿步〕爲米十七斛〔四斗〕…… |
| 212 | 5 | 624 | 2 | 收錢八十…… | | 收錢八十，〔凡爲錢一千一百六十錢〕…… |

| | | | | | | |
|-----|---|-----|---|-------------------------------------|-----------------|--|
| 213 | 5 | 629 | 1 | 一頃一畝 | | 一頃一畝一百廿步 |
| 214 | 5 | 634 | 1 | 凡廿三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十六畝旱不收布。 | | [凡廿一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十六畝旱不收布。]或[凡廿三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十八畝旱不收布。] |
| 215 | 5 | 639 | 1 | 凡卅七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卅一畝旱不收布。 | | 凡卅七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卅一畝一百廿步旱不收布。(旱敗面積應為“卅一畝一百廿步”。) |
| 216 | 5 | 645 | 2 | 定收十六畝一百廿步，為米十八斛六斗 | | 定收十五畝一百廿步，為米十八斛六斗，(注[一]為“為米十九斛六斗”，但若“定收十六斛一百廿步”， ^① 則“為米十九斛八斗”；若“定收十五畝一百廿步”，則“為米十八斛六斗”方合計算。) |
| 217 | 5 | 652 | 1 | 凡廿一畝一百步 | | 凡廿一畝一百廿步 |
| 218 | 5 | 664 | 1 | 其……定收卅畝…… | | 其[十七畝二百廿步旱敗不收布]。定收卅畝[一百步] |
| 219 | 5 | 666 | 1 | 皆二年常限 | | (“皆”前脫“其五十三畝一百廿步”。) |
| 220 | 5 | 676 | 2 | 為米廿三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米廿…… | | 為米廿三斛四斗四升，畝收布二尺。其米廿[三斛四斗四升，]……(州吏以畝收租米五斗八升五合計算。若非租米，則為[米卅八斛]。) |
| 221 | 5 | 677 | 3 | 凡為布…… | | 凡為布[一丈七尺，准入米]…… |
| 222 | 5 | 678 | 1 | 定收三畝二百一十步，為米四斛二斗五升，～凡為布一匹八尺，～凡為錢二百冊 | | (若“定收三畝二百一十步”，則米如注[二]，“為米四斛六斗五升”，布、錢則“凡為布七尺七寸五分”、“凡為錢三百一十”。若“為米四斛二斗五升”，則“定收三畝一百卅步”；若“凡為錢二百冊”，則“定收三畝”。) |
| 223 | 5 | 687 | 1 | 其六畝一百口步 | | 其六畝一百[廿]步 |
| 224 | 5 | 692 | 3 | 准入米一斛口斗口升 | 准入米一斛[六?]斗[二?]升 | |
| 225 | 5 | 695 | 2 | 定收十九畝百廿步，為米廿三斛四斗。 | | 定收卅畝，為米廿三斛四斗。(以租田定收卅畝計算，則米廿三斛四斗，其米廿三斛四斗除以一斗二升，則為十九畝百廿步。) |
| 226 | 5 | 695 | 3 | 凡為布口匹二丈一尺 | | 凡為布[一]匹一丈一尺 |
| 227 | 5 | 699 | 1 | ……定收 | | [其七十步旱敗不收布]，定收 |

① “斛”當為“亩”之誤植——譯注。

| | | | | | | |
|-----|---|-----|---|--------------------------|----------|---|
| 228 | 5 | 703 | 2 | 定收廿三畝一百口十步 | | 定收廿三畝一百〔八〕十步 |
| 229 | 5 | 708 | 1 | 凡八畝百廿畝，皆二年常限。其三畝旱敗 | | “凡九畝百廿畝，皆二年常限。其三畝旱敗”或“凡八畝百廿畝，皆二年常限。其二畝旱敗” |
| 230 | 5 | 723 | 1 | 定收卅五畝……六斛 | | 定收五畝，〔爲米〕六斛 |
| 231 | 5 | 725 | 1 | ……限 | | 〔凡十三畝，皆二年常〕限 |
| 232 | 5 | 739 | 1 | 凡卅四畝，皆二年常限。其五畝旱不收布。定收廿七畝 | | “凡卅四畝，皆二年常限。其七畝旱不收布。定收廿七畝，”或“凡廿二畝，皆二年常限。其五畝旱不收布。定收廿七畝，” |
| 233 | 5 | 748 | 1 | 其廿四畝旱敗不收布。 | | 其卅四畝旱敗不收布。 |
| 234 | 5 | 751 | 1 | 其十六畝旱敗 | | 其十九畝旱敗 |
| 235 | 5 | 792 | 1 | 畝……其……□□凡爲米三斛六斗，收布□□。 | | 畝〔收米一斛二斗〕，凡爲米三斛六斗，收布〔二尺〕。 |
| 236 | 5 | 807 | 1 | 其十三畝卅步旱敗 | | 其十三畝一百七十步旱敗 |
| 237 | 5 | 815 | 1 | 其十八畝八十步旱敗 | | 其十八畝一百八十步旱敗 |
| 238 | 5 | 815 | 2 | 定收卅三畝百九十步餘力，爲米十斛七斗 | | 定收卅三畝九十步餘力田，爲米十三斛三斗五升 |
| 239 | 5 | 816 | 1 | 凡卅五畝五十步 | | 凡卅六畝五十步 |
| 240 | 5 | 819 | 4 | 准入米□升 | 准入米〔三？〕升 | |
| 241 | 5 | 821 | 1 | ……佃田 | 〔悉？羨〕佃田 | |
| 242 | 5 | 826 | 2 | 凡爲二匹一丈二尺 | | 凡爲布一匹四尺 |
| 243 | 5 | 827 | 3 | 爲布一丈二尺 | | 爲布一丈 |
| 244 | 5 | 839 | 1 | ……定收十七畝 | | 〔其十四畝旱敗不收布〕，定收十七畝 |
| 245 | 5 | 841 | 1 | ……定收五十一畝 | | 〔其十二畝旱敗不收布〕，定收五十一畝 |
| 246 | 5 | 856 | 1 | 其十二畝二年常限。 | | 其廿二畝二年常限。 |
| 247 | 5 | 866 | 1 | 凡五畝。其三畝二年常限。 | | 凡五畝。其四畝二年常限。（注〔一〕認爲常限田、餘力田合計四畝與總數不合，但若常限四畝則與總數符合。） |
| 248 | 5 | 868 | 1 | 其卅三畝旱不收布。 | | 其卅三畝旱不收布。 |
| 249 | 5 | 884 | 1 | 其……不收布。 | | 其〔三畝旱敗〕不收布。 |
| 250 | 5 | 900 | 1 | 凡一頃廿二畝，皆二年常限。其十二畝旱 | | “凡一頃廿三畝，皆二年常限。其十二畝旱”或“凡一頃廿二畝，皆二年常限。其十一畝旱” |
| 251 | 5 | 904 | 1 | 凡廿九畝 | | 凡廿八畝 |
| 252 | 5 | 912 | 1 | 凡□□畝 | | 凡〔六十八〕畝 |

| | | | | | |
|-----|---|------|---|---------------------------|---|
| 253 | 5 | 915 | 2 | 收六十畝……□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米九十五斛六斗 | 收六十三畝，[爲米七十五]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米七十五斛六斗 |
| 254 | 5 | 937 | 1 | 定收九畝 | (“定收”前脫“其二畝旱敗不收布”。) |
| 255 | 5 | 939 | 1 | 凡廿畝 | 凡廿畝八十步 |
| 256 | 5 | 939 | 4 | 錢八百 | 錢四百八十 |
| 257 | 5 | 941 | 2 | 爲米十五斛五升 | 爲米十五斛 |
| 258 | 5 | 943 | 1 | 凡十二畝一百六十四步，皆二年常限。其四畝卅九步 | “凡十二畝卅九步，皆二年常限。其四畝卅九步”或“凡十二畝一百六十四步，皆二年常限。其四畝一百六十四步” |
| 259 | 5 | 970 | 1 | 其二畝一百……旱……定收……斛六斗，畝收布□□ | 其二畝一百[廿步]旱[敗不收布]。定收[五畝一百廿步，爲米六]斛六斗，畝收布[二尺] |
| 260 | 5 | 974 | 1 | 其十九畝旱敗 | 其廿九畝旱敗 |
| 261 | 5 | 980 | 1 | 爲米四斛 | 爲米三斛六斗 |
| 262 | 5 | 980 | 2 | 其米四斛。 | (注[二]認爲常限田米四斛、餘力田米四斗，合計米四斛四斗，但若常限田米三斛六斗，則與原文合計的四斛符合。) |
| 263 | 5 | 983 | 1 | 佃田……□十二月 | 佃田……[定收六畝，爲米七斛二斗]……□十二月 |
| 264 | 5 | 998 | 1 | 其…… | 其[六畝旱敗不收布]。 |
| 265 | 5 | 1000 | 1 | 其十□畝 | 其十[八]畝 |
| 266 | 5 | 1004 | 1 | 其□畝一百廿步 | 其[十]畝一百廿步 |
| 267 | 5 | 1006 | 4 | 錢五百廿， | 錢一千五百廿 |
| 268 | 5 | 1008 | 1 | 其……。定收五十畝一百廿步 | 其[九畝一百八十步旱敗不收布]。定收五十畝一百十步 |
| 269 | 5 | 1016 | 1 | 其□□畝旱不收布。定收…… | 其[一]畝旱不收布。定收[卅五畝]。 |
| 270 | 5 | 1018 | 2 | 定收十三畝百…… | 定收十三畝百[十步]，(以面積計算。若以米額計算，則“定收十三畝七十步”。) |
| 271 | 5 | 1022 | 3 | 米十斛…… | 米十斛[四斗]…… |
| 272 | 5 | 1023 | 1 | 凡五……其十三畝旱敗不收布。定收……畝 | 凡五[十一畝]。其十三畝旱敗不收布。定收[卅八畝，爲米卅五斛六斗]，畝 |
| 273 | 5 | 1024 | 4 | 錢七千六百□ | 錢七千六百[八十] |
| 274 | 5 | 1043 | 1 | ……皆二年常限。 | [凡九十二畝]，皆二年常限。 |
| 275 | 5 | 1043 | 2 | 凡爲布四匹二丈 | 凡爲布四匹二丈四尺 |
| 276 | 5 | 1061 | 1 | 凡卅七畝 | 凡卅七畝 |

| | | | | | | |
|-----|---|------|---|------------------------------|----------|--|
| 277 | 5 | 1062 | 1 | □□早敗不收布。其五畝餘力田，爲米二斛……爲米三斛六斗。 | | [其廿四畝] 早敗不收布。其五畝餘力田爲米二斛。[定收三畝]，爲米三斛六斗。 |
| 278 | 5 | 1069 | 1 | 佃田……爲米……斛六斗 | | 佃田……[定收廿八畝]，爲米[卅三]斛六斗 |
| 279 | 5 | 1070 | 1 | 其三畝早不收布。 | | 其二畝早不收布。 |
| 280 | 5 | 1073 | 1 | 其□□畝早不收布。定收□□畝 | | 其[九]畝早不收布。定收[廿四]畝， |
| 281 | 5 | 1075 | 1 | 其□□□定收□畝，畝收□□……□ | | 其[十五畝一百廿步早敗不收布]。定收[五]畝一百廿步，畝收[一斗二升，爲米六斛六斗，]…… |
| 282 | 5 | 1076 | 1 | 其十二畝早□不收布。定收……八斛四斗 | | 其十三畝早[敗]不收布。定收[七畝，爲米]八斛四斗 |
| 283 | 5 | 1080 | 3 | 准入米四升 | 准入米四斗， | |
| 284 | 5 | 1086 | 2 | 布一匹二丈二尺 | 布一匹二丈二尺， | |
| 285 | 5 | 1087 | 1 | 凡□□畝 | | 凡[廿四]畝 |
| 286 | 5 | 1087 | 1 | 定收…… | | 定收[十九畝，爲米廿二斛八斗] |
| 287 | 5 | 1091 | 1 | 凡廿一畝卅步，皆二年常限。其六畝二百步 | | “凡廿一畝卅步，皆二年常限。其十六畝二百步”或“凡十一畝卅步，皆二年常限。其六畝二百步” |
| 288 | 5 | 1094 | 1 | 其□八畝早敗 | | 其[十]八畝早敗 |
| 289 | 5 | 1094 | 3 | 凡布二丈五尺 | | 凡布二丈六尺 |
| 290 | 5 | 1096 | 1 | 凡五畝，皆二□□□。其四畝早敗不收布…… | | “凡七畝，皆二[年常限]。其四畝早敗不收布。[定收三畝]……”或“凡十四畝，皆二[年常限]。其四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十畝]……”（若以布額計算，則定收三畝；若以錢額計算，則定收十畝。） |
| 291 | 5 | 1101 | 1 | 凡五十二畝。 | | （“凡五十二畝。”後或脫“其四畝早敗不收布。”。） |
| 292 | 5 | 1109 | 1 | 其十一畝二年常限。其□畝 | | 其十七畝二年常限。其[十二]畝 |
| 293 | 5 | 1110 | 1 | 二年常限……五斗 | | 二年常限。……[定收六十畝]……五斗 |
| 294 | 5 | 1111 | 1 | 皆二年常限定收□□畝 | | 皆二年常限。定收[十七]畝 |
| 295 | 5 | 1112 | 2 | ……畝皆二年常限。 | | ……[凡一百卅四]畝，皆二年常限。 |
| 296 | 5 | 1113 | 1 | ……其五畝早敗 | | ……[凡十二畝]……。其五畝早敗 |

| | | | | | | |
|-----|---|------|---|----------------------|----------------|---|
| 297 | 5 | 1114 | 1 | 其□□畝早敗不收布……十二月 | | 其[卅五]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廿九畝，爲米三十四斛八斗]…… |
| 298 | 5 | 1118 | 1 | ☐皆二年常限。 | | ☐(……[凡廿三畝百九步])皆二年常限。 |
| 299 | 5 | 1120 | 1 | ……皆二年常限。 | | ……[凡廿八畝]，皆二年常限。 |
| 300 | 5 | 1120 | 2 | ……丈四尺 | | ……[五]丈六尺 |
| 301 | 5 | 1120 | 3 | 錢二千一百卅…… | | 錢二千二百卅…… |
| 302 | 5 | 1122 | 1 | ☐……二年常限。☐……爲米九斛六斗 | | ☐……[皆]二年常限。☐……[其三畝餘力田，爲米一斛二斗。定收七畝，爲米八斛四斗……凡]爲米九斛六斗 |
| 303 | 5 | 1123 | 1 | ……皆二年常限。 | | ……[凡一畝]，皆二年常限。 |
| 304 | 5 | 1124 | 1 | 其…… | | 其[四畝早敗不收布]。 |
| 305 | 5 | 1125 | 1 | 佃田……卅步 | | 佃田……[凡八畝二百]卅步 |
| 306 | 5 | 1127 | 1 | ……其廿畝二年常限。 | | ……[凡廿一畝]，其廿畝二年常限。 |
| 307 | 5 | 1127 | 1 | 其二…… | | 其十二[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八畝，爲米九斛六斗。畝收步二尺。其米十斛……] |
| 308 | 5 | 1129 | 1 | 凡□畝，皆二年常限。其廿畝早……定收…… | | 凡[廿五]畝，皆二年常限。其廿畝早[敗不收布]。定收[五畝，爲米六斛。]…… |
| 309 | 5 | 1131 | 2 | 爲米廿三斛八斗 | | 爲米廿二斛八斗 |
| 310 | 5 | 1134 | 3 | 凡爲布…… | | 凡爲布[二匹一丈八尺]…… |
| 311 | 5 | 1136 | 1 | ……其卅二畝二年常限。 | | ……其卅二畝二年常限。(以錢額計算，則餘力田、定收爲三十七畝百廿步。若二年常限合計爲卅二畝，則以旱田二畝、定收卅九畝計算不合。若二年常限合計爲卅二畝，則爲定收卅畝、餘力田七畝百廿步。定收部分三十六斛，餘力田部分三斛，米總計三十九斛。布額爲七丈五尺。但是，錢數三千可能有誤。) |
| 312 | 5 | 1138 | 2 | 凡爲布二匹一丈…… | | 凡爲布二匹一丈[六尺]…… |
| 313 | 5 | 1140 | 1 | ……定收十二畝 | | [其九畝一百廿步早敗不收布]。定收十二畝 |
| 314 | 5 | 1143 | 1 | 其……定收八畝 | | 其[六十二畝早敗不收布]。定收八畝 |
| 315 | 5 | 1145 | 1 | 其廿畝一百步早敗 | | 其廿畝一百廿步早敗 |
| 316 | 5 | 1145 | 2 | 准入米一斗…… | 准入米一 [斛?]…… | |
| 317 | 5 | 1149 | 1 | ☐皆二年常限。 | | ☐(……[凡七畝八十步])皆二年常限。 |
| 318 | 5 | 1152 | 1 | ☐三畝百廿步 | | ☐(……[凡卅])三畝百廿步 |
| 319 | 5 | 1153 | 1 | 凡□畝，皆二年常限。其七十畝早不收布…… | | 凡[八十一]畝，皆二年常限。其七十畝早不收布。[定收十一畝，爲米十三斛二斗]…… |

| | | | | | |
|-----|---|------|---|-------------------------------------|--|
| 320 | 5 | 1154 | 1 | ……其六十畝五十步早 敗 | …… [凡一百六畝一七十步, 其八十九畝一 百七十步二年常限] ……其六十畝五十步早 敗 |
| 321 | 5 | 1154 | 1 | 其廿九畝□□步 | 其廿九畝 [百廿] 步 |
| 322 | 5 | 1155 | 1 | ……敗不收布。定收一畝 二步 | [其卅六畝百十步早] 敗不收布。定收一畝 十步 |
| 323 | 5 | 1156 | 1 | ……年常限。 | …… [凡十六畝, 皆二] 年常限。 |
| 324 | 5 | 1157 | 1 | ……凡爲米七斛八斗。 | …… [定收六畝百廿步], 凡爲米七斛八斗。 |
| 325 | 5 | 1159 | 1 | 凡十四畝一十步 | 凡廿五畝一十步 |
| 326 | 5 | 1161 | 1 | 定收……畝收布二尺。其 米五…… | 定收 [卅九畝, 爲米五十八斛八斗], 畝收布 二尺。其米五 [十八斛八斗] …… |
| 327 | 5 | 1162 | 1 | □……定收十畝, □爲米 | □…… [其五畝餘力田] ……定收十畝, [凡] 爲米 |
| 328 | 5 | 1166 | 1 | 凡□六畝 | 凡 [六十] 八畝 |
| 329 | 5 | 1168 | 1 | …… 其 二 畝 早 不 收 布…… | …… [凡十一畝], 其二畝早不收布。[定收 九畝, 爲米十斛八斗] …… |
| 330 | 5 | 1171 | 1 | ……畝收布二尺。 | …… [定收十畝, 爲米十斛二斗]。畝收布二 尺。 |
| 331 | 5 | 1171 | 2 | 凡爲布…… | 凡爲布 [二丈] …… |
| 332 | 5 | 1173 | 1 | ☐……曼 | ☐…… [定收十畝, 爲米十二斛] ……曼 |
| 333 | 5 | 1174 | 1 | ☐畝收布二尺。 | ☐ (…… [定收三畝, 爲米三斛六斗], 畝收 布二尺。) |
| 334 | 5 | 1175 | 1 | ☐皆二年常限。 | ☐ (…… [凡廿五斛二百步], 皆二年常限。) |
| 335 | 5 | 1179 | 1 | ……六十一畝 | …… [凡] 六十一畝 |
| 336 | 5 | 1180 | 1 | ☐常限。 | ☐ (…… [凡十畝, 皆二年]) 常限。 |
| 337 | 5 | 1181 | 1 | ☐皆二年常限。 | ☐ (…… [凡五十一畝],) 皆二年常限。 |
| 338 | 5 | 1182 | 1 | ☐常限。 | ☐ (…… [凡十八畝, 皆二年]) 常限。 |
| 339 | 5 | 1183 | 1 | ☐畝收米一斛二斗, 凡爲 米…… | ☐ (…… [定收五畝]), 畝收米一斛二斗, 凡爲米 [六斛]。 |
| 340 | 5 | 1184 | 1 | ……凡爲米廿六斛 | …… [定收卅畝], 凡爲米卅六斛 |
| 341 | 5 | 1185 | 1 | ……畝, 皆二年常限。畝 收米一斛□□, 凡爲米八 斛四斗 | …… [凡七] 畝, 皆二年常限。畝收米一斛 [二斗], 凡爲米八斛四斗, (疑脫“定收七 畝”之載。) |
| 342 | 5 | 1186 | 1 | ☐布。 | ☐ (…… [定收二畝, 爲米二斛四斗] ……) 布。 |
| 343 | 5 | 1187 | 1 | ☐……爲米卅二斛四斗 | ☐…… [定收廿七畝], 爲米卅二斛四斗 |
| 344 | 5 | 1187 | 3 | 錢二千一百 | 錢二千一百六十 |

| | | | | | |
|-----|---|------|---|-------------------------|--|
| 345 | 5 | 1188 | 1 | 其□□旱不收布。 | 其〔二畝〕旱不收布。 |
| 346 | 5 | 1189 | 1 | 凡為米十五斛 | 凡（……〔定收十二畝一百廿步〕，）凡為米十五斛 |
| 347 | 5 | 1190 | 1 | 凡□□匹九尺 | 凡〔二〕丈九尺 |
| 348 | 5 | 1190 | 2 | 錢□千五百七十 | 錢〔三〕千五百七十 |
| 349 | 5 | 1195 | 1 | 凡卅一畝 | 凡（……〔凡〕）卅一畝 |
| 350 | 5 | 1202 | 1 | 凡畝 | 凡（……〔凡十五〕）畝 |
| 351 | 5 | 1205 | 1 | 凡畝七十步。 | 凡（……〔凡八〕）畝七十步。 |
| 352 | 5 | 1207 | 1 | 凡其卅一畝一百廿…… | 凡（……〔凡九十畝〕，）其卅一畝一百廿〔步旱敗不收布〕。 |
| 353 | 5 | 1208 | 1 | 凡一斛二斗 | 凡（……〔定收十四畝，畝收〕）一斛二斗 |
| 354 | 5 | 1209 | 1 | 凡常限。 | 凡（……〔凡五十九畝，皆二年〕）常限。 |
| 355 | 5 | 1209 | 2 | 布二匹七尺 | 布二匹八尺 |
| 356 | 5 | 1209 | 4 | 錢三千五百□□ | 錢三千五百〔廿〕 |
| 357 | 5 | 1213 | 2 | 畝收布…… | 畝收布〔二尺……凡為布四丈二尺五寸〕…… |
| 358 | 5 | 1216 | 1 | 凡……付倉吏張曼、周棟。凡…… | 凡（……〔定收十六畝，為米十九斛二斗〕）……付倉吏張曼、周棟。凡（……〔凡為布三丈二尺〕……） |
| 359 | 5 | 1225 | 1 | 凡六合，凡為米廿三斛四斗升 | 凡（……〔凡卅畝〕……〔畝收五斗八升〕五合，凡為米廿三斛四斗升，注〔一〕作“升”前脫數字，但“升”為衍文。） |
| 360 | 5 | 1227 | 1 | 凡匹六尺 | 凡（……〔凡為布一〕）匹六尺 |
| 361 | 5 | 1227 | 2 | 錢一千八百 | 錢一千八百卅 |
| 362 | 5 | 1228 | 1 | 凡尺，准米□斗五升 | 凡〔三〕尺五寸，准米〔五？〕斗五升 |
| 363 | 5 | 1229 | 1 | 凡准入米 | 凡（……〔凡為布一丈八尺〕，）准入米 |
| 364 | 5 | 1230 | 1 | 凡五年 | 凡（……〔凡為布三丈四尺〕……）五年 |
| 365 | 5 | 1236 | 3 | 凡為錢……廿 | 凡為錢〔三千一百〕廿 |
| 366 | 5 | 1238 | 2 | 為米二凡其…… | 為米一凡〔百一十五斛二斗〕……其…… |
| 367 | 0 | 8 | 1 | 凡□畝。其……定收……斛二斗，合為米十四斛…… | 凡□畝。其……定收〔十二畝，畝收一〕斛二斗，合為米十四斛〔四斗〕…… |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是經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批准設立的院屬研究中心之一，成立於1995年3月，是國內較早建立的以研究簡帛為特色的專業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秦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室。中心以歷史所的研究力量為主體，同時聯合國內外同仁共同從事簡帛學科的研究。目前，中心已成為一個打破單位、地區界限的簡帛研究前沿陣地。多年來，中心本着“推進學術，加強合作，提高水平”的宗旨，致力於簡帛學科建設、參與新出簡帛的整理與研究、推動國內外學者的合作交流，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效。中心目前編輯有《簡帛研究》、《簡帛研究文庫》，經過長期努力，它們已成為簡帛研究領域較有影響的專業性刊物之一，並被列入國家新聞出版署“十一·五”重點出版圖書。

責任編輯：羅文波 蔣曉玉
封面設計：楊鳳賓

辨析字形 理解文義

環珠重聯 審系篇題

終成圖籍 補史之逸

——張政烺



ISBN 7-5633-6274-6



9 787563 362745 >

ISBN 7-5633-6274-6/K·424

定价:98.00 元